第五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歷史、社會、文化-

The 5th Tamsui Stud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istory, Society, Culture

會議手冊暨論文集

主辦單位：淡江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研究室

合辦單位：臺北縣淡水鎮公所

贊助單位：外交部・僑務委員會

會議時間：2010 年 10 月 15~16 日(星期五、星期六)

會議地點：淡江大學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10 月 15 日)

臺北縣淡水鎮立圖書館演藝廳(10 月 16 日)

第五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歷史、社會、文化-

The 5th Tamsui Stud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istory, Society, Culture

會議手冊暨論文集

主辦單位：淡江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研究室

合辦單位：臺北縣淡水鎮公所

贊助單位：外交部・僑務委員會

會議時間：2010 年 10 月 15~16 日(星期五、星期六)

會議地點：淡江大學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10 月 15 日)

臺北縣淡水鎮公所藝文中心(10 月 16 日)

目　　錄

「第五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歷史、社會、文化」議程表…… II
專題演講人姓名・職稱簡介…… II
會議主持人姓名・職稱簡介…… II
論文發表人姓名・職稱簡介…… II
論文評論人姓名・職稱簡介…… II
會議規則…… II

專題演講

1.林煜堂
砂拉越河畔城鎮古晉的華人文明傳承：兼論對淡水發展的啓示…… 1

2.黃俊銘
地方閒置空間的國際性意義：淡水得忌利士洋行舊址的再詮釋…… 9

與會學者暨發表論文

1．邱馨慧
從雞籠到淡水—荷蘭時代北臺灣的政治經濟移轉…… 19

2．張建隆
淡水在地文化工作與公民行動—記「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一段往事…… 35

3.林承緯
民俗學視野下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議題—兼論對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之啓示…… 73

4．劉綺文
淡水中正路老街行為場域與環境意義…… 91

5．謝美娥
十九世紀淡水廳、臺北府的糧食市場整合研究…… 109

6．林玫君
日治時期台灣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之歷史考察—以臺北州為例…… 149
7．陳俐甫
日治末期日軍在淡水地區活動之軍事史考察…… 201
8．河原功
王昶雄の文学世界…… 209
9．周宗賢、林詠翔、邱怡庭、袁家玉、薛宗銘
淡水糕餅暨印模圖像之研究…… 227
10．曾令毅
從海港到「空港」：淡水港埠變遷與淡水水上機場之發展… 285
11.張寶釧
從在地生活的觀點探討淡水海關碼頭的再利用…… 325
12．張震鐘
閒置空間再利用與地方政府的可作為性…… 337
13．蔡葉偉
論文化硬體管理之地方賦權－以海關碼頭之發展為例…… 345
14 洪致文
洪以南的淡水歲月…… 359
15．周宗賢、王韻涵
初探淡水古蹟博物館之組織與功能…… 377
16．高菱憶
近代台灣氣象制度之建立—以淡水為例…… 413
17．馮文星
一切盡在影像中—淡大一甲子今昔對照…… 427

與會學者、人士名錄…… 429
第五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委員名錄…… 433

「第五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歷史、社會、文化」議程表

會議時間：2010 年 10 月 15~16 日 (星期五、六)

會議地點：10 月 15 日：淡江大學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

10 月 16 日：臺北縣淡水鎮公所鎮立圖書館演藝廳

2010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五)

08:50~09:10　報到

09:10~09:30　虞國興學術副校長、蔡葉偉鎮長開幕致詞

09:30~10:00　林煜堂（Dr. Lam Chee Kheung）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砂拉越河畔城鎮古晉的華人文明傳承：兼論對淡水發展的啟示」

10:00~10:20　茶點

第一場 10:20~12:00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羅運治	邱馨慧	從雞籠到淡水—荷蘭時代北臺灣的政治經濟移轉	翁佳音
	張建隆	淡水在地文化工作與公民行動——記「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一段往事	李健鴻
	林承緯	民俗學視野下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議題---兼論對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之啟示	劉俊裕

12:00~13:10　午餐

第二場 13:10~15:10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張勝彥	劉綺文	淡水中正路老街行為場域與環境意義	米復國
	謝美娥	十九世紀淡水廳、臺北府的糧食市場整合研究	李文良
	林玫君	日治時期台灣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之歷史考察－以臺北州為例	吳明勇
	陳俐甫	日治末期日軍在淡水地區活動之軍事史考察	蔡維民

15:10~15:30　茶點

第三場 15:30~17:10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林呈蓉	河原 功	王昶雄の文学世界	傅錫壬 口譯：富田哲
	周宗賢、林詠翔、邱怡庭 袁家玉、薛宗銘	淡水糕餅暨印模圖像之研究	黃繁光
	曾令毅	從海港到「空港」：淡水港埠變遷與淡水水上機場之發展	蔡錦堂

2010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六)

第四場 08:30~11:30

閒置空間再利用與地方賦權座談會		
專題演講 08:35~09:35 黃俊銘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地方閒置空間的國際性意義－淡水得忌利士洋行舊址的再詮釋		
文化議題，在地發聲－提出行動的策略紀錄片觀賞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黃繁光	張寶釧	從在地生活的觀點探討淡水海關碼頭的再利用
	張震鐘	閒置空間再利用與地方政府的可作為性
	蔡葉偉	論文化硬體管理之地方賦權－以海關碼頭之發展為例
	綜合討論	

11:30~12:50 午餐

第五場 12:50~15:00

主持人	論文發表人	論文題目	評論人
吳文星	洪致文	洪以南的淡水歲月（1913-1927）	周宗賢
	周宗賢 王韻涵	初探淡水古蹟博物館之組織與功能	張寶釧
	高菱憶	近代臺灣氣象制度之建立—以淡水為例	洪致文
	馮文星	一切盡在影像中－淡大一甲子今昔對照	

15:00~15:10 閉幕式：淡江大學文學院邱炯友院長主持

專題演講人姓名・職稱簡介

依姓氏筆畫排序

林煜堂　砂拉越馬來西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黃俊銘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會議主持人姓名・職稱簡介

依姓氏筆畫排序

吳文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呈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張勝彥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黃繁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羅運治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論文發表人姓名・職稱簡介

依姓氏筆畫排序

王韻涵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吳梅瑛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林承緯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玫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兼體研中心主任
林詠翔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
河原功　東京大学文学部兼任講師・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兼任講師
邱怡庭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學生
邱馨慧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洪致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
俞怡萍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所碩士
袁家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學生
高菱憶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張建隆　淡水社區大學主任
張震鐘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
張寶釧　淡水古蹟博物館第一任館長
陳俐甫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曾令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馮文星　淡江大學教學科技組編審
劉綺文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潘依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
蔡葉偉　淡水鎮鎮長・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瑪利大學教育領導博士
薛宗銘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學生
謝美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評論人姓名・職稱簡介

依姓氏筆畫排序

米復國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吳明勇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李文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李健鴻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

翁佳音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寶釧　淡水古蹟博物館第一任館長

傅錫壬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榮譽教授

富田哲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口譯)

黃繁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

劉俊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蔡維民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所長

蔡錦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會議規則

一、主持人致詞與介紹發表人、評論人為 3 分鐘。

二、每篇論文發表人報告時間為 15 分鐘。工作人員將於 13 分鐘按鈴一短聲，15 分鐘按鈴一長聲表示發表時間結束，請即結束報告。

三、每篇論文評論人時間為 7 分鐘。工作人員將於 6 分鐘按鈴一短聲，7 分鐘按鈴一長聲表示發表時間結束，請即結束報告。

四、每一場次於所有論文發表及評論後，開放會場發言討論，發言人每人以 2 分鐘為限，並以一次發言為原則，發言人請先報姓名職稱，亦請將所提問題填入發言條，於會後交予會場工作人員，以便記錄整理。

五、論文發表人綜合回應時間為 5 分鐘。

六、敬請謹守議事規則。

砂拉越河畔城鎮古晉的華人文明傳承：兼論對淡水發展的啓示

林煜堂*

河流與文明

文明的定義是指一種先進的社會和文化發展狀態，以及達到這種狀態的過程，這包括民族意識，技術水準，禮儀規範，宗教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文明國家的起源都與江河息息相關，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個文明國家，它們都是依靠河流建設起來：其中美索不達米亞(或巴比倫)依靠底格裏斯河，幼發拉底河；埃及和非洲的文明是靠尼羅河；中國的文明是靠黃河及長江；而印度的文明是靠印度河及恆河。這四個歷史古國都是發跡於河川地帶，原因不外是河流有固定的水源促使農業、航行及商業發展。

本文將探索馬來西亞砂拉越州境內砂拉越河畔的一城鎮古晉市（Kuching），以這裡華人的社會和文化，經歷百多年的演變來說明它進步的狀態與過程。古晉華人社會和文化進步的狀態與過程，則透過華人的民族意識，居住環境，美食，社團組織，宗教信仰，教育，職業，以及政治組織與力量來說明。

砂拉越簡概

攤開世界地圖，在新加坡東方的一個大島，也就是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西北部就是馬來西亞的其中一個州屬砂拉越(Sarawak)。砂拉越的面積 124,450 平方公里，是馬來西亞十三州當中面積最大的一州，北臨南中國海，南與印尼領土西加里曼丹相接，東與汶萊及沙巴州交界，人口約兩百七十萬。

砂拉越州境內江河密佈，流域廣闊，長期依賴水路運輸，很多的城鎮便在沿河地帶建立起來。其中砂拉越河長一百三十五公里，它是開啓華人定居砂拉越的名川，也塑造古晉市成爲首府以及它進步、繁榮的美譽。古晉社會從布洛克(Rajah Brooke)王朝統治前的馬來小村落，演進成爲一個以華人居多的城市，也是華人移民轉往砂拉越內陸其他地區的重要門戶。

砂拉越的歷史

砂拉越原屬汶萊蘇丹所有，1841 年英人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oke)因協助汶萊蘇丹敉平地方叛亂，而取得這片土地的統治權。1868 年詹姆士外甥查爾斯·布洛克(Charles Brooke)繼位，成爲第二代拉者，他大量招徠華人移民，對砂拉越領土的拓展及經濟建設，貢獻顯著。第三代拉者維納·布洛克(Vyner Brooke)於 1946 年日本投降後，將砂拉越讓渡于英國。砂拉越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脫離英國殖民地統治，加入馬來西亞成爲馬來西亞聯邦的一個州屬。

*砂拉越馬來西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華人人口史話

常言道：「有水的地方就有人，而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國人」。這句話說得一點也不誇張。今天，華人足跡遍佈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別的不說，單單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總人數已不下三千一百萬，居住在馬來西亞的華人有七百萬，而砂拉越的華人也超過了六十萬。砂拉越的華人也像移居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一樣，以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廣東，福建，廣西，以及海南島四省的人民爲多。

根據史實記載，砂拉越與中國的關係曾經有過一段很長的歷史。大概一千五百年前，砂拉越與中國已有商業來往。明末清初已經有華人從中國來到砂拉越，他們南來的動機是出自中國國內政治動亂，民生問題所使然。雖然當時的砂拉越還是草莽未開，蚊蟲混雜，但由於地廣人稀，耕種有地，華人也甘冒險來謀生；加上華人能憑著優良傳統的農耕技術，以及高超的手藝，也還能克服困難以及迎合當時土酋統治者的心理，所以不論經商，買賣或者是闢地而耕，總也還能獨處一偶，與當地社會相輔而成。當然，這期間華人人口的數目少有紀錄可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那時在砂拉越的華人人口不多，而且流動性很大，一些零星史料記載在某一蘇丹統治期間，由於清廉潔政，河口停泊著很多中國帆船，而岸上也有很多華人從事農務，相反地，在其後另一個時期，由於蘇丹的敗政，華人也便離此而去，造成良田荒廢，帆船絕跡的現象，這說明瞭當時華人去留很能自已選擇；加上早期南來的華人，雖是爲了逃避清廷的暴政，但也還受到禮教思想的影響，鄉土觀念濃厚，因此總希望在國內政治稍爲安定時便回鄉，或是待稍有儲蓄時，便賣棹返鄉，根本沒有作長久居留異邦的打算，更不願客死異鄉。最早定居在砂拉越的華人可能是一些在遠航政府或商船留下的船員，這些華人船員跟土著婦女結婚，很可能就是早期砂拉越一些民族的祖先。

根據資料顯示，英人詹姆士布洛克在 1839 年第一次來到古晉時，他已看到有二十名左右的華人，而過了一年以後，當他平定內亂後，在他的軍隊中，已有一小隊華人士兵，這說明在這以前，華人在古晉已居住了一段長久的時間。

可確定的是，西元 1830 年前已經有大批客藉人士從印尼西加里曼丹移居古晉附近的石隆門（Bau），從事採礦；1930 年，更有粵藉人士劉捷和他的幾位同鄉由廣東省直接乘帆船來到成邦江（Sembahyang），但過了不久，便轉到古晉定居。福建人王友海及林英茂等人在 1841 年從新加坡來古晉經商，過後不久，便有很多福建人由新加坡或中國廈門來古晉做生意。閩藉詔安人田考是在 1846 年由家鄉乘船到砂拉越古晉附近的石隆門。潮藉人士劉建發是在 1852 年帶領一批同鄉由中國的汕頭到古晉附近落戶。

砂拉越是一個多元種族的社會，1841 年砂拉越華人人口只有 1,000 人，1876 年華人人口 4,947 人，佔砂拉越總人口的 3.9%，到了 1909 年增加至 11%，其後到 1960 年，華人人口佔了砂拉越州總 人口的三份之一，今天，華人人口大約是六十萬，比例下降至二十六%。砂拉越的其他民族人數依次爲伊班人，馬來人，畢打友人，馬蘭諾人及其他內陸民族。

古晉的地理環境

古晉位於砂拉越河畔 離南中國海海口三十二公里處，面積爲 431.01 平方公里，人口約六十五萬。古晉是婆羅洲島上最大的城市，是砂拉越的首府，爲砂拉越州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行政中心。古晉的人口以華人居多，佔 38%；馬來

人 36%；伊班人 10%；其他民族 16%。華人以福建，客家人爲主，其次是福州，潮州，海南，廣東，和興化及其他藉貫人士。古晉居民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佛教，道教及回教爲主，其中華人信奉佛教，道教及基督教；馬來人是回教徒，而達雅人多數信奉基督教。大部份古晉居民，懂得講馬來語、英語，而當地華人也會說華語及方言。方言以福建話最流行。

古晉的歷史

古晉從 1827 年開始被汶來蘇丹的代表指定爲砂拉越的首都，當時古晉就等於砂拉越；一直到了 1872 年第二代白人拉查統治砂拉越時，砂拉越的領土擴張，才把砂拉越的舊區定名爲古晉。古晉名稱的由來是取自該地的一條小河，Kuching；該小河源自長滿龍眼的山嶺，而龍眼被土人稱爲貓眼，即 mata kuching，古晉因此而得名，至於古晉的中文譯名如何取得，則無從考核。

古晉的人文概況

一百多年前，古晉只是一個馬來小漁村，人口很少，華人聚居的地方都是臨河的沼澤地和亞答芭，海唇街(Main bazaar)依砂拉越河河畔而建，是華人在古晉最早開闢的商業區，初期是一排亞答店屋，1872 改用磚瓦建成目前的兩層與三層店屋，當時店鋪大都是經營米糧雜貨，土產買賣，店前也建有木材碼頭和倉庫供起卸儲存用途。如今老街的幾栜舊店，古樸的街坊依然佔據市區心臟地帶，依然是古晉市民們每天穿梭過生活的地方，只不過老街的範圍已經向外擴張。

舊時的古晉，民風純撲，一切都很簡陋，馬路狹窄，塵土飛揚，交通工具還是牛車、人力車、手推車，隨意自由通行；1868 年開始，古晉的街道，溝渠和建築物才加以改進，而古晉市中心卻是在 1884 年大火後才重建。這時期，古晉也建造了很多維多利亞式的政府建築，以及一些通訊系統和娛樂設施。之後，第三代拉者繼續發展，如今，這些街道已經全部是鋪上瀝青的雙向四車道，而且很多都實行單向交通管制，交通工具已經不再是牛車、人力車和手推車，全部已經由汽車和電單車取代。

古晉在 1988 年 8 月 1 日升格爲市，經過了整二十年的發展，它沿河毗鄰的地區已經建造了多間十多層樓的星級酒店，商業店，公寓；至於以前泥濘不堪的河岸地帶，古晉最早的海唇街沿岸碼頭、倉庫及菜、魚、肉公市已經被折除，改建成供休閑的河濱公園，而砂拉越河下游也建築起水匣來控制河水，作爲濾水和防洪之用。近年來，政府大力促進旅遊觀光事業，古晉迎來很多外國觀光客，古街更是遊客的集聚地，這裡多數的舊店已經改頭換面，不再經營雜貨和土產，改做迎合遊客消費的本地土著製作的手工藝品、衣飾、土產、古董及旅遊紀念品生意。如今，古晉的道路通暢、市容整潔，是馬來西亞最清潔城市之一，並獲得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推選爲 2005 年亞洲最適合居住城市之一。

近年來，古晉的發展已經逐漸從市中心向東南區移動，這些新興的市鎮建設在以往老一輩眼中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如今卻是商場雲集，學校，疹療所，銀行等樣樣俱全，生活方便。

古晉華人社會和文化的變遷

民族意識

華人身份認同的轉變，二戰後以迄 50 年代初期，砂拉越華人仍然以華僑自居，即使在中共在中國大陸獲得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華人在居留地不能擁雙重國藉，但是華人仍具有雙重認同。在 50 年代末期，馬來亞獨立後，由於馬、中雙方對公民法的制行，華人不再被允許兩國自由往來，才逐漸放下遷民的身份，歸屬於馬來西亞。現在砂拉越的華人已經完完全全是土生土長的馬來西亞公民。

華人居住的環境

華人店屋是砂拉越城鎮的特色，店屋的形式和結構也像東南亞華人集居城市的一樣。早期，華人店屋都是兩層樓的木板或磚屋，樓下供做生意用，店主全家人甚至兩三代家庭都一齊住在樓上。今時，古晉的老店除了用來做生意外，樓上已經很少住家，這是因爲店屋摟上的居住空間有限，環境不盡理想，加上近年來華人的經濟狀況提升，古晉郊區建設了很多住宅，它們都具備了良好的基本設施，既方便也舒適，造成了很多華人家庭已不再群居在店屋樓上，甚至個別家庭在房屋區也分開購屋居住，這樣便造成了華人傳統大家庭的觀念，包括父子關係，祀拜祖先，家庭的名譽地位以及祖產共有權鬆弛，進而導致很多華人傳統的習俗和禮節流失。

華人的美食

古晉老區的另一條街—亞答街，除了有四間古廟，同時也是古晉美食的集中地，其中依偎在上帝廟的開放式食坊，所售賣的食物更是遠近馳名，食客雲集。其中著名的美食粿雜、叻砂、鮮料麵、魚丸，沙爹、肉粥、魚粥，炸香蕉都集中在這裡，據說在別個地方經營的同樣美食很多是從這裡走出去，因此都會冠上“亞答街”的美名，譬如 「亞答街粿雜」、 「亞答街魚粥」等等。這條街也保留了最多海南人開設的咖啡店，一共有五間之多，這些咖啡店內的茶桌很多還沿用著舊式的雲石桌面以及木質的架子和座椅，充滿古早味。由於老街人口流失，鄰近各住宅區內大型飲食店林立，居民也因爲老街泊車不便，來這裡消費的人數相應減少，現在這裡的生意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遊客來支撐。

華人的社團組織

砂拉越的華人相當注重血緣關係，所以成立了很多姓氏宗親會，總共有六十間之多，其中古晉就佔了 34 間(林煜堂，1989:81-83)；同時華人也很借重于同一方言族人的地緣力量來達致族人的團結，方言地緣公會林立，其中廣府人的廣惠肇公會成立於 1853 年，潮州人的潮州公會在 1864 年，福建公會在 1871 年，嘉應同鄉會在 1881 年，瓊州公會在 1898 年，福州公會在 1930 年，客屬公會在 1934 年，其後各方言公會也相繼成立，這類社團組織總共有 93 間。早期，這些社團幫派分明，各自擁有實力，互相競爭。至於業緣性的組織也比比皆是，各立山頭。到了廿世紀初期才出現超幫派的華人社團組織，即中華總商會，再後又有華人社團聯合會的設立，這些華社的最高社會機構，由各會員公會選出代表組成理事會來共同處理華社的事務，取代了個別鄉社組織的作用。

早期，宗親血緣組織及方言組織對華人社會深具影響力，因爲它們發揮互助互惠的功能，尤其是在慈善、福利和教育事業方面。這些現象的存在是因爲華族傳統文化認爲宗親血緣組織是家庭組織的擴大，它的形響力駕馭個別家庭的地位；加上早先華族移民多數透過同鄉親戚的引介到這裡；而且移民多數隻身南來，缺

乏了傳統直系家庭和親屬的關懷和照顧，宗親及姓氏公會便在個人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也製造了從屬階級的觀念，因此傳統的思想和觀念便容易被推動和被遵守。不過，今天砂拉越的宗親、鄉團組織的傳統功能已經衰退，因爲砂拉越土地幅原廣闊，同宗親屬不一定在同一地方生活；加上地方遠隔，交通不便，集聚在一起的機會少；再者，華裔的土生一代互相交往，突破了姓氏的藩籬；同時華裔的新生代在學校接受的教育以華語、英語或國語作媒介，取代了方言的功能；加上華人年青子弟從事農業活動的人數逐年減少，從事工、商業的人數逐年增加，職場流動性大；而宗親會的傳統活動缺乏吸引力，年青人都不熱衷參予，很多公會都出現領導人青黃不接的現象，活動也相應減少。

華人的宗教信仰

砂拉越華人非常重視神靈的力量，認爲它可以祈福避災，所以建立了很多神廟供膜拜。砂拉越華族民間信仰的神，包括了自然神，圖騰神與人神，是佛教與道教的神譜系中的人物(劉伯奎，1993:155)。華人民間的傳統信仰可謂多采多姿，但卻有一個相同的社會根源，那就是早期華人對客觀惡劣的生活環境與個人命運感到迷惘和不安，因此有強烈的欲念求助神明保佑，這些事實可以從開荒時間越早和生活環境較惡劣的華人聚集地，神廟的數目眾多的情況得到証明。

在砂拉越河兩岸，便有大大小小的華人神廟二十多間，單單在古晉市區，較具規模的神廟，便有六、七間。其中隔著海唇街的另外一條老街，亞答街，就有四座超過百年歷史的神廟，它們是玄天上帝廟，天后廟，鳳山寺和壽山亭大伯公廟。大抵來說，古晉的潮州人是信奉玄天上帝，福建人是信奉聖王公，海南人信奉媽祖，廣東人信奉關公，客家人拜三山國王和譚公仙聖，而福德正神大伯公，即土地神，是一般華人都信奉的神明。由於華人族群各有他們崇拜的神明，所以這些神廟的事務便由各屬公會管理。砂拉越全部註冊的宗教團體一共有 140 個之多(林煜堂，1989:68)。

今天古晉已進入現代化城市的發展，華人生活的環境與素質已經提高，對傳統神明的依賴和企求肯定相應地降低，這可以從華人信奉其他宗教逐年增加得到印証。其中原因也包括許多華族子弟在英文學校接受教育，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他們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這可以從華人基督徒的人數逐年增加看出，計 1970 年，華人基督徒佔華人人口的 18.9%；1980 年，23.3%；1991 年，27.4%；至 2000 年的 34.9%(Lam,2005:37)；同時也有華族青年男女因爲與回教徒通婚而皈依回教，其比例也有逐年增長的趨勢，計1970年，華人回教徒只佔華人人口的0.2%，1980 年也維持在 0.2%的水準，1991 年卻增加到 0.4%，2000 年更增加到 1.4%(Lam, 2005: 39)。

華人的教育

語文是一個民族用來傳遞和表達文化的工具。華族母語教育也就是華人以本身祖先的語文來教導其後代有關的生活科技和做人處世以及行爲道德規範的方法。砂拉越華人對母語教育非常重視，正式的華文學校是 1870 年創立在古晉附近砂南坡的一間私塾，其後在 1904 年在倫樂也有華小的設立，而 1911 年第二省的成邦江也設立了華校，1912 年第五省林夢（Lambang）也有華校的設立。

古晉最早的一間華文學校是福建學校，它創立於 1912 年，是由福建人創辦，1916 年潮州公會也開辦民德學校；1917 年廣惠肇公會開辦益群學校；1923 年大

埔同鄉會開辦大同學校；嘉應同鄉會開辦公民學校；1936 年客屬公會合併大同及公民兩校，成立越光學校。這些學校都以創辦公會的方言教課，一直到 1920 年才成立校董會，採統籌統辦，統一教科書，用華語教課。華文小學的數目在 1957 年達到 246 間，不過時至今日，華文小學的總數已減少到 228 間，學生人數大約 58,000 人。華小數目減少的原因是學生來源減少，特別是鄉區華小，這種現象存在是因爲很多華人家庭從鄉區移往市區；現代華裔家長對母語教育缺乏熱心；也有些父母是爲了貪求方便和節省些少的學校費用而把子女送進政府小學上課，因爲政府小學是全津貼學校，沒有收學費及雜費，包括建校基金，而華小卻需要繳交些少費用。不過還是有 90%的華族學生在華小就讀。

古晉市區設有三間民辦中學，也就是獨中，這些學校沒有得到政府津貼，經費全都由校董會向華社籌募，教學以華語爲媒介語。三間獨中共有學生一千六百名，其辦學目標是維護華文教育，發揚中華文化，發揮中等教育功能，成人成才，爲邦國及華教儲才。獨中需要繳交比政府中學較高的學費，只有 10%華族學生在獨中上學。

砂拉越的華族青年前往世界各國留學的人數眾多，他們學成歸來，擴展了本地人的全球觀念和宏觀視野。

早期的華人移民很多都是目不識丁或者文化水準低落，來到砂拉越後感同身受，便開辦學文學校供子孫受教育，在先輩的努力推動下，華人的識字率便逐年增進，根據統計，華人 15 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在 1960 年僅佔 49.6%，1970 年增加到 70.1%，1980 年，74.3%，1991 年，88.6%，到了 2000 年，華人人口的識字率已達到 92%，華人文盲幾乎已經完全不存在(Lam,2004:8)。

華人的職業

早期華人來到砂拉越大都從事農耕，勞力工作及採礦。以農業爲例，在 1960 年，華人從事農耕的人口佔了華人勞動力的 58.5%，1970 年降至 35.2%，1980 年再下降至 27.8%，1991 年下降至 19.9%，而 2000 年只有 10.5%，這說明瞭現在砂拉越的華人從事農業活動的人數已微不道(Lam,2004:9)，而工、商業領域的活動已經取而代之，佔了領導地位。在商業方面，有超過 80%是由華族經營。

除了農耕，早期華人的其他職業在很大程度上與族群方言有直接關係，那就是廣東人多從事鐘錶、打金業；客家人絕大多數從事賣菜、裁縫和打鐵；興化人多數從事捕魚、開巴士及腳車業；江西人多數是木匠；海南人多數經營咖啡店；福建及潮州人多數經營洋雜及土產出入口生意；詔安人多數是從事建築及碼頭搬運工作(T’ ien, 1997:77)。時至今日，華人從事的傳統職業已不再局限於某一特定的方言族群，各行各業都有不同的方言族群參與，甚至很多行業，尤其是飲食、木工、建築、捕魚和開巴士已經是由本地土著或者外勞替代。這顯示古晉的各個行業已經打破由華人方言族群或且華人獨佔的局面，各個民族也分享到市場經濟的蛋糕。

華人的政治組織與力量

馬來西亞中央政府採用聯邦制，擁有民選的國會，各州擁有各自的立法機構，砂拉越州的統治者是州元首，他的職位是由最高元首委任。砂拉越州設有州政府和州立法議會。州政府是由民選州議員組成，而州議員是每五年選舉由人民投票選出。馬來西亞的政治是多黨制的政黨制度，但並非如西方的多黨制，它是一種

由多個政黨聯合組成政黨聯盟執政的制度，目前聯盟政府由 13 個成員黨組成。

在砂拉越州設有 31 個國會議席和 71 個州議席。州政府是由州國陣成員黨的州議員組成，州國陣的成員黨有四個，另外有三個反對黨。其中執政的國陣成員黨中的人民聯合黨(SUPP)是以華人爲主的政黨，它從 1970 年開始是國陣中代表全體華人的強勢政黨，不過到了 1979 年，西馬的反對黨民主進步黨(DAP)東渡砂拉越，砂拉越華人的政治舞臺開始起變化，這種變化直到 2008 年更顯凸出。該年的州立法議會選舉，反對黨民主進步黨一舉從執政的人民聯合黨手中奪取了六個議席，使到人民聯合黨從 1970 年的 12 州議席減至現在的的席，華人在政府的代表力量因此大大削減。

砂拉越華族政治力量的分化，顯然已影響到華族社會的結構，無可避免的是，華團也受到政黨政治的沖擊，在社團內，意見分岐，削弱了社團的凝聚力，大大地減低了社團的功能。

老市街，新風貌：淡水與古晉發展的再思考

淡水鎮與古晉市都是建立在河畔的城鎮，都俱有文明發展過程的事實，尤其是這兩個地方的老街更是可以用來說明進步的社會與文化發展的狀態，以尋找出它遺留下的價值觀，作爲歷史的根椐。

據瞭解，淡水港周邊地區是台灣北部最早開發的地區之一，一直以來就是一個工商業活動頻繁，文化昌盛的地方。儼如古晉市，它也是砂拉越開發最早的地方，兩地有著共同的的歷史價值。跟隨歷史的演進，淡水河在日據時代以後由於河口泥沙逐漸淤塞，加上基隆港的崛起而逐漸喪失做爲商港的地位；而砂拉越河也因爲疏流防洪被截流，加上航空運輸的發達，使到它在物流運輸方面失去了很大的功能。不過，淡水鎮與古晉市並沒有因爲河流環境的局限而裹足不前，它們仍舊向前發展，並且順應潮流改變了發展方向，雙雙都朝向旅遊觀光事業發展。如今，淡水鎮善用老街的許多古老文化景觀，諸如舊街坊，老式磚造店屋，還有老廟宇，諸如建於 18 世紀的開佑宮，19 世紀的文昌祠，龍山寺以及 20 世紀初的祖師廟，吸引遊客；至於歷史悠久的淡水老街—中正路，那裡餐館所提供的各種海鮮美食，還有其他小吃佳品，如淡水魚丸、魚酥、鐵蛋、阿給等更是炙人口味；除此以外，淡水老街也開設了很多古董店及民藝品店，充滿了文化氣息，人人嚮往；至於淡水河優美的河堤岸，也是遊客休閒的好去處。古晉市的老街仿佛是淡水鎮的翻版，海唇街、亞答街的老街坊、老式磚造店屋和四座古廟，即玄天上帝廟，天后廟，鳳山寺和壽山亭大伯公廟，配合本地的美食：粿雜、叻沙、魚丸，還有許多古董及手工藝品專賣店，以及供遊客休閑怡情的河濱公園，是觀光旅遊的好地方。上述的文化及地景變貌，值得研究者進一步深思及探索。

結語

砂拉越華人的社會結構經過了百多年著實的發展和調整，已經從遷民的本質轉變成大馬永久公民的特質，其時空的觀念已不再是暫時落足和客居，而是永久性的紮根定居；而其理性的意識也從強烈依附到有伸縮性的揉合，那就是說華族從中國帶來了很多鄉土習俗，但也採納了本地友族社會的一些習俗，而進一步把它們揉合成爲並不完全是中國化但也非完全是本土化的文化，這對華族的傳統社會結構起著一定的影響。

現在，砂拉越華族的社會結構已經不再是固封自守，而是更具開放性；其功能也不僅僅止於單一族群或單一方言和地域人士的慈善，福利和教育事業，而是推向更廣大的社會，國家人民的生活事業。砂拉越華族進步的社會與文化發展狀態以及達到這種發展狀態的過程，可以從華族的民族意識，居住環境，美食，社團組織，宗教信仰，教育，職業，和政治組織與力量等方面去瞭解。

古晉老街的今日風采應該就是當地族群推動進步的社會與文化發展的結果，而淡水鎮老街的情況也應該不會例外。

參考文獻

劉子政，《砂拉越史事論叢》，拉讓出版社，1987 年。

黃建淳，《砂拉越華人史研究》，東大圖書公司發行，1999 年。

劉伯奎，《砂拉越河畔的華人神廟》，砂隆印務有限公司，1993 年

林煜堂，《煜堂論說集》，砂隆印務有限公司，1989 年

Lam Chee Kheung , “Demographic Change of the Chinese in Sarawak, 1960-2000”,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October 2004

Lam Chee Kheung, “The Chinese Muslims in Sarawak”,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i Malaysia Sarawak, June 2005

T’ien, Ju K’ang, “Chinese of Sarawak：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Research & Resource Centre Committee, SUPP Headquarters, 1997

http://taiwantour.gogocn.com/380/sight-3084.htm

地方閒置空間的國際性意義：淡水得忌利士洋行舊址的再詮釋

黃俊銘[*] • 潘依凌[**] • 俞怡萍[***] • 吳梅瑛[*,***]

一、前言

本文爲淡水市街歷史研究的一環，旨在藉由清末淡水「得忌利士洋行」（Douglas Lapraik & Co.）舊址變遷的研究，瞭解此閒置的淡水紀念性建築的歷史價值，並進而詮釋淡水市鎮在東亞區域的國際性意義。本文由清末此洋行周邊土地的軍事性格談起，說明日後淡水開港與洋行選址的關係，並透過汽船航運公司得忌利士洋行的興衰，與該設施的變遷過程，瞭解日治末期此洋行舊址使用的官廳官舍化，以及戰後多元族群聚居使用的實態。最後以此洋行舊址建築再利用的實例，闡釋淡水市鎮作爲亞洲區域港市之一的歷史地位。

本文爲歷史論述性之研究，參考前人研究的成果，並使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及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所藏古地圖，與日治時期新聞報紙、出版刊物，以及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所藏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公文檔案，淡水鎮地政事務所收藏之日治時期土地台帳與戰後土地登記簿，戶政事務所收藏之日治與戰後戶口登記簿等史料，對照耆老與居民提供的老照片與口述歷史，以整理過去的歷史片段，釐清史實作爲歷史詮釋的依據。

二、清末淡水烽火段的土地與軍事設施

本文所論之得忌利士洋行位於淡水烽火段的土地上。依據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公文檔史料記載，此烽火段土地位於滬尾市街尾端，在清末開港洋行進駐之前，土地原爲廈門人洪氏所有。然因淡水河口爲軍事重要據點，清廷早在雍正年間在此地設汛駐兵，至嘉慶年間已具有規模之水師駐守滬尾砲台。但清廷自統一台灣後，對台人當兵具有戒心，因而沿用明代班軍制度，由福建、廣東、江西各省抽調兵丁來台駐守[1]。這些班兵爲聯絡同鄉情誼，在兵營附近紛紛設立同鄉會館，此種情形在台各駐紮地十分普遍，在淡水亦同[2]。

然而在淡水之各同鄉會館、甚至軍事設施卻有佔用洪氏私有土地的情事[3]。由 1906（明治 39）年總督府公文類纂收錄之地籍圖與土地所有調查資料對照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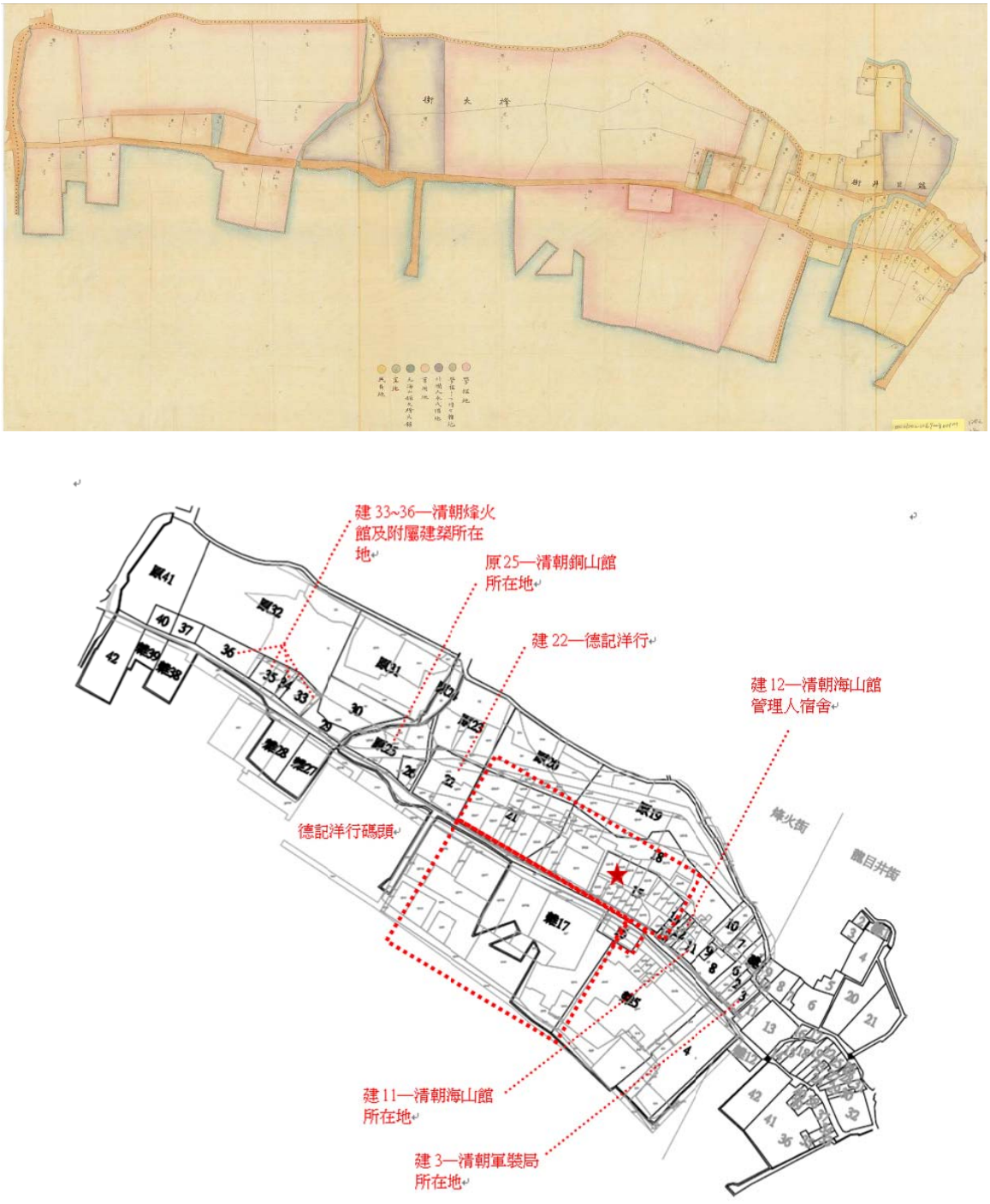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班畢業。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所碩士。
****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1]許雪姬，《清代臺灣的綠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年，P259。

[2]周宗賢，《淡水：輝煌的歲月》，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 年，P139~151。

[3]《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01009，文件號：16，〈臺北廳管下申立人萩原孝三郎外一名芝蘭三堡滬尾街土名龍目井街建物敷地一番其他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裁決ノ件〉，1904（明治 37）年。

知[4]，在清末淡水烽火段土地上，至少設有烽火館（福建水師烽火營班兵所設）、銅山館（福建漳州東山縣水師銅山營班兵所設）、海山館（福建水師海壇鎮標班兵所設）等會館，並有軍事設施「軍裝局」設置於此【圖 1】。顯示當時淡水由油車口、滬尾砲台至烽火段一帶的軍事特質。



【圖 1】1906（明治 39）年淡水烽火街及龍目井街地籍圖（上圖），將其與今日地籍資料疊套圖，建地 22 號爲德記洋行所在，建物雖已不存，但周邊環境與早期地籍相當吻合，建地 15 號則剛好落在本基地上（星號處），虛線框爲原得忌利士洋行的範圍，其餘清末淡水地區幾處重要的班兵設施亦可清楚比對出確實位置（資料來源：總督府公文類纂 01202-6，1906 年）。

[4]《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01202，文件號：6，〈芝蘭三堡滬尾街ニ於ケル官有地學租財團ヘ無償下付等ノ件〉，1906（明治 39）年。

三、淡水開港與對外航運

淡水自 1860（咸豐 10）年開放爲對外通商口岸以來，洋商在此取得租地建屋居住、設立洋行、船舶靠岸、經營貿易的權利。當時在東亞活躍的一些洋行；如英商的怡和洋行（Jardian Matheson & Co.）、顛地洋行（Dent & Co.）、寶順洋行（John Dodd & Co.）、德記洋行（Tait & Co.）、嘉士洋行（Cass & Co.）與本文論述的得忌利士洋行，以及德商的公泰洋行（Buttle & Co.）、美利士洋行（J. Milish & Co.）等皆到淡水設立據點[5]。這些洋行經營鴉片、樟腦、米、糖的進出口，亦投資製茶與煤礦、石油開採等產業，使淡水港成爲台灣北部與大陸兩岸間重要的貿易港口。

1870 年代東亞各港市之間的航運，逐漸由汽船取代傳統的帆船。汽船的遠洋航線以香港、上海、橫濱三大港爲據點，近海航運則由這些國際大港向鄰近的地方港口延伸航線[6]。清末東亞的航運主要爲英商太古洋行（Buttterfield & Swire Co.）控制的中國航業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怡和洋行控制的印度支那航業公司（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美商旗昌輪船公司（Shanghai 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7]與清廷設立的輪船招商局、日本政府支持的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日本郵船株式會社等大型航運公司所掌控[8]。

本文所述得忌利士洋行爲同時經營遠洋航運與近海航運的汽船公司，於 1871（同治 10）年開設台灣與大陸兩岸港口間南北二條定期航線。南部航線以「爹利士」號航行香港、汕頭、廈門與安平港口之間。北部航線則以「科摩沙」、「海龍」、「海門」號航行汕頭、廈門、淡水港口之間[9]【圖 2】，且最遲在 1884（光緒 10）年之前已延伸北部航線至基隆港[10]。

[5]各洋行資料參考自《臺灣歷史辭典》中黃富三所撰寫的相關詞條，及李乾朗主持，《臺北縣縣定古蹟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調查研究及修復計劃》，臺北縣政府，2003 年 4 月，p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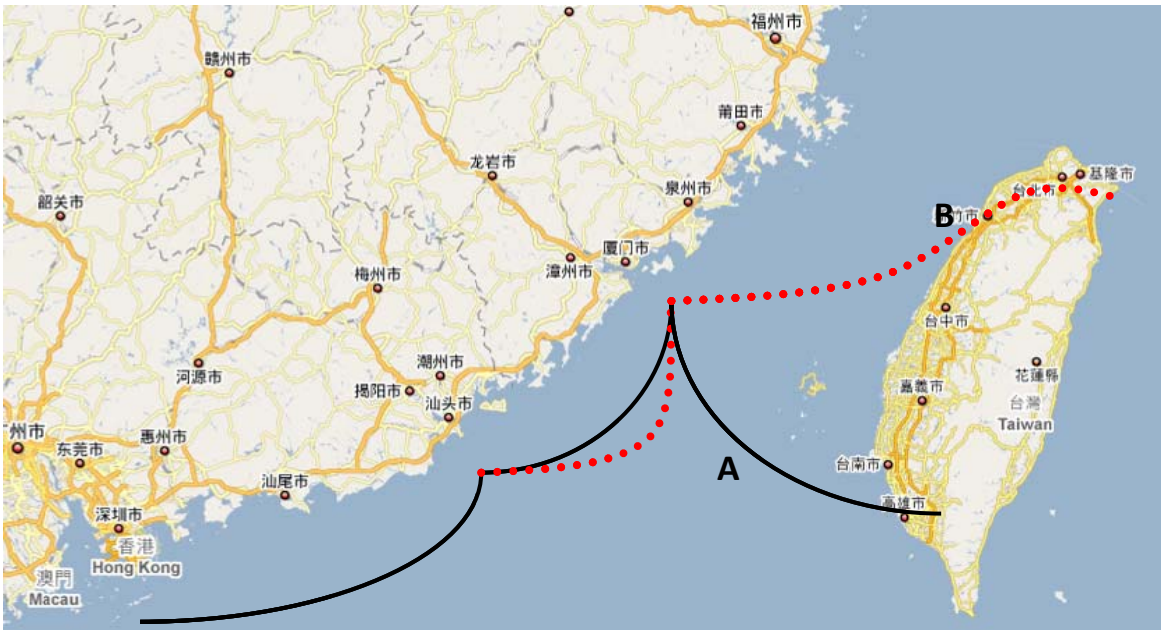
[6]小風秀雅《帝国主義下の日本海運—国際競爭と対外自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 年，p15-26。

[7]小風秀雅《帝国主義下の日本海運—国際競爭と対外自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5 年，p59-60。

[8]森重秋藏，《臺灣交通常識講座》，臺灣交通問題研究會發行，p1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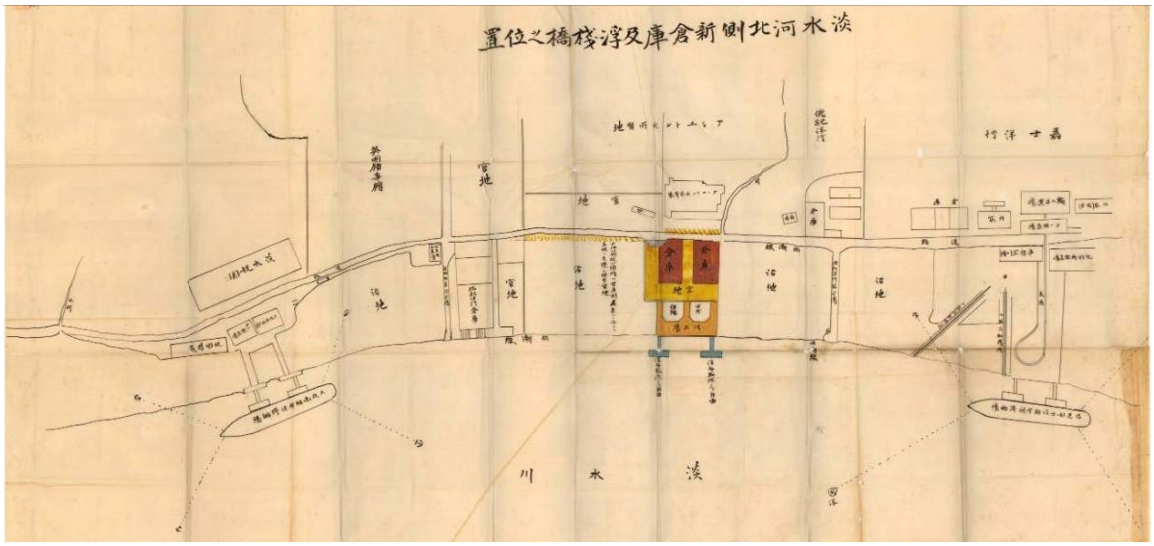
[9]連橫，《臺灣通史》卷十九郵傳志航運，p530。

[10]臺灣文獻叢刊一九二，《法軍侵臺檔》，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上)/福州將軍穆圖善咨呈法艦在基隆購煤被拒等件，p34~35。



【圖 2】據台灣通史所記，1871 年以後道格拉斯公司最初在台經營的兩條重要航線，A 線以「爹利士」號航行，B 線以三艘輪船「科摩沙、海龍、海門」號負責航行。

由 1900（明治 33）年總督府公文類纂收錄之地圖可見，日治初期在淡水烽火段一帶就有雅士頓（F. Ashton）洋行、嘉士洋行與得忌利士洋行，以及日商大阪商船株式會社，設有可停靠大型汽船之碼頭棧橋，而德記洋行與英國領事館前亦設有小型船舶停泊處，可見洋行視淡水烽火段一帶爲商行設址的好地段，以及當時淡水港口對外航運之一斑【圖 3】。



【圖 3】1900（明治 33）年淡水河北側倉庫及浮棧橋之位置圖，右側嘉士洋行處下方碼頭標示有「得忌利士滬船會社停泊場」（總督府公文類纂 00562-9，1899 年）

四、淡水得忌利士洋行的興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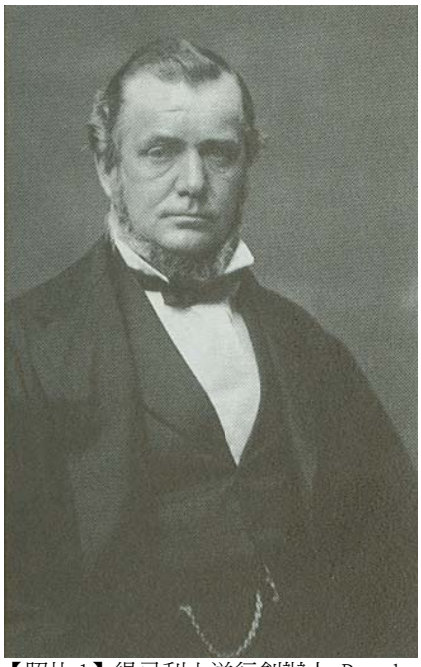
「得忌利士洋行」是清末官方檔案中的名稱[11]，又稱「德忌利士行」或「得

[11] 臺灣文獻叢刊一九二，《法軍侵臺檔》，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上)/福州將軍穆圖善咨呈法艦在基隆購煤被拒等件，p34~35；「梁倅查知該船係向「得忌利士」洋行買煤六十噸，適洋行存煤僅二、三十噸，以因不敷其數，回復未賣」。

忌利士公司」。在日文官方檔案或報紙上稱爲「ドクラス滊船會社」、「ドクラス汽船」。其前身的創辦人爲英國蘇格蘭人氏道格拉斯 • 拉普克（Douglas Lapraik）【照片 1】,「得忌利士」應爲其名字的粵語譯音。道格拉斯於 1839 年來到澳門在鐘錶商店當學徒，1842 年清朝割讓香港予英國後，他便轉往香港發展[12]。以鐘錶製造販賣累積資本後，便轉投資於地產買賣、貿易代理、信託管理等事業。1846 年他與其他英商合資購買一艘帆船，獨占了香港、廈門、福州、汕頭等中國南部沿岸港口間的航運事業。1860 年他獨資創立了道格拉斯汽船公司（Douglas Steamship Co.），成爲中國華南、華東沿海、東南亞、日本、澳洲間的遠洋航運公司[13]。

道格拉斯 • 拉普克一代致富後，於 1866 年退休，將事業交給其姪子約翰史都華 • 拉普克（John Steward Lapraik）繼承。約翰史都華 • 拉普克與跟隨道格拉斯多年的部屬接手航運事業，設立得忌利士洋行（Douglas Lapraik & Co.），台灣與中國南部沿海港口間的航線開設即爲此時期[14]。1883 年得忌利士洋行又與怡和洋行、嘉士洋行、德記洋行等洋行集資，設立得忌利士輪船公司（Douglas Steamship Co. Ltd），成爲該公司的最大股東，並擁有永久的經營支配權[15]。

1887（光緒 13）年劉銘傳在台擬復設商務局，雇船經營台、廈、香、汕各港間的航運，又有其他洋行欲經營台、廈之間航線的傳聞。得忌利士洋行爲維護其航運事業版圖，邀集台、廈茶商以低廉價格議合三年航運契約，因而得以持續在台灣維持航運的獨占優勢[16]。



【照片 1】得忌利士洋行創辦人 Douglas Lapraik（《University Hall 50TH anniversary》

至日治初期，依 1896（明治 29）年總督府的調查可知，當時得忌利士輪船公司（Douglas Steamship Co. Ltd）擁有總噸數 5000 噸的 6 艘輪船，以經營台灣對外的定期航線[17]。當年得忌利士洋行在台業務已委由嘉士洋行代理，故在上述 1900 年的淡水烽火段地圖中，可見停泊港口輪船標示爲得忌利士輪船公司所有，而岸上建物設施則標示爲嘉士洋行。同年嘉士洋行倒閉後，得忌利士洋行在台業務轉由英商三美路洋行（Samuel & Samuel Co.） 代理[18]。

日治初期，台灣總督府急於由洋商手中奪

[12]另一說法為 1943 年到香港，出自 TRADERS OF HONG KONG：SOME FOREIGN MERCHANT HOUSES, 1841—1899，p71。

[13]UNIVERSITY HALL 50TH ANNIVERSARY，p37。

[14]《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045，文件號：14，〈香港ドクラス會社賣卻ノ說ニ関スル件〉，1896（明治 29）年。

[15] 臺灣協會會報第 25 號，明治 33 年 10 月 20 日。

[16]臺灣文獻叢刊二四七，《清季申報臺灣紀事輯錄》輯錄(十三)：光緒十三年/四月初八日/利權獨攬，p1121~1122。

[17]《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04514，文件號：14，〈香港ドクラス會社賣卻ノ說ニ関スル件〉，1896（明治 29）年。

[18]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 1 月 12 日。

取台灣對外航運的主導權，故於 1899（明治 32）年開設由淡水經廈門、汕頭到香港的航線，交由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經營。爲與得忌利士輪船公司競爭，總督府對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提供 5,000 到 15,000 英磅不等的鉅額補助款[19]，使該會社得以得忌利士輪船公司運費的半價搶奪市場，令得忌利士輪船公司失去過去獨占該航線的優勢。1900 年 4 月總督府又增闢安平到香港航線，同年 10 月再闢香港至福州航線[20]。至此得忌利士輪船公司的競爭力已趨於劣勢，致使該公司於同年放棄安平至香港航線，1902 年末退出淡水至香港間的定期航運[21]，而將運務交由三美路洋行代理，僅維持淡水經廈門、汕頭到香港的不定期航班[22]。然而自 1900 年起英國政府向該公司租船，往來日本門司與中國上海之間運送煤炭，使其財務不致於迅速惡化[23]。直到 1932 年該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才將大部分股權出售給 S.T.Williamson，而至戰後 1976 年該公司才完全結束營運[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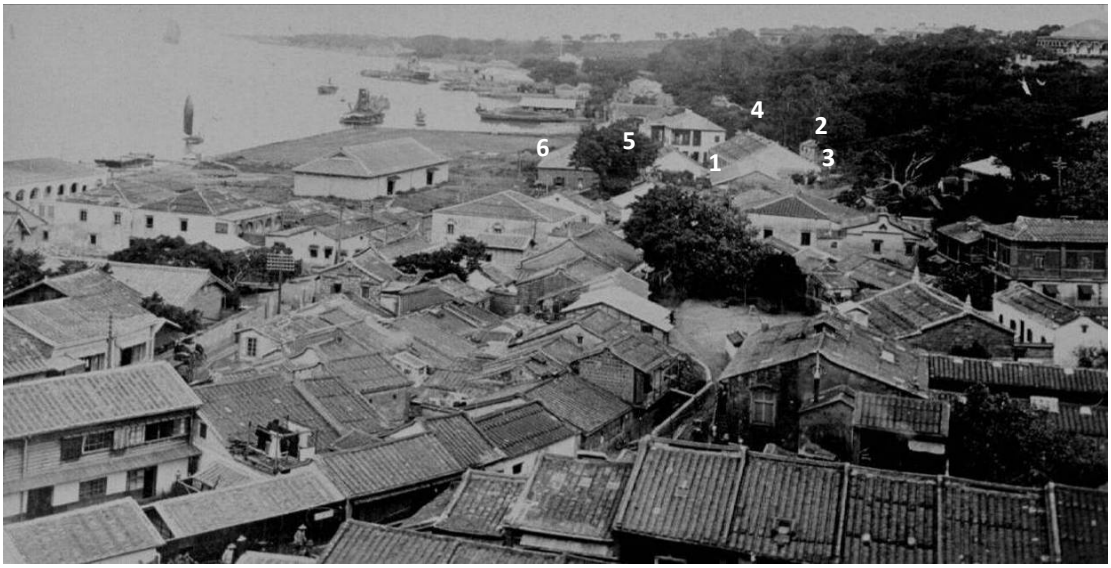
五、得忌利士洋行的土地設施與變遷

清末外商依通商條約不得購買及擁有清國土地。由日治時期烽火段一帶土地糾紛引起的調查與判決事件檔案可知，得忌利士洋行設施的所在地，在清末原爲廈門人洪氏所有。洪氏將土地永代借地予英商寶順洋行，寶順洋行又將其永代借地權部份轉賣給雅士頓洋行，部份轉賣給得忌利士洋行代理人嘉士洋行[25]。1888(光緒 14)年洪氏後代洪賀以洋銀二百元將永代借地的收租權轉讓給廈門人氏陳阿順，至 1891（光緒 17）年武營把總黃華國在烽火館右側佔地興建大屋，陳氏以契約爲憑要求收租，把總黃華國不肯而鬧上公堂。最後淡水縣正堂葉氏裁斷給陳氏洋銀二百元，將土地收回歸予學海書院所有，收租以資獎勵學子的經費。自此，取得永代借地權的洋行，納租對象轉爲學海書院。故 1906 年（明治 39）年 5 月總督府高等土地調查局在調查土地糾紛原委後，仍將該土地所有權判給學海書院（管理人爲民政長官後藤新平）[26]。當時得忌利士洋行、雅士頓洋行皆透過在台代理商三美路洋行的負責人 Hubbert　Ross 代繳租金給學海書院。

[19]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2 年 10 月 19 日。
[20]《臺灣海運史》，臺灣海務協會，昭和 16 年，p35~41。
[21]臺灣日日新報 2479 號，明治 39 年 8 月 4 日。
[22]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38 年 1 月 12 日。
[23]臺灣日日新報 649 號，明治 33 年 7 月 1 日。
[24]The Ships List 網站 http://www.theshipslist.com/index.html。
[25]本表資料來源以此公文為主。《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01202，文件號：6，〈芝蘭三堡滬尾街二於ケル官有地學租財團へ無償下付等ノ件〉，1906（明治 39）年。
[26]《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01009，文件號：16，〈臺北廳管下申立人荻原孝三郎外一名芝蘭三堡滬尾街土名龍目井街建物敷地一番其他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裁決ノ件〉，1904(明治 37)年。



【照片 2】約攝於 1908 年的淡水烽火街一帶，得忌利士洋行當時的配置含，編號 1-第一檢查場，2-輸入品倉庫，3-宿舍，4-陽臺式二層樓宅第，5-稅關新檢查場，6-碼頭區，岸邊有船隻停泊（淡江中學蘇文魁老師提供）



【照片 3】此照片攝於 1915 年左右，圖中可見得忌利士洋行主要的建築配置，與前引 1908 年照片比較，除編號 6 之碼頭區填築外，沒有太大差別。（淡江中學蘇文魁老師提供）

由 1900 年的地圖對照老照片【照片 2、3】並參考其他文獻可知，得忌利士洋行西鄰德記洋行，東鄰清末海山館設施舊址。該洋行設施以河岸道路爲界，可分爲南區與北區二部分。南區爲河岸低濕地，填埋成爲碼頭，低潮線外設置棧橋，以供大型蒸氣輪船停泊。並設有二條斜坡軌道及捲揚設備，可將小型蒸氣船拉上岸維修，在一旁設有「事務室」（兼修理工場），而事務室東側設有「稅關新檢查所」，檢查進出貨物以課稅捐。

北區由西至東分別設有花園、連棟倉庫、二層樓建洋行主管的住宅、前棟的「第一檢查場」及後棟的「輸入品置場」、其他職員宿舍住家與前方的煤炭堆置場。而南北區之間則設有輕便軌道串連事務室、碼頭、第一檢查場及輸入品置場，使用台車以利貨物之搬運。

得忌利士輪船公司退出淡水至香港間的定期航運後，1910（明治 43）年總督府在進行淡水河疏濬工程的同時，也收回原得忌利士洋行南區碼頭及低溼地，進行填埋工程[27]。1914 年（大正 3）11 月完工後，將此原屬學海書院之土地編入官有地，設定土地用途爲「廳舍敷地」[28]。

六、得忌利士洋行舊址的官廳官舍化

1920（大正 9）年 9 月台灣地方制度改制，原台北縣支廳改爲台北州淡水郡。翌年，台北州提出無償撥用原得忌利士洋行南區填埋地上第 17-2 號土地，作爲淡水郡役所建設用地[29]，獲准後建築於 1923（大正 12）年完工落成，而淡水警察署亦設置於郡役所內。此外，原得忌利士洋行南區第 16 號地上之稅關新檢查所，日後改建爲淡水武德殿。1914 年劃設爲廳舍敷地用途之河岸填埋地，最後如同計畫成爲淡水官廳區的一部分，戰後也延續其用途至今。

相對的，原得忌利士洋行北區原屬學海書院（後改爲學租財團）所有之土地，至 1908 年重劃爲一筆（第 14 號）建築用地，改屬國有財產。但因延續清末之永代借地權仍有其法定效力，爲雅士頓洋行所有。但不久雅士頓洋行就將永代借地權轉讓給日本長崎人氏中野金太郎，最遲至 1909 年 9 月 1 日的土地台帳上已登記中野氏爲其永代借地權者[30]。爾後此北區土地經過多次分割，成爲多塊地號的建地。地上使用權雖爲中野家族所有，但土地仍是國有，又因該地鄰近南邊的郡役所、警察署，此區自大正時期以後逐漸成爲官舍住宅區。現存的日治時期淡水戶口登記簿，明確登記曾居住在此地號上之住戶，100 人中就有 24 人爲台北州巡查，19 人爲電信郵局職員，16 人爲教職員，7 人爲郡屬職員[31]，可見此區塊土地成爲官舍住宅區的情形。

七、戰後洋行舊址多元族群的聚居

戰後，日產皆爲國民政府接收成爲公有，得忌利士洋行舊址北區原爲中野氏所有的資產亦不例外，成爲鎮公所公有地[32]。國軍撤退來台後，沿用戰前的海軍基地設立淡水巡防處，也因此於 1950（民國 39）年左右，海軍總部就近向鎮公所借用此舊址北區建物群，增改建作爲海軍眷舍，直至 1999（民國 88）年居民才遷往土城新眷村[33]。

依戶政資料及調查訪談得知，在此期間除海軍眷屬外，亦有稅捐處職員、警察眷屬、教師等軍公教人員入住此地。其中原得忌利士洋行的輸入品置場建築的一部份，因連續入住的教師或軍眷住戶爲基督徒，該宿舍成爲曾任軍職後來成爲

---

[27]地政事務所提供之日治「土地臺帳」165~169 頁;「土地登記簿」第壹〇六〇、壹〇六八號，025~026、041~042 頁。

[28]《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11265，文件號：18，〈淡水烽火街土地貸下ノ件〉，1919（大正 8）年。

[29]《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11265，文件號：18，〈淡水烽火街土地貸下ノ件〉，1919（大正 8）年。

[30]地政事務所提供之日治「土地臺帳」146~149 頁；「土地登記簿」第六〇二號，004~005 頁。

[31]戶政事務所檔案室提供之日治時期戶口登記簿。

[32]臺北縣淡水地政事務所，《臺灣省臺北縣土地登記簿》，〈淡水鎮淡水段烽火小段 14-22～25、14-32～36、14-77 地號〉，臺北縣淡水地政事務所，2010 年。

[33]周彥文、黃詩涵、陳珮妤，〈淡水地區眷村沿革〉，《第四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淡江大學歷史系， 2007 年。

教會傳道者的住宿處，亦自然成爲信徒的禮拜活動場所。1967（民國 56）年在其後方正式建立淡水國語禮拜堂，爾後成爲布農教會，使此地增添多元族群與宗教群聚的歷史涵構[34]。



【照片 4】前棟第一檢查場 2009 年樣貌



【照片 5】前棟內保留著原有洋式屋架



【照片 6】後棟輸入品倉庫 2009 年樣貌



【照片 7】後棟於近年住戶遷出時，仍可見日治時期增建的和式空間遺構

八、結語

如上所述，清末得忌利士洋行所在舊址具有長久堆疊的歷史往事，遺留下來的土地使用特性，與該洋行舊有的第一檢查場及輸入品置場建築物，仍然述說著淡水烽火段一帶過往時代的歷史故事。淡水鎮公所收回此公有土地與舊建築，納入淡水藝術大街造街計畫的一環，計畫將此閒置空間再利用，是件有意義而重要的行動。藉此洋行舊址的再造活動，賦予舊建築空間的新功能，重新詮釋它在當代的意義與在老市街中的新角色，使其能重新與鎮民的日常生活緊密的結合，亦能作爲外來遊客休閒旅遊的場域。

然而在此地方閒置空間再利用、老街再造的時候，除了爲此小鎮的浪漫風情，添加一些藝文休閒的去處之外，不宜忘記過去此遺址與建物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淡水這個港市在東亞區域所扮演的國際性角色與歷史地位。應避免以往地方政府對老街改造活動慣性的工程行爲，或只是把老舊閒置建築空間拿來再利用一下的

[34]蘇文魁老師訪談資料，2010 年 4 月 12 日 。

舊思維。

在大航海時期以後，世界早已成爲一體。淡水在其過去的歷史歲月中，有幸作爲東亞的一個重要港口市鎮，是樟腦、茶葉、煤炭等世界性貿易商品的出口地，成爲該區域性國際航運網絡不可或缺的一環。同時如此的港市，也是傳遞最新外界資訊、引進新生活型態、與異國人士文化交流的窗口，因而更能容納多元的族群與文化於一地，使其成爲眾民居易而群聚的市鎮。

綜觀過去史上偉大的城市，無不以自己過去大小的歷史遺跡爲傲。以往睿智的政治家都知道，藉由歷史來理解市鎮空間紋理與其中建築的意涵，同時在對時代潮流敏銳的感知下，充分運用城鎮公共的歷史資源，發掘老舊建築與都市歷史空間的潛在價值，就能掌握該市鎮空間的詮釋權，遂行其市政建設的企圖與理念。本文所談論的淡水得忌利士洋行的舊址遺構，絕對不是滬尾老街的盲段，對它合宜的再詮釋與再利用，不啻是淡水市鎮對自我價值認同的重要契機。

從雞籠到淡水
—荷蘭時代北臺灣的政治經濟移轉

邱馨慧*

摘要

164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從西班牙手中取得北臺後，將荷蘭在福爾摩沙的商業與殖民活動擴及到全島。基於大員爲東印度公司的根據地，北臺的發展重心，除了以軍事行動爲主的初期外，行政與經濟的重要地位逐漸由雞籠移轉到淡水。1645 年 8 月淡水設立主管一職，更具體成爲大員與雞籠之間的中繼站，擔負起人員、貨物與命令的匯集與分配等樞紐的角色。淡水也串連起位居北臺與大員兩地間的廣大新領地。

關鍵詞：

雞籠、淡水、荷蘭東印度公司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十七世紀中期，荷蘭東印度公司成功地將西班牙人逐出臺灣，結束十六年間（1626-1642 年）南部荷蘭、北部西班牙，雙元殖民臺灣的事實，成爲福爾摩沙唯一的統治者。對荷蘭與西班牙來說，這僅僅是歐洲兩個命運糾結的「世仇」在東亞無數回合搏戰中的一次。但是對北臺地區原住民來說，西方勢力互爲競逐殖民權力與利益，使得他們成爲臺灣最早經歷到「連續殖民」（continuous colonization）的群體。荷蘭東印度公司也開始擴大「殖民實驗」到全島視野，不僅將北臺視爲探金之旅的另一個嶄新起點，夢想著開闢從北部到東部直達「黃金河」的交通捷徑；也著手將西南部核心地區的統治與經濟力量北向延伸，拉長補給線，成爲名符其實的「整座島嶼的主人」[1]。本文將分析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取得北部臺灣以後政治建置的過程，探討其中涉及的經濟與地理，乃至與在地人群互動的因素，使得商業的淡水與軍事的雞籠逐漸成立，從接收西班牙殖民建置轉向連結大員與北臺，基於更爲務實的考量，也將北臺發展重心由雞籠進一步轉移到淡水。

二、雞籠轄淡水時期, 1642－1643 年

1642 年 8 月 25 日，荷蘭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地佔領了西班牙在雞籠島（今天基隆和平島）建築的 San Salvador 城堡。荷蘭壓倒性的軍力由大員本地 Hendrik Harrouzee 隊長率領，包括 390 名士兵、222 名水手、78 名廣南人、中國人、爪哇人與奴隸共 690 人。激戰的結果，荷方死亡 5 人，受傷 15 人；俘虜城堡共 446 人，包括 115 名西班牙人、62 名 Pampanga、93 名 Cagayan 人，42 名婦女，116 奴隸與 18 名兒童。另一方面，巴達維亞荷蘭東印度公司亞洲總部 Antonio van Diemen（1636-1645）總督已先行派出戰地指揮官 Johannes Lamotius 率領的遠征船隊，他們在西班牙投降消息傳來大員後方抵臺灣，但仍銜命前往北臺。Lamotius 到達雞籠後，成爲最高指揮官，召開會議，決議由升爲上尉的 Harrouzee 擔任雞籠要塞司令官（captain-mayor），Pieter Boon 爲代理隊長。[2]

當時的要務除了修復與重啓雞籠城堡的防禦、前往中國沿海巡弋日澳航路上的戎克船、與當地原住民互動與建立威權之外，[3]最爲重要的仍是尋找金礦；經過水路試探，Lamotius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佔領雞籠一個月後，就親自整裝，從陸

[1]引詞見於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臺北：聯經，2000），頁 237。

[2]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238-239；*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Diaries of Zeelandia Castle], *Taiwan*, I: 1629－1641; II: 1641－1648; III: 1648－1655; IV: 1655－1662, eds. Leonard Blussé et al.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86, 1995, 1996, 2000)。中譯版：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臺南: 臺南市政府，2000、2003、2004），II B fo. 658.

[3] 關於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北臺原住民的互動過程，詳見 Chiu Hsin-hui, *The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1624-1662* (Leiden: Brill, 2008), pp. 89-92。

路帶領軍隊預計前往 St. Laurens 灣（今蘇澳），但因爲途中路況不佳，只好到達三貂後就折返雞籠。[4]除了探金外，公司企圖持續雞籠、淡水方面的硫磺貿易。[5]在淡水，首先仍是恢復西班牙放棄的堡壘工事；1642 年 11 月，Lamotius 在完成淡水主城堡 Antonio 的命名之後返回大員。行前，中尉 Thomas Pedel 被任名爲駐淡水城堡的最高指揮官，聽從來自雞籠雞籠要塞司令官 Harrouzee 的指揮，不得任意執行死刑，同時每隔一到兩週向雞籠報告淡水事宜並接受下達的命令，爲此 Pedel 被指派蒐集淡水到雞籠的陸路與沿線住民、村落的情報，建立兩地的通信與交通。[6]

雖然雞籠具有高於淡水方面的權力，彼此也維繫著原先的位階與行政運作；但是大員與兩地的聯繫卻重在務實，地理的遠近與交通的便利似乎比謹守行政位階更爲重要，這也預示了兩地未來在政治位階的移轉。1643 年 3 月底，大員權力交接以後，先後在淡水、雞籠舉行爲北臺公司人員解除對過去長官誓約，與對接替人選效忠宣示的儀式。[7]4 月底，爲了硫磺交易事宜，大員分別去信給雞籠與淡水，同時也收到兩方各自的來信，此後大員與兩地也保持各自通信管道。[8]

1643 年 5 月，淡水城堡外面已經開闢好菜圃；爲了方便本地駐軍的日常生活，淡水方面提出請求，希望大員准許送來中國工匠、農漁夫、裁縫師與麵包師等。在此之前，大員也對缺糧的淡水進行船貨補給。[9]雞籠方面，由於有中國戎克船帶著日用品與工匠住下來，士兵獲准以現款購買日用品與食物，Harrouzee 也計劃能讓 70-80 名中國人住在雞籠進行買賣，所需糧食可以噶瑪蘭的米。[10]讓中國人住在城堡周邊提供日常生活用品與基礎建設向來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建立殖民地的作法；大員方面遲至 1644 年 3 月底方准許中國人定居在雞籠與淡水的城堡下，但仍須繳交與大員相同稅額。[11]

對於中國人在新領地的經濟活動同樣是公司取得北臺後關注的焦點。取得北臺後，直接有的新領地就是後來參加地方會議時，屬於「淡水集會區」的淡水地方、淡水河流域、Pinorowan 河（新店溪）流域、雞籠、三貂角與擴及噶瑪蘭等地區。同時，也連帶地造就出淡水與大員核心地區之間廣袤的臺灣西部新領地，大致從北港溪（the Pocan River）至淡水河以南一帶，包括後來分屬「淡水集會區」的「Baritischoen 人村落」、「淡水堡壘以南」、「龜崙人村落」，以及「北部集會區」內尚未臣服的虎尾壠，與福爾摩沙「中晝之王」—大肚王（King of Middag,

[4] Lamotius 在北臺的日記，見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B fos. 658-678; 其中包括雞籠前往今蘇澳的日記，以及三貂到今宜蘭平原的地理與路況資料。
[5]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239。
[6]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B fo. 678-680；淡水經陸路到雞籠的交通報告，見於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 313-314.
[7]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s. 306, 340-341.
[8]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s. 301, 307.
[9]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s. 308, 351.
[10]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s. 367, 369.
[11]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 288.

Quataongh）所轄地區。[12]1643 年 6 月 Pedel 向大員建議，前往大員與淡水之間的南崁地區貿易的中國人必須先到淡水出示公司核發的通行證，以利就近管理。[13]換句話說，伴隨著佔據北臺後，擴大的經濟版圖使得淡水可以就地利之便與大員成爲犄角之勢，爭取並管理來自中國人貿易的利益。根據情報指出，南崁地區確實也早有中國人與當地人進行鐵對鹿皮、米的交易。[14]

三、轉型過渡期 1644-1645 年

淡水的重要性持續顯著，呈現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取得北臺以後最大的轉向。1642 年 8 月底以後，荷蘭人仍繼受西班牙在北臺的建置，直到 1643 年秋，西班牙留在北臺的建築也逐漸被拆除，象徵地說明西班牙框架的打破。初期修復的雞籠城堡也在西班牙大教堂拆除後也步上相同命運，僅留下一個稜堡，1644 年 3 月底重新命名爲 Noort-Holland，以及圓堡，改稱爲 Victoria。[15]雞籠拆下來的石頭、木料運往淡水修築另一座新的碉堡（redoubt）。此座新碉堡遲至 4 月應已動工，工期一再延宕，計畫至 1645 年底完工。[16]最初 Boon 受委派監造工事，大員運去石灰與磚頭等建材，最後也將中國燒磚工直接送到淡水，也有不少中國工人在大員應徵獲准後被送往淡水造碉堡。下級商務員 Johannes Keyssel 在 Boon 另有任務下，成爲報導碉堡工程的通信員，直到他病死於該地。[17]駐軍方面，1642 年 11 月 Pedel 共領有 48 位士兵、6 名水手與 1 名砲手；1643 年 8 月，雞籠與淡水皆派駐 30-40 名。[18]到了隔年同期，雞籠駐有 50 名士兵，淡水方面由代理掌旗官 Marten Gitner 接替請求解除職務的 Pedel，士兵也增員到 80 名，理由是管理建造碉堡的「奴隸」。這是淡水駐軍首次高於雞籠，此後即使人數少，淡水駐軍人數也都略多於雞籠。[19]

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北臺的活動，逐漸以淡水爲重心，地理因素誠然是務實的考量，展現出並非點的思考，而是面的擘劃。公司在臺灣的根據地大員與新領地

---

[12] 關於各個地方會議的集會區，見參見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台灣番社戶口表〉，收在氏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1997），頁 1-38。

[13]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 370.

[14]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 369.

[15]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 413; II D fo. 26; II E fos. 287-288. 關於西班牙淡水 Santo Domingo 堡的研究，詳見陳國棟，〈西班牙及荷蘭時代的淡水〉，收於氏著《臺灣的山海經驗》（台北：遠流，2005），頁 125-128；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台灣早期史研究（1400-1700）》（台北：聯經，2005），頁 295-296；李毓中，〈從大航海時代談起：西班牙人在淡水（1627-1637）〉發表於「淡江紅毛城修復暨再利用國際學術研討會：揭開紅毛城四百年歷史」，2005 年 12 月；鮑曉鷗（José E. Borao）、Nakao Eki 譯，《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 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台北：南天，2008），頁 194-198。

[16] 新碉堡工事記錄詳見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G fos.748, 758.

[17]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E fos. 287-288, 291; II F fos. 186, 189; II G fos.679, 722.

[18]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s. 308v, 402.

[19]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F fo. 161. 筆者自行加引號。

最近的據點即是淡水，大員—淡水（Tayouan-Tamsuy）的陸路交通，成爲 1642 年經由海路的軍事行動完成後，企需建立的聯絡系統。這條道路必須經過大部分爲過去公司勢力所不及的地區。

Lamotius 結束北臺行動南返大員時，雖然途中經過二林、虎尾壠地區、東螺等地，發動對虎尾壠所謂的「懲罰性征伐」，將其徹底擊垮，但是因爲缺乏嚮導帶領，仍無法打通該條道路。[20]從 1643 年《熱蘭遮城日誌》大員與北臺的往來通信記錄，可以看出大員與北臺的信息傳遞主要仍是仰賴海路。[21]大員當局在 1644 年 8 月正式決議由 Pieter Boon 隊長率領 225 名人員的軍隊前往淡水、雞籠與噶瑪蘭地區征討當地原住民，回程重任就是打通淡水到大員的道路，建立「淡水道路」（de Tamsuysen Wech），這意味著要讓橫亙在其中的在地勢力大肚王臣服於公司。[22]Boon 的任務爲了彌補 Lamotius 行動的缺失，隨軍帶著一位淡水地區原住民擔任嚮導與翻譯；但是當他們來到大甲溪時，該嚮導以進入敵人領地爲由逃跑。換句話說，當時淡水地區原住民以及淡水語往來大甲溪以北一帶，尚稱可行，但仍不及於大甲溪以南的大肚王勢力範圍。征服大肚王靠的是另一項軍事行動的完成：1645 年 1 月底，以 210 名士兵的軍力燒毀大肚王統轄下 13 個村社，126 名村人死亡，並俘虜幼童分配到大員的荷蘭家庭成爲奴僕。[23]「淡水道路」在「火與刀」的攻勢下取得相當進展，從大員北上到達大甲溪的地區，即地方會議的「北部集會區」，均併入公司勢力內。當時未知領域也有原住民十數個村社在代理地方官 Joost van Bergen 視察淡水時，承諾將赴淡水繳交象徵臣服的忠誠（loyalty）的年貢（annual tribute）[24]，只是確實繳交的村社卻不多；大員當局認爲這是當地與原住民交易的中國人，以主人自居，從中阻擾之故，因此公告於 8 月底之前召回所有交易船隻，同時不得再航向該處。[25]

四、淡水轄雞籠時期,1645-1662 年

遲至 1645 年 8 月，淡水已經設置本地的議會（Raet tot Tamsuy），成爲觀察

[20]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244;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93.

[21]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s. 301, 307.

[22]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F fo. 160;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p. 99-101; 關於大肚王研究，詳見翁佳音,〈被遺忘的臺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臺灣風物》42:4 (1992), 頁 188-145；康培德,〈環境、空間與區域：地理學觀點下十七世紀中葉「大肚王」統治的消長〉《臺大文史哲學報》59 (2003), 頁 97-116。

[23]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p. 99-101.

[24] 關於年貢，參見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p. 130-135; 康培德,《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一）荷西明鄭時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頁 187-197。

[25]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G fos. 679, 708, 710;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p. 102-103.

淡水逐漸參與決策的指標，不再僅是附屬於雞籠的執行命令者。[26]另一方面，以商務員級別派駐的 Keyssel 雖然因爲監督修築淡水城堡，直接與大員通信，但是其在淡水應屬重要人物；他所擔任的職務爲帳簿文書，這可以說是商業起家的東印度公司最爲重視的業務，足見淡水一地在公司規劃北臺的地位。

然而更爲具體的呈現出淡水地位的提升，則是大員當局的福爾摩沙議會在隨後同月底的決議：任命下級商務員 Jacob Nolpe 去淡水擔任公司城堡與人員的主管（*Opperhoofd*）。Keyssel 去世後，大員派稽查官前去整理的帳簿文書不僅將交接給 Nolpe，後來更擔負起詳細記載送貨單、區別稅務與年貢等收入項目，以明晰淡水的收支情況。[27]這項任命案的意義在於：這是首度在北臺設立主管一職；同時也是以文職的商務員取代軍職人員擔任主管的開始；淡水也成爲北臺的主座。這一點相當具體的表現在雞籠的人事調動案。Harrouzee 於 1644 年 3 月奉命遠征柬埔寨，離開臺灣。掌旗官 Jacob Baers 早在 1643 年後，於雞籠擔任部隊長；Harrouzee 離台期間，Baers 署名向大員報告，並於 1644 年 10 月 25 日正式成爲雞籠最高指揮官。Baers 成爲 1646 年公司秘書派往征伐淡水城堡以南地區原住民所領軍隊的「第二號人物」；12 月 21 日，Baers 更奉命移駐淡水城堡。[28]人員的反向移動之外，過去報告與通訊的方向也倒轉過來，淡水方面成爲北臺消息的匯集處，甚至淡水必須轉達雞籠傳來的消息。[29]相對的，淡水也成爲大員命令的接收處，包括人員的派任與任命皆可從淡水向雞籠下達。[30]

Nolpe 的任命案還包括在淡水主持、召開地方會議（*Landdag*）。我們可以推測當局判斷北臺在地情況已經趨於穩定，可以掌握原住民情，也因此使得地方會議召開的時機成熟，此一「政治奇觀」的儀式，不僅是在新領地原住民群體間塑造出公司的威權形象，舉行地點淡水也自然成爲當地人意識中的權力所在地。[31]必須指出的是，當大員當局還沒有正式提升淡水地位時，淡水地方原住民已經在行動上表現出與公司一致的務實態度，實際距離的遠近往往勝過階序高低的定義與象徵意義，成爲決策與行動的依據。例如，荷蘭據有北臺後，就要求原住民村社代表前往雞籠舉行當時還延續西南平原的儀式：呈獻種有檳榔、椰子等小苗的盆栽，以表徵將土地獻給公司，完成這項等於是年貢前身的要求之後，村社可以領取象徵與公司結盟的親王旗，獲取公司提供的保護（或者是當地更希冀的，至少可以免除荷蘭人的侵擾），同時還得每三個月帶著旗幟，前往雞籠城堡向指揮官 Harrouzee 報到。但是當 Pedel 前赴淡水後，附近村社代表就逕自帶著當地果樹

---

[26]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G fo. 722.

[27]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G fo. 724; II H fo. 327.

[28]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note 5, note 32;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s. 334-336.

[29] 舉一例，詳見 1654 年 3 月 22 日書信內容，*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E fos. 364-366

[30] 例如，大員命令淡水當局從雞籠派人去產金村哆囉滿學語言，見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 320.

[31] 引詞「政治奇觀」出於 'Political Spectacle and Colonial Rule: The Landdag on Dutch Taiwan, 1629–1648', *Itinerario*, 21-3 (1997): 57-93。中譯版： 歐陽泰(著)、查忻(譯)，〈政治奇觀與殖民統治－荷蘭臺灣地方集會(1629-1648)〉，《暨南史學》4-5(2003): 223-286。

小苗前往淡水並且種在淡水城堡下方，「完成」該儀式，足見對於荷蘭當局的要求，淡水原住民自有理解與實踐的方式，記錄中顯示出村社帶來各種不同的果樹苗，包括橘子、檸檬、香蕉、柚子與荔枝等。對於前往雞籠報到的「義務」，淡水村社亦有「方便」的應對。1643 年初，雞籠來的荷蘭代表曾質問淡水村社爲什麼不去雞籠報到時，他們表示天氣冷、年紀又大，不願意去雞籠，倒是可以去淡水城堡，因爲比較近，還反過來問：去淡水和去雞籠不是都一樣嗎？[32] 1651 年的紀錄更顯示出原住民是以西班牙時代威望最高的名銜「*contador*」稱呼淡水的主管爲「*cantadoor*」。[33]

原住民的態度也確實是大員方面必須考量的面向。當公司將統治力量觸及北臺時，勢必面對處於廣大「淡水城堡以南地區」原住民的治理問題，雞籠也就顯得鞭長莫及，就連原來的地位也逐漸爲淡水所取代。這一點特別表現在原住民上繳年貢的運作上，對雞籠以及噶瑪蘭地區村社來說，去淡水和去雞籠就真的不一樣。1646 年，即使抱怨路途遙遠，噶瑪蘭地區的原住民尚且還必須將超過千磅重的米糧年貢送到淡水去，許多村社不願繳交年貢乃出於長途跋涉的辛苦；爲此，大員當局認爲即使新港仔溪的村社（更靠近淡水）要繳交時，應該考慮由公司派船去載運回來，讓原住民更樂意繳交年貢。淡水爲了儲藏年貢也另外再建竹造的房屋，同時用做接待外國人、召開地方議會的場地。[34]看來，基於更鞏固淡水爲荷蘭人在北臺權力所在的形象，該新造竹屋結合年貢與地方會議兩個原住民治理的機制，具體呈現出「臣服」（homage）的意涵，這一切無疑是可以展現在外賓面前可觀的殖民統治成果。

對於爭取利益的中國人來說，在大員或是去北臺？去淡水還是雞籠？也是一個需要衡量的問題。1646 年 4 月，大員當局認爲已經可以掌握淡水到 Dorenap（鹿港）一帶原住民情，於是公告將新港仔溪與竹塹溪賸給中國人一年；不僅如此，爲了供應淡水，特別是雞籠的日用所需物品與糧食，當局開放兩地直接與中國進行貿易。讓貨物自由出入淡水與雞籠之餘，當局也鼓勵兩地的農業開墾，開放讓各行各業中國人遷居兩地，同時施以優惠，住在淡水者除繳交人頭稅外，可免繳數年其他賦稅，遷居雞籠者連人頭稅都免繳三年。[35]換句話說，雞籠是預估中比較不受中國人青睞的選擇；然而或許優惠措施具有吸引力，一個月後已經有 15 名中國人住在淡水，雞籠也有 14 人，雖然其行業不明，人數卻相差無幾；但在 1648 年淡水已經有 78 名中國人，其中包括與

---

[32]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C fos. 310-312, 314-316, 329；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 91-92.

[33] 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頁 205；*The Formosan Encounter——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3 vols, I: 1623－1635, ed. Leonard Blussé, Natalie Everts and Evelien Frech; II: 1636－1645 and III: 1646-1654, ed. Leonard Blussé and Natalie Everts (Taipei: Sh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1999, 2000, 2006), III, 375, 571.

[34]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 365.

[35]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s. 310-311, 318, 339.

本地婦女結婚，開始農耕者。[36]

雞籠更明顯的反而是軍事色彩的基調。從《熱蘭遮城日誌》記載大員接獲書信的內容看出：1647 年至 1655 年之間，雞籠上報的事項大多是修復毀損、配備有大砲的 Victoria 堡、建哨所、維修長官房舍、要求新砲手、維修雞籠城堡地窖等。[37]雞籠其實並非一開始就在貿易上居於劣勢。關於雞籠與淡水在西班牙時代的貿易發展，除了兩地處於中國戎克船貿易網絡，尤其是絲貨貿易的一站外，與本地原住民交易的貨品大多是金、銀、硫磺、藤、米、酒、染料植物、蓪草與鹿皮等。[38]西班牙佔領的 1630 年代，每年有一、二十艘中國船隻到雞籠交易，同時數百名非在地人口聚居於雞籠與淡水；雞籠尚且發展出比淡水更大規模的 parian 中國人市街。[39]荷蘭人佔領北臺後，如前文所述，硫磺貿易也一直是持續備受控制的項目，比起西班牙尚未積極介入北臺的原漢硫磺貿易，東印度公司因爲早在南亞與大陸東南亞就進行該貿易，因此雖然硫磺的大宗買主仍爲中國人，公司也對出口硫磺課稅；即使被公司購買下來，也有運至巴達維亞再賣給中國商人的例子。[40]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北臺在兩百年後才爲進入工業革命以後爲時代所大量需求的煤礦產業與貿易在荷蘭時代已經開啓。[41]荷蘭東印度公司剛取得雞籠，就在附近的山找到煤礦，並把樣本送回大員；隨後還調查海岸與礁石一帶，尋找礦藏地。根據 Harrouzee 的報告，1643 年已經找到礦產地，但是不僅來回距離遠，同時只能是驅使奴隸去做的艱苦差事，主張不值得開採；雖然如此，開礦工程很快地就由本地原住民巴賽人（Basayos）擔綱。由於開採工具不佳，巴賽人只能從海邊的大岩石費力地敲下都是小塊碎屑的煤礦，爲此雞籠當局只能向大員解釋無法取得大塊礦石的原因。[42]在 1650 年代，雞籠煤礦已經可以供應荷蘭煤礦補給少的巴達維亞，在奇貨可居下，巴賽人有更多籌碼與當局爭取「勞工權益」；但是不久此煤礦終因有癱塌危險，再決定不以火藥爆破後停止挖掘。[43]姑且不論雞籠是否因爲開採煤礦而讓當局重新估算其地位，但是根據煤礦的船舶運輸，本地需求無虞後，大員均是煤礦後續航程在臺灣的集散地；中途站的淡水，遲至 1646 年就已經從雞籠收購煤礦並設有倉儲，一旦大員有需求時，也就直接過去淡水載運回來。[44]雞籠或許更是扮演商品生產地，而非貿易經營的角色。

---

[36]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A fo. 333.
[37]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J fos. 588, 590, 605, 612; III C fo. 679; III E fo.429; III F fo.604. 當然還有煤礦相關事宜見下文。
[38]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頁 250-255；鮑曉鷗（José E. Borao），《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頁 254-262。
[39] 關於西班牙時代北臺地區的 parian 考證與研究，詳見翁佳音，《大臺北地圖考釋》（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頁 243-248, 265。
[40]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 154.
[41]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 155.
[42]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B fo. 660; II C fos. 307, 366; II G fo.744.
[43]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F fo. 612, 769.
[44]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 331; III C fo. 689.

雞籠的此一角色或許也不會因爲萬一公司真的能夠進行黃金貿易而會有所改變。荷蘭東印度公司佔有北臺後，後續的探金結果並不理想，迫使當局必須接受臺灣的黃金貿易仍是無法實現的迷夢，使得位於傳說中—東部的黃金產地更近的雞籠無法發揮作用。[45]雖然歷史的後見之明，證實雞籠附近才是最後坐擁黃金大夢的所在，但在 1655 年，淡水當局也不可思議地預估要交易收購到價值一千里爾的沙金；[46]換句話說，即使東部黃金貿易發展有譜，淡水仍是北臺特產商品的集中地。從無法開展的黃金貿易到難以持續的煤礦貿易，雞籠本地的榮景在荷蘭時代尚屬「時不我與」，過於早發的階段。

公司在北臺發展的貿易還包括將過去行之已久的原漢交易納入體制的賦社制度。1644 年賦社制度正式實施後，當時北港溪以北的新領地已經有二林與虎尾壠兩個單位；到了 1646 年，西部鄰近沿海村社大致都入賦了，原賦區也有另外再分殊，於是增爲 8 個單位；1647 年尚未加入的沿海村社阿束、大肚等也入賦；較爲內陸的丘陵區，包括南、北投等遲至 1650 年，隔年才入賦的爲鄰近山區的 Baritischoen 與龜崙。新領地在 1650 年代後期，累計共有 17 個賦社單位，占臺灣本島共 42 個單位中的四成。[47]我們以 1651 年 17 個賦社單位都加入競標的結果來看，新領地的賦金（17,710 里爾）已經達到該年所有賦金總額（35,385 里爾）的一半，其中包括飆到上千里爾的五個單位：竹塹、新港仔溪（1,400），大肚地區（1,500），二林（1,300），東、西螺（3,500）與虎尾壠、貓兒干（5,550）。[48]進一步來看，新領地賦金收益占 1651 年度臺灣內地諸稅總收入（46,378 里爾）的三成八；[49]換句話說，新領地成爲公司的金雞母，也是中國賦商眼中可以獲取大量鹿肉的「黃金地段」。入賦無疑是政治經濟下的運作結果，所有入賦村社代表都參與過所屬地方會議的儀式。[50]然而，賦區的開發至終也僅於南崁地區，未及於淡水地方與淡水河、Pinorowan 河流域。

賦社制度能夠施行於新領地，得力於「淡水道路」的全面開通。「淡水道路」最後打通的區段位在鄰近淡水的一端：包括「淡水集會區」所屬的「淡水堡壘以

---

[45] 關於荷蘭臺灣東部探金之旅的尾聲，詳見中村孝志，〈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收在氏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臺北：稻鄉，1997），頁 219-249; 以及〈荷蘭人的臺灣探金事業再論〉，同書，頁 251-257；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p. 105-108.

[46]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F fo. 603.

[47] 小琉球為外島賦區，其根據〈賦社之稅表〉與新領地區域可以得出，〈賦社之稅表〉詳見中村孝志，〈荷蘭統治下的台灣內地諸稅〉，收在氏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頁 282-283；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Appendix Three; 康培德，《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一）》，頁 203-207。

[48] Baritischoen 與龜崙山區似乎只有在 1651 年該年入賦而已。此處計算根據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Appendix Three；中文譯名參考康培德，《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一）》，頁 206。另外 1655 年入賦 Karakan, Sivokan 尚不明位於何處，由於其賦金不出 200 里爾，應不具關鍵性影響。

[49] 數額來自〈內地諸稅細目表〉，詳見中村孝志，〈荷蘭統治下的台灣內地諸稅〉，頁 319。

[50]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Appendix Three, note 3.

南」、「Baritischoen 人村落」以及「龜崙人村落」三個地區。1646 年，表面上均屬公司盟友的兩個敵對集團的獵首紛爭：南崁（Parricoutsie）與 Goudt，對上竹塹（Pocael）與 Calikan 導致陸路交通受到阻礙，因此一度只能由海路先到大肚山（Patientieberg）後，再循陸路到大員。[51]爲了解除此阻礙，也要便利村社繳送年貢，公司發動三次不成功的征伐，最終發現紛爭乃由 Calikan 所引起。1647 年，公司派出少尉 Gerrit Casman 與原住民翻譯尋求外交斡旋的方式解決此一紛爭：在竹塹長老的居中協調下，迫使 Calikan 的獵首者從自己頸項珠飾中，拿出一粒珠子作爲賠禮給 Parricoutsie 長老，並承諾要付出他所要求的珠子數量。事後，參與的村社同意送年貢先到竹塹。該事件後來又引發 Baritischoen 人的兩村也有受害者，在 Goudt 長老的引薦下，兩村代表前往淡水與荷蘭人會面，並加入結盟；另一個屬於 Baritischoen 的村社 Ga-achaisan（海山）又幫助公司再度扮演相同的「和平仲裁者」的角色介入 Pinorowan 河流域村社、竹塹與龜崙村社之間的紛爭，在 1649 年公司宣告已經「平服」龜崙地區，這也是上述 Baritischoen 與龜崙最後均納入賽社制度的前因。[52]

回顧「淡水道路」的完成過程，自從 1642 年，公司擊垮虎尾壠後，即令虎尾壠所屬村社必須建立一個公司代表行經此區的「接待所」（ontvangstruimte op doorreis）。[53]同時，原住民也開始擔任「淡水道路」送信的差使，並向公司索取代價。[54]1650 年，「淡水道路」在大員到淡水之間，經過 12 個村社的路途可在 10.5 天完成。[55]對比 1654 年的紀錄，以原住民（的腳程）大約花了 12 天來看，這樣的旅程也有可能是騎馬完成的；但是比起 1646 年淡水原住民送信尚須花到 15 天，開通「淡水道路」後確實使路程縮短。[56]公司也開始責成各地方的政務員（*politieken*）維護必經的道路以及橋樑，並爲例行工事。[57]然而影響「淡水道路」是否通暢的最直接因素，仍然在於附近村社情況是否平靜，例如 1655 年，淡水附近的村社，包括八里坌（Pergon）、南崁與 Mattatas，淡水河流域連同 Pinorowan 河流域村社，以及竹塹都與淡水公司當局有所衝突，情勢趨於緊張，荷蘭人都躲在淡水城堡內不敢出來；當時的「淡水道路」，據報也是：「現在已完全不能通行了」。[58]

五、北臺成爲不能承受之重？

[51] *Formosan Encounter*, III, 65-66.
[52]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p, 102-103.
[53]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p. 14；中譯本，頁 15。
[54]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 355; III E fos.410, 492.
[55] *Formosan Encounter* III, 281.
[56]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E fo. 410; *Formosan Encounter* III, 57.
[57]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E fo. 504; III F fos. 737-738.
[58]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F fos. 767-768；引文見中譯本，頁 582。

面對北部臺灣成爲「不能承受的重擔」[59]，荷蘭殖民者似乎又回到了西班牙時代的窘境。西班牙對臺灣的著眼在貿易。初期，西班牙爲了南方「香料群島」之稱的摩鹿加群島，先佔領菲律賓做鋪路，在一連串的北向還是南向的殖民策略辯論中，臺灣甚至一度被鼓吹是香料肉荳蔻的產地；然而，直到荷蘭人先佔據臺灣西南部大員，阻斷中菲兩地貿易造成具體影響之後，西班牙才佔領雞籠。[60]在東亞殖民與貿易政策重南輕北傾向下，1636 年，西班牙當局決定放棄淡水，退守雞籠。[61]陳宗仁認爲西班牙當局此一決定在於菲律賓馬尼拉與中國、美洲的貿易漸行衰退，導致臺灣的雞籠、淡水變成多餘，在財政拮据下，只有先行縮減駐軍。[62]換句話說，西班牙當局將北臺的角色定位在馬尼拉與中國、美洲三邊貿易網絡上。

與西班牙人相同，荷蘭當局也期待北臺與中國之間的貿易，但是情況似乎不比西班牙時代來得有進展。1646 年當雞籠方面已有船隻從中國前來時，淡水尚未有之；兩個月後，才有中國來船到淡水的報告，可是數量都僅只一艘；貨物方面僅見雜貨。[63]1655年初，巴達維亞當局甚至建議將大員的貿易逐漸轉移到雞籠，例如將胡椒、鉛、錫與蘇木載運到該地，並派善於中國人打交道的商務員去進行；但是臺灣長官卻呈上長篇報告指出，大員水道變淺，中國人仍不願意前往雞籠，因爲他們已經習慣在大員交易。[64]過去在西班牙時代，仍有數十艘船到雞籠貿易的光景似乎已經不再。不只稱北臺沒有福州來船；時值鄭成功與滿洲韃靼人的爭戰，大員也面臨無中國船舶前來光顧的困窘，造成整體對中國貿易低迷的現象。公司也認識到貿易獲利不佳將難以維持駐軍，造成損失。[65]

1655 至 1656 年度，雞籠、淡水的花費，公司估計達到 *f*. 46,000，也就是大約占該年度總開支的一成。[66]1658 年，公司高層指出北臺的雞籠與淡水對公司造成負擔，希望能擺脫此兩地的麻煩，但又擔心一旦撤出，將使中國人前去定居，「並滲透到原住民中間」，煽動反對公司；面對被視爲難以掌握的當地原住民情勢，基於一發不可收拾的隱憂，公司當局只好寄望此地的物產：黃金、皮貨與煤礦可以稍稍彌補虧損。[67]到了 1661 年底，巴達維亞當局重申撤出北臺，將減少

---

[59] 關於此一命題，詳見筆者於博論的討論：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p. 146-148.

[60] 李毓中，〈北向與南進：西班牙東亞殖民拓展政策下的菲律賓與臺灣（1565-1642）〉《曹永和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台北：樂學，2001），頁 31-48 之頁 33-34；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 87。

[61]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頁 220, 280, 295。鮑曉鷗，《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頁 195。關於西班牙內部的討論：棄台灣，見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頁 271-295；棄守雞籠，見同上，頁 295-300；李毓中，〈北向與南進〉，頁 44-45。

[62]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頁 294-295。

[63]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s. 355, 382.

[64]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434。

[65]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F fo. 769;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434。

[66]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467；會計年度（1655 年 8 月 31 日至 1656 年 8 月 31 日）比例由前資料提供數據算得。

[67]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508。關於原住民情勢與北臺當局處境，見 Chiu

f. 40,000 費用。[68]綜觀公司經營北臺，開支大體不出人員薪資，食物與衣物的補給，築城、醫院、官舍與船舶，遠征費等項目。[69]然而對外與中國貿易欲振乏力，對內黃金貿易無法開展，相對來說，持續的開支又難以承擔，例如雞籠圓堡 Victoria 自 1647 年傳出修復，1654 年持續修復，1659 又再度有毀損，雞籠方面建議毀掉重建，但不被大員當局同意。[70]淡水所建碉堡也是陸陸續續建好、又壞再修。[71]

爲了應付全島各據點，包括雞籠、淡水、卑南三地無法藉由貿易來自給自足日常的所需物資，年度補給堪稱是大員向各地拉長的補給線，以解除各據點嗷嗷待哺的危機，不啻爲年度必須完成的例行要務。除了上文提及北臺最初兩年的情況外，1640 年代，大員進行補給較爲頻繁，主要仍是在南風季（5 月至 9 月）藉著海路由公司船隻或藉前往北臺的中國船隻載運所需的建材、食物、衣物等。[72] 1650 年代，年度補給的時間大抵是 4 月，淡水收到後，另外再往東分送到雞籠。[73]但是也有另一方向的規劃，爲了載運北臺的煤礦，當局不乏企圖結合全島據點的年度補給，將補給船由大員出發後先前往卑南，再沿著東海岸前往北臺的雞籠、淡水補給兩地後，沿著西海岸回到大員此一環島補給與輸運路線。[74]然而，補給貨物除了自用必需的米與鹽外，也包括可以用來與原住民交易的康甘布、煙草、日本鐵等商品；1655 年 4 月，前往淡水的北臺補給貨物總值已爲 *f.* 27,286.17.11，爲了確保安全，還讓士兵押送補給船。[75]

荷蘭取得北臺後，米糧缺乏向來是一大問題。除了雞籠略可向噶瑪蘭米倉獲取米糧外，淡水卻一直有缺米的困境，大員方面得不斷地派船送米過去，當有不順，難以完成時，淡水方面可先發給膳食費；[76]不然，原住民繳交的年貢米糧也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 147-148.

[68]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543；仍是年度開支的一成多，年度結算損益數據（1660 年 9 月 1 日至 1661 年 8 月 31 日；*f.* 386,596.11.18），見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551。

[69] 中村孝志，〈荷蘭的台灣經營〉，收在氏著，吳密察、翁佳音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上卷：概說、產業》，頁 321-342。

[70]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J fo. 588; III E fos. 360, 419, 505;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515。

[71] 1644 年至 1654 年都持續有修復記錄，見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E fo. 288; III E fo. 419；以及本文註 14。

[72] 例如 1644 年 4、6 月均有補給的紀錄，見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E fos. 290-292, 330; 1647 年 8 月決議補給與出發，見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J fo. 605, 606; 1648 年藉著前往淡水的中國戎克船，*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A fo.319;

[73]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E fo. 395, 可參見〈荷蘭福爾摩沙年中行事表〉，見於 Chiu Hsin-hui, *Colonial 'Civilizing Process' in Dutch Formosa*, p. 114, Table 7.2；*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E fo. 419-420.

[74] 1651 年行動失敗，補給船僅到卑南就因為暴風回到大員，後來再由大員航往淡水，見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C fos. 680, 689。

[75]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E fos. 395-396, 419; III F fos. 605, 609-611.

[76]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G fos.742, 750, 752.

可供消費；[77]此外，淡水主管也派人透過現金或是以物易物前去淡水河沿岸或是雞籠收購米，原住民翻譯 Lucas Kilas 就是被派任的人選[78]。米不足時憂慮，儲糧亦有風險，1646 年秋季淡水河沿岸收成好，淡水方面買到 12 lasten 米，未料儲放不到一年就開始壞了，公司趕緊出售，以減少損失，並以年度補給夏季到貨的暹羅米應急。[79]米的進出口與收購誠然是相當重要的事務；當中國戰況吃緊，難民潮衝擊大員，爲了禁止走私米穀前往中國，當局要求北臺等各地口岸嚴查，同時也禁用米、麥製燒酒。[80]此外，當天災發生時，公司也必須前去收購米；[81]1654 年引發嚴重飢荒災情的全島性蝗災，根據淡水主管 Thomas van Iperen 的報告，1653 年 11 月 6、7 日已經出現在雞籠，大員當局重申禁止穀物輸出令，同時從日本運來接濟米。[82]1655 年 5 月雞籠與三貂角地區現飢荒災情，原住民要求公司能開穀倉釋出米糧以利購買，爲此淡水方面也向大員要求補給，讓中國硫磺商人載運米過去賑災。[83]

除此之外，北臺對於公司派駐人員來說，尚處水土不服的「瘴癘之地」，特別是淡水地區。「因氣候條件差，淡水的死亡率極高」就出現在《東印度事務報告》中。[84]光是《熱蘭遮城日記》記載上報大員的疫情，就包括 1645 年雞籠、淡水的疫病；[85]1646 年 2 月淡水河沿岸的熱病；1650 年與 1651 年的 4 月都有爆發疫情、像是痢疾、腹瀉、高燒等，肆虐 4 個月；1654 年尤其是疾病不斷的一年：2 月雞籠駐軍發生熱病，4 月淡水職官大多感染地方病，7 月淡水爆發熱病，9 月淡水熱病、雞籠良好，11 月淡水重病、高燒猖獗；1655 年夏秋兩季都有疫情傳出；1659 年，淡水疾病與死亡不斷。[86] 除了下級商務員 Keyssel 病死在淡水外，設立主管後，先後有 11 位商務員級別獲得派駐，其中首任主管 Nolpe 以病爲理由要求接替人選；[87]另有 3 位多病死於任內（參見附表）。

六、結論

1642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從西班牙手中取得北臺後，將荷蘭在福爾摩沙的商

---

[77] *Formosan Encounter* III, 57-58.
[78]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 382, 386; *Formosan Encounter* III, 61-62;
[79]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 386; II J fos.601, 604-605.
[80]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A fos. 322-323, 325-326.
[81]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A fos. 347, 357.
[82]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E fos. 412-414, 523; *Formosan Encounter* III, 473.
[83]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F fos. 633, 635.
[84] 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543。
[85] 荷蘭人懷疑是原住民在飲水下毒引起，並指出西班牙人在時也曾發生過，*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G fos. 751-752.
[86]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 309;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B fo. 1025; III C fos. 679, 699, 721;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記》III，頁 289；*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I E fos. 410, 446, 489, 505, 528, 529; III F fos. 695, 769；程紹剛譯註，《荷蘭人在福爾摩沙》，頁 514-515。
[87] *Dagregisters Zeelandia* II H fos. 338; 373-374.

業與殖民活動擴及到全島。基於大員爲東印度公司的根據地，北臺的發展重心，除了以軍事行動爲主的初期外，行政與經濟的重要地位逐漸由雞籠移轉到淡水。1645 年 8 月淡水設立主管一職，更具體成爲大員與雞籠之間的中繼站，擔負起人員、貨物與命令的匯集與分配等樞紐的角色。不僅如此，淡水也串連起位居北臺與大員兩地間的廣大新領地；公司以軍事、外交手段掌控當地原住民村社情勢，並逐漸將其納入地方會議、年貢，以及賦社制度，取得具體的利益。然而，北臺無法順利開源，持續而例行的開支終於讓公司出現延伸補給線到北臺的困難，加上公司職員在該地區無法適應良好；1650 年代尾聲，北臺成爲公司眼中的負擔，僅在擔憂中國人會取而代之的壓力下勉勵維持。

附表：荷蘭時代淡水與雞籠的地方治理架構, 1642–1662

1. 雞籠轄淡水時期, 1642–1643

雞籠

Joannes Lamotius	(戰地指揮官: 1642 年 9 月–1642 年 11 月) [1]
Hendrik Harrouzee (Captain-Mayor)	(上尉: 1642 年 8 月起) [2]
Jacob Baers	(掌旗官: 1644 年 10 月 25 日)[3]

淡水

Thomas Pedel	(上尉: 1642 年–1644 年 8 月)[4]

2. 轉型過渡時期,1644–1645

Marten Gitner	(代理掌旗官, 中士: 1644 年 8 月) [5]
Johannes Keyssel* [帳簿文書]	(下級商務員: 1644 年 2 月–1645 年 8 月)[6]

3. 淡水轄雞籠時期,1645–1662

Opperhoofd: 淡水與雞籠主管 Chief [淡水]

Jacob Nolpe	(下級商務員: 1645 年 8 月–1646 年 8 月)[7]
Antonij Plockhoy	(下級商務員: 1646 年 8 月–1650 年 8 月)[8]
Simon Keerdekoe†	(下級商務員: 1650 年 8 月–1653 年) [9]
Thomas van Iperen	(商務員: 1653 年–1655 年 3 月)[10]
Pieter Elsevier*	(商務員: 1655 年 3 月–1655 年 8 月 28 日)[11]
代理 Pieter van Mildert	(下級商務員: 1655 年 8 月 28 日起)[12]
特使 Pieter van Borselen	(下級商務員: 1656 年) [13]
Johannes van den Eynde*	(上級商務員: 1656 年 3 月–1656 年 4 月 8 日)[14]
Substitute Egbert Codde	(下級商務員: 1656 年 11 月)[15]
Pieter Boons*	(商務員: 1657 年 5 月–1658 年)[16]
Nicolaes Loenius	(商務員: 1658 年–1661 年 8 月)[17]

說明：*死於任內; † 不當行為

資料出處：修改自 Chiu Hsin-hui, 2008: 304, Appendix Two.

出處縮寫：*DB*: *Dagh-Register Batavia*; *DZ*: *Dagregisters Zeelandia*; *GM*: *Generale Missiven*.

1: *DZ* II-B; 2: *GM*, 12 Dec. 1642, *DZ* II-B: 658, note 5; 3: *DZ* II-B:678, note 32; 4: *DZ* II-B:679; 5: *DZ* II-F:160; 6: *DZ* II-B:667, *DZ* II-G:722; 7: *DZ* II-G:724, *DZ* II-H:373; 8: *DZ* II-H:373, *DZ* III-B:1085; 9: *DZ* III-B:1085; *GM*, 19 Jan. 1654; *Formosan Encounter*, III, 349; 10: *GM*, 19 Jan. 1654; *DZ* III-F:603; 11: *DZ* III-F: 603, 606, 761; 12: *DZ* III-F: 761; *GM*, 31 Jan. 1657, 462; 13: *DZ* IV-A: 302, *GM*, 31 Jan. 1657, 462; 14: *DZ* IV-A: 196, 256; 15: *DZ* IV-A: 302; 16: *DZ* IV-B: 144; *GM*, 14 Dec. 1658; 17: *GM*, 14 Dec. 1658, 508; *DZ* III, p. 371

淡水在地文化工作與公民行動——記「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一段往事

張建隆*

摘要

發生於 12 年前的一場搶救運動，可以說是由在地文化工作者與文史團體結合全國各界力量共同達成的一次經典之作，及時挽救淡水河口兩岸的命運。起初看似機會渺茫，結果又覺得有些僥倖。但若仔細推敲起來，還是可以找到脈絡和意涵。擴大來講，可以牽連到整個時代的社會環境和政治生態。雖然不必如此大費周章；不過，還是必要乘著記憶尚存、文件猶在，經十年歲月沈澱過後，以較爲客觀的角度，記述那段往事。一方面，讓這場改變淡水命運的事件不致堙滅在熙熙攘攘中；另方面，也許更爲重要，或可找回對鄉土重新自我認同的初衷和力量。特別是在文化政策曖昧不明的今天，實在有必要檢視一下今昔之比。

關鍵詞

在地文化工作、公民行動、公共事務參與

*淡水社區大學主任

如果你想調整一下你的人生,讓自己能夠幫忙改變世界,我最誠摯的建議是：切莫花太多時間思索，只要開始行動就好。

—— Jhon Wood

一、前言
二、楔子
三、搶救聯盟
四、搶救行動
五、小蝦米 VS 大白鯊
六、第二波攻防
七、短兵相接
八、決戰篇
九、餘緒
十、代結語：城市美學與公民行動

一、 前言

台灣交通建設大餅，牽涉利益之龐雜，無與倫比。因此，歷年來只要有重大交通建設計畫，幾乎所向披靡。即便是驚動全國各界、連佛門也出面表態、纏鬥近 20 年的蘇花高，迄今仍是舉棋未定。唯獨「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像是踢到鐵板，在經過兩年多的抗爭後，竟然被迫停擺，創下了國內首例。

如今淡水河畔遊客如織，公部門也以「金色水岸」建設洋洋得意之際，甚至把「淡水河口藝遊網」納入旗艦計畫。有誰會想到，要不是十幾年前，民間團體發起的那場抗爭行動，今天走在河邊，只能看著一道三米高的水泥牆，「面壁思過」呢！

雖然這場運動，歷史自有評價；但隨著歲月流轉，往事逐漸湮滅，應趁著人事尚存，稍做整理，以爲交代。尤其，記憶中一直以爲搶救運動之所以成功，僥倖成份居多；但經仔細閱讀當年資料，才猛然發現，整個搶救過程，投入無數心血，以及各界人士的熱情襄助，其功不可沒。從其中也可以清楚看到，當年匪夷所思的秕政,如今仍普遍存在;而當年用以守護鄉土的作爲,仍可供後人參考。因此，藉由搶救運動成功十週年紀念之際，撰寫本文，向當年並肩作戰的夥伴致意，也用以勉勵大家發揚公民精神，投入公民行動，守護世代安居的家園。

二、 楔子

1997 年 12 月 3 日《聯合報》刊載，行政院於日前通過「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建設計畫」，將於 1998 年 7 月動工，預計 2000 年完成。消息傳來，引起莫大震憾。許多長期關心淡水的朋友，都覺得不可思議、難以置信。怎麼有人會想要在如此美麗的淡水河畔，興建一條大殺風景的快速道路？像是真實世界中不可能發生的事，卻有人硬是要去推動，而且是挾著極大的勢力非幹不可。

根據計畫報告[1][1]，計畫緣起是因爲淡水民意代表組成「淡水環河快速道路促進會」向省府請願，要求興建環河快速道路。這個組團請願事件，發生於 1995 年元月 9 日，陣容相當龐大，包括淡水地區的兩位縣議員李文德和呂子昌，以及由鎮代會主席蔡錦賢所率領的全體鎮民代表和各里里長等，共有六十多人，鎮公所主秘郭全男也陪同前往[2][2]。出面接見的層級相當高，是曾當過兩屆台北縣長的林豐正副省長。當天，一行人抵達南投中興新村時已將近中午，聽完省府的簡報後，便由副省長設宴款待，席開 6 桌，省府委員秦金生亦陪同宴客。

同年 5 月 9 日，林豐正主持召開研商「淡水環河道路規劃」會議，指示公路局委由顧問公司詳加研究本案的可能性。同年 7 月副省長吳容明召開另一次會議，指示公路局等到省府核准動用第二預備金後儘速辦理淡水河沿河道路可行性評估作業[3][3]。公路局於翌（1996）年 11 月啓動道路計畫後，半年內便完成道路工程研究，並提出期中簡報。接著，交通部分別在 1997 年 7 月、8 月和 10 月召開三次「台北都會區快速道路系統」協調推動小組會議，很快就拍板定案，行政院長蕭萬長於 11 月 13 日 2553 次院會中聽取簡報後，指示積極推動道路建設計畫，並請相關部會協助。層級之高，行政效率之快，令人稱奇。其背後應該不只是地方民代請願的緣故。

從當時交通政策急轉彎的過程，也許可以看見端倪。1996 年 5 月，省公路局提報台二線竹圍路段拓寬改善計畫。行政院核復，請公路局於 6 個月內完成運輸需求及拓寬方式後再行研議經費籌措。公路局於是在 1997 年 5 月提報修正計畫，並申請 88 年度重要經建投資計畫，建請中央全額補助。但是 8 月 21 日行政院的回答卻是：本案與「台北都會區快速道路系統整體發展計畫」中的短期計畫之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功能較近，交通部建議暫緩辦理台二線竹圍路段的拓寬改善計畫。如果是爲解決淡水聯外交通問題，最直接有效的應該是台二線竹圍路段的拓寬改善計畫，但當局的決策卻是捨近求遠，採行爭議較大、無直接幫助，而且是「後來居上」的沿河快速道路，其動機實在啓人疑竇。

---

[1] 此報告文件缺封面，撰寫時間大約在 1998 年 2 月間，內容包括路線研擬、工程研究、環境影響分析、建設計畫、結論與建議，共 64 頁，可能是省公路局的期末簡報資料。

[2] 當時筆者是以鎮刊《金色淡水》主編的身份隨行並拍照。

[3] 87.6.4 省公路局 87 路規劃字第 8719269 號函

就在行政院通過道路計畫後不到一個月，1997 年 12 月 11 日，交通部次長張家祝和公路局副局長陳晉源，陪同立委陳宏昌和縣議員呂子昌來淡水實地踏勘。陳宏昌直接向兩位官員要求不要做「環境影響評估」以免擔擱工期。陳晉源立即附和同意只需做「環境影響說明」，張家祝也表示交通部會積極向環保單位協調[4][4]，還說這是蔡部長（蔡兆揚）的政策，中央會全力支應建設經費。奇怪的是，陳宏昌的選區在三重並不在淡水，他爲什麼如此關心淡水的交通政策，是不是三重幫在沙崙地區有大筆房地產的投資[5]？因爲這條快速道路，看起來更像是「淡水沙崙市地重劃區」直達台北的專用快速道路[6]。

當然上述這些推論都是後來逐漸抽絲剝繭才慢慢看出來的。當時只覺得「交通建設可以帶來地方繁榮」也許是地方政商共同的迷思，但交通建設不應該是殺雞取卵式的唯利是圖。尤其在發現所謂的「沿河快速道路」行經淡水，將以路堤把淡水河完全阻絕起來時，簡直無法接受。於是淡水在地文化工作者、文史團體和長期關注淡水的朋友，很快地發起組成聯盟，投入搶救行動。

三、 搶救聯盟

1997 年 12 月 17 日晚上，淡水文化基金會邀請各界於淡水鎮中正路 161 號基金會會議室，參加一場名爲「淡水河邊快速道路政策檢討」的座談會。邀請對象包括縣長蘇貞昌、立委盧修一、王拓等人。出席者有：滬尾文史工作室李志仁 宋宏一 紀榮達 李美莉 呂欣怡、淡江大學教授黃瑞茂 范俊海、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張建隆、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彭揚凱、建築師李滄涵、淡水鎮代會主席蔡錦賢 鎮民代表蔡進發 鄭振豐 郭哲道、牙醫師陳盛、淡水文化基金會張子隆 姚聰榮 許慧明 洪家富、科管會黃繼明、立委李顯榮辦公室秘書蘇春旭、淡江大學教授錢傳仁、中央日報郭晏銓和淡水鎮民葉鶴齡等[7]。有趣的是，支持興建道路的一方，像是蔡錦賢等人也在邀請之列，並應邀出席。當晚似乎沒有擦出什麼火花。這場座談會最重要的決議就是發起組成「全民搶救淡水河岸行動聯盟」，並簽署共同聯署書，發表「發起聲明」。聲明如下：

---

[4] 當時縣議員呂子昌經營的「紅樹林有線電視台」記者跟隨採訪錄影並於翌年初縣議員選舉時當作宣傳影片播放而留下紀錄。

[5] 當年三重幫財力非常雄厚，以炒作房地產獲取暴利，陳宏昌是三重幫在國會的喉舌。而李登輝和三重幫掌門人林謝罕見交情匪淺亦眾所週知，交通部長蔡兆揚又為李登輝愛將，所以這中間似乎有很多聯想的空間。

[6] 「淡水沙崙市地重劃區」為林豐正擔任台北縣長任內的重要建設，1995 年 10 月開發完成後，因地處偏遠，加上受到淡海新市鎮第一期工程動工的排擠效應，許多房地產均遭套牢，與林豐正關係密切的「仕豐建設」於名列其中。

[7] 依簽名紀錄表格順序，表格共三頁，表格排列第一列是「蘇縣長貞昌」，最後一列是「淡水文化基金會」，「科管會」以下為自行填寫。但有些與會者並未簽名，在註 8 的另一份文件中就出現其他名字。

行政院十月十三日通過「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建設計畫」，將從規劃中的淡江大橋淡水端連絡道起，沿淡水河北側闢建雙向四車道至六車道的快速道路，經淡水渡船頭、淡水捷運站、紅樹林、竹圍、關渡大橋、關渡平原，最後則銜接台北市擬新闢之洲美快速道路。我們關切此項計畫如付諸實施，會不會對淡水自關渡大橋以下紅樹林自然生態和美麗的河岸景觀，造成無法挽救的損害，因此緊急發起組成「全民搶救淡水河岸行動聯盟」。

我們嚴正主張：

一、政府在計畫實施前，應依法做好環境影評估。

二、人民應有知的權利，請政府立即舉辦公開說明會。

三、請政府開放參與，讓人民有表達意見的機會。

四、政府應擬具贊代方案，做好各種方案利弊分析。

五、最佳方案應從各種方案中經公開辯論後選定。

六、從關渡大橋以下之紅樹林自然生態和沿著捷運淡水站到淡水河口的美麗河岸景觀，是淡水人民的珍貴文化資產，應好好子以保存維護。

在這份聯署書上簽署爲發起人的單位和代表人有：淡水文化基金會張子隆、滬尾文史工作室李志仁、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張建隆、淡水社區工作室黃瑞茂、滬尾山河工作室林慶宗、專業都市改革組織彭揚凱、淡江中學姚聰榮等[8]。

顯然部份出席座談會的人，並沒有簽署連署書加入搶救聯盟的行列，如鎮代會主席蔡錦賢、鎮民代表蔡進發等人。聯盟的發起人，大部分是老戰友[9]；但也有成爲生力軍的新戰友，如環保聯盟台北分會。因爲有記者受邀與會，《中央日報》在 12 月 20 日刊登了聯盟成立的消息，標題是「搶救淡水河岸／成立行動

[8] 依文件表格順序，這份文件簽署顯然是在會後重新謄寫（因字體相同）。在另一份只有記註「共同發起人」的十行紙文件上，依順序簽署的則為：淡水文化基金會張子隆、淡水老街商圈聯誼會葉鶴齡、滬尾文史工作室李志仁、淡江大學建築系淡水社區工作室黃瑞茂、都市改革組織彭揚凱、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張建隆、私立淡江中學姚聰榮、台灣愛樹人文史工作室廖守義、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常務理事李滄涵、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黃繼民、新埔專校講師宋宏一、淡水大學副教授錢傳仁、環保聯盟台北分會執委陳建志、環保聯盟台北分會執委王文賓、水返腳藝文中心高燈立、石門鄉文化發展工作室莊惠玲、慈暉文教基金會瓦磘溝觀光運河促進會劉欹欹、新莊文史工作室翁□□。

[9] 八〇年代中期，一群由文化愛好者組成的「滬尾文教促進會」，為了對抗當時塵囂甚上的淡水環河快速道路案，於 1987 年毅然走入淡水社區，推動地方的文化工作。這個淡水戰後的第一個地方文化團體，雖然於 1988 年因故解散，但卻埋下了日後淡水文史運動的種子。1990 年，前促進會成員張建隆成立個人工作室「淡水史田野工作」，開始進行淡水開發史的田野調查工作。同年，前促進會成員紀榮達和李志仁，與蘇文魁、吳春和等成立「滬尾文史工作室」…。1995 年 6 月，前促進會成員許慧明、謝德錫等，結合地方政商各界成立「淡水文化基金會」，推動各項文化活動。另外，由淡水大學建築系老師陳志梧、黃瑞茂和曾旭正帶領學生組成的「淡水社區工作室」，也自 1993 年開始在淡水推動社區營造、空間規劃和相關調查工作。參見張建隆＜田野調查與淡水史研究＞，1998。

聯盟」，副標題爲「籲請政府審慎評估北側快速道計畫／避免危及自然景觀」。

行動聯盟成立之初，聚會次數相當密集，從留下的簽名記錄可以看出，幾乎三、五天就聚會一次，每次出席人數也都有 10 人上下[10]。會議名稱有時是「政策檢討會」，有時叫「座談會」，也有稱「行動策略研談會」。至於聯盟名稱，到了 1998 年 1 月 19 日，就改成「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一直延用至最後。最初的會議，大都由淡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許慧明以臨時召集人的身份主持會議（但 1 月 19 日的主席是張建隆），後來就採輪值主席，當時留下的會議紀錄十分有限，只能借助於相關文件資料，了解搶救聯盟初期的運作情形。至於會議出席者參與情形，請參考文末的附表。

四、搶救行動

（一）組織架構

早期的開會通知單中，有所謂的發文單位「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執行委員會」、「臨時召集人」許慧明和「連絡人」顏瑛嬌，基本上都是淡水文化基金會在做行政支援。大約在三月的時候，經過會議討論，才把初步的職務分工確定下來，聯盟召集人由淡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許慧明擔任[11]，發言人由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張建隆擔任，專業協助由淡水社區工作室黃瑞茂擔綱，財務管理由滬尾文史工作室宋宏一擔任[12]。許、張、黃成爲聯盟的鐵三角，一直並肩作戰到最後一刻。

（二）初期戰略

包括：一、「蒐集資料」，透過立委王拓等人的國會辦公室向交通部取得＜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建設計畫＞簡報資料；二、「擴大串連」，廣邀民間人士、文史團體、文化團體、環保團體、專業學者、社造團體等加入聯盟；三、「媒體披露」，透過投書、發布消息、記者會等各種形式，引起社會關注；四、「製作說帖」，

[10] 從 12 月 17 日聯盟成立至農曆春節（1 月 28 日）前，聚會達六次之多：1997.12.26（13 人），1998.1.1（9 人），1998.1.4（11 人），1998.1.9（8 人），1998.1.15（記者會），1998.1.19（8 人）。

[11] 1998 年 2 月 17 日淡水文化基金會第一任董事長張子隆因故辭職，選出陳信雄為第二任董事長。

[12] 3 月 15 日的會議議程中「提案討論」的第一項就是「探討組織分工架構」。另，當時在淡江大學建築系讀碩士班的黃上科，為了撰寫有關快速道路爭議的論文，也經常出席會議，當時他為搶救聯盟整理的會議紀錄，留下不少記載。1998 年 3 月 25 日和 3 月 29 日的會議紀錄中，都有提到財務管理。另，從一份「行動聯盟財務收支表」，可以看出 3 月 22 日已開始有捐款的收入項目（包括 3 月 22 日宋宏一 1,000 元、許慧明 10,000 元、陳亭安 100 元、戴全成 500 元、黃上科 500 元、蔡維倫 2,000 元、張建隆 500 元、劉宏偉 500 元，3 月 25 日滬尾文史工作室 1,000 元，3 月 29 日王雅秀 100 元，4 月 5 日曾旭正 2,000 元、淡水史田野工作室 1,000 元、王文賓 1,000 元，5 月 11 日李志仁 3,000 元），而自 3 月 25 日開始有支出項目，主要是刻印、文具和郵資等。這份收支表只紀錄到 5 月最後一筆支出申請地籍資料 1,845 元，尚餘 13,541 元。可能是這時財務宋宏一因忙於其他事情，甚至到了 6 月以後幾乎失聯，財務也沒人做後續的管理，就不了了之了。

透過海報及論述，釐清問題之所在、凸顯問題的嚴重性；五、「拜會政治人物」，拜會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協助；六、「召開公聽會」，透過立委召開公聽會，對行政部門施加壓力。而且很快就找到攻防重點：針對該計畫有違合法性和正當性的部分，提出質疑、強烈抨擊。

（三）民間版環境影響評估

搶救聯盟在閱讀了＜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沿線問題協調結果報告＞後，發現該計畫顯然與現行文資法、水利法，以及捷運限建辦法相抵觸，而且該報告文末直言：「若辦理環境影響評估，可能影響完工時程」[13]。而 1998 年元月，淡水有限電視台又播出公路局副局長陳晉源附和立委陳宏昌不做環評的一段錄影，更加令人擔憂。於是聯盟由張建隆和黃瑞茂兩人，連日趕工，撰寫民間版的環境影響評估，並於 1998 年元月 15 日召開記者會，公布**＜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民間版環境影響評估＞簡明版初稿。張建隆在一份＜記者會備忘錄＞文件中申明**：「沒有經過環境影響評估的工程是不合法的工程，也是紕漏百出、後患無窮的黑工程」、「環境影響評估不只是專家學者的職責之所在，更是在地住民最需關心的重點。因為工程一旦動工，最受衝擊和影響的是當地住民的生活品質，我們當然有權來保護自己的權益」。這份民間版的環境影響評估，經過修改補充，最後配上說明地圖和海報封面，以半開對摺的形式，於 2 月初印刷出刊。這份環評於是成爲聯盟初期的主要論述與訴求。前言中強調：「國內公共工程黑箱作業的流弊，早已為國人所詬病…為此，我們責無旁貸的提出民間版的環境影響評估，希望全體民眾共同來監督」。主要內容分爲六大部分：

壹、日常居住生活的影響，包括：一、對於鎮民日常生活的衝擊：阻絕淡水人就近淡水河。二、「沿河快速路」引道之交通回流對市區交通的影響：造成市街交通的癱瘓。三、「沿河快速道路」的巨大結構體：將造成市街面臨淹水的窘境。四、「沿河快速道路」將帶來永無止境的車流噪音。五、「沿河快速道路」的巨大結構體阻隔空氣對流，造成市街嚴重的空氣污染。六、淡海新市鎮施工過程之工程重車，將帶來永無寧日的噪音和空氣污染。

貳、觀光資源與產業，包括：一、觀光資源：原先吸引大批人潮來淡水遊玩的美麗景觀，將完全被阻絕在「沿河快速道路」之外；嚴重影響淡水寶貴的觀光資源。二、觀光產業：淡水的觀光產業將喪失其競爭力，而且難以翻身。三、漁業：完全失去生存空間，僅有的河邊舢舨景觀也將永

[13] 該報告係附在＜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建設計畫＞簡報資料最後，註明日期 1997.10.30。

遠消失。

參、人文歷史的影響，包括：一、淡水傲人的歷史文化資源，將毀於一旦。二、淡水人共同記憶與熟悉的生活空間將成為歷史名詞。三、文藝之鄉將永遠淪喪。

肆、對淡水地區整體都市發展的影響，包括：一、淡水河水文的影響：造成沿河地區遭受水患的危機。二、與台北縣綜合發展計劃淡水未來發展定位相衝突：破壞淡水的產業根基。三、對淡水地區市區交通的衝擊：不但無助於解決，並且加重淡水市區交通的負擔與堵塞。四、與台北北區交通系統的整合：勿因此而讓淡水成為台北北區的疏散通道。五、「沿河快速道路」對於捷運線的影響：開倒車走回頭路。

伍、自然生態的影響，包括：一、「沿河快速道路」將直接破壞紅樹林生態保護區的植物生長與動物的棲息。二、「沿河快速道路」將嚴重破壞淡水河沿線豐富而特殊的地景風貌。

陸、對地方文化意識的影響：好山好水不見了，淡水人的驕傲也不見了。

這份環評內文總共不過五千多字，但條理分明、說理清楚、簡明扼要，又配上專業繪製的說明地圖，和以頗具說服力的照片對照做爲封面，成爲一份很有力道的說帖，又搶先在環評作業之前公布，也給公部門帶來不少壓力[14]。

與民間版環評同時出刊的四開彩色海報，上面放著兩張對照圖片，一張是阿嬤帶著四個小孫子坐蹲在美麗的淡水河邊眺望觀音山和淡水河，另一張則用繪圖軟體把風景填塗成一堵水泥牆。海報標題是「失去了淡水河，我們還剩下什麼？」副標題是「一條高三米寬五十米長一點七公里的沿河快速道路堤，即將把我們跟淡水河完全阻絕起來。淡水有難，亟需您來幫忙！」印製精美，頗具說服力，同樣成爲聯盟初期的主要文宣[15]。

（四）立法院公聽會

搶救聯盟很快就得到立法委員的協助，於 1998 年 2 月 24 日在立法院第九會議室召開公聽會。立法委員王拓、朱惠良共同主持[16]，立委李應元和馮定國也出席與會，政府部門包括交通部國工局湯副總工程師等 11 單位人員，以及民

[14] 公路局到了 1998 年 2 月 11 日才完成「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可行性評估期末報告書」。

[15] 該海報由張建隆設計（照片和文字），由淡水文化基金會出資請專業美編做版面編輯並付印。為趕在農曆年（1998.1.28）前出刊，張建隆由許慧明陪同，親自到台北的設計公司和美編做完稿。

[16] 此次公聽會是由王拓和朱惠良國會辦公室聯合邀請。當時張建隆在剛卸任黨主席施明德的「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擔任「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計畫」的研究員，基金會就設在施明德的國會辦公室，跟民進黨籍的立委有接觸的機會和管道。另，當時施明德正大力推動「大和解」，和新黨的朱惠良交情很好。因此之故，很能得到立委的支持。

間團體淡水文化基金會等 10 個團體代表[17]，還有不少媒體前來關心採訪，擠滿整個會議室。

這場公聽會討論的重點包括快速道路的正當性、適法性、對環境的衝擊、對文化和景觀的破壞，以及決策過程。然而自始至終，交通部官員一直無法說明爲什麼要做這樣的決策，幾乎都由公路局副局長陳晉源代打，再由亞聯工程顧問公司黃經理補充說明。陳晉源指稱，爲解決台二線交通壅塞問題，而台二線拓寬工程又會嚴重影響交通，所以才考慮另闢沿河快速道路，至於對環境景觀衝擊問題，在規劃中都會給予考慮。但當王拓質疑是否做過評估時，陳晉源才坦承若干環節問題還沒有獲得解決。亞聯公司則是一再辯護要如何加強設計減少對景觀的衝擊。

接著朱惠良委員質疑，爲何放棄原淡水新市鎮聯外道路系統選定的 B 方案（沿山線），而改採已遭否的 A 方案（沿河線），以及沿河快速道路與捷運淡水線功能重疊問題。交通部運研所蘇振維和公路局陳晉源，都把理由推給爲了銜接未來要興建的淡江大橋。但營建署劉科長則坦承沿河線的確對人文景觀衝擊較大，而且尚未獲得解決。捷運局第一處處長孫克理表示，淡水捷運系統目前的載運量 9 萬人，距離第一個目標年 2001 年的載運量 16 萬人，還有一段差距。

接著由民間團體和學者專家表示意見。淡水文化基金會許慧明強調文資法的重要性，以及快速道路對淡水文化資產的衝擊。滬尾文史工作室王宏升和紀榮達，都重申歷史文化和古蹟的重要性。淡水社區工作室黃瑞茂認爲，快速道路和淡江大橋等整個道路系統，不只會把淡水鎮變成一個「路過」的交流道，而且跟台北縣的綜合發展計畫是背道而馳的，同時在河道上建造 28 米乃至 50 米寬的路堤，將會導致洪患問題。都市改革組織喻肇青教授質疑，爲了縮短區區 14 分鐘的路程，竟要犧牲掉整個淡水鎮的親水空間，而且這條道路計畫觸犯水利法、文資法和捷運兩側限建辦法，問題嚴重。都市改革組織曾旭正教授指出，淡水商港其實是砂石碼頭，一旦興建沿河快速道路，只會引狼入室，讓大量的砂石車在淡水呼籲而過，建議立即停止這個計畫，把經費用在改善和增強淡水的人文環境。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張建隆最後發言，指出快速道路就像一把匕首插在淡水的心臟，因爲淡水河畔是淡水鎮最珍貴的菁華區；而且台二線的交通壅塞，應尋求交通管理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大興土木；如果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保留河岸景觀的經濟效益遠遠大於興建快速道路數千倍。稍後趕到會場的立委李應元也呼應，不要爲

[17] 據黃上科碩士論文＜一個爭論議題下的多元價值模型＞附錄一「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立法院公聽會的議題分析」，政府部門出席的有交通部國工局湯副總工程師、交通部運研所蘇工程師、省公路局陳晉源副局長、環保署劉科長、北市捷運局第一處孫克理處長、捷運公司高經理、亞聯工程顧問公司工程部黃經理、內政部營建署劉科長、省林務局管科長、農委會保育科簡科長、文建會編撰施先生。民間團體則有淡水文化基金會執行長許慧明、淡水社區工作室黃瑞茂 黃上科、滬尾文史工作室紀榮達 王宏升、都市改革組織喻肇青 曾旭正、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張建隆、荒野保護協會宋宏一、北市野鳥學會郭文榮 李先生、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王明慧、台北市交通環境改造協會許先生。

了速度而犧牲寶貴的自然景觀和人文資產。

當交通部官員一直無法回答王拓委員所提爲什麼會有這個計畫的質疑時，其他政府部門則紛紛表達對該計畫所持的保留態度。農委會保育科簡科長指出，他們在多次會議中都曾表示，請規劃單位能夠不經過紅樹林保護區，另尋替代方案。環保署劉科長主張，這個計畫必需做環境影響評估，而且過程需公開透明。文建會編撰施先生表示，站在文化主管立場，絕對支持淡水居民的主張，而且文資法明白規定，如果開發行爲造成環境破壞，將有罰則，公務人員還要加重二分之一。林務局管年長也認爲快速道路除了會破壞到紅樹林觀景台，而且施工中對整個紅樹林的衝擊，不是報告中所講的那麼小。

聽到這麼多不同的聲音之後，交通部運研所蘇振維終於改口說，如果紅樹林以北路段爭議很大又無法解決的話，可以考慮只做紅樹林之前的半段。但公路局陳晉源還是重複辯解說，如何透過設計減少道路對環境景觀的衝擊。聽到這裡，立委馮定國半開玩笑的說，像淡水河邊這麼美麗的景觀，就是要慢慢的開車，好好欣賞風景，根本不該有快速道路。如果是要蓋路，只需拓寬現有道路，而且應該往山邊去拓寬。

公聽會最後由立委朱惠良做總結[18]。她表示，無論是從生活、產業、文化、生態或景觀的角度來看，快速道路都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這條道路一旦興建，等於是扼殺深富歷史文化景觀和觀光價值的淡水鎮。公共工程不能只看單一的經濟效益，更需要考量到社會成本[19]。

這場公聽會幾乎是一面倒，並暴露出快速道路計畫決策過程和計畫內容的疑點重重。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譴責，連其他政府部門也都無法苟同。

翌日，《中國時報》有三篇報導。其一，標題「淡水人文景觀可能毀容」，副標「立委王拓、朱惠良針對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將遮蔽淡水河景觀召開公聽會」。其二，標題「淡水史蹟遺址因軍事管制未受破壞／擔心成為交通的祭品」。其三，標題「捷運淡水、淡海線夠新市鎮所需／惟淡海延伸線闢建時程未定」。另外，民視異言堂也做了一個專題「淡水再見？」報導公聽會經過，並訪問喻肇青和曾旭正，對快速道路提出質疑[20]。這些報導究竟能給有關當局多少壓力，當時並沒有什麼把握；但至少給搶救行動帶來不少激勵，並找到更多同志和盟友。立委王拓並於立院第三屆第五會期第三次會議，針對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的興建

[18] 中間還有三位來賓發言，一位是台北市交通環境改造協會的許先生，他認為台灣應學歐洲或同樣地狹人稠的新加坡和香港，鼓勵大家搭乘大眾運輸。另一位是淡水鎮民吳先生，他認為為了節省交通時間，快速道路還是有興建的必要，並提醒大家不要只注重文化和環境保護而忽略經濟發展。還有一位是荒野保護聯盟的宋宏一，他要求大家認真看待溼地的重要性，並警告說如果在淡水蓋路堤將來會導致對岸八里遭受洪患。

[19] 以上發言內容根據黃上科前揭書之紀錄。

[20] 該影片播放時間約於 2 月底，由林樂群親自掌鏡。先前因古國威引介，張建隆登門拜訪民視，親向異言堂製作群求助，立即獲得首肯。

將對自然生態、文化資產和觀光產業造成重大衝擊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五、小蝦米 VS 大白鯊

公聽會後，搶救聯盟再接再厲。3 月 9 日，透過立委李應元的安排，前往台北縣政府向縣長蘇貞昌說明興建沿河快速道路的不當[21]。3 月 16 日，張建隆以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名義向監察院陳情，指控交通部門行政草率、涉有弊端且有違法之嫌[22]。3 月 19 日，搶救聯盟邀請淡水和八里的漁民舉行座談會，爭取漁民的支持。3 月 25 日，立委李應元國會辦公室向台北縣政府發函，請縣府儘速派員勘察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沿線經過之多處古蹟遺址。

另方面，3 月 17 日公路局在淡水鎮舉行「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路線規劃說明會」，各媒體都有篇幅報導，《自由時報》標題：「**尷尬但熱鬧**」「**尷尬：官員及顧問公司人員都出席 民眾只有 40 人／熱鬧：地方意見領袖為了路線規劃自家人爭論不休**」[23]。《自立晚報》標題：「**淡水河側快速道路說明會場面冷清／反對**

---

[21] 這次的拜會過程，當時擔任李應元國會助理的謝孟瑤寫了一篇報導，刊在《文化淡水》14 期上：「立法委員李應元及淡水鎮長郭哲道，與淡水文化基金會（許慧明、顏瑛嬌、姚莉婷）、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張建隆）、滬尾文史工作室（紀榮達、王宏升）、淡水社區工作室（黃瑞茂）、荒野保護協會（宋宏一）、台北市野鳥學會（郭文榮）、環保聯盟台北分會（陳建志）、中華民國社區總體營造學會（賴政育）等團體成員，於三月九日上午前往台北縣政府向蘇貞昌縣長說明此工程的嚴重性，期待身為淡水地區的父母官，能夠瞭解淡水地區民眾對於該工程的想法與意見。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張建隆老師表示台北到淡水的交通問題並不是興建一條快速道路便可以解決，並且具體提出五大交通瓶頸的解決方案，唯有找出問題的癥結點一一擊破，才是根本解決之道，若再興建未經妥善評估的快速道路，只會帶來更多問題。會中立委李應元強烈的表示淡水河的自然景觀，夕照、觀音山景、紅樹林、水鳥棲息等等，是生活在大台北地區民眾最大的自然文化資產，交通建設的目的在於促進地方繁榮，絕不容許粗糙的工程計畫草率的破壞我們所珍借的成長環境。李應元指出若依照目前的規劃方案，快速道路行經關渡水鳥保護區、紅樹林自然保護區，高堤式的快速道路將遮斷淡水地區的自然景觀，加上快速的車流所帶來的噪音、振動、空氣巧染等等，對於自然生態、文化資產、觀光產業將帶來無限的衝擊。行政單位均應納入考量重點，運用智慧重新進行可行性評估，尋求其他替代方案以抒解交通壅塞問題。蘇貞昌縣長誠懇說明北縣政府對此案相當重視，交通工程固然會對地方帶來便利及繁榮，但絕對要考量其對環境的衝擊，千萬不可『積小善而成大敗』。機要秘書李文忠也婉轉說明該快速道路的最終決定權應在上級機關，北縣無權做出決策。」

[22] 監察院於 3 月 25 日回覆：「本院已於八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函請行政院，對於交通部逕行通過『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方案』，其決策過程草率、且涉有弊端等情乙案，請參處逕復。」一個多月後，監委江鵬堅申請自動調查。

[23] 這裡所謂的地方意見領袖的爭論，是指新科鎮長郭哲道在會中認為，環境影響說明報告過於粗糙，要求重新評估，並贊成暫時擱置對景觀衝擊較大的路段，但立即引起包括縣議員呂子昌等人的反駁。關於這些爭論，翌（19）日《自由時報》有進一步的追蹤報導：「昨日上午九時許，鎮籍縣議員呂子昌、鎮代會主席蔡錦賢、鎮代許文龍與沙崙、油車、鄧公三里里長洪清一、張再成、李宗璨率三十餘位支持興建案的民眾赴鎮公所，要求郭哲道明確表態支持該案，並積極推動『全線貫通』，不應分段完成。呂子昌說，淡水對外交通壅塞問題迫切需要改善，且該案歷經多次努力爭取才有眉目，不應為了少數人反對而毀於一旦，置多數人的期望不顧。他說，該案經費太大，超過鎮公所負擔能力，也不可能為了淡水人的歧見而保留，希望郭哲道不要堅持擱置紅樹林以北的路段。出席民眾多半來自爭議路段區，張再成說，里民往返台北市得經過鎮中心區，短短約二公里路程有時需二十分鐘，假日時更不堪設想。他

人士：沒收到通知 以致未參加說明會」。《中國時報》標題：「闢建淡水環快道 各彈各的調／交處辦說明會 民代里長促如期施工 鎮長異議遭反彈」[24]。

這次的說明會事先並沒有邀請搶救聯盟參加，因此聯盟於 18 日晚上發表聲明，對省公路局舉行興建案說明會前未廣泛通知、造成民眾出席狀況欠佳、行動聯盟更在不知情下缺席深表遺憾，並要求公路局再辦一次公聽會。行動聯盟發言人張建隆在聲明中指出，公路局始終無法解釋淡水河快速道興建案的部分疑點，包括對環境的衝擊，因此該聯盟主張應在淡水鎮舉辦說明會，不料公路局 17 日開會前未通知聯盟成員，且民眾參與情形毫無代表性，官方顯然缺乏誠意[25]。

爲此，搶救聯盟於 3 月 29 日召開工作會議，對公路局 17 日的說明會做進一步的探討，並且提出幾項重要的對策。一、密切注意環評流程，蒐集相關資料提供給環評委員，全力爲環評把關；二、針對計畫道路沿線的歷史文化資產向縣府提報古蹟[26]。同時，擬定兩大行動策略：一、宣傳與連署；二、對抗與聯合。前者主要對象爲民眾；後者則爲公部門與民意代表，一方面爭取具環境意識的單位和民意代表支持，另方面透過公文、拜會或公聽會拖延流程[27]。

3 月 31 日，搶救聯盟由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省議員周慧瑛、淡水鎮長郭哲道等陪同，前往捷運公司拜會董事長游錫堃，除向游說明快速道路諸多疑點以及與捷運淡水線功能重疊問題，並提議捷運公司與淡水鎮公所共同召開交通會

說，快速路一定要按照原案，從油車里淡江大橋引道預定地向南施工，才能解決當地民眾和淡海新市鎮三十萬計畫人口所需。郭哲道則重申始終支持全案，並早已列入競選政見，只是反對穿越鎮中心區河岸的現行路段施工設計，認為此舉有破壞景觀之虞，他強調，從紅樹林轉向登輝大道的高架方案是公路局規劃，並非他所堅持。部分民眾認為郭哲道的說法太過消極、缺乏誠意。呂子昌說，淡水河岸長期受洪水平原管制區限制無法開發，應趁本案妥善運用。蔡錦賢說，路通才有繁榮，交通建設一定會有破壞，鎮民的歧見已讓官方看笑話。還有民眾要求郭哲道保證四年任期積極推動全案完工。郭哲道不願具體承諾，他說，鎮公所只能對全案提出『小小的』意見，根本無怯決定完工期限，不過他強調，建設與自然並非無法兼顧。由於雙方爭論不休，郭哲道認為已表明支持立場，面對里長、民代的追問逕自離席，會談草草結束。」

[24] 甫當選就任鎮長的郭哲道，十年前為「滬尾文教促進會」的最後一任會長，該促進會原係為反對 1987 年的淡水環河快速道路案而成立。參見註 9。

[25] 據 1997.3.19《自由時報》。

[26] 這兩項策略，後來成為搶救工作終於成功的關鍵。據黃上科會議紀錄。從紀錄中可以發現聯盟的成員又添增了生力軍，包括當時在台北市都發局任職的蔡維倫，他提供環評流程示意圖；還有李應元的國會助理謝孟瑤，她跟大家報告說李應元將於 3 月 31 日立法院總質詢時向交通部長做專案質詢，那段時候謝常來淡水出席會議，傳遞消息；還有淡水工商管理學院（真理大學前身）的學生，他們主動成立「學生發展聯盟」，走入社區與居民互動。會議中也提議發行機關報，但並未實施，主要是透過《文化淡水》報導搶救運動的近況，或由環保聯盟台北分會藉由網路散播消息。

[27] 參見＜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初步行動策略備忘錄＞，1998.3.29。同日，《中國時報》刊出台大外文系教授廖咸浩投書嚴厲譴責「快速文化扭曲人文主義」，廖文近兩千字，配有插畫，佔不少版面，相當引人注意。後來廖咸浩告訴筆者說，他寫這篇投書時，因為氣憤難當，邊寫手還邊發抖。

議[28]。隔日《中國時報》報導說：「他（游）非常認同民間團體的訴求，願意以個人名義參與反對興建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工程的連署。」

這段時間，1998 年 2、3 月，搶救聯盟仍然十分忙碌，根據留下的簽名紀錄，兩個月間，至少聚會了 9 次，出席人數少則 7、8 人，多則 15、16 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環保團體[29]，還有淡水地區大學生的加入，特別是淡水工商管理學院的學生會由會長率幹部來支援[30]。

但是，3 月 31 日立委李應元在院會總質詢向行政院長蕭萬長提出洋洋灑灑的質詢內容，但得到的回應卻是：「我們會…以景觀的手法，重建親水空間，並考量…防洪功效，俾讓這條公路完成後，不致…成為一條硬綁綁的公路」。而且，4 月 2 日傳來壞消息：交通部初步決定，快速道路分兩階段施工，並於 7 月份開始動工。

聯盟於 4 月 5 日和 4 月 12 日召開會議，商討對策[31]。當時的工作會議已經相當有板有眼，議程通常分爲三部份，一是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與執行情形；一是訊息交流與情勢分析；一是議題討論和臨時動議。12 日的會議，特別邀請到省議員周慧瑛出席與會。主要討論事項有：配合省議會質詢期間行文省議會，和擴大召募搶救聯盟發起人加盟等。從簡要的會議紀錄中，可以看出搶救聯盟近日來的進展，包括：立委王雪峰將提出緊急質詢並召開聯合記者會、行文監察院檢舉交通部違法失職，和填寫古蹟調查概況表向縣府提報古蹟等[32]。

4 月 13 日，由鎮長、鎮民代表、里長、鎮民等連署，向省議員周慧瑛陳情，請極力爭取台 2 線竹圍路段計畫道路拓寬工程[33]。4 月 15 日，搶救聯盟張建隆

[28] 根據行動聯盟發言人張建隆的＜拜會游董事長報告提綱＞，報告內容分兩大部分：一、環河快速道路問題，包括 1.決策過程草率、粗暴；2.對淡水鎮的破壞與衝擊；3.對捷運淡水線的衝擊和影響；4.替代方案與對策。二、淡水交通、觀光昇級與捷運淡水線的營運，包括 1.淡水市區當前交通的困境；2.捷運淡水線與淡水文化、景觀資源的開發；3.召開淡水市街交通會議的必要性。另外，關於這次的拜會行動，黃上科寫了一篇報導＜為淡水鎮的交通把脈，共創捷運公司與淡水鎮的雙贏局面＞，登在 1998 年 5 月出刊的《金色淡水》第 15 期，根據這篇報導，同往捷運公司的聯盟成員有淡水文化基金會許慧明、淡水史田野工作室張建隆、淡水社區工作室黃瑞茂、荒野保護協會宋宏一、社區營造協會、鯨魚地球基金會、滬尾文史工作塞、環保聯盟台北分會等。

[29] 如「荒野保護聯盟」黃雍熙、廖惠慶代表出席，「台北市野鳥學會」郭文榮代表出席，「鯨與地球基金會籌備處」鄭景元代表出席。

[30] 淡水學院「學生會」會長陳俊男、外務部長劉宏偉、內政部王雅秀等。另，淡江大學社團，如「大地環保工作團」團長顏啟志和「環生社」陳亭安等。此外，省議員周慧瑛也派代表薛永松前來參與。

[31] 不過 4 月 5 日的會議上，主要是報告最近發言人張建隆頻上電台媒體表達反對興建環快的看法，以及決議繼續行文公部門表達意見，和發動學生寫 E-Mail 給行政院長蕭萬長等。

[32] 張建隆到立院拜會王雪峰取得允諾；檢舉函由許慧明負責撰寫並發函；古蹟提報由張建隆提供資料、紀榮達負責填寫並送件，當時提報的古蹟包括氣象測候所、水上機場、迺生產洋行（殼牌倉庫）、海關碼頭、中法戰爭油車口歷史水岸等。

[33] 連署人包括：淡水鎮長郭哲道、鎮民代表鄭楊淑玲、張文陞、郭添印、竹圍地區里長陳延富、紀興旺、蔡泰昌、鄭吉良、馬偕醫院竹圍分院院長黃富源、竹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鄭國楨、

在《中國時報》投書，標題「淡水環河道路案 不容借屍還魂」，抨擊交通部門決策過程粗糙草率且明顯行政疏失。4 月 16 日，搶救聯盟許慧明函省政府指出公路局辦理環快有浪費公帑、圖利包商和嚴重違法之嫌。4 月 17 日，淡水地區民眾組團前往中興新村，向省議會要求儘速實施已延宕 19 年之久的「台二線四十米計劃道路」拓寬工程。這次的陳情行動，兩大報皆有報導。《中國時報》標題「搶救淡水河聯盟 赴省議會為家園請命」。《聯合報》標題「淡水環河快速路 效益遭質疑／數十民眾陳情省議會 抗議興建工程未經嚴謹環評」。4 月 21 日，立委王雪峰在立法院第二會議室召開「搶救淡水河，反對興建淡水環河快速道路」記者會，提出三大譴責、二大質疑，和一項呼籲[34]，炮火全開，等於是向交通部門全面宣戰。5 月 2 日，環保聯盟台北分會舉辦「不要跟美麗淡水說再見，淡水深度生態之旅」活動。5 月 6 日，監察委員江鵬堅針對「淡水環快案」涉嫌違法瀆職申請自動調查。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傳來消息，立院將於 5 月 14 日召開聯席會議，審查「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案」5 億元先期預算[35]。搶救聯盟緊急會商，發動一連串的行動。5 月 11 日，搶救聯盟前往立院，分別拜訪民進黨團、新黨黨團和永續發展促進會，進行遊說，籲請立委刪除 5 億元先期預算，並請立委簽署連署書。同時發起「一人一信，反對淡水環河快速道路興建」活動，透過網路呼籲大家寫 E-Mail 給行政院長、台北市長、交通部和立法院交通委員[36]。5 月 12 日，搶救聯盟前往監察院[37]，在監院門口召開記者後，即向監委許新枝陳情[38]。之後前往環保署，針對淡水環快尚未完成環評即欲通過預算一事請求解釋[39]。5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國民黨例行中常會，搶救聯盟集結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仁愛路的安全島上[40]，在樹幹上綁白布條[41]，手舉淡水老照片[42]，上面寫著「少年李

淡江大學數學系教授錢傳仁、竹圍國中家長會長薛永松、民進黨淡水鎮黨部前主委鄭振豐、竹圍居民呂添得、淡水農會竹圍媽媽成長班班長呂林金蓮、鎮民陳明印，和淡江大學交通管理學系暨運輸科學研究所教授范俊海等。

[34] 三大譴責是:1.嚴厲譴責規劃和決策部門的無知與愚昧;2.嚴厲譴責交通部門的蠻橫與粗暴；3.嚴厲譴責行政部門的違法亂紀。兩大質疑是：1.自相矛盾的交通規劃；2.到底是為改善交通，還是為圖利財團。一項呼籲是向李總統喊話，呼籲李總統趕快出面糾正錯誤的交通規劃，以保留曾經陪他走過少年李登輝成長的美麗淡水河景緻。

[35] 這 5 億元包括辦理工程規劃設計、用地取得及部分工程費。

[36] 這個活動主要是由環保聯盟台北分會呂建蒼等人負責發起，這也是國內最早開始使用電子郵件向相關單位和人士訴求的活動。

[37] 根據一份「採訪通知」文件，主要成員有許慧明、張建隆、環保聯盟台北分會陳建志和呂建蒼，以及生態保育聯盟和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代表。

[38] 江鵬堅雖已於 5 月 6 日申請自動調查，但直至 5 月 13 日才由《自立晚報》披露。

[39] 根據一份「行動計劃流程」文件，12 日（二）早上 10 點在監察院門口集合，早上 11 點半到環保署。

[40] 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設於台北市仁愛路三段 53 號中國廣播公司大樓裡。

[41] 根據 5 月 13 日《自立晚報》記載，白布條寫有「李總統，你知道嗎？淡水美景快消失了！」「心靈改革，請先改革交通部」、「不要讓我們的母親淡水河哭泣」和「誓死反對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案」等。

[42] 這張老照片是從李登輝就讀淡水中學校（淡江中學前身）那一屆的畢業紀念冊翻拍的，照片裡是淡水中學校的兩名學生站在淡水河邊眺望觀音山，河中有一艘上千噸的輪船。

登輝的淡水河邊」，等待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座車離去時，向他喊話。這次的行動，搶救聯盟特別發出新聞稿給媒體[43]，因此當天中午，《自立晚上》馬上登出兩篇報導，標題「少年李登輝的淡水河在哭泣／反對興建淡水環快 環保團體籲請李總統改革交通部」、「環保團體提民間版環評報告／指解決竹圍地區交通壅塞 應從拓寬台二線計畫道路著手」。把訴求對象提升到總統層級，固然因爲李登輝的地緣關係，但也可以看出當時搶救聯盟的拚勁和創意。立委王拓也投書質疑環快的合法性，刊登在第二天的《聯合報》上，爲當天立院的攻防暖身。

14 日一大早，搶救聯盟集結在立法院中山南路門口[44]，張掛白布條「失去了淡水河，我們還剩下什麼？」「誓死反對興建淡水環河快速道路！」，並且舉牌靜坐抗議，向立法院喊話。立委王雪峰、李應元、翁金珠、簡錫堦都出來爲大家打氣，並一起喊口號。立法院內正進行全院聯席會議，審查交通部及所屬預算，朝野立委展開攻防，在野黨立委基於保存古蹟、自然生態保育、軍事防務等原因，強烈反對興建，國民黨立護航，最後該筆五億元建設預算以協商方式通過，將刪除預算、不通過及預算暫照列等三方案一併送交院會表決處理。翌（15）日《台灣日報》和《自立早報》皆有附照片的篇幅報導[45]。

---

[43] 新聞稿由聯盟發言人張建隆製作發出，內容包括 5 月 13 日到國民黨中常會「呼喚李登輝」、5 月 14 日在立法院大門「全民請願施壓救淡水」，以及「給李總統的一封公開信」。公開信內容如下：「親愛的李總統：久違了！您有聽到您的故鄉淡水正在呼喚著您嗎？也許在夜深人靜時，您偶而也會憶起小學時寄宿在淡水街布埔頭李宅的往事。也許您偶而也會想到當年在淡水中學校利用學校宿舍走道的燈光苦讀的往事。但是最令您憶念的應該是淡水河邊浩蕩的江水和秀麗的景致吧。相信您也和我們這些後輩的淡水子弟一樣，曾在優美迷人的淡水河邊留下無數的歡笑聲。而這條亙古不變的河水，一定曾經陪伴您走過青春歲月，也曾激勵著您少年的雄心壯志。所以，您也會和我們這群淡水的憨子弟一樣，把淡水河視做最親愛的母親。可是，總統先生，您知道嗎？我們的母親淡水河快要被一條環河快速道路給強暴了嗎？河流的嗚咽，大地聽得見。母親的泣聲，如針刺在子女心裡。總統先生，您有聽到我們的母親淡水河正在飲泣嗎？您的故鄉淡水正在呼喚著您，正在呼喚著少年時代的李登輝。請趕快站出來，加入我們搶救淡水河的行列。懇切的請求您！淡水鄉親敬上 1995 ， 5 ， 13」

[44] 當天淡江大學建築系老師鄭晃二帶著他的學生前來聲援，報紙刊登照片舉牌靜坐抗議的，不少是淡大建築系的學生。

[45] 《台灣時報》記者許丕忠寫了一篇相當詳實的報導：「全院聯席會議昨天上午審查交通部及所屬預算，結果朝野為「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應否興建展開攻防，在野黨立委基於保存古蹟、自然生態保育、軍事防務等原因，強烈反對興建，國民黨立護航，最後該筆五億元建設預算以協商方式通過，將刪除預算、不通過及預算暫照列等三方案一併送交院會表決處理。「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全長十二點五公里，初估經費約需七十八億元，在八十八年度預算，交通部編列了五億元的初期工程預算。李應元、王雪峰、朱惠良及人輪番發言反對興建「淡環河快速道路」。李應元提出一份環境影響評估作業進度調報告指出，目前該快速道路之環影響評估尚由省公路局委託廠商進行中，並未完成，在環評未完成前絕不容許編列工程預算。李應元並表示，該快速道路由於行經紅樹林自然保護區，必須受到水利法、文化資產保護法第五十二條等相關法令的限制，行政單位無視於違法事實，便要強行進行初期工程，且依目前規畫方案，高堤式的設計不僅將遮斷淡水地區的自然景觀，對自然生態、文化資產、觀光產業也將帶來無限衝擊，他絕對要全力抵制該快速道路的興建。立委蔡正揚並指出，交通部之所以一直要蓋這一條路，主要是三重幫在附近買了一塊地，以讓財團炒作土地。交通部次長陳世圯則解釋指出，目前淡水河只有一條台二線道路，每逢交通尖峰時刻都會造成壅塞。目前快速道路之所以引起爭議，主要是因為沿著淡水河興建，不過，沿河興建經評估是最適宜的。他並強調，交通部在興建時絕對會依環評相關作業將環評報告送省環保處審查，

在院會表決之前，發生了一件插曲。5 月 21 日，搶救聯盟及立委至交通部表達反對興建環快意見。交通部次長陳世杞竟拿出一紙手繪地下車道示意圖，當眾宣布，淡水環快沙崙至紅樹林捷運站段，爲避免景觀衝擊，將變更爲走地下。決策過程之匆促，令人稱奇。這項轉變顯然是爲化解日益高張的反對聲浪。搶救聯盟當天立即發佈新聞稿，質疑交通部倉促提出修正案只是爲化解壓力，並要求交通部尋找替代方案。翌（22）日，《聯合報》大幅報導這件消息「淡快道路（沙崙↔捷運淡水站）改走地下／拯救淡水夕照 交通部變更設計 經費將增為 96 億元」，並刊登搶救聯盟的聲明表示不會贊同這種修正方案[46]。同時也報導台北市野鳥學會對於快速道路工程通過關渡地區和淡水紅樹林地區，對候鳥棲地的衝擊深爲擔憂。事實上，「改走地下」並未能解除民眾疑慮。5 月 25 日和 5 月 28 日的《中國時報》，各有一篇讀者投書質疑此事：「關渡、淡水、紅樹林 難道只值十四分鐘」；「環快挖掘地下箱涵 危害淡水更烈」[47]。

爲了阻擋預算過關，搶救聯盟再接再勵，於 5 月 27 日在立法院第七會議室召開「揭發淡水環快弊案」記者會，由立委李應元主持，立委王拓、朱惠良、省議員周慧瑛、搶救聯盟張建隆，以及兩位證人出席。會中提出三大質疑：一、政策急轉彎，內幕重重；二、規劃內容處處違法，急於推出，是否有不可告人的隱情；三、官員謊話連篇，意圖何在。最後的結論是：謎底揭曉——圖利財團。矛頭指向在淡水沙崙重劃區炒作房地產的財團和政治人物[48]。資料指證歷歷[49]，

等各項法定程序完成後才動工興建，一切兼顧環保與交通，絕不會貿然動工。國民黨立委劉盛良、楊吉雄等人則對該快速道路預算極力護航。劉盛良指出，此一環快雖然只有十多公里，但功能相當大，可以直通淡水新市鎮，需要花費七十八億元，而如果不董，將現有的道路拓寬，只可以到連登輝大道，且沿途居民需拆遷、補償，花費將更多。」

[46] 「由台灣環保聯盟、淡水史田野工作室等環保團體成立的搶救淡水行動聯盟昨天發表聲明指出，交通部提出的淡水北側環快道路沙崙至捷運淡水站填河造路地下化修正方案，表面上似乎對環快案的淡水景觀衝擊部分有所回應，但對人文遺址、紅樹林生態、河道縮減引起的防洪問題無任何解決，行動聯盟不會贊同這種修正方案。行動聯盟表示，交通部在立法院審查預算的最後階段，倉促提出淡水北側環快道路的地下化修正案，顯然是想化解民間與立法委員間的反對聲浪，有意讓預算先通過。行動聯盟強調，這次修正案未來將面臨：水利怯的限制、捷運禁限建辦法、文化資產保護法、環境影響評估保護法的審查等四大關卡。行動聯盟要求交通部懸崖勒馬，改弦更張，停止該項開發計畫，尋找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47] 前者是由淡水學院學生莊豐吉所撰；後者是由台大研究生魏郁祥所寫。

[48] 當時一位住在沙崙的楊明鑑先生主動跟筆者連絡，提供許多內幕消息，主要包括 1980 年代林豐正擔任台北縣長時完成沙崙重劃區規劃共三百多公頃，公有土地標售當天，林豐正以縣長身份親至淡水地政事務所主持，而且由他所帶來的人得標。與林豐正關係密切的「仕豐建設」在民國 78 年 8 月 8 日取得的多筆土地上 87 年時已經蓋了 23 棟樓房。沙崙重劃區的地價從 1980 年代每坪三萬，到 1998 年時已漲至七十萬。為了證實楊明鑑所言，筆者特地去地政所影印地籍資料，果然發現若干財團在沙崙重劃區擁有大筆土地。

[49] 省議員周慧瑛提出一份資料＜為台二線拓寬，為舒解淡水交通問題請命＞，其中列舉出三重幫相關人士炒作土地的詳細數據：簡正雄 41-10 地號原貸款 1200 萬，過戶宏國貸款變成 4 億 2 千萬；林鴻道 29-1 地號原貸款 70 萬，過戶宏國貸款變成 4 億 2 千萬；簡正雄 41-11 地號原貸款 3500 萬，過戶宏國貸款，變成 4 億 2 千萬；林鴻道 1-28 地號原貸款 400 萬，過戶宏國貸款變成 3 億 1 千萬；林鴻道 1-21 地號原貸款 400 萬，過戶宏國貸款 1 億 4 千 3 百萬；林美鈴 4-3 地號原貸款 400 萬，過戶宏國貸款變成 3 億 1 百 30 萬。光是這 6 筆土地就超貸 19 億 3 千多萬！

可惜沒有引起媒體多大的興趣。此外，搶救聯盟還想辦法走進立法院，到交通委員會場，試著游說委員支持[50]。

5 月 31 日，表決當天，朝野政黨全面動員，針對民、新兩黨所提「刪除交通部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興建工程預算五億元」採記名投票進行表決。表決結果，在場委員 137 人，贊成刪除者 60 人，反對者 77 人，以 17 票之差，表決失敗[51]。這場表決雖然失利，民新兩黨聯手作戰的態勢[52]，已把反對興建淡水環快運動提高到全國性的層次。

六、第二波攻防

531 立院表決失利後，搶救聯盟另闢戰場，循不同管道進行搶救行動。除了持續進行文書戰外，主要是擴大與社群及校園的結盟，並試圖與高層對話。

在一份 6 月 2 日由搶救聯盟發言人張建隆具名，寫給行政院秘書長張有惠的信函中，已經羅列出五十四個加盟的民間團體[53]。從這份名單中，可以看出

---

[50] 當時搶救聯盟的夥伴，只能站在會議室門外，舉起海報，表達無言的請求。並把大大的民間版環評地圖攤在走道上，向偶而出來走動的委員游說。

[51] 表決當天，筆者特地借用國會辦公室同仁的識別證進入院會會場，找當時的老闆（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剛卸任黨主席的立委施明德，請他幫忙動員黨員同志支持刪除預算，施明德滿口答應，還說這是應該幫忙的。

[52] 當時台北市野鳥協會為搶救聯盟印了一張＜搶友淡水河，吶喊＞的傳單，把贊成刪除預算和反對刪除的名單，全部都羅列出來。幾乎全部的民進黨和新黨黨籍的立委都投贊成票（民進黨的張晉城除外），名單如次：余玲雅、鄭龍水、蕭裕珍、陳其邁、范巽綠、傅崑成、高惠宇、林忠正、彭紹瑾、鄭朝明、李慶華、賴來焜、李俊毅、黃爾璇、郁慕明、蔡正揚、劉進興、沈富雄、范振宗、蘇煥智、李應元、郝龍斌、蔡同榮、翁金珠、鄭寶清、朱惠良、顏錦福、簡錫堦、廖大林、林郁方、錢達、蔡明憲、林瑞卿、馮定國、周陽山、邱垂貞、王拓、黃天福、柯建銘、張俊雄、謝聰敏、洪其昌、林豐喜、謝啟大、葉菊蘭、陳定南、林文郎、陳一新、張旭成、林哲夫、謝錦川、陳癸森、陳漢強、蔡煌瑯、蔡式淵、周伯倫、王雪峰、林濁水、施明德、巴燕達魯。而國民黨籍也都投下反對票（包括金牛級的無黨籍立委）：曹爾忠、林政則、沈智慧、徐少萍、蔡璧煌、林建榮、李顯榮、吳惠祖、高揚昇、李鳴泉、丁守中、李友吉、朱鳳芝、黃昭順、洪秀柱、林源山、王令麟、王素筠、翁重鈞、簡金卿、林炳坤、曾永權、陳鴻基、蕭金蘭、章仁香、吳克清、鍾利德、謝欽宗、林國龍、莊金生、徐中雄、何聖隆、陳宏昌、黃秀孟、潘維剛、蔡中涵、劉光華、李文郎、郭政權、羅福助、陳瓊讚、張晉城、陳志彬、廖福本、王天競、洪玉欽、黃國鐘、全文盛、陳清寶、黃清林、鄭永金、羅傳進、陳傑儒、葛雨琴、李必賢、劉國昭、杜振榮、劉盛良、王金平、徐成焜、林耀興、楊吉雄、洪昭男、高育仁、施台生、曾振農、游淮銀、鄭逢時、郭廷才、張光錦、陳朝容、林明義、饒穎奇、洪性榮、郭金生、韓國瑜、靳曾珍麗

[53] 淡水文化基金會、淡水史田野工作室、滬尾文史工作室、淡水社區工作室、滬尾山河工作室、淡江中學、淡水學院學生會、環保聯盟台北分會、主婦聯盟關懷生命協會、台北市家長協會、中華民國教育改革協會、社會立法運動聯盟、生態保育聯盟、綠色陣線協會、勞工陣線、鳳山溪愛鄉協會、台灣生態神學中心、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自然生態攝影學會、勵馨基金會、台灣原住民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野鳥協會、朴仔腳文化工作陣、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台灣青年之聲、詹雙發里長辦公室、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環保生活協進會、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輻射安全促進會、台北全景廣播電台、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美濃愛鄉協進會、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新環境基金會、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鯨與地球基金會、荒野保護協會淡水分會、寶島客家電台、台大城鄉所、台北市野鳥協會、環保

1998年台灣各種社會運動的蓬勃發展，也是因爲有這些運動力量的聲援與協助，使得搶救淡水河行動得以勇往直前。信函內容，除陳述淡水環快諸多弊端外，主要是希望能在 6 月 16 日總統府公布 88 年度總預算前，晉見行政院長，以免鑄成大錯[54]。

6 月 12 日，淡江大學舉辦「淡水環河快速道路座談會」，邀請淡江大學建築系老師黃瑞茂、水環系老師林意楨、搶救聯盟張建隆、生態保育聯盟總召林聖崇、環保聯盟台北分會王雅慧、縣議員呂子昌和公路局代表，由淡江大學資工系教授莊淇銘主持，討論提綱包括：興建環快的重要性、環快施工及營運對環境的衝擊、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以及政府對交通政策的思維及決策過程[55]。這是第一次把淡水環快的議題帶入大學校園討論，引起學生不少的迴響。稍早前，6 月 10 日，世新大學「群聚動態社」用掛號寄來的厚厚一疊連署書中[56]，大都是世新的學生，也有世新的老師李筱峰，勵馨基金會紀惠容，還有二十幾位中研院物理所的研究生，可見搶救行動已受到大學校園和學界相當程度的重視。淡大學生對環快的關心和對搶救行動的支持，最具體的表現，就是 9 月 5 日在捷運淡水站公園所舉辦的「淡水河邊社區音樂會」活動。除了展出文史及生態圖片，現場導覽說明淡水環快對淡水珍貴的文化及自然資源的嚴重衝擊外，主要是由淡江大學畢

聯盟台南分會、淡水老街商圈聯誼會、淡水老街發展協進會、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台北縣民俗文物協會、古風史蹟協會、山河文史工作室、台灣愛樹人文史工作室、水返腳藝文中心、石門鄉文化發展工作室、慈暉文教基金會。到了 9 月的時候，增為 63 個，新增的有：台北市笑哈哈畫友會、大稻埕美術俱樂部、花東新村都市原住民兒童美術館、永續台灣文教基金會、台北霞海城隍廟、德簡書院、雄獅美術、雲門舞集、常民文化協會。之後又增到一百多個，包括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灣綠色和平組織、民進黨淡水鎮黨部、生態關懷者協會、李應元國會辦公室、高雄市野鳥學會、義美環境保護基金會、澎湖縣野鳥學會、環保生活協進會、中華社區資源交流協會、元貞聯會律師事務所、青境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揚昇霖實業有限公司、觀音菩提精舍、寶象實業有限公司、曜慶企業有限公司、大樹文化事業公司、伯驊印刷有限公司、紅蕃茄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郭英釗建築師事務所、張清華建築師事務所、中華民國駱駝登山協會、淡水反環快學生聯盟、三棋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簡安祥建築師事務所、陳江文建築師事務所、晨星出版社、綠色主張工作室、綠色消費者基金會、環保聯盟花蓮分會、水源地文教基金會、台灣生態藝術基金會、生態永續協會、自然生態教育基金會、宜蘭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日出環境小組、花蓮縣動物權益促進會、看守台灣研究中心、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全景映像工作室等。

[54] 雖然這一次並沒有晉見到高層，但後來有一次，因立委朱惠良的安排，到中研院拜會院長李遠哲，並獲得他的支持，寫了一張名片請張有惠安排時間接見。沒多久，行政院來電，要筆者於某日某時，獨自一人前往行政院面見秘書長。筆者被引進秘書長室時，赫然發現室內坐著交通部長林豐正、國工局局長鄭文隆和另一位官員。沒想到先前連絡人要求筆者不要帶人赴約，對方卻安排三位高官應對。沒多久，張有惠就把訪客丟下，讓筆者獨自面對林豐正等人。雖然事出突然，但筆者仍冷靜以對。談話氣氛尚稱平和，筆者強調大家都是為國為民，以降低彼此的對立。言談中，林豐正不經意透露了一段陳年往事，反而證實了民間傳言他與沙崙房地產業的特殊關係。他說當年淡海新市鎮徵收土地時，許多當地居民強力抗爭，就是由他和縣議員民代等人鼓動的，因為當時他對營建署頗為感冒。他於台北縣長任內用心規劃的「沙崙重劃區」開發案才剛啟動不久，營建署也不知會一下，就悄悄地在「沙崙重劃區」旁邊規劃了一個規模大上好幾倍的「淡海新市鎮」，好像是故意和他過不去。

[55] 呂子昌和公路局代表都沒有出席這場座談會。林聖崇在搶救行動中協助甚多，特別是在訊息的提供和人脈的連繫。

[56] 寄信人署名陳亞平（據連署書資料，他是世新社會心理系一年級學生）。

業生組成的「觀子音樂坑」樂團演唱表演，透過音樂和歌聲，表達對環境和文化的關懷，以柔性的方式傳達抗議訴求，更容易引起共鳴。翌日，兩大報都有報導，《中國時報》標題是「反環快 救淡水 祭出情感訴求」，內文寫著：「主辦單位並且在現場懸掛許多黃色的紙條，模仿中元祭典的符咒模樣，並寫著『保護淡水、永保平安』的字樣。除了中元應景的意味之外，還希望提醒民眾環快動工之後，淡水河沿岸珍貴的人文、自然景觀都將如古人一般消失」，還附上現場照片。《聯合報》標題是「觀子音樂坑演唱 文史組織導覽 淡水河邊音樂會很環保」，內文對這場活動有完整的報導：「淡水河邊社區音樂會五日在捷運淡水站後方公園舉行，吸引不少民眾參加。除由環保文史組織專人導覽外，在演出現場同時展出淡水文史及生態圖片。還在演唱會中播放幻燈片，讓民眾在觀賞觀子音樂坑樂團演唱的同時，一起懷想淡水河的今昔變化。觀眾都覺得特別有意義。」

這段期間，陸續和公部門的文書往返，公部門對於民間質疑的回覆，照樣都是責成有司參酌民意或兼顧工程與環境等官樣詞令[57]。搶救聯盟於 6 月 20 日發表＜盤踞在淡水河口的工程怪獸－「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妖龍現形記＞，提出四項譴責和四點質疑。四項譴責包括：1.賤踏古蹟遺址的「交通建設」；2.淡水河域的生態殺手；3.縮減排洪斷面引洪患進城；4.危害捷運淡水線大開時代倒車。四點質疑包括：1.政策急轉彎理由何在；2.B 案變 A 案、交通部門變魔術；3.解決交通 or 圖利財團；4.千方百計非到沙崙重劃區不可嗎。並且羅列「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和「淡海新市鎮聯外道路 B 方案」的比較分析表。明顯看出交通部門寧捨衝擊小、服務範圍多、無違法、社會成本低的方案，而採行衝擊大、服務範圍小、明顯違法、且需付出重大社會成本的方案，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搶救聯盟也乘著當時台灣正開始重視永續發展議題[58]，於 6 月 24 日發表＜為國土永續發展請命－請行政院當局停止進行「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案」說帖＞，在某次由劉兆玄副院長主持的相關會議中，散發給關心永續發展的與會人士[59]。會後並把有關淡水環快相關資料彙整成冊，透過立委朱惠良國會辦公室交給劉兆玄，不過同樣沒有獲得任何回應。但如果細讀這段期間相關部會的會議紀錄，可以看出官方還是屬意推動淡水環快，雖然理由自相矛盾。譬如經建會在 87.6.24 第 928 次委員會中的結論之一是：「考量台二線省道長僅四公里，總經費高達 71 億（用地費約 50 億），而反觀淡水河北側沿河道路為快速道路，長 12 公里，惟用地費僅約五億元，且可銜接洲美及環河快速道路，交通及經濟效益較高。」但附件中各委員及列席人員的綜合意見卻是：「一、興建淡水地區連絡台北直達交通之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並不足以替代台二線關渡橋至淡水外環道路段拓

[57] 回覆單位包括公路局、交通部、台北市政府阿扁信箱、台北市捷運工程局等

[58] 1998 年 3 月 24 日，由王拓、朱惠良、林忠正、丘垂貞、洪奇昌、范巽綠、翁金珠、陳文輝、陳永興、陳光復、黃國鐘、葉菊蘭、劉進興、蔡正揚、蕭裕珍、錢 達、謝欽宗、蘇煥智等立法委員發起的立法院永續發展促進會宣布成立，並推趙永清擔任第一屆召集人、柯建銘為執行長。1998 年 5 月 26、27 日，行政院經濟部召開首次全國能源會議。

[59] 會議的確定日期已難以查明，但從文章記註日期，可以推測應該是在 6 月 24 日左右。當時生態保育聯盟總召林聖崇對搶救聯盟相當關切，可能是由他邀請筆者報名參加那次會議。

寬後之功能，因此台二線關渡橋至淡水外環道路段之拓寬仍有必要。二、本案淡水河段係屬台灣整少數值得闢做親水活動之河段，因此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必須俟其環境影響評估（E－A）審查通過後，再予規劃興建。…六、目前淡水河下游河川治理期限尚未奉核定，建請交通部俟整體規劃各方面均以明確後，再做決定。」[60]一方面說要參照委員意見，一方面卻以所謂的「經濟效益」爲理由，就把結論寫成和委員意見不同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第六點有關河川治理一項。因爲淡水環快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卡在水利法的規定，不得在行水區內建造任何構造物妨礙水流。因此之故，搶救聯盟就和水利單位展開了一場淡水河治理計畫的攻防戰。

是年（1998）9 月 7 日，省水利處在台北縣政府舉辦「淡水河河口段治理基本計畫地方說明會」。筆者受省議員周慧瑛之邀，共同前往出席[61]。在聽取說明時，發現疑點重重，特別是把許多現行河道行水區劃爲洪患區。周慧瑛在會上要求水利處到現地踏勘，但卻遭婉拒。因爲事關重大，回到淡水後，筆者立即撰寫了＜爲淡水環快量身定製的淡水河河口段治理計畫之商榷＞，行文給台灣省水利處，副本給省主席宋楚瑜、監察院江鵬堅、省議員周慧瑛。文中詳引水利法相關條文，指出該治理基本計畫以變相手法，故意將部分行水區誣指爲洪患區，擅自縮減河道，而所謂的治理計畫線，卻與淡水環快的計畫路線完全吻合。這種量身定製、別有企圖的治理計畫，不僅違背法律、棄守專業、破壞省府形象，而且會給大台北地區陷入新的洪患夢魘[62]。同時，另外投書《中國時報》，於 9 月 11 日刊登於「時論廣場」，標題爲「行水區劃為洪泛區 危及台北盆地」，質問水利處「幾十年來，淡水河水道任其遭人侵佔、傾倒廢土…從不聞問…早已嚴重失職…如今一反常態，主動提出已被荒廢數十載的河道治理計畫，原係好事，但是省水利處如此任意修改堤線，與河爭地，縮減河口洩洪區域的行水水道，難道絲毫不擔心台北盆地的洪患危機嗎？難道這就是省水利處在凍省前夕，送給大台北地區住民的臨去秋波嗎？」

10 月 21 日，省水利處鄭重其事地發函給筆者，除了自圓其說辯稱把行水區劃出計畫水道是爲了保護紅樹林，並把淡水河水道遭人亂倒廢土責任推給台北縣政府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竟把底細全盤托出：「查淡水河兩岸近年發展迅速、對交通等公共建設需求日殷；惟沿岸交通等公共建設或跨河構造物之施設，必須配合本河治理基本計畫，始能辦理。過去，因本河段治理基本計畫尚未擬妥，致相關沿岸交通等公共建設配合無據。…因此，本處本於水利主管機關立場，自應積極趕辦本案治理基本計畫，俾利防洪；並可提供相關公共工程建設配合執行

[60] 87 年 7 月 10 日總(87)字 3370 號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函。

[61] 說明會只邀請台北縣的省議員、政府相關單位和各級政府出席。

[62] 水利處僅以一紙公函短短兩行字回覆「貴聯盟惠賜對『淡水河河口段治理規劃』之卓見，本處業以同日期文號函轉請該案規劃單位台灣省北區水資源局參酌研議，復請查照」(87.9.18 水利處 87 水河字第 A876001365 號函)

之依據，以利地方發展。」[63]果真沒錯，這個治理計畫正是爲淡水環快量身定製。

10 月間，大台北地區遭逢瑞伯颱風侵襲，基隆河水位暴漲，汐止五堵一片汪洋，災情慘重，台北內湖山崩五人活埋。筆者於是針對淡水河口段治理計畫，再度投書，刊登於 10 月 28 日《中國時報》，標題「縮減淡水洩洪口 大台北遲早泡湯」，指出瑞伯颱風豪雨已嚴重考驗二重疏洪道的排洪承受力，如再任意縮減淡水河口洩洪區的水道，將給台北盆地帶來無窮後患，勸告世人不要與天爭強，以免百姓遭殃。並引水利處來函文字，指責水利處嚴重失職。這場淡水河的基本治理計畫攻防戰，一直延燒到翌（1999）年底，著實卡住淡水環快無法從水利法解套。

除了水利法，文資法也是攻防的重點。搶救聯盟一方面以文資法明文保護的紅樹林自然生態保護區爲訴求，另方面也希望透過古蹟提報的方式阻擋淡水環快。同時也持續關切環評的進程。搶救聯盟 9 月 13 日會議紀錄的決議，足以說明當時的工作重點：1.要求縣府儘速邀請專家學者前來會勘前所提報的迺生產洋行倉庫古蹟；2.請環保聯盟協助提供環評委員的名單及住址，並將搶救聯盟所做的民間版環評寄給環評委員。而爲了爭取認同，也開始著手 T 恤的設計[64]。

搶救聯盟早在 1998 年 4 月間，就向台北縣政府提報迺生產洋行倉庫等八處古蹟[65]，縣民政局於 5 月 26 日邀集公路局、淡水鎮公所，以及搶救聯盟等人到現場會勘，結論是「由縣府擇期再敦請古蹟專家學者履勘」。但從此以後，卻遲遲沒有下文。爲了取得古蹟所有權人的同意，搶救聯盟於 10 月間，請許慧明和黃瑞茂前往拜會「殼牌公司」（迺生產洋行倉庫古蹟所有權人）；經數次討論並轉報殼牌總公司後，很順利就獲得同意[66]。唯縣府方面卻始終不見動靜[67]。搶救聯盟於 12 月 7 日直接行文給縣長蘇貞昌說：「讓人對 貴府行政效能之低落，甚感憂慮，為此得函請 鈞座鑒察，促相關人員儘速安排履勘，以昭公信，而止民怨」[68]。縣府於是在 12 月 20 日安排古蹟審查委員文化大學建築系教授李乾朗

[63] 87.10.21 台灣省政府水利處 87 水河字第 A871601095 號函

[64] T 恤的設計是請當時就讀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的林靖凱幫忙設計，並請環保聯盟台北分會的陳建志協助製作。

[65] 當時搶救聯盟提報的八處古蹟，包括蘇府王爺廟、駱家古厝、海關碼頭、聖江廟、迺生產洋行倉庫、寶順洋行（遺址）、斜陽古道石板路、水上機場。參見 87.6.10 台北縣政府 87 北府民二字第 174928 號「會勘紀錄影本」。

[66] 根據當時擔任殼牌台灣公司董事長田臨斌的回憶：「一是不希望見到歷史悠久的倉庫被幾個鋼筋水泥做成的橋墩所取代，從而殼牌公司與淡水的淵源就此消失在所有人的記憶之中；二是考量到公司負責人在我之前全是老外，他們或許不那麼在意，但身為臺灣人潛意識中總希望在商業利益之外還能為自家鄉土做些什麼；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我和我的同事被淡水文化基金會（搶救聯盟）同仁們的精神給打動了」。參見田臨斌＜台灣淡水殼牌倉庫記事＞，《文化淡水》社區報 123 期，2010 年 3 月。

[67] 搶救聯盟曾於 9 月 2 日去函詢問進度，9 月 22 日才得到回覆說「將儘速邀請專家學者再行履勘」，之後便完全沒有下文。

[68] 滬尾文史工作室也於稍後 12 月 15 日去函縣府要求辦理古蹟申報案履勘。

到迺生產洋行倉庫、水上機場和海關碼頭等處進行初勘。結論是，這幾處古蹟都具有稀有性，價值十分珍貴。建議淡水環快「除了一般的環境影響評估外，更應特別針對歷史、考古做更細膩、完整的考證，重新考量，檢討其路線並做變更，及規劃替代的方案」[69]。雖然只是一位審查委員的意見[70]，但總是給搶救行動帶來了新的希望。

七、短兵相接

但事實上，從古蹟初勘到後來的古蹟指定，還有一段很長的路。這中間涉及到各種情況、各種利益與勢力的角力，以及複雜的政治運作。

搶救行動也是如此。以有限民間力量的集結，要對抗龐大的國家機器，重重難關一再考驗著搶救聯盟的能耐。隨著進程的推展，決戰點逐漸逼近。其中最關鍵的是環境影響評估。

由於搶救聯盟不斷地呼籲、串連、陳情、舉發，大張旗鼓，使得環評作業變成動見觀瞻。因此到了 1998 年 9 月 25 日，省環保處在回覆有關環評審查進度時，就顯得謹慎多了：「因本案規劃之路線佈設，依『文化資產保護法』及『大眾捷運法』、『水利法』細則等法律（令）規定，涉及法律所禁止開發利用、法令所限制開發利用之區域等問題，尚待解決及取得有關機關之同意。是以，省公路局於 87 年 9 月 14 日…函請本處退回本案環境影響說明書…」[71]。

搶救聯盟當時在分析情勢時，也看清這一點：「目前環快的環評由於國工局在水利法，大眾捷運辦法，森林法及水資法上尚未與主管機關取得協調，故臨時退回環評報告，故至少在這些主管機關上就應施以壓力，讓國工局無法取得主管機關的同意」[72]。因此，由台北鳥會協助，發起「救捷運反環快」萬人連署活動[73]；並且藉著台北市長選舉的時機，台北鳥會郭文榮特別製作了一張連署書的大字報，到現場請台北市長兩位候選人陳水扁和馬英九在上面簽名。同時，淡水大學中文系也於 12 月 7 日舉辦「淡水環河快速道路座談會」，並發行＜搶救淡水河＞活動快報，刊登多篇反對興建淡水環快文章，呼籲大學師生一起來關心

---

[69] ＜淡水環河快速道路路線古蹟會勘紀錄＞，因未見縣府公文，只有這份打字稿，很可能是搶救聯盟根據當天李乾朗的口述而自己整理出來的文件。另，留有一紙會勘簽到單手稿，上面記載「87 年 12 月 20 日 pm2:00~5:20。會勘古蹟：迺生產洋行，氣象聯隊，海關」，簽名的有：李乾朗、許慧明、姚莉亭、張志源、黃上科、黃柏萇、池月娟、張建隆、陳建志、薛永松、黃瑞茂、周章德、翟星穎、唐珮玲、紀榮達、林光震（台灣殼牌公司）、周移轉、宋宏一。

[70] 古蹟審查需經多位委員會勘，再開會討論，最後才做成決議。

[71] 87.9.25，台灣省政府環境保護處 87 環一字第 63380 號函。這份說明書當時很難拿到，後來是經由省議員周慧瑛透過執政黨籍的省議員簡盛義向公路局要到的。

[72] 1998.11.24，＜淡水河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73] 因為淡水環快高架橋有一段必須跨越捷運淡水線上空，而且高架橋柱落點在捷運護坡上，不僅明顯違反大眾捷運法，而且危及捷運系統和行車安全。

[74]。

然而，當時的情勢可以用「變化多端」來形容。從 11 月 25 日《台灣日報》的一篇報導，可以看出多方角力的情形：「（農委會主委）彭作奎昨天（在「紅樹林生態學術專題和保育經營國際研討會」上）針對台灣紅樹林消失嚴重的問題提出警訊，並指出淡水竹圍地區的紅樹林是目前保育成績最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淡水環快道路工程卻給農委會出了一道難題，因為如果沒有農委會點頭，根據文化資產保護法的規定，這一片自然保留區根本不允許任何開發行為。但從淡水環快道路在立法院包裹過關的態勢來看，此一工程顯然被政府視為重大開發計畫之一，農委會很難不配合讓它過關。」標題是「淡水環快工程闖關 學者憂心」，副標題是「農委會指僅橋墩影響紅樹林棲息地 影響不大 學者認為施工期破壞程度難評估 不應草率贊成」。

正當大家正在擔心農委會會不會放水時，沒多久卻傳來好消息，農委會「自然景觀審議小組技術組委員會議」到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緊臨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路段現勘之後，開會討論的結論是「本案因與會各委員一致持反對意見，請交通部考量其他不經過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之替代路線。[75]」等於是明白告訴交通部：淡水環快文資法無法過關。

同時，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也於 12 月 18 日出爐。雖然調查結果，「尚無發現積極證據足以證明有圖利特定財團之情事」。但對相關政府部門多所糾正，包括：「一、本案道路規劃路線與先前已由內政部營建署在進行『淡海新市鎮聯外道路系統』A 方案之路線相同，且最後又是委由同一家工程顧問公司規劃評估，顯見各級政府辦理闢建道路計畫，仍欠缺整體統合規劃，而涉有重複評估浪費公帑之嫌」；「二、顯見其政策前後搖擺不定，亦未能就淡水地區各項交通狀況予以統合考量，致引起地方人士及環保團體之抗爭，以及專家、學者之訾議，實有未洽」；「三、為澈底解決淡水地方人士及環保團體基於對地方關心所質疑事項，行政院應督促所屬依法令規定確實辦理[76]」，警告意味濃厚，明白要求行政單位需謹守法令規定，換言之就是要確實做好環評。

監察院這份調查報告，對交通部門的影響如何？交通部於翌（1999）年 2 月間回復監察院：「本部當責成後續辦理本案之國工局[77]，在進行初設與定線之

[74] 這些文章多為轉載，包括：台北市野鳥學會＜搶救淡水河＞、張建隆＜「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妖龍現形記＞、顏瑋志＜環評尚未通過 探勘已然進行＞、江衍疇＜一起來關心淡水快速道路＞、黃上科＜「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方案可行性評估」公聽會＞、黃上科＜對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建設設計的省思＞、東白＜關心淡水河岸景觀生態危機＞、李應元＜行不通的淡水北側快速道路＞等。

[75] 87.12.16，行政院農業委員會（87）農林字第 87030846 號函。出席委員包括：陳明義、呂光洋、王鑫、吳功顯、楊平世、周昌弘等。

[76] 87.12.18，監察院（87）院台交字第 872500323 號函。

[77] 台灣省於 98 年地虛級化（精省或稱凍省），原公路局辦理案件轉由交通部國道興建工程局接手辦理。

同時，邀集相關單位與地方民眾，以說明會或現地會勘等方式進行溝通，施工前亦必須完成新環評法、文資法、水利法及捷運兩旁禁建辦法等相關法令規定需辦理之法定程序後，如推動本工程[78]」。還有，前述行政院秘書長張有惠接見搶救聯盟成員，安排交通部長林豐正和國工局長鄭文隆出面溝通[79]，可能也是在這個時間點。

爲了解套，交通部於 1999 年 3 月初，提出沿河快速道路新版本：不進入淡水，從捷運紅樹林站附近銜接淡水外環道（登輝大道）。3 月 6 日《聯合報》有詳細的報導，標題是「避開紅樹林 從捷運站附近銜接外環道 如通過環評 淡水河快速道路可望年中動工」。內文提到：「交通部最近邀集相關單位再度會商後決定，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將在捷運紅樹林站附近銜接淡水外環道，現階段將不興建沙崙至捷運淡水站之間的地下路段，以便早日通過環評、早日動工，解決淡水至台北間的交通問題」。

從 1988 年底以來，情勢看似開始有所好轉，但搶救聯盟絲毫不敢掉以輕心。就以古蹟申報一事，可以看出問題的難度。繼審查委員李乾朗 12 月 20 日來現地勘查後，很快地，翌（1988）年 1 月 8 日，台北縣民政局再邀請專家學者徐福全、王啓宗、薛琴、李乾朗、張震鐘，以及公路局、淡水鎮公所和搶救聯盟等，到英商范嘉士洋行倉庫、水上機場、氣象測候所、海關碼頭等遺址會勘。但是，過了一個多月卻看不到縣府有後續的動作。2 月 10 日，搶救聯盟發函給縣府，要求儘速安排古蹟審定後續程序；但仍沒有回音。因此，搶救聯盟再次透過安排，於 2 月 20 日到縣府拜會縣長蘇貞昌，希望了解縣府對淡水環快的態度[80]。雖然蘇貞昌在會中指示民政局加快古蹟審查的腳步，但民政局卻拖到 4 月 26 日才召開會勘後的第一次會議。爲此搶救聯盟分別發出＜嚴重抗議台北縣民政局賤踏古蹟

[78] ＜監察院調查『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計畫，有關該院交通及採購委員會會議通過之調查意見第一至第三項，交通部研處情形報告＞，88.2.26。

[79] 參見註 54。

[80] 這次的拜會過程，2 月 25 日《聯合報》和《台灣日報》都有附圖的篇幅報導。《聯合報》記者葉玲紀錄了蘇貞昌對古蹟的承諾和縣府對淡水環快的態度：「包括環保聯盟台北分會、野鳥學會、淡水文化基金會、淡水史田野工作室、主婦聯盟等單位所組成的『搶救淡水河聯盟』，昨天下午面見縣長蘇貞昌陳情，希望縣政府阻止淡水環河快速道路興建案…縣長蘇貞昌最後表示，淡水鎮是全台相當有知名度及特色的小鎮、淡水的夕照及歷史古蹟都是寶貴的資產，他指示民政局加快古蹟鑑定的腳步…常到淡水的蘇縣長說，淡水的塞車問題他很了解…但是台二線的管轄單位是公路局，而淡水環河快速道路則是交通部規劃並且主導興建，兩者縣政府都無權置喙。」《台灣日報》記者戴光育則報導了當時淡水鎮長態度的轉變和彼此間的微妙關係：「主任祕書林錫耀指出，淡水鎮長曾向他表達不同的看法。郭哲道鎮長以地方有不同的聲浪為由，相當堅持應進行淡水環快興建案。以搶救淡水河為主要訴求的『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昨日下午聯袂拜會蘇貞昌縣長時指出，外傳台北縣政府支持交通部所提淡水河北側環河快速道路興建案，讓聯盟感到到相當驚訝，因此要求蘇貞昌縣說明…蘇貞昌縣長指出，談水地區的交通瓶頸是在關渡、登輝大道之問，淡水環快解決問題能力有限，彈性拓寬『台二線』恰好可以打破瓶頸，同時拓寬所需的都市計劃已通過廿多年，因此他一直是支持拓寬『台二線案』。蘇貞昌並強調，對人的信任要長遠，不要受到別人一句話、或一件事而受到影響，他希望搶教聯盟發動更多動作，一齊為搶救淡水的未來而努力。」

＞[81]和＜給蘇縣長的一封公開信＞[82]表達抗議。雖然事後民政局很快就在 5 月 1 日發出會議紀錄，但結論竟是如此依違兩端：「仍請工程單位於設計規劃時確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其實施細則相關規定辦理。並隨時與地方古蹟管理單位及地方人士協調溝通」、如此令人傻眼：「各地文化工作者對古蹟及相關調查之投入及貢獻，縣府表示肯定和感謝，並請各文化工作室對具體之文資調查全力爭取文化處補助」。經過這次的教訓，看來搶救聯盟只有自求多福、自力救濟了。

淡水鎮長郭哲道從原來的堅持反對興建環快紅樹林至沙崙路段，到後來主張趕快興建淡水環快，讓許多昔日戰友大感不解[83]。而更令搶救聯盟措手不及的是，1999 年初傳來淡水鎮公所即將拓寬中正路老街的壞消息。當時，搶救聯盟除了要不停督導縣府民政局加速古蹟審定進度，還得加緊游說中正路老店屋主同意申報古蹟。前院忙撲火、後院又著火，忙成一團。雖然請出副縣長林萬億親至淡水協調，但因郭哲道態度強硬，搶救聯盟又爲了集中力量反對環快，徒呼負負，只有留下遺憾。

爲了阻止沿河快速道路新版本避開了文資法而強行闖關，搶救聯盟轉而釘緊水利法。3 月 18 日立委朱惠良函水利局詢問「淡水河河口段治理基本計畫（草案）」核定情形。3 月 29 日經濟部水資源局長徐享崑覆函朱惠良稱省政府尚未提報。但國道新建工程局在 5 月 6 日表示：「經研究，由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至淡水外環道路段可完全避開該保留區（紅樹林自然保留區）…本局將俟環境影響說明獲審查通過始辦理發包施工」[84]。而且行政院又編列了 10 億元的快速道路預算。搶救聯盟於 5 月 12 日上午，在立院門口發動陳情活動，散發＜反對編列「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10 億元預算備忘錄＞，列舉六大理由[85]，呼籲立院三

---

[81] 抗議內容包括：「1. 民政局行政效率之低落，令人無法忍受；2. 民政局公然違背蘇縣長承諾、喪失縣府施政的誠信；3. 民政局與公路局串通共謀賤踏古蹟；4. 請民政局長下台，以向縣長及全體縣民交代。」

[82] 公開信內容諸多質疑和譴責：「姑不論『去年五月初勘，今年一月才複勘；一月八日會勘，四月二十六日才要開會討論』的行政效率如何。記得二月二十四當天，『搶救聯盟』還特別向縣長提出『聽說古蹟之指定還得聽取公路局的意見』這樣的疑問，承蒙蘇縣長當眾否認，蘇縣長那種斥責謠傳的神情和堅定的語氣，猶然歷歷在眼前；但怎會想到當時被縣長堅定否決的謠傳如今竟『惡夢成真』！依程序，經專家學者實地會勘之後，應直接召開評鑑會議，決定是否指定為古蹟。如今，不僅承辦單位遲遲不肯召開評鑑會議，反而節外生枝，拖延了一個多月之後，忽然又生出一個所謂的『邀請有關單位針對會勘意見研議以作為評鑑依據』？是否有關單位可以干涉學者專家的評鑑？如果是這樣，那麼所謂『古蹟評鑑』其意義何在？但更嚴重的是，民政局竟然可違背縣長的信諾，欲置縣長的誠信於何地？因此特別致上這封信函，請縣長能以一貫明快的施政作為，立即糾止民政局的嚴重失職行為，以維護縣府團隊的形象和縣長的誠信。」

[83] 郭哲道和搶救聯盟的張建隆、許慧明等，都是「滬尾文教促進會」的前後任會長，該促進會原係為反對 1987 年的淡水環河快速道路案而成立。

[84] 國道新建工程局 88.5.6，＜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工程計畫辦理情形＞。

[85] 六大理由包括：「一、明顯牴觸『水利法』第 78 條、『文資法』第 52 條、『森林法』第 25 條、『大眾捷運禁限建辦法』等規定。二、去年所編列之 3．8 億元預算，迄今僅動支其中編列 8 千萬的規劃費項目的部份經費，原因係去年 6 月必須做出的「環境影響評」至今仍然無法完成。三、農委會已做成決議，要求交通部採行其他不經過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護區的

黨二派黨團在諸多違法問題未解決前，要求交通部撤回 10 億預算。

交通部門的如意算盤，是想用分段施工的方式，先避開紅樹林的爭議。至於水利法和大眾運輸禁限建辦法，則希望透過部會協調的方式予以解決[86]。但是，以分段施工規避環評問題，攸關環評法和主管機關之權責，而且環快第一期工程仍受水利法之限制。因此，行動聯盟一方面行文行政院環保署，要求解釋疑問、說明清楚；另方面則於 5 月 20 日在立法院召開「縮減淡水河河口，台北洪患無處躲」公聽會，檢討「淡水河河口段治理基本計畫（草案）」是否爲淡水環快量身訂製，因而製造洪患問題。當時，搶救聯盟發表一份說帖＜堅決反對爲淡水環快量身定製的淡水河河口段治理計畫＞，嚴厲抨擊該治理計畫的荒謬。主要論點：水利處把「行水區」（尋常水位之河道）指稱做「洪氾區」（兩百年洪氾水位到達地區），猶如昔之趙高「指鹿爲馬」，今之水利處「指河爲陸」，目的只是爲了配合交通部在行水區河道上興建快速道路，而劃出一條與淡水環快計畫路線完全吻合的所謂的「治理計畫線」，與河爭地，後患無窮[87]；並提出「淡水河河口段治理基本計畫九大疑問」[88]。此外，立委朱惠良、范巽綠等，也於 6 月 21 日，提出臨時提案[89]，引 5 月 20 日公聽會上學者專家的質疑[90]，要求行政院嚴

替代路線。四、國工局以「分期施工」的技倆，規避「環評法」的法律限制，但用半條「淡水環決」的規劃來編列整條「淡水環快」的預算，等同把立法院之預算審查視同兒戲。五、第一期工程目前仍然抵觸「水利怯」和「大眾運輸禁限建辦法」，是否能通過「環評」還在未定之天。六交通部門之規劃「淡水環快」，事前既未考量規劃內容之適法性與否，以致處處觸法、窒礙難行；而事後在發現有違法規時，不僅不思修正內容，反而企圖鑽營法律縫隙，甚且不惜破壞法律」。這篇備忘錄也為搶救聯盟發言人張建隆所撰。

[86] 在一份國工局立院說帖＜「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88 年下半年及 89 年度預算編列說明＞中，就說得非常清楚：「有關指稱本工私之規劃違反相關法令乙節，按第一期該路段該路段可完全避開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並無涉『文化資產保存法』問題，至於經關渡地區路段，因受地形限制，前於交通部召開之『台北都會區快速道路系統發展協調推動小組第七次會議』，省水利處省水利處已原則同意以高架方式通過行水區，以減少該段路線對水流之阻隔，將由水利處與國工局協商研提可行方案做細部修正；另涉及『大眾捷運法』部分，台北市捷運工程局也據該第一期工程初步設計圖函復表示，在不妨礙捷運設之安全及營運（施工中及完工復）前提下，應可依大眾捷運禁限建辦法函請捷運主管機關同意。國工局已將相關路段平面圖及斷面圖再送請台北市政府審查。」

[87] 這份說帖為張建隆所撰，文後附載搶救聯盟加盟團體，已從原來的 64 個增加為 72 個。

[88] 一、本計畫書中所稱的「治理計畫線」是否即是「堤防線」？二、計畫書中表明因河道寬廣無需築堤保護，本計畫不作防洪布置（設置堤防），但為何第 13 頁卻說「如作其他建築用途，應自行有適當之防洪措施（設置堤防）？三、行水區可以劃作洪氾區嗎？四、何謂「河川區域內之洪患區」？如何界定？依何法律？依何程序？五、「河川區域內之洪患區」是否受水利法第 78 條規定保護？六、「土地公鼻自記水位站」下方之水道被劃作洪患區，該洪患區是否為所謂的「河川區域內之洪患區」？如是，則「淡水環快」將在該處佈置高架橋墩是否牴觸水利法？七、關渡大橋西方之河道最窄處，河床刷深達負 18.4 公尺，如今兩側之計畫線又使水道更加縮減，而且皆將佈置硬邊工程，如此一來，必使河床刷深情形更趨嚴重，是否危及關渡大橋的安危？八、本計劃一旦付諸實施，水利單位要如何禁止工程單位和民間開發公司競相在「洪氾區」大興土木，與水爭地？有何配套計畫和專責機構可以有效執行？九、若因本計畫之實施而導致大台北地區的洪患災害，水利處和本計畫之核定單位是否願負全部責任？

[89] 提案人：朱惠良、范巽綠、翁金珠、周清玉；連署人：張世良、李炷烽、營志宏、謝啟大、鄭龍水、李慶華、馮滬祥、郝龍斌、曹啟鴻等。

格把關，切勿任令水利主管機關及交通部門左右政策而導致「指河爲陸」、「與河爭道」之現象，一旦損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必須追究疏失部會及官員政治及行政責任。大約在 8 月底，經濟部水利處覆文回應「九大疑問」，不得不承認「如淡水環快在該處（土地公鼻自計水位站下方之水道）佈置高架橋墩，依水利法第 78 條規定應禁止建造足以妨礙水流之行為」。但卻又硬拗成「亦即橋墩之施設應以不足妨礙水流之方式辦理之」。妨不妨礙水流，完全由他們認定。

而在這之前，傳出「住都處規劃中的東西向快速公路，六月中決議沿淡水河南岸，由五股至八里淡江大橋，在這段行水區的河中打樁，興建高架公路」[91]。落腳在八里的林懷民爲了不忍淡水河美麗景緻遭受破壞，於是號召民眾及各界人士，於 7 月 12 日，住都處召開協調會當天，前往抗議。翌（13）日《民生報》報導標題「別讓淡水河景觀毀容 藝文人士與八里民眾同聲抗議」。根據報載，到場聲援的，除了八里地區民眾以及主婦聯盟、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還有舞蹈家林懷民、台大教授夏鑄九、淡江大學教授曾旭正、體育人士紀政等，立法委員陳學聖、周慧瑛、林重謨等[92]。報上刊登林懷民頭綁白布條的特寫，相當引人注目。而且還特別做了一個邊欄，標題「為了淡水河的依戀 林懷民頭綁布條走上街頭」，內文寫道：「舞蹈家林懷民上過的舞台，分布世界不計其數；綁布條上街頭，則是難得的場面…為了淌淌的河水，他綁起布條，和鄰居一起高喊抗議口號。林懷民說…淡水河不只給了他靈感和慰藉，假日扶老攜幼的民眾來河旁玩水賞鳥撿螃蟹，以及數不清的藝術家為淡水創作。他說，淡水河是上下幾世代台灣人的共同依戀。『為什麼不讓淡水河變成像冬山河一樣的易於親近？』林懷民不解的問。」尤其引起藝文界的關注。如此一來，淡水河南北兩岸反對力量開始串連，並相互聲援，更加強化搶救聯盟的聲勢。

如前所述，受到強烈質疑的「淡水河河口段治理基本計畫」，因行動聯盟的窮追猛打，迫使主管機關不敢輕易定案。11 月 1 日，經濟部水利處覆函搶救聯盟詢問有關基本計畫的進況時，回答說：「刻正由本處北區水資源局續辦規劃作

---

[90] 台大土木系蔡丁貴教授：「1. 本治理之目的，似乎不是以水利為目的。2. 本基本計畫未提及洪水位演算之詳細內容；但由其中之附圖可知是以恆定流之演算為考量。淡水河口段治理基本計畫，應以不恆定之學理為基礎演算本治理計畫對全河系產生之影響，以作為決策之依據。『水道』之定義依水利法實施細則為水流經過地域。在現在水道內一再畫設水道治理計畫線有何意義？是未來的堤防嗎？如果是，則河岸溼地一定消失，對國家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榮譽理事長林增吉：「1. 淡水河河口段基本治理計畫（草案），未明確說明其水利目標、洪水演算及水工模型試驗。2. 淡水河口段是屬於感潮河段，感潮河段特別要考量河川流及海洋流之交互影響，因其是非穩定流，變化複雜，必須詳加考量暴潮位及雍浪之影響。3. 尤其要考量河川輸沙及海洋漂沙，造成沙洲、沙丘、杜塞水流，減少水道排洪斷面，影響中上游之洩洪能力。因此，此計畫應整體考量，淡水河系防洪問題。4. 整治計畫特別要考量出海口，南北兩岸開發利用之影響因素。」

[91] 88. 7. 9.＜林懷民邀函＞：邀請各界及媒體到住都局抗議並舉行記者會。據 88. 6. 4《聯合報》，6 月 3 日，八里鄉公所舉行「為八里、新店東西向環河快速道路催生座談會」，道路規劃內容經披露後，引起不少質疑，認為環河高架的設計將破壞生態、景觀。

[92] 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亦有受邀，當天有張建隆等到場聲援。

業，並詳加強綜合考量地區經濟發展及防洪安全等因素審慎檢討中」[93]。等於是承認先前省水利處提出的計畫不夠審慎。到了 12 月 22 日，經濟部水利處進一步做出正面的回覆：「由於該河段之地形因素，河道頗為穩定，故水道治理著重於自然保護維持水道 200 年計畫洪水頻率之洩洪能力，儘量減少人為構造物之佈設並重視環境生態之保育，因此研討中之計畫，將以維持現況河道地形、流路，避免影響水道自然穩定及生態環境之平衡為原則」[94]。

八、決戰篇

自 1999 年台灣省「精省」之後，淡水環快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權責，由省環保處轉至行政院環保署。環評層級的提升，可以降低交通部的行政壓力，減少黑箱作業的機會。因此，12 月 14 日環保署的覆文，立場就截然不同：「經查，本案之環境影響說明書由交通部轉送本署審查，因未符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本署未予受理…日後有關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將邀貴聯盟列席陳述意見」[95]。

果然， 12 月 30 日，收到環保署寄來「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可行性評估第一期工程建設計畫（淡水外環道至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環境影響說明書」及審查意見表。在收到環境影響說明書後，搶救聯盟隨即於 2000 年 1 月 9 日檢送審查意見表給環保署，針對環境影響說明書中諸多內容提出質疑，包括：1.違反水利法第 78 條，且與經濟部水利處研擬之「淡水河河口段治理基本計畫」原則不符；2.有觸犯文資法第 52 條之虞，且對紅樹林自然保留區構成重大威脅；3.違反森林法保護保安林之規定；4.與「淡水河口保護區計畫」保護原則相違背；5.影響河岸野生動物的生存及親水權利；6.破壞特殊地景風貌與河岸自然景觀；7.交通估算數據資料過於老舊，效益預估未將捷運通車後的交通系統作全盤了解與分析；8.對民眾的問卷調查設計欠缺正反面意見的陳述；9.整份報告並未將第一期與第二期的工程資料分開評估；10.明顯違反「大眾捷運法」，迄未取得主管機關許可等等。

搶救聯盟於 2000 年 1 月上旬，收到環保署的開會通知，受邀出席 1 月 18 日召開的「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可行性評估第一期工程建設計畫（淡水外環道至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環境影響說明書」專案小組初審會。爲了因應這場決戰，搶救聯盟於 1 月 12 日發出＜搶救淡水河生死關頭！＞，向搶救聯盟的加盟團體發出緊急呼籲[96]，請大家於初審會當天踴躍出席，並透過各種管道向專案

[93] 經濟部水利處 88.11.1.經（88）水利河字第 A885046700 號函。

[94] 經濟部水利處 88.12.22.經(88)水利河字第 A885055032 號函。當時的水利處處長是黃金山，算是少數有擔當的官員之一，後來擔任第一任水利署署長，在水利界十分受到尊敬。

[95] 88.12.14.行政院環保署 88 環署中字第 0015749 號函。

[96] 當時加盟團體已增至一百多個。

小組審查委員以及與會教授進行強力游說[97]。

爲了擴大民眾的支持，搶救聯盟連夜發起「搶救捷運淡水線連署活動」，於 1 月 15、16 兩日，在捷運淡水站站前廣場擺攤，布置海報看板及書面資料，號召來往民眾參與連署，並敦請連署民眾寫信給馬英九市長，請他做爲民意的後盾，一起來搶救台北捷運淡水線[98]。

後來因環評初審會改期至 1 月 25 日，搶救聯盟再於 1 月 21 日重新發出緊急呼籲，並附上審查意見表，供加盟夥伴參考。1 月 23 日搶救聯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 25 日環評初審會議對策、確認當天出席人員[99]，並請張建隆撰寫＜請公路局立即撤回本環境影響說明書＞附上相關資料，做爲當天的說帖[100]（參見附件），記憶中，淡水鎮代會主席蔡錦賢嗆聲，紅樹林沒什麼了不起，要放把火把紅樹林燒掉，說出這樣的「名言」，可能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初審會翌（26）日，搶救聯盟許慧明、張建隆兩人，具狀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告，告發交通部長林豐正辦理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可行性評估第一期工程建設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有捏造、僞陳、誤導、欺瞞等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僞造文書罪嫌。

2 月 28 日，搶救聯盟張建隆與許慧明，到台北民生社區宋宏燾家參加「荒野保護協會」例會，報告「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案」。在座的有曾任陳水扁市府團隊交通局長的賀陳旦，後來對搶救行動發揮了臨門一腳的作用。

整個搶救行動，在進入環評決戰階段的時刻，最具戲劇性的變數，就是 3 月 18 日總統大選，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二位民選總統。政治效應在 5 月 8 日環保署召開的第二次初審會議中，已經可以感受得到。會議現場，新政府閣員熱門人選之一的立委李應元也到場關心，會場氣氛顯得不太一樣。根據會議紀錄，會議主席黃書禮一開頭就批評開發單位（交通部公路局）「上次專家學者會議之討論及結論均未回應」。與會學者專家，除交通部運研所林志明副所長外，大都對公路局提供的資料有意見。搶救聯盟乾脆建議「交通部所提環境影響說明書資料不實，又未充分擬具可能的替代方案，且嚴重牴觸水利法、文資法，請審查委員應予全案否決」。並提議「新內閣交接在即，新任交通部長對淡水環快計畫負施政之責，理應先請審查委員將全案暫先退回交通部，讓新交通部

[97] 根據這份文件資料，列舉游說對象的，包括專案審查委員王穎、鄭福田、歐陽嶠暉、李錦地、陳鎮東、黃增泉；與會教授林建元、江漢東、鄭仙偉、陳炳煌、翁祖炘。

[98] 記得活動海報是請滬尾文史工作室的余素君幫忙製作，據筆者 2000.1.15 日記：「下午和杜秀元搬運白板和長桌到捷運淡水站廣場，擺『攤子』發起連署『搶救捷運淡水線』的活動，喊了三個多鐘頭，至快六點才收攤，徵得四百多人簽名連署」。另，據搶救聯盟 2000.1.23 會議紀錄，兩天共連署三千多人。

[99] 據會議紀錄，25 日可以出席初審會的人有張建隆、許慧明、郭文榮、林茂馨等人。

[100] 針對說明書內容不實、避重就輕、自相矛盾，而且顯然有嚴重缺失，甚至涉嫌偽造文書、違法瀆職部分，列舉實例，加以說明，要求公路局撤回這本謬誤不實的說明書。初審會當天，搶救聯盟的發言，主要依據此說帖內容，表述意見。初審會議地點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台灣省政府台北聯絡處 9 樓會議室。關於交通問專業，當時任職於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總經理的林志盈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

長和新內閣對淡水環快計畫有重新檢討評估之機會」[101]。

於此同時，原先延宕多時的古蹟審查進程，也開始有所進展。事隔八個多月後，2000 年 1 月 14 日，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安排學者專家到「迺生產洋行」、「海關碼頭」等古蹟指定處會勘[102]。又過了將近半年，到了 6 月 27 日，台北縣政府正式公告將「英商嘉士洋行倉庫」、「淡水氣象測候所」、「淡水水上機場」和「淡水海關碼頭」等四處指定爲縣定古蹟。這項決定，等於是宣告淡水環快第二期工程的死刑。因爲這四個古蹟所在位置，全部都在第二期工程必經路線上。

這時，搶救聯盟也計劃拜會新任交通部長葉菊蘭。首先由張建隆準備相關資料包括＜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淡水環快）案發展經過年表＞及＜拜會葉菊蘭部長備忘錄＞，請立委朱惠良國會辦公室轉交。接著，由許慧明和張建隆代表搶救聯盟到交通部面見交通部次長賀陳旦，向他報告淡水環快目前的狀況。最後終於安排在 7 月 14 日，前往交通部拜會葉菊蘭。當天由許慧明和張建隆代表聯盟與會[103]，記憶中陪同拜會部長的，還有立委朱惠良、周慧瑛、鍾碧霞等[104]。葉菊蘭表示支持搶救聯盟的主張，並且保證只要在任的一天，絕不會興建淡江大橋[105]。

9 月 25 日，環保署再度召開「淡水河北側沿河快速道路可行性評估第一期工程建設計畫（淡水外環道至台北市洲美快速道路）環境影響說明書」專案小組第三次初審會議。與會學者專家和政府部門以及民間團體[106]，除了淡水鎮公所外，幾乎全都提出否定的意見，甚至連交通部都說：「有關新政府上任，交通部對本案政策是否有新想法與改變，因 90 年度交通部內建設經費不足，有財政困難下，已對重大建設重新檢討說」。所以答案已很明顯。審查會最後做成的結論是：「建議本案規劃內容認定不應開發」，爲搶救淡水河行動畫下圓滿的句點。

九、餘緒

2000 年 12 月 27 日，殼牌石油公司有感於搶救聯盟和淡水文化基金會愛護鄉土文化古蹟的熱心，將殼牌倉庫地上建築捐贈出來，作爲淡水在地文化學術活

[101] 這次初審會，由張建隆、郭文榮和李永志代表搶救聯盟出席，並提出由張建隆負責撰寫＜對公路局答覆說明的意見＞及附件資料做為書面資料。記得當時搶救聯盟在牆上張掛由台北市鳥會協助製作的淡水河口鳥類調查圖，製作精美、資料豐富；某位環評委員當場表示贊賞，並批評開發單位的專業比民間團體還不如。

[102] 台北縣文化資產主管業務由原先的民政局轉交文化局。

[103] 記憶中，還有黃雍熙，當時他的父親病危已在彌留狀況，但他還是趕到交通部陪同我們拜會葉菊蘭，令人難忘。

[104] 省議員周慧瑛當時已選上第四屆立法委員。

[105] 1999 年總統大選時，連戰把興建淡江大橋做為主要政見之一，讓搶救聯盟憂心忡忡，在搶救過程中，也曾多次透過各種機會表達強烈反對意見。

[106] 這次受邀與會的民間團體，除了搶救聯盟外，還有台北市野鳥學會、台北縣野鳥學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團體。

動的空間[107]，交由淡水文化基金會使用、維護。

2000 年 12 月底，淡水文化基金會邀集淡水文化教育各界協力召開第二屆淡水文化會議[108]，決議籌組大淡水地區的社區大學。2001 年 2 月，淡水文化基金會邀請北海岸地區首長、各級學校、地方文史團體等人士擔任淡水社大籌備委員，召開淡水社區大學第一次全體籌備委員會議。2001 年 4 月，籌備委員會決議敦請淡江大學前任校長林雲山出任社區大學籌備處主任，向台北縣政府正式提案籌組淡水社區大學。2001 年 8 月 1 日，淡水社區大學正式成立。從此，殼牌倉庫便成爲淡水社區大學的校本部，成爲淡水地區推廣終身學習的校園。

十、代結語：城市美學與公民行動

發起於 1997 年底的搶救淡水河行動，歷經漫長而艱辛的抗爭過程，凡是可以動員和串連的資源和人脈，幾乎都已全力使盡。面對著龐大的國家機器和盤根錯節的政商結構，實在像是蜉蝣撼大樹。但是搶救聯盟自始至終，不計成敗，絞盡腦汁、用盡力氣，總是不肯退縮。

聯盟的核心成員，大都是淡水在地文化工作者或文史團隊成員；聯盟的重要戰鬥夥伴，也都是熱愛淡水小鎮淳樸風貌與美麗景緻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子。搶救聯盟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是靠公民行動對抗官僚體制，還有超越政商結構的精神力度——城市美學。他們對於公民權的追求，不只停留在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層面，更進一步要求文化公民權。特別是在經濟掛帥的當代台灣，政商集團經常以繁榮地方爲由，無視地方風貌和風土特色，大興土木、謀取暴利，幾乎已到旁若無人、恬不知恥的地步，居然推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沿河快速道路計畫案，以水泥高架橋和高聳的路堤遮蔽恒古勝景，還自以爲得意，完全不知美與醜爲何物。如果不是利慾薰心，就是麻木不仁。面對如此黑暗勢力，搶救聯盟成員選擇不接受，並起而抗爭到底，無非是要伸張文化價值。如果連最珍貴的美感經驗都被剝奪殆盡，那麼城市生活內容還剩下什麼？在日益都市化的 21 世紀，以公民文化權爲主體的城市美學公民行動，將是守護家鄉的最佳途徑。

---

[107] 贈與契約立約日期為 2000 年 12 月 27 日，立契約人分別為英商亞細亞火油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董事長田臨斌、財團法人淡水文化基金會董事長陳信雄。契約書第三條載明「乙方（淡水文化基金會）保證標的物依第二條移轉佔有後，僅得作為文化、學術等非商業性質之活動使用。 乙方並應保留標的物之特定足夠空間，以展示甲方與標的物之間相關歷史文獻資料。」

[108] 1999 年底，搶救聯盟夥伴有感於啟迪民眾關心在地文化的重要性，在張建隆的提議與協助規劃下，淡水文化基金會於 12 月 26 日假淡水紅樓餐廳召開「淡水文化會議」，邀請淡水文化團體、文史工作者，教育各界共同參與，舉辦座談與討論，座談主題包括「淡水文化工作的回顧」和「當前文化工作的問題與困境」，綜合討論主題為「前瞻與未來」，分別由張建隆、黃瑞茂和陳亮全擔任引言人。2000 年 12 月，召開第二屆「淡水文化會議」。

附表：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內部會議出席紀錄表

日期	出席者	備註
1997.12.17	李志仁、宋宏一、紀榮達、李美莉、呂欣怡、黃瑞茂、范俊海、張建隆、彭揚凱、李滄涵、蔡錦賢、蔡進發、鄭振豐、郭哲道、陳盛、張子隆、姚聰榮、許慧明、洪家富、黃繼明、蘇春旭、錢傳仁、郭晏銓、葉鶴齡	成立搶救聯盟
1997.12.26	董俊仁、張志源、曾旭正、呂欣怡、張建隆、許慧明、王文賓、紀榮達、錢傳仁、戴全成、謝明達、郭哲道、范俊海	
1998.1.1	駱文智、吳福財、紀榮達、宋宏一、張建隆、戴全成、錢傳仁、許慧明、陳建志	
1998.1.4	許慧明、葉鶴齡、戴全成、羅國德、樓震威、陳其南、孫水根、王文賓、陳建志、孫華翔、莊耀棋	
1998.1.9	許慧明、孫水根、戴全成、錢傳仁、張建隆、李麗華、呂欣怡、張國麟	
1998.1.19	張建隆、許慧明、戴全成、紀榮達、黃上科、莊永廷、陳建志	
1998.2.14	許慧明、黃上科、謝孟瑤、陳思成、宋宏一、錢傳仁、黃瑞茂、注精良、張建隆、紀榮達、黃雍熙、廖惠慶	
1998.3.8	許慧明、曾義明、紀榮達、錢傳仁、黃上科、林靖凱、劉宏偉、紀靜宜、黃信欽、張建隆、薛永松、宋宏一、王文賓、林奕辰、陳建志	
1998.3.8	許慧明、張建隆、紀榮達、黃上科、宋宏一、曾義明、林靖凱、劉宏偉、紀靜宜	拜會縣長蘇貞昌行前會議
1998.3.15	陳亭安、顏啓志、辛立美、黃春秀、蔡維倫、林靖凱、鄭景元、林玲珊、吳明勳、劉宏偉、邱舜稜、許慧明、陳俊男、王雅秀、紀榮達、張建隆、宋宏一	
1998.3.19	張建隆、吳福財、黃榮章、陳建志、康世昊、駱文智、黃明輝、陳澤宗	淡水、八里漁民座談
1998.3.22	紀榮達、謝孟瑤、鄭景元、黃上科、戴全成、林靖凱、劉宏偉、蔡維倫、許慧明、張建隆、宋宏一、薛永松、陳亭安	
1998.3.29	許慧明、王雅秀、黃上科、蔡維倫、宋宏一、張建隆、紀榮達	拜會捷運董事長游錫堃行前準備
1998.4.5	許慧明、劉宏偉、林靖凱、張建隆、紀榮達、宋宏一、王文賓、陳建志、薛永松	
1998.4.12	許慧明、王雅秀、紀榮達、王文賓、蔡維倫、薛永松、周慧瑛、張建隆、宋宏一、黃上科	針對蕭萬長院長的回應商討對策

1998.4.19	蔡維倫、張建隆、黃上科、陳建志、林靖凱、王雅秀	
1998.4.26	張建隆、林生祥、陳婉芳、戴全成、蔡維倫、王雅秀、薛永松	
1998.5.3	許慧明、陳俊男、候嘉洪、蔡維倫、張建隆、張以全、江秋燕、林靖凱、戴全成	
1998.5.9	黃上科、陳俊卿、呂建蒼、紀榮達、林靖凱、錢麗如、簡鳳儀、鍾成虎、蔡宏傑、戴全成、王雅秀、陳建志、劉宏偉、蔡維倫、許慧明、張建隆、鄭振豐、鄭楊淑玲、	針對行政院將審議淡水環快 5 億元先期預算商討對策
1998.5.17	鄭景元、戴全成、蔡維倫、林靖凱、張建隆、呂建蒼、許慧明、陳建志	
1998.5.24	呂建蒼、鄭鳳美、林靖凱、林秀怡、戴全成、紀榮達、張建隆、許慧明	交通部提沿河地下化方案之對策
1998.6.14	許慧明、宋宏一、張建隆、蔡維倫、唐珮玲、黃上科	
1998.6.21	王文賓、林靖凱、蔡維倫、宋宏一、許慧明、張建隆、紀榮達	
1998.6.28	許慧明、蔡維倫、黃上科、宋宏一、張建隆	
1998.7.12	許慧明、張建隆、林靖凱、陳建志	
1998.7.26	張建隆、郭文榮、蔡維倫、陳婉芳、林靖凱、紀榮達、陳建志	
1998.8.9	張建隆、紀榮達、王文賓	
1998.8.30	許慧明、紀榮達、盧碧玉、張建隆、陳建志	觀子音樂坑「游盪美麗島」活動流程
1998.9.11	紀榮達、駱文智、顏瑋志、盧碧玉、張建隆、陳宏仁（國道新工局承辦人）、李榮華（國道新工局公關）	
1998.9.13	許慧明、紀榮達、黃世昌、張建隆、蔡維倫、唐珮玲、駱文智、吳福財、陳建志	要求縣府儘速派員會勘古蹟
1998.9.20	許慧明、林靖凱、黃瑞茂、唐珮玲、紀榮達、蔡維倫、張建隆	
1998.9.27	張建隆、許慧明、紀榮達	
1998.10.11	張建隆、許慧明、黃瑞茂、張登傑、楊淑惠、陳建志、林靖凱	搶救捷運淡水線活動計畫
1998.10.25	許慧明、紀榮達、蔡宜珊、張建隆、張登傑	
1998.11.8	許慧明、紀榮達、郭文榮、張建隆、林靖凱、陳建志	
1998.11.15	張建隆、紀榮達、許慧明、黃瑞茂、郭文榮、陳建志、林靖凱	
1998.11.29	王雅慧、張建隆、陳建志、許慧明、李志仁	淡江大學「淡水環快座談會」
1998.12.27	許慧明、黃瑞茂、黃柏蓁、吳瑪琍、薛永松、張建隆、王文棋、紀榮達、陳建志	
1999.1.9	許慧明、郭文榮、張建隆、廖家瑩、薛永松、王雅慧、陳建志、	

	林志盈、紀榮達	
1999.1.24	陳雅惠、薛永松、何一先、郭文榮、張建隆、許慧明、紀榮達	
1999.2. 7	紀榮達、張建隆、許慧明、郭文榮、薛永松、陳雅惠、何一先	古蹟審查進度延宕問題
1999.2.28	黃瑞茂、葉鶴齡、林宇陽、張建隆、張威廉、林虹均、許慧明、周章德、翟星穎、紀榮達、徐揚、林奕辰、鄭弘毅	
1999.3.14	張建隆、許慧明、郭文榮、陳雅惠、洪菁雯、紀榮達、張志源	
1999.3.22	林志盈、蔣永豐、許慧明、黃瑞茂、郭文榮、張建隆、王雅慧、紀榮達、陳建志	
1999.3.28	紀榮達、林宇陽、張建隆、黃柏蓁、陳建志	
1999.4.4	郭文榮、紀榮達、張建隆、許慧明	
1999.4.11	紀榮達、林宇陽、郭文榮、張建隆、許慧明、王雅慧	與郭鎮長約時間談中正路老屋保留相關
1999.4.25	張建隆、林宇陽、郭文榮、紀榮達、陳建志、許慧明、王文賓	
1999.5.9	陳建志、許慧明、張建隆、紀榮達	
1999.5.16	陳建志、郭文榮、黃瑞茂、許慧明、張建隆	5.20「淡水河河口段治理基本計畫公聽會」準備工作
1999.5.23	張建隆、紀榮達	
1999.6.13	郭文榮、張建隆、紀榮達	
1999.6.27	王文賓、張建隆、紀榮達	
1999.7.11	張建隆	
1999.8.8	陳啓東、楊正雍、黃旟、黃英芳、張建隆、郭文榮	八里反東西快速道路藝文界
1999.8.29	郭文榮、張建隆、許慧明、紀榮達、周章德、黃瑞茂	
1999.9.12	許慧明、吳建興、郭文榮、紀榮達、李永志、陳建志、夏子康	
1999.9.26	夏子康、紀榮達、陳建志、許慧明、張建隆	
1999.10.10	陳建志、許慧明、張建隆、紀榮達	
1999.10.24	許慧明、張建隆、紀榮達	
1999.11.14	顏長齡、許慧明、何信鴻、紀榮達	
1999.1128	許慧明、黃瑞茂、郭文榮、張建隆	
2000.1.6	郭文榮、林茂馨、張建隆、許慧明、朱惟君、余素君	
2000.1.11	劉振南、張建隆、許慧明、駱筠萍、林志誠、王俊德、陳秋吉、紀飛月、游晴媚、郭貞梅、余素君、宋宏一、陳建志、杜秀元	
2000.1.23	許慧明、卞中佩、張建隆、林茂馨、郭文榮、陳建志、紀榮達	

2000.2.27	張建隆、李永志、許慧明、紀榮達	
2000.3.26	李永志、許慧明、紀榮達、張建隆、陳建志	
2000.4.9	黃瑞茂、黃一郎、洪良鑑、游晴媚、許慧明、李永志、張建隆、孫君婉、杜秀元、郭文榮、紀榮達、陳建志、姚莉亭、沈玫伶	
2000.4.23	陳建志、紀榮達、孫君婉、許慧明、張建隆、周銘宏	
2000.5.7	許慧明、李永志、游晴媚、張建隆、陳建志、孫君婉	
2000.6.13	陳愷璜、王德瑜、杜偉、李永基、張建隆、許慧明、陳建志	
2000.6.18	張建隆、黃瑞茂、孫君婉、林茂馨、許慧明、郭文榮、	
2000.9.10	紀榮達、余素君、許慧明、張建隆、李永志、游晴媚、謝德錫	

附件：請公路局立即撤回本環境影響說明書　張建隆 2000.1.25

本說明書不僅內容不實、避重就輕、自相矛盾，而且顯然有嚴重缺失，甚至涉嫌僞造文書、違法瀆職。茲舉若干例證，略加說明。

在本說明書一開頭的「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調查表」〔附件一〕，就已漏洞百出了，如第十三項「是否位經保安林地？」「台北縣政府函」明明說：「來函僅附地籍圖，並無註明地號，故無從查對是否為保安林。」而「林務局函」更明白指出：「部份路段與竹圍紅樹林編號第一 O 七號保安林相鄰，對當地生態影響重大。」但調查表上竟填作「無」！

又如第十二項「是否有獨特之地理景觀？」調查表上填作「否」；可是完全不附任何相關證明文件，只空口說「依本計畫實地調查」云云，至於到底調查了什麼，翻遍整本計畫書，沒有一句話交代；反而倒是在內文第 6-55 頁，不打自招的羅列了「大屯春色」、「觀音吐霧」、「淡水夕陽」等自然景觀〔附件二〕。難道這些馳名遐邇的名勝景點，還不夠獨特嗎？如果這些優美的景觀不值一顧，爲何又在第 7 -38 頁至 7-40 頁「本計畫景觀美質及遊憩環境」評估爲「十分不協調」和「影響程度嚴重」？同樣在第 6-55 頁，也不打自招的招出了「特殊的自然景觀」：「當淡水河流過關渡，進入平緩、廣闊之河口區，流速減慢，夾帶在水中之細泥便逐漸沈澱下來，淤積成泥沼地。在竹圍這片廣大之河口沼澤地，所生長之水筆仔純林… 乃分布於世界之最北界，同時也是面積最大之水筆仔純林，其豐富之生態體系，成就為相當特殊之自然景觀。」〔附件二〕 這種世界絕無僅有的特殊景觀，「調查表」絲毫不當一回事，連提都不提；甚至計畫路線明明經過紅樹林自然保留林區及其所植根的泥沼地——鐵證如山，請詳見「說明書」第 7 -37 頁並對照八十七年版說明書第 7-47 頁〔附件三〕 ；另外農委會林務局函，雖然語氣委婉卻也已經說得夠清楚了：「本案緊臨淡水河紅樹林自然保留區，其中部份路段與竹圍紅樹林編號第一〇七號保安林相鄰，對當地環境、景觀與生態影響重大，且有觸犯文資法第五十二條『 生態保育區與自然保留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自然狀態』之虞，即使未直接落樁於保留區內，其陰影、震動、噪音等種種影響，亦將改變原有現況。」何況說明書第 7-35 頁早已坦承：「由於本計畫道路臨紅樹林區高架段之高層約 18 公尺，路寬約 20~27 公尺，若以橋墩直徑 2 公尺、最大之日照入射角為 60º 估算，則於上午時段因日照產生之橋面陰影最大面積約為 2.2 公頃、橋墩約為 0 .17 公頃，則遮蔽紅樹林之最大陰影面積合計約為 2 .37 公頃。」可是「調查表」第十項「是否位經生態保育區或自然保留區？」竟填作「否」！同樣第十項「是否位經古蹟所在地鄰近地區或古蹟保存區鄰接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的回函明明說：「刻正委託劉益昌教授辦理調查研究」，其備註欄也註明「目前正委託中研院教授調查」，可是調查表竟然填作「否」！甚至「調查表」第二項「是否位經紅樹林沼澤？」就乾脆睜眼說瞎

話了，連備註欄也懶得說明了。像這樣明顯違背已知之事實，已經構成僞造文書之犯罪行爲了。

更爲嚴重的是關係整個大台北地區數百萬居民身家性命的「計畫路線違反水利法」這麼重大的問題，竟然以「前水利處已原則同意以高架方式通過行水區」一語帶過；更妙的是後面的一句「將取得水利主管機關之同意證明文件後方進行施工」，試問，爲何不直接透過部會協調就好了，還需要環評審查做什麼？還需要法律做什麼？水利處函明明說「現階段以河川區域爲範圍」，「淡水河河口治理基本計畫」尚未核定公告，係以河川管制線（即捷運線）爲爲準，本計畫路線自關渡大橋至紅樹林站完全是蓋在行水區裡面，這已是不爭之事實，但說明書卻故意用含混的文字誤導以爲只有關渡段走在行水區裡· 其實說明書第 8-4 頁「路堤路段之基礎開挖… 以鋼板樁打入淡水河床」豈不已坦承計畫道路是布置在河床上？耐人尋味的是，如此昭然若揭的事實，交通部門或行政當局到底對水利處施加了多大的壓力，致使水利處不敢明白說出「計畫道路確實是位於河川行水區」，而還要如此迂迴的回答說：「是否位於河川行水區，請逕洽北區水資源局查詢。」這件事，恐怕得勞動監察院來調查了！

同樣，計畫道路在紅樹林路段，緊貼捷運線布置，橋面護欄甚至幾乎與捷運護欄相貼，遠超過「大眾捷運禁限建辦法」六公尺的安全界限。尤其嚴重的是，計畫道路巨大之橋墩竟落樁於只距捷運線護坡不到兩公尺處，施工所造成的振動將對捷運路軌和精密的電腦線路造成怎樣的衝擊，說明書竟沒有支言片語提及此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尤其這些巨大橋墩是落樁在高滲透陸、地下水位只有 0 .5 公尺之砂土層上，不僅有土壤液化之虞，而且將嚴重危及捷運淡水線之路基。事實上，歐陽嬌暉教授早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的審查會上已明白提出：「本案完全與捷運淡水線平行… 都市交通應鼓勵搭捷運，籌建本計畫是否適相反？」的質疑。但開發單位對此不僅不作檢討，反而故意引用不切實際的數據自欺欺人，如第 6-71 頁～6-73 頁的「尖峰時交通量」全都引用八十六年九月的舊資料。眾所週知，自從捷運線連線通車以來，台二線的交通雍塞已漸見舒解：可見說明書所據以爲分析之數據已失其可信度。

甚者，本說明書引用數據之作假謬誤已到粗糙不堪之地步。如第 8-11 頁「若與 86 年爲折現基年及 8 騙折現率計算，本計畫道路之總成本現值約爲 74 億元，總效益現值爲 114 億元，淨效益爲 40 億元，益本比爲 1. 53，內生報酬率爲 11 . 34，顯示本計畫道路建設投資之經濟價值可行。」竟然和八十七年所提出的全線規畫案（起自淡江大橋銜接洲美快辦創珞）之益本比、內生報酬率完全相同：「若與 86 年爲折現基年及 8%折現率計算，本計畫道路之總成本現值約爲 74.49 億元，總效益現值爲 114.21 億元，淨效益爲 39.72 億元，益本比爲 1.53，內生報酬率爲 11 .34 ，顯示本計畫道路建設投資之經濟價值可行。」簡直是天方夜譚！又如第 5-8 頁「預期效益」：「本計畫道路完工通車後，於目標年（民國 110 年）自淡水外環道至關渡大橋間之尖峰平均行車速率可提高 153 % (17KPH → 3KPH)，另

尖峰之旅運時間可節省 58 % (24 分鐘-10 分鐘）。」竟然與不同起點的沿河快速道路全線的「預期效益」完全一模一樣，一字不差：「本計畫道路完工通車後，於目標年（民國 110 年）自淡江大橋至關渡大橋間之尖峰平均行車速率可提高 153 % (17KPH → 43KpH) ，另尖峰之旅運時間可節省 58 % (24 分鐘→ 10 分鐘)。」〔附件四〕真是天才傑作！同樣只做第一期工程的本計畫道路，竟然和做完全線工程的「交通量及服務水準」所有的數據都一字不差！〔附件五〕公路局到底是把評審委員全當做三歲小孩，還是把自己當做白痴？即使認爲環評只是形式上做個樣子，也不該輕忽到這種地步啊！

本說明書之謬誤不實，已不夠資格稱爲「環境影響說明書」了，其他琳琳總總的缺失，可參見本聯盟提出之「審查意見表」〔附件六〕。相信評審委員和專家學者也早已明察秋毫。其浪費公帑、怠忽職守，已昭然若揭，因此請公路局立即撤回這本荒腔走板的環境影響說明書，並速取消此一嚴重違法的道路計畫，以免鑄成大錯。

民俗學視野下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議題---兼論對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之啓示

林承緯*

摘要

我國文資法自1982年頒布以來雖已行之有年，不過因時空背景及法令所限，特別在無形文化資產保存上缺乏具體與延續的作爲。不過近年來，隨著 200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保護對象擴大到非物質形態文化遺產的潮流，加上 2005 年公告之文資法修訂版本，具體將「傳統藝術」與「民俗及相關文物」合併成章，並清楚擬定具體之行政保護措施，讓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發展跨出一大步。當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及研究逐步謂爲風潮之際，對於民俗學者而言，傳統藝術與民俗及相關文物兩大範疇，原本即爲民俗學主要涉及的研究對象，因此民俗學門實有必要秉持學科立場及視野，積極發揮對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議題的推展盡一己之力。

本文首先將說明國內無形文化資產政策的發展歷程及現況，接著探討民俗學科與無形文化資產課題構成的關聯性。再者將以 2009 年所實施的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爲探討核心，說明文化資產保存及普查現狀間所遭逢的問題。最終期待針對被作爲文化資產的民俗文化保存、研究，以及活化、再生等議題進行討論。

關鍵字

無形文化資產、淡水地區、民俗及其文物、傳統藝術、民俗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 言

「文化資產」一詞，近年來隨著社會潮流、時空環境轉變，以及本土意識高漲的推波助瀾下，逐漸褪去生硬冰冷的形象，成爲人們熟悉並能朗朗上口的語彙。在我國所施行的《文化資產保存法》最新修訂版本中，將文化資產定義爲「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資產」。在法令條文賦予的定義之外，事實上「文化資產」就其內涵而言，可視爲「文化」+「資產」兩概念揉合下的語彙。「文化（Culture）」之意在此不再贅說，而「資產（Heritage）」一詞，過去廣泛被作爲具經濟價值的事物之意，例如：金錢、土地、房屋、證券等，在此文脈下的文化被投以價值化、資源化等意識，成爲一種可被利用的資產、資源。因此，今日活躍於世的文化資產概念及相關保護工作，可理解成一種將文化作爲資產、資源進而加以有效利用的活動。一方面，文化資產可謂人類社會中具保存意義的存在，在文化資產保護意識之下，透過法令制定及系統性知識的產出，成爲了各國從事相關保護視野一致的腳步。「有形」與「無形」爲相對的概念，在文化資產保護措施構成中，透過如此的概念界定來詮釋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傳承構造[1]。冠上「有形」二字的文化資產，擁有一定的空間及形體，如：古蹟、聚落、歷史建築、文化景觀、古物等具物質性、感知性、固定性的類型範疇皆屬此項。「無形」的文化資產，性質上屬非物質性、非感知性、暫時性，如傳統藝術與民俗及其有關文物，著重於「技」與「型」的傳承，相較於有形性質的資產，無形文化資產建構於傳統歷史、社會構造及生活智慧之中，可謂順應時代、空間、社會環境之演變所產生的文化表現[2]。因此相對於有形文化資產，無形文化資產保護對象呈現的是不定時、形體不明、對象不清的性格，往往只能透過間接性的傳承者來達到掌握。

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文資法）自 1982 年頒布以來雖已行之有年，可惜由於時空背景及法令所限，特別在無形文化資產保存上缺乏具體與延續的作爲。不過近年來，隨著 2003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保護對象擴大到非物質形態文化遺產的潮流，再加上 2005 年公告之文資法修訂版本，具體將「傳統藝術」與「民俗及相關文物」合併成章，清楚擬定具體之行政保護措施，讓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發展跨出一大步。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及研究謂爲風潮的理由，事實上有其時代背景其意義，洪孟啓指出：「在全球化時代的衝擊下，許多珍貴的人類文化資產也因爲文化的均質化、武裝衝突、大量的觀光發展、工業化、農村人口外移、移民及環境惡化等因素的威脅，而面臨消失的危機。而國際社會已普遍認爲「無形文化」是其文化認同、保存文化多樣性的

[1] 江韶瑩〈守護・傳承－台灣無形文化資產概說〉，收錄於黃貞燕編著《日韓無形的文化資產保存制度》（宜蘭：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2008），頁 7。

[2] 大島暁雄〈「型の伝承」と保護施策について―民俗文化財における保存会の問題を中心に〉《民俗文化研究》10、2009、頁 186-188。〈無形の民俗文化財の保護について―特に、昭和 50 年文化財保護法改正を巡って〉《國學院雜誌》107（3），2006，頁 49。

重要基礎，迫切需要國際間的共同努力來維護這些人類文化的寶庫。[3]」一方面，江韶瑩則以：「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由於政治經濟環境、都市化與科技工業「跳動」式急劇的變遷，民間傳統文化的生存空間迅速的被耗竭、擠壓[4]」一語道出國內文化資產保存意識下無形文化資產概念萌芽期的時代背景。除了上述的理由之外，各國從有形文化保存中意識到無形文化的重要性，應與有形及無形文化本質呈現的先天差異有關。有形文化屬於具象、實際的存在物，若遭受外力帶來的侵蝕、改變、破壞等威脅，所產生的變化相對明顯，較易引起世人的矚目，如接連發生於 2009 年初的苗栗後龍古窯群與汐止周家花園等拆除事件。反觀無形文化屬非具象的存在，往往只在特定的時間、場域中凝聚呈現，如此的特性導致無形文化即使遭逢的威脅更勝於有形的建築物、古物，不過往往容易被人們所疏忽遺忘，缺乏有形文化遭受破壞時容易引起的話題性，因此被視爲文化資產保存對象的時間略晚於有形文化。

文資法自 2003 新修訂版本出爐，無形文化資產重新受矚目以來，一時之間引起各界的關注，不論透過學術性的研究論述或是相關活動的舉行，皆可感受到無形文化資產所呈現的熱潮。以學術發表爲例，特別是從 2005 年起，幾乎每年皆有重要研究著作問世，例如：林美容、謝佳玲〈臺灣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5]、洪孟啓〈文化資產保存的世界潮流—從有形到無形〉[6]、林崇熙〈文化再生產：一個無形文化資產哲學芻議〉[7]、黃貞燕《日韓無形的文化資產保存制度》[8]、林茂賢〈臺灣無形文化資產傳統藝術登錄現況〉[9]、王嵩山總編《2005-2008 年臺灣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年鑑》[10]、江韶瑩〈守護‧傳承－台灣無形文化資產概說〉[11]等，爲國內無形文化資產之學理及實踐策略上奠定穩固基礎。除此之外，這段時間不論是政府機關或民間社群，亦紛紛透過研討及展覽活動等形態，提升社會對於此議題的認識，如：2007「博物館與無形文化資產國際研討會」、2008「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動力論壇」、2009「保護‧傳承‧弘揚～兩岸非物質文化遺產論壇」，以及「守護‧傳承－台灣無形文化資產特展」等活動，皆充分反映出無形文化資產議題發展的蓬勃。本文試圖承繼上述的研究成果，以筆者所從事的民俗學角度出發，首先透過民俗學門的視野，探討無形文化資產理論與實踐層面上呈現的特徵，接著具體以 2009 年所實施的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爲例，分析文化資

[3] 洪孟啟〈文化資產保存的世界潮流—從有形到無形〉《美育》154 期，2006，頁 14。
[4] 同註 2，頁 5-11。
[5] 林美容、謝佳玲〈臺灣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現況〉《臺灣史料研究》25 期，2007，頁 147-169。
[6] 同註 4，頁 14-19。
[7] 林崇熙〈文化再生產：一個無形文化資產哲學芻議〉《文資學報》4 期，2008，頁 1-26。
[8] 黃貞燕編著《日韓無形的文化資產保存制度》（宜蘭：臺灣傳統藝術總處籌備處，2008）。
[9] 林茂賢〈臺灣無形文化資產傳統藝術登錄現況〉，發表於「海峽兩岸閩南文畫生態保護研討會」，福建省藝術研究院、福建省海峽文化研究會、廈門閩南文化研究會主辦，2009。
[10] 王嵩山總編《2005-2008 年臺灣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年鑑》（臺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2009）
[11] 江韶瑩〈守護‧傳承－台灣無形文化資產概說〉《文建會雙月刊電子報》3 期，2010。取自 http://www.cca.gov.tw/images/epaper/20100118/page01.html（2010/07/01）

產保存及普查現狀間所遭逢、衍生的各種議題，最終以作爲文化資產的民俗文化所遭逢的保存、研究，以及活化、再生等議題進行討論。

二、無形文化資產與民俗學

（1）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意識及法令的形成

文化資產保存的歷史由來已久，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意識的形成與保護法令的出現，實際上歷經過一段漫長的歷史。關於這部分可分成國際性公約及國內形態的保存法令而論，以下約略說明這兩種保存機制的發展歷程及基本構造。

首先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爲核心所揭起的全球性無形文化遺產保護動向而言，作爲聯合國旗下執掌文化事務的專門機構 UNESCO，若要論及該組織對無形文化資產的關注，我們根據「建立保護民間藝術國際規範之可能性」文件起草時間，可追溯至 1971 年前後。雖然該組織於 1972 年制定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是以保護建築、古蹟、遺址等有形性遺產爲主，不過相關動向已引起國際間對民間藝術等無形文化資產保護的關注。在相關議題凝聚共識與周邊知識體系日趨成熟下，1989 年，第一份國際規範工具《保護傳統文化與民俗建議書》獲得建立，接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97 年第 29 屆世界大會中，通過「人類口傳與無形文化遺產代表作宣言(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隔年 10 月，再通過「人類重要口傳與無形文化遺產公告計畫」，正式提出人類口傳與無形文化資產的概念[12]。2001 年 5 月 18 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第一次「人類重要口傳與無形文化遺產(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公告，共有 19 項資產以具備歷史、藝術、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文學價值及傳統文化代表性等理由獲得認定。到了 2003 年通過「無形文化遺產保護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後，則使世界遺產的範疇擴及「無形文化遺產」(Intangible Heritage)，讓對於人類共同文化遺產的界定範疇更顯周延[13]。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無形文化遺產」概念，賦予如此的定義：「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是個人視爲其文化遺產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以及相關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無形文化遺產保存意識始於維護其現存狀態及傳承延續之活力，在「無形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制定的契機下，提升國際間對無形文化遺產保護的矚目。一方面，透過該國際性公約條文內容表現的具體原則與精神，以及對於各締約國發揮的約束力，提升各國對於無形文化資產保護的重視，進而引領一波無形文化的熱潮。

---

[12] 愛川紀子〈ユネスコ無形文化遺産保護条約―採択(2003)から第１回政府間委員会開催(2006・11）まで〉《無形文化遺産の保護―国際的協力と日本の役割》(東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無形文化遺産部，2008)，頁 13-22。

[13] 古田陽久、古田真美《世界無形文化遺産ガイド―無形文化遺産保護条約編》(東京：世界遺産総合研究所 2004)，頁 8-21。

關於國家規模的無形文化資產相關法令的制定，日本的起步甚早，早在1897年即出現《古社寺保存法》如此以文化資產保護爲核心的法令制度。到了1950年，爲了有效因應在社會變革及戰敗衍生的價值觀劇變之下，諸多文化資產保護遭逢的危機，制定《文化財保護法》這部全球首度施行的綜合性保護法令，積極致力於文化資產保存、活化等工作。在該保護法第一條中清楚指出：「本法之目的爲謀求文化財之保存及活用，提升國民文化，並對世界文化之進步有所貢獻。」文化資產一詞在日語中稱爲「文化財」，其範疇之下包含：有形文化財、無形文化財、民俗文化財（細分有形民俗文化財與無形民俗文化財）、紀念物，文化的景觀，傳統的建造物群、文化財保存技術及埋藏文化財等類別[14]。其中「無形文化財」與「民俗文化財」二項屬於廣義的無形文化資產範疇，即爲本文所關注的類別。

將「無形」之概念運用於文化資產上，日本可謂首開先例，不僅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韓國在制定相關法令政策時產生影響，並間接的影響到包含我國在內的其他各國在建立法源機制中對於文化資產類型的理解。雖然在我國現行文資法正式條文中未出現「無形」一詞，不過根據2005年新修訂的文資法第五章的「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細項內容，卻已實質對應於日本文化財保護法的「無形文化財」與「民俗文化財」概念。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在1982年正式施行前的草案過程中，曾一度納入「無形」概念，在1979年5月的文資法草案中出現：「無形文化資產指的是具有歷史藝術高度價值之戲曲、工藝、民間藝術、民俗才藝之技能」等文字，不過「無形文化資產」用語在隔年即被「民族藝術」所取代。雖然相關的保護內涵及精神隨著公告後的文資法施行至今，不過因時空背景及範圍設定，導致過去被做爲文化資產保存對象集中於有形範疇。如此情況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導的幾項無形文化理論及實踐工程逐步付諸實踐下，帶動國際間興起一波無形文化資產保護的熱潮。如此時空背景之下，我國文資法在2005年公告修訂版本，將「傳統藝術」與「民俗及相關文物」合併成章，順應文化資產的特性建構更爲健全、完整的法令架構及行政措施，爲我國無形文化資產保護翻開新的一頁。

在新修訂的文資法中，將文化資產定義爲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1）古蹟、歷史建築、聚落（2）遺址（3）文化景觀（4）傳統藝術（5）民俗及有關文物（6）古物（7）自然地景。在這些項目中，經常爲求實務執行之便，再依據文化資產的屬性，將文化資產再區分出「有形文化資產」與「無形文化資產」兩大類。所謂的無形文化資產包含有「傳統藝術」和「民俗及有關文物」兩大類，因兩者性質屬性相似，故於文資法中併列於第五章。在文資法總則中，對於兩者的內涵皆有清楚的說明，傳統藝術：「指流傳於各族群

[14] 中村賢太郎《文化財保護制度の解説》(東京：ぎょうせい，2007)，頁 1-9。佐々木正直〈日本における「無形文化財」の保護の現状と課題—工芸技術を中心として〉《無形文化遺産の保護—国際的協力と日本の役割》(東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無形文化遺産部，2008)，頁 59-63。

與地方之傳統技藝與藝能，包括傳統工藝美術及表演藝術。」而民俗及有關文物：「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信仰、節慶及相關文物。」此外，對於個別文化資產的登錄基準，傳統藝術是以具「藝術性、特殊性、地方性」，民俗及有關文物則爲「傳統性、地方性、歷史性、文化性及典範性」[15]。

（2）民俗學所見的無形文化資產

相信透過上述對文資法第五章中「傳統藝術、民俗及其相關文物」內涵的說明，可以清楚理解這些保存對象原本即與民俗學研究範疇相符，因此，面對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意識下的相關措施，相信民俗學學科不論在理論或實踐層面上應可發揮一定的功能。民俗學（Folklore）是以研究風俗習慣、傳說民謠、生活用具等自古以來流傳民間的有形或無形的民俗事物爲核心，藉由理解人類生活傳承現象的歷史變遷，進而與現今社會的生活文化展開對話的一門學科[16]。該學科源起於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二十世紀前半葉，日本在柳田國男的領導之下，建構出獨特的民俗學研究領域，成爲民間文化研究上相當重要的一門學科。反觀國內民俗學學科的學問體系及方法論建構的腳步尚未完成，雖然從二十世紀初期至今，不斷有學界及民間的力量投入台灣民俗文化的研究，並累積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以一門學科之姿進行發展的民俗學知識體系尚未出現。所幸從人類學、史學、文學、社會學等研究視野進行民俗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不少透過自身對於民俗文化研究及觀察的經驗，參與各項與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相關事業。面對如此的景象，身爲民俗學學徒的筆者，經常思考究竟對於一個以民俗文化爲核心所發展出來的民俗學科，在面對將民俗及傳統藝術作爲一種文化資產保存對象的操作時，如何有效藉由民俗學方法論及相關論述，對於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學理建構及執行提出反思。因此，以下將針對民俗學與文化資產保存概念間可能產生的幾個交集點進行初步討論。

首先，我們可以確信的是文化資產保存思惟與民俗學致力的學科目標應無衝突，不過往往一些思惟在面臨現實層面的落實上，將產生進退兩難的困境。一般而言，文化資產保存法令爲達到文化保存、維護等目的，因此需在眾多文化資產中篩選符合預設價值基準的文化資產，著手進行指定、認證的作業。如文資法第57條指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保存價值之項目、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確實在需要付出龐大時間、資本的文化資產保存工作中，適當的篩選、審查有其必要性。不過，如此透過法令對文化資產展開評價（如：傳統性、地方性、歷史性、文化性、典範性）的作法，確實與民俗學所主張的所有文化並無高低優劣的認知不同。以民俗學立場而言，任何一個地區或時代創造出來的文化皆有不可取代的價值，不過文化資產保存法令的篩選卻將各文化資產相互比較，再

[15] 傅朝卿等《文化資產執行手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頁5之3 -5之9。
[16] 宮田登《日本の民俗学》（東京：講談社，1985），頁1-2。

從中挑選出符合評價基準的民俗文化，進而賦予其不同的地位與榮譽[17]。例如 2008 年雞籠中元祭被指定爲我國第一項國家級重要無形文化資產，確實從該祭典具有的歷史性、文化性而論，雞籠中元祭能從全國各大小民俗祭典活動中脫穎而出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若從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條提起的「弘揚多元文化」的基本精神而論，搶救其他即將面臨危機的文化資產，確實比指定目前仍保有源源不絕傳承能力的民俗文化更來得迫切。雖然民俗學對於民俗文化的自然演變抱持著樂觀的態度，不過面對即將遭逢消滅的無形文化資產，若能適時透過法令規範及配套措施來展開搶救或記錄，將能夠讓更多代表各地各時代的民俗文化獲得保留。

民俗學認爲無形文化資產特別是民俗文化在經歷時空傳承之下，其文化內涵隨著時代背景或地方特徵所產生的變異是即爲自然的現象，換言之，目前你我所接觸到的文化資產樣貌，絕對與百年或千年以前所傳承的內涵形貌不盡相同。不過當我們對照「無形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及相關法令內容之中，所提出的真實性（authenticity）完整性（Integrity）、歷史性（historicity）等被視爲文化遺產申報的基本條件時，民俗文化呈現的變異性特徵將成爲難以克服的難題。林會承在談到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現狀與展望時指出：「以往過度期待「完整」性，或偏執於「正統性」，或注重藝術觀點（或所謂「美」的觀點），導致修復結果流於過多想像、虛假或傷害了地方性特色，近年已調整爲以文化資產之真實性爲核心價值[18]。」對於無形文化資產而言，若將真實性、完整性、歷史性等概念作爲衡量此文化資產唯一的價值基準，相信將引發嚴重的矛盾。一方面，也由於無形文化資產具有較強的變異性，因此，基本上在每個時空裡所呈現的文化樣態皆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倘若只是片段式的對現今所見的文化現象進行指定保存的話，反倒影響干涉到文化資產自然的變異作用，最終離追求的真實性目標只會越來越遠，淪爲另一型態的人爲產物。以上藉由民俗學對於民俗文化本質及傳承之概念，詮釋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理論及實踐方策下，文化資產可能面臨的「價值」及「變異」等議題，反映出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具有的獨特性。

三、普查與指定：2009 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所感

（1）文化資產普查執行脈絡

文資法爲保存及活化文化資產的法令機制，爲了達到其宗旨與功能，適時掌握各文化資產現狀可謂行政執行的首要基礎作業。目前文資法對於現有文化資產掌握的形式，以無形文化資產範疇爲例，文資法第五十七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保存

[17] 大島暁雄〈無形の民俗文化財の保護について―特に、昭和 50 年文化財保護法改正を巡って〉《國學院雜誌》107（3）2006，頁 50-52。

[18] 林會承〈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歷程〉《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獎助博碩士班學生研撰傳統藝術論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2005），頁 377。

價值之項目、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我們可將其途徑細分爲二，一則爲主管機關主動展開的普查，另一是被動接受民眾的提報。主管機關仰賴這兩種途徑取得當地的文化資產狀態，才得以展開後續的審議、登錄、公告作業等行政作業，發揮文化資產保存法具有的功能。透過該法令的行政流程顯示出「普查」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機制具有的重要性，回溯起過去國內針對傳統藝術或是民俗文化所進行的研究調查，事實上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例如八〇年代尹建中教授主持「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訪查」、「中國民間傳統技藝與藝能調查研究」，九〇年代江韶瑩教授主持「民間藝術保存傳習計畫」[19]等調查研究計畫，皆爲臺灣無形文化資產的基礎資料的建構奠定深厚的基礎。不過這些調查研究在性質上皆屬全國廣域型態，一方面，當時執行時空背景下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尚未積極關注於無形面向，因此國內以作爲文化資產保存法行政措施下的普查作業，大約從 2005 年修正版通過之後才逐步。自 2009 年 2 月爲止，全國行政區域中完成普查之縣市有基隆市第一期、台北市、台北縣、新竹市、新竹縣原住民、苗栗縣、台中市第一期、台中縣、南投縣原住民、彰化縣、雲林縣、嘉義市、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平地鄉鎮、花蓮縣原住民、台東縣原住民、宜蘭縣、澎湖縣[20]等地。以上所見皆屬縣市層級的普查工作，除了縣級規模的文化資產普查之外，以鄉鎮爲單位的普查作業亦陸續展開，如筆者於二年前協同主持的「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即爲其中一例。

2008 年 12 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在台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委託下，針對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展開爲期十一個月的普查研究。該計畫源起於 2007 年由淡水古蹟博物館推動的「臺北縣淡水地區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在該案中具體提出「山水架構下的淡水區域保存論述」，就是爲了擴大與集結分布於淡水境內的文化資產，進行區域性的地方文化資產保存與整合的作業結合。如此企圖將文化資產從過去常見的「點狀」保存，串連成「線狀」甚至「面狀」的保存意識，獲得文建會的補助進行相關研究工作。淡水古蹟博物館爲求在未來能有效推動各文化資產之保存、維護、研究極整合等作業，將掌握淡水地區文化資產現狀的基礎資料普查作爲首要工作，當然該普查計畫的推動因與未來落實各地無形文化資產提報登錄的趨勢有關。在這項計畫之中把文化資產細分爲有形與無形兩項，分別於 2007 年與 2008 年委託弊校建築古蹟維護所黃士娟教授及傳統藝術研究中心林保堯教授與筆者執行該普查計畫。對於當時仍屬國內少數推動的鄉鎮規模的無形文化資產普查，委託單位對此計畫推動的期許如下所示：「除了傳統文化空間外，淡水也保有極爲豐富的【無形文化財】，主要包含傳統節慶、民俗活動、匠師工藝技術、民俗曲藝與傳統產業等。在淡水進行區域保存的建構過程中，這些資產將是珍貴文化經驗的內容，無形文化財較有型文化財的消逝速

[19] 同註 2，頁

[20] 江韶瑩《無形文化遺產潛力點調查計畫期中報告》（臺北：財團法人世界宗教博物館發展基金會，2009）。

度更爲驚人，更需要有系統的整體與建構。[21]」雖然我國無形文化保存工作實際執行仍處於起步，不過從淡水古蹟博物館對於淡水地區文化資產所建構的未來藍圖及操作策略，確實令人看到與以往不同的思維。誠如淡水古蹟博物館的構想並兼顧無形文化資產具有的保存意義，該普查計畫的執行方針，即依循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委託單位之設定，針對淡水地區全域的無形文化資產展開田野普查。藉此發掘具地方性、傳統性、傳承性、藝術性等保存價值的無形文化資產，其成果將提予行政部門在進行保存、傳習、推廣之依據，對增進淡水地區文化資源之內涵。一方面，透過無形文化資產課題的深掘，未來再還原到淡水地區整體文化資產視野之下，得以與歷史建築及人文景緻進行區域性、塊狀型態的結合，豐富淡水地區文化資產的內涵。



圖一、淡水地區有形文化財普查計畫



圖二、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

關於「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的執行，在前述的計畫背景及施行緣由之下，自 2008 年 12 月著手展開，爲求區域性普查研究案能夠圓滿達到預期成效，執行單位首先針對「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之名呈現的幾個概念展開定義。根據該計畫名稱，我們可解構出「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這幾個主要的詞彙。「淡水地區」一詞屬於本普查計畫的區域設定，當然「淡水地區」並非行政區域名，地區爲抽象性的文化概念，因此引起兩種不同的思考。究竟所謂的淡水地區是否等同於行政區域的淡水鎮，或者指得是民間長久以來泛稱的淡水地區。委託單位在工作說明書上，採用「包括淡水、竹圍地區河口與山區地帶」等文字進行界定，因考量到淡水境內部分無形文化資產具有跨行政區域的情形。不過一方面也留意到委託單位賦予普查案的目的性，以及曖昧不明的普查範圍將影響到田野普查執行效能及成果的呈現，因此採以行政區爲軸心，周邊相關區域爲輔的執行策略。再者，「無形文化資產」爲本普查計畫之研究對象，作爲文資法行政框架之下的普查作業，本計畫即依據委託單位的操作設定，採文資法中的「傳統藝術」與「民俗及其有關文物」的概念，同時爲利於往後委託單

[21] 參照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編〈「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工作說明書〉（臺北：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08）。

位未來在保存、維護、研究及教育推廣運用之便利性，全程普查採用文資法制式的普查表格。最後，就計畫名稱中的「普查」一詞而言，以清楚表明本研究案的性質特徵，盡可能達到廣泛收集之調查，而非專題型態的個案調查研究。所以普查執行的範圍設定，只要滿足「淡水地區」與「無形文化資產」這兩個範疇的事物，皆爲本普查計畫的重要對象。

以下針對本普查計畫案執行內容及其輪廓略做說明，以利於對執行內容及衍生議題的討論。本普查計畫在研究人員培訓與任務編組完成下，首先著手與普查區域及對象的相關基礎文獻收集，同時拜訪在地文史研究者、村里長、耆老等人士，廣蒐相關田野訊息及地方知識。接著開始進入普查區域做初步的環境探勘，並確認重要普查經營據點。地域性普查對於外來的研究者而言，除了透過有限的研究文獻及相關資料理解在地文化知識之外，尋求當地文史研究者及村里長等管道的協助，將可加速對於普查區域的理解並取得第一手的田野訊息，本普查研究案執行過程受多位文史研究者的指導及協助，爲整體普查工作帶來質與量的提升。在基礎資料及田野環境逐步掌握下，齊頭展開傳統工藝美術、傳統造型藝術，以及民俗及其相關文物三大類型的普查作業，一方面配合著各文化資產的特質，分別採行點狀型態的個案普查，並搭配時令歲時的線狀型態普查，以及有助於提升普查完整性的區域面狀型態的普查，透過淡水鎮各村里行政區爲基準，逐步分區完成各村里範圍的無形文化資產清查。在歷時十一個月的執行時程，完成淡水市街及周邊聚落傳統文化脈絡之下的傳統藝術及民俗文化的普查，將文化資產保存現況，透過文字描述、表格登錄及影像拍攝等形式，共完成八十八項無形文化資產的建檔及相關資料的記錄[22]。同時也針對普查對象篩選出符合文資法精神並具發展潛力的無形文化資產（圖三），針對淡水古蹟博物館提出的擴大區域性文化資產的保存架構，提供相關理論與實務的建議。期許能成爲日後推動文化資產指定、登錄、維護及振興地方文化、開發文化資源之參考依據。

（2）普查所見的現況及其特徵

究竟分布於淡水地區的無形文化資產現狀如何，在本普查計畫案執行中，透過直接觀察法，問卷調查法、深度訪談法等田野調查方式爲基礎，針對無形文化資產的現況及內涵進行觀察記錄。以下將對於各無形文化資產的現存狀態呈現的各種現象及問題，藉由文化資產保存的行政執行的視野及民俗學的觀點兩方展開探討。首先以隸屬傳統藝術的傳統工藝美術類型而言，普查對象的選擇參照文資法對傳統工藝美術範圍的界定，並盡可能廣納淡水地區具相關技術的人選，經過普查過程針對個普查對象的性質與屬性做初步評估篩選之下，共完成十一位傳承者的普查記錄列冊。在本計畫登錄的這十一位淡水地區現存傳統工藝美術傳承者中，大致仍持續相關行業的製作，不過在實地訪查與觀察中，可見近幾年傳統工藝美術產品在需求市場減少，以及成本、人工等考量之下，多數呈現產業外移，

[22] 林保堯、林承緯《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成果報告書》（臺北：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2009）。

或是外國廉價產品傾銷帶來的衝擊。面對如此的社會情境，多位傳統工藝美術傳承者即使能夠勉強餬口維生，不過一身技能卻少有發揮的機會。因此，傳承者對對工作的態度目前多半抱持有工作就做，沒有就休息的消極作爲。各項傳統工藝美術技能對於這些傳承者來說，以從過去的主業轉變爲副業，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實在難以再去談傳承的可能性。

在普查工作所意識到的傳統工藝美術現存狀態中，另一個現象在於傳統工藝美術樣貌的變異問題，譬如新式工具、原料、工法的採用，或是例如部分傳統工藝傳承者從原本的自產自銷，演變成半成品加工，甚至以銷售爲主力等情形，間接地喪失文化資產的地方性特質。同時，在面對如此的傳承者是否納入保存對象，這部分也將涉及到文化資產的真實性、完整性等價值判斷。不過以民俗學立場來說，這些持續被傳承者吸納成爲生產元素或交易物件的事物，反映出了這個時代的需求及背後的價值。除此之外，這些文化資產在外顯特徵的變異之下，應該還有部分持續傳承延續的文化元素，可透過更縝密的分析探索取得傳承脈絡。本次普查以文建會制訂的普查表格爲依歸，對於現存傳承者的歷史源流、技能特色、學藝過程、代表作等類項進行記錄。如此內容的普查事實上只適用於文化資產初步列管建檔之用，特別是對於彩繪莊武男、土水李自然等地方代表性的工藝傳承者，實有必要進行更細緻詳實的調查記錄，以做爲往後傳承復興該技藝，甚至作爲未來重新復興、復原無形文化資產的重要參考依據。

至於「傳統表演藝術」的普查所見，就以北管爲例，根據相關文獻記錄顯示，淡水自日治時代起即呈現蓬勃發展的景象，近年來在社會環境、生活型態、價值取向等因素的影響下，傳統依附於一般民眾所傳承的「子弟軒社」形態，隨著成員的老成凋謝及年輕新血的缺乏，後繼無人漸趨消散的情景隨處可見。不過像曾一度陷入傳承危機「南北軒」，在地方人士對於文化傳承重視之下，年輕新成員的加入及傳承活動的持續，讓成立於1917年的老軒社提升復甦活力，並於2010年8月1日再度登台復演。相較之下，淡水地區另一著名傳統子弟軒社和義軒，則面臨後繼無人的傳承危機，對於面臨衰滅危機的無形文化資產，即刻透過文化資產保存機制進行系統性的記錄，相信將原比導入外力勉強維持其傳承運作來的重要。相對於傳統以子軒社傳承的北管活動，淡水山區呈現的是另一種經營型態，這類型的北管團體保持傳統以社里爲中心的構成模式，成員多來自於各社區居民，利用閒暇學習北管技藝以應付庄頭紅白事所需。同時也開始應邀到外地出陣，性質上已脫離傳統子弟軒社的色彩，但是此狀不論對於北管這個傳統樂種的延續，或是各社里庄頭的凝聚而言，皆發揮良性的力量。此外，諸如屯山社區北管陣、行忠社區北管陣、玄樂社、國隆社、霓裳社等北管團體的技藝，多數傳承自淡水本地資深北管藝師李三有，因此，當我們從傳承來源所保有的地方性而論，亦凸顯這些傳統音樂傳統團體的可貴。



圖三、淡水鎮無形文化資產普查潛力地圖（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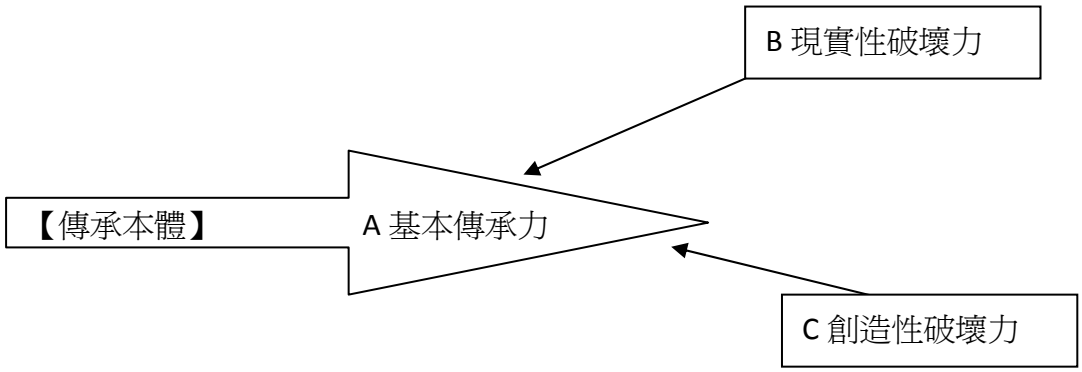
最後談「民俗及有關文物」類型的普查現況所得。關於民俗及有關文物的部分，文資法將之細分節慶、信仰、風俗及其他四個部分，共完成四十六項無形文化資產的普查列冊記錄，以數量而言主要集中於信仰與其他兩項。誠如「傳統工藝美術」及「傳統造型藝術」所見的現況一樣，民俗文化同樣伴隨社會型態、生活模式等因素，造成多數傳統元素及內涵產生明顯的改變，不過仍能從一些現象表徵中看到民俗文化的基礎表徵。以信仰而言，從普查所得顯示都市化對於民俗文化的衝擊，這可從淡水地區多數具特殊性、地方性之民俗文化多數保存於市街之外的情況來印證。舉例來說，沙崙保安廟登刀梯過火祭典、八庄大道公輪值祭典、油車口忠義廟王船祭典，以及至今仍持續傳承於淡水近郊一帶的插土地公金等民俗活動皆相當具特色[23]。反觀市街區域所傳承的民俗文化，基本上存在的特殊性與地方性較爲稀薄，就以福佑宮及祖師廟歷年舉行的繞境活動而言，確實在這兩場大型廟會活動中仍令人感受到傳統、地方或是民俗的色彩，不過若仔細檢視其參與者成分，將可發現在地民眾參與比例逐年降低。一方面，各種非在地、人爲造作的力量卻不斷地增生入侵，再加上鄉土文化長期所受的污名化，讓這些無形文化資產的傳承發展遭逢難題。雖然民俗學是將民俗文化順應時代、環境等因素所產生的消融變化視爲常態，不過如果這些變因來自與非自然、極端性或是在短時間下所生成的變異，如何透過文化資產保存機制提出有利對民俗文化持續傳承發展的方策，將是從事民俗研究者認同並須積極參與投入的。

[23] 同註 22，頁 238-279。

四、民俗文化的傳承與變容

（1）文化資產的生成與消滅：一個方法論的提出

普查研究爲發掘探究各地現存文化資產必要的工作，特別是對於無形文化資產來說，唯有透過定期性的探查追蹤，才能掌握文化資產傳承發展的完整面貌。前章以筆者參與的「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執行所見爲具體事例，對於無形文化資產的樣貌及衍生的幾個問題進行初步探討，本章節將持續針對無形文化資產動態變化下所呈現的生成及消滅等文化傳衍過程，以及其背後所呈現的本質性議題進行統整解析，試圖深化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學理基礎。作爲守護文化資產機制的文資法，相信若能充分掌握文化的發展軌跡及形態，將有利於保存、活用機制達到的實際成效。論及無形文化資產的傳承形態，基本上所呈現的是動態、變動的模式，即使傳承過程受某些既定規範、限制所約束，在傳承孕育而生的內涵上仍存在部分的變異。向來對於文化發展的結構及意義，各學科皆有不同的詮釋與解讀，民俗學者新谷尚紀將民俗文化的傳承作用歸咎於三股力量消長對峙的結果，分別爲延續傳承之力、阻擾傳承延續之力及改變創造傳承之力[24]。筆者延續新谷尚紀對於傳承構造的剖析，嘗試將之發展成解明無形文化資產傳承脈絡的一種方法論述（參照圖四說明）。



圖四、無形文化資產（民俗文化）傳承與變遷的三股作用力

在無形文化資產呈現的動態發展途徑之中，首先，那股維持著無形文化資產原有形貌（傳承本體），使之在不受任何外力影響下展開傳承推移的力量，可謂無形文化的「基本傳承力 A」。相對之下，導致這股既有的基本傳承力量遭受影響、阻礙，並造成該文化必須爲順應時代、社會、環境、地域等條件，進行調整

[24] 新谷尚紀《柳田民俗学の継承と発展―その視点と方法》（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 98）。關於傳承概念理論的考察，參照：大月隆寬〈常民・民俗・伝承――開かれた民俗学へ向けての理論的考察②〉（《常民文化》9、1986、頁 23-41）。平山和彦〈伝承の構造と機能〉（《福岡教育大学紀要 社会科編》36、1986、頁 95-103）。

的對峙之力，可視爲一種反傳承的作用力。這股力量可根據性質特徵再細分爲二：其一屬於人爲、造作、變革、主動、非自然性格的力量，稱爲「B 創造性破壞力」。以淡水地區所見的廟會繞境元素爲例，暫且先不談北管、神將、龍獅陣等傳統陣頭，我們可發現大約九〇年代起「蜈蚣鼓（圖五）」、「官將首（圖六）」、「拋灑高錢（圖七）」充塞於各廟會，但是在不到幾年的時間內，卻換成「弄破鼎【轎前鑼鼓】（圖八）」、「電音三太子（圖九）」、「辣炮（圖十）」攻佔街頭。上述所列舉的幾類廟會中的陣頭，從興起、流行至衰退皆在短時間內發生，爲特定人或事件所賦予操作下所形成的結果，可視爲改變傳承本體的創造性破壞力。另一股相對於無形文化基本傳承力者，是具備非人爲、演化、沿襲、被動、自然性格的力量，將之稱爲「C 現實性破壞力」。舉例來說，今日淡水地區的北管團體多數在社會型態及環境等因素衝擊下衍生出多種不同的現存狀態，如傳統地方子弟形態的參與者減少，促使女性或是非在地人士的加入，或像是麥克風、擴大器等電子設備導入，改變傳承演奏時的音響效果及樂器比例。這些變化同樣阻擾改變了傳承本體固有的形態風貌，不過對傳承本身的無形文化資產帶來的破壞性較弱，文化資產在現實性破壞力的作用下，透過部分元素的順應妥協獲取持續傳承的可能。綜合上述的方法論述鋪陳，將無形文化資產的傳承結構簡約成三股力量對峙消長來進行分析的手法，或許無法全面性的關照到文化傳衍各階段的變化，不過對於解析動態的、多元的無形文化資產發展，進而達到深化無形文化資產研究與方法論的確立，筆者以爲該方法論述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接著即以淡水大拜拜爲事例，從這三股力量的角度來解析說明。



圖五、蜈蚣鼓



圖六、官將首



圖七、拋灑高錢



圖八、弄破鼎（轎前鑼鼓）



圖九、電音三太子



圖十、辣炮

（2）無形文化資產的資產化過程

每逢農曆五月初五，當全國多數民眾正度過充滿粽子、龍舟、雄黃、艾草等節日元素的端午之際，此時的淡水人正著手爲夜晚及明日的祭典做準備。對於多數的淡水人而言，瀰漫於市街巷道的鞭炮鼓樂聲響，相信比粽子、龍舟或是雄黃來的深刻。今日俗稱的「淡水大拜拜」，也就是清水巖祖師廟祭典繞境活動，雖然至今對祭典源起之說仍眾說紛紜[25]，不過至少可確定的是祖師廟繞境活動起源應早在大正四年（1915）以前。該繞境活動分成兩天進行，農曆五月初五晚上舉行暗訪，隔天則進行繞境，從大正年間至今幾乎無中斷年年持續辦理，歷年參與陣頭隊伍囊括淡水地區各大寺廟。如此具備傳承性、地方性等特質，可視爲讓這項宗教活動從清水巖祖師廟祭典遶境，凝聚成淡水地區最大宗教盛事的主因[26]。當然祭典緣起孕育出這項文化資產的出現，不論是爲了除瘟禳災、慶祝祖師得道，或只是淡水人爲了擁有盛大祭典活動等理由[27]，當一項祭典活動產生之後，如何讓傳承本體的清水巖祖師廟祭典繞境得以傳承百年，這股推動作用的力量即爲該無形文化資產的基本傳承力。這股力量由宗教信仰、地方意識積累孕育而成，在歷史傳衍中構築出該文化的基礎模式與形態，藉由傳承者、傳統團體透過某些行爲模式的實踐把祭典的意識傳承延續。

做爲淡水地區代表性無形文化資產的祖師廟祭典繞境，我們可見該傳承本體在基本傳承力的作用下，讓每年農曆五月初五、初六成爲淡水人的重要節日，不過可想而知的是祭典繞境的內容，在百年來將不斷隨著當時主客觀因素而產生變異。舉例來說，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對於昭和初年淡水大拜拜的描述，可知當年繞境的盛況。當時參與的團體有米商團、屠商團、作業團、木匠商等組織，這些團體爲了爭奪繞境評選比賽名次，除了邀請本地鑼鼓陣、藝閣等陣頭投入繞境活動之外，還向台北、桃園等地招聘樂班、演員。如此景象在近年來廟會遶境中仍可見，只不過今日多數邀請外地陣頭參與繞境的動機與性質與當時相距甚遠。過去淡水本地各寺廟或宗教組織皆各自擁有陣頭，向外地聘請陣頭屬於非常態性，只是爲了強化陣頭豐富性進而贏得評選的手段。這幾十年來，隨著本地各項陣頭的參與者減少，讓不少具地方特質的技藝失去傳承管道。只不過每年五月的祭典繞境依舊舉行，因此，多數團體唯有仰賴外地或非原傳承文脈下的人群來維持繞境活動[28]，如此造成文化傳承本體構造的翻轉，即在於基本傳承力抵擋不了創造

[25] 對於遶境活動緣起詳細的討論，可參照彭美琴〈淡水人的年度盛事—清水祖師遶境活動〉《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集刊》1 期，2006，頁 249-252。

[26] 論及淡水大拜拜及淡水地區清水祖師信仰的特殊性，張建隆於《尋找老淡水》一書中指出「臺灣全島主祀清水祖師之廟宇約有一百座，但很少像淡水舉行如此盛大的廟會；既無【暗訪】儀式，也不在五月初六舉行（通常都在正月初六祖師誕辰日）。事實上，淡水清水巖所供奉的蓬萊老祖（落鼻祖師），有別於他廟的清水祖師，而且其傳說故事，極具地方特性，並早以溶入小鎮的生活史中。」參照張建隆《尋找老淡水》（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 86。

[27] 同註 25，頁 250。

[28] 關於近年淡水大拜拜的景象，近期於《文化淡水社區報》，有段極為生動的描述：「觀察今年

性破壞力的作用。這些外來陣頭將各自的形式風格帶到淡水，在本地傳統陣頭傳承式微之際，極容易加速地方特色的消逝。以「發揚多元文化」做爲法令精神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意識而言，諸如臨時性來自於外地的陣頭，或是過多人爲因素所產生的改變，皆不利於無形文化資產追求的「真實性」、「完整性」，同時更容易成爲削弱地方性及文化多元面貌的一大主因。



圖十一、蓬萊老祖神轎車與隨香信眾


圖十二、蓬萊二祖神轎

一方面，在淡水五月祭典繞境中，另一股壓制基本傳承力的現實性破壞力同樣也造成傳承內涵的改變。例如三十多年前該祭典繞境的蓬萊老祖轎班是以淡水火車站苦力工人組成，蓬萊大祖會轎班則由計程車公會組成，蓬萊二祖會轎班爲小貨車公會組成[29]。在時空環境及生活型態等因素的變遷下，各轎班組織從原先行業公會型態轉變成蓬萊大祖會、蓬萊二祖會等近似神明會的形態。同樣的，傳統採徒步抬轎的方式也演變成神轎車隊，而繞境活動中不論是陣頭或是隨香，過去普遍的全程徒步已不多見，這些變化隨著時間推移一步步侵蝕祭典傳統的形貌。當然，正如民俗學對於文化傳統所抱持立場，各種民俗文化皆存在於動態發展之中，生成、流行、變容、消滅等作用都是可能的狀態。做爲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淡水大拜拜，我們所需要的並非造作的保存，當然也不該採自然放任的態度以對。唯有針對該無形文化資產內涵特徵，進行更深入的探索理解，思考有利於該文化發展的作法對策，才是最理想的文化資產保存措施。筆者以爲對於即將消逝的陣頭或是民俗內涵，應立即進行精密的調查與記錄，以作爲未來「再復興」時的重要傳承參考依據。再者，對於目前依舊持續運作的陣頭或儀式，應進行活化及支援的工作，促使該技藝、文化能夠持續傳承，維持地方固有的特色及多元性。最後，對於傳承本體也就是淡水清水巖祖師廟祭典繞境活動而言，著手於活化及資源化是有必要的。特別是所謂「資源化[30]」這個課題，或許我們可以重新來思考，將淡水大拜拜這個民俗文化做爲淡水地區的無形文化資產，究竟具有甚麼意義?

的遶境活動，陣頭雖多，但同質性高，部分路段隊伍間隔太長，中斷許久，使得有些民眾覺得不若以往精彩」，參照戴瑞君〈祖師公五月初五暗訪、初六遶境〉《文化淡水社區報》126，4 版。

[29] 戴寶村編《淡水鎮志》(2006，未刊稿)。

[30] 岩本通弥〈ふるさと資源化と民俗学・序文〉《ふるさと資源化と民俗学》(岩本通弥編，東京：吉川弘文館　2007)，頁 4-5。菅豊〈在地社会における資源をめぐる安全管理—過去から未来へ向けて—〉《環境—完全という価値は》(松永澄夫編，東京：東信堂 2005)，頁 70-74。

再者，我們該如何有效利用這項資產的價值?這兩個問題。

近來民俗文化在發展上面臨空前危機，除了這幾十年來隨著生活型態、社會環境及產業結構改變，讓過去做爲民俗文化發展根基的傳統地域社會面臨瓦解，而八〇年代起席捲全國各地的全球化浪潮，亦導致傳統文化及地方色彩面臨岌岌可危的命運[31]。一方面，都會地區的過密化以及農漁村的過疏化現象，加上少子化問題日益惡化，皆爲傳統文化的未來投下一顆震撼彈。在此情況之下，保存無形文化資產成爲當代重要的議題，不過，這些被作爲保存對象的無形文化資產，到底具有何價值? 相信有不少人會以文化的傳統性、歷史性、特殊性或是稀有性等爲理由，說明保存文化資產對於人類社會具有的貢獻，甚至還被作爲說明文化資產比其他文化更爲優越的理由。舉例來說，「傳統性」與「歷史性」在《文資法》中被視爲民俗及有關文物的登錄基準，在〈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二條中，更明確定義無形文化資產的審查標準，所謂的「傳統性」: 指具有古昔生活傳承，風俗形成與發展者。「歷史性」: 由歷史事件形成，具有紀念性意義者[32]。從法令文字中可見對擁有古老歷史的文化的評價，當時也間接地反映出對新文化的態度，不過在現實生活之中，就因不斷有新文化的產生，才得以營造出豐富多元的文化表徵。況且所有具歷史性的文化實際上都經歷過這樣的創造過程[33]，藉此可見將「傳統性」與「歷史性」視爲詮釋文化價值似乎在邏輯上出現問題。再者，若把「特殊性」視爲無形文化資產的價值，依舊存在著若干議論的空間，確實現今的無形文化資產在遭逢全球化浪潮帶來的文化均質效應下，特殊性成爲了一項價值。只不過任何一種無形文化資產皆是在不同的時代、環境、地域條件下所孕育，因此相當難以找到完全一致的文化，也就是說特殊性可謂所有無形文化資產，甚至所有文化現象所共有的特徵，所以將「特殊性」視爲無形文化資產的價值，在邏輯論證上也並非周全。

如此說來無形文化資產的價值爲何? 對於淡水而言，作爲無形文化資產的淡水大拜拜可成爲活化區域與重整生活秩序的珍貴資產，藉由祭典活動定期的舉行，將在地的傳統代代延續，爲在地居民帶來一股心靈安頓與安心感。一方面，亦可透過這項極具代表性的活動，提升淡水居民對於家鄉的認同感，做爲樹立地方意識重要的標的，可視爲精神層次上的價值。再者，在經濟層面的實質價值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力量，當各地保有的文化在上述的多重危機衝擊，紛紛失去具地方特色與代表性的無形文化資產之際，淡水若能夠將五月祭典這項資產善加活用，使之成爲具豐富地方色彩與歷史意義的祭典活動，相信可吸引眾多外來觀光客，爲淡水當地帶來更多的人潮。除了可帶動商機之外，眾多人潮參與的現象對祭典參與者而言，將可促進「活化」的效應，特別是帶給參與者及在地民眾的成就感、自信心，可視爲該無形文化資產對於傳承地最大的一種回饋。當然，作爲一種資

[31] 長谷川嘉和〈無形の民俗の保護をめぐって〉《日本民俗学》257 期，2009，頁 136-137。
[32] 同註 15，頁 5 之 27。
[33] 管豐著、陳志勤譯〈何謂非無質文化遺產的價值〉《文化遺產》2009 年第 2 期，頁 106。

源的無形文化資產，雖然在利用上並沒有像石油、煤炭、水等自然資源般的減損性(subtractability)，但是若不加以妥善規劃，頻繁地消費、利用於觀光或地方振興等事業的話，將嚴重損耗無形文化資產的內涵。以文化資產保存的立場而言，文化資產的應用需考慮到「延續性」的問題，如何延續並提高資源化的民俗文化，相信藉由適當的資源管理讓資產保有適當的稀有性、奇特性及地方性，將可提升該無形文化資產的能量。除了維持既有的資源內涵之外，還須針對該資產的內涵進行淬鍊及開發的工作，例如喚起在地民眾重新投入祭典邊境的行列，或是強化淡水大拜拜自有的地方特色。屏除過多非淡水地方色彩的入侵，亦可藉由過去的史料記錄讓已消失的民俗文化達到再現、復活的可能，這些都是無形文化資產作爲一種被活用、保存、傳承、利用的資源得以應用拓展的可能。

五、結 語

無形文化資產爲常民生活的產物，先民世代傳承的智慧結晶，在社會變遷及時空轉換的背景中，這些過去宛如理所當然般存於土地上的文化現象及表徵，今日被視爲一種具價值的資產，該如何妥善加以有效維護、利用、保存、傳承等課題，成爲無形文化資產研究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本研究以民俗學視野下的無形文化資產作爲初步研究對象，首先藉由國內無形文化資產政策的發展歷程及現況的梳理，解析法令背後的精神意涵及執行架構於各時代背景下所具有的意義。接著由民俗學的學科視野來討論站在學科研究與行政執行層面上可能產生的衝突與對立，透過民俗學對於民俗文化本質及傳承之詮釋，說明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理論及實踐做法下，文化資產可能面臨的「價值」及「變異」等議題，呈現出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及經營管理具有的獨特性。接著以 2009 年所實施的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的實際操作經驗作爲探討核心，凸顯文化資產保存法令與實際執行上所遭逢的幾個問題。對於掌握區域現存文化資產最有效的普查作業而言，相較於有形文化資產具一定空間及形體的特質，無形文化資產的非物質性、暫時性及不定時性等特徵，加深掌握無形文化資產內涵的難度。因此，爲提升區域型態的無形文化資產普查的完整性，長時間、持續性的追蹤普查有其必要，反觀目前常見的年度性普查作業形態，實難以全面性掌握無形文化資產的全貌。最後，持續以 2009 年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執行所見爲例，針對無形文化資產動態變化下所呈現的生成及消滅等文化傳衍歷程，以「基本傳承力」、「創造性破壞力」「現實性破壞力」這三股力量的對峙消長來做解析，嘗試以民俗學對民俗文化傳承結構的獨特方法論述，具體解析淡水地區民俗文化呈現的變遷過程及其特徵。再以淡水最具代表性的五月淡水大拜拜爲具體事例，論述該民俗活動在作爲一個被活用、保存、傳承及利用下的地方資源可能遭逢的問題。事實上，無形文化資產的論理性探索才剛開始，雖然近來全國各地不斷浮現出各種不同性質與特徵的文化資產。不過，究竟什麼樣的無形文化資產值得我們來保護，地域性的文化資產的資產化過程，是否將影響甚至危害到各區域文化生態發展之平衡，這些留下來的課題值得日後持續加以關注。

淡水中正路老街行爲場域與環境意義

劉綺文*

摘要

淡水中正路老街在北台灣發展過程中具重要歷史地位，直至 1980 年代更是淡水地區長年來主要行政、金融與商業中心。隨著大淡水地區整體環境發展與捷運通車使淡水老街面臨著街道拓寬、建築形式更新、與大量觀光人潮湧入的劇烈環境變遷狀態。本論文根據 1989 和 2010 兩個年度間在中正路老街實際進行田野調查所蒐集資料。研究主要焦點專注於老街中環境行爲場域及系統所呈現之社會空間與環境意義關係。觀光發展後之淡水老街不但在行爲場域支應量上呈現將近兩倍的增加，同時觀光消費性質場域取代社區日常生活場域。在地生活場域萎縮與觀光場域興起改變了中正路老街所再現的社會空間關係與環境意義。老街中所發現的行爲場域形式和時空運作模式比較呈現公共領域使用內容與流動性的差異。過去歷史長年累積的環境線索及所傳達集體行爲共識已被大量環境符號拼貼以及行政體系主導的社會限縮控制取代。在大量去地方化觀光消費與激烈商業競爭中，歷史是一種在建成環境、商家、與觀光客交互運作過程裡無中生有的創造和拼湊。

* 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中正路老街與研究背景

滬尾是北台灣近四百年歷史發展過程中重要聚落，中正路老街兩百年來亦是八里、三芝、石門、與淡水四鄉鎮的中樞，具有行政、金融、宗教、與商業中心的重要地位。根據記載，中正路老街昔稱滬尾街、下街、或淡水街；它的發展可溯及清嘉慶年間（1796 至 1820）以福佑宮至現今淡水信用合作社前公館巷之公館口段爲起始;向東至現今的公明街發展爲東興街(意指東側新興市街)，往西到現在新生街口爲新店（意指新的市街）。日治時代日人將滬尾街改名爲淡水街，並於 1929 年開始進行市區改正將中正路老街推向現代化。1934 年中正路從原來四公尺路面拓寬爲雙向車道兩側各有一百三十公分人行道及下水道的九公尺現代化街道。同時將街屋改建爲二、三層樓房，沿街建築立面更以洋和混合的「昭和式樣」牌樓秀面美化市容（http//www.sanxiecheng.com.tw//tpl-his4.php）。

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以前的中正路承續過去傳統一直是大淡水地區的政治、經濟、宗教、與日常生活的中心。這段時間的中正路，除了做爲淡水社區的主要生活街道，在交通上亦扮演著連結竹圍淡水、淡海、及北海岸區域的重要通路。淡水鎮公所、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總行、淡水信用合作社，合作金庫分行等多家金融機構全部聚集在街上，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日及五月初六清水祖師巖迎神繞境更是主要必經地段。低樓層的連棟街屋中開設多家蔘藥行，金飾及鐘錶店、禮餅舖、綢緞莊、西服訂製行、嫁妝店、擇日算命館、家電五金及雜貨店、碾米舖顯示中正路的商業中心地位。除此之外，清晨菜市場及魚貨中盤批發商聚集成市於街道兩邊也是八零年代中正路街景最強烈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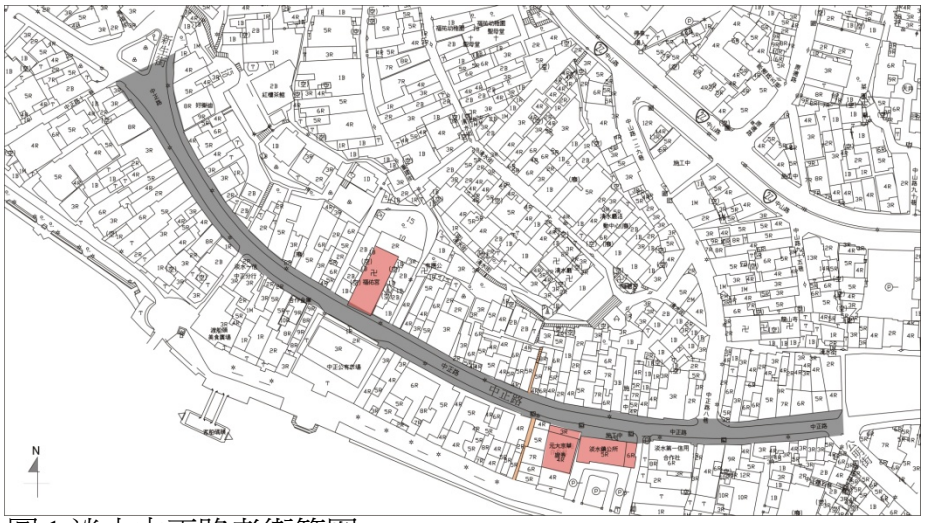


圖 1:淡水中正路老街範圍

隨著人口增加與城鄉發展，淡水地區也面臨著交通抒解的問題。198 年與中正路平行的中山路拓寬爲四線道，公車路線紛紛改道讓中正路頓失交通幹線的重要性。伴隨車潮的減少，接踵而至的是人潮與商機的大量流失。一九八零年

代末期，中正路老街的商業重要性已逐漸被中山路商圈取代，但仍維持著當地傳統社區生活的樣貌。街上最高的建築物爲五層樓的鎮公所和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其餘私有房舍大都爲三層樓以下的街屋。九零年代初期，中正路老街上許多街屋紛已改建爲三或四層新式混凝土建築，來自當地居民對於該地段土地及商業開發壓力也與日遽增。一方面面對著都市開發壓力，而另一方面企圖利用歷史文化保存發展觀光經濟，淡水鎮公所選擇修正 1978 年修訂的中正路拓寬計畫，將原計畫雙向十二公尺車道變更爲目前設有人行道的單相車道街道型態以容納觀光人潮。1997 年淡水線捷運通車至淡水，隔年鎮公所執行都市計畫道路拓寬將中正路改造爲左右各有機車停車格與二到三公尺人行道的十二公尺單向道路。隨著路面拓寬，中正路老街兩側建築更進行全面性改建與新造。爲保持老街歷史特色風貌，鎮公所與在地文化工作者及都市設計專業者大力鼓吹獎勵仿造舊有磚造洋樓語彙的建築立面風格。然而這些獎勵措施仍不敵私人開發偏好與利益，短短兩三年間新建八、九層電梯大樓夾雜出現在四至五樓中層連棟建築中。新舊風格雜陳與高低差距不但改變了過去街道和諧而平緩的街景天際線，同時也取代過去金融行政機構在老街上的至高點。除此之外，有些新建電梯大樓刻意留設三公尺以上的騎樓讓原有中正路道連續街屋景緻與人行空間的經驗大爲不同。

雖然空間尺度與建築形態已不復從前，但由於輝煌的文化歷史背景與淡水觀光旅遊活絡，中正路老街現今仍是觀光客到淡水觀光旅遊的必訪地點之一。老街的角色也從地方金融行政與生活中心蛻變爲台北都會區的觀光據點。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與老街平行的河岸步道對老街地位也形成一些衝擊。河岸步道的完成直接聯結捷運站形成主要觀光路徑，也是許多遊客產生淡水主要印象的空間。這條路徑帶來大量觀光人潮並且誘使旁邊的房舍紛紛將原住宅建築坐向前後翻轉，讓原背面轉換成商店經營的門面。沿河岸建築翻轉及轉型讓中正路老街不再具有獨霸的地點與商機競爭優勢，反而遜於遠離交通塵囂並且風景悠美的河岸步道。老街與河岸步道的主從關係在遊客眼中似乎不再確定，中正路變成爲沿河步道後面的一條商業街。老街的社經地位與地點位置的中心性在觀光發展之中似乎正面臨著重新詮釋的狀態。



圖 1：1989 年淡水老街街景一



圖 2：2010 年淡水老街街景一



圖 3：1989 年淡水老街街景二



圖 4：2010 年淡水老街街景二

三十年來淡水都市與觀光發展促使中正路老街經歷了實質與社會環境形式劇烈變化並且反映在社區居民人口變化中。中正路老街涵蓋了民安里和部分草東里，近二十年來居民呈現了逐漸減少的趨勢。民安里人口數從 1989 年 1292 人，1999 年 980 人，減至 2010 年 925 人；草東里亦呈現類似的趨勢從 1989 年 1633 人，1999 年 1125 人減至 2010 年 893 人。換言之，中正路老街在地居民近二十年從 2925 人縮減為 1818 人，減少超過一千人佔總人口數三分之一。現今民安與草東二里人口年齡結構分佈以二十歲以下未成年者佔 18.15%，六十歲以上居民佔 20.74%，而 61.22%的居民則由二十至六十歲的青、中、壯年人口均勻組成（淡水鎮戶政事務所，2000）。由此可以推論目前中正路老街當地社區正逐漸縮小，但居民人口組成仍然維持著混合世代而非老年化的社區結構。又淡水文教基金會 2008 年對中正路老街店家調查發現十五年以上的店家只佔 29.5%多為淡水知名產物及在地服務產業，七成的店家則在中正路拓寬觀光興起之後才開業。超過二成的店家為連鎖經營性質，如麥當勞、屈臣氏、好樂迪 KTV、7—11 便利商店等。由產權所有者自營店家只佔四分之一，其他皆為租賃（ http//www.tamsui.org.tw//115-4.html）。老街目前雖然充斥著觀光活動行為但它對當地日常生活支應角色與社會空間定位如何乃值得關注。

本文目的不在討論淡水中正路老街的歷史發展沿革，而是針對中正路老街作為一個整體環境隨著使用者認知與實踐所組成不同場域系統，生產並衍生出不同的社會空間經驗。筆者於 1988 至 1989 年間進行中正路老街行為場域調查以瞭解街道環境所支應的活動與社區生活（Liu 1994）。調查所發現的行為場域九成以上都屬重複發生的在地生活類型，街道實際上是工作、購物、飲食、宗教儀式與私人服務的空間，並且具有社區公共與私人領域串連的重要意義。街道中固定環境元素具有高度傳達場域邊界與預期行為訊息的溝通角色，顯示居民對於環境元素解讀與約定俗成的行為規範具高度共識。淡水老街經由使用者對於環境線索與空間再現的解讀實際上呈現多重的社會空間。街道等寬的實質線性空間實際上並非都市規劃者預設之均質空間，它們其實藉由時間與空間組織包容不同活動與社會溝通互動發生。林聖隆（2002）於 2000 年底至 2001 年初以

相同方法對中正路老街進行場域調查，發現透過規律性輪用和集市機制讓在地生活與觀光活動相互保持平衡共存的韻律。林氏認爲觀光活動進駐並未對於在地日常生活有所排擠。觀光活動性質場域表面上看來數目龐大但多爲短暫臨時性質，反而在地生活場域的穩定性及時間延續性遠大於前者。故此林氏認爲常態性在地生活場域才是型塑老街特質的主力。這似乎顯示中正路老街在拓寬完成之時仍然延續著長年來的社會場域。然而林氏所調查時間在中正路拓寬完工後立即進行，許多店家與小販正處重新洗牌青黃不接狀態，因此觀察所發現的街道活動場域並未飽同時也難以判斷其間的代表性。經過近十年的轉變，拓寬改建後的老街所支應之在地生活與觀光活動是否重新改寫環境的社會與歷史意義因此值得重新探討。藉由前後間隔二十年所記錄環境與行爲場域系統的比較亦可做爲淡水老街歷時性變遷的見證。

本文主要根據 1989 與 2010 年兩次田野調查工作。中正路老街調查範圍東起公明街西至新生街口，總共距離爲 452.6 公尺。調查對象爲街道公共空間中可以直接目擊的行爲場域，包括開放式店面、可動性（例如攤販買賣，商家卸貨及置物，行人停留聊天）與固定性場域（例如路邊公共停車，公車站，公共電話，住宅信箱及對講機）。街道中所觀察行爲場域記錄除了場域活動內容及屬性，運作時間與規律之外，並則以 1/200 比例行爲地圖紀錄作爲後續街道空間組織分析基礎。

環境組織與行爲場域系統

人作爲社會動物在環境中的行爲舉止經常必須與周遭相互配形成一種和諧狀態合而非全然個人零散或任意的表現。社會學有些理論雖強調社會行爲與實質、抽象和社會空間三者交互運作的重要性，但是對於空間的紀錄描述卻一直缺乏實質空間的具象尺度概念。建築與環境設計專業者卻又把空間視爲絕對的幾何空間而沒有意義與社會關係的考量。行爲場域理論強調人的行爲與環境是一個相互依賴的整體更是一套有系統的結構。環境不應以單一心理、社會、或物質空間現象視之但爲這三者的整合體。環境是由大小不同的單元所組成，而其中最小的基本單元稱做行爲場域（Barker 1968；Schoggen 1989；Heft 2001）。行爲場域是一種由清楚時間與地理空間範圍與其中用以支應重複行爲模式物件共同組成的完整單元。它的定義並不根據特定建築與空間物件型態或特定角色及社會行爲模式而是根據這些因素的共同組成的整合體。換言之，行爲場域是由人、事、時、地、物所共同組成一種具有持續性而且有組織可辨識的環境單元。一個行爲場域的運作需要所有參與者各司其職並在行爲模式上相互配合有如進行著持續的節目或計畫（program）。人們進入一個行爲場域通常會改變之前行爲模式以配合正在進行的節目計畫。持續的節目計畫進行也讓一個行爲場域不受個別參與者更迭而有所改變，例如公車站、路邊攤、電影院等。

如同個人無法獨立於社會，環境中的行爲場域並非各自獨立存在個體但牽涉相互關連與組織關係。相互關連的行爲場域共同組成周遭環境，進而更形成整體大環境。個別場域的改變影響著大環境的組織，反之大環境的變革也影響個別場域運作的可能與狀態。場域和環境處於一種有秩序和組織的相互依存互動關係。環境中的行爲場域提供了清楚的時間空間範籌與支應物讓生活中的活動得以實踐。環境中的行爲場域因此提供人們行爲與社會實踐和互動的機會。空間與物件因此絕非純然實質的構成，但卻對其創者及使用者具有重要性和關連性。環境本身具有高度結構組織性將空間、時間、人、物、與意義編組成不同單元讓所社會活動與行爲得以發生。環境具有物質性可以視爲社會結構及文化意義系統有形可見的反映。環境組織牽涉分類整理步驟將之歸入文化所界定的類項及認知範疇（Liu 1994）。Barker 和他的同儕(1973，1978)認爲想要瞭解一群人如何生活可藉由社區環境中行爲場域的觀察得知該環境所提供的活動豐富性與社會交流互動機會。透過行爲場域的分類與計量可以得知一個環境能夠提供居民活動種類的豐富性和瞭解他們的社會關係與互動模式。

Rapoport（1977，1990，2005）從建成環境與活動關連性中進一步提出行爲場域系統概念。社會活動的時間、地點、秩序、意義及其相互關連性都受到社會中的活動系統組織所影響。活動系統在清楚的時間和空間範疇中被組織起來，其所形成的網絡在實質環境中可清楚被看見和瞭解。行爲場域統的作用就是讓這些活動系統得到實際支應，並且可以在相同時間和空間範疇中持續不斷運作。類似的個別行爲場域往往在不同的環境中可被發現，但是它們彼此的時間和空間組織關係卻未必再現相同的認知和社會實踐。類似的環境形態相同的也未必呈現相同的社會文化意義端視其中活動與行爲場域系統組織與脈絡關係。行爲場域與其所組成的場域系統是一種具有再現社會文化性質實質環境單元組織，藉由行爲場域內容及行爲場域系統組織方式的發現與分析可以幫助瞭解一個文化中人們如何組織及詮釋環境對他們所具有的意義。Rapoport 更認爲建成環境具有向人們提供訊息的提醒功能，透過環境中的固定、半固定、與非固定要素物件向人們傳達身處場合及適當行爲的資訊。建成環境因此可被視爲一種非語言性溝通。使用者對於環境訊息瞭解共識與持續遵從可導致該環境運作穩定並避免社會衝突。做爲環境中最基本單元，行爲場域透過持續進行的行爲模式和相互配合的支應物件實際上具有向人傳達社會場合與預期行爲的溝通作用。

既然環境行爲場域和系統反映著一個環境被組織與使用的內容和模式，環境變遷因此可以從相同環境在不同時間歷程所發現的行爲場域及系統比較中看出端倪。相同環境在時間歷程的變遷不但反映於場域計畫內容及數量，參與者特性，與場域運作維持模式。行爲場域在時間及空間範疇中的分佈和彼此間相互關係亦展現整體環境組織規則。此外各自場域中相關支應物件配置與環境固定、半固定、非固定元素線索內容及組織上的變異更可用以推斷詮釋行爲場域在表面計畫內容之外潛藏企圖與社會意義的轉變。

文化社會與現代建成環境

環境並非只是一種空間容器容納隨意發生的行爲。人們根據文化意義系統及方案進行環境形塑、組織、與修正讓社會互動與交流得以發生並使群體的特定生活方式得到支應。建成環境除了是一種感官的實質空間之外也是一種文化的場域隱含了人們所賦予的認知。建成環境也是一種實質存住與經驗的空間（lived，experienced space）（Lefebvre，1996），它提供了立即身體經驗結合想像與實質空間並讓抽象的文化社會概念及註解給予可見的向度。建成環境經由人們刻意規劃設計建造，並在時間過程中不斷被修正以符合使用者的想像及實踐，可被視爲文化的產物。然而人在生活實踐過程中經常受到周遭環境機會與限制的雙重影響。社會行爲與互動往往受制於周遭環境空間以判斷是否合宜，也常因周遭環境空間而終止或促成(Rapoport，1977；Richardson，2003；Goffman，1963)。環境與空間在文化與社會意義系統下被生產，同時藉由在這環境空間中實際經驗衍生了特定社會互動與關係。換言之，實質環境雖爲文化社會的產物但透過再生產過程也是製造社會關係與互動的工具或媒介(Tiwari，2010；Lefebvre，1996；Gottdiener，1988)。又人與環境關係並非單向或恆常不變，人設計生產了建成環境但也因它而改變。由於時間歷程及使用者認知改變與差異，相同實質環境可能呈現迥異的意義與社會關係。建成環境雖然具體而且固定不移動，但所再現內容實際包括人與環境動態的社會空間詮釋與關係。

現今社會的建成環境相較於過去傳統社會往往缺乏清楚共識的環境訊息。一方面則因現代主義影響的建築設計忽略日常生活社會互動關係的社會空間但專注於獨立而抽象的絕對空間。這使得現代建成環境除了表象使用機能之外難以傳達心理及歷史社會象徵性意義，同時也鮮少表達個人情感或群體個性（identity）（Eco，1986；Lefebvre，1996；Gottdiener，1988）。快速建成的環境難有集體經驗與共同記憶的累積，也不易形成共同情感投射與依附感因而缺乏清晰可辨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 (Auge，1995；Relph 1976，1993；Frampton，1991)。另一方面由於多元化發展現代社會不再遵從單一集體意義與價值系統使得社會成員互動溝通缺乏共同規範而更趨困難(Rapoport 1990，2004)。現代建成環境作爲社會成員日常生活一部份，如同大眾傳播資訊，往往淪爲不同人根據各人喜好各自解讀。在此狀況下，建成環境資訊只有刺激而沒有溝通的作用，只是表象符號（sign）而不具深層意義的社會象徵（symbol）作用(Tiwari，2010；Eco，1986）。

失去識別個性的快速建成環境爲強化其與眾不同往往利用主題化的手法突顯特殊性以吸引大眾目光。尤其後現代與全球化潮流下創造速成環境識別性顯得更爲平常，包括傳統建築風格模仿再造，異國風情環境元素抄襲移植與拼貼，以及即興創造的夢幻場景（Dear & Flusty，1999；King，2004）。這些被刻意主題化的建成環境創造了與日常生活遙不可及的異地所在(heterotopia 或 dystopia），

從中所生產（或再生產）的社會空間與經驗甚至可能重新書寫對於在地與被轉嫁借用異地的文化歷史認知（Cass，2004；Oakman，2004）。觀光地點的包裝與其衍生的活動場域系統往往縮限社會生活中的多樣性及差異斷裂。它重複製造雷同訊息，引發相同的觀感和行爲炮製讓真實社會互動死亡並且造成身體失去知覺。這是觀光環境在主題化生產過程中經由遊客與在地及共同實踐所再生產出的「公共領域限縮狀態」(Edensor & Kothari，2004)。許多觀光景點的歷史與主題空間透過各種符號與環境線索的包裝固然誘導遊客對於特定再現的連結，但是遊客在混亂過渡刺激的狀態中容易以過去經驗記憶爲基礎對環境作通俗的解讀。此時環境所具的物質性及支應性同樣刺激遊客一般性的詮釋及行爲而忽略甚至抗拒景點設計背後的企圖與價值觀（Rapoport 1977，1990)。歷史意義對於現今快速建成的環境顯得漂浮不定甚至可能與地方實際經驗累積脫節。

中正路老街行爲場域與系統—計畫內容、時間、與空間組織

1989 年間中正路老街建築沿街面含括 4 間銀行、1 間政府行政機關、1 間廟宇、3 間民宅、14 個分層住宅出入口、和 159 間可供商用的店面。其中 92 間或 57.86%爲開放式、58 間或 36.48%爲封閉式店家、10 間閒置、1 間正在進行改建施工。所有 150 間營業店家除了 9 間（6%）古董與民藝禮品店外其他幾乎都是以爲淡水地區居民爲服務對象的店家。這些包括衣食住行一般性的店家外，還另有 10 間金飾珠寶鐘錶店，6 家綢布莊，7 家西藥房，7 間中（醫）藥店，6 家西醫療診所， 2 家佛具店，機車修理店及房屋仲介各 1 間等專業店家。這些跡象顯示著 1989 年中正路老街雖已因中山路開發而面臨著商機流失蕭條的狀況但仍持續著一些業種的集市也突顯其在當地社區生活中的重要性。1989 年中正路老街田野觀察主要記錄街道空間中可直接觀察的行爲場域，包括開放式店面以及在街道中所發生的常態與臨時的半固定和移動性行爲場域。其中觀查發現記錄了 301 個行爲場域，包括 141 個（46.8%）場域屬於商業性質，62 個（22.92%）爲宗教活動性質，30 個（9.99%）屬於公共服務與公部門機能場域，而非商業或宗教的私人活動行爲場域則有 61 個（20.26%）。

2010 年中正路老街固定建物仍維持相同數量、相同地點的金融、行政、與宗教機構使用，但有 138 間店面與 28 個分層住宅入口。主要空地則包括一處舊民宅荒廢空地、與福佑宮前舊有市場拆除的廣場工地。138 個店面中封閉式佔 36.23%(50 間)而 60.14（83 間）爲開放式；整體開店營業率高達 96.38%（133 家）顯示老街商機相當熱絡。店面數目減少主要受到建築型態改變的影響。有些傳統街屋整併爲電梯大樓而出現大單位面積店面。這些大單位面積店家多爲連鎖店經營，包括便利商店、KTV、藥妝店與速食店等。店家服務對象與經營者相較於 1989 年呈現顯著不同。服務在地社區居民爲導向的醫藥衛生類商家從 20 家縮減至 9 家，銀樓及珠寶鐘錶業數量從 10 家減至 5 家，布店與西服訂製業種則全數遭到汰換。田野工作所觀察記錄之行爲場域共有 571 個，其中 162 個（28.37

％）屬於商業活動性質，84 個（14.71％）爲公共服務類包括沿街機車停車、垃圾清運儲放、公共電話、公所佈告欄、公車站、觀光導覽圖示、及交通指揮與警察巡邏等。另有 161 個（28.20％）屬於私人服務場域例如卸貨、私人停車、信箱及對講機、置物、清掃環境等，145 個（25.39％）社交停留場域，和 19 個（3.33％）宗教性質場域。

表 1　1989 及 2010 年度場域性質

年度 / 場域種類	1989 年	2010 年
商業活動場域	141（46.84％）	162（28.37％）
宗教活動場域	69（22.92％）	19（3.33％）
公共服務場域	30（9.99％）	84（14.71％）
私人服務性場域	61（20.26％）	161（28.20％）
停留與社交場域		145（25.39％）
總計	301	571

表 2　2010 年地方與觀光性質場域表

	在地活動場域	觀光活動場域	在地觀光兼具	總計
商業活動場域	42	76	44	162
宗教活動場域	19	0	0	19
公共服務場域	18	12	54	84
私人服務性場域	129	5	27	161
停留與社交場域	17	104	24	145
總計	225	197	149	571

從比較 1989 和 2010 年觀察記錄相同路段的整體場域數量中可以看出現今的中正路老街比過去支應將近兩倍的行爲場域。顯然現今中正路老街在觀光發展後不但忙碌許多而且環境所承受服務力也倍增。其中變化最巨者屬私人服務和停留社交性質場域，公共服務類型場域亦呈倍數以上增長。然而民間宗教儀式性場域減少超過七成，而屬於商業活動場域數量並沒有太大變化。私人服務性質場域的劇增主要因爲傳統街屋單一住宅與入口改變爲多戶分層住宅所衍生出之個別信箱及對講機所致。在地居民私人機車與汽車臨時或輪時停放亦爲數量增加原因之二。尤其後者除了數量增加外，特別是許多私人停車通常以輪時方式發生在非商業經營時段大致仍維持二十年前運作模式。然而社區居民人口逐漸減少而公共服務類型場域倍增顯示中正路老街面臨著因觀光發展而產生的環境清潔與停車壓力。爲解決觀光人潮所產生的垃圾問題，除了每日兩次定點垃圾車收集一般店家垃圾外鎮公所幾乎每二十公尺就設置大型垃圾桶並不定時派員清運。另外沿車道劃設機車停車格原有隔月換邊停車之規定。公部門爲標示停車規則在老街前後 450 公尺路段中設置了 43 個各式的交通告示牌。然而沿街

雙面機車停車場域的常態發生顯示大量觀光人潮讓這些停車規定與告示形同虛設。密集的公部門環境服務行爲場域表面或許上解決了實質環境服務性功能問題，但也削弱過去街屋環境中私人店家對於眼前街道公共空間的管轄責任感。一個完全仰賴政府行政機構維持的街道公共領域容易造成公私範疇的漸進與轉換關係斷裂，約定俗成的社區共識和行爲規範也難以形成。

雖然商業活動場域數量在這二十年來沒有顯著變化，但卻在內容上產生極大變異表示著中正路老街環境意義與社會關係的改變。1989 年間所觀察的商業性場域有九成以上以服務淡水居民爲主，其中超過七成更屬日常生活範疇的行爲場域。2010 年觀察發現的商業活動場域中以服務在地居民爲主的場域少於三成，而七成以上的商業活動場域與觀光遊活動有關。現今中正路老街除了專門服務業種市集瓦解之外，過去清晨在中正路上金融機構及市場附近人行道空間所進行的魚貨中盤商交易行爲場域已完全消失不見。在觀察發現的 42 個在地商業活動場域中有三分之一（14 個）爲只在早上進行的流動性蔬菜肉品小販；這些現象意味著老街環境對於在地生活的支應性不但在數量同時也在運作時間上被壓縮。另外商家每月初二、十六祭拜土地公燒紙錢宗教儀式場域的大幅減少（62 減至 15 個）暗示著對店家經營者對於在地「落戶認同」的忽視。老街對新的商家而言似乎只是個營業的場地而缺乏深層的鄰里社會脈絡關係。雖然在地性的行爲場域在老街環境中仍佔最大比例，但多屬功能性質而缺乏實質社會互動關係。這些顯示老街在觀光發展之後所再現的當地社區生活空間意義已經被改變。

老街空間對於社區生活意義的變革衍生了現今使用者對於人行道空間不同的認知與實踐。舊有開放式店面的半固定物擺設通常引導使用者進入店裡進行買賣，而且公私交界的店口經常是鄰里社交活動重要的場所。中正路老街過去作爲社區生活街道其街上的私有產權店面空間除了商業活動進行之外，隱含在其場域運作計畫中還包括社區居民互動的行爲模式。開放性店面前端鄰街空間可被視爲城市街道公共空間的延伸，因此具有連結公私領域的重要社會性功能。社區居民社會互動或停留鮮少發生於人行道空間之中，它屬於流動性的動線空間與私人短暫服務的支應空間。這種以產權界線串連公共與私有空間的概念在現今觀光導向的固定性場域中已不復見。許多觀光性質的開放式店家刻意將服務櫃台橫置於店口並將店內作爲工作空間而讓顧客溜覽等待服務與排隊等行爲溢散至店外的公共人道上。店家與顧客的交易多發生在公私產權分界線上，而且也少有交易之外的社會互動。換言之，在大量觀光客的參與實踐中公共人行道被轉化爲私有店家的延伸，私有產權界線也變成切割在地人與觀光客連結的清楚註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固定環境元素形式，或街道尺度改變，抑或公私領域社會互動模式變革，中正路老街似乎持續一種街道開放空間與社會互動空間不變的結構性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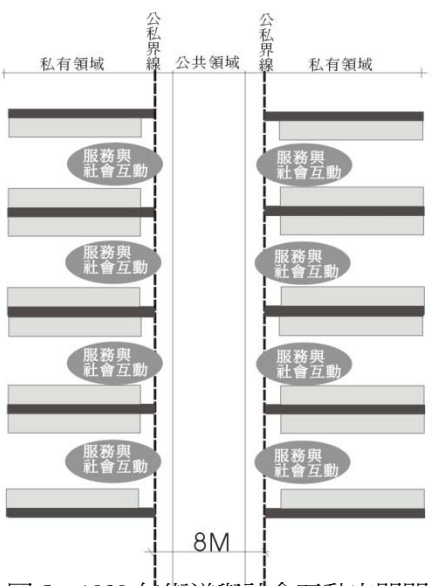


圖 5　1989 年街道與社會互動空間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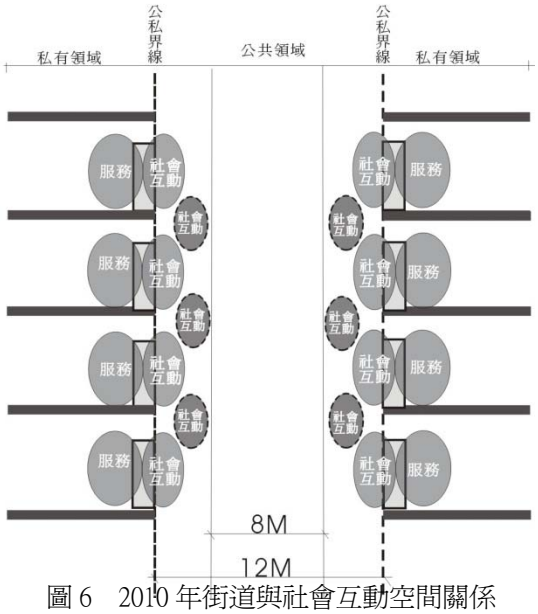


圖 6　2010 年街道與社會互動空間關係

人行道空間除了支應開放式觀光性質的商家延伸之外，同時也也提供觀光客最主要的停留與社交空間。中正路老街空間其實並未針對遊客的停留休息有所設計，而私人商業活動行爲場域又都以消費作爲進入或停留的前提。遊客們因此大多選擇人行道沿街花台邊緣作爲暫時停留休息或飲食的空間。在 197 個觀光場域中有關遊客社交停留場域就多達 104 個。雖然這些社交與停留場域不能直接指涉特定商業活動場域，但實爲後者的相關衍生場域。老街的主要消費行爲模式包括前段的交易與直接服務和後續的停留消耗及清理。遊客停留社交行爲場域的觀察中可見大量遊客飲食行爲與所購得物品。這代表著老街的遊客停留社交場域實際上扮演去化私領域觀光消費活動之後半段間接服務角色。尤其在假日經常因爲人行道中停留社交與商家延伸場域的發生使得觀光人潮必須改換至車道空間才得以行進。雖然在地居民在老街上亦有社交停留場域的參與但卻在時間與行爲內容上和遊客之停留社交行爲呈現很大差異。前者多發生在早晨而且以老年人短暫獨自停留或鄰居們在打烊後聊天，而且所發生地點多沿靠在未開張的店面入口避免阻撓人行動線。這些都與消費行爲無關而且所佔比例已經少於總場域數量之 3%。停留社交場域在質與量的特性上顯示老街人行道公共空間在觀光發展下已經成爲私人營利及消費活動系統的重要部分。傳統街區人行道作爲動線串連的公共性角色在觀光活動之中逐漸消失。

一個環境場域系統與所再現的空間意義除了展現於其中的行爲場域計畫內容所支應的活動行爲之外還隱含於場域在時間與空間的組織關係中。田野觀察中經常發現相同空間在不同時間實際上可能有一個以上的場域發生；或是同一個場域可能在空間範疇上有所變動。藉由行爲場域的時間與空間分類關係可以瞭解該環境實質佔用運作規律與使用者對於該環境空間認知及賦予的價值觀。行爲場域的界定包括時間與空間的界線，因此它們的分類不能只根據物理性特質而同時必須納入時間及領域佔用的規則。行爲場域的時空特質分類主要條件

爲（1）場域環境構成元素的實質移動性包括固定、可移動半固定、不移動半固定、與移動性特質，和（2）場域所佔用空間領域的時間長短與輪替，包括常設性、具重複規則的管轄性、及偶發不重複的臨時性。根據上述條件，所有觀察發現的行爲場域可被歸爲七大類:(一)常設固定性場域,例如開放性商家;(二)常設不移動半固定性場域，例如公共電話、販賣機、信箱;(三)常設可移動半固定性場域，例如 24 小時運作攤販或置物;(四)管轄性半固定場域，例如輪時性攤販或重複性私人停車;(五)管轄性移動場域，例如道路沿途清掃;(六)臨時性半固定場域，臨時攤販或臨時停車；與（七）臨時性移動場域，例如廟會遊行。表 3 陳列 1989 與 2010 年在中正路老街所發現行爲場域時空性質分類結果。表 4 呈現場域活動性質與所發生的時空關係。

表 3 場域時空性質分類

	固定性		不可移動 半固定性		可移動 半固定性		移動性		總計	
常設性	（一）		（二）		（三）				(1989) 159 52.83%	(2010) **255** **44.66%**
	(1989) 116	(2010) **124**	(1989) 38	(2010) **117**	(1989) 5	(2010) **14**				
管轄性					（四）		（五）		(1989) 50 16.61%	(2010) **197** **34.50%**
					(1989) 49	(2010) **195**	(1989) 1	2010) **2**		
臨時性					（六）		（七）		(1989) 92 30.56%	(2010) **119** **20.84%**
					(1989) 89	(2010) **119**	(1989) 3	(2010) 0		
總計	116 38.54%	**124** **21.72%**	38 12.62%	**117** **20.49%**	143 47.50%	**328** **57.44%**	4 1.33%	**2** **0.35%**	301	**571**

表 4　2010 年場域活動與時空性質

活動內容與 場域型態	商業活動場域	宗教活動場域	公共服務場域	私人服務場域	停留社交場域	總計
（一）	113	3	1	7	0	124
（二）	6	0	50	61	0	117
（三）	6	1	5	2	0	14
（四）	37	0	17	48	93	195
（五）	0	0	2	0	0	2
（六）	0	15	9	43	52	119
（七）	0	0	0	0	0	0
計	162	19	84	161	145	571

以上場域分類結果顯示現今中正路老街空間中直接可見的常設固定性（116 vs 124）場域與二十年前並無明顯變化，顯示其中固定環境元素所支應的場域數量並未因爲街道拓寬與建築形式更新而大幅改變。老街中藉由常設不可移動環境元素所支應的行爲場域只佔整體之 42.21%（241/571），而其他將近六成場域皆由移動性高的半固定環境元素和人共同構成。換言之，老街中整體活動發生的空間領域固定性相較於二十年前減弱許多，包括建築的固定環境元素對於整體街道場域系統組織所具有的重要性與支應性也有消減。若以時間向度觀察，具規則性而且重複運作的場域不論在數量或整體比例上都比二十年前有所增加，尤其屬於輪時管轄的行爲場域更增加將近三倍。這些輪時管轄的行爲場域七成以上爲支應私人服務與停留社交活動行爲。另一方面，缺乏常設領域範圍與規律運作時間的臨時性場域雖在數量上有增加但在整體比例卻相對減少，而且其活動內容八成左右屬於臨時的私人服務與短暫停留活動行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眾多臨時性的行爲場域中，沒有一個屬於與商業活動種類。綜合上述現象可以說明老街整體街道活動發生因觀光發展而更具流動性與輪替性，使得街道在一天二十四小時和一週七日內的場域組織變化比過去支應在地社區日常生活爲主的場域系統更爲動態也具更強烈的對比性。老街環境在觀光發展中似乎也同時展現一些社會控制的跡象，不在認可範圍內的突發場域活動幾乎無法任意進行。然而與過去差別的是這些控制往往必須藉由警察巡邏取締勸阻而非大眾集體約定俗成的共識所致。

現今中正路老街的集體社會共識似乎展現在把街道空間做爲消費與後續服務的空間，在其中觀光消費活動主宰了主要社會關係。社區居民日常生活在老街中幾乎被極端壓縮至清晨或夜晚的剩餘時間。街道空間無法再現社區居民間的社會網絡關係，同時社區生活與老街歷史的連結也似乎呈現斷裂。在地居民若非盡量避開觀光活動場域接觸，就是成爲觀光服務的提供者。屬於在地居民的主體性也因爲觀光發展而逐漸消逝。反觀遊客在老街中停留主要據點又都以商業消費行爲作爲選擇根據。除了三級古蹟福佑宮之外，過去在中正路老街發展過程中重要歷史地點，例如淡水信用合作社總行、公館巷口等卻完全不爲吸引遊客駐足停留之處。此外遊客更不因爲建築風格之特殊與趣味性而影響其參與停留的決定。換言之，固定元素環境如今並未傳達有關歷史與文化發展意義訊息，但卻清楚表達服務功能的線索。

觀光意象拼貼與環境訊息意義

觀光發展後的中正路老街除了建築物形式更新與街道尺度拓寬外最明顯的是半固定環境元素的改變。過去淡水老街相同業種的集市實際上讓店家們處於商業競爭狀態。顧客選擇商家主要依據自己和店家熟習程以及店家經年累月所累積的在地商譽；再者則根據商品的品質與價錢決定。這些選擇資訊通常來自社區生活實踐過程中成員實際互動的經驗與認知，實質環境所傳達的訊息與社

區社會脈絡息息相關。經由業者設計安排的支應環境大多簡單明瞭動線順暢，主要傳達易於溜覽選購和容易溝通的企圖。業者的事業規模與實力似乎展現在實質建築物精緻程度、店面大小、和無形的社會網絡中。半固定環境元素內容仍以銷售商品和營業相關設施用具最顯眼，店家招牌與宣傳廣告牌示似乎只是相對的配角。反觀 2010 年的中正路老街是一個牌示與環境符號爆炸的空間。老街整體場域系統再現了觀光消費的價值觀與其衍生的激烈商業競爭與促銷技術。

中正路老街 450 公尺左右現今七成以上共 346 個商業活動場域已爲旅遊觀光性質，但其中經營業種卻呈現高度重複現象。服務遊客的商業活動場域內容屬性不外餐飲、食品、和禮品業種。重複性最高的商業活動場域包含超過十個以上淡水魚丸鐵蛋販賣，十間糕餅業者，將近二十個冰品飲料的商業活動場域。這些商業活動場域之中少數爲經營超過二十年的淡水老店，而絕大多數爲觀光發展之後的產物。爲在高度重複商品的激烈競爭中贏得遊客青睞經營者更以大量宣傳牌示昭告自家商品歷史悠久而且在地的正統性（圖 7 ），其中更不乏以年長女性人物做爲作爲在地性核心代表。一些新興業者則以放大牌示引用各式大眾媒体報導與名人背書作爲宣示商品的可信度；或有其他商家以宣傳在其他地方生產發展成功的「歷史」爲商品正當性作見證（圖 8 ）。



圖 7：牌示與在地正統性宣示



圖 8：媒体引用牌示建立商品信用

另外一種吸引遊客消費的手段就是懷古仿舊的主題營造，特別在旅遊紀念禮品相關與少數餐飲的商業活動場域中更爲明顯。除了極少數從過去民藝古玩雜貨轉型幾家之外，這一類場域幾乎都在街道拓寬之後才進駐與淡水歷史文化並無深刻淵源。與利用大量牌示宣示正統性最大差異在於仿古懷舊主題經營通常展現在場域空間與環境物件的整體配合。這種整體場域氛圍整合包括商品內容選擇，裝飾物件風格和顏色色調。爲呈現民俗歷史氛圍仿古主題場域以展售台灣古早味以及東南亞與中國大陸製工藝品爲主。用以裝飾和販售的物品幾乎都爲現代或全球化大量製造的產品，淡水特性除了展現在滬尾字樣符號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媒介方法可見。高彩度飽和的紅色基調與大幅陳年舊照片背景讓古早味主題場域環境猶如刻意裝扮的舞台布景而非真實生活部分（圖 9，10）。這些似乎都成功吸引遊客消費，尤其對於外國人和年輕族群更充滿新鮮趣味性。



圖 9：仿古主題觀光場域



圖 10：大幅照片與淡水懷舊主題經營

除此之外連鎖店經營藉由大眾（或媒体）市場已經建立的品牌知名度也在觀光消費中佔有一席之地。這些連鎖商業活動場域提供制式標準化商品與服務，淡水特殊歷史文化與地理特色對於場域運作絲毫沒有任何影響。淡水老街對於連鎖經營的商業場域而言只是大眾消費市場多個傳銷管道中的一個佈點，突顯品牌形象與可見度因此在老街環境中成爲重要課題。連鎖商業活動場域不但利用商品陳設及相關半固定環境元素，更經常大修正既有固定環境元素特色以顯現品牌識別性。反觀一些經營多年的在地社區型老店並未附和遊客眼光與偏好而重新修正。這些老店仍保持著多年延續的場域運作方式及形式，包括商品設備的安排和主客間的空間關係模式。更特別是它們鮮少在固定建築元素外附加大量半固定符號拼貼，有關場域主要訊息來自於人、事、時、地、和必要支應物件相互配合的整體感。相對於觀光類型場域高度符號化的訊息傳達這些在地社區場域所傳達的訊息量顯得非常精簡，但需要在地社區直接經驗知識脈絡作爲有效正確解讀基礎。正因如此，遊客對於大部分的社區老店一無所知也未曾駐足，更遑論藉由它們瞭解淡水老街的發展變革脈絡。

結論

觀光與在地型行爲場域在內容、參與對象、運作時間、和環境訊息傳達的內容與途徑差異顯示社區生活和觀光活動場域系統的斷裂。中正路老街在道路拓寬後歷經劇烈環境變革與快速發展過程，過去建成環境中累積長年的社會生活訊息隨著在地社區生活萎縮已消失並被觀光消費與符號所取代。環境元素傳達有關場域訊息所需的知識與社會共識也隨著大量外來觀光人潮而瓦解。無中生有所創造出的歷史與在地性掩蓋了實際經驗過程所連結的認知與再現。中正路老街的變遷反映了傳統生活環境在使用者的解讀與實踐過程中被重新生產與歷史書寫。在地生活萎縮、公共空間消費化與窄化、仿古建築與懷舊的環境營造讓老街儼然成爲一個與現實脫節的主題環境再現拼貼的歷史與文化。通俗去地方化的消費模式已成爲現今中正路老街觀光活動場域特質。老街似乎只是一個在台灣觀光旅遊地圖上的一個名稱地點，而歷史只是拼貼在環境中的表面裝

飾符號。

參考書目

Auge, M., 1995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NY, USA: Verso

Cass, J., 2004, Egypt on Steroids: Luxor Las Vegas and Postmodern Orientalism, Lasansky, D.M. & McLaren, B., (eds) 《Architecture And Tourism: Perception, Performance And Place》. Oxford, UK: Berg

Dear, M. & Flusty, S. 1999, The Postmodern Urban Condition, in Feartherston, M. Lash, S. (eds) 《Spaces Of Culture: City, Nation, World》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Eco, U., 1986, Function And Sign, in Gottdiener, M. & Lagopoulos, A. (eds)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NY, USA: Columbia Univ. Press

Edensor, T., & Kothari, U., 2004, Swetening Colonialism: A Mauritian Themed Resort, in Lasansky, D.M. & McLaren, B., (eds) 《Architecture And Tourism: Perception, Performance And Place》. Oxford, UK: Berg

Frampton, K., 1991, Reflections on the Autonomy of Architecture: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Production, in Ghirardo, D. (ed)《Out Of Site: A Social Criticism Of Architecture.》Seattle, USA: Bay Press

Goffman, E. 1963,《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Y, USA: The Free Press

Gottdiener, M., 1988,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TX, USA: Texas Univ. Press

King, A., 2004, 《Spaces Of Global Cultures Architecture Urbanism Identity》. NY, USA: Routledge

Lefebvre, H, 1996,《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Liu, C-W., 1994 《Form Old Town To New City: A Study Of Behavior Setting And Meanings Of Streets Un Taiwan》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lwaukee,WI., USA: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Ockman, J., 2004, New Politics of the Spectacle: " Bilbao" and the Global Imagination, in Lasansky, D.M. & McLaren, B., (eds) 《Architecture And Tourism: Peception, Performance And Place》. Oxford, UK: Berg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UK: Pion Limited

Rapoport, A. 1977《Human Aspect Of Urban Form》NY, USA: Pergamon Publishers

1990《The Meaning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2nd Edition》Tucson, Az. USA: Univ. of Arizona Press

2005《Culture, Architecture, And Design》Chicago, USA: Locke Science Publishing co

Relph, E. 1993, Modernity and the Reclamation of Place in Seamon, D. (ed) Dwelling, 《Seeing, And Designing: Toward A Phenomenological Ecology》. NY, USA: SUNY Press

Richardson, M., 2003, Being-in-the-market Versus Being-in-the-plaza in (eds) Low, S. &

Lawrence-Zuniga《(eds) Low, S. Lawrence-Zuniga》The Anthropology Of Space And Space MA , USA: Blackwell Publishing

Tiwari, R., 2010, 《Space-Body-Ritual: Performativity In The City》. Plymouth, UK: Lexington Books

林聖隆 2002 《尋找淡水老街在地生活》台北 淡江大學建築系 碩士論文

淡水文化基金會 http//www.tamsui.org.tw//115-4.html

淡水三協乘餅舖 http//www.sanxiecheng.com.tw//tpl-his4.php

十九世紀淡水廳、臺北府的糧食市場整合研究

謝美娥*

摘要

清代時人認知的淡水，其地理範圍不僅包含現在的淡水鎮，還納入淡水河流域、竹塹一帶，在十九世紀先後稱爲淡水廳、臺北府。此一廣義的淡水地區自開墾伊始即以產米著稱，長時期以來經由八里坌及其沿海各港出口米糧。又因西部地區的水路大皆西流，或謂米穀運輸亦受此限，從產區各自向西由沿海港口輸出，這似乎暗示北臺地域之內的各米產區之間並未統合爲一個糧食市場區。然而情形未必如此。本文利用「清代糧價資料庫」中十九世紀未分府前的臺灣府和分府後的臺北府米價資料，以及兩種帳簿——淡水河下游平原的《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吉置廣記總抄簿》、竹塹《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中的米價資料，藉由不同的米價相關分析，進一步證明本區無論是區內之間或本區與全臺之間，從糧食市場來看，本區內各米產區並不因爲水路西向運輸之限而各自分立，其市場整合程度相當高，可以說十九世紀北臺地域大部分地區已統合爲一個糧食市場區。

關鍵詞

米價、市場整合、清代糧價資料庫、帳簿、淡水、臺北、竹塹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本文爲清代臺灣米價的區域研究，也屬於米價史課題的「延伸研究」。[1] 此處的區域，指北部臺灣，也就是廣義的淡水地區。在現今，淡水只被視爲一個鎮，可是十九世紀晚期，它的同名行政區層級比鎮還高，所轄四至範圍更大。若再更早，則清代時人認知的淡水，是一處有淡水河系穿繞，北起三貂嶺、雞籠，南至大甲溪的廣濶地區。[2] 這個範圍其實就是北部臺灣地區，最初以淡水廳，其後以臺北府名之。臺北府的出現，淡水才限縮於一個縣，指涉轉爲狹義。本文討論歷史上的淡水，是立於清代時人的地理認知，指其以淡水爲名而開始的區域，歷經淡水廳時期、臺北府時期。同時，筆者掌握的米價史料所示意的空間範圍，也正是此一廣義的淡水地區。

近人對這一區域的研究爲數不少，與經濟有關者，大致是在土地開墾、市街鎮港、商貿、貨幣、米價等方面的探討，也有以淡水河流域爲範圍的地毯式陳述。[3] 其中，涉及市場的討論者，主要探討具體的市街鎮港的產生和變遷，也將之理出一個理想的有層次的體系，並以港口體系指稱爲市場圈、交易圈。其論點，或主張清代臺灣各港間有其從屬關係，系統內的港口間互聯大於系統與系統的港口往來，而港口等級體系就是市場圈體系；至於市場圈，分成地方性（鄉街）、地區性（次系統港口）、區域性（主系統港口）。[4] 或認爲沿海至山區的鄉街市鎮群中，僅沿海港口一型發展成以港口爲據點的交易圈，而各交易圈又不相統屬、重疊。[5]

以上市街鎮港研究是針對看得到的、有建物施設的市街鎮港交互運作的具體空間，固然可以說是市場，有探究必要；可是也應注意到另一種看不見的、非建物施設所運作形成的市場。近人從具體的市街鎮港切入，進而以之建構市場圈/交易圈及其階層化體系的論點，並未能指出將市街鎮港等同於抽象的市場或市場

---

[1] 完整的米（糧）價研究應包含兩個先後相關聯的層次：基礎研究和延伸研究。前者指運用可靠的糧價史料，檢測糧價數據，據之建立一個糧價時間數列，以此數列分析價格的各種變動，並對糧價變動尋求合理的解釋因素。後者則是立於基礎研究之上才得以進行的研究，包含相對物價如工資、利息、地價、地租等的比較，以及探討區域間的市場整合、賦稅負擔、生活水平、糧價與政治社會事件的關聯等課題。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4-5。

[2] 陳培桂，《淡水廳志》（同治 10 年，1871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卷 2，〈志一・封域志〉，頁 23。

[3] 單篇論文數量不少，不一一列載。若是專書，可參考王世慶、施添福、溫振華、戴寶村、林玉茹、唐次妹等人的著作。

[4] 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臺北：知書房，1996 年），第 4 章；《清代竹塹地區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動網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年），第 2 章。有別於戴、林二人的是田靜逸，他以行郊運銷體系視為市場體系，見田靜逸，〈清代臺灣墟集與市場系統的初步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出版年不詳。

[5] 戴寶村，〈近代臺灣港口市鎮之發展與變遷〉，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臺灣史論文精選》（臺北：玉山社出版，1996 年），（上），頁 425-443。唐次妹，《清代臺灣城鎮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年），頁 150。

區時，應該釐清的課題，即：如何判斷某一市街鎮港與另一市街鎮港可以視爲同或不同一個市場圈/交易圈？如何看出此一市街鎮港的市場與另一市街鎮港的市場有著高或低的關聯？兩地之間有交換行爲，雖可稱有關聯，但是當吾人問及市場間是否有關聯時，其實就是企圖釐清兩個或多個市場之間的整合程度。整合度高者，可以視爲同一個市場區，在這個高整合的市場區內，勞動力、資金、技術、物價等市場信息的波動，會高度互相影響或出現一致性的變動趨勢。換言之，既有的市街鎮港研究的論著，對於市場圈/交易圈的界劃仍然模糊，所謂的圈，究竟在哪裡？個別的市街鎮港有興衰起落，可是一旦在同一個市場區，其區內高整合度的特徵，不會因某一個別的市街鎮港消失或出現而有異。學界建構的市街鎮港體系究竟與市場體系、市場區一不一樣？兩者可不可以劃等號？這些疑處如果不進行市場整合研究，不考察主要商品的流通運輸，則無以明瞭兩地或多地之間彼此是否同屬一個市場區。

清代臺灣最重要的農產品之一——稻米的流通及其價格的變化，就是提供解決這一類問題的最好切入點，因爲一條米價時間數列反映的就是以數量表示的該地糧食市場，以最能代表清代臺灣經濟榮枯的稻米價格來探討糧食市場間的關聯程度（整合度），尤能處理看不見的、非物質陳設運作的市場的變動，可彌補上述以市街鎮港設定市場圈/交易圈時沒有解決的問題。

那麼，什麼是糧食市場整合？簡言之，透過米糧的供需流通，與外地糧食市場會產生程度不一的關聯，此關聯指兩地是否形成糧食供需關係、是否存在市場整合，若是，則形成糧食市場區。然而如何探得糧食市場區的構成範圍？有兩種研究途徑可以進行，一爲以米穀流通方向及其流通終點的變遷來界劃，一爲以米價變動的相關程度來衡量。兩者雖然都是糧食供需關係的研究，但仍有差異。前者是質化研究，主要是尋找史料文獻中有糧食流通記錄者佐證；後者關涉糧食市場整合的探討，爲量化研究，從米價的相關分析來看糧食市場區域的分劃和其間的遠近關係。[6]

根據第二種研究途徑，以往論著已進行過完整的米價研究，處理過臺灣與外地的糧食市場整合，惟對臺灣內部的糧食市場整合尚未考察。米價研究方面，針對清代臺灣時期，自王業鍵、王世慶首開米價研究的兩種方式後，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承王業鍵的研究成果，運用王氏以清代糧價清單轉錄編製的「清代糧價資料庫」，輔以也是糧價清單轉錄的「抄檔」，首度建立出可靠的臺灣 1738-1850 年米價數列，且釐清其變動歷經上升期（1738-1838）與下降期（1839-1850）。（見圖 1、圖 2）[7] 糧食市場整合方面，僅王業鍵論及臺灣與閩省

[6] 謝美娥，〈餘米運省濟民居，兼及西浙與東吳——十八世紀臺米流通及其與週邊地區糧食市場整合的再觀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及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聯合主辦，「明清時期江南市場經濟的空間、制度與網絡國際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09 年 10 月 5-6 日，頁 2。

[7] 王業鍵，〈十八世紀福建的糧食供需與糧價分析〉，收於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 年），第 2 冊，頁 119-150。王世慶，〈清代臺灣的米價〉、〈清代臺灣的米產

內地的糧食市場整合，而謝氏一書著重米價的「基礎研究」，糧食市場整合屬於「延伸研究」，該書並未含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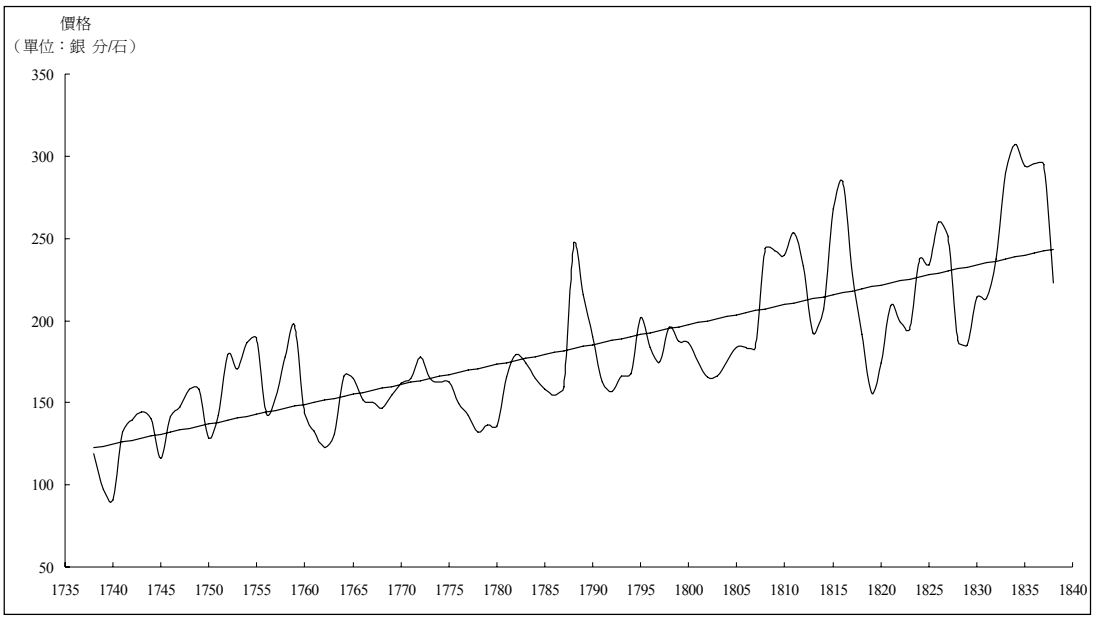


圖 1：清代臺灣府年平均米價及長期趨勢（1738-1838）

資料來源：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 年），頁 106，圖 2.2。



圖 2：清代臺灣府年平均米價及長期趨勢（1839-1850）

資料來源：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109，圖 2.3。

與外銷〉，見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年），頁 73-129；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 年。「清代糧價資料庫」把糧價清單數位化並轉為西曆，可按年代、省府、糧別檢索。「抄檔」是指抄自戰前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糧價清單而成表格化形式的資料，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蒐藏，2009 年出版為《清代道光至宣統間糧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清代臺灣米價研究》使用的「抄檔」為作者 2004 年至典藏單位蒐集的複本。

謝美娥另文〈餘米運省濟民居，兼及西浙與東吳——十八世紀臺米流通及其與週邊地區糧食市場整合的再觀察〉，繼王業鍵有關臺灣與閩省糧食市場整合的探討，再次對同一課題進行考察。該文加長米價下限和擴大地理範圍，以十八世紀臺米流通爲中心，利用東南沿海地區——「臺灣與週邊地區」共十七個府州米價（相當於 G. William Skinner 劃分的包含臺灣在內的 ”Macroregion of Southeast Coast”東南沿海大區），進行臺灣米穀輸出與其近處週邊（福建、廣東）、遠處週邊（長江下游）米糧市場關聯程度的驗證。據其米價相關分析顯示，東南沿海地區可劃爲三個次級糧食市場區，其中臺灣和沿海的福州、興化、泉州、漳州互通性最高，形成一個糧食市場區；臺灣米價與粵省潮州府也有相當的相關，但與浙三府（處州、溫州、臺州）和長江下游地區的米價相關則低。（見圖 3、圖 4）[8] 不過，此文處理的時段和糧食整合區主要是十八世紀和臺灣與外域的米糧市場關聯，至於臺灣內部則未進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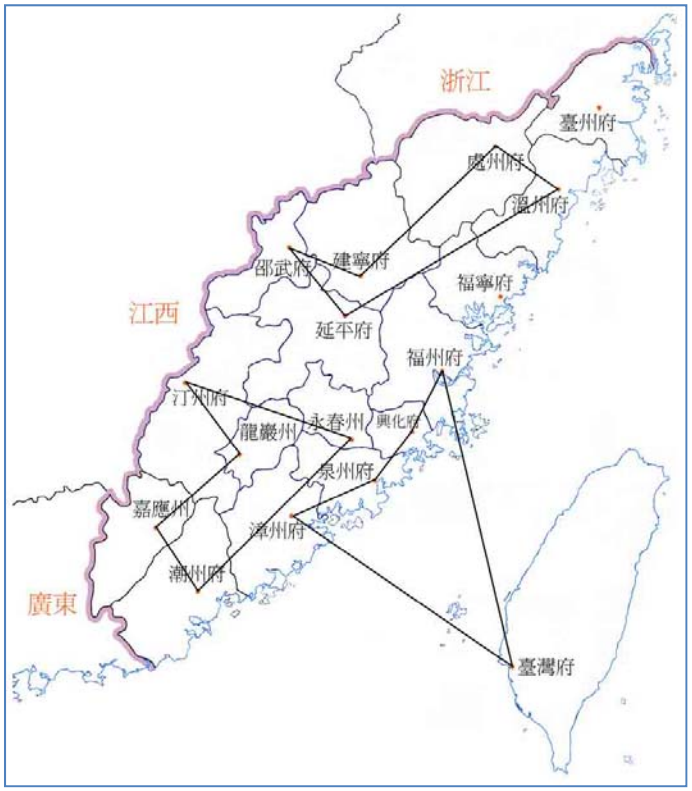


圖 3：十八世紀東南沿海地區米價高相關三區

資料來源：謝美娥，〈餘米運省濟民居，兼及西浙與東吳——十八世紀臺米流通及其與週邊地區糧食市場整合的再觀察〉（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及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聯合主辦，「明清時期江南市場經濟的空間、制度與網絡國際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09 年 10 月 5-6 日），頁 13，圖 4。

[8] 該文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及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聯合主辦，「明清時期江南市場經濟的空間、制度與網絡國際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2009 年 10 月 5-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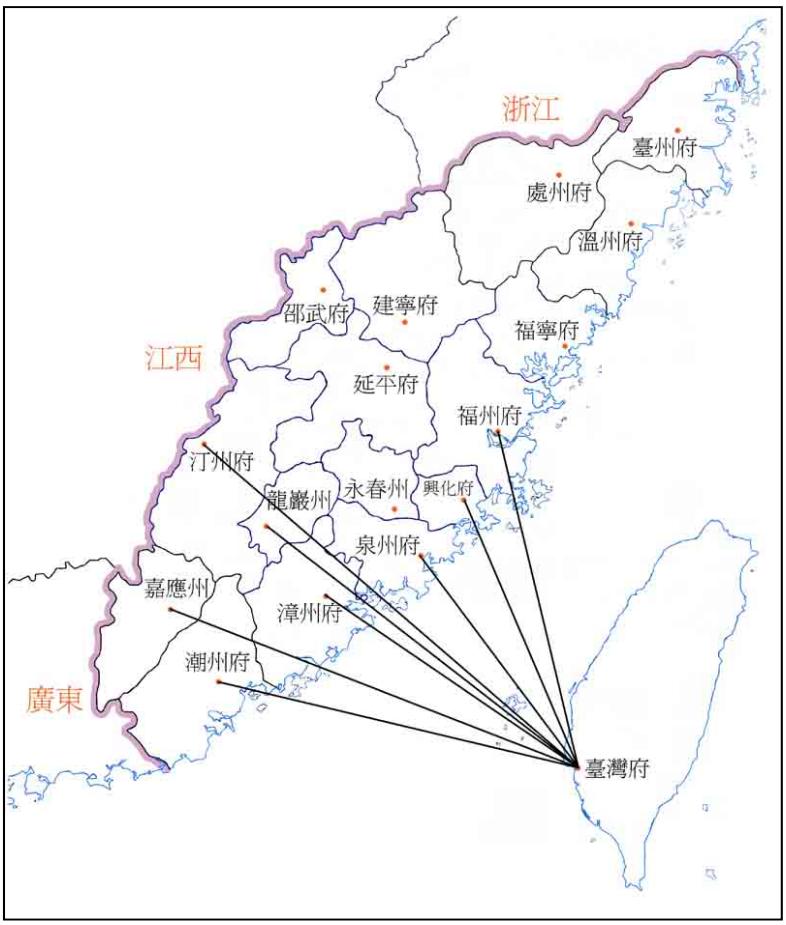


圖 4：十八世紀臺灣府米價高相關區

資料來源：謝美娥，〈餘米運省濟民居，兼及西浙與東吳——十八世紀臺米流通及其與週邊地區糧食市場整合的再觀察〉，頁 15，圖 7。

歸納上述，清代時人認知的淡水，其地理範圍不僅包含現在的淡水鎮，還納入淡水河流域、竹塹一帶，可謂是廣義的淡水地區，包含了現今概念的北部臺灣，在十九世紀的行政區先後稱爲淡水廳、臺北府。此一廣義的淡水地區自開墾伊始即以產米著稱，長時期以來經由正口八里坌、滬尾及其沿海各港出口米糧。又因西部地區的水路大皆西流，或謂其米穀運輸亦受此限，從產區各自向西由沿海港口輸出，這似乎「暗示」臺灣之內的各米產區之間並未統合爲一個糧食市場區。而以米價相關分析實證臺灣內部糧食市場整合情形的研究又付諸闕如，其間情形是否如市街鎮港史研究所指向的「體系」，值得再探究竟。

據此，本文將利用官方米價數據和兩種民間帳簿的米價資料進行量化考察，以廣義的淡水地區，即臺灣北部地區爲個案，證明臺灣內部至少相當大的地區存在較高程度的糧食市場整合，其米產區之間的供需關係並不因爲水路西向運輸之限而各自分立。

二、米價數據的描述與評估

以淡水廳、臺北府地區爲範圍，本文據以論述的官方米價數據是取自「清代糧價資料庫」和「抄檔」中的臺北府米價資料，以及兩種民間帳簿——淡水河下游平原的《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吉置廣記總抄簿》（淡水廳廣記）、新竹《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竹塹義民廟）中的米價資料。何以選擇這幾種資料？以下詳明其理，並整理這些量化史料，使之成爲可資分析的數據。

（一）官方米價數據——臺北府

從近人對清代臺灣米價的研究可知，目前存留較爲有系統的清代臺灣米價資料，是清代政府透過糧價陳報制度（見圖 5、圖 6）中的「經常報告」（Regular Report）和「不規則報告」（Special Report）蒐得的月報米價（前者以糧價清單呈現），有縣級、也有府級米價，數量眾多且品質相對較高。[9]（其報告格式見圖 7、圖 8）但是由於這一來源的米價資料依照制式化的報告格式，所記爲按府級行政區表示的米價，所以當臺灣的行政區劃還是一府時，其米價資料示意的價格空間範圍只能稱爲臺灣府米價。只有到了臺灣分爲二府及建省後形成的三府一州時期，其糧價清單上的米價才具有表示臺灣內部的分區（府級）價格訊息。

分區的米價資料自光緒元年 12 月 20 日，即西曆的 1876 年 1 月 16 日後才出現，因爲該年新設臺北府一府，另爲臺灣府，米價代表的地理範圍爲南、北兩個分區。而光緒十三年 9 月 16 日（1887 年 11 月 1 日）決議升省後才算正式建省，開始省級政務的執行。[10] 由於建省的起始時點已近年末，米價分期的斷限權宜以光緒十四年（1888）切分。換言之，自此年開始，米價表示的分區已變爲三個府級區，其後更則形成四個府級分區。由於有分區的米價資料，才得以運用米價的價格相關分析方法，探討臺灣內部不同的糧食市場區之間的整合程度。

如上所述，筆者取得的分區後的米價資料如表 1 所示，其起訖爲 1878 至 1894 年，皆爲府級米價。至於糧價清單留存的縣級米價資料，事實上只有同治十二年（1873 年 1 月至 1874 年 2 月）一年。[11] 緣此，利用此類來源的米價時，本文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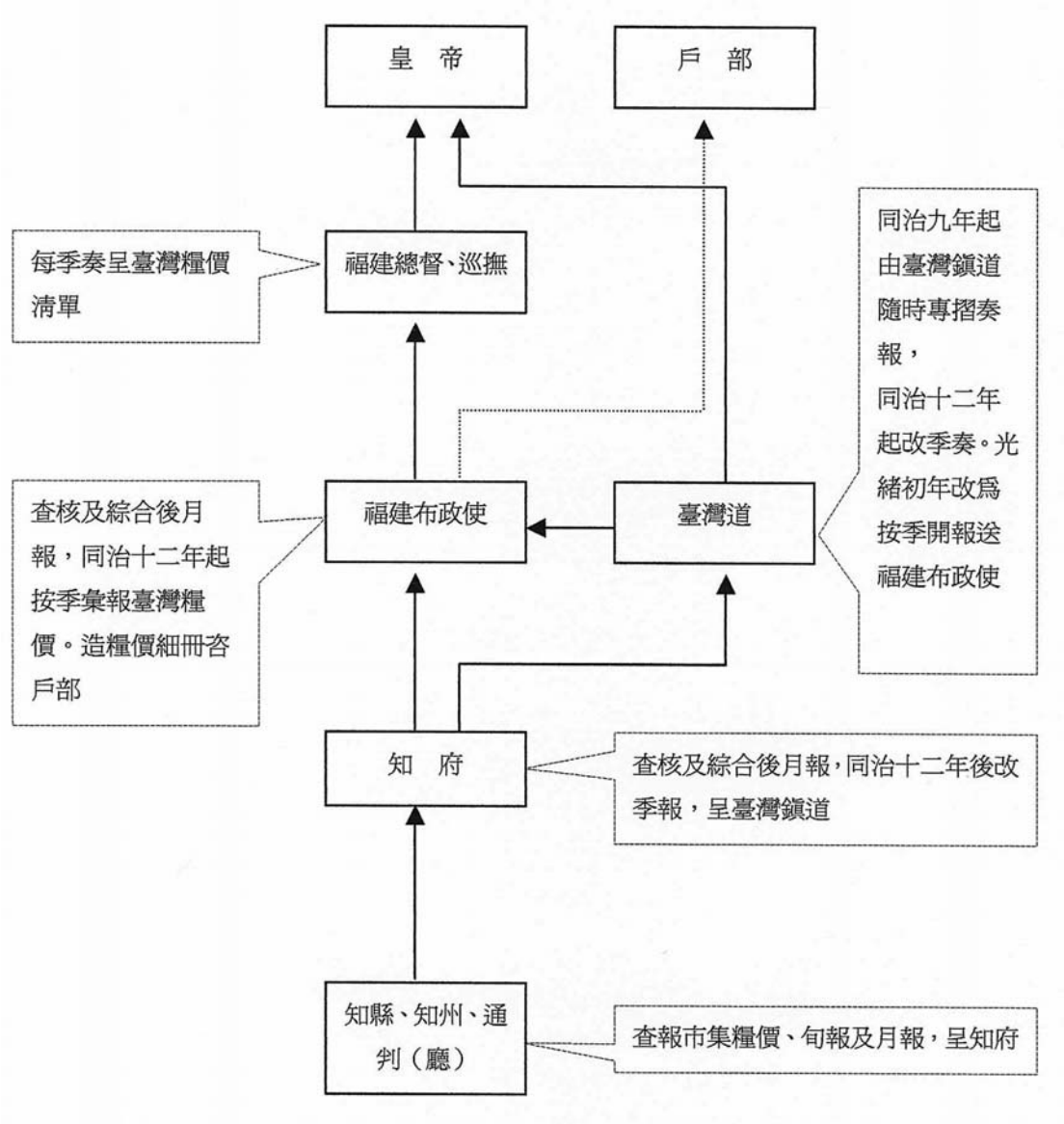
---

[9] 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14-15。

[10] 趙爾巽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清史稿・志》（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卷 71，〈志四十六・地理十八・臺灣〉，頁 2263-2265。劉銘傳，〈籌議改設臺灣郡縣疏〉，《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灣文獻叢刊第 276 種，凡臺灣文獻叢刊皆使用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下同，不另註明），頁 269-271。楊昌濬、劉銘傳，〈遵旨籌議臺灣改設行省事宜疏〉，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上海：廣百宋齋校印，1891 年，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卷 75，〈兵政十四・塞防下〉，頁 11-12。

[11] 謝美娥，〈十九世紀後半期臺灣米價的可靠性評估——以「清代糧價資料庫」所輯米價數據為主〉，中國經濟史學會、清華大學歷史學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合辦，「紀念梁方仲教授誕辰 100 周年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2008 年 11 月 20-2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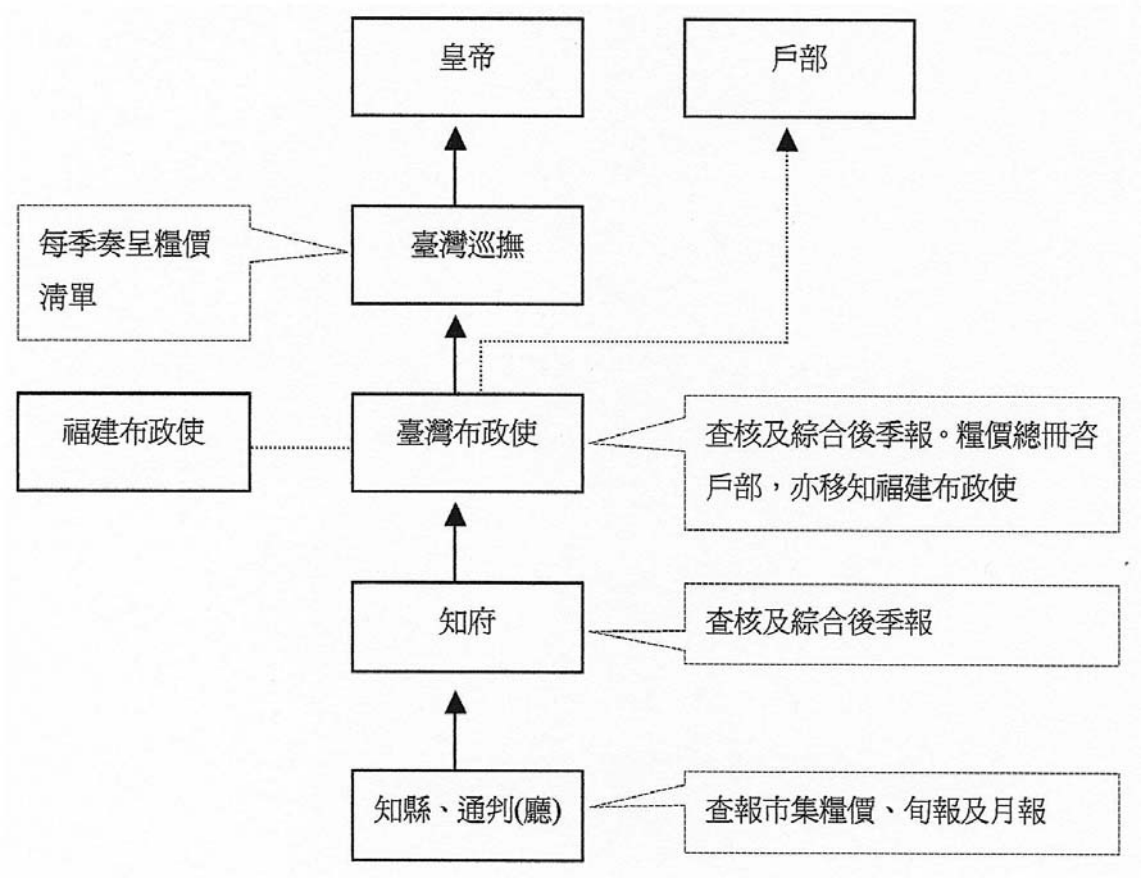
用府級米價進行研究。



實線箭頭爲主要管道　虛線箭頭爲輔助管道

圖 5：清代臺灣建省前糧價陳報程序圖

資料來源：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56，圖 1.2。



實線箭頭爲主要管道　虛線箭頭爲輔助管道

圖 6：清代臺灣建省後糧價陳報——經常報告程序圖

資料來源：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57，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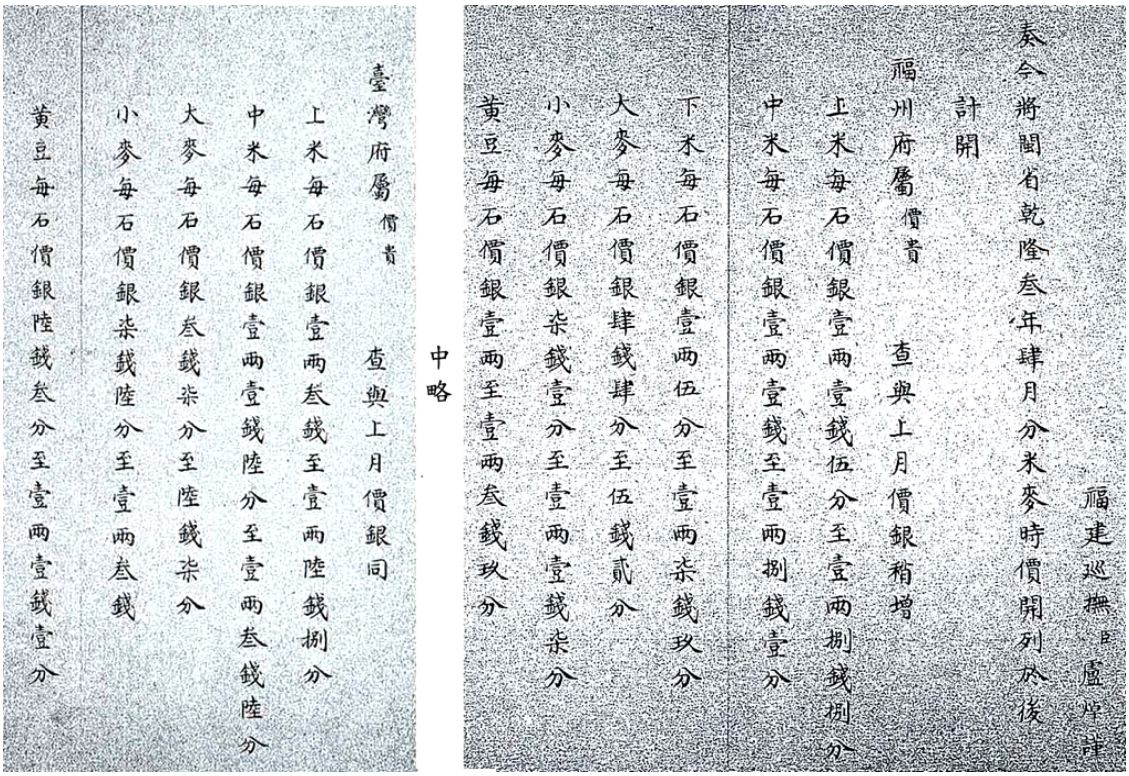

福建巡撫臣盧焯謹
奏今將閩省乾隆叁年肆月分米麥時價開列於後
計開
福州府屬價貴　查與上月價銀稍增
上米每石價銀壹兩壹錢伍分至壹兩捌錢捌分
中米每石價銀壹兩壹錢至壹兩捌錢壹分
下米每石價銀壹兩伍分至壹兩柒錢玖分
大麥每石價銀肆錢肆分至伍錢貳分
小麥每石價銀柒錢壹分至壹兩壹錢柒分
黃豆每石價銀壹兩至壹兩叁錢玖分
中略
臺灣府屬價貴　查與上月價銀同
上米每石價銀壹兩叁錢至壹兩陸錢捌分
中米每石價銀壹兩壹錢陸分至壹兩叁錢陸分
大麥每石價銀叁錢柒分至陸錢柒分
小麥每石價銀柒錢陸分至壹兩叁錢
黃豆每石價銀陸錢叁分至壹兩壹錢壹分

圖 7：「經常報告」的書寫格式，乾隆 3 年（1738）4 月福建省糧價清單——臺灣府，福建巡撫盧焯奏

資料來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 13 輯，頁 422、427。

(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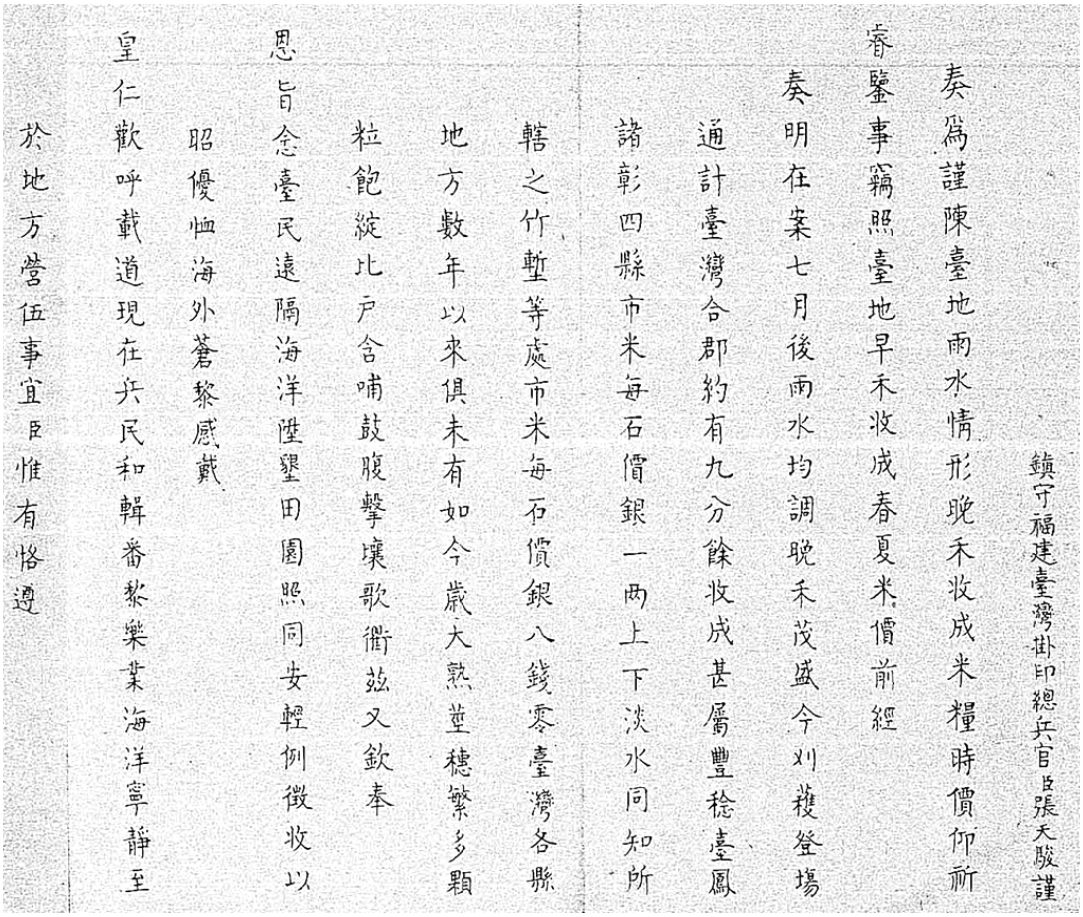


圖 8：「不規則報告」的書寫，乾隆 9 年（1744）10 月 15 日臺灣總兵張天駿奏

資料來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滙編》，第 21 輯，頁 284-285。

表 1：十九世紀臺灣分區米價數據及斷限

時期	行政區	米價數據斷限	糧食類別
二府時期（隸福建省）	臺北府	G4.3- G13.12（1878.5-1888.1）	上米、中米、下米各含低價、高價兩數列
	臺灣府	G2.1-G13.12（1876.2-1888.1）	同上
臺灣省時期	臺北府	G14.1-G20.9（1888.3-1894.10）	同上
	臺灣府	G14.1- G20.9（1888.3-1894.10）	同上
	臺南府	G15.4- G20.9（1889.5-1894.10）	同上
	臺東直隸州	G18.4- G20.9（1892.5-1894.10）	同上

說　　明：D、X、T、G 分別表示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各年號。

資料來源：謝美娥，〈十九世紀後半期臺灣米價的可靠性評估——以「清代糧價資料庫」所輯米價數據爲主〉，中國經濟史學會、清華大學歷史學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合辦，「紀念梁方仲教授誕辰 100 周年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2008 年 11 月 20-21 日。

上表中 36 種十九世紀臺灣分區米價數據並不能直接取用，應該進行數據的可靠性評估以及遺漏值（missing value）的補值。據筆者所做的評估結果，可以做爲米價相關分析的高可靠性米價資料以低價數列品質較高價數列爲佳（但並不表示高價數列不可用），其中以仍隸福建省的二府時期（臺北府 1878 年 5 月至 1888 年 1 月、臺灣府 1876 年 2 月至 1888 年 1 月）較爲可用。此外，上、中、下三種米別在各府之內無明顯差異，任何一種米別都是可以利用的。相對之下，建省時期（1888 年 3 月至 1894 年 10 月）的米價數列品質較爲參差，因府而異，唯臺北府的低價數列和臺東直隸州兩種數列米價相對較好。[12]

根據此一可靠性評估結果，很慶幸地，二府時期的臺北府和建省後的臺北府米價數列品質都很好，圖 9.1-9.3、圖 10.1-10.3 呈現的是經過遺漏值處理過的 12 種逐月米價時間數列。[13]

不過，臺北府米價因按行政轄區調整時間，被分爲隸屬福建省、隸屬臺灣省前後兩個時期，是否可以將之併爲同一米價數列？這將視臺北府在二府時期和建省時期的轄區是否仍有相當大的疊合而定。

光緒元年十二月（1876 年 1 月）臺灣行政區的調整，使臺地從一府劃爲二府，進入二府時期，主要的調整是新設臺北府：[14]

> （光緒元年十二月）癸未，諭內閣：前據沈葆楨等先後具奏，臺北擬建府廳縣治、請移紮南北路同知、酌改臺地營制、臺屬考試請歸巡撫主政各摺片，當派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妥議具奏。茲據奏稱：沈葆楨等所奏各節，係為因時制宜起見，自應准如所請等語。著照軍機大臣等所議，准其於福建臺北艋舺地方，添設知府一缺，名為臺北府，仍隸於臺灣兵備道。附府添設知縣一缺，名為淡水縣。其竹塹地方，原設淡水廳同知，即行裁汰，改設新竹縣知縣一缺。並於噶瑪蘭廳舊治添設宜蘭縣知縣一缺，即改噶瑪蘭廳通判為臺北府分防通判，移紮雞籠地方。[15]

這是將縣級的淡水廳改設爲府級的臺北府，行政層級升格。同時，裁去在竹塹的廳治，易爲新竹縣知縣駐地，新設的臺北府府治改在艋舺，以淡水縣爲其附郭。

---

[12] 米價的可靠性評估方法及其結果見謝美娥，〈十九世紀後半期臺灣米價的可靠性評估——以「清代糧價資料庫」所輯米價數據為主〉。

[13] 以插補法及季節指數法補遺漏值，參見謝美娥，〈十九世紀後半期臺灣米價的可靠性評估——以「清代糧價資料庫」所輯米價數據為主〉。

[14] 張本政主編，《清實錄臺灣史資料專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1032。北京市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司編，《臺灣史料輯》，（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 年），第 13 冊，頁 3560、3556。設府建縣之議見沈葆楨，〈臺北擬建一府三縣摺〉，饒玉成，《皇朝經世文編》（光緒 8 年，1882 年；同治 12 年刊，1872 年；光緒 8 年補刻續編江右饒氏雙峰書屋刊本，1882 年），卷 84，〈兵政十五・海防中〉，頁 20-23。陳衍纂輯，《臺灣通紀》（臺灣文獻叢刊第 120 種），卷 4，頁 202-203。

[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年），第 1 冊，頁 505-509。

另，噶瑪蘭廳也做縣級易名，改爲宜蘭縣。由淡水廳到臺北府，納入原噶瑪蘭廳轄區，行政區擴大，府下轄淡水、新竹、宜蘭三縣。

至建省時期，臺北府轄區爲宜蘭縣、基隆廳、淡水縣、南雅廳（光緒二十年，1894 年，從淡水縣桃澗堡分出）、新竹縣，其中又將新竹縣西南一帶分出，設爲苗栗縣。[16] 比較兩個時期臺北府轄區的變化，建省時期的臺北府比二府時期略小，少了新竹西南一帶，變化並不大。因此，大致而言，建省時期的臺北府所轄與二府時期的差距尚微。亦即從淡水廳到臺北府，轄區範圍的變動不至於太顯著，依然是廣義而言的「淡水」地區或北部臺灣地區。臺北府兩個時期的米價因地理範圍重疊比例相當高，可以一貫相連。圖 11.1-11.3 是合併兩個時期後並且處理過遺漏值的臺北府逐月米價時間數列。

一般而言，清代糧價清單陳報的上米、中米、下米三種米別，大致與米的品種、品質、價格等的等級有關，原則上其等次大抵按上、中、下由高而低。爲了平衡起見，本文選擇等級居中的臺北府中米數列。又，爲方便下一節進行米價相關分析，此處將中米低價和高價兩數列的逐月米價計爲年平均米價，再計兩數列的平均值，並將其趨勢標示出來，其數據見表 2，圖示於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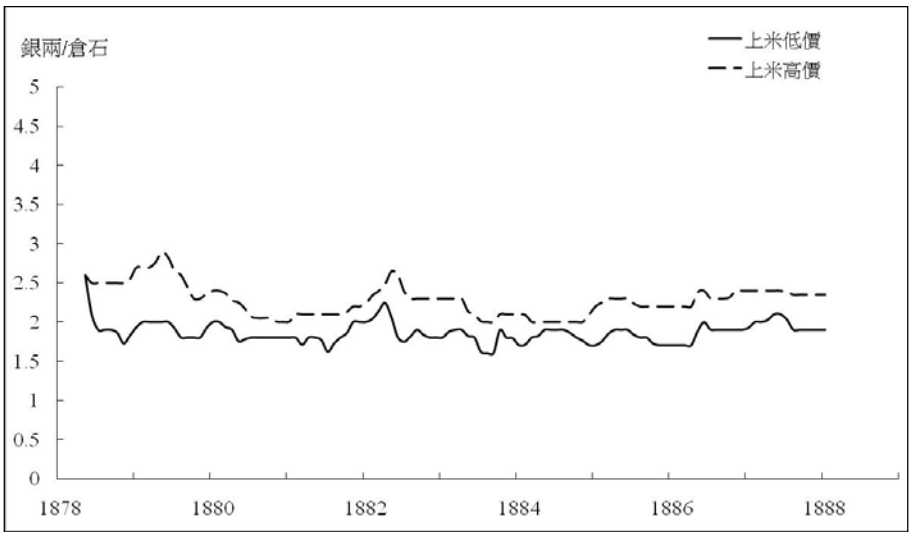


圖 9.1：二府時期臺北府上米米價（1878-1888）

資料來源：謝美娥，〈十九世紀後半期臺灣米價的可靠性評估——以「清代糧價資料庫」所輯米價數據爲主〉，附錄：十九世紀後半期臺灣米價（以府爲單）之附表 2：二府時期。

[16] 洪敏麟、陳漢光、廖漢臣等編，《臺灣堡圖》（小冊，據日本明治 39 年（1906）至大正 20 年（1931）等七次不同版本縮製，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9 年），〈臺灣歷代行政區域變遷概述〉，頁 1-3、11-12。張勝彥，《清代臺灣廳縣制度之研究》（臺北：華世出版社，1993 年），第 1 章，〈廳縣轄區之劃定與調整〉，頁 5-57。劉銘傳，〈籌議改設臺灣郡縣疏〉（光緒 13 年，1887 年），《劉銘傳撫臺前後檔案》（臺灣文獻叢刊第 276 種），頁 269-271。陳衍纂輯，《臺灣通紀》（臺灣文獻叢刊第 120 種），卷 4，頁 225。《清實錄・德宗景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四），卷 227，頁 65；卷 230，頁 104。不著撰人，《臺灣地輿全圖》（臺灣文獻叢刊第 185 種），〈臺北府輿圖說略〉，頁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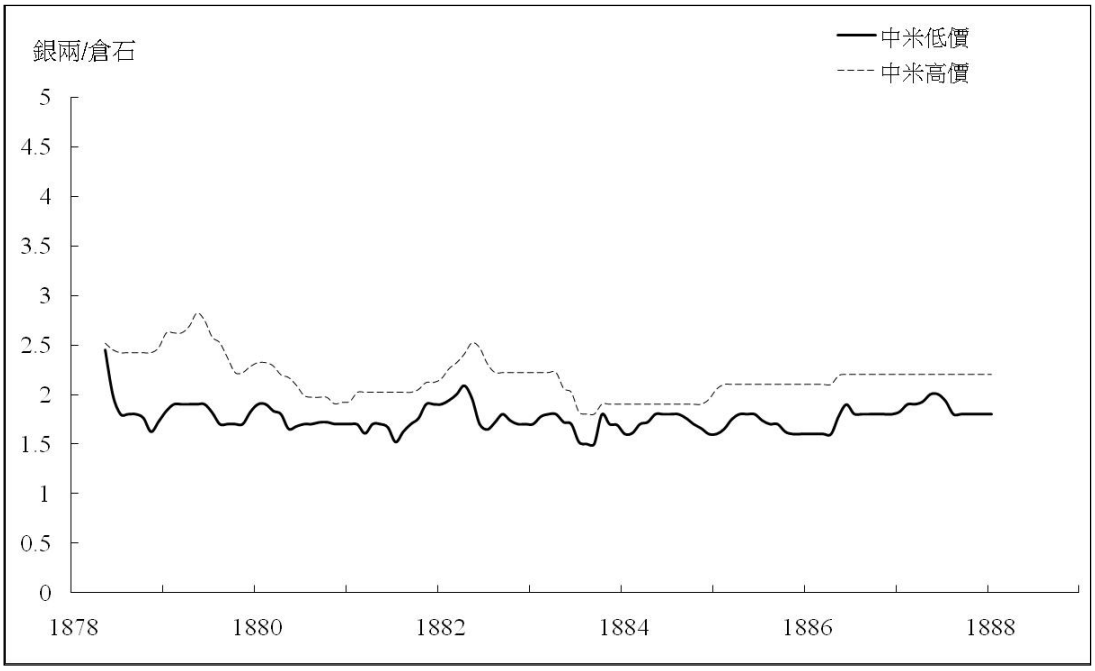


圖 9.2：二府時期臺北府中米米價（1878-1888）

資料來源：同圖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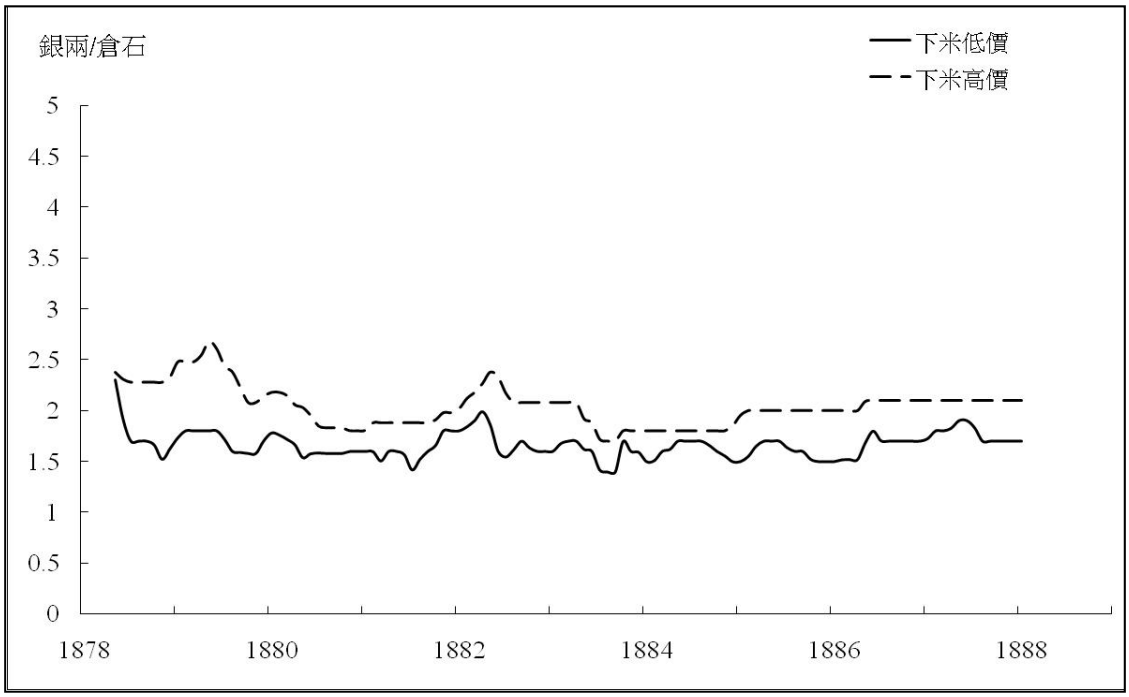


圖 9.3：二府時期臺北府下米米價（1878-1888）

資料來源：同圖 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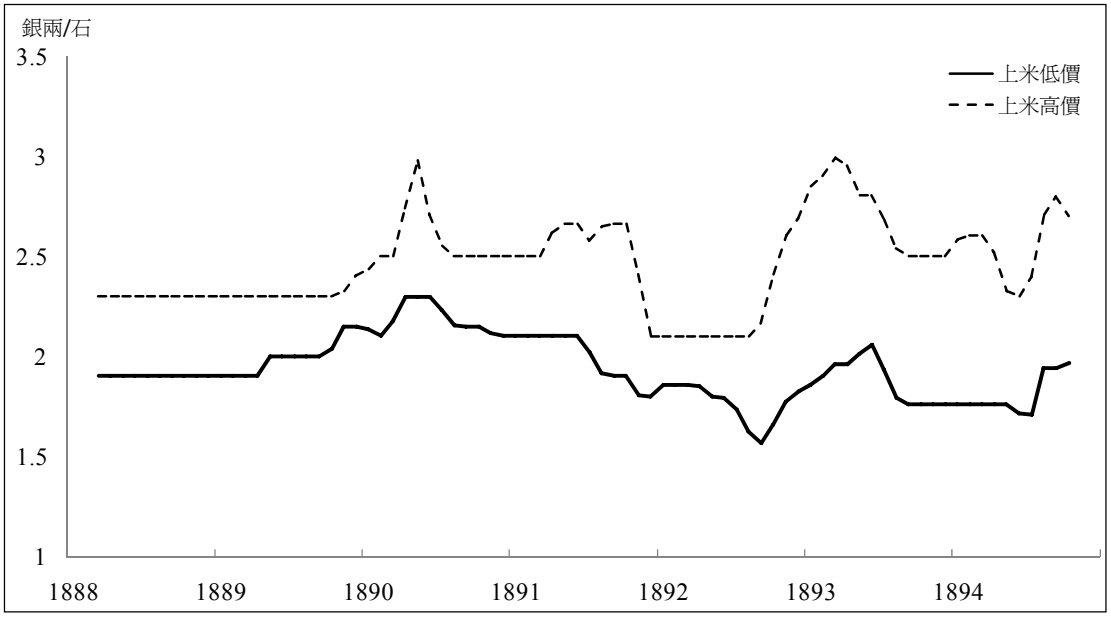


圖 10.1：建省後的臺北府上米米價（1888-1894）

資料來源：謝美娥，〈十九世紀後半期臺灣米價的可靠性評估——以「清代糧價資料庫」所輯米價數據爲主〉，附錄：十九世紀後半期臺灣米價（以府爲單）之附表 3：建省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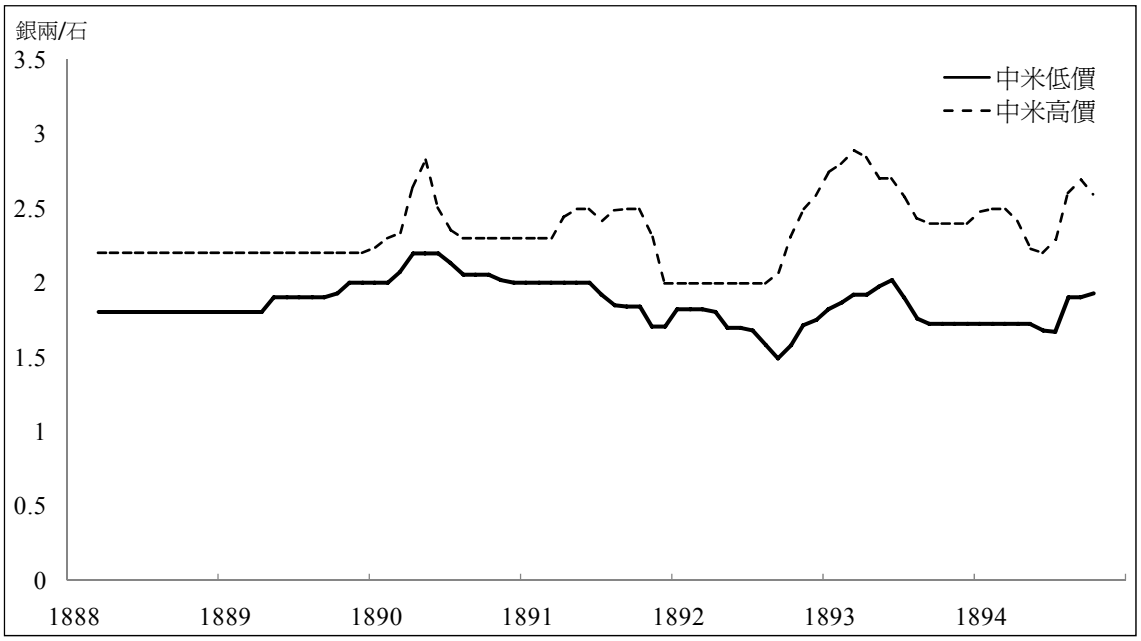


圖 10.2：建省後的臺北府中米米價（1888-1894）

資料來源：同圖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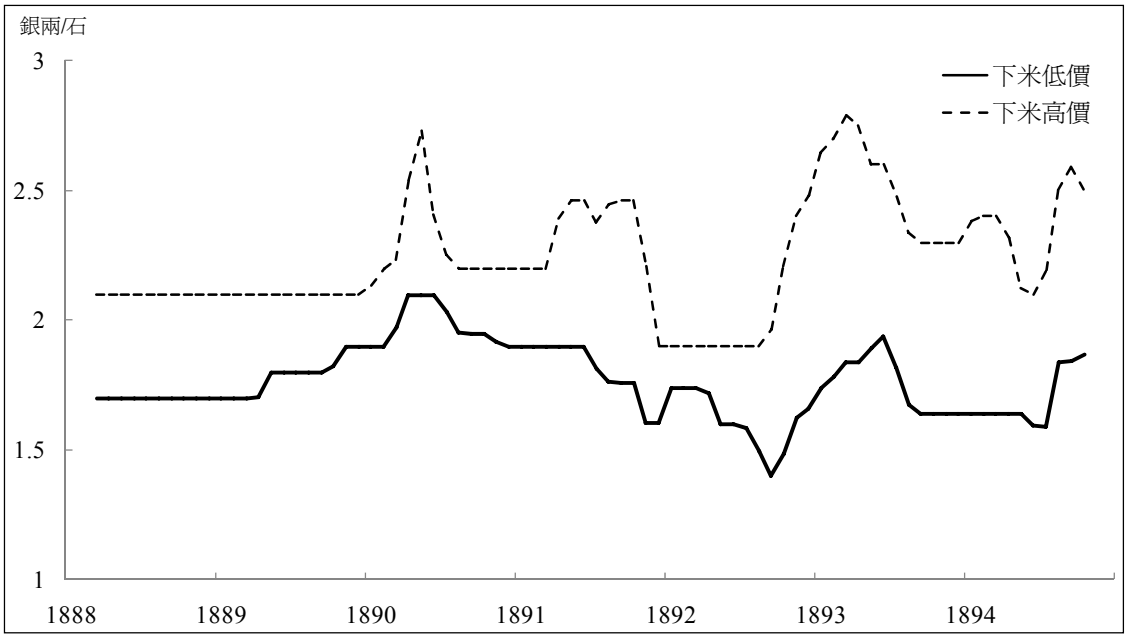


圖 10.3：建省後的臺北府下米米價（1888-1894）

資料來源：同圖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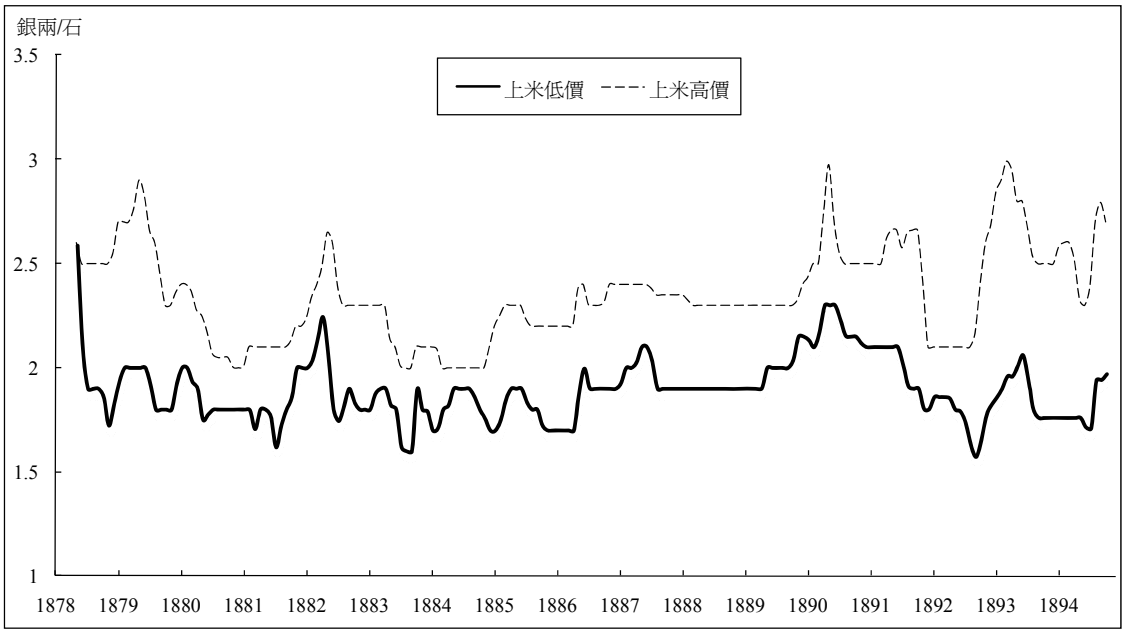


圖 11.1：19 世紀臺北府上米米價（1878-1894）

資料來源：謝美娥，〈十九世紀後半期臺灣米價的可靠性評估——以「清代糧價資料庫」所輯米價數據爲主〉，附錄：十九世紀後半期臺灣米價（以府爲單）之附表 2：二府時期、附表 3：建省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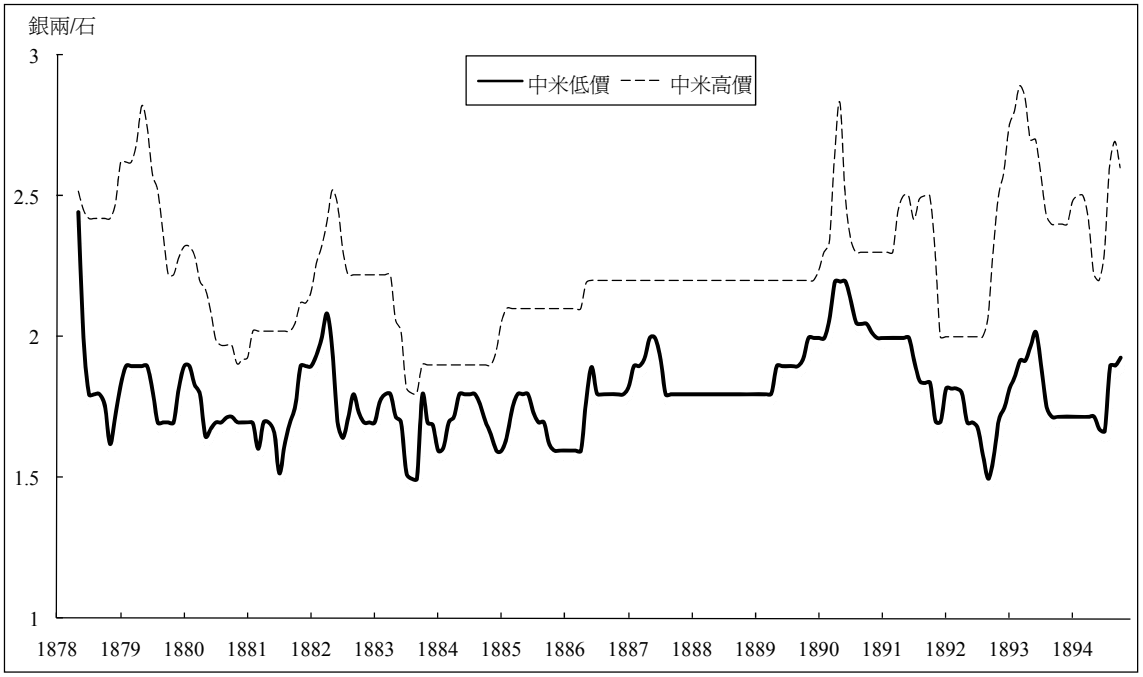


圖 11.2：19 世紀臺北府中米米價（1878-1894）

資料來源：同圖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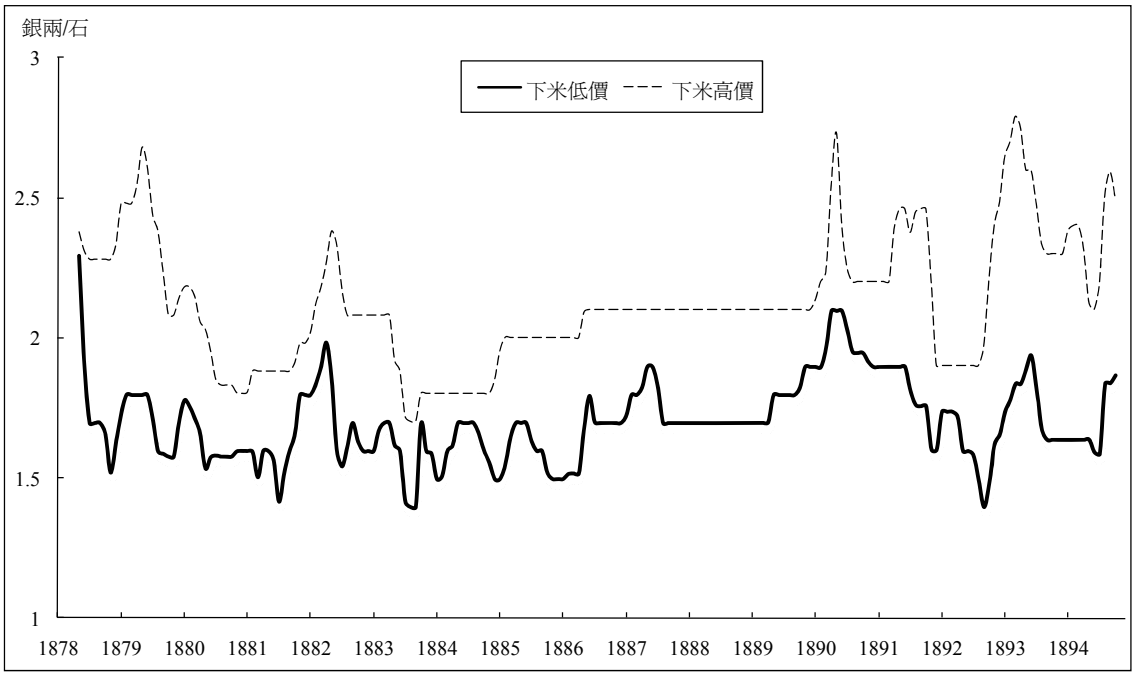


圖 11.3：19 世紀臺北府下米米價（1878-1894）

資料來源：同圖 11.1。

表 2：19 世紀臺北府年均米價及其趨勢值（1878-1894）

單位：銀　分/石

年	年均價	趨勢值	年	年均價	趨勢值
1878	216	194	1887	204	203
1879	217	195	1888	200	204
1880	192	196	1889	204	205
1881	187	197	1890	224	206
1882	206	198	1891	214	207
1883	185	199	1892	191	208
1884	181	200	1893	222	209
1885	190	201	1894	211	210
1886	195	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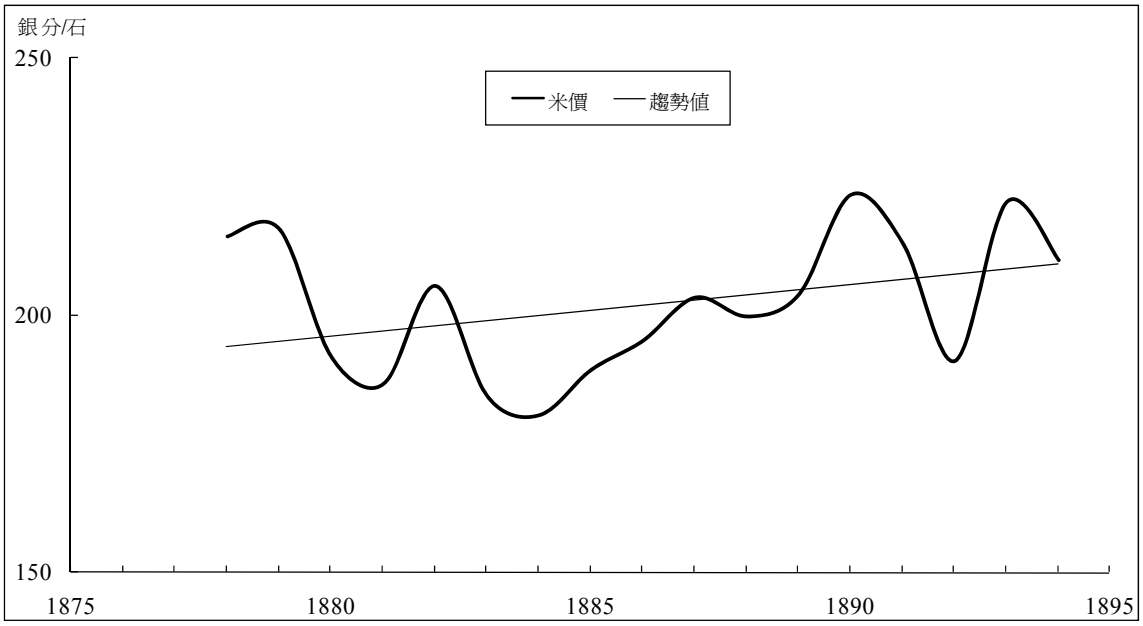


圖 12：19 世紀臺北府年均米價及其趨勢（1878-1894）

資料來源：表 2。

（二）民間帳簿中的米價數據——淡水廳廣記、竹塹義民廟

在臺灣，專事清代臺灣經濟史的研究學群，向來不太碰觸需要較多計量方法的米價史，部份涉及米價研究的早期學者，所用方法正誤與否姑且不論，其所賴以立論的史料則多依賴民間帳簿。[17] 民間帳簿的獲得其實不易，若非公藏機構

[17] 除了王世慶，還有李冕世、黃典權、周省人皆用帳簿研究米價，見黃典權，〈古帳研究一例〉，《臺南文化》，第 6 卷第 3 期，1959 年，頁 1-89。李冕世、黃典權，〈清代臺灣地方物價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歷史學報》，第 4 號，1977 年，頁 41-129。周省人，〈清代臺灣米價誌〉，見《臺灣經濟史十集》，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臺北：古亭書屋影印出版，1979 年），下冊，頁 118-137。

有系統的訪蒐，則帳簿的出土概憑機緣。但是質、量皆優且可以用來做米價史研究的帳簿並不多見，因爲民間帳簿自成一套書寫體系，內容譯解的難度、所記年月的連續性、指事的清晰度、帳簿格局的完整性等等都會影響其品質。縱使某些帳簿包含了米價的記錄，其記錄量總未如人意，少許的數據無法構成一個較長的時間數列，難以據之捕捉價格的時間變化。因此帳簿中的米價訊息數量若夠多，年月數較長且連續，則是優質帳簿，適宜運用。本文所用的兩種帳簿的品質即屬這一水平。

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中收入一本長達 28 年的淡水廳興直堡張姓小租戶的《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吉置廣記總抄簿》，曾被利用爲農村借貸利息及米價變動的研究。[18] 另一爲新竹枋寮義民廟廟產的收支帳《敕封粵東義民廟祀典簿》，帳簿記錄年年延續，達 59 年之久，曾被用來研究銀錢比價。[19] 不過後一種帳簿的米價訊息相當豐富，直到近期才有人將其譯解，難能可貴。[20]

兩種帳簿中有效的米價訊息斷限，《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吉置廣記總抄簿》爲 1843-1869 年，《敕封粵東義民廟祀典簿》則是 1835-1893 年。值得注意的是，前者的下限年和後者斷限的前四分之三年數，都在臺灣行政區還是一府時期之內，且同屬淡水廳轄區。而在一府時期，官方米價數據的糧價清單只有臺灣府一種府級米價，府級以下米價資料至今未見。[21] 據此，不難想見淡水廳廣記和新竹（竹塹）義民廟這兩種帳簿的價值有多麼高了，是民間優質米價史料可補官方米價史料不足的佳例。

廣記和義民廟所在的地點爲興直堡和竹塹新埔，都位於盛產米穀的淡水廳（淡防廳、臺北府）區域內，其本地及週邊一帶也都有市街鎮形成，商業繁榮。十八世紀初期尹士俍《臺灣志略》稱：

---

[18] 張偉仁、王世慶編，《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第 10 輯，第 6 冊，第 271 目，頁 0330-0527。王世慶，〈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農村金融之研究：以興直堡銀主小租戶廣記爲例〉，見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 1-72。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第 6 章第 2 節，〈銀錢比價與米價變動〉。

[19] 賴玉玲，〈帳簿的運用與史料價值——以《粵東義民祀典簿》為例〉，《史匯》，第 5 期（2001 年 8 月），頁 24。王世慶，〈十九世紀中後期臺灣北中部銀錢比價變動續探（1839-1895）〉，《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 年），第 8 輯，頁 239-268。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第 2 章第 2 節，〈長期趨勢的檢驗〉。蒐藏此帳簿（複本）的是賴玉玲女士，她本人當然用它來做研究，已出版《褒忠亭義民爺信仰與地方社會發展——以楊梅聯庄為例》（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 年）一書。另，林桂玲《家族與寺廟——以竹北林家與枋寮義民廟為例（1749-1895）》（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7 年）、鍾仁嫻主編的《義民心鄉土情——褒忠義民廟文史專輯》（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1 年），皆未見用於物價方面的研究。

[20] 數年前本人透過許毓良教授的熱心協助，獲賴玉玲女士慨允影印該帳簿，非常感謝他們。帳簿米價資料的譯解參考黃瓊儀，〈從《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看清代竹塹地區的米價變化（1835-1893）〉，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21] 按清代糧價陳報制度的運作，縣級政府每旬都蒐有市集米價，向上層層冊報，每月都由省級政府彙整由縣送來的糧價細冊送往戶部存查。然而縣級政府的糧價細冊至今出土或被發現者無幾。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45-48。

> 淡防廳所屬為竹塹保（內有八庄）、淡水保（內有二十一庄），合二保（內有二十九庄）計一千零七十五戶，共男女三千二百五十七丁口。竹塹建城栽竹，修衙署、起營防，市廛漸興，人煙日盛。大溪墘南北八十餘里，地土廣闊。淡水內港，戶頗繁衍，牧笛漁歌，更唱疊和，油油於熙皞之天，風俗樸實，終年少鬥毆、爭訟之事。所產稻穀，賤於通臺。[22]

竹塹因有軍政機關駐紮，[23] 商業據點的形成與維持更穩定，而此時廳北一帶開發後也以產稻著稱，淡水廳的稻穀價格經常低於其他地區。不過，《臺灣志略》所描述的景象，在乾隆初年福建巡撫周學健看來，北部臺灣的新墾地開發仍舊「僻在內山」；可是此地居民別無出產，專藉米糧以資用度，其稻穀產地價格「挑運出山尚須運費，每石合計不過 4 錢有奇，已屬賤價」。[24] 淡水廳開發前景甚好，在乾隆十七年（1752）一份官方報告提到：

> 臺灣戶口蕃盛，比之從前，何啻二三倍。而淡水一帶，沃野緜亙，邇年出產米穀，南北二路及府治窮民，多有挈家赴淡謀食，商旅貿易往來叢雜，向之荒郊僻壤，漸成村莊市集。[25]

報告內容說明了不到十八世紀中期，淡水廳已經以產穀爲名，其土地福利陸續吸引島內謀食者向北移動。

位於淡水廳北部的興直堡，據乾隆年間兼理臺灣府北路淡防同知的彰化知縣胡邦翰的描述：

> 興直保在竹塹城北百里，北為峰子峙山，南為龜崙山，東面擺接山，西枕八里坌山，四面環繞，平原廣開，水田肥美，實為臺北要區、天然巨鎮也。中有新庄街一道，商販雲集，煙戶甚眾。凡內地人民赴臺貿易，由郡而來北路，必至於是。[26]

可知十八世紀中葉興直堡水田廣開，已可稱爲臺北巨鎮，是北路重要的聚居地，而且堡內有商業繁榮的新庄街。在某一段時間，新庄街的發展曾被定於「一府二鹿三新莊」的地位。[27] 興直堡一地「平原闢萬頃膏腴，足徵富庶」，「市肆聚千家煙火，具見繁滋」，「惟距塹城窵遠，鞭長莫及，是以專駐八里巡檢，在彼彈壓」。

---

[22] 尹士俍著，李祖基點校，《臺灣志略》（乾隆 3 年序，1738 年，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年），中卷，〈民風土俗〉，頁 47。

[23] 雍正 9 年（1731）之後由彰化縣轄分出淡水廳，但初期淡水廳的同知衙門仍留彰化，乾隆 21 年（1756）才移駐竹塹。詹雅能編撰，《明志書院沿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2002 年），頁 19-20。

[2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倉儲》（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7 年），第 20 冊，頁 217。

[25] 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2003 年），第 7 冊，頁 68。

[26] 不著撰人，《明志書院案底》，頁 115。

[27] 陳宗仁，《從草地到街市：十八世紀新庄街的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6 年），頁 201。

[28] 八里即八里坌，自雍正九年（1731）起與竹塹同時設巡檢，在開爲正口之前已見糧食由此進出口。[29] 其後由於八里坌巡檢駐地海口漲塞、無船隻出入，而新庄「原爲該巡檢管轄之地，現商賈聚集，煙戶稠密，且北聯艋舺、大加臘，南距霄裡汛、大溪乾一帶」，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八里坌巡檢改爲新庄巡檢，移駐新庄。[30]（圖 13）一旦駐有巡檢，對治安、商業發展更爲有利。[31] 此外，興直堡距新庄街只有 5 里（2.5 公里），[32] 廣記張姓小租戶帳簿內記錄的穀物交易行爲，反映的正是興直堡內米市變動的情況。

至於竹塹，在改制爲新竹縣之前，此地是淡水同知駐紮處，淡水廳的行政首府。《臺灣志略》稱「竹塹居淡屬之中，建城修署，漳、泉、潮、惠之民耕種生理者，日漸雲集」。[33] 姚瑩道光元年（1821）的〈臺北道里記〉記竹塹「民居約二千餘戶」，又於道光二十年（1840）〈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描述竹塹港爲淡水廳的四個次級口岸之一，「在淡廳治北十里，民居舖戶頗稠，有文武於此稽查」；遙對閩省福清縣的海壇，商艘絡繹。[34] 晚清時，新竹縣的竹塹堡就有四個米市，分別在縣城內、九芎林街、樹杞林街、北埔街，爲每日市：

> 米市，一在縣城內北鼓樓外，一在縣東二十里九芎林街，一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樹杞林街，一在縣東南三十二里北埔街；皆城廂窶戶及各村莊農人用竹籃挑運到此，排設街中為市。每日辰時畢集，日晚則散。[35]

米市的米糧來源皆由週邊村莊生產匯集而來，共同構成以米糧生產與流通爲主的地區。此外，縣內的竹北堡、竹南堡也各有兩個米市（新埔街、鹹菜甕街；中港

---

[28] 不著撰人，《明志書院案底》，頁 115

[29] 北京市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司編，《臺灣史料輯》，第 4 冊，頁 1069。「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登錄號 118054。

[30] 乾隆三十一年（1766）閩浙總督蘇昌奏請移駐新庄，隔年吏部即議准。「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058413。見《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卷 779，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二月甲寅，頁 561-2。

[31] 巡檢為縣級政府中的文職官，通常設於人口密集區或偏遠要地。據《安平縣雜記》（日治初期，1895 年後，臺灣文獻叢刊第 52 種）頁 99 之〈安平縣職官及其衙署〉，其職「秩從九品，職任緝捕盜賊」。然其職務似可因地制宜，淡水廳竹塹巡檢「稽查地方兼司獄務」，八里坌巡檢則是「稽查地方」。由於八里坌巡檢駐地靠近港口，通常也負責船隻進出的盤查掛驗。劉良璧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乾隆 6 年序，1741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卷 13，〈職官一（文職）‧官制〉，頁 348。姚瑩，〈籌議噶瑪蘭定制〉，姚瑩，《東槎紀略》（道光 9 年序，1829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7 種），卷 2，頁 41。

[32] 不著撰人，《明志書院案底》，頁 116。

[33] 尹士俍著，李祖基點校，《臺灣志略》，上卷，〈全郡形勢〉，頁 5。

[34] 北京市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司編，《臺灣史料輯》，第 4 冊，頁 1069。張本政主編，《清實錄臺灣史資料專輯》，頁 102。尹士俍著，李祖基點校，《臺灣志略》，上卷，〈全郡形勢〉，頁 5。姚瑩，〈臺北道里記〉、〈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姚瑩，《東槎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7 種），卷 3，頁 89；卷 4，頁 111。姚瑩，〈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道光 20 年，1840 年），姚瑩，《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之《東溟文後集》，卷 4，頁 82。李元春，《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8 種），卷 1，〈地志〉，頁 18。

[35] 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清光緒 20 年，1894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45 種），卷 2，〈倉廒〉，頁 102-103。

街、頭分街），同樣是每日市。[36] 義民廟位於新埔枋寮，其營運管理自道光十五年（1835）後由新埔街六大商號輪值，已知其米穀兌現的交易點、廟產及租權等分布及於竹塹堡、竹北堡、竹南堡，[37] 其帳簿記錄的米價變動不會只反映新埔街米市行情，而是反映竹塹（新竹）一帶較大地區米糧供需的價格變動情形。

清代臺灣民間帳簿記錄價格的貨幣單位主要使用最通行的銀元，次爲銅錢，極少以紋銀（銀兩）結算，這兩種帳簿也不例外。然而糧價清單上的米價貨幣單位是以銀兩計，考慮可比性的問題，一概將這兩種帳簿以銀元計數的價格轉換爲以銀兩表示的價格。[38] 同時，兩種帳簿所記大多是穀價，糧價清單則是米價，爲便於分析，按一米兩穀轉換。轉換之後，淡水廳廣記的年均米價、趨勢示於圖 14，竹塹義民廟（竹塹地區）的年均米價和趨勢值則列於表 3 和示於圖 15。

[36] 陳朝龍，《新竹縣采訪冊》（臺灣文獻叢刊第 145 種），卷 2，〈倉廒〉，頁 104-105。

[37] 黃瓊儀，〈從《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看清代竹塹地區的米價變化（1835-1893）〉，頁 27-29、36、38、61，表 5、表 6、表 14。

[38] 據王世慶的研究，十九世紀中北部貨幣流通殆以六九銀元為主，轉換之法為佛銀 1 元=庫平銀（紋銀）0.69 兩。王世慶，〈十九世紀中葉臺灣北部銀錢比價變動初探〉，收於《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臺灣與華南社會（1600-190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頁 148-149。兩種銀通貨的轉換，參考鄭永昌，〈清代前期臺灣貨幣流通的發展與演變（1684-1800）〉，《故宮學術季刊》，第 19 卷第 1 期，2001 年，頁 227-261。



圖 13：十八世紀中期的興直堡、新庄街

說　　明：此圖爲《清乾隆朝臺灣輿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局部，圖中圈線處即興直堡、新庄街所在，新庄街設有巡司署，八里坌設有倉廒，其對岸的滬尾、帆船航入關渡門後的艋舺似都還剛發展。據林天人加註的圖說，學界大致認爲是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四年（1756-1759）間繪製。然而圖中新庄街已有巡司署，即巡檢衙署，八里坌則未見。八里坌巡檢改爲新庄巡檢並移駐新庄的時間爲乾隆三十二年（1767），故輿圖繪製時間的上限應在此年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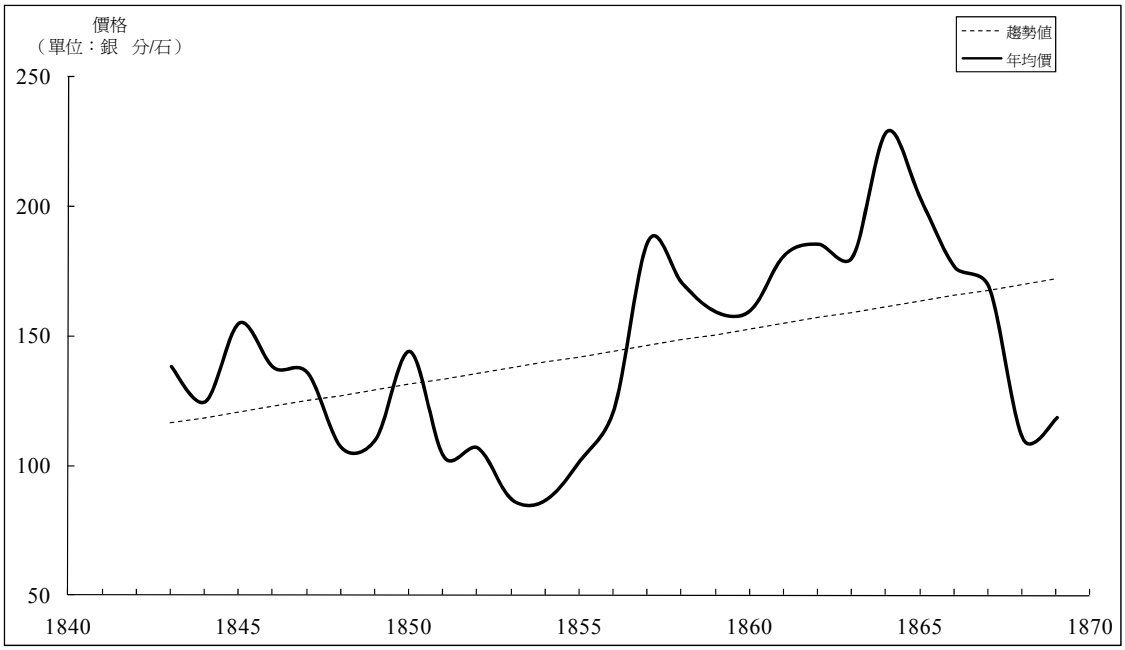


圖 14：清代臺灣府淡水廳廣記年均米價及趨勢（1843-1869）

資料來源：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127-128，表 2.6。

表 3：清代竹塹地區年均米價及趨勢值（1835-1893）

單位：銀　分/石

年	年均米價	趨勢值	年	年均米價	趨勢值
1835	179	109	1865	184	132
1836	181	110	1866	190	133
1837	127	110	1867	120	134
1838	83	111	1868	89	135
1839	115	112	1869	140	135
1840	80	113	1870	128	136
1841	69	114	1871	132	137
1842	86	114	1872	173	138
1843	84	115	1873	130	139
1844	150	116	1874	112	139
1845	108	117	1875	127	140
1846	116	117	1876	199	141
1847	112	118	1877	182	142
1848	89	119	1878	191	142
1849	120	120	1879	171	143
1850	84	121	1880	148	144
1851	89	121	1881	168	145
1852	97	122	1882	132	146
1853	79	123	1883	117	146
1854	81	124	1884	110	147
1855	97	125	1885	127	148
1856	85	125	1886	135	149
1857	145	126	1887	135	149
1858	161	127	1888	133	150
1859	131	128	1889	157	151
1860	145	128	1890	153	152
1861	151	129	1891	133	153
1862	152	130	1892	138	153
1863	169	131	1893	147	154
1864	194	132			

資料來源：黃瓊儀，〈從《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看清代竹塹地區的米價變化（1835-1893）〉（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67-68，表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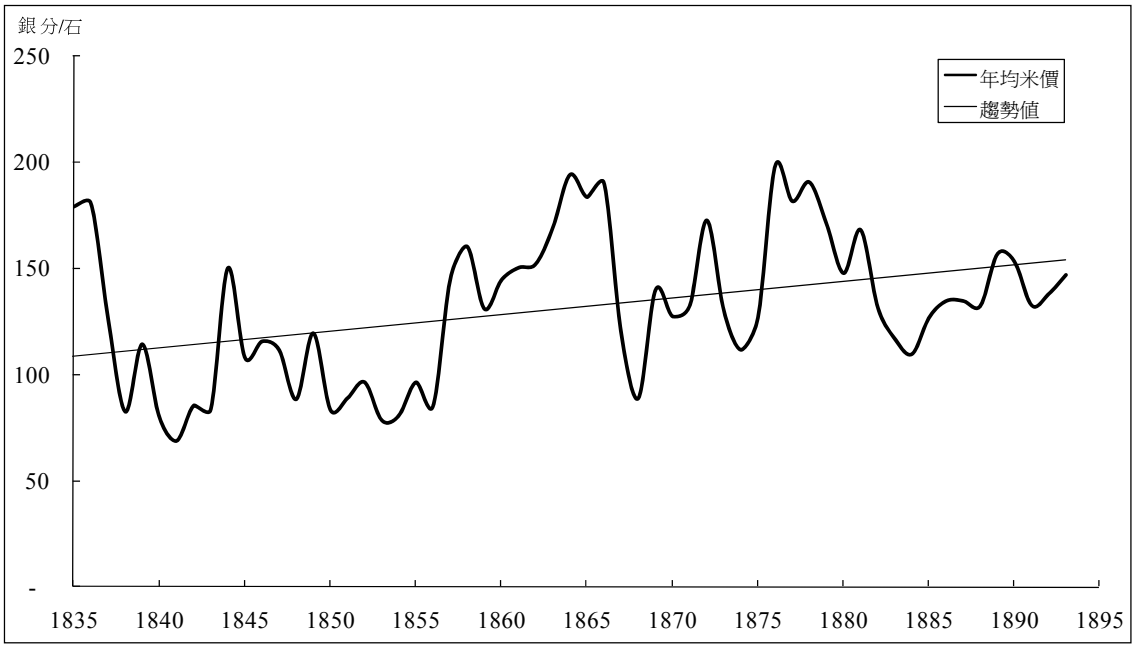


圖 15：清代竹塹地區年均米價及趨勢（1835-1893）

資料來源：表 3。

三、米價變動、相關分析與糧食市場整合

上一節經過可靠性評估且補過遺漏值的臺北府米價數列，以及經過譯解、貨幣單位轉換爲與官方米價一致的兩種民間帳簿米價數列，已成爲可進行各種分析的計量資料。本節將先概括這三種數列的變動樣貌，接著進行相關分析以及解讀計量分析結果。

（一）米價變動樣貌

此處將臺北府（1878-1894）、淡水廳廣記（1843-1869）、竹塹義民廟（1835-1893）三種米價及趨勢合於圖 15，如圖所示，無論哪一種米價數列，其價格變動的總趨勢皆爲上升，尤其廣記數列的上升較爲顯著。[39] 價位水平則是臺北府最高，廣記次之，竹塹居末。[40] 可以說，在淡水廳時期或臺北府時期，北部臺灣的南部米產區糧食供需比北部相對餘裕。

個別數列的變動情形方面，臺北府米價可以 1884 年爲分，之前爲下降之勢，之後則向上爬升，而 1892 年來到新低點後再行攀升。廣記數列在 1853-1854 年爲價格低谷，之前爲下降之勢，1854 年後到 1860 年代，也就是開港前後，大幅

[39] 顯著與否，以斜率來看，臺北府、淡水廳廣記、竹塹義民廟三種米價數列的斜率分別為 0.71、2.14、0.78，三個值都是正值，意即三種米價數列分別平均每年上升 0.71 分、2.14 分、0.78 分（銀兩制）。

[40] 以數列的截距來看，臺北府、淡水廳廣記、竹塹義民廟三種米價數列的截距分別為 201.69 分、144.21 分、131.52 分（銀兩制），分別是三種米價數列在其斷限期間的平均米價。

度向上揚升，並繼續處於價格高峰，在高價維持了十一年（1857-1867）才見下落，且其下落幅度大。竹塹數列 1835-1841 年從價格高點下降，看起來似是上一個波動的結束。接下來包含數個波動，應是 1841-1853 年、1853-1868 年、1868-1884 年（或再分爲 1868-1874 年、1874-1884 年）、1884-1891 年。而 1891 年進入新低點後再上揚，與臺北府相同，應該都是另一段波動的起始。其中，如果將 1835-1841 年與 1841-1853 年視爲一個年段的話，則整個年段的趨勢是下降的；再以臺灣府下降期（1839-1850）（見圖 2）同樣的年段來對照，則其價格下探趨勢與臺灣府也頗爲一致。可見竹塹米市的價格對臺灣府價格變化的作用不小。

值得注意的發現是，竹塹數列很明顯地在 1853-1884 年不但價格經常居於較高水平，而且上下波動劇烈；即使數列最後一段波動 1884-1891 年的價位，雖已較一八六〇、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代降低，但也沒有比 1853 年之前較長的低價時期來得低。尤其其中的 1853-1868 年，與廣記 1854-1868 年的變動幾乎一致。換言之，十九世紀中期起，淡水廳的南北兩個米產地一同進入高米價時期。以米糧的生產與流通關係而言，長時期的高米價可能意味著北部臺灣糧食的供給和需求相對於十九世紀中期之前（乃至十八世紀）明顯吃緊，島內可資流通的米穀數量少，價格自然上漲而且居高不下。[41]

可惜廣記數列下限在臺北府設立之前即結束，無從觀察其後的變動。不過，1878 年開始的臺北府數列與竹塹數列的變動又極爲彷彿，相當引人注意。這兩個數列的分期點都落在 1884 年，該年之前到 1878 年，以及該年之後的變動趨勢，兩者都極爲一致，而且也都在數列尾端的 1891 或 1892 年下滑後再上升。臺北府設立之後雖然轄區先擴大（納入宜蘭縣）再小幅縮小（分出新竹西南一帶），但從兩數列 1878-1892 年的變動如此亦步亦趨，可知竹塹米市價格異動對臺北府米價的影響仍然明顯。[42]

還有一項觀察也應該注意，雖然竹塹數列歷經上述數個波動年段，但是如果略去頭幾年（1835-1837 年），整個數列其實可以以 1853 年切分爲兩大時期，前期爲低價期，後期爲高價期。亦即，十九世紀的五〇年代後半、六〇、七〇及至八〇年代前半，或說從開港前後以及開港之後，竹塹（新竹）地區米價長期處於高價位。

---

[41] 影響米價時間數列的長期趨勢並不考慮個別的、時間延續較屬點狀式的天災或人禍的影響，除非天災或人禍事件的持續時間長達數年或更久，否則這兩種因素通常是對個別年度的極端價格或季節變動產生影響。

[42] 按清代臺地的糧價陳報制度（本文圖 6），糧價清單上的臺北府米價，是知府綜合轄內各縣級政府彙報而上的旬報和月報米價，再季報給布政使，由布政使上呈巡撫，再由巡撫季報給總督而成。在這層層的流程中，臺北府米價原則上至少包含淡水、新竹、宜蘭三縣米價的綜合；但是綜合後，臺北府米價卻與竹塹米價如此趨近，當是後者對前者的作用顯著。至於另外兩縣臺北府米價的作用如何，因無可用的米價數列，尚不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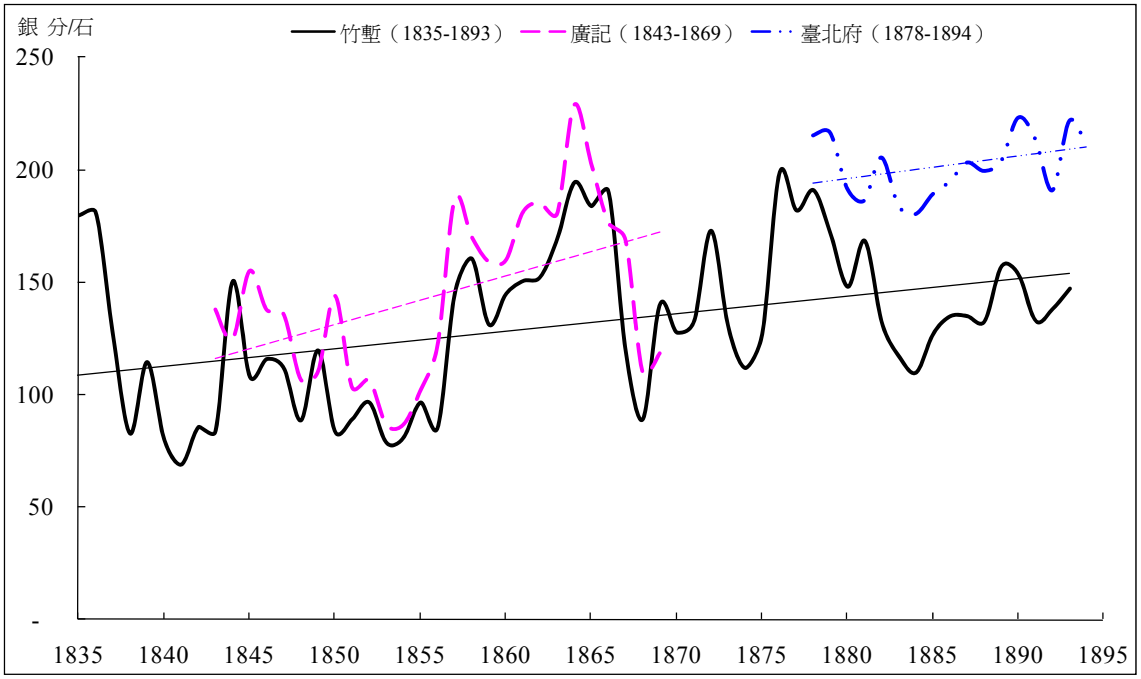


圖 15：清代臺北府、廣記、竹塹年均米價及趨勢

竹塹數列前期低後期高的特徵，也出現在廣記數列，前後之分都在十九世紀中期；而臺北府數列則是一直在高價水平變動。如何解釋這種現象？筆者以爲，可以從北部臺灣糧食豐嗇程度的歷程來看。

做爲米產區，北部臺灣（淡水廳）的糧食生產在清代很長一段時期一直自給有餘可供輸出，直到十九世紀晚期（臺北府）才發生改變。乾隆年間的閩省官員經常奏稱「淡水同知所屬係產米之地」、「淡水地廣人稀，穀價每賤於他邑」。[43] 十八世紀島內的糧食供需情形，主要是缺糧的臺灣府治倚賴臺灣縣供給，當臺灣縣漸轉爲自給不足時，就靠鳳山、諸羅（嘉義）南北兩路輸轉，而鳳、諸（嘉）如果歉收則依賴淡水、彰化供給。淡水廳與彰化縣被並視爲臺地糧食供給的最後奧援，是重要的產米區（但並不意謂其產量爲全臺之首），因而每有內地大員來臺採買米糧時，往往按這種豐嗇情況的瞭解派買到廳縣。[44]

一八三〇年代，姚瑩判斷淡水廳在全島糧食供需形勢中的地位，與十八世紀相差無幾，他說：

[4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倉儲》，第 28 冊，頁 201 ；第 33 冊，頁 103。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 7 冊，頁 70。「軍機處全宗（1729-1911）」之「軍機處錄副雍正、乾隆朝」（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全文影像，檔案編號 03.9740.080。《臺案彙錄乙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173 種），卷 2，〈巡臺御史六十七題本〉，頁 95。

[44] 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388。

> 蘭、淡二廳，自給之外，稍有餘穀。蘭之烏石港、淡之八里坌，皆出米，交福州商船運省。然每年二廳出米，亦不過十餘萬。其米多可糶者，惟鳳山、嘉義、彰化三縣而已。[45]

在他看來，淡水廳可供外地採買運出的糧食比鳳、嘉、彰三縣爲少，可見淡水廳所出之米供給本地的部分已較十八世紀有所成長。儘管如此，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央諭令閩、浙、兩廣運米供京倉存儲時，閩省官員以「臺灣、鳳山、彰化、嘉義四縣餘米向須接濟漳、泉，淡水廳餘米則又接濟省城」爲由，答以無餘米可運京城。[46] 這表示到十九世紀中期，淡水廳仍有餘米輸出，輸出數量還是低於鳳、嘉、彰三縣。

十九世紀中期仍然有糧食餘裕的淡水廳，其田園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始報陞科後，所產米穀如何分配？除了本地人口消費之外，一爲以實物稅形式——供粟（徵收的稻穀），二爲供給淡水廳官倉補倉，三爲閩省內地官員及商人來臺採買、販運。用途不同，但最終大部分還是轉爲由政府可動員的糧食。臺灣徵收的供粟主要用於撥給臺澎各營兵米之用，支用之後若有餘穀就貯入官倉之中。[47] 臺灣供粟總額在雍正初年約 14 萬石，乾隆二十、五十五年（1755、1790）時約 17 萬、19 萬石，對應的臺澎兵食約需 6 萬餘石、9.1 萬石、9.6 萬餘石。[48] 可見十八世紀所徵供粟每年大約有 1/2 可以存倉，餘糧率甚高。然而雍正初年起，這些存倉供粟又逐漸做爲支給內地兵眷、金廈提鎮督標、內地漳泉平糶三類糧食之需。[49] 已知乾隆末年淡水廳徵供粟約 13,070 石，佔全臺 7%。[50] 道光年間全臺年徵供粟 188,497 石，其中淡水廳 13,070 石，與乾隆末年無何差異，也是佔全臺 7%，爲各縣之中比例最少者。[51]

依此，這 7%的穀石須支付多少臺澎兵食？有多少存倉供粟可供上述輸向內地的三類糧食？十九世紀的史料顯示，淡水廳應負擔的兵食是竹塹北路右營額兵、新添調撥鎮標左右營兵、艋舺營陸路額兵、滬尾水師額兵、協濟北中營額兵冬季分額，主要是供養布署在本地的軍隊；其糧食數量在同治年間年支米 9,204 石，同治八年（1869）以後年給米 5,205 石（合穀 19,810 石、10,410 石）。[52] 照這份

---

[45] 姚瑩，〈覆曾方伯商運臺米書〉（道光 21 年，1841 年），姚瑩，《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之《東溟文後集》，卷 7，頁 136。

[46]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文獻股，《宮中檔道光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5 年），第 16 輯，頁 505。

[47] 指常平倉，不含義倉、社倉。

[48] 見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 7 冊，頁 288、344。「軍機處檔・月摺包」（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檔案編碼 046002。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356，註 28。

[49] 謝美娥，《清代臺灣米價研究》，頁 356。

[50] 乾隆末年全臺供粟額以 19 萬石計，淡水廳徵額見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卷 4，〈志三・賦役志・田賦〉，頁 93。

[51] 各縣比例，臺灣縣 26%、鳳山縣 24%、嘉義縣 25%、彰化縣 18%。佚名編，《福省政事錄》（抄本，北京國家圖書館文津分館藏），卷 6，〈臺灣事例・附開臺屬年征供粟〉。

[52] 同治八年（1869）以前年應支米 9,204 石中的調撥鎮標左右營兵米 701 石，原由臺灣縣正供支

帳單來看，十九世紀六〇年代時，本地供粟根本無法支應本地兵食。填補兵食缺口的辦法是由廳「赴司領銀買補」，再由「各業戶及番通事具狀領價」繳納，但咸豐年間各業戶或繳或不繳，政府無糧可支。[53] 所幸同治七年（1868）起實行裁兵，稍微緩解兵食問題。[54] 裁兵之後，應支兵米量減少，供粟才稍有所餘可以存倉。

不過，對於官倉中的供粟餘穀，官方擬定了額貯制度，不足額時則應採買補倉，這是爲了節省缺糧而設計的綢繆之法。乾隆七年（1742）議定臺灣官倉額貯總數爲 40 萬石，其中府倉須準備 20 萬石，臺灣縣是 3 萬石，鳳、諸、彰三縣則各應存 5 萬石，淡水同知須補足 2 萬石。[55] 淡水廳官倉的額貯量佔全臺的 5%，不論官倉中有無剩餘供粟餘穀，都要採買補倉，達到規定額度。廳政府可動員的糧食——供粟，其總量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無所增加，光是支應本地兵食幾乎是盡數發給；所憂「惟配運及採買二項胥關緊要，且裁兵亦恐非久計」，只得依賴額定的官民「捐積常平倉穀」。[56] 這表示，在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已可看到由於淡水廳供粟數量有額限，支用於前述第一種分配時實在左支右絀，而用於前述後兩種分配——官倉補倉、內地官商來臺買運的糧食，則大部分要靠其他形式的動員轉爲政府可用的糧食來支應。這種情形不能說淡水廳糧食自給不足，如道光初年臺地官員所稱「淡水至今有年額採買約數千石者，即隱匿之額也」，[57] 否則怎麼籌得出大量穀石以供補倉採買。

前述只從供粟來論，但十九世紀六〇年代淡水廳米糧是否自給有餘，由於史料闕如，不能妄論，只知到了十九世紀第四季（臺北府時期）似乎出現變化。根據 H. B. Morse 對 1882-1891 年淡水海關糧食進出口的報告，一八六〇年代起臺灣北部的稻作耕地逐年漸減，1873-1881 年沒有輸出的餘裕，一八八〇年代轉爲進口米糧，其緣由是以內部消費爲大宗的「很好的本地市場」形成的關係。[58] 然

放，道光十七年（1837）起改為臺灣縣解銀給淡水廳買米代放。又，兵食量減少是因同治七年（1868）閩浙總督左宗棠先後奏陳「裁兵加餉，就餉練兵。請以無論水陸標營，一概抽留五成，官亦分別酌量裁減」之故，見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卷 7，〈志六・武備志・兵制・糧餉〉，頁 164-165、167。嘉慶十三年（1808）添設滬尾水師營後，亦由淡水廳支應大部分的兵食，但光是淡水廳並不足以供應滬尾水師營全部兵食，缺額由噶瑪蘭廳運糧供給。其運輸水陸兩程皆有，水路是由烏石港配船，載至八里坌口登岸。姚瑩，〈籌議噶瑪蘭定制〉，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卷 7，〈雜識上〉，頁 339-340。

[53]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卷 4，〈志三・賦役志・餉帑・解運存留〉，頁 103-104。

[54]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卷 7，〈志六・武備志・兵制・糧餉〉，頁 167。

[55] 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 7 冊，頁 341-342。額貯 40 萬穀石之制實際上到了乾隆十年（1745）才首次買足，但是由於倉儲運作的關係，並非年年都能達到額貯數，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倉儲》，第 26 冊，頁 35-41；第 29 冊，頁 123-134。

[56]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卷 4，〈志三・賦役志・餉帑・解運存留〉，頁 104。

[57] 方傳穟，〈開埔裏社議〉，周璽，《彰化縣志》（道光 9-10 年修，1829-1830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卷 12，〈藝文志・議〉，頁 410。

[58] H. B. Morse, 〈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收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

而 1892 年淡水海關又大量出口米糧，使他對於本地米穀生產量是否已轉爲超過消費量未能論定。[59] 換言之，H. B. Morse 主張一八八〇年代臺灣北部糧食自給不足。應該注意的是，H. B. Morse 並非不知道當時米穀輸出入依然習用民船（Junk）運載，但他明白主張經由外國航運的輸出入，方能對臺地米穀貿易提供公正的數據。[60] 不可否認地，海關資料畢竟記錄了龐大的米穀進出口數據，未必就不能代表米穀進出的變動趨勢（此指趨勢，非指絕對數量）。可是另一方面，究竟開港後載米民船數量及其運載的米穀總輸出入數量變化如何？與由海關顯示的數量相較又如何？至今甚至連如何估計以上數據的合理之道，都還難有可靠的清代量化史料可以憑藉。[61] 因此，衡量輸出入後究竟臺北府時期北部臺灣的糧食自給水平如何（有餘或不足），都不甚清晰。

前述 H. B. Morse 臺灣北部稻作耕地一八六〇年代起漸減的看法，尚需具體的耕地數據來佐證，可是他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年代由無餘米輸出轉爲必須進口米糧的觀察，則與光緒十六年（1890）閩浙總督卞寶第的奏報呼應。卞寶第稱「閩地素所仰藉者滬米爲大，臺米次之。臺灣田畝近多改種茶樹，加以防營勇多，臺地已無餘糧，販運竟至絕跡。」[62] 茶作主要在北部擴展，卞寶第所奏應是臺灣北部一八八〇年代的情況。

綜合前述對淡水廳米穀分配的分析、海關記錄與清朝官員的報告，可以說自淡水廳時期以來北部臺灣糧食自給有餘的情況，到了臺北府時期或一八八〇年代，其糧食豐啬程度已見下降。若將這種豐啬水平的轉變與臺北府、廣記、竹塹三種米價數列並同觀察的話，就不難理解何以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三種米價數列都在較高價位變動，而且連竹塹米產區都長期處於高米價，那麼臺北府米價數列比起淡水廳時期的廣記數列，其米價長時期維持在更高水平的現象，其理亦可以想知。這也意味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尤其是臺北府時期或一八八〇年代，北部臺灣在糧食生產總量和生產速度上未必超過其消費量。

（二）米價的相關分析

上文對米價變動樣貌的觀察，顯示三種數列的變動極爲相近，已經間接指出淡水廳/臺北府範圍的北部臺灣地區米糧市場的高整合狀態，但是以下仍需進行

濟史》，下冊，頁 87-88。

[59] H. B. Morse, 〈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頁 88。

[60] H. B. Morse, 〈1882-1891 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頁 87。

[61] 或許可以由日治初期的海關統計或調查數據來推估？可是使用哪一個時點以及如何推估才合理？日治初期對臺灣與清國間的米糧貿易進行宏觀調控以及實施稻米品種改良，自治三十六年（1903）臺米輸出到日本的量明顯超過輸出到大陸，而明治三十八年（1905）起就有改良米出口，因此應避免使用經過這兩種變化後的數據去推估一八九〇年代乃至更早時期的臺灣米糧進出口數量。現知較早的臺灣與清國間的輸出入記錄是明治二十九年（1896），時點有了，但是用什麼做為估計的基礎？人口？稻作面積？生產量？消費費？筆者仍未能綜合掌握。《臺灣移出米概況》（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明治 40 年，1907 年），頁 80-82。

[6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朝硃批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95-1996 年），第 91 冊，頁 117。

米價的相關分析，方能具體確證。相關分析方法是以年平均價格剔除趨勢值和循環值後，計其相關，即不規則變動的相關。[63] 以相關係數 0 至 1 之間的數值顯示，數值愈大表示兩者相關程度愈高，反之則愈低。數值若爲正，表示兩者爲正相關，若爲負值則爲負相關。數值爲 0，表示沒有相關，+1 或-1 表示兩者完全相關。[64] 必須說明的是，由於這三種米價的斷限各不相同，基於統計要求，無法一次計求三種米價數列的相關，必須分爲兩組：臺北府與竹塹（1878-1893），廣記與竹塹（1843-1869）來觀察。

表 4 和表 5 是兩組數列的相關係數，從 .95 和 .96 及其正值可知，兩組數列各自的兩個米價數列爲正相關，而且令人驚訝地，其相關程度竟如此之高。這意謂在淡水廳時期，北部臺灣地區的糧食市場已有高度的市場整合，而下至臺北府時期，北部臺灣也還是維持這種發展。由於是高度的整合，北部臺灣可以視爲一個經濟區或市場區。這個市場區的地理空間無論是否包含宜蘭在內或將新竹西南一帶排除，至少由本區北部的興直堡一帶（或臺北平原、淡水河下游）與本區南部的竹塹（新竹）的米價相關，已足夠指出本區主要米糧市場之間的高關聯。

表 4：臺北府與竹塹米價相關係數（1878-1893）

	臺北府	竹塹
臺北府	1	
竹塹	0.95	1

表 5：廣記與竹塹米價相關係數（1843-1869）

	廣記	竹塹
廣記	1	
竹塹	0.96	1

表 4 還表示另一個含意，即一個縣級區域的糧食市場與一個府級區域的糧食市場也是相當整合的。這種特徵同樣出現在淡水廳時期，以下用廣記、竹塹與同時期的臺灣府米價來驗證。圖 16 是這三種米價數列的年均米價及趨勢，爲顧及

[63] 筆者在〈餘米運省濟民居，兼及西浙與東吳——十八世紀臺米流通及其與週邊地區糧食市場整合的再觀察〉中臺灣府米價採四年週期剔除循環值，此處衡量三種米價數列的循環變動後，發現三年週期為其共同接近的循環，故以三年計。

[64] 此為簡單線性相關，許多研究清代米價的論著大都使用這種方法觀察市場整合程度，其中不乏知名的前輩學者之作。不過現在已有學者提出應該使用「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 tests)，而不使用簡單相關係數來衡量市場整合(參考彭凱翔，〈評 Sui-wai Cheung, The Price of Rice: Market Integr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新史學》，第 21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175-182)。「協整檢驗」雖是計量經濟學常用於檢驗兩變量線性組合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係的方法，但是使用舊有方法，是否必然會誤解、曲解或不能幫助吾人瞭解米糧市場的整合程度，筆者仍予保留。

統計方法上的一致，斷限都取 1843-1862 年。[65] 如圖所示，一如十九世紀臺北府與縣級米價的關係，臺灣府數列的米價水平都比縣級米價水平還高，這是因爲廣記和竹塹都是米產區，而臺灣府還有其他地區爲糧食自給不足之處或運銷出口之故。三種米價數列總的長期趨勢都是上升，但臺灣府數列價格升降的落差較大，上升顯著。[66]

再次，三種數列的時期切分點非常接近，都在 A. 1844 或 1845 年，B. 1848 或 1849 年，以及 C. 1856 年。從 A 到 B，三者都是下降之勢，C 點以後三者也都是上升之勢；但是從 B 到 C，廣記與竹塹的米價變動很一致地進入低價期，唯臺灣府數列卻微幅上升。然而其實 A 到 C 可以視爲一個時期來觀察，如此，可看到三種數列的米價趨勢都在下降之中，只是臺灣府的價格下跌相對較爲和緩；而 C 點以後的價格上升依然是三者最顯著且一致的變動。

上述觀察表示，清代北部臺灣地區不僅臺北府時期，在淡水廳時期的縣級區域糧食市場與府級區域的糧食市場也有較高程度的整合。以下使用這三種數列的相關係數來證明。表 6 中，三種數列的係數值都爲正值，表示其彼此之間爲正相關。先看此表中的竹塹與臺灣府，將之比較表 4 中的竹塹與臺北府，顯示北部臺灣地區的南部米產區市場，在十九世紀很長一段時期與府級糧食市場有相當高的整合。而比起竹塹與臺灣府，廣記與臺灣府的相關程度相對低些，顯示後者整合度稍次於前者，但相關程度也不低。或者說，臺灣府米糧需求受竹塹米產區的影響，比來自於臺北府治週邊產米產區的影響還要顯著。這表示臺北府治週邊的糧食自給率，不如竹塹地區的自給率。另外，表中相關係數值也表示，與臺北府時期相較，淡水廳時期的縣級區域糧食市場與府級區域糧食市場的整合程度稍次，這可能意謂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臺灣的糧食市場較十九世紀中期之前更爲統合。不過，應該注意價格示意的地理範圍上的差異。淡水廳時期的府級區域糧食市場區指的是全臺灣(不含後山)，而臺北府時期的府級區域糧食市場區就是北部臺灣。表 6 中廣記與竹塹相關程度頗高，表示淡水廳時期的北部臺灣已是較高整合的一個市場區。

[65] 臺灣府米價做可靠性評估後取其中米米價的低價和高價數列，補全遺漏值後再予以平均。

[66] 以斜率來看，臺灣府、淡水廳廣記、竹塹義民廟三種米價數列的斜率分別為 5.23、2.34、2.17，都是正值，意即三種米價數列分別平均每年上升 5.23 分、2.34 分、2.17 分（銀兩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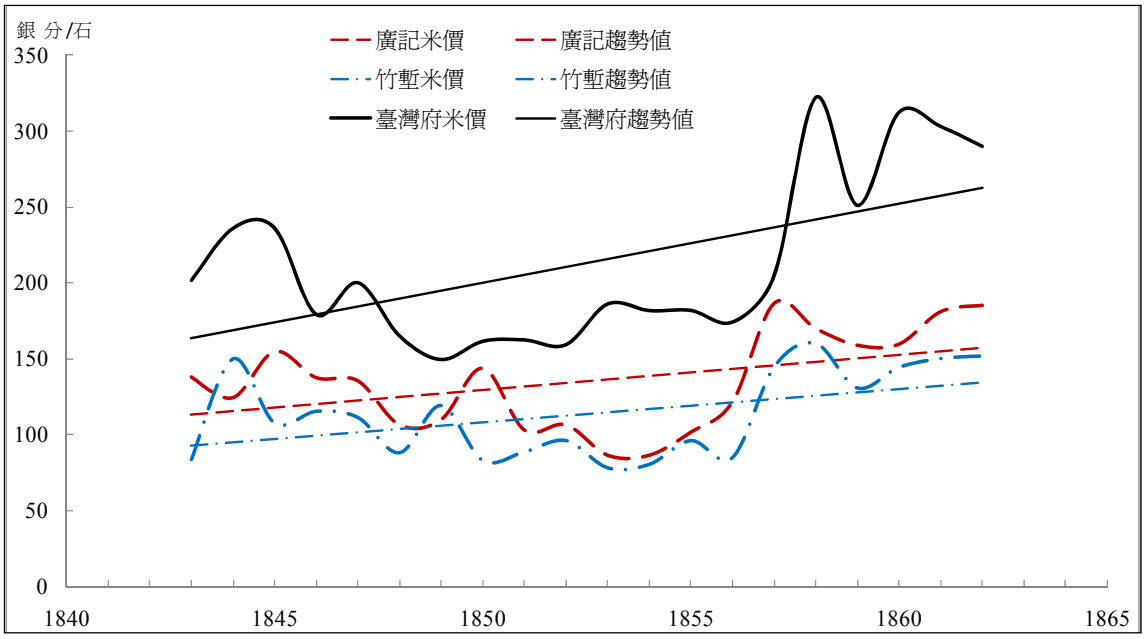


圖 16：清代臺灣府、廣記、竹塹年均米價及趨勢（1843-1862）

表 6：廣記、竹塹與臺灣府米價相關係數（1843-1862）

	廣記	竹塹	臺灣府
廣記	1		
竹塹	0.96	1	
臺灣府	0.84	0.91	1

（三）糧食供需流通與糧食市場整合

本節以可靠的量化史料實證的結果顯示，在十九世紀很長時期之內，北部臺灣其實是一個內部相當整合的糧食市場區，可構成一個經濟區，內部的互通有無程度高，其縣與府級糧食市場的相關亦高。然而這個市場區是否形成於更早，例如：在北部臺灣開發歷程的哪一個階段，或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後到十九世紀初期臺灣米穀輸出的黃金時期？[67] 若此，則此區內的具體市場——市街鎮體系構成的腹地範圍是否與這個市場區符合？此區與竹塹以南的其他經濟區關聯又如何？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待釐清，只是目前似乎還沒有充足的史料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不過，從質性史料中有關淡水廳/臺北府的米糧流通情形，可以輔助解釋本節的計量結果。以下從由政府支配動員、由商業領域動員的兩大糧食流通來分析，前者是指內地兵眷、金廈提鎮督標、內地漳泉平糶、隨機撥運及政府採買的糧食，後者包含商船帶米、商民請照買運以及走私的糧食。[68]

[67] 謝美娥，〈清代閩臺米穀流通類項與數量的考察〉，《中國史學》（日本：東京），第 17 卷（2007 年），頁 70。

[68] 謝美娥，〈清代閩臺米穀流通類項與數量的考察〉，頁 56。

米穀爲臺灣清代時期重要的出口品，若要輸出，其流通方向是由鄉而城，由城而聚往沿海港口。在只有鹿耳門與廈門對口時期，儘管北路有淡水港，「內有大澳，分爲二港……澳內可泊大船數百，商船到此載五穀、鹿脯貨物，內地商船間亦到此。」[69] 雖可通巨艦，但距廳治二百里（100 公里）之遙，又屬禁港，不許商艘往來貿易，所以

> 南北路各廳縣所產米穀，必從城鄉車運至沿海港口，再用舟彭仔、杉板等小船，由沿邊海面，運送至郡治鹿耳門內，方能配裝橫洋大船，轉運至廈，此即臺地所需之小船、車工、運腳。不特官運米穀為然，即民間貨物、米穀，亦復如此轉運。（乾隆二十年）[70]

礙於獨口出入的規定，無論是官方動員的運糧或民間米穀及各種貿易運輸，各廳縣米穀雖然運到沿海港口，卻不是逕自出洋，而是以小船裝運，沿西海岸向南運到鹿耳門，再轉裝到橫洋大船過洋。淡水廳輸出的米穀也不例外，這是北糧南流。此處的北，指淡水廳、北部臺灣，南指此區以南，而流，指水陸兩途的運輸。淡水港不許商船往來，卻額設社船，每年九至十二月自廈門直抵淡水一次，於回棹時帶米出口，每年數萬石，其餘月分只能赴鹿耳門貿易。[71] 雖是淡水廳產的米穀直接自淡水港出洋，但爲數畢竟不多。

北糧南流不特是爲了出口糧食到內地而有的現象，此與前述十八世紀島內糧食供需情形有關。也就是臺灣縣糧食輸往缺糧的臺灣府治，鳳山、諸羅（嘉義）南北兩路的糧食則流向臺灣府治和臺灣縣，而淡水、彰化的糧食則在鳳、諸（嘉）不濟時流入，平常則南流到臺灣府治。

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二個正口開設，鹿仔港－蚶江對口通航，此後無論是內地商船從蚶江渡臺配載的官運糧石，或是內地及臺灣商民在臺買穀販運的米穀，大都是淡水、彰化地區所產的米穀，從鹿仔港出洋。[72] 既由鹿仔港運輸出去，從淡水廳運出的米糧仍然向南流動，較鹿耳門獨口時期路程縮短，但還是北糧南流。

及至林爽文事變平定後，增設八里坌爲正口，但新設章程及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條規，都未要求由此港進出的商船必須配運內地兵眷類、金廈提鎮督標類等由官籌撥的糧食。[73] 直到嘉慶十四年（1809），閩浙總督方維甸以臺穀積

---

[69] 周鍾瑄修，陳夢林等編纂，《諸羅縣志》（康熙 56 年序，1717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41 種），卷 1，〈封域志・山川〉，頁 14-15。

[70] 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第 7 冊，頁 287-288。

[71] 尹士俍著，李祖基點校，《臺灣志略》，中卷，〈民風土俗〉，頁 47。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乾隆 17 年，1752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卷 2，〈山水志・海道〉，頁 68。張本政主編，《清實錄臺灣史資料專輯》，頁 190。

[7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倉儲》，第 55 冊，頁 195-197。

[73]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13 種），卷 2，〈山水志・海道〉，頁 68。《福建省例・海防例》（同治 13 年，1874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199 種），〈八里坌對渡五虎門開設口岸未盡事宜〉，頁 711。

滯爲由，才奏開八里坌配運。[74] 此後，一部分由官籌撥的糧食，其運輸方向出現南糧北流。然而，由八里坌口分攤應配運到內地的米穀，未必是淡水廳一地出產的米糧，而是來自彰化縣。[75] 此處的南糧，指彰化一地所產的米穀。「彰邑距八里坌陸路五站，水程亦須由鹿仔港登舟出大洋行走」，[76] 水陸兩程都是經常性的運輸路線。八里坌口應配運的糧食量是兵穀 14,772 石、眷穀 7,065 石，後者道光八年（1828）後改爲解銀，前者也有一部分陸續折銀，剩 7,701 穀石應運，其後又增爲 9,451 石。[77]。比較十九世紀前期臺灣各正口配運量，八里坌佔 16%，鹿仔港爲 26%，鹿耳門負擔 58%。[78] 相較之下，由八里坌出口的南糧（彰化）北流的糧食數量並不太多。

以上都是指由政府支配動員的糧食流動方向，而由商業領域動員的糧食中，米糧走私並沒有領照商船的正口掛驗約束，其米穀由城鄉匯聚後直往西部沿岸各小港流動。至於商船帶米、商民請照買運兩類，因受政府正口規約限制，其米糧流動與政府動員的糧食運輸方向相同，稍微有有異的是在淡水廳買運者由八里坌出口，在彰化買運者可由鹿仔港出口。據筆者研究，清代臺灣由政府動員的糧食與由商業領域動員的糧食，其數量以後者爲多。[79]

故大致可說，八里坌開爲正口之前，無論是由政府動員的糧食或商業領域動員的糧食，大宗的米糧流動主要是向南、跨區的較長距離的運輸，形成北糧南流。沿西岸的海上交通繁忙，可以想見淡水廳時期北部米產區與臺灣府的糧食市場相關必定不低。八里坌正口開通後，佔糧食運輸較大比例的商業領域動員的糧食可由北部出口，其米穀流動其實是在淡水廳區域之內向北流動。嘉慶十四年(1809）由政府支配動員的糧食開始從八里坌配運出口後，形成南糧北流。來自彰化地區的南糧在北部臺灣地區之內由南向北流動，與商業領域動員的糧食流動方向一致。

八里坌口於一八三〇至四〇年間淤淺，北岸的滬尾替代其角色，爲淡水廳各港中的「最要大口」，尤其開爲通商口岸後，「夾板輪船帆檣林立，洋樓客棧闤闠喧囂」，由此一水可直通淡水最大村鎮且巨商富戶薈萃倍於竹塹城的艋舺，一八六〇年間「商賈之輻輳，昔推八里坌、今推艋舺」之稱仍下及臺北府時期。[80] 前

---

[74]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卷 7，〈志六・武備志・海防〉，頁 185。

[75] 姚瑩，〈樹苓湖歸鹿港分運臺穀狀〉（道光 18 年，1838 年），姚瑩，《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之《東溟文後集》，卷 3，頁 38。

[76] 此為噶瑪蘭通判呂志恆語，見姚瑩，〈籌議噶瑪蘭定制〉，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卷 7，〈雜識上〉，頁 340。

[77] 兵穀、眷穀量為筆者自行加總，據周凱，《廈門志》（道光 12 年自序，1832 年，臺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卷 6，〈臺運略・額數〉，頁 187-188。姚瑩，〈樹苓湖歸鹿港分運臺穀狀〉（道光 18 年，1838 年），姚瑩，《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之《東溟文後集》，卷 3，頁 38-39。

[78] 據周凱《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卷 6，〈臺運略・額數〉，頁 186）稱「鹿耳門口歲運穀四萬九千餘石，鹿仔港口歲運穀二萬二千餘石，八里坌口歲運穀一萬四千餘石」計算百分比。

[79] 謝美娥，〈清代閩臺米穀流通類項與數量的考察〉，頁 63-64。

[80] 姚瑩，〈臺灣十七口設防圖說狀〉（道光 20 年，1840 年）、〈臺灣不能堅壁清野狀〉（道光 21 年，

述米糧運輸流通情形到八里坌口逐漸被滬尾替代時，仍然無大改變。這就解釋了何以表 5、表 6 中廣記與竹塹的高相關，即淡水廳時期無論是北部臺灣地區的北部或南部，其米穀運輸同樣受到外需的拉力而一致地往八里坌、滬尾流動，在北部臺灣地區之內的米市價格彼此互相遷動、互有影響。（此所言爲大宗米穀流動趨勢，並不是說所有的竹塹米產區的糧食完全只出口到淡水港）儘管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由政府動員的糧食運輸因折銀而減消，且八里坌口益形没落，但滬尾港的興起及其腹地的發展形勢，使臺北府時期北部臺灣地區的出口貨財更增強爲向北流動，沿襲開港前已經有的物財流動形勢。從海關記錄的淡水港（滬尾）出口貨品的來源地和進口貨品的運銷終站地的範圍，更可印證北部臺灣地區實成爲一個較高整合的經濟區。[81] 此外，滬尾及艋舺的發展正可解釋廣記米價數列 1854 年後到 1860 年代，也就是開港前後，米價大幅向上揚升，維持價格高峰達十一年（1857-1867）的現象。

表 7 爲 1867-1895 年從淡水和基隆海關進出口的米石數量，跨淡水廳時期和臺北府時期。如本文所述，海關資料畢竟記錄了龐大的米穀貿易數據，不能忽視它所顯現的變動趨勢，尤其新式輪船一次船次的載運量不是傳統載米中式帆船可比，更何況關也記錄中式帆船的進出口情形。從表 7 可見，十九世紀淡水廳時期北部臺灣仍有一些米石自淡水海關出口（表中 1867-1873 年），以出口大於進口最多的 1870 年而言，該年出超餘米 83,317 海關擔（約 69,431 石），與一八三〇年代姚瑩判斷的「蘭、淡二廳……每年二廳出米，亦不過十餘萬」約略衡量，雖不知噶瑪蘭廳可出運多少米石，但可推測四十年間北部臺灣的餘米量可能並未增加。而表 7 中的臺北府時期（表中 1882-1895 年）大多數年分卻是扣除出口後仍需進口米石，一八八〇年代入超最多 67,731 海關擔（約 56,443 石），可是 1893 年竟入超 255,471 海關擔（約 212,892 石），爲歷年最多，或者 1894 年入超 98,692 海關擔（約 82,243 石），這些數量都不可小看。

表 7 的米石進出口變動情形，正好說明了本文第三節（圖 15）所述，臺北府數列與同時期的竹塹數列，二者米價都於 1884 年後向上爬升，尤其是臺北府數列一直居於高米價水平。這表示臺北府時期北部臺灣地區米糧自給或無剩餘或已現不足，米價自然居高不下，連帶地，竹塹米產區的米價也有一致的波動。十九世紀開港以後，北部臺灣地區糧食生產若自給有餘，大抵會經由滬尾裝載出口過洋，到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或順西部沿岸南下供給臺南府城。但是能出超的年分有限，出口到對岸者，只有 1867、1869、1878、1888 年，主要在淡水

1841 年），皆見姚瑩，《中復堂選集》（臺灣文獻叢刊第 83 種）之《東溟文後集》，卷 4，頁 81-82；卷 5，頁 104。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文獻股，《宮中檔咸豐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 年），第 23 冊，頁 591。丁紹儀，《東瀛識略》（同治年間，臺灣文獻叢刊第 2 種），卷 1，〈建置・疆域・建置〉，頁 6、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 1 冊，頁 507。

[81] 唐次妹，《清代臺灣城鎮研究》，頁 132。

廳時期；北糧南流往臺南府城者亦只 1869 年，似也不多見。[82] 但如果一八八〇年代北部臺灣地區確實食自給不足的話，那麼糧食進口後的流動則是北糧南流，惟其運銷終站地僅在北部臺灣地區之內（特別是此區的北部城鎮）。

表 7：十九世紀淡水、基隆海關米進出口數（1867-1895）

單位：米/海關擔

年	進出口數	年	進出口數	年	進出口數
1867	9,978	1882	-66,028	1891	-44,662
1868	37,101	1883	-198	1892	33,035
1869	16,836	1886	-1,525	1893	-255,471
1870	83,317	1887	-67,731	1894	-98,692
1871	77,918	1888	-46,164	1895	-67,393
1872	23,926	1889	-16,371		
1873	388	1890	-45,988		

說　明：進出口數欄的數字爲出口數與進口數相抵後所得，數字爲正值者表示出口大於進口，負值表示進口大於出口。又，1 海關擔=100 斤，而 1 石=120 斤。

資料來源：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年），頁 7-8、14、22、24、37-38、40、55、57、76、78、111、118、251、273、345、475、506、591、592、622、624、721、724、726、756、759、799、800、838、876、878、924、968、970、990、1008、1011、1020、1051、1054、1057、1063、1096、1102。

最後，應該瞭解清代北部臺灣地區的糧食流通與區內內河水系航運的繁榮有關，這是指淡水廳、臺北府的北部而言。當米穀向北聚集到淡水港（八里坌、滬尾）前，依賴最爲便利的牛車陸運和內河水路航行的運輸。北部臺灣地區主要的內河水運爲淡水河水系，沿其本流及大嵙崁溪、新店溪和基隆河三條支流的各內河河港（新庄、大嵙崁、錫口、艋舺、大稻埕、關渡等）、津渡構成的水運網，溝通淡水港和淡水河流域南北向的糧貨運輸，在十八世紀已相當繁榮。[83] 像淡水廳的艋舺溪渡上通擺接、內湖，下達淡水港，滬尾溪渡爲滬尾、艋舺往來必由之路，皆是淡水廳南北往來重要通津。[84] 淡水河三條支流各河港內陸所產米糧除本鄉消費外，也向北運輸到下游市街鎮，尤其供給「非特淡蘭扼要之區，實全臺北門之管」的艋舺。[85]

---

[82] 李讓禮，《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臺灣文獻叢刊第 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論臺灣府城及打狗通商馬頭貨額〉，頁 56-57 記 1869 年春季「由淡水往府城一號，載米一百六十噸」。黃富三、林滿紅、翁佳音主編，《清末臺灣海關歷年資料》（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年），頁 7-8、37-38、345、800。

[83] 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6 年），第 3 章。

[84]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72 種），卷 3，〈志二・建置志・橋渡〉，頁 68。

[8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光緒宣統兩朝上諭檔》，第 1 冊，頁 508。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運史》，頁 91。

歸納上述，清代臺灣內部糧食運輸方向與開設正口的順序有關，先是北糧南流，繼之又有南糧北流，皆是在官方主導下形成，爲了調劑內地糧食需求缺口（漳泉平糶）、供給內地兵眷類、金廈提鎮督標類糧食使然。而淡水廳發達的淡水河系水運，在十八世紀已相當繁榮，使廳內的上游米糧透過水系各內港、津渡的運輸，向北供給下游市街鎮以及匯聚到淡水港出口，是北部臺灣地區本地米穀的南糧北流。在鹿耳門爲唯一正口進出時期，各地米穀先向西運到海口，再由沿岸向南運輸，可說是由北向南的流動。北部臺灣生產的米穀亦向南流通，但隨著新的正口往北增開，向南流的糧食流程縮短。至八里坌開爲正口後，反而出現南糧北流現象，此時的南糧爲彰化縣所生產的米穀。從十八世紀的北糧南流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南糧北流，由於西岸沿海的水路運輸較陸程便利，使淡水廳、臺北府不但其區內的糧食運輸，與區外的糧食流通都有相當高的關聯。隨著八里坌口與滬尾港的興起，乃至成爲開港以後的北部最大口岸，十九世紀淡水廳、臺北府時期北部臺灣地區的糧食在本地區內的流動以及向北匯流的趨勢更爲顯著。而北糧南流的跨區流動，自八里坌口負擔配運米穀以來即相對減縮。這種糧食供需流動的變化——從跨區式的流動逐漸轉爲本區式的流動，更爲增強本區的互通有無，解釋了米價相關分析的顯著相關結果，也就是十九世紀淡水廳、臺北府可視爲一個糧食市場高度整合的地區。

四、結論

本文爲清代臺灣米價的區域研究和「延伸研究」，以北部臺灣爲個案，從可靠的米價數列著手，試圖證明清代臺灣內部存在糧食市場整合。北部臺灣，其實就是廣義的淡水地區——按清代時人的地理認知，以淡水爲名而開始的區域，歷經淡水廳時期、臺北府時期。此區自開墾以來即長期以產米著稱，經由正口八里坌、滬尾及其沿海各小港出口米糧。

以往討論清代臺灣的市場（包含此區在內），主要從具體的市街鎮港的產生、變遷和系統建構切入，以港口系統指稱爲市場圈/交易圈。然此類研究未能指出將具體的市街鎮港等同於抽象的市場或市場區時，沒有釐清的課題，例如：不同的市街鎮港是否同屬一個市場圈/交易圈？一個市街鎮港系統就是一個市場嗎？不同的市街鎮港系統是否不屬於同一個市場區？學者指稱的市場圈/交易圈，所謂的圈，究竟在哪裡？ 針對這些問題，應進行市場整合研究，考察主要商品的流通運輸，才能明瞭兩地或多地之間是否同屬一個市場區（市場圈/交易圈）。

然而，近人研究雖曾以最能代表清代臺灣經濟榮枯的稻米價格來探討市場整合，可是那是以臺灣與外地的糧食市場爲對象，至於臺灣內部的糧食市場整合則未見考察。

基於此，本文使用「清代糧價資料庫」中十九世紀分府後的臺北府米價，以及從兩種民間帳簿——淡水河下游平原的《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吉置廣記總抄

簿》、竹塹《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理出的米價，進行米價相關分析，藉以證明本區在區內之間、本區與全臺之間，是否存在糧食市場整合。

根據計量分析結果，首先，臺北府與竹塹（1878-1893），廣記與竹塹（1843-1869）兩組數列各自的兩個米價數列都是正相關，而且相關程度令人驚訝地高。這意謂在淡水廳時期北部臺灣地區的糧食市場已有高度的市場整合，下至臺北府時期也還是維持這種發展，北部臺灣實可視爲一個市場區（或經濟區）。其次，縣級區域的糧食市場與府級區域的糧食市場也是相當整合的，這個特徵在淡水廳時期、臺北府時期都具備，不過在臺北府時期更爲增強，這可能意謂十九世紀中期以後臺灣的糧食市場較十九世紀中期之前更爲統合。

以上計量分析結果又可從質性史料中有關淡水廳/臺北府的米糧供需流通情形加以印證。淡水廳地區發達的淡水河系水運，使廳內的上游米糧透過各內港和津渡的運輸，向北供給下游市街鎮以及匯聚到淡水港出口，是北部臺灣地區本地米穀的南糧北流，這種流動在十九世紀第四季時期更爲明顯。但是清代臺灣內部糧食運輸方向，仍與官方動員的糧食的運輸以及開設正口的順序密切相關，其流動變化爲從十八世紀的北糧南流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南糧北流。在鹿耳門單口進出時期，無論是官方或民間商業領域動員的糧食，各地米穀先向西運到海口，再由沿岸向南運輸，由北向南流動，北部臺灣生產的米穀也是向南流通。因爲在十八世紀島內糧食供需關係中，淡水的糧食在鳳山、諸羅（嘉義）糧食供給不濟時輸往該地，平常則南流到臺灣府治、臺灣縣。

其後隨著新的正口往北增開，向南流動的糧食流程縮短。八里坌開爲正口後，官方動員的糧食運輸出現南糧北流，亦即彰化縣生產的米穀向北運至八里坌出口，而此時佔糧食運輸較大比例的商業領域動員的糧食，則是在淡水廳內由南向北流動。隨著八里坌口、滬尾港的興起，十九世紀淡水廳、臺北府時期，北部臺灣地區的糧食在本地區內的流動以及向北匯流的趨勢更爲顯著。而早期北糧南流的長距離跨區流動，自八里坌口負擔配運米穀以來即相對減縮。北部臺灣糧食供需流動的變化——從向區外的跨區流動爲大宗逐漸轉爲增強本區內的糧食流動，在自給有餘時的糧食流動是向北而行，需要進口米糧時則由北向南流動。這種變化正好解釋了米價相關分析顯示的，區內北部和南部糧食市場米價的高相關、縣級與府級糧食市場區的高相關，同時意味十九世紀淡水廳、臺北府同屬一個高度整合的糧食市場區。

論文初稿
請勿引用

日治時期臺灣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之歷史考察
—以臺北州爲例*

林玫君**

一、前言
二、關於體育教師的「誕生」
三、體操講習會的初現
四、傳遞體育知識：臺北州體操講習會的舉行方式
五、體操講習會的「樣子」：以 1924 年淡水的夏期講習會為例
六、同一性的體育政策？—談臺北州體操講習會的實踐方式
七、結語

一、前言

「師範爲先，師資第一」。2009 年年底教育部體育司公布《學校體育統計年報》，調查指出，國民小學體育專任教師佔體育相關科系畢業者僅 15.88%，[1]易言之，國民小學有八成以上比例的體育教師係屬非體育相關科系畢業者，而且此數據比例有逐年減少的趨勢。[2]面臨上述的體育「危機」，政府如何建立非專業體育教師的進修機制，成爲當前之要務，教育部或各縣市政府每年舉辦體育教師增能計畫，[3]希望透過研習或觀摩，使得體育教師專業發展的必要性可以提高，並協

*感謝國科會補助，此研究為研究計畫之一部分，計畫名稱：「『教』與『學』的體育視界－臺灣百年體育師資養成之歷史考察」二年期計畫，計畫編號 97-2410-H-003-100-MY2，執行時間為 2008.8-2010.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兼體研中心主任

[1] 教育部，《98 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臺北：教育部，2009），頁 76。

[2] 國民小學體育專任教師佔體育相關科系畢業者，94 學年度為 19.6%，95 學年度為 18.4%，96 學年度為 16.79%，97 學年度為 16.08%。以上資料來自教育出版之 94 至 97 年度之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3] 例如九十八學年度的主要目的即是彙整相關教材及辦理創意教學觀摩會、輔導縣（市）政府辦理「體育教師增能計畫」。見「中等以下學校體育教師增能計畫」，教育部體育司第三科 http://140.122.72.62/sportedu/index?style=1&id=cf536ad071ee6195d52b0c949f7a20bd4c04b9da4c8af，2010 年 9 月 2 日查詢。

助體育教師具備術科技能及教學能力，提升學校體育的成效。

回首臺灣舊時路，日治時期殖民者引進近代學校教育制度的同時，即已重視體育運動，無論是小公學校、師範學校、中等學校、實業學校甚至高等學校，均將體育做爲其中一個教學科目來實行。經過日本殖民者的努力，早期臺灣學生和家長甚至一改過去排拒體操，或視體操爲兵伕活動的觀念。[4]學校課程除了體操科的正課之外，也重視課外活動，如運動會等，另外還包括遠足、修學旅行、登山、團體操（朝會後的體操與課間體操，日治後期尚有廣播體操）、課後體育活動（有弓道、網球、舞蹈、拔河、排球、籃球、田徑運動、游泳、戶外運動等），連女學生也不例外。[5]

值得玩味的是，日治時期並未設置體育師資養成之專責機關，[6]那麼，體育師資如何產生？又如何因應小公學校的體育課程需求呢？根據目前有限的資料顯示，體育師資的來源可分爲四種：一是來自日本培育師資機構；二是日本殖民者於治臺期間，設立國語學校師範部和後來成立的師範學校，依不同的入學資格來培養師資，其修業年限亦不同；三是辦理體操講習會；四是參與師資檢定。前二者培養國語傳習所和師範學校的教員，以及小學校的校長或教員，兼作研究臺灣教育方法之處；後二者是採速成方式，施以短期的訓練後，即至臺灣全島各地去推展，以補充師資的不足。上述四種養成方式，皆在日治之初已實施，「體操」做爲學校一個科目，確實已受到殖民政府某種程度的重視。

體操科作爲小公學校課程中的一個科目，若從「教」與「學」的關係而言，擔任小公學校第一線工作的體育教師，如何維繫體育教學水準的努力，是學校體育成敗的重要關鍵，因此，探討體操講習會的運作過程，或可知體育教師之專業化程度。

以臺北州做爲討論的主軸，係因臺北州做爲日本殖民政府的重要地理位置，除了是臺灣總督府選擇臺北舉辦體操講習會的首要之地之外，也是日本國內來臺宣導體育知識最重要的據點，因此，透過臺北州（或在臺北州舉辦）體操講習會舉行之討論，可以更爲理解日本殖民政府對於體育師資培育的實施方式。

---

[4] 美國的臺灣領事同時是教育顧問阿諾德（Arnold, Julean H.），在 1908 年所寫的報告中指出，臺灣兒童在運動遊戲中展現歡樂，使學生喜歡參與並樂在其中。Julean H. Arnold, *Education in Formosa*, p.37. 引自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60.

[5] 有關日治時代學校體育的相關內容，可以參考蔡禎雄，〈日本統治下臺灣における初等學校教科體育の歷史的考察〉（東京：日本筑波大學修士論文，1987）。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2002）。另外，女學生的學校體育活動的發展，可詳見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2000.06），頁 5-75。

[6] 在臺灣這塊土地，第一個成立相關體育師資培育者是 1946 年 6 月，由當時的省立師範學校成立「體育專修班」，開始培育國中體育師資，國小體育師資則是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於 1947 年 8 月開始培育，惟雖已設立相關科系培育之，正式開啟臺灣體育師資的新里程。

要討論這些課題，當然得回到歷史的源頭，然而，目前足供參考的資料並不多，筆者根據收集及查閱的文獻發現，多數研究將主要的問題意識置放於戰後的關懷，[7]對日治時期體育師資之研究，實在貧乏。其中，討論日治時期體育專業師資略爲相關者，僅有三篇，一是蔡禎雄所著的《日據時代台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8]論者將「體操科」的脈絡置於殖民地政策的框架下，論述師範學校體操科在「基礎工事期」、「體系確立期」、「日台同步期」、「戰時體制期」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從而分析在殖民地政策中存在的日臺「不平等」待遇，以突顯殖民地的體操科與殖民差別統治互爲聯繫的特點，此書的基調，爲臺灣做爲殖民地的師範體育發展建立了基本框架，也清楚點明當時的師範生是以通才教育爲主體，並未單獨培育體育專業人才，雖在內容未關注體操講習會的討論，卻已提供體育師資與教育、社會彼此關聯性的背景知識。二是謝仕淵的碩士論文〈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9]本論文從身體規訓、文明開化的角度，討論日治前期公學校體操科的實施與殖民統治的關係，其中，第二章針對體育教師專業化的現象有所著墨，尤其是體操講習會的舉行，有部分論述，該篇論文雖僅討論至 1922 年，與本研究的時間斷限並不相符，但具有極大的參考價值。最後，游鑑明的〈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10]乙文，透過學校女子體育發展在殖民教育政策逐步展開的問題意識下，解析殖民者藉由「放足運動」使女子身體得到解放與重塑，女子突破傳統柔弱觀念和本身的生理限制，以及體操課、體能訓練、運動競賽的運作過程，強調爲達殖民統治目標，日本政府採用嚴密和全面的手段，以集體鍛鍊、精神陶鑄和不鼓勵個別表現的形塑過程，使臺灣女性身體符合殖民政府的期待，其中對於女教員的體操講習會有些許探討及分析，對本論文而言，提供筆者許多寶貴之重要資料。

易言之，目前有關日治時期教員講習會之相關論著，相當闕如，遑論體操講習會之研究，因此本課題的研究內容實際是一個全新的嘗試。

本篇論文大量運用政府官方史料，如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事年報外，也爬梳臺灣日日新報，還有教育相關雜誌等，另參閱相關書籍後，針對日治時期體操講習會的歷史脈絡加以審視，並從這些舉辦的背景及實質內容中進行分析及探討。本文試圖揭示師範教育的體育發展，審視體育師資整體的培育成效；接著針對教師參與講習會的過程與內容進行陳述；再以臺北州體操講習會的實施情形，

---

[7] 例如林玫君，〈戰後臺灣國民小學體育師資養成之歷史探源(民國 34-76 年)〉(桃園：國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蔡昇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改制前身體育師資培育之歷史考察（民國 36 年～民國 94 年）〉(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李玉麟，〈臺灣地區小學體育師資培育課程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上述各論文皆是針對體育師資培育制度的變革、時代背景、教育內容、課程設計、教學實況、國民小學體育師資結構、師資素質和人力運用概況等進行研究。

[8] 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大書苑，1998）。

[9]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中央大學，2002)。

[10]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2000.06)，頁 5-75。

包括舉辦目的、舉辦時間、舉辦內容等方向進行討論；其中，以 1924 年於淡水舉行的體操講習會爲例，說明講習會舉行之整體樣貌；最後，就體操教授要目的公布與改正，對於臺北州體操講習會的影響爲何，加以分析，另陳述女子體操講習會的內容，以及針對體育知識如何透過體操講習會的舉行，以傳遞日本甚至於全世界的文明身體，提出看法。

二、關於體育教師的「誕生」

體育教師的「誕生」，以下分爲日本培育體育教師的概況；臺灣教育的第一步；師範學校的培育等三部分加以說明，以明體育教師專業化之梗概。

（一）日本培育體育教師的概況：

將體育做爲學校的一個科目，是三個多世紀以前的事。追溯十八世紀的歐洲，德人巴塞斗(Johann Basedow, 1723-1790)於 1774 年在戴騷(Dessau)創設「博愛學校」(Philanthropinum)，全體學生需於每日規定時間，從事各種體育活動，是歐洲的首創者，[11]爾後爲了因應體育課程的出現和需要，體育師資受到極大的重視，最早培育體育師資及人才的國家，亦從歐洲開始興起，尤其是丹麥政府於 1828 年採用那哈爾氏(Franz Nachtegall, 1773-1847)的建議，設立體操師範學校，以培養體育師資人才，是爲最早。這股培體育師資之風，慢慢擴散至全歐洲，[12]再吹向美國，也吹往亞洲的日本。

日本之所以採用西洋的體育，一開始是因爲幕末爲了軍事加強、武備充實，而引進以軍事爲主的《體操教範》(Handleiding voor het onderwijs in de gymnastiek,1853)，後有感日本兵力的基礎體力欠佳，採取以柔軟體操和器械體操爲主的「練體法」(Gymnastque)之體操。[13]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在引進近代教育之時，是以吸收歐美學術文化及提升國民知識水準爲主要目的，加上日本傳統教育中並無「體育」課程，在無視學生健康與重視智育的結果之下，學生身體衰弱、罹患疾病而退學、休學者相繼出現下。[14]

1871 年，文部大臣田中不二麿至歐美視察，參觀美國波士頓州的阿瑪斯特大學(Amherst College)，對該校實施的「整容體操（Calisthenics exercise）」（筆者按：健美體操）印象深刻，返國後，已產生自阿瑪斯特大學聘請教員至日本創立體育學校的初步想法，1876 年，田中氏第二次到美國，復次至該校訪問，並參觀該校的「附屬體操學校」，對於實施的運動法十分感動，認爲有必要將此術

[11]吳文忠，《體育史》（臺北：正中書局，1957），頁 64-66。

[12]如 1849 年被喻為「德國學校體操之父」的斯比次(Adolph Spiess, 1810-1858)，於丹司太得創設師資訓練班，1860 年的柏林已有 1,500 名受過訓練的體育師資。吳文忠《體育史》，頁 64-66；75-76；115-116。

[13] 成田十次郎，《スポーツと教育の歴史》（東京：不昧堂，1988），頁 56。

[14] 能勢修一，《明治体育史の研究—体操伝習所を中心に—》（東京：逍遙書院，1971），頁 41-89。

在日本普及，隔年返國後，遂向日本政府及阿瑪斯特大學進行交涉。[15]文部省遂從阿瑪斯特大學聘請醫學士，同時也是生理學教授的李蘭土（George Adams Leland,1850-1924；日本漢字爲「李蘭土」）至日本擔任體操傳習所的教師。

1878 年 10 月 24 日，日本文部省布達第五號「今般東京府下に体操傳習所開設致候條此旨布達候事」，決定設立「體操傳習所」，[16]是日本第一所體育師資養成機構，除聘請李蘭土外，日本政府同時任命當時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伊澤修二爲兼任主幹，以及坪井玄道爲教員並擔任李蘭土的翻譯。

體操傳習所設立的目的，在於選定適合日本施行的體育方法，並培養體育專業教師，傳習所之成立，促進明治初期學校體操之振興，更是近代體育發達的主要起點。[17]由於李蘭土曾經受到劉依士(Lewis)所創以醫療爲主體的美國新體操影響甚深，李蘭土教授係以醫療、衛生爲立場的體操課程－「輕體操」。[18]李蘭土對日本體育教學有頗大的貢獻，被喻爲日本的「學校體育之父」，後於 1881 年 7 月離開日本。[19]

李蘭土的體育思想，記錄在李蘭土氏講義《體育論》，[20]此外，體操傳習所亦出刊四本書籍，除了《體操傳習所規則》和《體操傳習所一覽》，最重要的即是 1882 年出版的《新撰體操書》及《新制體操書》二書。前者爲李蘭土針對體操傳習所、東京師範學校、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學生實地教授輕體操（普通體操）內容的筆記，[21]由坪井玄道翻譯爲日文；後者爲體操傳習所第一屆畢業生，出版輕體操的指導解說書，[22]此二書被視爲日本體操書之嚆矢。體操傳習所的畢業生陸續出版 97 本相關書籍，[23]復加上李蘭土、伊澤修二、坪井玄道等人之調教體操傳習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女子師範學校，其學生畢業後又將新式體育技術與觀念傳播至各地，[24]對於近代日本體育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

[15]今村嘉雄，《學校體育之父　りーランド博士》（東京：不昧堂，1978），頁 14-18。

[16]今村嘉雄，《日本體育史》（東京：不昧堂，1970），頁 129。

[17]筑波大學体育・スポーツ史料室，《体操傳習所（明治 11 年～19 年）筑波大學体育のルーツ(1)》（2003），頁 4。

[18] 劉依士(Lewis)創設以醫療為主體的美國新體操，基本上是採用簡單器具，以輕鬆力氣便可以操作的體操。Richard A. Swanson & Betty Spears,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s.:Brown & Bunckmark, 1995, pp.126-127.

[19] Richard A. Swanson & Betty Spears,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 Wis.:Brown & Bunckmark, 1995, pp.126-127.真行寺朗生、吉原藤助，《近代日本體育史》（日本體育基本文獻集 第 8 卷）（東京：日本體育學會，1928），頁 627-628。

[20]今村嘉雄，《十九世紀に於ける日本體育の研究》（東京：不昧堂，1977），頁 913。

[21]今村嘉雄，《十九世紀に於ける日本體育の研究》，頁 918。

[22]筑波大學体育・スポーツ史料室《体操傳習所（明治 11 年～19 年）筑波大學体育のルーツ(1)》，頁 14。

[23]筑波大學体育・スポーツ史料室《体操傳習所（明治 11 年～19 年）筑波大學体育のルーツ(1)》，頁 24-26。

[24]入江克己，《日本近代體育思想の構造》（東京：明石書店，1988），頁 39。引自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

體操傳習所自 1878 年 11 月 25 日正式設立起，至 1885 年 3 月改爲附屬於東京師範學校，1886 年 4 月正式廢止，此九年期間培育的畢業生共有 255 名，[25]也使體育師資逐步專業化，對日本學校體育教學有極大之貢獻。

（二）臺灣教育的「第一步」[26]

1895 年，日本治臺不久，臺灣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希望設立「教員講習所」，以期培養初等學校師資。[27]爲達成此一目標，伊澤於是年 10 月 25 日上京處理招募講習員之相關事宜。透過文部省及各府、縣下的郡、市公所來招募講習員，經過一連串的「波折」，[28]錄取 45 名。4 月 6 日，連同 13 名新任學務部員，由伊澤率領前往臺灣，4 月 11 日抵台，這些講習員成爲日治時期臺灣最初的教員。

兩個半月的時間裡，講習的學科有：臺灣語、日本語教授法、支那公文書信、體操、唱歌、博物學及衛生法等六個科目，[29]雖然，伊澤著重的是臺語及教學法的講授（約各佔一個月），但伊澤曾經協助日本體操傳習所的成立及開設，大力培育日本體育教師，或許是「體操」乙科在日治之初的臺灣即已安排於課程之中的原因之一，同時，體操亦是確保講習員身心之健康的重要活動。

根據伊澤修二學務部長的報告和第一期的講習員加藤元右衛門指出，這 45 名講習員的體操科課程是由大久保幸之助，須田小五郎兩位少尉來授課，至於上體操科的服裝方面，則是經由伊澤考量後設計而成，「夏天爲白色，冬天爲黑色，胸前附有肋骨狀的鈕扣，其狀如往昔將校所著之服」，至於帽子「其形狀類似斗笠，用竹編成，再用布覆蓋，夏天爲白色，冬天爲黑色，戴上此帽子會覺得很涼爽，而且在兵式體操持槍訓練之時，頗爲方便」。至於在課餘之時，「爲了準備萬一，武技的練習是必要的，放課後在庭前或樹蔭下，每天從事擊劍的練習。其中以林元三郎、中堂謙吉、齊藤典治、新家鶴七郎、江田駒次郎、堀正次郎等諸氏擅長著於此道」。[30]

二個半月後的 7 月 1 日，舉行畢業典禮，[31]席上，伊澤部長特別就第一期講習員講習的情形，向在座的諸長官及貴賓提出補充說明，其中有關體操科的部分：「體操是將兵式體操的徒手各個教練，柔軟體操、持槍各個教練的全部，做一通盤的教授」，而且「當地的氣候風土大不相同，特別是炎熱如火的天氣，飲水的不良將危害道健康；爲此，請了在此地富有經驗的陸軍軍醫，就衛生法和急救療

[25]能勢修一，《明治体育史の研究—体操伝習所を中心に—》，頁 102。
[26]引自謝明如的概念，詳見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第一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講習員之培訓與任職—〉，《臺灣教育史研究會》52 期（2007.5），頁 2-15。
[27]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台北：該會，1939；台北：南天，1995 年複印），頁 14-17。
[28]有關伊澤修二於日本期間招募情形，詳見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第一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講習員之培訓與任職—〉，頁 2-15。
[29]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6），頁 74。
[30]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頁 79。引自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頁 50。
[31]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1939），頁 538-542。

法做了一番的講習」，[32]足見當時係以兵式體爲其主要。

有關於第一期至第七期的講習員入學及畢業人數，整理成表 1：

表 1：七期講習員入學及畢業人數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入學年月日	1896.4.15	1896.12.15	1898.9.22	1899.3.31	1899.9.22	1900.2.20	1900.11.18
入學者數	45	甲 50 乙 26	30	37	29	26	28
畢業年月日	1896.7.1	1897.3.1	1898.1.14	1899.7.9	1900.1.25	1900.4.19	1901.3.30
畢業者數	45	甲 49 乙 22	30	37	25	26	30

資料來源：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6，頁 75。

有關第二期講習員講習期間體操科的授課情形，由 1897 年 4 月 1 日的畢業典禮席上，國語學校代理校長本田教授的報告可以窺之：「甲種講習科目爲國與學校教授法和土語，並將理科、唱歌、體操來加以補習；乙種則授以土語、支那公文書信，並將理科、體操加以補習……（略）……本次的畢業生，是將以上的科目加以講習，在學中任何一人均品行良好，注意健康，精勵好學，才有今日的好成績」。[33]

至於第三期至第七期的講習員講習期間有關體操之相關資料，受限於資料緣故，[34]目前無法得悉。可是，此種具有因應急迫局勢採取權宜計策意味的國語傳習所，讓臺灣近代教育（包括體育）往前跨出一大步。

（三）師範生的培育與訓練

1896年6月日本殖民政府頒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國語學校設師範和語學兩部，然國語學校並非專責之師資培育機構，且專培養日籍教師，且1898年7月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公學校令」，規定以地方經費開辦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教師需求因此大增。再據總督給地方長官之內訓，決定設置師範學校，培養臺灣人從事教職，[35]1899年3月31日，臺灣總督府以敕令第97號頒布「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4月13日發布師範學校規則，以培養臺籍之國語傳習所

[32]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543-544。

[33]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頁 74。

[34]其他有關第三期至第七期的講習內容，詳見謝明如，〈日治時期「臺灣教育的第一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講習員之培訓與任職—〉，頁 2-15。

[35]原因有四：（一）在日本國內招募教師困難且經費開支頗大；（二）在臺日籍教師異動甚大；（三）為應將來公學校增加之需求並節省經費；（四）為改革書房學科，使其漸近於公學校。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學校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8））（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1983），頁15-16。

及公學校教師爲主旨，培養臺灣人從事教職的措施始正式法制化。並於同年4月9日，以告示第39號公告師範學校的名稱和位置，分別爲臺北師範學校、臺中師範學校、臺南師範學校，其後因公學校發展未如預期之迅速，加上台籍師資之供給有過剩之虞，因此臺北、臺中、臺南三所師範學校，遂於1902年、1904年分別廢除，師範生併入已明確定位爲師資培育機構的總督府國語學校，[36]開啓師資培育的重要工作。

課程方面，臺灣總督府於 1896 年 3 月 31 日以敕令第 94 號公布「臺灣總督府直轄諸學校官制」，並依此官制的發布，原來的「芝山岩學堂」改稱「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芝山岩學堂」，而後在同年 9 月 25 日，臺灣總督府以府令第 38 號發布「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第 1 條即言「國語學校分成師範部及語學部且加設附屬學校」；第 2 條爲「國語學校師範部是作爲培養國語傳習所和師範學校的教員，以及小學校的校長或教員，兼作研究本島普通教育的方法之處」。[37]

師範部的學生年齡應在 18 歲以上，35 歲以下的內地人（註：日本人），且必須有尋常中學第四學年以上的學歷，始能入學，修業年限爲二年。教學科目共有十二個科目，其中「體操」即是其一。

另外，前述的臺北和臺中師範學校廢止後，大部份學生編入國語學校，1902 年 7 月 6 日，臺灣總督府以府令第 52 號將「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規則」加以修正公布，師範部則改爲設立甲科及乙科。甲科年齡應在 18 歲以上，25 歲以下的內地人，須有中學第四學年的課程修了者或具有同等以上學力者；乙科入學者爲年齡在 15 歲以上，23 歲以下的本島人，具有公學校畢業以上的學力者，兩者修業年限分別爲二和三年。教學科目部份，甲科設有十五個科目；乙科設有十四個科目，同樣地，「體操」都是其中之一的科目。1905 年 12 月 23 日，修正國語學校規則。

1919 年 4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以敕令第 65 號公布「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將師範學校分爲預科及本科，預科修業一年，本科修業四年。另外，在師範學校內設小學師範部及公學校師範部。

[36]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師範學校之研究》，頁15-20。

[37]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 11 卷（教育資料調查會，1964），頁 39-40。

表 2：國語學校師範部授課課程表

公布時間	學校	第一學年	每週教授時間	第二學年	每週教授時間	第三學年	每週教授時間	第四學年	每週教授時間
1896	國語學校師範部	兵式體操 普通體操	三	兵式體操 普通體操	三				
1902	國語學校師範部甲科	遊戲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四	遊戲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四				
	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	遊戲 普通體操	五	遊戲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五	遊戲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三		
1905	國語學校師範部甲科	遊戲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二						
	國語學校師範部乙科	遊戲 普通體操	四	遊戲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四	遊戲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三	遊戲 普通體操 兵式體操	二
1919	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預科	體操 教練 遊戲	四						
	臺灣總督府師範學校本科	體操 教練 遊戲	三	體操 教練 遊戲	三	體操 教練 遊戲	三	體操 教練 遊戲	三

資料來源：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 11 卷，教育資料調查會，1964，頁 44、187-196、284-288。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1939，頁 584-587。

即便師範教育機構因爲諸多現實之考量，時有制度上之變革，然而對於體操科教授教學能力的培育，並未因制度更迭而有所改變。除了上表所列之體操科內容之外，尚有部分臺北師範學校、臺中師範學校、臺北第一師範學校其他體育活動的情況（包括學校行事曆、運動會、運動場平面圖、課外活動、運動部、養護等），[38]對於師範生的體育教學能力亦可產生提升的效果。

三、體操講習會的初現

上述各師範學校的教學機制，對於日後小公學校教師體操科教授能力的養成，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然而，小公學校教師就職後，臺灣總督府以及地方各州廳尚舉行各種教學講習會，成爲維繫教師體操教學能力的重要媒介。

講習會之舉行，是日本殖民者關切之事，臺灣自日治之初至日治末期皆未間斷，這可從《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的文獻略爲得知，其主辦單位從臺灣總督府（包括臺灣教育會）乃至府州廳郡（各地教育會）等，皆分別舉辦教員講習會。1930 年臺灣總督府舉辦體育研究會時，甚至還特別提出體操講習會應如何促進

[38]關於師範學校體育活動的發展，可參閱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臺北師範學校編《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週年紀念誌》（臺北：臺北師範學校，1926）與台中師範學校編《台中師範學校創立十週年紀念誌》（台中：臺灣師範學校，1933）關於學生就學時期從事體育活動的回憶。

講習員「資質向上」乙事進行討論，[39]足見其重視程度。

早在 1900 年，臺北師範學校在暑期休暇期間，於 7 月邀集全島各教員三十餘人參加，[40]內容雖未涉及體操科目，但已開教員講習會之例。1905 年 7 月 1 日，臺灣總督府以訓令第百六十一號發布「地方學事講習規程」，[41]該規程第一條載明，為使臺灣公學校訓導能在教學上「改良進步」，廳長可隨時開設學事講習會，另希望各地「務使統一」辦理相關講習，[42]看來，此規程的設定，最初是針對公學校教員，且以教學精進為其優先。

然而，教員講習會的舉行，除了具有「豐富教員的能力」[43]之效；亦可「啓迪方法」[44]之外，更希望各講習員參與講習之後，「以為實際之活用，俾得收本島人教育之效果」，[45]這些意在培養教育見識及各種提升教員知能的講習會，亦可置於社會及國家發展之上，期能藉此涵養國民性。1905 年內田長官在教員講習會開幕式談到：「諸氏冒三伏之炎熱，利用休暇，從事研究所定科目，諸氏之勞苦實可謂大矣，今者日新之時運，教育之需改善者愈急，學術之進步駸駸無暫停，□□之趨勢，謀本島教育之發展，誠刻下之急務，而教育發達之中心，實在教員之人格與技倆，是以督府設本會，欲促學力之充實，與技術之進步……，更欲一言者，為本年有御即位大典人子弟，益孚感尊皇之大義，涵養發揮其國民性，無有遺憾，此等教養之根柢，有俟於教員者，自無待言……」，[46]政府應該因應今日時勢，於改善教育之同時，加強教員之「學力」及「技術」；又言，教員應教導其子弟，「益孚感尊皇之大義，涵養發揮其國民性」，透過講習會的舉行，除強化體育教學知能外，亦將國民道德或教育思潮等理念傳遞至小公學校學生身上，可見教員之「重責大任」。

筆者依據《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的資料，將教員講習會（含體操）之次數整理如表3：

---

[39]〈督府體育研究會　總督代理訓示後　就諮問事項答申〉，《臺灣日日新報》(1930.7.6)，版 8。〈督府主催體育研究會　總督の訓示-諮問事項の答申／諮問案答申要項〉，《臺灣日日新報》，(1930.7.6)，版 n1。

[40]研習時間頗長，共達 47 日，講習時間從上午 7 時至下午 7 時，長達十餘小時，顯現其講習課程頗多。〈教員講習會講習の成績〉，《臺灣日日新報》(1900.10.16)，版 2。

[41]〈訓令第百六十一號地方學事講習規程設定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8 年永久保存，冊號 1092，文號 24，門號 7。

[42]〈昨日之教育事業（上）〉，《漢文日日新報》(1906.1.7)，版 3。

[43]〈小學校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08.7.16)，版 2。

[44]〈教員講習會講習の成績〉，《臺灣日日新報》(1900.10.16)，版 2。

[45]此為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於 1910 年 7 月 17 日，在教員講習會的致詞，全文如下：「本島之開發。今已就緒。而教育一事。亦益進普及發達之域。誠堪為國家欣喜之者。當此之時。從職教育者。應常不怠于學理之研鑽並實地之磨鍊。以期改善者。自不待言。特如教育本島人者。宜深鑑本島社會之狀態。施以適宜之教育。使之健全。藉得養成常識之良國民。此公學校職員諸君。所於宜一層研究與努力也。此次開設講習會。亦將以資諸君之研究。願諸君善修其業。以為實際之活用。俾得收本島人教育之效果。當舉此開會之式。謹陳一言。以為訓辭。」〈紀講習會開會式〉，《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0.7.21)，版 2。

[46]〈講習會開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15.7.7)，版 5。

表 3：1899 年至 1937 年體操講習會概況

	總督府（含台灣教育會）			州廳郡市			臺北州		
	綜合(含體操科目)	體操專業講習會	教育相關講習會之總和	綜合（含體操科目）	體操專業講習會	教育相關講習會之總和	綜合（含體操科目）	體操專業講習會	教育相關講習會之總和
1899	未記載								
1900	未記載								
1901	未記載								
1902	未記載								
1903	0	0	0	2	0	6			
1904	0	0	1	2	0	6			
1905	1	0	3	1	0	3			
1906	0	0	3	4	0	12			
1907	0	0	0	4	0	10			
1908	0	0	1	7	0	15			
1909	1	0	1	6	0	16			
1910	0	0	3	2	0	8			
1911	0	0	2	1	0	8			
1912	1	0	3	2	0	8			
1913	0	0	4	0	0	6			
1914	0	0	8 場 3 回	0	0	3			
1915	3	0	9 場 5 回	2	0	6			
1916	5	1	11 場 6 回	1	0	8			
1917	3	0	9 場 4 回	3	0	9			
1918	0	0	8 場 5 回	5	0	13			
1919	0	0	11 場 8 回	11	0	19			
1920	2	0	16 場 9 回	21	0	34			
1921	3	0	5 場 5 回	17	3	30	7	0	10
1922	1	1	7 場 7 回	0	0	0	0	0	0
1923	1	0	7 回	11	0	14	1	0	1
1924	1	0	2	2	0	75	0	0	27
1925	0	2	6	12	0	89	2	0	42
1926	0	1	7	1	2	94	0	0	31
1927	0	2	1 場 7 回	2	2	100	0	0	27
1928	0	2	7 回	3	3	101	0	0	25
1929	2	0	1 場 8 回	3	13	96	0	5	30
1930	0	1	1 場 7 回	2	9	80	0	3	18
1931	0	1	1 場 4 回	2	8	79	0	2	14
1932	0	0	1 場 4 回	1	9	95	0	4	17
1933	0	0	1 場 4 回	1	18	108	0	2	14

1934	1	0	1 場 4 回	0	11	98	0	4	20
1935	1	0	1 場 4 回	0	8	87	0	1	14
1936	0	0	1 場 5 回	0	8	69	0	0	9
1937	0	1	5 回	2	21	86	0	4	28
合計	26	12	129 場 118 回	133	115	1491	10	25	327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一年至第三十六年，明治 36 年至昭和 12 年），1905～1940 年，整理而成。

以上的數據雖僅至 1940 年，然其教員講習會的舉行仍然持續。例如 1941 年臺北州文山郡教育會舉行該郡的教員講習會，[47]1942 年高雄州高港郡也針對郡下國民學校的助教和准訓導進行一週的教員講習會，[48]1943 年新竹州爲了解決教員素質低下的問題，積極舉行教員講習會，以強化其素質，[49]顯示教員講習會的舉行至日治末期仍然存在，但已有減少之趨勢。

根據表2，從1903年起，針對教師體操的教授能力，已藉由制度化的講習會，維持體操科教師的素質。1899年到1937年之間，臺灣總督府（含臺灣教育會）舉行的講習會共有129場，其中38場將體操列入講習課程，比例約爲29.5％；各州廳郡市舉行的講習會共有1,491場，其中248場將體操列入講習課程，比例約爲16.63％；臺北州則舉行327場，其中35場將體操列入講習課程，比例約爲10.70％，由此粗略的數字看來，體操講習會多以臺灣總督府主辦者居多，各州廳比例相對較少，不過，對於體操的教授能力，講習會課程應可提供教師不少幫助。

大抵上，講習體操的舉行方式可分爲二種：一是類似「綜合」講習會，二是以「專業」爲主的講習會。

第一，「綜合」講習會主要內容是提供教師廣泛的知識，不偏重某項課程，意指以多種不同科目進行課程教學，一次教授數種科目，體操只是其一。例如1905年臺北廳等六個地方廳，利用夏季休業時間，分別舉行教員講習會，講習會的科目包括有土語、國語、讀書、算術、唱歌、教授法、管理法、唱歌、體操……等，每廳二至八科不等，[50]其中六場講習會當中，有二廳（臺北廳和新竹廳）分別將體操列入其中的講習科目。又如1906年7月16日起至8月5日之間，臺北廳利用三

[47]〈文山郡で助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41.8.26），版 4。
[48]〈國民塾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42.8.2），版 4。
[49]〈新教員近く配置　新竹州助教員講習會強化〉，《臺灣日日新報》（1943.3.21），版 n02。
[50]臺北廳舉行之教員講習會之教授科目為土語、教授法、管理法、唱歌、體操（以上教諭）、國語、教育學、唱歌、體操（以上訓導、囑託、雇）；宜蘭廳之教授科目為國語、讀書、算術、唱歌、教授法、管理法；桃仔園廳之教授科目為修身、國語、算術、教授法、管理法；新竹廳為國語、作文、算術、教授法、唱歌、體操；南投廳教授科目為國勢一斑、教育學大要、算術、地理及歷史ノ一斑、衛生、國語、日用須知、諸制度；澎湖廳之教授科目為國語（讀方、話方）、算術（四則）作法。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年報》（1905），頁 3。

禮拜的時間召集廳內公學校訓導與雇教員在大稻埕公學校舉行講習會，每日五小時針對國語、體操及各科教授法進行講習，並補助出席者一人每日二十錢。[51]大體上，體操做爲小公學校教授科目的一環，殖民當局在通才的概念下實施，小公學校教師應該學會各項技能，體操也不例外。

第二，「專業」講習會則以運動技能和知識做爲講習主軸。臺灣最早專爲體操舉行的講習會何時舉行？爲了回答這個問題，筆者從《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臺灣日日新報》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史料裡進行爬梳。謝仕淵的研究提到1899年國語學生畢業生曾進行體操的進修教育，[52]然真正以講習爲名的起始者，應是1903年於臺北廳舉行的體操講習會。[53]當年3月26日，臺北廳利用學期終了的休業時間，針對小公學校的教師於臺北第一小學校進行「體操遊戲講習會」，聘請國語學校的鈴木和金須擔任講習會之講師，然其講習之內容爲何，限於資料之闕如，無法進一步說明。之後，同樣在臺北地區，舉行數次體操講習會，例如1908年於臺北舉行的「體操講習」；[54]1912年臺北廳內各公學校於年末的休暇，進行體操教員的講習會；[55]1920年臺北廳學務當局針對管內之小學校教員進行體操科的講習，從一月開始至三月，每星期六下午一時開始。[56]上述地點皆位於臺北。

接著，筆者再根據《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的史料進行細部的統計，日治時期針對教員舉行的講習會種類，竟高達47種之多，整理如下表。

表 4：1899 年至 1937 年教員講習當中的專業講習會舉辦次數

編號	種別	舉辦次數	編號	種別	舉辦次數
1	國語講習會	126	25	複式學級經營講習會	3
2	其他講習會	92	26	家事裁縫講習會	3
3	（男、女）體操（育）講習會	83	27	休養講習會	3
4	農業（科）講習會	69	28	地理理科講習會	3
5	圖畫講習會	65	29	青年指導講習會	3
6	教育講習會	61	30	裁縫手藝家事講習會	2

[51]〈臺北廳教員講習〉，《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6.22），版 3。

[52]對於體操師資的維持，曾以國語學校畢業生回校進修的方式進行。1899 年，國語學校曾針對畢業生（多半任教於公學校）進行進修教育，其中體操科部分，以體操準備、整容法、呼吸運動、身體矯正術、徒手體操第一演習等項目為主，另旁及兩中體操、槍執用法、戰鬥勤務等訓練。該項措施意味教育當局藉著類似進修的方式，維繫體操師資的素質。〈國語學校卒業生の修業狀況〉《臺灣日日新報》(1899)，版 2。引自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頁 115。

[53]〈体操遊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03.3.25)，版 2。

[54]〈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08.5.7)，版 2。

[55]〈體操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12.12.29)，版 2。

[56]〈體操科の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20.1.12)，版 2。〈教員講習體操科〉，《臺灣日日新報》，(1920.1.13)，版 4。

7	唱歌音樂講習會	31	31	學校看護講習會	2
8	體操遊戲講習會	29	32	體育衛生講習會	2
9	音樂講習會	27	33	唱歌講習會	2
10	地理歷史講習會	26	34	國史講習會	2
11	理科講習會	22	35	書方講習會	2
12	修身講習會	20	36	保姆講習會	2
13	手工圖畫講習會	19	37	軍事訓練講習會	2
14	算術講習會	15	38	家事音樂講習會	1
15	（國民）精神文化講習會	13	39	中古文學講習會	1
16	學校衛生講習會	10	40	少年團講習會	1
17	青少年團及修養講習會	10	41	手工（科）講習會	1
18	裁縫手藝講習會	8	42	作業（科）講習會	1
19	工業講習會	7	43	武道講習會	1
20	家事裁縫講習會	7	44	裁縫講習會	1
21	複式教授法講習會	6	45	綴方手工講習會	1
22	唱歌遊戲講習會	6	46	臺灣語講習會	1
23	音樂遊戲講習會	5	47	衛生體育講習會	1
24	國語算術講習會	4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一年至第三十六年，明治 36 年至昭和 12 年），1905~1940 年，整理而成。

說明：本資料僅針對學事年報資料而言，有部分數據與其他尋獲之史料有部分差異。再者，在「綜合」與「專業」講習會之計算方式，因學事年報有時將講習會全稱列出，有時則否，增加計算的困難度。

從上表初步觀之，國語講習會 126 次最高，其次是其他講習會舉辦的 92 次，再者則是體操（育）講習會，有 83 次，看來與「前二名」還有一段小距離，但若加上相關之講習會（體操遊戲講習會的 29 次、體育衛生講習會的 2 次、唱歌遊戲講習會 1 次、音樂遊戲講習會 1 次、武道講習會的 1 次、衛生體育講習會的 1 次），總次數則高達 112 次，僅次於國語講習會。在各種講習會舉辦當中，體操科何以受到極大的歡迎？在 1915 年臺灣總督府舉行教員講習會時，已報載「其科目中最有興味者，爲體操一科」，即便當時的體操講習會爲七月炎暑之天氣，但各講習員仍然「熱心研究」，而且「即年長者亦頻揮熱汗」，又根據教師所言，其體操講習之方針，「爲本島生長子弟，比在內地體力甚劣，即精神上亦注意力散漫，乏活氣，意志薄弱，照此體育甚可補肉體上精神上之缺點，使全校兒童喜運動，不問校內校外。于體操科修得規律及其他美德，均期實行」[57]。可見講習員之認真程度。至於此種以人體主動從事之肢體活動爲生（身）理特徵的體育活

[57]〈講習中之體育〉，《臺灣日日新報》（1915.7.13），版 5。

動，是否也反映殖民者對於學生在身體、意識型態的期待，或者在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下的臺灣，藉由身體改造的體操課程做爲同化臺灣人的主要政策，這，應是另一個重大的課題。

值得一提的是，公學校教師任用的機制，令此一師資培養的過程具有進一步加強的功能。

此一機制即爲教師任用時必須通過的測驗。臺灣總督府於 1898 年 7 月 27 日以敕令第百七十八號頒布的「臺灣公學校令」，第九條即規定「公學校教員限用領有臺灣總督檢定公學校教員之執照者」，[58]同年，「臺灣公學校教員檢定規則」的頒布，[59]規定公學校教師之任用方式。初始，公學校教員檢定分爲教諭檢定和訓導檢定，[60]之後，小公學校教員的任用方式則分爲「無試驗檢定」與「試驗檢定」等兩種方式，使任用教員有更明確的依據。因此，透過教師資格徵選的測驗，便成爲維繫公學校體操科教授能力的保障。

值得關注的是，謝仕淵提到教師試驗與講習會之間似乎是一種相互配合的制度，亦即以類似補習的形式出現。[61]以1906年爲例，總督府因公學校膨脹，爲因應急需，舉行教員檢定試驗，授與訓導證書，然此試驗須具有師範部乙科畢業之程度，臺灣教育會，乃舉辦講習會，凡公學校畢業生、師範學校國語學校半途退學者，或是國語學校國語部畢業生，即可報名參加，講習時間自11月19日起，爲期五個星期，科目則爲教育、國語、修身、數學、體操、唱歌等，這些科目皆爲訓導試驗必要之學科，若通過檢定，可直接減少四年的就學時間，隨即可擔任教員一職。[62]參加者另於參加講習會時，繳納檢定三十錢。[63]又根據謝仕淵的研究對照，講習會講師爲渡部、志保田、三屋、長谷、大橋以及負責體操教授的鈴木等六人，卻也同時出現在總督府所任命的「教員檢定臨時委員」的名單之中，[64]是故提出講習會授課之教師與「教員檢定委員」是多數重疊的，此一現象是否意味著，參與講習會的人比較容易通過檢定考試，誠爲一值得注意的問題。

的確，臺灣小公學校，或因增設甚多，缺員現象嚴重，臺灣總督府屢用夏期休業時間，舉辦教員講習會，[65]以補充教員之不足，或藉此進行教論試驗準備，於是乎，在教員講習會的類別上，經常可見「教員學力向上講習會」、「師範學校

[58]〈公學校令敕令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1 年甲種永久保存，冊號 225，文號 7，門號 17。
[59]〈府令一一一號公學校教員檢定規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1 年甲種永久保存，冊號 225，文號 32，門號 17。
[60]〈教員檢定〉,《漢文日日新報》(1901.12.13)，版 3。
[61]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頁 116。
[62]〈訓導採用之新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10.10)，版 2。
[63]〈教育會講習會〉,《漢文日日新報》(1906.10.13)，版 3。
[64]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頁 116。原引文為〈教育會講習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10.21），版 2。〈教員檢定臨時委員〉，《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11.3），版 2。
[65]〈教員補充〉,《漢文日日新報》(1909.6.15)，版 2。

卒業者學力補充講習會」，或是「文檢受驗準備講習會」。[66]更甚者，有些講習會的舉行也會有審查或考查制度，可直接授與教員之免許狀，[67]看來，講習會除了具備傳遞體育新知、國民道德之外，也是另類的培育教員機構，更是一種快速取得資格的捷徑。

總之，公學校體操科師資固然可依循著師範體系，從事體操教授能力的培養，確保公學校體操科的教授品質，而在教師在職進修方面，主要依循著講習會的方式或者同儕間的體育活動，加強體操的教學能力。

四、傳遞體育知識：臺北州體操講習會的舉行方式

日治之後，臺灣人的活動受到殖民者帶入新的體育運動思潮而有所轉變。[68]1903 年 7 月的《臺灣日日新報》曾就「臺北紳士的娛樂」列出其興趣，[69]內容包括動態和靜態兩種活動，記載人數雖然不多，但在這些娛樂當中，臺北紳士著重於大弓、圍碁、自轉車（自行車）、玉突（撞球）、相撲、謠曲和寫真等方向，仔細對照這些項目，與當年由大島久滿次成立「體育倶樂部」所推展的體育運動內容十分相近。雖然運動倶樂部的成員泰半以日本人爲主體，臺北紳士是否加入不得而知，惟體育倶樂部推展之相關活動確實存在於臺灣人的意向之中，顯示臺灣人已然受到日本人因明治維新之後接觸的西方運動和日本原有傳統運動的影響。

一九二Ｏ年代，日本殖民政府獎勵體育、支持保健等言論紛紛出現，臺灣人士對於體育運動也逐步有所認識。例如由留學東京的臺灣青年學生於 1920 年組成的「新民會」，發表的文章內容亦著重於體育運動，鼓勵臺灣人積極從事。蔡培火在《臺灣青年》月刊雜誌之創刊號發表〈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一文，對於當時臺灣三百五十萬的住民提出六點建議，[70]提倡體育就是其中一項。

日治之後，臺灣受到日本傳來之西洋文明，不僅部分臺灣人已經可以接受，還大聲呼籲和獎勵體育，1920 年 2 月成立的「臺北青年體育倶樂部」，係以「圖

---

[66]〈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12.5.16)，版 5。〈雇教員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18.6.2)，版 4。〈教員講習修了〉，《臺灣日日新報》(1920.2.25)，版 7。〈公學校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19.9.14)，版 7。〈淡水教員講習告終〉，《臺灣日日新報》(1922.7.21)，版 5。

[67]例如授與訓導之免許狀、尋常小學校本科正教員免許狀，或乙種公學校教諭免許狀，抑或丙種同上免許狀。〈公學教員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20.4.25)，版 5。〈計畫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1.8.25)，版 5。

[68]《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廿五期的〈島人士趣味界一班〉，就不同的「趣味」加以說明，針對臺灣人從事「靜態」活動逐一加以分析，其內容包括詩、燈謎、書道、繪畫、骨董、花木植栽、下棋、音樂、戲曲和講古等項目，可看出臺籍人士從事的活動大抵上是以靜態活動為其主軸。〈島人士趣味界一班〉，《臺灣日日新報》(1930.7.13)，版 4。

[69]〈臺北紳士の娛樂〉，《臺灣日日新報》(1903.7.26)，版 3。

[70]此六點建議分別為(一)廣胸懷；(二)破迷信；(三)貴體育；(四)養趣味；(五)習科學；(六)興言論。蔡培火，〈對內根本問題之一端〉，《臺灣青年》第一卷第一號 (1920.7)，頁 46-53。

謀臺灣青年體力向上，期許協助人格完備」，[71]以期望臺灣人在運動競技獲得佳績，更是在改變和逆轉劣弱身體的氛圍中積極參與的心理轉折。

至於本文所討論的體操講習會之舉行，筆者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的資料而言，發現在 1920 年之前，專爲體操舉行講習會者並不多，而且絶大多數幾乎集中在北部地區，似也符應了一九二〇年代之後的體育熱勃興，易言之，針對不同教員所舉行的體操講習會，在一九二〇年代之後有較爲顯著的成長。

1919 年 11 月，田健治郎總督上任，爲了確定臺灣地方制度，召開多次會議，[72]後於隔年 7 月 1 日以律令第三號發布台灣州制、臺灣廳地方費令、臺灣市制、臺灣街庄制，[73]自此，州、市、街、庄不僅是行政區劃，同時也是地方公共團體，將原來臺灣西部十廳廢除，改設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等五州，東部的臺東和花蓮廳保留舊制，[74]共五州二廳。

改制後的臺北州，共管轄 3 市、9 郡，分別爲臺北市、基隆市、宜蘭市、七星郡、新莊郡、海山郡、文山郡、淡水郡、基隆郡、宜蘭郡、羅東郡、蘇澳郡。其中，臺北州教育會雖於 1927 年 8 月 29 日於鐵道ホテル（旅館）成立，[75]擔負起舉辦講習會之責，但屬於臺北州教育會支會的各市郡教育會早在不同的時間點陸續成立，例如臺北市教育會在 1927 年 4 月 5 日設立於臺北市教育社會課內，[76]基隆市教育會於 1927 年 10 月 30 日成立，[77]宜蘭郡教育會則於 1931 年 9 月 1 日成立。[78]

其中，各郡市「教育會」與「教育研究會」的功能十分接近，但成立的時間似乎更早，例如臺北州教育研究會雖不知何時成立，但在 1924 年已舉行過相關活動[79]，顯示其成立時間比臺北州教育會早；臺北市教育研究會則更早，於臺北廳改制爲臺北州的隔年（1921 年）成立[80]。「教育會」與「教育研究會」的業務範圍，二者相當接近，羅列如下：臺北市教育會的主要事業爲（一）關於教育調查研究及發表；（二）開設講演會和講習會以及展覽會；（三）關於社會教化事業；

[71]顏春芳（台灣青年體育俱樂部會員），〈我が臺灣青年の體育改造を呼ふ〉，《臺灣青年》第二卷第二號（1921.2），頁 57。

[72]蔡慧玉，〈日治臺灣街庄行政(1920-1945)的編制與運作：街庄行政相關名詞之探討〉，《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第 3 卷第 2 期（1996.12），頁 97。

[73]〈律令第三號臺灣州制公布〉，《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 98 年永久保存，冊號 3006，文號 10，門號 1。

[74]張勝彥、吳文星、溫振華、戴寶村，《臺灣開發史》（臺北縣：空大，1996），頁 211-212。

[75]會員有三百五十餘名。〈臺北州教育會發會式　二十八日鐵道ホテルで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27.8.29），版 2。〈臺北州　教育發會式　廿八日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27.8.30），版 n02。

[76]臺北市役所，《臺北教育要覽》（1933），頁 20-21。

[77]〈基隆市　教育會　昨日創立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10.31），版 2。

[78]1936 年會員數為 141 位。宜蘭郡教育會編，《宜蘭郡教育要覽》（1937），頁 23。

[79]〈臺北公學部　教育研究會〉，《臺灣日日新報》（1924.12.4），版 n1。

[80]〈教育研究會　臺北市に設立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21.4.6），版 2。

（四）會報的發刊和圖書的刊行；（五）體育獎勵事業；（六）學事視察；（七）教育功績者的表揚；（八）其他。[81]至於臺北市教育研究會則是（一）研究及發表；（二）研究各科之教材教法及教具用品；（三）研究教育及體育；（四）研究實地教授；（五）研究校務；（六）開設講習會；（七）必要事項。[82]看來，二者皆可舉辦講習會，然兩者之間的關係爲何，如何分工，權責爲何，至今尚無足夠的證據可供討論。

臺北州專爲體操舉行的教員講習會不在少數，筆者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及《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將臺北州及所屬郡市主辦之體操講習會（此處所指全爲專爲體操舉行的「專業」講習會）整理如附錄 1。

從附錄 1 的資料可以發現，自 1922 年至 1943 年爲止，除了 1941 年和 1942 年尚未找到資料足以呈現外，臺北州均於每年舉行體操相關講習會，少則一次，多則 10 次以上，其中以 1926 年、1936 年和 1937 年的次數最多，此與體操教授要目的公布與修正有其關連性，將於第五節進行討論。

考量到各市郡舉行體操講習會的大小規模，方式有時聯合，有時分組，情況不一，因爲體操講習會大多由各該郡市教育（研究）會舉行，但有時二郡市之間爲互相合作，也會聯合辦理體操講習會，例如 1925 年羅東、蘇澳二郡教育研究會爲了便利，乃針對二郡的女教員，一同舉行體操家事講習會。[83]除了「聯合」舉行之情事外，也有「分組」的情況，如 1923 年臺北市舉行體操科講習會，由六校共同參加講習，內容是有關「各校上級兒童體操實習及遊戲」，但將講習員分成三組，分別爲末廣小學校和壽小學校、南門小學校和旭小學校、建成小學校和樺山小學校，每二校共同研究及講習，「務以徹底研究體操科實習」爲要。[84]

另從現有的資料而論，臺北州各郡市舉行體操講習會之地點，以小、公學校本身爲其主要講習地點，但隨課程性質不一，地點亦有所調整，例如教授水泳課程會搭配至基隆的クールベー濱或淡水海水浴場舉行，[85]人體解剖課程於醫學專門學校教室舉行[86]，另外，也會依據規模大小，增加講習會場，例如 1922 年臺

[81]1933 年統計，臺北市教育會的會員數有小學校 198 位，公學校 279 位，合計 477 位會員。臺北市役所，《臺北教育要覽》(1933)，頁 20-21。

[82]〈教育研究會　臺北市に設立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21.4.6)，版 2。

[83]〈羅東の女教員　體操と家事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25.7.24)，版 5。

[84]〈體操科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22.12.25)，版 3。

[85]1926 年基隆市教育研究會舉辦的體操水泳講習會，有關體操競技部分在基隆第一小學校，水永則改至クールベー濱，至於クールベー濱，翻譯漢文為「區裕麥」或「孤拔」，為法國將領 Courbet 的音譯，根據鄭人豪的研究，基隆クールベー濱是北部地區（包括基隆和臺北）的學校常進行游泳教學或臨海教授的重要據點。〈基隆體操水泳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6.7.13)，版 n1。鄭人豪，〈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的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86]總督府於 1922 年 12 月舉辦全島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邀請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櫻井博士，講授人體解剖生理的基礎及對內地人適切學理的體操。〈體育講習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12.21)，版 2。

北市舉行大規模的體操科講習會，六位講師分據六個學校會場；[87]1939 年臺北市教育會舉辦一場 1,000 餘名教員之講習會，即依照高、中、低年級分開進行教學，[88]又如臺北市於 1940 年針對市內 700 餘名女教員辦理體操講習會，其會場亦分爲四個學校，[89]顯示各市郡的狀況（包括地理環境、學校人力、經費）各不相同，端視活動之大小，加以調整。

例年講習會的舉行，大抵利用暑暇公餘期間，召集教師，一連數日舉行講習，[90]臺北州也不例外，從附錄 1 的舉辦時間來看，以 7 月舉行的次數最多，其次是 8、6、9 月。舉行時間多則二個月，少則一天，時間長短並不一；多數採集中方式進行，少部分之體操講習採用分散方式，於每星期固定天數和時段，進行講習之課程，例如 1922 年臺北市舉行的體操講習會，在 10 天內的星期三、六、日進行，每次三小時；[91]又如 1922 年臺北市舉行的體操講習會，於 1 月 13 日至 3 月 3 日的每星期四、六進行，[92]七星郡則採隔日舉行體操指導講習會，[93]可以看出各市郡之時間運用方式並不相同。

臺北州體操講習會的舉行，亦有將小學校教員和公學校教員分開之情事。小學校教員在小學校參加，公學校教員則於公學校參加，1933 年由臺北市辦的體操講習會[94]，以及 1934 年由臺北州主辦的體操實技講習會[95]，皆是如此。但實際上，臺北市教育研究成立初始已提出，「臺北廳時代，各學校之校務蹉商會、教務蹉商會，自來小公學校，殆無關係，各自行動。然自四月一日起移管於市，經濟相同，關係密搖，內容應彼此相助」。[96]希望小學校與公學校彼此有其對話的空間，但如上述引文所言，部分體操講習會的進行是將小、公學校教員分開。

至於參加體操講習會者，不全然是體操科之任教教員，這在附錄 1 的資料上可以明顯看出，大多數的進行方式係採州下、市下或郡下所轄之教師均得參加之模式。惟有時擴大辦理，也會邀請他州[97]，希望各州能推薦適當人選一同參加，例如 1926 年臺北市教育會邀請日本知名的體育權威－永井道明時，則希望其他

---

[87]第一會場樺山小學校久保講師、第二會場末廣高等小學校船曳講師、第三會場旭小學校荻原講師、第四會場太平公學校並河講師、第五會場蓬萊公學校梅谷講師、第六會場日新公學校田原講師。

[88]〈劃期的な體操講習會　三會場で一齊に開始〉，《臺灣日日新報》（1939.6.13），版 n02。

[89]於建成、壽、南門和樺山小學校舉行。〈女教員に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40.6.19），版 n02。

[90]〈開會講習〉，《漢文日日新報》（1908.7.28），版 2。〈新竹通信／夏期講習〉，《漢文日日新報》（1909.6.29），版 4。〈地方學事講習會開期〉，《漢文日日新報》（1910.6.24），版 2。

[91]〈體操講習會　二日より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9.1），版 2。

[92]〈體操科の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22.12.24），版 4。

[93]〈七星郡の體操指導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33.6.28），版 2。

[94]1933 年臺北州主辦的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小學部在建成小學校舉行，公學部則在日新公學校舉行。〈北市小公校　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33.9.26），版 8。

[95]〈體操實技指導講習　臺北州主催〉，《臺灣日日新報》（1934.10.25），版 n4。

[96]〈教育研究會　臺北市に設立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21.4.6），版 2。

[97]〈永井道明氏を聘し體操講習會　臺北市教育會主催で〉，《臺灣日日新報》（1926.11.20），版 2。

州也報名參加[98]，另外，全島舉行體操講習會時，多半由州廳選拔數位前往參加[99]。

至於理論和實務共同進行，一直是體操講習會舉行的主軸。1922 年臺北市第一次舉行「大規模」的體操科講習會時，即規定市內各小公學校全體教師「一律」都得參加的體操科講習會，此次講習會被喻爲「本島空前的事」[100]，十分具有規模，六位講師分據六個學校會場[101]，進行三十個小時講習教學（理論講義十小時、實地練習二十小時），此六所學校還準備了新的設備，包括肋木、肋木用腰掛、水平棒（雙槓）、平均臺（平衡木）、跳箱等，供全臺北市的教員（即講習員）使用。首先，理論講義十小時的安排，需針對十個體操動作講述其目的，再針對各教材的要領和教授法進行說明。此十個體操動作爲：（一）下肢運動；（二）上肢及上下肢運動；（三）頭部；（四）上身運動（胸和前後側）；（五）身體扭轉；（六）懸垂；（七）平均；（八）身體運動（背、側腹）；（九）跳躍；（十）呼吸。[102]上述十個動作，看起來是實務操作，實然爲理論課程，易言之，每個簡單動作的背後或順序的安排，牽涉到兒童生理學上的理論，以及運動的分類[103]，務使兒童身體可以完滿發展。看來，課程內容理論實務兼具。

隨著體育的受到重視，講習會的內容更偏重實際教學，以確實訓練講習員的身體技能，有時也會安排類似「教學實習」或「試教」的概念來實施，進行兒童的實際教學。例如 1934 年臺北州主辦體操實技巡迴講習會，該年 9 月於基隆郡瑞芳公學校舉行，該次課程內容如下：第一日開幕式和實技指導；第二日實技指導和兒童操習會、質疑、講評；第三日實技指導後閉幕。[104]其中第二天的兒童體操會項目有：一、個人演技種目（男子）；二、團體演技種目（女子）；三、參加人員及運動實施法；四、採點法；五、表彰法；六、用具；七、其他。[105]又如 1934 年臺北州主辦體操實技指導講習會，講習要項爲第一日：一、徒手體操、跳躍；二、繩跳；第二日：兒童體操會；第三日應用體操、球技、教練、其他。[106]上述體操講習會的課程與小公學校學生的實際體操內容相結合，是非常實用的課程，當然，學童的表現優劣低下，更是決定講習員的學習表現。

臺北州體操講習會之舉行形式大約可分爲開幕、正式講習及開幕式（兼證書

---

[98]〈臺北體操講習會　全島から　入會百餘名〉，《臺灣日日新報》（1926.12.3），版 n01。

[99]〈全島男子體育講習會　八月十日から十日間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27.6.1），版 2。

[100]〈體操講習會　二日より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9.1），版 2。

[101]第一會場樺山小學校久保講師、第二會場末廣高等小學校船曳講師、第三會場旭小學校荻原講師、第四會場太平公學校並河講師、第五會場蓬萊公學校梅谷講師、第六會場日新公學校田原講師。

[102]〈體操講習會　二日より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9.1），版 2。

[103]依照瑞典體操的特徵來安排。能勢修一，《明治期學校體育の研究－學校體操の確立過程》（東京：不昧堂，1994），頁 300-303。

[104]〈臺北州主催體操講習　開于瑞芳公校〉，《臺灣日日新報》（1934.9.13），版 n4。

[105]〈臺北州主催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34.9.15），版 3。

[106]〈體操實技指導講習　臺北州主催〉，《臺灣日日新報》（1934.10.25），版 n4。

授與），有些則另加會外活動。以 1922 年臺北市舉行市內各小公學校體操科講習會爲例，其開幕式分二個場地，小學部於樺山小學校，公學部在太平公學校舉行，二者皆由臺北市尹進行訓示，並由講師代表和講習員代表分別致詞[107]，其儀式頗爲正式，各長官多蒞臨與會致詞或訓示，以便傳遞殖民政府之相關政策或教育理念[108]。下圖即是木下內務局長於 1925 年的女子體操講習會中的訓示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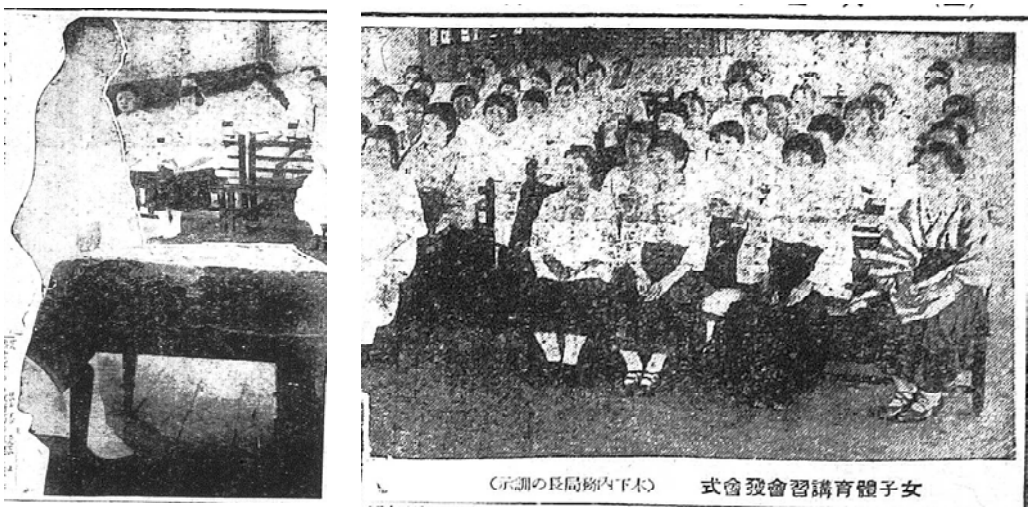


圖 1：木下內務局長於 1925 年的女子體操講習會中的訓示畫面。

資料來源：〈女子體育講習發會式　（木下內務局長の訓示）〉，《臺灣日日新報》，1925.8.12，版 n2。

經過正式的授課，在講習終了時，會同時舉行講習證書授與儀式，亦即於講習終了，審查其成績，並授與講習證書[109]，有時，也針對「優等生」發送賞品[110]。

饒富意味的是，教員講習會不見得如此枯燥，有時也有趣味的一面，早期教員講習會舉辦完畢後，會進行運動會、慰勞會或參觀等活動[111]，然而體操講習會舉辦後，除了活動寫真（電影）及拍紀念照外[112]，其內容多偏重動態活動，例如 1925 年首次女子體操講習會之舉行，結束當下，即熱烈討論要不要爲此開個小

[107] 小學部在樺山小學校舉行，公學部則在太平公學校舉行。〈體操講習會　二日より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9.1），版 2。

[108] 1924 年相賀內務局長陳述講習會的由來及內容，吉田長官代理提出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重要性，內容詳見〈兩講習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24.3.6），版 5。

[109] 〈海山／女教員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5.8.2），版 6。

[110] 〈教員講習會告終〉，《臺灣日日新報》（1921.2.28），版 3。

[111] 如召開運動會，辦理各種競技，優等者悉與以賞物；或是進行慰勞會；進行「實地見學」，參觀龜山發電所、總督官邸和博物館、製冰會社等。〈學事彙報〉，《臺灣日日新報》（1909.7.28），版 2。1903 年臺北廳管內的教員講習會舉辦完畢後，即召開講習員的運動會。〈講習證書授與式〉，《臺灣日日新報》（1903.8.28），版 3。1917 年由臺灣總督府召開該年的第一回教員講習會，由民政長官代理招待講師和講習員至鐵道ホテル舉行慰勞會來招待之。〈講習會慰勞會〉，《臺灣日日新報》（1909.7.28），版 2。1906 年臺北召開的教員講習會，於講習終了後，帶領講習員至龜山發電所參觀。〈教員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06.8.12），版 2。〈學事彙報〉，《臺灣日日新報》（1909.7.28），版 2。〈學事彙報〉，《臺灣日日新報》（1909.8.11），版 2。

[112] 〈體育講習閉會式　妙技を活寫に納める〉，《臺灣日日新報》（1927.8.21），版 n2。

體育會，或者是在新公園公開臺灣本島女子體育[113]；隔年，在臺北一中舉行的男子體操講習會，會後即舉辦「大競技會」，將全員 80 名分爲三班，再從三班內選出五名選手，進行鉛球、標鎗、三級跳、懸垂、跳躍、籃球、曲棍球、1,200 公尺接力等活動[114]。

除了由講習員本身披掛上陣，以顯現其運動技能者之外，也會在體操講習會之後，透過兒童來展現其成果，1934 年宜蘭郡舉行體操指導講習會，則是在講習會結束後，從郡下各小公學校各選拔 21 名兒童，參加各校的對抗體操會[115]，講習會的後續活動，頗爲多元，且多以對抗性之競爭活動爲主。

此外，除了講習會，各校可透過共組體育會的方式，不僅可強化體能的訓練，更具有加強體操教授能力的效果。[116]甚至由臺北州或各市郡教育會舉辦體操研究會，共同討論體操科的實際問題。例如基隆第一公學校自行舉辦體操研究會，就四年男生的競爭遊戲，六年女生的遊戲，以及高等科二年級男生的體操，進行實地授課[117]；有時也會邀請各市郡學校教員及地方長官和父兄前來參觀學生之活動[118]，可以讓體育教師進行教學經驗與心得的交換，藉此傳遞體育新知，改進及提昇體育教學。

五、體操講習會的「樣子」——以 1924 年淡水的夏季講習會爲例

1924 年於淡水舉行的夏期講習會，非常值得一談。首先，這場講習會著重的是游泳課程，原本在學校校區舉行的講習會，受限於游泳場地的欠缺，實施上有其困難性，主辦單位爲能容納一百多名講習員，因此，選定的地點是離臺北市區不遠，又擁有海水浴場的淡水；其二，1922 年新的「臺灣教育令」公布，於初等學校的體操科規定中，明文列出除了遊戲、普通體操和教練外，應在體操科之外提供戶外運動或游泳教學，[119]因此，過去體操講習會著重的多半是陸上的運動項目，除了依此法令的公布進行調整外，也突破了過去皆在陸上舉行講習會之思維。

---

[113]〈女子體育講習會　來る二十日終了の豫定〉,《臺灣日日新報》(1925.8.15)，版 5。

[114]〈男子體育講習棹尾を飾る大競技會　二中校庭で盛大に擧げらる〉,《臺灣日日新報》(1926.8.13)，版 n2。〈男子體育講習會愈始まる〉,《臺灣日日新報》(1925.8.23)，版 5。

[115]〈體操指導の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7.5)，版 3。

[116]台北市樺山尋常小學校體育研究部，《臺灣に於ける小學校體育の實際》（臺北：臺灣子供世界社，1924），頁258-259。引自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頁117。

[117]〈基隆一公　體育研究會〉,《臺灣日日新報》(1928.10.20)，版 6。

[118]宜蘭公學校體育研究會，邀請宜蘭街長、視學、郡下各學校教員及父兄，學生 1,200 餘名進行全校合同體操、唱歌遊戲、皮球遊戲、學級體操、徒步競走、體育跳舞及中隊教練等。〈體育研究〉,《臺灣日日新報》(1929.10.5)，版 n4。

[119]見第三十二條。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灣教育會，1939)，頁 367。

設置海水浴場的概念，在日治之初已被日人引入臺灣，例如基隆海水浴場於 1902 年成立，淡水海水浴場則於 1906 年成立。[120] 由於此次活動是首次以水泳做爲主軸的講習會，因此格外受到重視，除了《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外，《臺灣教育》第 267 號亦有十分完整的記述，作者將每天活動的過程詳盡記載下來，使我們得以瞭解該次講習會的整體樣貌。接著，讓我們一起乘坐時光機，進入這場七十餘年前的講習會吧！

（一）事前的籌備

1922 年 6 月淡水海水浴場興建一個大的休憩場所，[121]完工後二年，1924 年臺灣教育會選在淡水舉行全島水泳講習會，或許是首次辦理，也或是特別重視之故，在舉辦前二個月前的 6 月 21 日下午，生駒學務課長和土性視學、籐崎州教育課長一行人搭著汽車到淡水勘察場地，進行選定地點、處理講師和講習員住宿的問題以及其他事宜；中村庶務課長和後藤視學則另外至淡水海岸及淡水公學校視察。[122]

不單如此，講習會舉行的前二天，松井視學上午又至淡水會場勘察，淡水郡後藤視學、淡水公學校齋藤校長及其他同地小公學校教員也一同準備，將所有講習會所需運動器材、蚊帳、毛巾及巡迴書庫等物品送至會場[123]，可見事前作業十分仔細，也顯示主辦單位對於體操講習會的作業必須經過仔細的安排，相當重視。

（二）師資及參加者

此次除了聘請日本戶山學校教官野地大尉來臺教學外，還有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諭、總督府技師、臺灣銀行行員，參加者是除了從選拔全島小公學校體操科主任 102 名和淡水郡 7 名之外，小野大尉另外率領下士 20 名參加[124]。

（三）住宿

講習員住在公學校教室，講師住在郡構內組合事務所內。[125]至於小野大尉率領的 20 名下士則住北投，三種身分分開住宿。

（四）設備

---

[120]鄭人豪，〈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的研究〉，頁 178。

[121]〈淡水浴場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22.6.2)，版 6。〈淡水海水浴場準備整ふ〉，《臺灣日日新報》(1923.6.1)，版 3。

[122]〈全島水泳講習會　淡水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24.6.24)，版 4。

[123]〈淡水に於ける體育夏季講習會日誌〉，《臺灣教育》267 號 (1924.9)，頁 63。

[124]《臺灣教育》的資料顯示為 102 名。〈體操講習發會　淡水公學校に於て〉，《臺灣日日新報》(1924.8.5)，版 2。〈督府主催體操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4.8.3)，版 2。〈淡水に於ける體育夏季講習會日誌〉，《臺灣教育》267 號 (1924.9)，頁 68。

[125]〈體操講習發會　淡水公學校に於て〉，《臺灣日日新報》(1924.8.5)，版 2。〈督府主催體操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4.8.3)，版 2。

此次使用的設備總共三十四件（見附錄 3），與體育運動相關者有平均臺、跳越臺、肋木、圓盤（鐵餅）、砲丸（鉛球）、蹴球（足球）、鎗（標鎗）、高跳用柱、鐵棒、ハードル（欄架）、竹棒、排球用具、.籠球用具（籃球）、庭球用具、手旗、游泳用標識旗、水泳用鉢巻、繩並綱（拔河繩）等物品。從以上的設備，可以瞭解此次講習會的內容，不單是游泳課程，也有許多陸上運動的設備，這些設備除了由淡水提供之外，部分採購置方式，有些則是向不同的學校或聯隊借用。

（五）體操講習會進行之日程

體操講習會的時間安排如下：每天上午五時半起床，六時半早餐，七時至十二時講習，十二時用完午餐後至下午二時爲休息時間，下午二時至四時講習，下午五時半晚餐，晚餐後至八時半爲日誌的整理，晚上八時半就寢。以下將此次講習會的所有日程做重點摘述。

◎八月三日　晴　星期日

1.上午十時，視學官等八名從臺北車站出發到淡水。

2.松井視學至淡水公學校視導設備準備、講習員入住和晚餐準備事宜，其他一行人至淡水公學校、水利組合事務所和海水浴場視察。

3.講師和視學官等入住水利組合事務所和公學校員宿舍。

4.講習員入住 98 名。

5.講習員晚餐用畢，松井視學報告注意事項[126]。

6.注意事項講解完畢，集合室長，說明更爲詳盡的注意事項。[127]

◎八月四日　陰天有雨

1.上午七時舉行開幕

2.會後，進行講習員的調查，包括州廳

[126]包括(1)自治的生活；(2)郡、街及學校的援助和好意；(3)炊事、賣店和就褥的注意事項；(4)室長的任命；(5)郵件的收集和遞送；(6)講習時間及講習時的服裝；(7)金錢貴重品的保管；(8)外出的注意；(9)出席簿；(10)疾病時的注意。

[127]分為六室（第一室臺北州、第二室臺中州、第三室新竹州、第四室花蓮港廳、第五室臺南州、第六室高雄州），各選出一室長。注意事項包括：(1)講演筆記；(2)日誌；(3)有關宿舍的娛樂和星期天的生活法；(4)水泳場往復方法；(5)入浴（淡水湯的借用及風呂券）方法；(6)洗面、洗衣、剪髮及食事注意；(7)零食；(8)新聞的購入；(9)室長集合的信號；(10)賣店、巡迴書庫等其他事項。

學校名、姓名、年齡、身高、體重、(一分鐘）脈搏、既往疾患（心臟、耳、鼻等)、現在練習實行競技遊技、水泳流派等資料。

3.因雨，於講堂進行體操遊技（全體分爲五組，各有助手協助)。

4.下午一時至二時半，醫師盧秋桂在體操場進行健康診斷，結果六名無法進行水泳。

5.下午二時進行水泳，在驟雨之下，大家仍然元氣旺盛，四時半歸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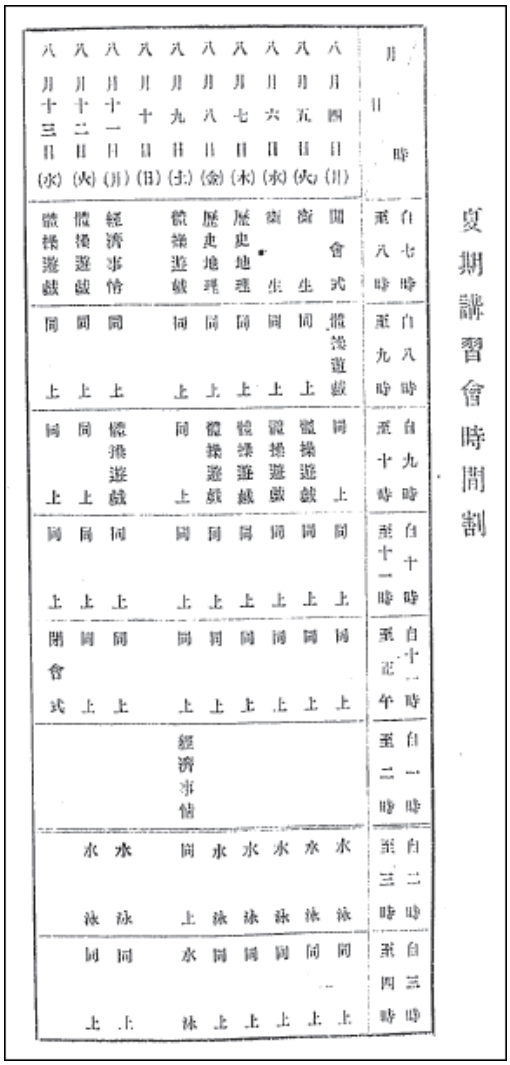


圖 2：體操講習會之課程表
資料來源：〈淡水に於ける體育夏季講習會日誌〉,《臺灣教育》267 號（1924.9)，頁 68。

◎八月五日　風雨

1.上午七時，堀內講師進行衛生講話。

2.在講堂進行體操遊技。

3.下午，郡役所來電說明有關低氣壓造成的風雨情形。

4.通知水利組合事務所三名講師，若有危險，撤至淡水公學校宿舍。

◎八月六日　雨

1.風強雨驟，講習會場多處浸濕。

2.上午七時至九時，堀內講師進行衛生講話

3.上午九時在講堂進行體操遊技。

4.午餐後，松井視學說明水泳場往返注意事項，將全員編成七組游泳班，由廣吉講師進行水泳練習的注意事項。

5.公醫濱田理八郎來診。

6.晚上配給蠟燭。

◎八月七日　晴

1.大橋講師因病未到，上午七時由野地講師進行曲棍球的解說和實習，上午九時於講堂內進行體操遊技，下午二時赴海水浴場、水泳練習。

2.午後三時高爾夫球俱樂部代表者前來訪問。

3.醫師濱田理八郎來診。

◎八月八日　晴

1.上午七時舉行研究會，發表演說。

(1) 丸山正樹，題目：關於蕃族社會。

(2) 河野作之丞，題目：有關臺灣學校體育之所感。

(3) 田中吉藏，題目：東部蕃人生活教育之一斑。

2.上午八時，台北衛戍病院長陸軍二等軍醫正時岡與太郎氏進行救急法的講演，另實習三角繃帶的方法。

3.上午十時，於室外進行體操演技，如走幅飛（跳遠）、砲丸拋（鉛球）、籠球（籃球）、籠球排球之練習。

4.下午二時至海水浴場水泳，至四時。

◎八月九日　快晴

1.上午七時至九點，台灣銀行助役補築本節藏演講經濟事情。

2.上午九時至十一時，時岡二等軍醫進行人工呼吸法和其他救急的演演，並實習之。

3.上午十一時四十分集合，前往高爾夫球場，進行曲棍球、鐵餅、標鎗的練習。下午二時結束。

4.從高爾夫球場徒步至海水浴場，進行水泳練習至四時。

5.下午七時四十分開始，在宿舍間的空地聽收音機，美妙的樂曲與明月相伴。

◎八月十日　星期天　晴

1.上午七時，竹本講師談經濟事情。

2.上午九時，舉行小競技會[128]。

3.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選出網球選手及組別。

4.午後二個半小時，參觀高爾夫球場。

5.午後三時至六時，與淡水庭球團講習員進行網球比賽。

[128]夏季講習會小競技會有鉛球、跳遠、跳高、一千五百公尺跑及接力。

◎八月十一日　雨

1.上午七時至九時，大橋講師以淡水爲中心進行地理歷史的講演。

2.九時至正午，在屋內進行體操競技。

3.午後十二時至二時半，於講堂進行水泳講話。

4.淡水街主辦講習員的歡迎宴。

5.下午八時，於講堂播放教育會的活動寫真。

◎八月十二日　晴

1.上午七時至九時，大橋講師講授地理歷史。

2.九時至正午，野地講師於室內講授體操遊技。

3.下午二時至三時，廣吉講師講授水泳。

4.講習員當中，劍道二段級有十名，郡役所的劍士招待之，除比賽外，另進行歡迎茶話會。

◎八月十三日　雨

1.上午五時半起床集合，參觀廣吉講師的水泳示範。

2.七時至十時半，野地講師講授體操遊技。

3.上午十一時舉行閉幕式。

4.中午，會員舉行謝恩會，並進行記念寫真。

從上述講習會日誌的內容，可以瞭解到一個體操講習會整體運作過程的完整面貌。其一，主辦單位於二個月前進行勘察，前置作業可謂完善；其次，在器材準備上，配合課程的多元，有商借也有購入；第三，不同單位的教師在短時間內需生活在同一個空間，在集體住宿的模式下，先是分組，入住當天已明定清楚十天的生活公約及注意事項，讓大家遵守規矩，若有缺席或外出等其他規定之的行動，須告知室長和「監督者」，此如同金字塔式的監控形式，具有加強社會控制之功能；第四，或因水泳課程之故，對講習員的身體特別重視，除了進行調查外，另安排醫師前來診斷並進行醫治。

從時間來看，講習員每天的行程是每天上午五時半起床，晚上八時半就寢，屬於早睡早起；再者，上午的課程時數明顯偏多，達五個小時，下午僅二小時，在課表的安排上，上午以經濟、衛生和體操遊技爲主體，下午則全部以水泳爲其主要課程，其中數天因風雨的驟然來臨，課程些許變動，每堂課的確切時間不一，不全然是按其課表操作，尤其是星期天原訂是未排課程，但日誌卻呈現該天舉行

「小競技會」。整體而言，課程的內容相當多元，提供教師廣泛的運動技能和知識，細數其內容，包括體操遊技、水泳、衛生、演講、體操演技（跳遠、鉛球、籃球、排球）、經濟事情、地理歷史、人工呼吸法和其他救急、曲棍球、鐵餅、標鎗、參觀高爾夫球場、網球比賽和進行小競技會。然而，對於每天下午行之的水泳課，如何進行？游多長的距離？有無長距離游泳？測驗與否？是否有救生員在旁看守協助？等問題，因資料不足，我們很難瞭解，遑論評斷。最後，在閉幕式之後，會員另行舉行謝恩會，感謝授課講師的教導。

有趣的是，講習會重視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有一門課特別安排說明淡水的地理和歷史，使講習員能對淡水的環境有較爲深入的認識，此外，也走出會場，至淡水「走透透」，除至淡水海水浴場教授游泳之外，也到附近的淡水高爾夫球場練習球技，並與淡水的網球隊、劍道等單位進行比賽聯誼，淡水街的仕紳們更宴請講習員們，十分受到禮遇。晚上的活動也沒空著，聽音樂和看電影是最大的享受，看來，在集體生活之外，也需一些娛樂活動。其他的講習會也如出一轍，1928 年文山郡學校職員 60 名於 8 月召開五天的體育講習會，會員全部合宿，日間講習體操、球技、競技及水泳，其中水泳練習至新店的碧潭，晚上活動有活動映寫會、講演會和娛樂會。[129]看來講習會之外的活動內容十分多元、精彩，也很有趣。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的體操講習會之外，淡水海水浴場也與修養有關。

這是 1925 年 10 月 23 日起四天召開的全島小公學校長講習會，以修養會爲其主體，前二天，有關智能部分在醫專講堂舉行，第三天後，講習的會場移至淡水海水浴場，進行「修養」課程，這種講習會是臺灣最初的嘗試。講師特別自日本前來，除了有東京修養團之外，還有來自國民體操研究所，上課內容爲國民體操、靜坐、凝念、作業、精神講話。[130]二百數十名的校長到淡水後，先聽松本講師解說國民體操，下午即到海水浴場，進行朗誦、遙拜（宮城伊勢大廟）、國民體操、水浴、靜坐等活動。[131]

追溯至 18 世紀，歐洲人相信水療法帶來的醫療效用和功能，日本則於 1885 年於大磯海岸設立第一個海水浴場後，積極推動海水浴，認爲在天然海水中可以健身防病。「海水浴」強調三個功能：日光浴攜來的紫外線、空氣浴伴隨的海氣，以及冷水浴帶來的寒冷刺激，有助於身體的新陳代謝和活力的增進，[132]曾擔任過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還出版《海水功能論附海濱療法》乙書，強調海水浴的好處，不僅如此，海水浴因帶有閒暇和健康的元素，還被視爲是「文明開化」的象徵。

---

[129]〈文山郡教員等　體育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28.8.5），版 4。
[130]〈東京修養團の講師本日來臺〉，《臺灣日日新報》（1925.11.22），版 5。
[131]ＨＫ生，〈修養講會たまの記〉，《臺灣教育》282 號（1925.12），頁 105-106。
[132]引自鄭人豪，〈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的研究〉，頁 178。

體操科與修養的關係，是一種橫向聯繫關係，謝仕淵分析認爲體操科被定位爲輔助修身科的教學，以利用體操的規律運動、秩序觀念，確保本島兒童守規律、守秩序，從而達成修身科所揭示的目的；加上體操科的精神目的，表現在體操法規中的「快活的精神，並養成遵守規律的習慣」（1898），「精神快活，兼以養成遵守規律，和崇尚協同一致的習慣」（1904）等文字中。[133]至於，海水浴對於修養的關係更甚之，有記者言：「有資產家之子，生性頑迷不遜，自練習游泳後，心機一轉成爲良順之徒，學業驟進；總督府某官吏子弟，性質駑鈍，也於練習游泳後，頭腦明晰，精神爽快，於是議論風生」。[134]至海水浴場實施課程，可以透過一連貫的方式，如在海邊中朗誦、實施國民體操、水浴以及靜坐等，具有德行之涵養以及陶冶國民必要之性格的功能，可強化修身中強調的若干原則，進而顯現出海水浴與修養之間的配合，正可說明精神訓練、身體健康的目標下，可達成國民精神訓練、養成國民性格爲其目的，同時也串連著效忠精神的體現。

六、同一性的體育政策？－談臺北州體操講習會的實踐方式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臺灣教育會等單位舉行的體操講習會大多選擇於臺北州舉行，筆者將之史料整理如附錄 2，並與臺北州舉行之體操講習會進行比較。

先從體操講習會的名稱來看，兩者有諸多不同。臺灣總督府及所屬臺灣教育會等單位在臺北州舉行的講習名稱爲「體操講習會」或「體育講習會」（見附錄 2），較爲單一，相較於此，臺北州舉行的體操講習會（見附錄 1），十分多樣又有趣，以體操爲主要的有「體操講習會」、「體育講習會」、「體操指導講習會」、「體操實技講習會」、「巡迴體操實技講習會」、「改正體操講習會」、「聯合體操講習會」、「體鍊科講習會」等，另外，還與其他科目合辦，有唱歌、家事、水泳、遊戲、音樂、裁縫、相撲，分別是「體操唱歌講習會」、「體操和家事講習會」、「體操和水泳講習會」、「女教員體操遊戲講習」、「唱歌及遊戲教授法講習會」、「音樂體操講習會」、「水泳講習會」、「唱歌遊技講習會」、「體操實技（指導）講習會」、「唱歌遊戲講習會」、「裁縫體操講習會」、「相撲體操指導講習會」，仔細觀看，除了水泳、遊戲、相撲三項與身體運動較爲連結之外，其他諸如唱歌、家事、音樂、裁縫，不少是專爲女教員所舉辦。

進一步討論講習之內容，大致而言，體操講習會的內容可分爲演講、理論與實地練習三種。首先，演講的比例較少，而且多爲邀請日本體育名人來臺，在指導體操相關知能之際，進行演講；至於理論的部分，則是針對體操教授要目之內容及教材，以及教授指導方法或是最新體育法進行解說；最後則是實地練習，

[133]高岡武明，〈公學校ノ修身科ニ就キテ〉《臺灣教育會雜誌》4 號（1902.3），頁4。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 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臺北：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頁83。引自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頁119-120。

[134]引自鄭人豪，〈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的研究〉，頁 69-70。

即以其科目做爲講習員練習的內容，項目亦多，例如：體操、體操遊戲、唱歌遊戲、音樂遊戲、遊戲、舞蹈、競技、水泳、球技、相撲、體育衛生、武道、劍道、柔道、薙刀，以上這些科目的設立，皆與當時的教育政策及體育制度有關。

以下分爲體育政策與體操講習會、女子體操講習會、從世界到日本再到臺灣的文明身體三部分加以論述。

（一）體育政策與體操講習會

筆者將講習的科目依體操教授要目在臺灣公布的時間點做爲分期的依據，將講習過的科目整理如表 5。

表 5：以體操教授要目公布年代爲分期點之體操講習會科目一覽表

年代	臺北州體操講習會之科目	臺灣教育會等單位於臺北舉行體操講習會之科目
1920～1926 年	體操、遊戲、體育舞蹈、競技、水泳	人體解剖生理、櫻井式體操、競技運動，新的競技方法、體操、遊戲、水泳、衛生、地理、博物、經濟、生理
1927～1935 年	體操、體操實技、音樂遊戲、遊戲、最新體育法、球技、競技、水泳、各種競技	體操、競技、遊戲、衛生、生理、水泳、陸上競技各種目、學校教練各種目
1936～1945 年	體操、遊戲、音樂遊戲、舞蹈、相撲、體操要目指導法、武道、體育衛生、水泳、劍道、柔道、薙刀	學校體操教授要目、學校體操教授要目改正趣旨、學校衛生上諸問題其他

資料來源：依附錄 1、附錄 2 資料整理而來。

說明：體操教授要目在臺灣公布的時間分別爲 1917 年、1927 年和 1936 年，惟 1917 年尚未出現臺北州乙詞，故以 1927 和 1936 年做爲分期點。

從上表得知，體操講習會講授的科目隨著年代有增加的趨向，然其科目與教育法令及體育制度的關聯性爲何，以下就表 5 的內容，加以討論。

首先，1920 年至 1926 年期間，臺北州及臺灣總督府等單位舉行的體操講習會，以體操一科最爲大宗，前者爲體操、遊戲、體育舞蹈、競技、水泳；後者爲人體解剖生理、櫻井式體操、競技運動，新的競技方法、體操、遊戲、水泳、衛生、地理、博物、經濟、生理。看來，後者的課程內容較爲豐富，大抵因爲臺灣總督府等單位大多邀請日本國內體育學者，其課程與日本國內較爲接近，也較爲多樣性。

事實上，日本國內自明治維新後，大量吸收各種不同的體育運動觀念，各種思潮紛紛湧入，然因學校充斥著多元化的體操、遊戲流派而顯得紊亂，教師難以適從，正逢日本實行國定教科書制度，日本政府爲統一和確立體操科的方向，乃於 1904 年 10 月設立「體操遊戲調查會」，經過八位委員的多次討論，隔年 11

月由文部大臣提出結果，確立體操科以瑞典體操爲主體的方向。[135]其中除了體操科外，已開始重視遊戲對於兒童身心成長的功能，特別鼓勵簡單的競爭、行進和動作遊戲。

當「體操遊戲調查會」做成結論後，再經陸軍省和文部省協調體操科的內容，[136]1913 年 1 月 28 日日本文部省訓令第一號頒布包括小學校、高等女學校、中學校、師範學校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137]是以永井道明的「合理的體操」爲精神藍本（其內容係根據瑞典式體操進行修正），包括有體操、遊戲與教練，同時明定課外活動內容，[138]經歷多年的調查、協商與制定，日本體操科進入統一版本的時代，內容上也有明確的方向。此種制度的過程，似乎對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產生前導性的影響，至於臺灣方面因爲明治末年輿論對於官方未能訂定正式的體操科教材而焦慮，爲因應學校體操教授要目的頒布，臺灣總督府是於 1914 年開始展開體操科教授要目的調查，並設立「學校體操教授要同調查委員會」，邀請來自學務部、國語學校、中學校、高等女學校、附屬小公學校職員共 9 名，經過二年多的努力，及召開五十多次的會議，[139]1916 年提出「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140]臺灣總督府於隔年 2 月 3 日以訓令第九號公布，[141]此次臺灣體操教授要目的修正內容，乃「量臺灣風土氣候產業，及家庭生計所關，本島兒童生計心身發育，及對男女特性，學校程度、種類、學校經濟狀況等」，而且是「內

---

[135] 竹之下休藏，《體育五十年》（東京：時事通信社，1950），頁 68-69。

[136] 日俄戰爭勝利後，日本陸軍省擁有極大的發言權，不能接受教育官僚決定的體操科內容，認為學校體育是國民從事軍事教育的基礎，於是強力介入教育行政工作，採用兵式體操之聲響起，不過，日本對外參加的競技運動漸趨活絡，當時文部省覺得明治後期傳入的瑞典體操及歐美的新教育思想，有再重新全面檢討的必要。文部省和陸軍省為了學校體育的課程內容形成對立的局面，妥協之後，雙方共識完成，軍方同意文部省以瑞典體操作為學校體操的主體，原先的兵式體操改稱「教練」。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東京：大修館，1971），頁 75；81。

[137]〈體操科新要目（廿八日東京發）〉，《臺灣日日新報》（1913.1.30），版 2。〈體操科教授通牒〉，《臺灣日日新報》（1913.2.8），版 3。

[138]課外活動必須注重武道、遊戲和其他活動，包括鞦韆、浪木、回旋塔、攀登運動、角力、弓術、薙刀（女子）、遠足、登山、水泳和帆漕、拍羽毛鍵、拍毬、棒球、草地網球等項目均在其列。永井道明，《學校體操要義》（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1913），頁 577。

[139]〈決定體育方針〉，《臺灣日日新報》（1917.5.7），版 3。

[140]報告書中除了詳細提出各級學校的體操科實施內容外，也規劃體操科之外進行的課外運動：第一是體操，利用每日上課前、休息時間、每堂課後，或是上課以外的時間進行簡單的體操活動；第二則是武道（劍道、柔道、薙刀）、遊技（鞦韆、回旋塔、拍羽毛鍵、拍毬）、體育的作業（整理運動場、整理運動器具）和其他運動（角力、水泳、遠足、登山）等項目。〈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三十卷，六二三〇冊十三文號，大正 5 年 1 月 1 日。

[141]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頁 75；81。此修正內容是體育名人永井道明針對學校體育做出研究，由於日俄戰爭的勝利，國際情勢產生變化，陸軍省擁有極大的發言權，為了充實軍事教育而重視學校教育中的體育，並認為是對國民從事軍事教育的基礎，因此強力的介入政府的教育行政工作，採用兵式體操之聲響起，不過，當時日本內地對外參加的競技運動漸趨活絡，當時的文部省覺得對於明治後期所傳入的瑞典體操及歐美的新教育思想，有再重新全面檢討的必要，於是，雙方為了學校體育的課程內容，文部省陸軍省形成對立的局面，在妥協之下，日本政府於是委託永井道明進行研究，針對學校體操和軍事教練的二大項去進行研究，以改革和充實學校體育。

地和朝鮮所無之創見」，[142]以編定適合臺灣各學校的體操科教授要目，[143]當然此要目對臺灣學校體育之發展有其意義。也因此，在講習會內「其體操遊戲各部分的要旨，均以瑞典式最新學理爲基，使生理上心理上共無遺漏」[144]的報導，亦可得知其延續性。

之後的法規更迭，1919 年 1 月 4 日勅令第一號臺灣總督府公佈「臺灣教育令」，第十九條的條文提到，體操科是以遊戲爲主，再逐漸傳授普通體操，[145]1922 年 2 月 4 日勅令第二〇號，爲因應「撤廢日臺人差別教育」和「日臺共學」，修正公布新的「臺灣教育令」，體育課程的教材轉爲詳盡，在原有的遊戲和普通體操之下，增加教練項目，又申明應依男女各別授業，以及斟酌教授事項，另外，加授運動生理學的基本，並應該依各地情況，在體操科之外提供戶外運動或游泳教學。[146]

爲此，總督府於 1922 年 12 月在臺北市舉辦全島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參加者約 150 名，均由由全島各郡市各出三名小公學校體操科主任，並邀請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櫻井恒次郎博士來臺宣導，地點於臺北樺山小學校及醫專教室舉行，講授內容除了人體解剖生理的基礎及對內地人適切學理的體操外，亦針對櫻井式體操做實地指導。[147]1913 年日本公布體操教授要目後，櫻井博士依據解剖學上的研究，大力宣傳此種「合理的體操」，並將體操教授要目的體操與科學進行結合，[148]雖然隔了數年櫻井才至臺灣宣傳和教學，但實質上已收其效，因爲 1923 年 2 月在宜蘭小學校舉行的體操研究會，擔任講師者，是參加櫻井式體操的講習員，這二位（宜蘭小學校安田訓導和宜蘭小學校栗山訓導）將其體操教授要目的概念帶回宜蘭，[149]至自己服務的郡市宣導，將日本推動體育教學一致性的政策傳遞至各郡市。

第二，1927 年至 1935 年期間，臺北州及臺灣總督府等單位舉行的體操講習會，前者爲體操、體操實技、音樂遊戲、遊戲、最新體育法、球技、競技、水泳、各種競技；後者爲體操、競技、遊戲、衛生、生理、水泳、陸上競技各種目、學校教練各種目，前後二者的課程內容，仔細比對，並未有太大差異，可見臺北州已積極地將最新的體育法帶入。

體操科實施十餘年之後，有鑑於教練的重視和運動的興盛，加上社會情勢

---

[142]〈決定體育方針〉，《臺灣日日新報》（1917.5.7），版 3。

[143]〈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設置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四十一卷，二二六〇冊二十七文號，大正 3 年 12 月 1 日。

[144]〈講習中之體育〉，《臺灣日日新報》（1915.7.13），版 5。

[145]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38。

[146] 見第三十二條。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67。

[147]〈體育講習會　來る二十三日〉，《臺灣日日新報》（1922.12.11），版 2。〈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12.12），版 5。〈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12.15），版 2。〈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12.16），版 6。

[148]今村嘉雄，《日本體育史》，頁 260。

[149]〈體操研究會〉，《臺灣日日新報》（1923.2.28），版 4。

的變化與體操界的視野擴大，爲減少枯燥無味的體操項目，爲此，日本政府將原有要目重加修正，把球類運動及舞蹈兩項內容加入遊戲的項目下，並在 1926 年修正「學校體操教授要目」，將教材分爲體操、教練、遊戲及競技三大項目，正課外行戶外運動及游泳並講授運動生理的初步，來指導學理的學習。[150]翌年的 6 月 14 日臺灣總督府以訓令 31 號，加了但書公佈，隔日，總務長官後藤文夫以「學校體操要目實施ニ關スル件通達」提出六點指示，[151]其中，指示體操科不能以機械式的形式，應考慮學校校地情形、設備的多寡以及學生身心的發達等實際狀況，以適切方式行之。將上表內容與臺灣總督府公布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進行對照，看來，頗能符應其教材。

居於政府首要之地的臺北州，很快地嗅覺到日本國內體操科改正的訊息，未等臺灣總督府的公告，臺北州下的基隆市教育研究會即在 1926 年的講習會強調體操和競技二科的內容，是依文部省改正體操要目行之，[152]速度之快，令人瞠目。1927 年文山郡教育研究會則在體操講習會「講習最新體育法」，[153]亦是符應體操教授要目。1927 年臺灣總督府爲了「改正體操教科書」，[154]召集。小公學校校長及女教員進行體育講習會，其講師即自日本前來。看來，無論是臺北州或是臺灣總督府，其腳步幾與日本同步

第三，1936 年 1945 年，臺北州及臺灣總督府等單位舉行的體操講習會，著重的除了是課程的不同之外，對於學校體操教授要目改正後的內容相當重視，多次講習均以此爲其課程內容。另外，因應時局變化，增加如相撲、武道、劍道、柔道、薙刀等項目。

體操教授要目實施已屆十年，由於整體時事和體育界情勢的改變等因素，日本強調國家主義，並發現學校體育和運動相剋，加上歐洲體操的移入和體育思想的抬頭，於是在 1936 年再修正「學校體操教授要目」。[155]臺灣同年 12 月 6 日以訓令第 60 號公布，[156]體操科的教材內容定爲體操、教練、遊戲及競技等三大部分，與日本不同的是將「游泳、滑雪、滑冰」之內文改爲「游泳」，其餘的可謂是同步調。[157]九一八事變之後，日人在臺推動同化工作，1938 年日本正式頒布「國家總動員法」，臺灣進入「戰時體制」，日本國內提出「鍊成皇國民」的教育目的，「體操科」改爲「體鍊科」，強調國防軍事課程。其中，有關劍道、柔道、薙刀等項目，是爲了因應中等以上男生須必修劍道及柔道，得加授弓道，而女學

[150] 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頁 92-93。
[151] 臺灣總督府，《學校體育教授要目》(1927)，頁 1-2。
[152]〈基隆體操水泳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26.7.13)，版 n1。
[153]〈文山郡教育主催體操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6.28)，版 n4。
[154]〈全島體育講習會　督府主催　十一日起廿日止〉，《臺灣日日新報》(1927.8.17)，版 4。
[155] 井上一男，《學校體育制度史》，頁 103。
[156] 臺灣總督府臺灣教育會編，〈學校體操教授要目ニ關スル要件〉，《臺灣學事法規》(帝國地方行政會發行，1943)，頁 376-1，376-2，376-3。
[157]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頁 114-115。

生在師範學校、高等女學校及實業學校，得加授弓道和薙刀等規定。[158]

爲了即時趕上體操教授要目的改正，臺灣教育會於 8 月專爲臺北州下的教員舉行體操講習會，講習的科目即是改正體操教授要目之解說，並請到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佐佐木等人，及文教局員前來，[159]針對改正的「瑞典體操」進行詳細解釋。[160]

在臺灣教育會舉行過體操講習會後，體操的實施應有統一版本的制訂，但在實踐過程中因爲學校的差異性，難保課程實施具有一致性的發展，爲此，各州於是召開體操講習會，教導此一政策內容。臺北州教育課的效率甚高，隨即於 10 月 8 月至隔年的 2 月 27 日，進行全州的體操講習會，主要內容即是針對 1936 年改正體操教授要目中的小公學校體操科之指導，必要的實技及理論之講習，以便於州下學校體育的健全與發達，講師是北商教諭三宅政光、第一高女的松下、臺北一中的田島繁得以及第三高女的古賀カズエ等四名講師，並配合臺北體育研究會於 6 月針對學校體操教授要目的改正要點，以及各教材的特長和教授上的注意事項，進行研究討論，[161]巡迴日期及各市郡如下：

宜蘭郡：1936 年 10 月 8、9、10 日於宜蘭公學校

基隆郡：1936 年 10 月 22、23、24 日於七堵公學校

臺北市（小學校）：1936 年 11 月 5、6、7 日於建成小學校

臺北市（公學校）：1936 年 11 月 19、20、21 日於日新公學校

基隆市：1936 年 12 月 3、4、5 日於雙葉小學校

文山郡：1936 年 12 月 17、18、19 日於新店公學校

淡水郡：1937 年 1 月 14、15、16 日於淡水公學校

七星郡：1937 年 1 月 28、29、30 日於士林公學校

新莊郡：1937 年 2 月 4、5、6 日於新莊公學校

羅東郡、蘇澳郡：1937 年 2 月 18、19、20 日於羅東公學校

海山郡：1937 年 2 月 25、26、27 日於板橋公學校[162]

---

[158] 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師範學校體育發展史》，頁 117。

[159] 臺北市 70 名、七星海山二郡各 22 名、基隆市郡各 20 名、宜蘭郡 19 名、羅東郡 15 名、新莊郡 14 名、文山郡 13 名、淡水郡 10 名、蘇澳 5 名，共 230 名，〈小公校教員　體操講習　十日起四日〉，《臺灣日日新報》(1936.8.7)，版 n4。

[160] 〈體操、教育科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36.8.11)，版 7。

[161] 〈臺北體育研究會の體驗發表會〉，《臺灣日日新報》(1936.6.30)，版 11。

[162] 〈小公學校教員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主催で〉，《臺灣日日新報》(1936.10.5)，版 5。

由上觀之，日本本地訂定的體操科內容是有一定的展延性，更可以觀照殖民地臺灣體操科的變遷脈絡，及顯現日本與臺灣相互扣連的歷史環節。參加臺灣總督府舉行的體操講習會之講習員，如同種子教師一般，回到所屬各州進行宣導，將其影響面擴大。

此種要求體操科的「一致性」，一直持續到日治末期。1939 年臺北州針對州下的小公學校體操科主任進行講習，特別強調「小公學校體育的統一」，[163]足見體育政策的貫徹性，在體操講習會當中表現無疑。又，臺北州下的國民學校配合國民學校令的改正及國民學校體錬科教授要目，於 1943 年 6 月舉行的體錬科講習會當中，教授體育衛生、水泳、相撲、劍道、柔道和音樂遊戲；[164]1943 年 9 月 3 日起二週，也有體錬科講習會因應教材的更動，教授體操、音樂遊戲、劍道、柔道和薙刀；[165]女教員也不例外，臺北市針對市內 700 餘名女教員辦理體操講習會，主要目的即是爲了「努力普及體操要目指導法之圓熟度」。[166]有時，還要配合政發展，在「非常時局」下，臺北州也提倡堅忍不拔的「日本精神」，以圖士氣之振作，[167]可見得體操講習會的舉行，多半按其政策進行推動事宜。

由上討論得知，學校體育的實施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所致，經過多次課程的修訂，大正後期已在體操科當中加入了運動競技、游泳、球類運動等項目，不論是教育法令或是體育的制度的制訂逐步具體化，明文規定學校實施上述項目，體操講習會的舉行也隨之將最新的體育制度列入，由於臺灣對於日本的從屬性格，體操講習會的教學旨意雖反映了日本國內的體育政策，但在體操科的層次上或略有落差，可是我們發現，臺北州和臺灣總督等單位所舉行的體操講習會，除了服膺於臺灣總督府公布的體操教授要目之內容，有時未待臺灣公告，已請日本體育專家指導，臺北州的訊息幾乎與日本同步，或與臺北的資訊較爲豐富有關。

（二）女子體操講習會

初等學校的女學生年齡較小，又是初次接受教育，但無論是正式或代用女教員多未受過專業的體育訓練。[168]爲推動女子體育教學，勢必針對這些女教員進行體育講習。根據目前的史料內容，日本殖民政府直至治臺三十年後的 1925 年，才舉行第一次的女子體操講習會，此牽涉臺灣女子體育發展的諸多歷史，讀者可參閱游鑑明的文章，[169]在此不再贅述。另根據歷史學家游鑑明的研究，1926 至 1937 年有女教員參加的講習會計 42 場次，專以體育爲主的講習會有 7 次，[170]包

[163]〈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39.6.24），版 n2。
[164]〈臺北州下國校體錬科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43.7.31），版 n1。
[165]〈體錬科講習　三日から二週間〉，《臺灣日日新報》（1943.9.2），版 n2。
[166]於建成、壽、南門和樺山小學校舉行。〈女教員に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40.6.19），版 n2。
[167]〈基隆郡で相撲體操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38.12.10），版 8。
[168]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22。
[169]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5-75。
[170]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23-25。

括臺北、新竹、高雄、臺東和澎湖均舉辦過，然 1940 年臺北市還針對市內 700 餘名女教員辦理體操講習會，[171]可見至日治末期仍重視女子體育的教學。

值得一提的是，1925 年舉行的女子體操講習會，聘請四位來自日本二階堂的女史，教授體操、競技、唱歌遊戲等項目，然而，第一天的情況即發生小小混亂，「其中有些人穿著長袖或著令人酷熱的袴褲出席，因此，有講習員申訴可能需要舉行服裝的講習會，一共有八十名內臺女子參加，大家穿著彩色的的洋服和和服」，[172]在服裝方面，講習員似乎不太理解體操講習會應著之服裝規定，有些著長袖，有些著袴褲，有的又著洋服或和服，體操講習會應著之服裝顯然有極大的差異，也促使有人戲言需針對女子進行一場服裝的講習會，可見參加講習者服裝之混亂和不專業性。爲推動女子體育，有關單位舉辦體操講習會，顯然比男子教員晚了許多，致使最基本的服裝穿著仍顯不一，然而，此講習會的舉行，事實上也符應 1922 年的新「臺灣教育令」的公布，該令申明應依男女各別授業，以及斟酌教授事項，[173]並開啓了女子教師進修的新階段。

事實上，這場於第一高等女學校屋內體操場開幕的講習會，係爲首次舉行，1925 年木下內務局長表示，女子體育的必要性是時代之需求，教育應以男女機會平等爲理想，雖然女子教育每年進步，但是過去以來女子體育一直被忽略，此次可藉體育健全母體。[174]四位講師（內田鳩子、御笹政重、人見絹枝、西澤）皆從日本二階堂體操塾（日本女子體育大學的前身）前來，本來是預定會員 40 名和旁聽者數名，但會員增加到 81 名，還有從全島來的女學校體操科主任也參加，從十八、九歲的年輕人到老婦等都來到會場，人數十分壯觀。不同的課程由不同的講師授課，《臺灣日日新報》將第一天的講習的報導十分有趣。陳述如下：

> 第一位是內田女史，穿著像女優一樣的高跟鞋，好像纏足婦女在走路一般，教導尋常一年級的體操，她以輕快的口令來進行；競技則由人見女史來負責，她是五尺七寸的大女，以她紮實的腿可判斷，不愧是擁有世界紀錄的人，她的動作很熱心，因此大家都很專心競技運動；最後是御笹女史，她進行的是唱歌遊戲，她彈著鋼琴，接著進行遊戲，因為一個小時內要進行四首歌，所以她看起來很忙碌，雖然她一邊手腳彎腰指導一年級做的動作，但她和講習員之間沒有默契，她看到如此不協調的樣子，只能苦笑。可是不愧是女史，後來她們慢慢學會。同時，在同校參加其他活動的夫人，她們拋棄自己的活動，來看唱歌遊戲，其中有些人開始模仿動作，也跳起來。中午過後，內田女史稱讚大家很認真，也做得很好，御笹女史除了向大家

[171]於建成、壽、南門和樺山小學校舉行。〈女教員に體操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40.6.19)，版 n2。

[172]四位講師與考察臺灣各種文化的大阪府教育視察團，一同搭乘扶桑丸來臺。〈體育講習講師　八日來臺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5.8.8)，版 5。

[173] 見第三十二條。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367。

[174]〈本島の女子體育に新生面を開く　女子體育講習會の發會式　木下局長體育の必要を力說〉，《臺灣日日新報》(1925.8.12)，版 n2。

> 說明服裝之外，也擔心臺灣女教員不能理解其內容，不過，有一位講習員說：非常有興趣，她問這個人，那裡有趣？她把手放在胸前回答：不知道那裡，不過很好玩；此時，在旁邊沒有辦法安靜的人見女史，很開心的投球和擲標鎗。[175]

臺灣日日新報記者對於臺灣首次舉行女子體育講習會的報導,有著十分有趣的觀點，一開始的講習會亂中有序，從沒有默契開始到講習員認真且順利完成動作，著實花了不少時間，但參與的講習員似乎無法理解講習的內容，可是表達出內心覺得新鮮且有趣的感受。

第二天，情況有些好轉，講習員穿著運動服前來，由於十分難得，會場除了講習員和講師外，參觀者人山人海，主辦者只好將「學事關係者以外」的隔絕在外。[176]該天的活動也十分有趣：「教練喊口令，向左向右，二列橫隊，集合，向後轉的二學年教材，讓大家變得年輕，一二。一二的呼唱做體操，腳前出。臂左右伸。手胸開腳上體後屈，最後開閉腳的跳躍運動——原地跳和原地小跑步，透過奇特的體操姿勢，有一部分的會員在笑；唱歌遊戲是御笹女史來快樂進行，大家似乎看起來習慣，隨著音樂，大家很快樂地律動；競技是人見女史來進行，帶領大家從事馬鈴薯接力（ポテトリレー）和躲避球（ユーデツドボール），大家流著大汗做，第五時間是實地教授，所以附屬小學校六年女生二十名穿跑步服進入會場，御笹女史喊口令指揮她們，很自在又很有趣，講習員十分佩服，都靠近觀看大家的一舉一動。」[177]大家做著「奇特」體操，也做唱歌遊戲，同時也有競技活動，有趣的是，人見絹枝帶領講習員的內容並非是田徑運動，而是馬鈴薯接力和躲避球。最後，請小學校的女學生進行實習課程。

相較於女教員的小混亂，這些女學童的表現則是令人讚賞，一同參觀的後藤長官夫人特別稱讚女學童所做的實地操演：「雖然是六年級的學生，但是今天第一次受指導，就做得那麼好，應該平常的訓練做得很好吧。」[178]事實上，殖民政府對於女子體育的實施內容存在著很大的彈性，女學生體操課的教學內容可由各校自行排定，視女學生的身體狀況，以提供不同的身體活動，此種根據女學生身體狀況實施適當體育的教學方式，是爲日治時期女子體育的大致原則與特色，但臺北市的女學童在體操的表現上可圈可點，或許我們也可這麼說，臺北做爲臺灣的首都，其文化的向上遠超過其他的都市，[179]也因爲「運動風氣無不有由臺北傳

---

[175]〈長袖や美い袴で　彩られ繪を見るやうな　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5.8.12)，版 5。

[176]〈參觀人が押すなすなで　今後は關係者以外お斷り　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5.8.14)，版 5。

[177]〈女子體育講習會（第二日）　講習員も若返つて　ピアノに伴て律動する　きのふは長官夫人も參觀〉,《臺灣日日新報》(1925.8.13)，版 5。

[178]〈女子體育講習會（第二日）　講習員も若返つて　ピアノに伴て律動する　きのふは長官夫人も參觀〉,《臺灣日日新報》(1925.8.13)，版 5。

[179]田中一二編、李朝熙譯,〈臺北市史－昭和六年（一）〉,《臺北文獻》直字 106 期（1993.12)，頁 187

移至其他地方之情形」，[180]因而女學童的表現良好，當是可被理解之情事。從圖 3 可以看到，女學童的實地操演採取集體方式，動作一致，有條不紊，亦是在集體訓練中改造及規範女學生的行爲與身體。



圖 3：女子體操講習會，小學校女學生實地操演之畫面。

資料來源:〈臺北第一高女に開會中の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5.08.15，版 5。

此次講習因爲「對本島女子體育振興有很大的刺激」，隔年，承續主辦女子體育講習會，[181]講師雖仍招聘前一年的內田鳩子、御笹政重、人見絹枝來臺授課，但已加入本島講師（附屬小學校的則西澤、三高女的小川），會員有許多是去年參加過的教員。有趣的是，女子體育發展雖然受到整體社會的運動競賽激盪影響，[182]但時人提出女子體育雖應努力，但女子應有女子的本份，不得超過女子體育的常識之外，進行「奇怪的跑跳」，[183]可見，女子還是受到性別的拑制，不得有太多的跑跳動作，謝仕淵分析「體操科教授要目取調委員報告書」公布內容時，指出「可跑可走不可跳」的女子體育，[184]顯示體育教育的課程上雖迴避跳躍的動作，但是跑動和步行的動作已是女學生在從事體操課時可被允許的活動範圍。

總之，講習會提供女教員學習體育的管道，可以改善和提昇教員的體育教學，提供學童正規的體育內容，另外，體育講習會另有一項重要功能是協助教師舉行各項活動，如運動會，[185]由於運動會是各校一年一度的盛會，而運動會的籌備又歸屬教師負責，因此，對小公學校的女教師而言，體育講習提供了相當多的「支援」。

---

[180]田中一二編、李朝熙譯，〈臺北市史－昭和六年（五）〉，《臺北文獻》直字 120 期（1997.6），頁 213

[181]〈女子體育講習　仍聘三講師〉，《臺灣日日新報》(1926.6.16)，版 4。

[182]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15。

[183]〈輝かしく横溢した　元氣な躰をお土産に　廿日閉會の女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5.8.21)，版 5。

[184] 謝仕淵，〈日治初期(1895-1916)臺灣公學校的女子體育與放足運動〉，《臺灣文獻》第 55 卷第 2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6），頁 205-230。

[185]游鑑明提及為了秋季運動會指導學生體操表演，黃快治女士於暑假從臺北至宜蘭參加學校舉行的體操講習會。引自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頁 23。

（三）從世界到日本再到臺灣的文明身體

歷史學家周婉窈在《臺灣歷史圖說》乙書提到：「日本在臺灣推行近代式的統治與建設，固然帶來了許多日本文化的特色，但基本而言，這是一個轉手的『西化』」。[186]日本國內在明治維新之後，積極向西方靠攏，體育運動也不例外，尤其在競技運動方面，在 1920 年代之後，有著傲視全世界的表現。

以奧運爲例，因受限體型及體質影響，東方人在世界運動競賽舞臺的揮灑空間相當有限，但在二次大戰前，日本在奧運場上頗具立足之地，尤其自織田幹雄於 1928 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拿到奧運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後，露出日本（也是東方）的第一線曙光，自此，日本勾勒出連續三屆奪取三級跳遠金牌的連環畫卷，稱霸奧運田徑體壇，二次大戰之前，包括跳遠、撐竿跳、馬拉松、游泳、馬術等項目，[187]均稱霸世界體壇，奪得多面獎牌。

從體育運動的角度而言，日本早已在文部省設立「體操傳習所」，培養體育師資和指導者，之後陸續開辦體育專業的學校，但在臺灣，並無體育師資或指導者之養成，對於體育運動的認知，多半透過日本殖民者「穿針引線」的工夫，方得以獲悉。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日本做爲帝國的中心，比起臺灣的殖民文化，日本較爲開明與活躍的社會，構成一個內地Ｖ.Ｓ殖民的「文化社會」差異，使得日治臺灣建立完整體育運動體系的可能性，要遠低於日本內地。或許也因爲如此，擔任臺北州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的講師，除了極少部分爲小公學校教諭及府體育官、臺北市囑託、體育官補外，絕大多數爲中等或高等學校教員，或是軍方，[188]推論或許因爲沒有體育師資的養成機構，於是由中等或高等學校教員爲主，但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總督府及臺北州等單位尚邀請日本奧運競技選手及體育政策推動者，如織田幹雄、[189]南部忠平、[190]人見絹枝、[191]加賀一郎、永平道明等人到

[186]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臺北：聯經，1998），頁 144。

[187]代表人物有：織田幹雄（1928 年奧運三級跳遠金牌）、人見絹枝（女，1928 年奧運八百公尺銀牌）、南部忠平（1932 年奧運三級跳遠金牌、跳遠銅牌）、大島鐮吉（1932 年奧運三級跳遠銅牌）、西田正平（1932 年和 1936 年奧運撐竿跳銀牌）、田島直人（1936 年奧運三級跳遠金牌、跳遠銅牌）、原田正夫（1936 年奧運三級跳遠銀牌）、孫基禎（朝鮮人，1936 年奧運馬拉松金牌）、南順永（朝鮮人，1936 年奧運馬拉松銅牌）、大江季雄（1936 年奧運撐竿跳銅牌）、鶴田義行（1928 年二百公尺自由式金牌）、高田勝男（1928 年一百公尺自由式銅牌）……等人。東・俊郎，《スポーツ八十年史》（東京：日本體育協會，1958），頁 534-560。

[188]男子體操講習會 1925 年於臺北第一中學校舉行，特別從軍隊招聘講師——臺北第一聯隊所屬的將校前來指導。〈軍隊からも　講師が來て開かれる　男子體育講習會の〉，《臺灣日日新報》（1925.8.19）版 5；〈軍隊から出る講師四名　男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5.8.18)，版 5。

[189]織田幹雄，田徑選手，亞洲第一位奧運會個人金牌得主。1928 年奧運場上以 15 公尺 21 的成績奪得三級跳遠金牌。就讀早稻田大學，與南部忠平等人，締造出田徑新紀錄。織田幹雄多次來臺，對臺灣田徑運動影響頗深。

[190]日本的南部忠平，是田徑界的傳奇人物。他是一九三二年洛杉磯奧運會跳遠和三級跳遠的日本選手，在參加奧運會前，他已有跳遠七公尺九八的世界紀錄，比賽當時，因為腳傷，跳遠只跳出七公尺四五，奪得一面銅牌。沒想到，他的三級跳遠竟然跳出十五公尺七二的優異成績，打破由同是日本選手織田幹雄保持的十五公尺五八世界紀錄（一九二八年第九屆奧運），奪得金牌，一舉將三級跳遠的世界紀錄往前推進了十四公分。也因為這個世界紀錄，使得南部忠平同

臺灣擔任講師一職，他們都是在奧運場上叱吒風雲的人物。

事實上，在日本治臺的過程中，日本國內不斷地有體育專家前來，例如日本體操學校夏季體育研究會自東京來臺各地召開講習會（先至臺北，再到基隆、臺中、臺南、高雄各地舉行）。[192]1922 年 12 月在臺北市舉辦全島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教授櫻井恆次郎博士來臺講授內地人適切學理的體操，大力宣傳櫻井式體操。[193]1922 年由臺灣基督教青年會主辦，臺灣體育協會支援的體育講習會，在臺北明石町舉行，邀請到奧林匹克協會技術代表名譽顧問エフ、エゥチ、ブラウン及日本基督教青年會同盟體育部幹事西村正次擔任體育講習會的講師，召集可以修業二十天的健康者及普通競技運動者，或是小學校、中學校和師範學校教員，以及運動競技研究者，[194]最後有四十餘名參加，講習會中，教導競技運動，以及新的競技方法。[195]同樣地，1926 年，臺北市教育會更邀請日本知名的體育權威永井道明，[196]來臺擔任 12 月 3～5 日舉行的體操講習會講師一職，[197]甚者，原訂 5 日下午的體操講習會，還變成「臺北市民講演會」，參與者從教員擴大至一般市民，其講題爲「有關二次大戰後世界體育的趨勢與我國民體育」，[198]可見永井道明的吸引力。1927 年全島男子體育講習會，由各州廳選出八十名，講習體操、競技、遊戲、衛生、生理各科，講師亦是招聘日本文部省相當倚賴的體育家。[199]

於是乎，1925 年在臺北一高女舉行的臺灣首次女子體操講習會，報導之所

時保有跳遠和三級跳遠的世界紀錄，成為日本最偉大的跳部選手之一。

[191]人見絹枝（1907-1931），是日本最早在奧運場上展露頭角的女性選手。就讀二階堂体操塾（現日本女子體育大學），1925 和 1926 年來臺指導。1928 年參加阿姆斯特丹奧運會，於 800 公尺獲得銀牌。1931 年，因肺炎逝世，享年僅 24 歲。

[192]會費一圓。〈體操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8.7.22），版 2。

[193]〈體育講習會　來る二十三日〉，《臺灣日日新報》（1922.12.11），版 2。〈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12.12），版 5。〈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12.15），版 2。〈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12.16），版 6。

[194]學費三圓。〈體育講習會愈愈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22.10.14），版 7。〈體育講習 一日より二十日間〉，《臺灣日日新報》（1922.10.31），版 2。

[195]〈體育講習會閉會式と競技演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11.20），版 5。〈體育講習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1922.11.2），版 4。

[196]永井道明（1869～1950），為明治至昭和前期著名的體育學者，1905 年至歐美留學，研修スウェーデン体操（瑞典體操），1913 年完成日本最早的「學校體操教授要目」。著有《體育講演集》（東京：健康堂，1913）；《學校體操要義》（東京：大日本圖書：1913）；《學校體操教授要目の精神及び其の實施上の注意》（東京：教育新潮研究會，1919），上述幾本於日本出版書籍，目前在臺灣的圖書館仍可尋獲。

[197]當時的永井道明為東京本鄉中學校長，因到臺中參加中學校長會議，臺北州教育會特別邀請他，永井氏欣然允諾，於是將返京時間延後。〈臺北體操講習會　全島から　入會百餘名〉，《臺灣日日新報》（1926.12.3），版 n1。

[198]〈體操講習會　二日より開會〉，《臺灣日日新報》（1922.9.1），版 2。

[199]〈全島男子體育講習會　八月十日から十日間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27.6.1），版 2。〈全島男子體育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27.06.02），版 n04。〈全島男子體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1927.6.1），版 2。

以有許多人參加，是因爲「講師人選挑選的好」之說詞，[200]也就不這麼令人驚訝了。該次的四位講師（內田鳩子、御笹政重、人見絹枝、西澤）皆從日本二階堂體操塾（日本女子體育大學的前身）前來，其中一位，即是在奧運場上得到八百公尺銅牌的人見絹枝；隔年，人見絹枝等三人同樣到臺灣進行女子體操講習會的指導講師。[201]


世界新記錄を作つた兩選手
（右は南部忠平君、左は織田幹雄君）

圖 4：奧運知名選手來臺指導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報紙經常刊載這些競技選手的消息。
資料來源：〈世界新記錄を作つた兩選手〉，《臺灣日日新報》，1931.10.28），版 7。

1930 年起，來臺灣擔任體操講習會的講師更勝一籌，包括南部忠平、織田幹雄、加賀一郎等田徑好手，多次來臺參與體操講習會，[202]指導小公學校教員，讓小公學校教員得以在臺灣見識到世界一流水準的奧運選手，原本遙不可及的奧運，突然被這些在臺灣的教員們有種踩到奧運尾巴的感覺，前頭日本選手開的列車，被這些教員開的列車一下子「喀嚓」連結上了。

這些奧運競技選手代表的是權威，代表的是專業，除了擔任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的講師外，還巡迴至臺灣各地指導小公學校教員的田徑運動（臺北州通常是安排於首要時間），[203]此外，還特別針對臺北市的圓山運動場和臺北帝大運動場進行實地的量測，使之成爲臺灣「最初的公認競技場」。[204]他們的到來，的確使得臺灣的運動與日本甚至是全世界接軌。

這些名人來臺擔任體操講習會的同時，對臺灣的運動員也產生了極大的激勵作用。例如 1930 年 7 月，臺灣教育會聘請南部忠平、加賀一郎兩位，至各地巡迴講習及指導小、公學校教員，第一位參與奧運會的臺灣人張星賢即於體操講習會中，[205]聽聞南部忠平他談及國際性的田徑賽會，內心許下宏願，見賢思齊，決

[200]〈女子體育講習會に就て 極めて喜ぶべき傾向〉，《臺灣日日新報》（1925.8.19），版 2。
[201]〈女子體育講習會に就て 極めて喜ぶべき傾向〉，《臺灣日日新報》（1925.8.19），版 2。
[202]〈南部忠平、加賀一郎 兩氏を招聘〉，《臺灣日日新報》（1930.5.22），版 5。〈織田幹雄氏近く來臺す 臺北州の體育講習會の講師として〉，《臺灣日日新報》（1931.7.5），版 7。
[203]〈陸上競技指導講習會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30.5.29），版 2。
[204]〈本島最初の公認競技場 加賀南部兩氏立會で 圓山と帝大を指定〉，《臺灣日日新報》（1930.8.14），版 n2。
[205]張星賢在自傳提到的時間是一九二九年一月，但根據《臺灣日日新報》記載，南部忠平曾經到過臺灣三次，一是一九三〇年七月與加賀一郎，進行陸上競技講習；另一是一九三二年一月與

心做一位頂尖的田徑選手。張星賢言：

> 他擔任教練時所穿的世運(筆者按：奧運會)選手運動衣和早稻田大學運動衣，使我們很羨慕！那時我私自下了決心，將來一定要做一個一流選手，也就在這時，我認識了世運會這個──「名堂」和它具有的意義。[206]

追求「更快、更高、更強」（CITIUS, ALTIUS, FORTIUS），不只是奧運的宗旨，也是所有人類內心深處追求的目標。體操講習會的舉行，邀請日本好手至臺灣並至各地巡迴指導，臺灣的運動界瀰漫著一股活躍現象。在此氛圍中，接觸到這些選手的講習員之眼光，已朝向「日本帝國」，並一躍進入「全世界」，勾起參與者無限的遐想與志向，也讓部分有志者正式踏入現代運動的場域，或許是講習會舉辦之初始料未及之事吧！

七、結語

「良以臺灣統治問題，莫先於教育地方田村，內地人之居住甚少，大抵不外警官與教員二者，其直接間接於全體統治上之影響甚大」，[207]這是臺籍教師對於教員講習會的舉辦，提出其見解，認爲教員講習會的舉行有莫大之意義，尤其是在全體的統治上。

日治時期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的生成，乃因應學校體操課程的補強或是教師資格的不足而來，五十年來，至少舉行 112 次的體操相關講習會，足見其需求情形。

從臺北州舉行的體操講習會可以得知，主辦單位爲州、市、郡之教育（研究）會，至於利用臺北州舉行體操講習會的臺灣總督府（或臺灣教育會），對於臺北州在體育接受程度以及體操教員的視野擴展上，有極大的幫助。事實上，各項體育運動於日治時期不斷地狂潮襲岸，衝擊著臺灣，體操科也不例外，而協助小公學校教員打開通往體育教學道路的重要關鍵者，正是臺北州，臺北州的地利之便，敏銳地感應到體操科變動的腳步聲，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接收到最新體育政策之公布，不但對體育教學有迅速的理解和認識，也積極地推動日本殖民者體育政策的「一致性」。

體操的講習多數集中於夏期休業期間，以期在學校休業空檔時間，教師能透

織田幹雄，指導小公學校的教員；第三次是一九三八年一月與村社講平，至臺灣進行演講。其記載的時間與張氏自傳內容顯然有所差異。〈陸上競技指導講習會開催〉，《臺灣日日新報》（1930.5.29），版 2。〈織田、南部兩選手來臺に決定 明年一月十六日大和丸で著臺〉，《臺灣日日新報》（1931.12.26），版 2。〈跳躍王國の覇者紅顔の忠平さん 最高峰に立つ素晴らしい記録二度來臺した新しい記憶〉，《臺灣日日新報》（1932.8.6），版 1。〈講演（臺北九・三一）スポーツ放談〉，《臺灣日日新報》（1938.1.20），版 1。

[206]張星賢，《私の一生と体育生活》（上冊），頁 7。張星賢，《慾望、理想、人生－談我五十餘年的運動生涯》，頁 19。

[207]〈教員講習〉，《臺灣日日新報》（1912.06.26），版 6。

過講習會加以「充電」，以提昇其教學品質，講習的內容泰半提供教師廣泛的運動技能與知識，不偏重某項運動，並兼顧理論與實務經驗，有時，舉行各項運動競賽外，也會以兒童的體操會做爲成績的主要考量，其中，女子體操教師較爲缺乏，對女子體操的講習也未能偏廢。1924 年於淡水舉行的水泳講習會，除了運動項目的多元外，鎖定水泳課程，使講習員得以學習。

隨著日本殖民者逐漸重視體育之際，講習會的內容不僅偏重於實際，也必須配合日本國內及殖民政府於不同年代公布「學校體操教授要目」之科目而行，並傳輸體育觀、運動設施、教材教法和研究報告等新式知識，協助教師充實體育知能、舉行學校運動會和課外活動等內容。也就是說，體操講習會在時間和歷史的向度介入至小公學校，從日治初期到末期的過程中，講習會的科目及內容不斷地發生動態變化，是故，體操講習會不僅具有強化教師體操教授能力的機制，尚具有傳遞體操新知的功能，對於體操新知的傳遞更具影響，也是維繫體育教師良莠的重要關鍵之一。

總之，體操講習會在於改善及提昇教師的體育教學，甚至成爲養成體育師資的重要場域，體操講習會所傳授的新知，就像在水池丟入一顆顆石子一般，水面上不斷地產生一波波美麗的漣漪，一層又一層地向外擴散開來；亦猶如一顆種子落地，施肥澆灌，假以時日，蔚然成林，影響更多的學校及學生。對於小公學校的教師而言，講習會的確提供體育教師廣泛的運動技能與知識，不啻提供實際任教的體育教師相當多的「支援」；但是，體操講習會所產出的體育知識一致性，也成爲掌控體育教學的一項重要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以體操作爲主軸的講習會，扮演著傳遞日本甚至是全世界的運動新知和文明身體的中繼站，更是政策宣傳的重要據點。然而，參與講習會的教員們，究竟把自身的參與置放在何種意義下理解？是日治時期未來必須進一步深化的課題。

附錄 1：日治時期臺北州及所屬郡市主辦之體操講習會

年代	日期	講習會名稱	主辦單位	地點	講習科目	講師	講習員	參考資料
1922	9.2-9.11 共 10 天	體操講習會	臺北市	小學部於樺山小學校；公學部在太平公學校	理論講義、實地練習		市內公立各小公學校的教師	臺日 1922.9.1（2）
1923	1.13-3.3	體操科講習會	臺北市	六所小學校	理論及實習	總督府高等學校船曳教諭	臺北市內六小學校全部教員	臺日 1922.12.24（4）
1924	8.6-8.10	體操唱歌講習會	新莊郡教育會		體操、唱歌	總督府高等學校船曳教諭	郡內所有職員	臺日 1924.7.17（n1）
1924	11.30 起 7 天	唱歌體操講習會	海山郡教育研究會	板橋公學校	體操、唱歌	臺北三高女、臺北師範學校	郡下小公學校教員	臺日 1924.12.5（n1）
1925	7.11-7.16	唱歌體操講習會	海山郡教育研究會	板橋公學校	體操、唱歌	臺北三高女、臺北師範學校	郡下小公學校教員約百名	臺日 1925.6.27（n1）
1925	7.22-7.27	體操和家事講習會	羅東郡教育研究會、蘇澳郡教育研究會	羅東小學校	體操、家事	宜蘭公學校小島女史、臺北三高女林女史	女教員 15 名	臺日 1925.7.24（5）
1925	8.5 起 7 日	女教員講習會	海山郡教育研究會	板橋公學校	體操遊戲和體育舞蹈	第三高女梅谷教諭	郡下小公學校女教員及其他有意願者	臺日 1925.8.2（6）
1926	7.12-7.17	體操和水泳講習會	基隆市教育研究會	基隆第一小學校、クールベ一濱	體操、競技、水泳	臺北師範教諭、基隆郡九分公學校訓導	市內小公學校教員 30 名	臺日 1926.7.13（n1）
1926	9.8-9.22	體育講習會	臺北市	男子於樺山小學校，女子於旭小學校				臺日 1926.9.9（1）
1926	11.16	體操講習會(預定)	臺北市教育研究會	末廣小學校	體操			臺日 1926.11.6（n1）
1926	12.3-12.5	體育講習會	臺北市教育會	臺北商業學校、樺山小學校	體操（實習、講演、實地授業）	永井道明	市內體操教員和全島申請者百名以上	臺日 1926.11.20（2）；1926.12.4（n1）
1926	不詳（二學期舉辦一次）	體操講習會	臺北市		體操			臺北州學事一覽（大正 15 年）
1926	7 月中旬	體育講習	基隆市		體育			臺北州學事一覽（大正 15 年）

1926	第一學期舉行 7 次	唱歌及體操講習會	七星郡		唱歌及體操			臺北州學事一覽（大正 15 年）
1926	不詳（共 4 天）	體操唱歌講習	蘇澳郡		體操、唱歌			臺北州學事（大正 15 年）
1926	8.9 月	女教員體操遊戲講習	海山郡		體操、遊戲		女教員	臺北州學事（大正 15 年）
1926	8 月下旬	唱歌及遊戲教授法講習會	新莊郡		唱歌、遊戲教授法			臺北州學事（大正 15 年）
1927	6.23 起	體育講習會	文山郡教育研究會	景美公學校	最新體育法	高等學校及臺北第一師範學校二體操專家	郡下各小公學校職員 55 名	臺日 1927.6.28（n4）
1927	7.11-7.16	女子體育講習會	基隆市教育會	第一公學校	體操遊戲		會員 20	臺日 1927.7.12（4）
1927	8 月暑假	男女教員體育講習會	臺北市	男在北師範，女在一高女	男體操。競技。遊戲，女體操。遊戲		男八十名女子八十名	臺日 1927.8.8（n4）
1928	8.6-8.10 共 5 天	體育講習會	文山郡	新店	體操、球技、競技、水泳	臺北高等學校鴻澤教諭	郡下小公學校教員 60 名	臺日 1928.8.5（2）；1928.8.5（4）
1928	9.3-9.21	體育講習會	海山郡	板橋公學校		臺北商業學校山本教諭	郡下小公學校體操主任 60 名	臺日 1928.9.9（n4）
1929	7.14-7.19	音樂體操講習會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窗會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音樂、體操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教諭	會員 79 名非會員 11 名	臺日 1929.6.15（7）；1929.7.15（2）
1929	共 5 次	體育講習會	臺北州各郡市	臺北州各郡市	體操			學事第 28 年報
1930	7.16-7.19	水泳講習會	宜蘭郡教育會	蘇澳（三郡聯合）	水泳			宜蘭郡教育
1930	7.26	體育講習會	基隆市教育會		各種競技	石川講師		臺日 1930.7.29（2）
1930	8.5-8.8	唱歌遊技講習會	宜蘭郡教育會	宜蘭小學校（三郡聯合）	水泳			宜蘭郡教育
1930	共 3 次	體育講習會	臺北州各郡市	臺北州各郡市	體操			學事第 29 年報
1931	7.12-7.18	體育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會			織田幹雄 南部忠平	小公學校體育教員 40 名	臺日 1931.7.05（7）；學事第 30 年報
1931	7.12-7.18	女教員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會	臺北三高女		織田幹雄 南部忠平	小公學校女教員 40 名	臺日 1931.7.05（7）；學事第 30 年報
1931	共 2 次	體育講習會	臺北州各郡市	臺北州各郡市	體操			學事第 30 年報

1932	5 天		臺北州	臺北州	體操、競技、遊戲	台北州中等學校教官	小公學校教員 70 名	學事第 31 年報
1932	共 3 次	體操遊戲講習會	臺北州各郡市	臺北州各郡市	體操遊戲			學事第 31 年報
1932	6.21 起	體操講習	新莊郡	三重埔公學校	體操	臺北一中、第一高女	郡下小公學校教員 50 名	臺日 1932.6.24（n4）
1932	7.5-7.6 共二天	體操實技指導講習會	海山郡	板橋公學校	體操	臺北商業、第一高女、臺北第一中	郡下全部小公學校體操主任	臺日 1932.7.7（8）
1933	共 2 次	體育講習會	臺北州各郡市	臺北州各郡市	體操			學事第 32 年報
1933	6.22.24.26	體操指導講習會	臺北州	松山公學校	體操	一中、一高女、二高女	七星郡小公學校職員	臺日 1933.6.28（2）
1933	9.28-9.30	體操講習	臺北市	建成小學校	體操	一中、臺北商業、一高女	臺北市小學校教員 200 名	臺日 1933.9.26（8）
1933	10.5-10.7	體操講習	臺北市	日新公學校	體操	一中、臺北商業、一高女	臺北市公學校教員 280 名	臺日 1933.9.26（8）
1934	12 天		臺北州	臺北州	體操實技	臺北第一中學校田島教諭外 2 名	小公學校體操擔任者	學事第 33 年報
1934	7.5-7.7	體操指導講習會	臺北州	宜蘭公學校	體操	一中、一高女、北商	宜蘭郡下小公學校教員 130 名	臺日 1934.7.5（3）；1934.7.8（3）
1934	9.13-9.15	巡迴體操實技講習會	臺北州基隆郡	瑞芳公學校	體操	一中、一高女、北商	小公學校教員	臺日 1934.9.13（3）；1934.9.14（8）；1934.9.15（3）
1934	10.24-10.26	體操實技講習會	臺北州	日新公學校	體操	一中、一高女、北商	公學校 280 名	臺日 1934.10.25（n4）
1934	11.15-11.17	體操實技講習會	臺北州	建成小學校	體操	一中、一高女、北商	小學校 230 名	臺日 1934.10.25（n4）
1935	共 1 次	體育講習會	臺北州各郡市	臺北州各郡市	體操			學事第 34 年報
1936	共 5 次		臺北州各郡市	臺北州各郡市	音樂遊戲			學事第 35 年報
1936	8.25-8.29	唱歌遊戲講習會	文山郡教育會		唱歌		小公學校教員 64	臺北州管內（昭和 11 年）
1936	10.8-10.10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宜蘭郡宜蘭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宜蘭郡內小公學校教員	臺日 1936.10.5（5）
1936	10.23-10.24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基隆郡七堵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	基隆郡內小公學校教員	臺日 1936.10.5（5）

						等四名教諭		
1936	11.5-11.7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臺北市（小學校）建成小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臺北市內小學校教員	臺日 1936.10.5（5）
1936	11.19-11.21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臺北市（公學校）日新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臺北市內公學校教員	臺日 1936.10.5（5）
1936	12.3-12.5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基隆市雙葉小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基隆市內小公學校教員	臺日 1936.10.5（5）；1936.12.3（5）
1936	12.14-12.16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文山郡新店公學校	體操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文山郡內小公學校教員 100 名	臺日 1936.10.5（5）；1936.12.18（9）；1936.12.19（n4）
1937	1.14-1.16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淡水郡淡水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淡水郡內小公學校教員	臺日 1936.10.5（5）
1937	1.23-1.24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羅東郡和蘇澳郡聯合）羅東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羅東郡和蘇澳郡內小公學校教員 150 餘名	臺日 1936.10.5（5）；1937.1.26（8）
1937	1.28-1.30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七星郡士林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七星郡內小公學校教員	臺日 1936.10.5（5）
1937	2.4-2.6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新莊郡新莊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新莊郡內小公學校教員	臺日 1936.10.5（5）
1937	2.25-2.27	改正體操講習會	臺北州教育課	海山郡板橋公學校	體操教授要目改正	臺北商業、一中、一高女、三高女等四名教諭	海山郡內小公學校教員	臺日 1936.10.5（5）
1937	7.13-7.14	夏期講習會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窗會	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唱歌、遊戲、舞蹈	3 名	150 名	臺北市社會教育（昭和 12 年）
1937	7.13-7.16	小公學校教員體育講習會	臺北州	臺北州	體操		小公學校教員 100 名	臺北州管內（昭和 12 年）
1937	8.6-8.9	體操講習會	新莊郡	新莊公學校	體操	臺北一高女		臺日 1937.8.6（8）
1937	8.21-27	唱歌遊戲講習會	基隆市教育會		唱歌、遊戲		小公學校教員 47 名	臺北州管內（昭和 12 年）
1937	4 天		臺北州	臺北州	體育	臺北商業學校教諭三宅	小公學校教員男子 68	學事第 36 年報

						政光外 3 名	名女子 40 名	
1937	共 3 次	體育講習會	臺北州各郡市	臺北州各郡市	體操			學事第 36 年報
1937	共 4 次		臺北州各郡市	臺北州各郡市	唱歌遊戲			學事第 36 年報
1938	6.20-6.24	裁縫體操講習會	臺北市教育會	建成小學校、末廣高等小學校	裁縫、體操			臺日 1938.6.21（7）
1938	12.18-12.19	相撲體操指導講習會	基隆郡	瑞芳公學校	相撲、體操	大日本相撲體操創始者八尾氏		臺日 1938.12.14（7）
1939	6.12 起 5 天	體育講習	臺北市學務課	建成小學校、樺山小學校、東門小學校	體操科		市內小公學校職員約 1000 名	臺日 1939.5.26（n2）；1939.6.13（n2）；1939.6.17（n2）
1939	7.15-7.19	體育講習會	臺北州	臺北一高女	小公學校體操科的理論與實技	松下（一女）、山本（商業）、阿部（三中）、岸本（州體育官）	各校體操科主任	臺日 1939.6.24（n2）
1940	6.18-6.21	體操講習	臺北市	建成、壽、南門、樺山	體操要目指導法		臺北市內小公學校女教員 700 餘名	臺日 1940.6.19（n2）
1943	8.16-20	體鍊科講習會	臺北州	臺北一中、南門國民學校	武道、體育衛生、水泳、相撲、劍道、柔道、音樂遊戲	府體育官、臺北市囑託、體育官補、北師教諭、高校教、北一中教諭、北師助教授	臺北州下國民學校	臺日 1943.7.31（n1）
1943	9.3 起二週	體鍊科講習會	臺北市	樺山、南門、壽、建成、老松、太平	體操、音樂遊戲、劍道、柔道、薙刀	宇佐見主事等人	臺北市內國民學校全部職員	臺日 1943.9.2（n2）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一年至第三十六年，明治 36 年至昭和 12 年），1905~1940 年。《臺灣日日新報》（1896～1944 年）。出版單位不詳，《大正十五年度臺北州學事一覽》，出版年不詳。宜蘭郡教育會，《宜蘭郡教育概況》，宜蘭郡教育會，1930。臺北州，《昭和十一年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北州，1936。臺北州，《昭和十二年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北州，1937。

附錄 2：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等單位於臺北州舉行之體操講習會

年代	日期	講習會名稱	主辦單位	地點	講習科目	講師	講習員	參考資料
1922	12.23 起 10 日	全島小公學校體操講習會	總督府	臺北樺山小學校及醫專教室	人體解剖生理，櫻井式體操	九州帝國大學櫻井博士、山口縣師範小森教諭	全島各郡市各出三名小公學校體操科主任共 160 人	臺日 1922.12.11（2）；1922.12.12（5）；1922.12.15（2）；1922.12.16（6）學事第 21 年報；臺灣教育（236）
1922	11.1-11.20 共 20 天	體育講習會（學費三圓）	臺灣基督教青年會主辦，臺灣體育協會支援	臺北市明石町	教導競技運動，以及新的競技方法	奧林匹克顧問	40 餘名	臺日 1922.10.14（7）；1922.10.31（2）；1922.11.20（5）；1922.11.2（4）
1924	8.4-8.13	衛生體育講習會（全島水泳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淡水公學校及淡水海岸	體操、遊戲、水泳、衛生、地理、博物、經濟	戶山學校教官（野地大尉）外陸軍將校 1 名中學校高等女學校教諭總督府技師臺灣銀行行員	小公學交體操科研究主任訓導 90 名	臺日 1924.6.24（4）；1924.8.5（2）；學事第 23 年報
1925	8.11-8.20 共 10 天	女子體育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第一高等女學校屋內體操場	體操、遊戲	奈良女高師助教授（內田御笹）京都一高女（人見）西澤	小公學校教員研究體操科教授者及中等學校體操科擔任者 93 人	臺日 1925.8.12（5）；1925.8.12（n2）；1925.8.13（5）學事第 24 年報
1925	8.21-8.30 共 10 天	男子體育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臺北師範學校	體操、遊戲、衛生、生理	臺北步兵第一聯隊將校（三木少佐、田村少尉）高等學校教諭	小公學校教員研究體操科教授者及中等學校體操科擔任者 80 人	臺日 1925.8.19（5）；1925.8.18（5）；學事第 24 年報
1926	8.3-8.12 共 10 天	男子體育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臺北第一中學校	體操、遊戲、生理、衛生	步兵第一聯隊將校、中等學校教諭、	小公學校教員對體操科有研究者 78 名	臺日 1925.8.2（6）；學事第 25 年報
1926	8.6-8.15 共 10 天	女子體育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女子部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體操、遊戲、生理、衛生セブン・ジャンブス（seven jump）	內田鳩子、御笹政重、人見絹枝三女史	小公學校教員對體操科有研究者 118 名	臺日 1926.6.16（4）；1926.8.7（n1）；1926.8.9

								（3）；學事第 25 年報
1927	8.11-8.20 共 10 天	男子體育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	體操。競技。遊戲。衛生。生理	島內中等學校教官	各州廳選出小公學校男教員 80 名	臺日 1927.6.2（n4）；1927.6.1（2）；1927.8.11（n1）；學事第 26 年報
1927	8.11-8.20 共 10 天	女子體育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競技、遊戲	島內中等學校教官	小公學校女教員 80 名	臺日 1927.8.11（n1）；學事第 26 年報
1928	7.17-8.27 共 11 天	男子體育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	體操、競技、水泳、生理、衛生	島內師範學校及臺北高等學校教官	小公學校男教員之體育指導者 97 名	臺日 1927.7.12（4）；學事第 27 年報
1928	7.23 起 11 天	女子體育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體操、競技、水泳、生理、衛生	島內高等女學校教官	小公學校女教員之體育指導者 82 名	臺日 1927.7.12（4）；學事第 27 年報
1928	8 月開始	體操講習會（會費一圓）	日本體操學校夏季體育研究會	至本島各地			日本體操學校舞蹈遊戲主任小橋川八氏和學生數名	臺日 1928.7.22（2）
1930	3 天	體育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各州廳委任	陸上競技各種目	加賀一郎南部忠平	小公學校男教員各會場 40 名	臺日 1930.7.13（n1）；學事第 29 年報
1931	3 天	體育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各州廳委任	陸上競技各種目	織田幹雄南部忠平	小公學校男教員各會場 40 名	學事第 30 年報
1932	4 天	學校教練教師講習會	總督府	臺灣步兵第一聯隊	學校教練各種目	臺灣步兵第一聯隊將校	學校教練教師 27 名	學事第 31 年報
1936	8.10-8.13	小公學校教員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北一師	學校體操教授要目等三科目	4 名	小公學校教員 300 名	臺北市社會教育（昭和 11 年）、臺北州管內（昭和 11 年）
1936	4 天	小公學校教員體操科講習會	臺灣教育會	臺北第一臺中、臺南各師範學校	學校體操教授要目改正趣旨、學校衛生上諸問題其他	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佐佐木等及文教局	原小臺學校教員 1,025 名	學事第 35 年報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一年至第三十六年，明治 36 年至昭和 12 年），1905~1940 年。《臺灣日日新報》（1896～1944 年）。出版單位不詳，《大正十五年度臺北州學事一覽》，出版年不詳。宜蘭郡教育會，《宜蘭郡教育概況》，宜蘭郡教育會，1930。臺北州，《昭和十一年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北州，1936。臺北州，《昭和十二年臺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北州，1937。《臺灣教育》（1912-1942）。

附錄 3　於淡水舉行的夏期體育講習會之設備一覽

1.平均臺	八臺（淡水）四臺（臺北二高女）
2.跳越臺	五臺（淡水）五臺（北師）
3.肋木	二十間（淡水）
4.腰掛	五十腳（淡水）
5.圓盤	二個（淡水）十個（高等）五個（附小）
6.砲丸	二個（淡水）四個（高等）十一個（附小）
7.蹴球	六個（淡水）
8.槍	三本（淡水）十本（購入）
9.高跳用柱	一基（淡水）
10.鐵棒	三間（淡水）
11.ハードル	六個（附小）
12.竹棒	共 11 本（購入）
13.排球用具	一式二組（北師）
14.籠球用具	一式二組（北師）
15.庭球用具	一式二組（淡水）
16.旗	手旗、游泳用標識旗等　三十本（淡水）
17.謄寫版用具	一組（淡水）
18.莫蓙	
19.荒蓆	
20.敷藁	
21.枕	
22.毛巾	二百枚（聯隊）
23.蚊帳	八人用二十五張（聯隊）
24.洗面器	二十個（聯隊）　六個（淡水）
25.郵便箱	一個（淡水）
26.ハードル	六個（附小）
27.巡迴書庫	一　行李五十冊（圖書館）
28.碁盤碁石	二組（淡水）
29.救急藥品箱	箱（淡水）　藥品（購入）
30.ホーケー用具	一式　二組（講師攜帶）
31. 水泳用鉢巻	黑色二十本　紅色二十本（購入）
32.石灰	一俵（購入）
33.繩並綱	十條（購入）
34.箒	十本　室內用（購入）室外用（淡水）

資料來源：〈淡水に於ける體育夏季講習會日誌〉，《臺灣教育》267 號（1924.9），頁 68。

說明：腰掛（凳子）、圓盤（鐵餅）、砲丸（鉛球）、蹴球（足球）、鎗（標鎗）、ハードル（欄架）、籠球（籃球）、莫蓙（涼席）、敷藁（鋪的稻草）、繩並綱（拔河繩）、碁盤碁石（棋盤、圍棋）。

日治末期日軍在淡水地區活動之軍事史考察

陳俐甫*

摘要

日本帝國在台灣五十年間的殖民統治，以軍事爲嚆矢，也終焉於軍事。對台灣的軍事動員由 1937 年開始台灣人軍屬（約聘文職）徵募，1943 年則發展至特別志願兵，1944 年底開始實施台人徵兵制度，1945 年進行包括學徒兵的全面草根動員。本文以淡水爲中心，試圖描述出戰爭末期日本帝國政府在台灣防衛戰時對台灣北部防衛的規劃部屬與動員情形，並評估日本本土防衛戰中在台灣淡水周邊區域日軍的戰爭策略與考量。日治末期台灣青年主要以徵兵方式被動員至日本的台灣保衛戰，而當時的戰爭有別於領台初期的完全來自日本內地的純日裔師團，1944 年中期以後，在台灣已經產生全部在台灣本地徵集的新編聯隊所構成正規師團，此等部隊達 20%-40%比例是由台灣青年應召構成。

關鍵字：

台灣軍、淡水、戰爭動員、日本帝國、軍事史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一、 前言

淡水是台灣文化歷史最豐富的地區之一，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延聘歷史學者開設「淡水發展史」課程，而通識教育中心也開設有「淡水河流域戰史」科目由軍訓室教官主授。但淡水河流域戰史主要討論清法戰爭，日治時期戰爭資料則付諸闕如。[1]

過去在台灣因軍事屬於機密，統治者如蔣介石認爲軍史是建軍之根本，相關職位與權力常爲外來統治者所專擅。故本土台灣史學者對台灣軍事史著墨較少，日本殖民時期的軍事相關研究尤稀，解嚴以來，關於皇民化研究（如動員與徵兵）與戰爭下台灣庶民史（如台灣人日本兵）的研究開始逐步發展，台灣近代軍事史相關研究才開始出現，但制度史或戰爭史仍屬少人觸及之領域。因筆者過去曾著墨於日本帝國之戰爭動員體制，並有一些台灣史的粗淺勞作，願不辭固陋，以本文爲拋磚引玉之嘗試。惜因淡水地區相關資料稀少，如有謬誤缺漏之處，尚請 海涵。

二、 日華戰爭以後在台灣的日軍動員

台灣本地的日本軍事體制，日本侵台之初，自首任樺山資紀大將以來，即以總督監管全島軍事，乙未抗日時，因劉永福於台南激烈抵抗，日本被迫由遼東半島增遣第二師團來台協助近衛師團等部隊之軍事鎮壓，方成立由台灣副總督高島丙之助中將兼任南進軍司令官統籌南部軍事，此爲日本在台灣最早之「軍」編成。此等軍之編制爲作戰軍，肥平時一般編制，此南進軍完成任務撤銷後，直到 1904 年由黑瀨義門中將出任首任「台灣守備軍」司令，台灣守備軍並非獨立於台灣總督府制度外之組織，而是由台灣總督府於 1903 年 12 月 29 日頒佈之律令所設置之司令官制。[2]故其上受台灣總督府之軍事指揮，而非一般之軍團。1919 年 8 月 19 日日本政府制訂「台灣軍司令部條例」，並廢止「台灣守備軍司令官」，由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中將直接兼任台灣軍司令官，爲利軍權統一，直到日本戰敗爲止，只要陸軍將領出任武官身份之台灣總督，均兼任台灣軍司令官。原本日軍作爲「國防軍」，在明治維新以來，地方以聯隊管區爲基礎，師團是平時之最高軍事編制。台灣軍司令官的設置，一方面爲因應大正民主時代下，大日本帝國憲法軍令權專屬於天皇的需要，預先排除民選內閣的侵擾，另一方面也是因應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作爲承平時期政府對殖民地（包括中國租借地滿州、合併後的朝鮮王國、殖民地台灣）需要的特殊軍事考量。因此台灣軍、關東軍、朝鮮軍就成爲三個承平時期的常設軍團。顯示當時日本已經轉變爲隨時對外用兵作的列

[1] 淡水河流域戰史課程之主要教材為張揚興：《台灣歷史上的決定性戰役》（台北：幼獅文化，2007）。

[2] 古野直也著，許極燉譯：《台灣近代化秘史》（高雄：第一出版社，1994）頁 345。

強與帝國思維。

台灣軍雖然爲平時之軍團編制，在 1930 年霧社事件之鎮壓也即時發揮了他的制度性作用。[3]但台灣地區當時僅有分屬台北與台南的兩個聯隊編制：台灣步兵第一聯隊與台灣步兵第二聯隊（均爲 1907 年創設）。以此兩聯隊與台灣山砲兵大隊構成了台灣守備隊，整體實力僅相當一個混成旅團之編制。[4]尚不足日本侵台時期三分之一兵力。

1937 年蘆溝橋事變以後，台灣守備隊擴編成台灣混成旅團被送往中國前線作戰，歷經上海、南京、廣州等地之戰役，爲補足台灣日裔徵兵之不足，首先在 1937 年以軍屬名義，徵募台籍青年前往中國戰場協助翻譯、運輸等之輔助工作，此即俗稱「台灣軍夫」之濫觴。

隨戰事擴大，1941 年開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3 年海軍也在台實施特別志願兵徵募，全面性的徵集在 1944 年 12 月實施台灣徵兵令以後，才取得對台灣男性青年全面之法律依據，1945 年起，台灣青年被徵入島內各新成立的部隊，連中學生也被編成沒有軍階的學徒兵支援防禦任務。[5]1937-1944 年間，日本在台的軍事人力一般以在台日人爲主要徵集對象，台灣步兵第一、第二兩聯隊均爲在台日人所構成，1941 年以前，台人主要作爲隨同兩日人聯隊與其在中國戰場之化身「台灣混成旅團」的文職輔助人員，1941 年以後戰事加劇與人力消耗，1940 年 11 月 30 日年台灣混成旅團返台養補擴編成第 48 師團（通稱「海」兵團）以投入南洋作戰，輾轉由菲律賓、印尼、澳洲等前線，最後駐守於帝汶迎接終戰。此間以陸軍特別志願兵方式引進台灣青年（含原住民）爲 48 師團之補充兵，台灣陸軍志願兵（軍人）在島外即以投入第 48 師團爲最多。但此師團與日治末期日人在台防衛部屬無緣。依據學者研究，台灣人在台灣可被認可以加入日本軍隊服役，主要原因是台灣混成旅團的成立，使台灣軍由台灣島內的叛亂鎮壓部隊轉型成外征部隊，所以台灣人可以被接受爲日軍成員，第 48 師團編成即爲此證。[6]但台灣人是否只能擔任外征部隊而不能參與島內的軍事呢？常見的說法台灣「皇民化」運動固然是一理由，但當時日本軍有保鄉衛土、現地自活的苦衷，恐怕才是不得不立刻大量徵用台灣青年的主要原因。

台人被大量徵集爲日本軍人，如前所述，乃 1944 年 9 月 1 日台灣徵兵制實施之後的結果，因取得法源後，台灣青年才能成爲補充兵。但另一要因則是，補充哪

---

[3] 陳俐甫：〈霧社事件之責任問題與歷史意義〉，《台灣史論集：曹永和教授古稀嵩壽紀念》（台北：1991），頁 147-151

[4] 太平洋戰爭前，日本的標準師團編制為兩步兵旅團（四個聯隊），並包括一個山砲或重砲連隊及其他師團附屬部隊。如為關東軍下轄的滿州常駐師團與朝鮮軍下屬的朝鮮駐屯師團，均是高員額編成的戰時定員編制師團，相對於其他軍，台灣軍的軍力只有半個師團，在台兵力可說是非常貧乏。師團編制參見大江志乃夫：《天皇之軍隊》（東京：小學館，1982），頁 241-243

[5] 台灣十五歲學生即被集體徵派執行軍事任務，可參見台北二中學生林景明之回憶錄。林景明：《日本統治下台灣之「皇民化」教育》（東京：高文研，1997）。

[6]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台灣》（東京：刀水書房，1996），頁 46。

些部隊？爲何有那些部隊的編成？而何以哪些台灣青年會主要用於守衛台灣？

1941 年有侵菲之主力部隊於台灣集結（由兩個師團與一個混成旅團構成，含第 48 師團），由台灣軍司令官本間雅晴兼任對菲作戰的第十四軍司令官，一時台灣成爲日本帝國用兵之前線，南方之基石，此後隨南方作戰順利，台灣角色轉成「兵站基地」。依據大本營制訂的南方作戰計畫要旨規定：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台灣爲南方作戰之中繼補給基地」。[7]因遠離戰爭前線，直到 1944 年以前，台灣的防務空虛，直到 1943 年秋天美軍航空母艦組成之機動部隊（現美海軍第七艦隊前身）開始大規模空襲台灣、琉球（首日台灣受 600 架次空襲，同時琉球受 400 架次空襲），進行佯攻，而目的在進攻菲律賓，日本也集結大量陸海軍所屬之戰機到台灣備戰（在台灣、九州南部 300 架、在菲律賓 200 架）。爆發於 1943 年 10 月爆發台灣沖航空戰（台灣外海空戰），日本在台空軍損失過半，並開始採用神風自殺攻擊，台灣成爲名符其實的「不沈的航空母艦」。因日本誤信已造成美國機動部隊重大損失，而於發動了捷一號菲律賓作戰，結果不只是在菲陸軍失利，連海上兵力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此後日軍知道本土作戰迫在眉睫，認定美軍即將入侵台灣與琉球，大本營才開始認真增強台灣防衛。1944 年 3 月 22 日防衛軍性質的台灣軍編入作戰序列，起初除少數要塞部隊，全台只有駐守帝汶島的第 48 師團的留守部補充隊而已，連一個完整的師團都沒有。[8]1944 年 6 月起才在台灣各地新創 301-305 五個聯隊番號，8 月又創設 249 聯隊，這些新編聯隊，主要構成在台灣的第50師團與後來成立的混成旅團的骨幹，這些新補充與創立的部隊，幹部也不少是台灣各級學校的在鄉軍人（後備軍人）與學校軍訓教官（教練）所構成，如第 102 混成旅團的旅團長小林忠雄少將，原是台北帝國大學的總教官。[9]1944 年 9 月台灣軍改編升格爲第十方面軍，統領台灣、琉球、澎湖等區域之軍事，由安藤利吉中將（後大將）出任總司令，並擔任琉球守備任務的第 32 軍也納入其下。1944 年 12 月 22 日，由關東軍增援到台灣精銳的第 12 師團爲發端，1945 年 1 月 4 日在澎湖與基隆新設獨立 75 及獨立 76 旅團。1945 年 1 月 8 日，更在嘉義新成立第 40 軍司令部，統籌台灣南部之防務。1945 年 2 月 1 日，當時由海軍現役將領擔任的台灣總督一職也由陸軍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兼任，軍政合一。大本營準備在台灣與琉球與美軍決戰（捷二號作戰），1 月 23 日除由關東軍在移派第 71 師團到台灣嘉義外，稍早 1 月 10 日已自琉球抽調精銳的第 9 師團駐防新竹，2 月 17 日在增設獨立混成 100 旅團（高雄）、102 旅團（花東地區）、103 旅團（第 40 軍直屬部隊）。在 2 月當時台灣陸上兵力有五個師團六個旅團的龐大兵力。[10]這龐大的兵力中，新設部隊內約有 20-40%比例是台籍青年所構成。[11]

美軍登陸琉球後，日軍防衛重點變更爲日本內地防衛，故盡量抽調精銳回防日本，

---

[7] 林三郎：《太平洋戰爭陸戰概史》（東京：岩波書店，1951），頁 52。
[8] 中野校友會編：《陸軍中野學校》（東京：原書房，1978），頁 711。
[9] 參見小林忠雄在《啊～台灣軍》中的回憶。台灣會：《啊～台灣軍》（東京：台灣會，1983）。
[10] 林三郎：同前書，頁 226
[11] 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四冊（東京：鱒書房，1953），頁 61。

台灣乃改現地自活之策略。

1945 年 5 月，日軍解除在在嘉義的第 40 軍司令部戰鬥序列，轉用至日本九州南部負責本土防衛，歸福岡的第 16 方面軍管轄。背景是 4 月 1 日美軍已經登陸沖繩本島，跳過台灣，台灣失去日本內地屏障之價值。日本開始第二次內地兵備動員（8 個師團）以進行本土防禦戰鬥，或因制空權與制海權爲美軍所奪，或因部隊爲盟軍所阻，無法順利調動大軍回防，僅能加強內地之動員因應。第 40 軍司令部轉用回九州，可見日軍在台灣的防務陷入僅能自求多福的狀態。

三、 戰爭末期日本在的淡水周邊的軍事部屬

日本戰爭末期的軍事部屬，淡水台北地區之防務上屬由台北的第十方面軍司令部直接指揮，以乙種師團等級之第 66 師團（司令官中島吉三郎中將兼台北警備司令）駐守台北、淡水沿線，實際兵力 1 萬 3 千 815 人，防衛重點爲淡水河口左岸至許厝港附近之河岸地帶，包含淡水、樹林、鶯歌、南崁一帶，並與駐守基隆有兵力六千多人的的獨立混成 76 旅團聯繫，共同防阻美軍。前述有大量台籍徵兵組編的 304、305、249 等三個聯隊，即第 66 師團之組成。66 師團直接用於淡水的部隊爲破竹部隊，轄有師團搜索隊、師團自動車隊、第一野戰築城隊及師團其他部隊、特警 535、552 大隊，505 大隊之三個中隊，518 大隊的淡水小隊，總兵力約 4 千多人。淡水現地部隊之防衛重點爲麟山鼻至南勢岡附近，前洲子附近至淡水河口，於其作戰計畫爲美軍登陸時，依店子公司溪左岸高地線，及淡水打球地（淡水高爾夫球場）之主陣地，將之擊滅。另有田島正雄少將指揮的獨立混成 103 旅團，5 月後由台南北調，實際兵力 3164 名，是輕裝機動部隊，歸方面軍司令部直接指揮，用於淡水、板橋間防務。[12]

日軍在淡水之獨立第 103 旅團奉陳儀總司令於 1945 年 10 月 30 日發佈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軍字第一號命令，規定：所有武器、裝備、車馬、器材、文書繳集於淡水附近各場庫，北淡線之主力第 66 師團也於台北交接。[13]但事實上在中國軍隊到達台灣以前，1945 年 10 月 8 日台灣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在與中國接收軍副參謀長兼前進指揮所副主任范詠堯少將的談話紀錄中即有記載：駐防台北、淡水的這兩支日軍部隊早已自行移駐至台東與高雄。[14]故於中國軍隊登陸以前台北、淡水等地日軍已經自行提早撤離。故淡水地區之日軍防務，在日本投降前後有大幅變動。1945 年 5 月以前以台灣南部爲防禦重點，之後隨專職南部防務之第 40 軍司令部轉移回日本內地，島內軍隊全部直屬於方面軍司令部使用，部分南部軍隊如獨立混成第 103 旅團也北調用於支援北部地區之防務。此外也準備退入山區進行長期游擊戰之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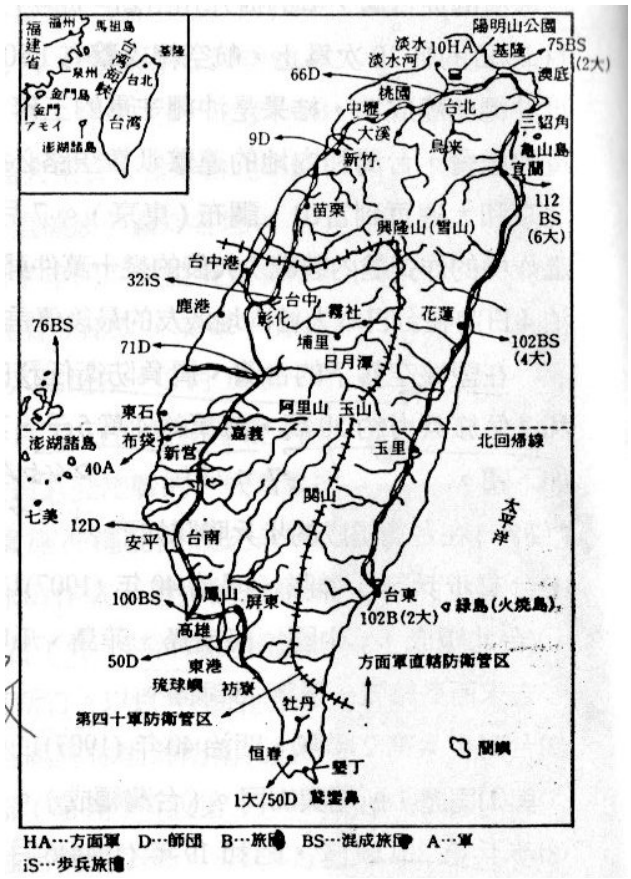
---

[12] 參見劉鳳翰：《日軍在台灣》，下冊（台北：國史館，1997），頁 588。
[13] 張瑞成編：《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頁 246-7。
[14] 張瑞成編：同前書，頁 240-241。

四、 結語

日治末期台灣人開始被直接納入日本軍事體制內，兵役尤爲典型之軍事動員。尤其是主要負責防禦台北盆地與淡水河流域之日本陸軍 66 師團，其主要兵源包括三個由大量台籍青年構成的 304、305、249 聯隊。這些聯隊都包括至少 20-40%的台籍新兵。推估人數有數千人之譜。日治末期，台灣人在日本的台灣防務上佔有重要角色已有不少研究台籍日本兵的學者提出相關研究成果，而台北淡水地區的台籍兵士比例應爲全台部隊中數一數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以後，師團編制以三個步兵聯隊爲原則，而駐台北淡水的第 66 師團與駐潮州萬巒之第 50 師團，均爲三個台灣徵集的現地聯隊所構成。全日本的師團中，即便是號稱台灣師團的第 48 師團也僅有兩個聯隊是台灣所徵集的，且早期編成時的兩個聯隊係全台灣日裔青年所構成，其台人兵士的比例應遠不如文中所述之第 66、50 兩師團。未來如能透過日本所遺留這兩個師團史的研究與隸屬該等部隊之台籍日本兵口述歷史，或許可以更具體呈現出日治時期台灣軍事史的面貌。

附圖：日本在台之軍事部屬圖 1945.8.20。



資料來源：古野直也：《台灣軍司令部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東京：圖書刊行會，1991。本圖爲許極燉之漢譯版本。

參考書目

大江志乃夫：《天皇之軍隊》。東京：小學館，1982。

中野校友會編：《陸軍中野學校》。東京：原書房，1978。

古野直也著，許極燉譯：《台灣近代化秘史》。高雄：第一出版社，1994。

台灣會：《啊～台灣軍》。東京：台灣會，1983。

近藤正己：《總力戰與台灣》。東京：刀水書房，1996。

林三郎：《太平洋戰爭陸戰概史》。東京：岩波書店，1951。

林景明：《日本統治下台灣之「皇民化」教育》。東京：高文研，1997。

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四冊。東京：鱒書房，1953。

張瑞成編：《光復台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台北：國民黨黨史會，1990。

張揚興：《台灣歷史上的決定性戰役》。台北：幼獅文化，2007。

陳俐甫：〈霧社事件之責任問題與歷史意義〉，同氏編：《台灣史論集：曹永和教授古稀嵩壽紀念》。台北：台灣史專題研究課程同窗會，1991。

劉鳳翰：《日軍在台灣》，下冊。台北：國史館，1997。

王昶雄の文学世界

河原　功*

摘要

淡水をこよなく愛し、日本留学で文化的素養を養った王昶雄は、歯科医院を営みながら文学活動を推進していった。

王昶雄に関する研究では、これまでは代表作「奔流」が論じられることが多かった。だが、「梨園」「淡水河の漣」、未発表の小説「鏡」、さらに随筆や評論、それに詩などが新たに発見されたことから、王昶雄の文学世界が立体的に見えてくるようになった。私は《王昶雄全集》（台北県政府文化局）の編纂委員を務め、また《王昶雄作品集》（緑蔭書房）を編集したこともあり、その経験を通じて考察した、王昶雄作品の分析と、文学傾向、そして人間性に迫る。

關鍵詞

淡水　王昶雄　奔流　淡水河の漣　鏡

*東京大学文学部兼任講師・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兼任講師

はじめに

王昶雄（本名王栄生、1915－2000）は、台湾淡水の生まれ。1933 年に叔父の洪李澤[注 1]を頼って上京し、東京の郁文館中学校に編入した。35 年に同校を優秀な成績で卒業、日本大学予科文科（二年制）に進学した。その在学中に短篇小説「梨園の秋」（処女作）を『台湾新民報』に発表する。予科文科を卒業して法文学部文学科（三年制）に進学するが、程なくして歯科医となることを志す。そこで、38 年に日本大学専門部歯科（四年制）を受験、41 年に歯学科を卒業するが、この間に中篇小説「淡水河の漣」を『台湾新民報』に連載。42 年に台湾に戻り、淡水に「岩永歯科医院」を開設。歯科医として多忙の日々を送る傍ら、小説や詩、評論や随筆など多くの作品を発表した。

王昶雄の代表作は小説「奔流」（『台湾文学』第 3 巻第 3 号、1943 年 7 月）だが、同じく淡水を舞台にした小説「梨園の秋」（『台湾新民報』1936 年）、「淡水河の漣」（『台湾新民報』1939 年）も作品として面白い。随筆「初秋独嘯」（出典不明）では「淡水を見ない者は、フオモサを見ない者だ」と言い、「詩の中の夢現実的の夢」（出典不明）でも淡水を讃美している。王昶雄文学の最大の特色は、淡水との関わりが深いところにあると言える。妻の林玉珠もまた淡水の人で、画家として活躍し、淡水の風光を多く描いてきた。

王昶雄の作品はこれまで、小説「奔流」以外はほとんど読めなかった。彼の没後すぐに台湾で『王昶雄全集』編纂事業[注 2]が始まり、その過程で膨大なスクラップ帳の貼り込みから幾編かの小説や随筆等が発見された。しかし、新聞発表のもののほとんどは発表紙も発表年月日も不明のままである。また、紙質等の関係で印刷不鮮明であったり、欠損部分があったりで、判読できない箇所も少なくない。特に新聞に発表されたものにその傾向が強く、しかも誤植も多い。小説「淡水河の漣」「梨園の秋」、随筆「初秋独嘯」での欠損部分の多さは実に残念なことだ。

加えて、王昶雄には今なお未見の作品が少なくない[注 3]。それがため、王昶雄の文学世界を論ずるには制約があって、どうしても限定的にならざるを得ない。

初期の二つの短篇小説－「梨園の秋」「出戻り娘」

王昶雄の初期の作品で現在読むことのできる短篇小説は「梨園の秋」「出戻り娘」の 2 編である。日本大学予科文科（二年制）から法文学部文学科（三年制）に在籍して時代に書かれた作品で、完成度は低く、どちらかというと習作のレベルでしかない。

「梨園の秋」は 1936 年に執筆、『台湾新民報』に発表された短篇小説（処女作）である。同時期の『台湾新民報』は現存しないが、王昶雄自身による切り抜きスクラップ帳で読むことができた。しかし、発表の月日は不明。『台湾新民報』には 6 回に分けて連載されたようだ。

「梨園」とは、そもそも「俳優の世界」「演劇界」を意味する。物語は旅役者一行の淡水での巡業、その生活ぶりを描いたものである。秋の長雨に降り込まれて観客の少ない興行にすっかり意気消沈した一座、ヤクザの登場あり、色恋沙汰あり、といった舞台裏を描き、芸人の失踪そして死と展開していく。作品は、旅役者の演ずる田舎芝居と同様に、大衆受けする筋立てである。

王昶雄自身、随筆「創作とヒント」（『暁鐘』第 11 号、1940 年）のなかで、この作品について次のように語っている。

> 数年前京都の片田舎の或る小駅の前を通つた時のことであつた。秋風が身に沁みる上に、その日は陰気な雨がしよぼしよぼと降つて居た。その小さな駅の軒下で雨を避けて居るのか、汽車を待つて居るのか、二十人位の旅役者達がふと私の目に映つた。腰かけて居る者、立つて居る者、彼等は言葉を交はす気力さへ失つたのであらう。唯黙々として淋しく降りつゞく雨の音に耳をすまして居た。世紀末な頽廃色とも云ひたいやうな面々 ── 行きなやむ漂泊者らしいやるせない歎息がもれて来さうに感ぜられて仕方がなかつた。旅役者と秋雨 ── これだけでも私の感傷を浚るに充分だつた。転々として極まりないこれらの世界の儚い姿は、私の創作欲を異常に駆り立てたのである。題して梨園の秋 ── 後で知人達から、「馬鹿に暗い小説だね。」などと云はれたが、これは或はその時の印象が余りにも暗かつたせゐかも知れない。これが私の処女作であつた。

日本内地の旅役者と秋雨を、台湾芝居の役者と秋雨の話に再構築して、さらにミステリアスな展開に持っていったところ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と言えよう。欠損部分の多いのが惜しまれる。

「出戻り娘」も『台湾新民報』に発表された短篇小説だが、発表の月日は不明。文末に「一九三七、五、卅一」とあるところから、1937 年 6 月ごろの発表と推察される。

物語はこうである。木賃宿「興安館」の娘「琴花」は夫と離縁して実家に戻っていた。なかなかの働き者で、「興安館」をよく手伝い、愛嬌もあって若者たちの評判も高かった。再婚希望を捨てきれない琴花は、泊り客の「高啓川」というヴァイオリン弾きの薬売りに心惹かれ、やがて彼の求婚の言葉に頷く。ところが、新荘郡五股庄に住む啓福がその兄だと知って、琴花は大きな衝撃を受ける。なんと、好きになった男が、離縁した前夫だったからだ。

作品の構造は単純で、内容も薄く、習作の域を出ていないが、コントとしての面白さがある。

この 2 作品のレベルでは、作家としての一定の評価をほとんど受け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かろうか。

作家としての挑戦－「淡水河の漣」

「淡水河の漣」は、「新鋭中篇創作集」の一篇として、1939 年に『台湾新民報』紙上に 33 回にわたって連載された。この「新鋭中篇創作集」は、『台湾新民報』文芸部にいた黄得時の企画によるもので、翁鬧「港のある街」、陳華培「胡蝶蘭」、呂赫若「季節図鑑」、王昶雄「淡水河の漣」、張文環「山茶花」、龍瑛宗「黄夫人の戯画」の 6 編があげられている。この 6 編のうちで読むことができるのは、現在のところ、王昶雄「淡水河の漣」、張文環「山茶花」の 2 編しかない。当該紙の『台湾新民報』が現存していないためである。この「淡水河の漣」もまた、「梨園の秋」同様に、王昶雄自身による切り抜きスクラップから発見された。残念なことに、発表の詳細な月日は不明、そのうえ欠損部分がある。

連載予告での「作者の言葉」として、王昶雄は次のように語っている。

> 淡水河の河畔に生れ育てられて、この河は如何に私を夢の国へと誘ひ、如何に数多くの幻想を与へてくれたことか。この懐しい河を描いたのが[ママ]、大袈裟に云へば、少年時代からの一つの大きな念願でつた[ママ]。（中略）私は狼のやうな貪欲な人間と、鳩のやうな柔和にして実直な人間との闘争をテーマに、抗すべからざる宿命を描きたいと思ふ。そしてその中に青年男女のはかない恋をも挿入するのを忘れて居ない。

また、随筆「創作とヒント」のなかで、王昶雄は次のようにも語っている。

> この小説のヒントは、ムーラン・ルージュの「柳の村から桃の里へ」と題する短劇から得たのであるが、渡し守を生業とする親爺が倅に代つて日頃の怨みを晴らさんとて、その仇人を乗せた舟を河の真中まで漕いだ[ママ]途端に、これを覆へすシーンがあるが、この場は頗る印象的で、かなりに私の心を打つたのである。劇では親爺がとうとう一身を犠牲にしたが、首尾よく報復を遂げたといふハーピー[ママ]エンドに終つて居るが、私はその親爺を死なせた上に、最後をも悲劇に終らせた。私の生来の甘い感傷が、こゝにも徘徊して居るわけである。

挿画は中村敬輝が担当した。中村敬輝は本名「陳敬輝」といい、改姓名した台湾人である。陳敬輝は 1911 年 4 月に新店に生まれ、32 年 3 月に京都絵画専

門学校を卒業、そして台湾に戻って淡水中学校並びに高等女学校で教鞭をとっていた。台湾で最も権威ある美術展「台展」にも数回特選を受賞している。「淡水河の漣」の挿絵を担当する画家として最適な起用だった。

淡水河での渡し船を生業とする貧しい胡温と阿川親子を中心に展開する「淡水河の漣」は、阿川の幼馴染の彭明珠が女学校を卒えて淡水の八里庄に戻ってくるところから始まる。阿川と明珠の交際は急速度で深まっていくのだが、父親の胡温は、２人の恋愛に反対だった。阿川には童養媳素英と一緒にさせようと考えているからだ。だが、本当は阿川の祖父母が明珠の祖父の策謀で非業の死をとげたためであり、それがため胡温が彭家に対して恨みを抱いているからだった。もちろん素封家にのし上がった明珠の両親にしても、娘の明珠が貧しい阿川と付き合うことには猛反対だった。そこで、明珠を早く嫁がせようと、町の有力者の息子で、東京の大学を卒業した石文淇との縁談を進める。

明珠にしてみれば阿川に未練があるものの、両親の勧めと、気障な石文淇の外見に魅かれ、結局文淇との結婚を選ぶ。そして、明珠は阿川に交際解消の手紙を書き、あっさりと阿川を棄てる。傷心の阿川のところに、明珠の父親子安がやってくる。婚礼の渡し船を阿川に是非漕いでもらいたいと言われ、阿川は耐えがたい屈辱と憤怒を覚える。その阿川の心中を理解している父温は、そのとき病床に就いていたが、自ら漕ぎ手を買って出るのだった。これまでの怨念をこの際晴らそうという決意を抱いたのである。折しも天候が急変し、新郎新婦双方の父親を乗せた温の船は激しい風雨に妨げられて、結局淡水河の中ほどで沈没してしまう。

明珠は文淇と結婚したものの、文淇の母親から冷遇され、また文淇の道楽に悩まされることになる。いっぽう、明珠に棄てられ、父を失った阿川は、間もなく素英を妻に迎え、貧しいながらも幸せで穏やかな生活を送る。渡し舟の沈没事件から８ヶ月が経ち、妊娠し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明珠は、姑によって強引に離縁させれて実家に帰されることになる。明珠の結婚は不幸な結果に終り、これ以後彼女は寂しく辛い人生を送ることになるのだった。

強健な身体の持ち主である阿川は、軍夫を志願する。いよいよ出動という1937 年 9 月、前日に阿川は、素英と、生まれて５ヵ月の息子とともに、観音山の墓地に眠る胡温の墓に参る。墓前に跪いて阿川は「晴れの征途に上ることが出来ました。いよいよ明日出立いたします。阿川は男の名にかけても、男として皇国に対する最大なる責務を果たして来ようと思ひます。―死はもとより覚悟の前です。どうか喜んで下さい」と報告する。

この小説は、1930 年代の淡水の風光を織り交ぜながら、新聞連載小説という、不特定多数の読者を対象とし、一回ごとの分量的な制約のなかでメリハリをつけてよく纏め上げていると思う。芝居好きの王昶雄らしい、戯曲的な展開

を見せている作品だ。王昶雄自身、この作品への読者の反応は芳しくなかったと述べている[注4]が、私としては悪くない作品と思っている。

物語の展開は、国木田独歩（1871-1908）の小説「運命論者」を引き合いにして、明珠の祖父による阿川の祖父母への策謀、それがために胡温の抱く彭子安への敵愾心、それでいて三世代目にあたる阿川と明珠との恋愛には運命的なものがあるとする。また、明珠が阿川に送った恋愛解消の手紙に「この際お別れした方が、お互ひに仕合せではないかと思ひます。ほんとうにすべてが運命だと諦めて頂戴ね」と、運命的な決着をつけることで阿川に理解を求めようとし、明珠も自分自身を納得させようとする。彭子安への復讐を船の転覆をもって果たす胡温の覚悟、姑から冷遇され夫の理解を得られずに結局離縁させられてしまう明珠の不幸、いずれも運命というものである。人と人との関係を「運命」という軸で考えることは単純かつ一面的ではあるが、いっぽうではわかりやすい論理である。この小説はムーラン・ルージュの「柳の村から桃の里へ」にヒントを得て執筆したとあるが、その短劇を観ていないので私にはわからない。しかし、「淡水河の漣」のなかに独歩の「運命論者」を引いて、「この大海の一粟にも足らない孱弱い人間はいつの世に於ても運命の波の間に間にもまれて、抗する気力のないことだけは慥かである」と述べている。作品の根底に流れているのは、国木田独歩の小説「運命論者」での、「運命」に縛られそこから逃れることのできない人間の生き方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言えよう。

国木田独歩の小説「運命論者」は、主人公信造の出生の秘密が本人の口から語られる話である。信造は馬場金之助の子として生まれたが、母親の「お信」がまだ馬場の籍に入らないうちに亡くなり、しかも出生届を出してなかったので、懇意にしていた大塚剛蔵（東京控訴院の判事）が引き取って自分の子として届けられたのだという。だが、その後信造が馬場家の墓所を訪ねたところ、老僧の話から、お信が金之助の病中に乳飲み子を置いて男と駆け落ちしたこと、金之助が死に際にその子を大塚剛蔵に託したことを知る。法学部を卒業して弁護士となった信造は、仕事の関係で雑貨商を営む高橋梅と縁ができ、やがてその一人娘の里子と結婚し、高橋姓を名乗ることになる。梅には狂信的なところがあって、不動明王を拝み、何時間も呪文を唱えたり、怪しげな神符を居間のあちこちに貼りだしたりする。ところが人生は皮肉なもので、高橋梅は実母、里子は父を異にした妹だったことを信造は知る。信造は、実母に対して「父を瀕死の際に捨て、僕を瀕死の父の病床に捨てゝ、密夫と走つたことを思ふと、言ふべからざる怨憤の情が起る」のだが、「生の母は父の仇です、最愛の妻は兄妹です。これが冷かなる事実です。そして僕の運命です」と沈鬱な思いに陥るのだった。

「運命論者」は創作ではあるが、実は国木田独歩自身と重なってくるものがある。独歩の戸籍は養子、庶子、嗣子と３度も書き換えられていったし、佐々城

信子との結婚ではその母親の強い反対にあった。母親は娘時代には男装して仙台の街中で馬を乗りまわしていたというように、相当に気の強い女性だった。独歩は、１年間東京に住まないこと、佐々城家と絶縁することなどの条件のもとに信子と結婚した。ところが、信子も母親譲りの性格の持ち主だったようで、その信子との新婚生活は半年も経たずして信子の失踪で終わりとなる。離婚後に信子は独歩の子を出産するが、その赤子は信子の両親の四女として出生届が出され、佐々城家に迎えられることなく、３週間後に産院からそのまま他所に預けられる。独歩がその事実を知るのはずっと後のことである。

「淡水河の漣」での阿川や明珠の出生にはなんの問題も秘密もないが、祖父、父、そして当人たちの運命的な繋がりは「運命論者」に登場する人物と重なってくるものがある。「運命論者」の最後で信造は「人の力を以て過去の事実を消すことのできない限り、人は到底運命の力より脱るゝことは出来ない」と、諦観した運命観を述べている。それは「淡水河の漣」での、祖父の代からの敵対関係、それを清算するためにとった胡温の彭子安への復讐、明珠からの一方的な交際解消の通告、明珠に対する姑の冷遇と夫の無理解、幸せを摑んだはずの明珠に与えられた掣肘ともいうべき離婚、という作品構成に反映しているように感じられてならない。

王昶雄にとっての小説「淡水河の漣」は、読者の批判を受け、試練を味わうことになった作品ではあるが、運命に縛られた人間を描き出そうと、作家としての挑戦に臨んだ作品なのである。

しかし、結末の部分、つまり阿川が軍夫に率先して志願する点については疑問を覚える。それを、王昶雄が皇民化政策に寄り添っているいないという意味で捉えるのではない。物語を収束させるに、突然軍夫の話を持ち出したことが不自然なのである。一家の貧しい生活を支えるのは阿川しかいないという境遇なのに、素英と乳児を置きざりにして戦陣に赴こうとすること、その２人の生活を老いて貧しい素英の両親が面倒を見てく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と安心していること、そのことが果たして現実問題として可能なことだろうか。しかも、軍夫とはいえ、戦線にさらされるわけだから、生きて帰ることが保証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もない。物語を収束させるに、王昶雄は配慮のない、現実性に欠く、強引な方法をとったという印象を拭い去れないのである。

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

「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は、『台湾日日新報』1940 年 2 月 14 日から 3 月 12 日にかけて、24 回にわたって連載された。内容は 1「国劇を愛せよ」から始まって、2「起源と沿革」、3「劇場と舞台」、4「歌舞伎の役柄」、5「女形芸術礼讃」、6「歌舞伎の扮装」、7「支那劇の扮装」、8「演出と表現法」、9「歌

舞伎の音楽」、10「支那劇の音楽」、11「歌舞伎の脚本」、12「支那劇の脚本」、13「芝居番組の構成」、14「二つの交流」、15「団十郎と梅蘭芳」、16「歌舞伎の名優」、17「支那劇の名優」、18「歌舞伎の鑑賞法」、19「私の歌舞伎観」、20「支那劇の観賞法」、21「支那の芝居気分」、22「支那劇と国民性」、23「古典劇の将来」と続き、結びは「演劇の本体を」となっている。京劇と比較しながら歌舞伎の良さを述べた長文の研究である。

随筆「創作とヒント」には、「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を執筆するにあたって「初め半月分しようと思つたが段々調べて行く中に材料が次から次へと出て来て、とうとう廿四日分になつて仕舞つた」こと、激励や賞賛の手紙がたくさん寄せられて「相当な評判をとつた」ことが記されている。

小説「鏡」の冒頭部分が演劇を鑑賞する場面であることからも、王昶雄は相当の演劇好きである。王昶雄自身も「歌舞伎に対する愛好熱と異常なる関心を抱いて居る点に於ては人語に落ちないと信ずる」(「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 19－私の歌舞伎観」) と述べている。また、「梨園の秋」は台湾芝居の一座の生活を描いたもので、これもまた幼少時から王昶雄の好む世界であった。この「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は、歌舞伎と京劇・台湾芝居を比較させながら、その両者の演劇世界を読者にわかりやすく紹介するものである。

日本での歌舞伎や京劇等に関する書籍はかなり多い。王昶雄は「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を書くにさまざまな文献に当たっている。文中では、かならずしも参考した書名や著者が書いてあるわけではない。むしろ、明記されていないことのほうが多い。したがって、まだ全容はつかめないが、判明できたものは、各章で次のようになっていた。

1「国劇を愛せよ」吉見廣勝『作品名未詳』

2「起源と沿革」　飯塚友一郎『歌舞伎概論』博文館、1928 年 9 月

3「劇場と舞台」　関根只誠『東都劇場沿革誌』珍書刊行会、1916 年 7 月

4「歌舞伎の役柄」飯塚友一郎『歌舞伎概論』博文館、1928 年 9 月

5「女形芸術礼讃」飯塚友一郎『歌舞伎概論』博文館、1928 年 9 月

春柳舊生『梅郎評』

6「歌舞伎の扮装」飯塚友一郎『歌舞伎概論』博文館、1928 年 9 月

7「支那劇の扮装」－

8「演出と表現法」飯塚友一郎『歌舞伎概論』博文館、1928 年 9 月

9「歌舞伎の音楽」飯塚友一郎『歌舞伎概論』博文館、1928 年 9 月

10「支那劇の音楽」辻聴花『中国戯曲』順天時報社、1925 年 1 月訂正改版

田辺尚雄『作品名未詳』

11「歌舞伎の脚本」　飯塚友一郎『歌舞伎細見』第一書房、1926 年 10 月

12「支那劇の脚本」辻聴花『中国戯曲』順天時報社、1925 年 1 月訂正改版

13「芝居番組の構成」　－

14「二つの交流」　七理重恵『謡曲と元曲』積文館、1926 年 3 月

『新修国文学史』

15「団十郎と梅蘭芳」　－

16「歌舞伎の名優」　－

17「支那劇の名優」王夢生『梨園佳通』　正しくは『梨園佳話』商務印書館、1915 年

18「歌舞伎の鑑賞法」　三宅周太郎　＊『演劇巡礼』中央公論社、1935 年 5 月か？

19「私の歌舞伎観」　－

20「支那劇の観賞法」　王夢生『梨園佳話』

21「支那の芝居気分」　－

22「支那劇と国民性」　石橋丑雄「未詳」(『中央公論』に発表）

23「古典劇の将来」　藤田徳太郎「未詳」

24「演劇の本体を」　永持静香「未詳」、新居格「未詳」

＊下線のあるものは文中で明記されている人名や書名

このことからわかるように、王昶雄はこの「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を執筆するにあたって、飯塚友一郎（ともいちろう）の著書『歌舞伎概論』を最も多く参考にしたことになる。本文の引用や要約をするばかりか、新聞に添えるために挿絵「澤村京十郎と瀬川菊之丞」「歌川国政筆の女形」も同書から借用している。

飯塚友一郎（1894－1983）は東京に生まれ、1919 年に東京帝国大学法学部を卒業した。約 10 年間弁護士を開業する。その傍ら、『歌舞伎細見』『歌舞伎概論』などを上梓して、歌舞伎の生成発展、演出様式、歌舞伎狂言の整理、解説など、学問的な分析、研究を施した。1932 年以降は、日本大学芸術学部の教授となり多くの後進を育成し、さらに二松学舎教授にもなる。30 数冊の著書、訳書

があり、日本に演劇学の基礎を築いた功績は大きい。なお、飯塚友一郎は坪内逍遥の女婿でもあった。

『歌舞伎細見』（第一書房、1926 年 10 月）は 1250 頁に及ぶ大著で、これまで上演された歌舞伎狂言を「仇討狂言編」「御家騒動編」「縁起霊験編」など 11 編に大きく分類し、さらに 275 種に細分化する分類法を提示した。『歌舞伎概論』（博文館、1928 年 9 月）は 730 頁に及び、歌舞伎の成立、歌舞伎の鑑賞、歌舞伎役者の生活、女形芸術、劇場の構造、花道の効用、歌舞伎の様式、演出法、舞台装置、扮装法、劇場音楽、歌舞伎の将来など、歌舞伎のあらゆる項目について精緻な研究をした。両書とも歌舞伎の研究書としては当代一と思われる。

したがって、王昶雄が「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を執筆するに飯塚友一郎の著書を参考にしたことは適切な選択だったと言えよう。むしろ専門書である飯塚友一郎の大著を活用することで、読者に歌舞伎を解りやすく説いたのが「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であった。

また、王昶雄は辻聴花『中国戯曲』も参考にしている。辻聴花（本名は武雄、1868－1931）は熊本県に生まれ、1898 年に慶応義塾大学を卒業した。中国に渡り江蘇師範学堂や江南実業学堂で教鞭をとるが、1912 年に「順天時報」の招きで北京に移り、以後本格的に京劇を研究するようになる。京劇の脚本『蘭花記』、研究書『中国戯曲』を著すが、31 年に北京で死去した。

王昶雄自身、京劇が好きだったし、歌舞伎にも魅了されていたので、これらの書籍を読むことで彼は「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を書き上げた。王昶雄の歌舞伎や京劇に対する思いは深い。

> 私は元来俗に云ふ新劇や新派よりも純粋の古典劇に、より深い興味を持つて居る。だから歌舞伎とか支那劇とかに対して、心の底からの愛着を感じて居る。（9「歌舞伎の音楽」）

> 私は決して歌舞伎通ではない、また歌舞伎通たることを夢見たこともない、いやそれどころか、一介の門外漢である。唯歌舞伎に対する愛好熱と異常なる関心を抱いて居る点に於ては、人後に落ちないと信ずる。私は歌舞伎の或る劇を観てから、歌舞伎のみが持つ独特の妙味に魅せられて了つた。私は役者の台辞を真似たり、脚本を乱読したり、果ては長唄や義太夫を唸つたりし出したのは其の後である。勿論その一つ一つは悉く未完成のままに終つたのであるが。
>
> 歌舞伎を観て先づ第一に感じ得た事は、劇そのものの品のよさである。この点阿鼻叫喚のやうな騒々しい音楽を中心にした支那劇とは隔世の感がある。優雅そのものの音楽といひ、出て来る人物の落着き払つた縁起といひ、登場人物と雰囲気とによく調和した背景の見事さといひ、日本の総

合芸術の精粋だと云つても決して過言でないことを知る。（19「私の歌舞伎観」）

王昶雄がこの「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を書いたことは、王昶雄にとって有益なことだった。王昶雄は「創作とヒント」の中で語っている。

この一作を物したお蔭で、一番大きな収穫はと云へば、作家がものを書く時の調べ方が分かつた事だつた。

つまり、たくさんの文献を読みこなしたことが、後の代表作「奔流」を生む原動力となったようだ。

代表作「奔流」

「奔流」は、張文環の強い勧めで『台湾文学』第 3 巻第 3 号（1943 年 7 月）に発表した中篇小説で、王昶雄の代表作である。

主人公の「私」は医学生としての東京生活を送った後、父親の急逝に遭い、その医院を継ぐために台湾に戻った。そして、中学校の国文科教師「伊東春生（はるお）」と親交を結ぶことになる。伊東春生は、もともとは台湾人「李春生（シュンセイ）」であるが、自分が台湾人であることを極度に嫌っていた。伊東は、内地人の妻と結婚して、「内地人」として振舞っていた。

「私」は 10 年間の内地生活を回想する。「私」は一人の日本人女性との恋愛を通して、生花や茶道を理解し、着物や日本髪に愛着を抱き、能や歌舞伎に心酔することができた。「私」は「純然たる内地人になりすまねば気が済まなかつた」のだ。だが、日本人女性と結婚して台湾で暮らすことへの躊躇から、結局「私」は彼女と別れることを選択してしまった。ところが、「伊東」は日本人女性との結婚を実行し、生活面でも精神面でも完璧な日本人であろうと努めるのであった。それは台湾人の実母の訪問に邪慳な態度をとり、実父の病床や死去に対しても冷然としているという徹底ぶりであった。

「私」にはそんな伊東の心情が、自分も内地にいたときに台湾人だと見透かれまいと絶えず神経を尖らせていた体験を思い出して、人ごとならず理解できるのだった。そのいっぽうで、「内地人」に成りすましたつもりで得意然としていて、いよいよ化けの皮がはがれるとリスのように逃げまわっていた「私」は、自分を卑屈な男と認めざるを得ず、「それは明らかに台湾そのものを卑下してゐる証左ではないか」と気づくのだった。だから、「私」は、日本人以上に完璧な日本人であろうとする伊東に対して責めることのできないものを覚える。

小説「奔流」は、内地人と同等に扱われたいと努力する伊東の心情の内面を

掘り下げるとともに、その対極線上に甥の「柏年」を配置して、台湾青年の深刻な悩みに迫った作品でもある。柏年は、台湾人であることを払拭しようする伊東の生き方に強い反発を持ち続けていたが、台北州の剣道大会で優勝したことを契機にして、内地の武道専門学校に進学する。それは伊東の経済的援助によるものだが、当の柏年はそのことを知らない。柏年は「私」に手紙で「立派な日本人であればある程、立派な台湾人であらねばならない」と強い覚悟を伝えるのだった。台湾人青年が避けることのできない精神面での二重性に焦点をあてて、その克服に敢然と立ち向かおうとするのである。

決戦下の緊迫した時代、皇民化運動盛んな社会状況の中で書かれた「奔流」は、伊東春生や柏年の壮年青年世代が、植民地台湾にあって、「日本人」として運命づけられた人生をどう生きていくか、その奥底で「台湾人」とし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どう維持していくかを問うている。まさに、王昶雄文学の傑作と言えよう。

埋もれていた小説「鏡」

「鏡」は、400 字詰めの原稿用紙 134 枚に書かれた短篇小説である。清水書店から小説集『鏡』（台湾文学叢書[3]）として、この「鏡」を代表作として収録のうえ、1944 年中には出版の予定だった。その近刊予告が、台湾文学奉公会刊行の『台湾文芸』第 1 巻第 2 号（1944 年 6 月）に出ている。しかし、同書の出版は実現せず、「鏡」は発表の機会を逃したまま長いこと埋もれていた。戦局の悪化に伴う印刷用紙等の欠乏が小説集『鏡』の出版を妨げたのであろう。

「鏡」は、東大法科に在籍する台湾人学生「洪秋文」と、7 歳の時に台湾の両親の許を離れて東京の叔父の家に居候して 15 年になる女子大生「江馬哲子」との恋愛、そして悲恋の物語である。東大を卒業し高等文官試験にパスした洪秋文は、台湾に帰郷してすぐに、澳底にある哲子の家を訪ねる。蘇澳の女学校の教員となっていた哲子は修学旅行の引率であいにく留守だったが、哲子の両親は気さくな人で、秋文の突然の訪問を歓迎してくれた。秋文が哲子との恋愛の一件をどう切り出そうかと思案していると、哲子の母親から「やつぱり洪さんには、郷里の女が一番いゝですわね。何でしたら、わたし一つお世話しませうかしら？」と先手を打たれる。この言葉を聞いて、哲子との結婚はとうてい許してもらえないことを悟った秋文は意気消沈する。それでも哲子への恋慕を棄てきれない秋文は、哲子の修学旅行先の旅館を訪ねるのだが、行き違いで会えない。間もなく、秋文のもとに、哲子からの長文の手紙が届く。それには、思いがけないことに、秋文との恋愛を解消したい旨が綴られていた。秋文は、失恋の痛手を癒す意味で、これを機会に台湾を離れ、母を伴って満州に行く決意をするのだった。

台湾人と日本人とが恋愛関係にあっても、結婚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現実には外的障害や内的障害が立ち塞がっていることを、王昶雄は落ち着き払って淡々と書き綴り、味のある作品に仕上げている。

清水書店の台湾文学叢書は、[1]が坂口ﾚｲ子の『鄭一家』(1943年9月)、[2]が呂赫若の『清秋』(1944年3月)で、どちらも評判のよい小説集であった。清水書店は楊逵も認める良書出版社だけに、小説集『鏡』が台湾文学叢書[3]として出版されていたとしたら、王昶雄はさらに注目を浴び、作家としての評価もかなり高まっていたことであろう。

冒頭は秋文と哲子が有楽座で芝居を観るところから始まる。杏花戯曲十種の中の『新宿夜話』[注5]、そしてメインは坂東蓑助[注6]が演じる新国劇『白野弁十郎』[注7]である。その内容がかなり詳しく綴られていて、王昶雄の芝居好きがここにもあらわれている。

しかしこの小説「鏡」でも、王昶雄は作品を終息させるにあたって、主人公秋文が哲子から一方的に交際断絶の手紙を受け取り、その傷心の痛手から台湾を離れて満州に行くとする場面展開をはかる。「淡水河の漣」での阿川に通じる、失恋と、軍夫となって戦地に赴く終盤と似通った展開である。もっとも、阿川が軍夫を志願したのは積極的な行動だが、秋文が満州に行こうとするのは消極的な動機という違いはあるが、秋文の満州行きは唐突の感がしなくもないが、王昶雄には縁あることであった。というのも、郁文館中学入学時の保証人となった王昶雄の叔父「洪利澤」が、中央大学法学部を卒業し、高文試験に通り、南満州鉄道に就職が決まって満州に渡っているのである。だが、読者としてはあずかり知らぬことだけに、物語がこうした満州行きという形で終結を迎えたことは中途で置き去りにされた感じだ。原稿段階での小説だから、出版するまでの推敲で内容変更もありうるだろうが、この原稿段階では終結の仕方として無理があるという印象を抱かざるを得ない。

王昶雄文学の一つの傾向

ａ・演劇や舞踊への関心の深さ

処女作「梨園の秋」は旅役者一行の淡水での巡業を扱った作品だ。「淡水河の漣」では、村で「祝英台」の芝居がかかる場面が描かれている。「奔流」では、日本内地で交際していた恋人の影響で「能や歌舞伎に心酔することが出来た」とある。「鏡」の冒頭部分では主人公秋文が哲子と有楽座で『新宿夜話』『白野弁十郎』を観劇する場面に多くが割かれている。なんといっても長文の「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という研究がある。

王昶雄はまた、現代演劇にも関心があり、「厚生演劇研究会」の公演を観劇

して「燃え上る情熱－厚生演劇の公演を観る」(『興南新聞』1943 年 9 月 13 日）を新聞に寄せている。その中で、林博秋演出、呂泉生指揮の「高砂館」(原作・林博秋）と「鬮鶏」(原作・張文環）を高く評価している。ことに「鬮鶏」に関しては、役者の演技は「絶賛に値する」「出色の出来」であるし、「郷土色を十二分に出して、これを活かしてゐる点」が劇として成功をおさめていると述べ、呂泉生の音楽効果に対しても「劇の流れをよく理解したもの」と高い評価を与えている。

さらに、同じ淡水出身の舞踏家林明徳にも強い関心を抱いていて、「舞踏家の友に」(『台湾新民報』1940 年 10 月 11 日）、「東洋的幻想の追求　林明徳氏の新作舞踊を中心に」(『興南新聞』1942 年 7 月 13 日）「舞踏界の鳳雛－淡水が生んだ林明徳君」（出典不明）で彼のことを度々取り上げている。

王昶雄の作品と演劇とはこのように深い繋がりがあり、歌舞伎や新国劇、京劇への彼の関心の強さが伺える。と同時に、小説の展開は演劇的構成で悲喜こもごも 緩急あって 興味を惹きつけるところがある。どの作品の構成もまた、観客を飽きさせないと同様に、読者を惹きつける演劇的手法、演劇的展開を取っている。

ｂ・台湾人としての苦悩

「淡水河の漣」は、真杉静枝や龍瑛宗に刺激された王昶雄が内地に向かう船の中で草稿を錬った作品である。淡水への懐旧の念が高まって書いたようだ。「淡水河の漣」での胡阿川は、画才ある人物で、物語の最後では淡水河の渡し舟稼業から脱して新たな生き方に飛躍しようとする。軍夫ではあるが、一日本人として対等に生きようという意志だろうか。「奔流」は、東京の医大を卒業した「私」が、故郷淡水に戻って、鬱々とした生活の中で伊東春生と柏年と知り合ったことが縁になり、日本精神を持ちつつも台湾人としての生き方に開眼する話である。「鏡」は、東大出で高等文官試験に通過したエリート青年秋文が、台湾人であるがゆえに日本人女性との恋愛を成就させるに外的にも内的にも障害があることに悩む話である。舞台は内地から台湾へ、台湾から内地へ、そして戦地に、満州に至らんと、己の居場所を求めて流浪する。

王昶雄は、「武士道と義士精神」(『興南新聞』1943 年 1 月 18 日－25 日）で、赤穂義士を通じて「日本国民の性情の奥深く潜んで居る徹底性と隠忍性」の分析を試みている。「石田三成と王安石」(『興南新聞』1943 年 5 月 24 日）では、三成を「強い信念に徹した人物」と評価し、王安石を「鉄壁のやうな意志を以て自分の信ずる所を断行」した堅固な人物と評価し、「彼等を弁護し曲筆を是正し、直筆して人々の史眼を開く」のだと述べている。自分を支える強さを赤穂義士や石田三成、王安石に求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代表作３編はいずれも生活行動や精神としての二重構造、つまり台湾人とし

て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失うことなく、日本精神をどう自分の中に取り込んでいくべきか、という生き方を模索することを問題にしている。台湾人である己を棄てて盲目的に日本人になりきろうとするわけではない。

c・王昶雄の戦争賛美

王昶雄文学の最大の特色は郷里「淡水」との繋がりが深いということだが、さらに無視できないものは、小説ではそうではないのだが、詩や随筆のなかに戦争讃美に繋がりかねない作品が幾篇か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たとえば、詩「いざ勝抜かん」(『興南新聞』1942 年 3 月 2 日)では、皇国日本「一億の民」が一丸となって、敵陣を撃つべく進軍し、この大戦に勝ち抜こうと檄を飛ばす。詩「海の志願兵を讃ふ」(『興南新聞』1943 年 9 月 6 日)では、海軍志願兵制度が施行されるにあたって、「撃ちてしやまん」の覚悟で台湾青年の志願を煽る。「嗚呼！サイパン島」(『台湾芸術』第 5 巻第 8 号、1944 年 8 月)では、サイパン島を死守して玉砕した将兵を讃辞し、いずれは敵軍を撃滅して仇を取るのだという決意を述べる。

随筆「出征せる友へ」(『台湾新民報』1940 年 10 月 8 日)では、「嘗ては教壇に立つて、可憐な公学校児童を薫陶して来た君が、今では支那大衆に向つて、堂々正義日本の真の姿を説き、東亜新秩序の建設を叫んで居る」のを「羨望の念を抱かずには居られない」と記している。随筆「大なる創造」(『興南新聞』1943 年 11 月 30 日)では、東亜諸民族は今や「鬼畜となんら違はない米英を共同の敵として戦つてゐる」、「我々は最後の勝利を得るまで、断じて矛を収めない」とある。随筆「大いなる進軍」(『台湾時報』第 296 号、1944 年 9 月)では、「いつでも死ねる」、「矢でも鉄砲でも持つて来い」と意気を高揚させ、「本島青年は、既に自己の内に潜む日本精神の息吹を感じ、大和魂の高鳴りを覚え、一気に悟道の境地にも似た純一にして清澄なる心境になり切ることを得た」と述べる。

ここに挙げた詩や随筆は、いずれも皇民奉公運動を側面から支える色彩が強く、戦意高揚を謳っている。だが、こうした傾向は王昶雄一人に限ったことでなく、一部の例外はあるものの、この時代の台湾人作家に見られる傾向でもあった。それは政策的なペースで展開された皇民化運動に台湾じゅうが覆い包まれていたために、作家たちもまた総動員させられるという不幸の所産であった。したがって、王昶雄の作品一部を取り上げて、偏った評価を下すことは厳に慎ま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かも、前にも触れたように、王昶雄にはまだ未見の作品が幾つもあるわけなので、慎重に検討していかねばならない。表面的には戦争賛美で当時の国策を喧伝しているが、それが本心なのか否かは未見の作品のなかにヒントがあるかも知れない。

最後に

以上のことから、王昶雄が求めたものは、日本精神を認め受け入れつつも台湾人としてどう生きるべき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た。決戦下という時代の潮流に翻弄されながら、時として皇民化運動に巻き込まれることがあっても、王昶雄の課題は自分を現実社会と対峙させ、自己認識を確かなものにすることだった。「淡水河の漣」で阿川を軍夫にしたこと、「奔流」で柏年を内地の学校に入学させたこと、「鏡」で秋文を満州に行かせること、いずれも台湾人としての新たな生き方への模索であった。作品の結末をそう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ところにこそ、日本人・日本文化・日本精神をよく理解する台湾人王昶雄の、秘めたる苦悩が読みとれる気がするのである。

とは言うものの、現段階で王昶雄の文学世界を把捉することは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い。王昶雄文学を論じた研究も最近ではかなり目につくようになってきたが、未見の作品が多数あるという障害のため、小説「淡水河の漣」「奔流」「鏡」の３編を対象にするのがほとんどであって、そのため十分な研究成果をあげるに至っていない。もちろん、私のこの小論もその域を超えるものでないことは私自身がいちばん自覚していることである。未見の作品の発掘が王昶雄文学を理解する大きな要素となるだけに、その発掘に強く期待する次第である。

【注】

1 洪利澤（1910－？）は淡水の生まれ。27 年に中央大学に入学、33 年に同大学法学部を卒業した。高等官試験行政科に合格するものの、南満州鉄道に就職。その後、奉天市公署や遼寧省税務局の科長を歴任、台湾に戻って淡水の純徳女子高校で公民国文の教師になったり、台湾省政府の税務秘書官となる。（「台湾省級機関档案－洪利澤任免通知書」を参照）

2 『王昶雄全集』全 11 冊（台北県政府文化局、2002 年 10 月）の主編は師範大学の許俊雅教授。日本側では垂水千恵（横浜国立大学）と河原功が編纂に加わった。

3 『王昶雄全集』第 9 冊（台北県政府文化局、2002 年 10 月）所収の「王昶雄生平著作年表初編」、並びに「王昶雄自訂日治時期著作目録」（『文学台湾』2000 年 4 月）によれば、王昶雄にはまだ下記の短篇小説、現代詩、文芸評論があ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短篇小説……「二人の女性」（『台湾新民報』1937 年）、「さすらひ日記」、「ピエロの溜息」、「遠島」、「チンピラ物語」、「浜千鳥」、「ある壮士の死」、「へつぽこ野郎」、「阿緞の嫁入り」、「心の歳時記」、「緋桜の咲く頃」。

現代詩……「私の歌」（『青島』第 2 巻、1935 年）、「陋巷札記」（『台湾新民報』1937 年 9 月）、「樹風問答」（『台湾新民報』1941 年 4 月）、「海辺の回憶」（『興南新聞』1942 年 11 月）、「友よ、心せよ！」（『台湾芸術』1944 年 6 月）、「人の世」、「思ひ出」、「草山の四季」、「自画像」、「神木」、「かささぎとからす」、「鸚鵡返し」、「仮りた私が」、「北方から来たシスター」、「かかし」、「炊煙」、「秋の岬」、「お山の大将」、「戦雲たなびく」、「城堡」、「朝

の祈り」。

文芸評論……「文学における世界観と美の問題」、「文芸家の独創力」、「文学の精神と使命」、「文芸時評についての感想」、「伝記文学論」、「ドストエフスキーの作品」、「水滸伝の人物論」、「浮生六記のヒロイン陳芸」、「金聖嘆論」、「横光利一の『旅愁』」、「槙有恒のエツセイ」、「詩の典線美と含蓄美」、「史詩私見」、「英国における中国韻文研究」、「訳詩について」、「分りにくいヴァレリーの詩論」、「中国の民謡」、「女形の研究」、「歌仔戯の衰微を憂へる」、「舞台劇『閹鶏』を観て」、「林明徳の舞踏に寄せて」、「黄青廷の画と彫刻」、「杉森孝次郎の『文化の中国』を読む」。

4　随筆「創作とヒント」(『暁鐘』第 11 号、1940 年?月）に、「私は非常な抱負を以て臨んだが、『この作者は作家としての危機に直面して居る』とか何とか、散々こき下ろされた」とある。

5　杏花戯曲十種は、歌舞伎の近代化に尽くした二代目市川左団次（1880-1940、号は杏花）が撰した、高島屋市川左団次家のお家芸。『新宿夜話』はその一つで、『修善寺物語』『鳥辺山心中』とともに岡本綺堂の作。

6　六代目坂東蓑助（1906-1975）、後の八代目坂東三津五郎である。人間国宝。京都の料理屋でフグ毒に当たって急死した。文中では「簔(ママ)助」と誤記されている。文楽の人形師に吉田簔助がいるので、その「簔」と混同したのかも知れない。

7　「新国劇」は、1917 年に沢田正二郎が新しい国民演劇の創造を目標として作った劇団（坪内逍遥が命名）で、歌舞伎よりもリアルな立ち回りを多用した時代物で人気を博した。『白野弁十郎』は、額田六福が沢田のために『シラノ・ド・ベルジュラック』（17 世紀のフランスに実在）を翻案したもので、舞台を幕末から明治初頭に設定している。1926 年に邦楽座で初演されて大成功をおさめた。以来、『国定忠治』『月形半平太』『大菩薩峠』などとともに新国劇の看板演目として、大衆の支持を得た。文中では『白野弁十郎』を「狂言」(「能」とともに旧劇の一つ）としているが、正しくは「新国劇」に分類される。

【参考】王昶雄略年譜

1915 年　2 月 25 日、台湾淡水郡淡水街にて出生。本名は栄生。
1922 年　5 月、淡水公学校に入学。在学中に内地留学の希望を強くする。
1928 年　3 月、淡水公学校を卒業。成績優秀につき「郡守賞」「優等賞」等を受賞。
1929 年　4 月、台湾商工学校商科に入学。
1932 年　3 月、台湾商工学校を卒業。
1933 年　3 月、叔父の洪利澤を頼って上京。郁文館中学校４年に編入。
1935 年　3 月、郁文館中学校を卒業。4 月、日本大学予科文科（二年制）に入学。
1936 年　短篇小説「梨園の秋」（処女作）を『台湾新民報』に発表。
1937 年　3 月、日本大学予科文科を卒業。4 月、法文学部文学科（三年制）に進学。
1938 年　4 月、日本大学専門部歯科（四年制）に進学。

1939 年　中篇小説「淡水河の漣」を『台湾新民報』に連載。

1940 年　2 月から 3 月にかけて、「日本歌舞伎と支那劇の研究」を『台湾新民報』に連載。

1941 年　12 月、日本大学歯学科を卒業。

1942 年　4 月、淡水に「岩永歯科医院」を開設。

「東洋的幻想の追求」「科挙への狂態」「科挙と儒教」を『興南新聞』に発表。

「陳逢源氏の『雨窓墨滴』を読んで」を『台湾芸術』に発表。

張文環主宰の『台湾文学』（啓文社）に参加。

1943 年　6 月、林玉珠（画家）と結婚。

7 月、中篇小説「奔流」を『台湾文学』に発表。

11 月、『台湾小説集１』（大木書房）に「奔流」が収載される。

1944 年　小説集『鏡』を清水書店から台湾文学叢書[3]として出版予定だったが、未刊に終わる。

1946 年　8 月、淡水の純徳女子中学校の歴史教師に就任（4 年ほど在職する）。

1957 年　台北市中山北路に転居し、歯科医院を「照安」と改める。

1973 年　巫永福、劉捷、鄭世璠らと「益壮会」を成立。

1993 年　台北県立文化中心から刊行の「北台湾文学叢書」主編となる。

6 月、同叢書として『駅站風情』を出版。

1996 年　3 月、『阮若打開心内的門窻』を草根出版から出版。

2000 年　1 月 1 日、死去（病名は胃がん）

〔「王昶雄生平著作年表初編」（『王昶雄全集』第 9 冊に所収）を参照〕

淡水糕餅暨印模圖像之研究

周宗賢[*]、林詠翔[**]邱怡庭[***]、袁家玉[****]、薛宗銘[*****]

摘要

古老的糕餅店，對淡水來說也是一大特色，然而美味的糕餅除了是一種食物之外，還含有其深遠的文化意義。縱觀人的一生，許多事情都與糕餅有關連，例如：出生、結婚、喪禮以及各種廟會慶典皆須用到糕餅，由此可見，糕餅對於人的生活有著很大的關聯。

在此我們要探討的便是，在淡水人的生活中糕餅在各種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代表的意義，而這也能使我們更加的了解過去淡水人的生活情況及面貌。

關鍵詞

糕餅

[*]淡水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學生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學生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學生

目錄

壹、前言 ..... - 228 -

貳、淺談台灣糕餅的歷史 ..... - 231 -

一、 傳統糕餅的源流 ..... - 231 -

二、 糕餅在台灣的發展 ..... - 232 -

三、 淡水糕餅史—以三協成爲例 ..... - 233 -

(一) 淡水簡史 ..... - 233 -

(二) 淡水餅店的元老——三協成糕餅舖 ..... - 234 -

四、 糕餅業的守護神 ..... - 237 -

參、淡水常用糕餅印模之圖像意涵 ..... - 237 -

一、 神話故事 ..... - 237 -

二、 神靈瑞獸 ..... - 240 -

三、 動物諧音 ..... - 243 -

四、 植物諧音 ..... - 244 -

五、 器物諧音 ..... - 248 -

六、 象徵圖像 ..... - 250 -

(一) 動物象徵 ..... - 250 -

(二) 植物象徵 ..... - 253 -

(三) 器物象徵 ..... - 260 -

七、 文字紋飾 ..... - 264 -

(一) 吉祥文字 ..... - 264 -

(二) 裝飾紋飾 ..... - 264 -

八、 特殊印模 ..... - 265 -

(一) 西洋器物 ..... - 265 -

九、 吉祥語句圖像寓意 ..... - 266 -

肆、糕餅在年的旋律與生命的旋律中的意義 ..... - 268 -

一、 歲時節慶 ..... - 268 -

(一) 春節 ..... - 268 -
(二) 天公生 ..... - 272 -
(三) 上元節 ..... - 272 -
(四) 土地公生 ..... - 273 -
(五) 清明節〈掃墓〉 ..... - 273 -
(六) 七夕 ..... - 274 -
(七) 中元普渡 ..... - 275 -
(八) 中秋 ..... - 276 -
(九) 重陽〈作祭〉 ..... - 276 -
二、 生命禮俗 ..... - 276 -
(一) 出生禮 ..... - 277 -
(二) 成年禮 ..... - 278 -
(三) 婚禮 ..... - 279 -
(四) 壽禮 ..... - 280 -
(五) 喪禮 ..... - 280 -
(六) 其他 ..... - 281 -
伍、結論 ..... - 281 -
陸、參考資料 ..... - 282 -

壹、前言

淡水和基隆早在 15 世紀，就出現在中外的文獻上，17 世紀初以前，到淡水的中國人，大多是季節性來來去去，淡水的開發經營在當時沒有什麼成績可言。淡水真正的開發在西元 1628 年年底，即西班牙人進駐後，當年便建築了「聖多明哥」城堡於淡水，以作爲控制及徵收淡水附近諸番社的稅賦機關和傳教地點而開始。西元 1642 年荷蘭人驅逐了西班牙人，其在西班牙人舊有的統治基礎上更加強化對北台灣的控制，也開始引進漢人拓墾，發展農業。明鄭時期，對於淡水的開發採流放罪犯的方法，但人數不多，文獻上也未出現漢人村莊的記載。進入滿清時期後，已有較多的漢人從事漁耕，可開發範圍仍小。至乾隆初年，淡水由小村落逐漸形成市街，與此同時隨著漢人一起遷徙到台灣的包括人們日常生活所需的「餅」，加之貿易的繁榮，故淡水的開發在進入嘉慶以後顯得更爲活躍。

西元 1860 年，隨著開港通商淡水港也隨之發展起來，各國商船接續而來，洋行也紛紛設立，淡水被西方列強選爲通商口岸，加之茶葉的興起，故淡水開發在同光年間（西元 1862 至 1894 年）達極盛時期，爲當時最大貿易港口。當然至日治時，傳統的餅不但被普及使用並且開始受日本風俗習慣影響，引進日式的糕餅。

餅在台灣傳統社會中，不單單只是一種食品，還包含特殊的文化意涵與寓意亦有著象徵性的人文意涵，使得其與人的一生有著緊密而不可分割的關係。從淡水人的生活中想必也可從其中糕餅一窺究竟。

在人潮熙來攘往、新舊文化不斷交互融合的淡水老街，老字號餅店依舊屹立其中，其有什麼獨特魅力？好奇之餘，我們決定爲文對其有更深入的了解，於是前往老街，造訪淡水各大餅店，發現如今淡水餅店大都以喜餅與觀光爲主要發展。我們除了試吃了各家不同風味的糕餅，也觀察了三協成內的糕餅模，發現其中具有豐富的民俗意涵，這使我們開始企圖深入了解製餅的方法與其圖像之意義，從而漸漸明白餅在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

爲了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我們從各方面著手尋找有關的資料，糕餅之類的食物，並非主食，存在雖然久遠，也留存於高層社會及平常人民之中，但是，史料不易覓得，吾人研究的步驟遂訪問各家餅店老闆，再進而從國家圖書館尋找相關文獻資料，雖然笨拙，但吾人認爲是不可或缺的途徑，而後爲了解餅與淡水在地之關係，我們走訪淡水各大廟宇，如：福祐宮、清水嚴，並實際訪問淡水當地人，以更加確切地明白餅在節慶與傳統習俗的地位與角色。

淡江大學歷史系學生想藉由此次的機會，對淡水的景物人文有更深入的了解與關懷，使人與鄉土文化更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了解人與土地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我們選擇這一深具文化與創意的題目來發表。

貳、淺談台灣糕餅的歷史

一、傳統糕餅的源流

從生活的習慣來說，米食爲中國傳統漢民族的主食，除了是一般糧食之外，再經過各種巧思的烘烤蒸製下，便製成各種富含預意且應景的糕餅，加之中國民間向來視米爲敬重的粒食，故在各大節慶禮俗中均扮演要角，進而形成精緻的傳統糕餅文化。

從字面上來說，「糕」古時稱之爲「餌」，是中國較早期糕餅的慣稱，而以辭書說明探知。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中則記載「米粉合豆末，糖蜜蒸成者曰餌」[1]。而餅字最早的使用，則是《墨子》:「見人之作餅。」[2]爲麵粉製成的點心，《說文解字》記載:「餅，麵餈也，稻餅也。」;「粿」字的來源亦甚早，據《康熙字典》「粿」爲米食、淨米、粿屑之意。[3]

從民間所用的器具來看，先秦時期，民間即知利用穀類石磨來製作糕餅，品質雖粗造但卻爲往後豐富糕餅發展的先聲。自漢時，「餅」極爲麵食的通稱，從一般大眾飲食來看，凡以一般麵食加工的成品均可稱之爲「餅」。水煮麵塊稱爲湯餅，燒成的餅稱爲燒餅，蒸成的饅頭稱爲蒸餅等，如此可見糕餅漸增多樣。

從糕餅在中國的整體發展史來看，在漢代時史游所編的兒童起蒙讀本《急就篇》即有云:「餅餌麥飯甘豆羹，皆野人農之食耳。」[4]文獻內所提及皆爲一般大眾飲食，而漢代出土的模具實物等考古發現，也足以說明，此時石磨已成爲重要的米食加工工具。而到了南北朝時期，製作糕餅的技術已達到豐富精緻的水準，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5]將餅食的製作及種類整理成二十多種餅品製法，煎餅、燒餅、細環餅、豬皮餅雞蛋餅等…。至隋唐時期，除了承先啓後技術更爲精進外，糕餅店的廣增、糕類開發的新品種亦是一大突破，如隋朝謝諷《食經》[6]之花折鵝糕、紫龍糕等名品。唐朝馮贄《雲仙雜記》[7]的雲棗糕、玉梁糕等…，皆爲當時新創糕餅之集大成。宋朝則是讓糕餅類豐富化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因原物料的增加、加工技術較之前更爲精進，還有磨粉業的普及，這些因素都是造就宋代糕餅的繁多，宋朝周密《武林舊事》[8]一書光介紹「糕品」即列出廣寒糕、生糖糕、

---

[1]〈明〉李時珍著，《本草綱目》，卷二十五〈穀部〉，台北，文光圖書公司，民國五十七年十月，p882。

[2]〈清〉孫星衍，《燕丹子・墨子》〈墨子　卷十一　耕柱〉，台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十四年。

[3]（訂正者）渡部溫，《校正康熙字典》，卷之九　米部，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p2062。

[4]史游，王雲五主編，《急就篇》，卷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p132、133。

[5]〈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九　餅法第八十二，北京，團結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6]〈隋〉謝諷，《說郛》，卷一百二十　續集　卷四十六　卷九十五　食經。

[7]〈唐〉馮贄，《雲仙雜記》，卷四，藝文印書館。

[8]〈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六　糕，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

社糕等零零總總共十九種之多。元代糕餅的特色則是少數民族的傳入，另外的發展關鍵則是研磨技術已進步到利用水爲磨粉動力，並更講究衛生，在麵糰發酵方面，發展出新式的發麵法。明朝則充分顯現出製作的精良和品質的注重，而中秋吃月餅更是在此時風行，明代沈榜《宛署雜記》中記載:「八月饋月餅。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麵餅相饋，大小不等，呼為『月餅』。」[9]即可看出。

二、糕餅在台灣的發展

臺灣的粿(粄)糕餅文化，最早可以說是源於清代先民從唐山大陸閩粵地區所帶入；「閩粵」也就是「閩越」，因福建、廣東都在「南越」的範圍，古時稱東南原住民爲「南夷」,「南夷」又稱「越」，固有此稱呼。而以台灣在清代閩南族群是移入主體來說，多半是講河洛話，河洛源於黃河、洛水一帶之古中原地，經過五胡亂華、黃巢之亂，衣冠士族的的不斷南遷江淮之地，又轉而向閩越發展。在這漫長的南遷過程，開始與當地食米爲主的原住民夷越人混合，並以米製作多種品類之零食、祭品、禮品，同時與南方盛產之龜鱉水族爲活物祭品，這些風俗習慣在移入台灣時都也一併的帶過來，並與本地氣候、作物，甚至政治、民族等因素影響融合，發展爲台灣地區的文化習俗

糕餅在清代更有集大成之趨勢，發展技術亦已相當成熟，清代飲食論著《調鼎集》[10]中記載餅類，如元宵餅、水晶月餅、裹餡餅等，達四十多種。糕類，如八珍糕、天寶糕、桂花糕等，亦達三十多種之多，內容相當豐富。由此可觀當時糕餅已相當盛行且樣式豐富精緻，並爲慶典風俗增加更多熱鬧氣氛。

論台灣粿、糕、餅的使用，可從年節文化、生命禮俗得其詳細，並可大概歸納出這些食品、祭品、禮品的文化，都源自閩、粵兩省祖籍原鄉。

台灣民間文化，到了日據初期儘管實施軍事及警察武力的鎮壓統治，但對於傳統的生活民俗並無強制掃蕩禁止，因此傳統民間文化是持續不斷的，仍然依照生命禮俗、年節、聖誕等歲時祭儀進行。其活動並未稍歇，因而台灣民間在粿、糕、餅方面又有一些變化增益，尤其是在由農業轉向工業的表現上，例如以鳳片粉製成的鳳片龜取代傳統的紅龜粿。此外因是日據時期，故產生迎合當代獨特的產物，在台灣總督府方面，爲配合日本本國國慶，於一年中放的四個重要節慶發放「慶四節」糕品慶祝，這四個節慶分別爲元旦、二月二十一日「紀元節」(紀念神武天皇)、四月二十九日「天長節」(紀念當時天皇)、十一月三日「明治節」(紀念明治天皇)，此種節慶的糕餅特色在於上印有日本太陽雙旗和「祝」字，也就是說這是只有在台灣獨特政治背景下所產生的糕餅，光復之後即消失，但仍然留下美好的回憶。

[9]〈明〉沈榜，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一冊 〈宛署雜記〉 卷十七，北京，中國書房出版，p.160。

[10]〈清〉童岳荐編撰，張延年校注，《調鼎集》，河南省，新華書店。

台灣光復後，社會民間漸漸進入工商社會，而原來傳統所流傳的粿、糕、餅、糖塔文化，在民國四、五十年代大多仍舊持續，也有一部分是新增，新增的如祭祀使用的麵粉龜、中秋節則樣式變多，新增各式廣式月餅，但也有一部份自六十年代卻趨式微，如中原普渡所使用的中原糕品被餅乾零食類所取代，加上廟宇製作糕餅類減少，一般民眾不在家自行印製糕餅，都使糕餅粿類需求不像從前繁盛。

現今糕餅的走向在傳統面，如各婚禮慶典仍佔有一定市場，使現今糕餅的經營不至於走向窘境，此外，隨著國人休閒意識上漲而帶動假日觀光產業，再加上各地方政府發展在地特色不遺餘力，許多百年老餅店產生新的契機，並呈現穩定發展，也偶有新的創意。

三、淡水糕餅史—以三協成爲例

(一) 淡水簡史

淡水自十八世紀初(康熙末年)形成「滬尾庄」之後，隨著淡水河周邊的開發，淡水遂發展出以商貿爲主的「滬尾街」，1860(咸豐 10)年對外開港後，更提升爲國際貿易型態的港埠，雖然 1895 年馬偕博士在《Trom Far Formosa》書中，記述「淡水是個骯髒多煙的市鎮」，但也是個「有米店、鴉片館、廟宇、藥鋪互爭顧客；也有木匠、鐵匠、理髮師、轎夫等在營業」很熱鬧的小鎮。馬偕博士雖然沒有提到「糕餅店」，但以當時淡水擁有各行各業的店鋪作坊來看，賣糕餅這個行業，應該已經存在，可惜文獻不徵。

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殖民政府很快地進行各項近現代化的工作，例如道路的拓寬、市區的改正，1901(明治 34)年 8 月淡水線鐵路通車後，對淡水的影響大，約在 1926 年間，淡水所需的設施大致完備，這使得淡水脫離了髒亂，耳目一新，以今天中正路爲主的市街機能更趨完備。銀行、木材行、茶葉、碾米葉、鐵工、油槽、製鞋、麵類、金市工藝、製蓆等應有盡有。

1935(昭和 10)年淡水市街更新後，今中正路兩側，各色有樣的商店林立，根據 1937(昭和 12)年的商工調查，淡水街已有包括「糕餅」業的商店 374 家[11]。而 1936(昭和 11)年「淡水街」主要店鋪圖中，就有多家販賣糕餅的「菓子店」，而「三協成」也首度出現。[12]

[11] 《台北縣志》，二十三卷商業志，(日據台北州時期各街庄物品販賣者公佈表)，P.16-17。

[12] 圖 1，昭和 11(1936)年淡水市街主要設施分布圖。虛線部分為周宗賢老師整理(資料來源:《中國商工地圖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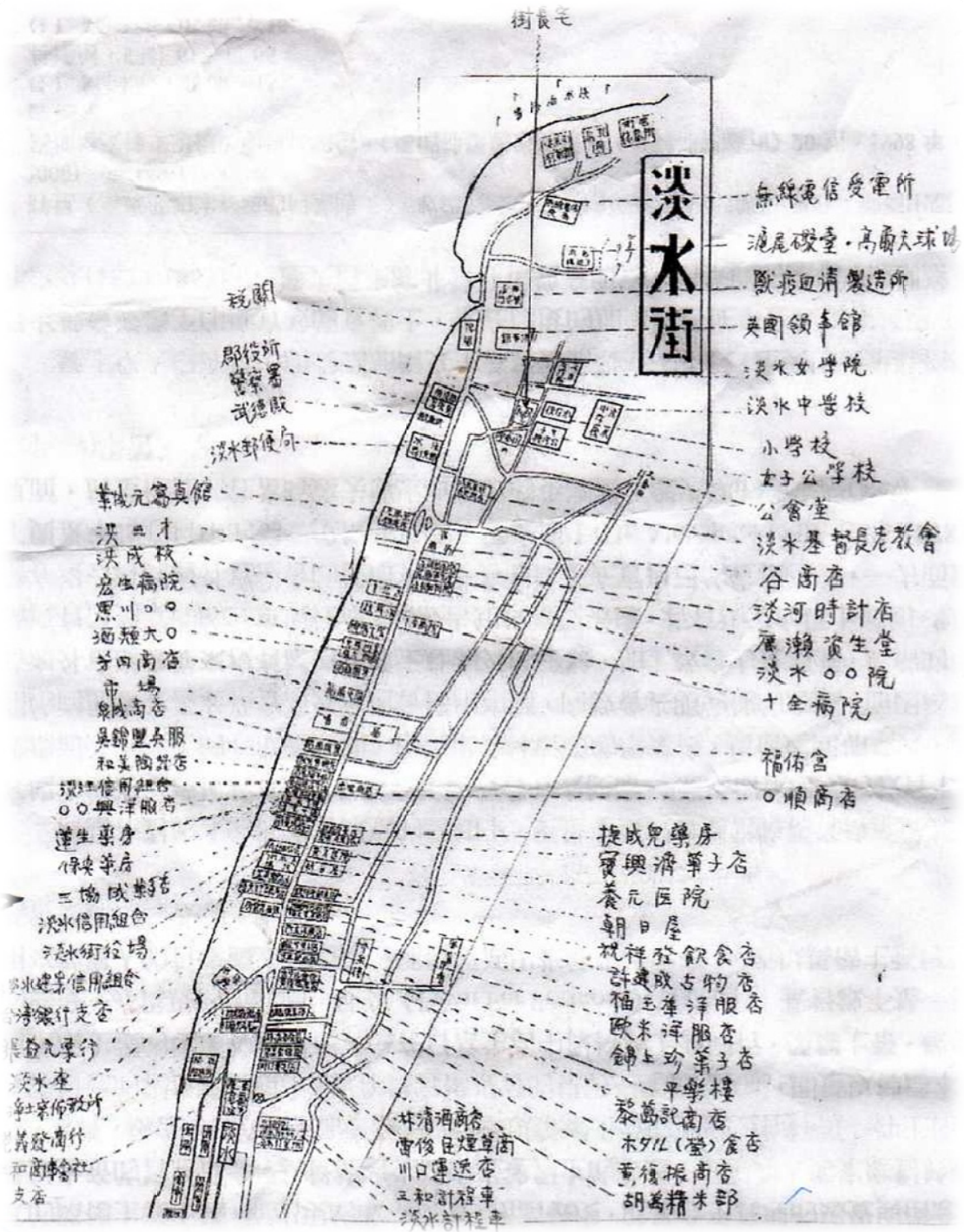


圖 1 淡水街

(二) 淡水餅店的元老——三協成糕餅舖

「三協成」，創始於昭和十年（西元 1935 年），成立至今，已逾一甲子。最初，只是現任老闆（李志仁先生）的祖父（李烏金先生），帶著老闆的父親（創辦人—李清水先生）向三芝鄉的老師傅（陳春發—阿土師）學作泉州糕餅（俗稱漢餅）。學成之後，李清水先生便領著二兄弟（李水海先生）、三弟（李秋煌先生）落腳淡水開始糕餅舖的生涯。餅舖取名「三協成」的意義就是希望兄弟三人同心

協力經營而有所成。

１・寄賣時代：1935～（市街更正）

創店初期，店裡的生意並不理想，身爲大嫂的李鄭妙首女士，因此不得不設法改善營運狀況。二十年代，台灣鄉下正流行「寄藥包」的銷售方式，以彌補醫療體系的不足和缺乏。保存期限一個月以上的各式糕點剛好派上用場，然後定期去鋪貨、收款。果然深受好評，從此打響了「三協成」的名號。

２・喜餅市場的開拓：1955～（龍鳳喜餅）

往昔淡水人有一句諺語「娶某不取八里坌」，這句俚語是提醒年輕人，八里人嫁女兒的風俗是要送喜餅給全村的村民的，所以娶她們的女兒要自量其力；而李水清先生就從這句諺語中看到廣大的喜餅市場。爲了攻占喜餅市場，李水清先生首先透過前台大婦產科主任—歐陽培銓先生，認識了英國領事館的主廚—徐彩和先生，然後向他學做英國水果派（派皮較鬆軟），以爲改進傳統水晶餅皮軟趴趴的缺點。而其女婿—林銅洲先生也因爲在英國領事館任職商業秘書，從而進口英國老牌子 Bush Boake Allen 香料，以爲改進水晶餅內餡的香味（當時台灣尚沒有奶粉、奶精等原料），自此中西合併，改良後的冬瓜肉餅一炮而紅，成爲「三協成」維持七十年不墜的招牌餅。

３・技術的傳承與創新

西元 1976 年，李水清先生的獨子—李志仁先生正式接掌「三協成」，爲了面對日趨西化的糕餅市場，又爲了維護傳統漢餅文化，第二代頭家開始了沿襲日本、法國點心的艱辛歷程。而其所研習之技法與心血亦毫無保留的應用在改良漢餅，竭力地爲漢餅文化注入新意。這段期間，創新改良的糕餅有李鹹糕、綠茶金棗糕、杏仁粄、初戀餅、八角塔餅・・・等。

４・觀光時代：1997～（捷運通車）

自從捷運通車後，交通的便利帶來龐大的商機。三協成餅舖當然也欣喜這樣的變化，但在受惠的同時，「三協成」的當家—李志仁先生卻不得不憂心，因爲大量的觀光客湧進咱們的淡水小鎮，地方上雖然日漸繁榮，但禍福相依，淡水小鎮獨有的迷人文化卻似乎在逐漸失落中。另外，淡水以其著名的景觀及歷史古蹟吸引人潮前往，不過在地方沒有妥善規劃的情況下，誰也沒有把握這商機能持續多久？所以，2000 年，李志仁先生又成立「三協成糕餅博物館」，定期舉辦油畫、雕塑、佛朗明哥・・・等展覽。讓餅店不只是餅店，同時成爲推廣傳統文化的博物館。

５・未來與展望

現在，「三協成」的當家—李志仁先生老闆，守業餅店三十多年，正逐步交

棒給兒子—李奇峰，準備迎接新世紀的新挑戰。而對於可預測的未來，「三協成」餅舖也將因應時代潮流，推出自己的專屬網站，期許能與世界接軌。「三協成」的店名很本土，招牌卻是挺洋派，「Chez　Jean」、「depuis 1935」。

西元 1952 年出生的老闆—李志仁解釋，這是法文，意思是「阿仁的家，創於西元 1935 年，希望客人來我家，親切又自在。」這樣的老餅舖，除了有各式各樣的糕餅可以試吃，還有長凳可以歇腳，渴了還會奉上一杯熱茶。







四、糕餅業的守護神

台灣民間的各行各業都有守護神，一般都以各業的創始者或有功者爲之供俸，如理髮事業的呂仙祖，布商及染織商的葛麻仙翁，雨傘業的女媧娘娘，木匠的巧聖先師，泥水匠的荷葉先師等等。糕餅業的守護神則是「諸葛亮」。

諸葛亮成爲糕餅業的祖師爺及守護神，其典故源自《三國演義》第九十一回中的一段故事，其內容如下：

諸葛亮南征班師回到蜀國，四川一帶，有酋長叫孟獲，率部相送，九月秋天，諸葛亮到達瀘水忽然烏雲密佈，狂風聚起，兵不能渡，回報諸葛。孟獲且說：「此水原有猖神作禍，應備『七七四十九』個人頭，並黑牛白羊祭之，自然風平浪靜，更兼連年豐稔。」

諸葛亮說：「戰役已經結束，怎可妄殺一人？」

於是有土人向諸葛亮建議說：「需依舊例殺四十九顆人頭，則怨鬼自散也。」

諸葛亮說：「本為人死成怨鬼，豈可一殺再殺？我自有主意」。諸葛亮隨即喚來廚師宰殺牛馬，和以麵粉，速成人頭，肉包牛羊肉以代之，名曰：「饅頭」，設案及備祭物，讀祭文，以祭猖神，猖神即退，諸葛之兵，得而過江。

由上文可知：諸葛亮因設計用牛羊肉爲餡，外包麵粉，作成「饅頭」，拿來代替「人頭」，作爲祭拜瀘水的祭品。也因此被後人所崇奉。

另外，台灣民間自印的《黃曆通鑑》，也都以諸葛亮做爲糕餅業的祖師爺和守護神。

參、淡水常用糕餅印模之圖像意涵

淡水的餅店擁有悠久的歷史，三協成、新建成、雙元成都是著名的老餅店，其中，三協成近年來轉型成功，除了以新式糕餅的觀光發展取向外，對於傳統的糕餅印模保存更是不餘遺力。

此章所使用之糕餅印模皆由三協成提供，謹致謝忱。

一、神話故事

1．嫦娥

在中國神話故事中，嫦娥原是后羿的妻子，她偷吃后羿從西王母娘娘求來的仙丹後便飛升至月亮上，月上有廣寒宮、金蟾、月兔；因此糕餅模上多以月宮廣寒宮爲背景，前景再配以嫦娥、月兔擣藥等；嫦娥是月宮主人，故在糕餅模的應用上，以中秋節爲主，各式中秋月餅上常見此嫦娥月宮圖案。



2・福星

福星原爲星宿名，即歲星，出現的年代甚早，後世人將福星神格化後，出現多種說法，其一是道教中的「三官」信仰，爲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故「天官」被視爲福星的象徵；其二爲福星是由歷史人物演變而來，《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記載：「福神者，本道州刺史楊公諱成。...立祠繪像供養以為本州福神也。後天下庶黎民皆繪像敬之，以為福祿神也。」[13]

在糕餅模中，福神造型多以一臉和善，長鬚，身著員外郎官服、玉帶，手執如意，體態多具福相，因此象徵著吉祥的意思，多用在結婚糕餅上。



[13]著者不詳，《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台北市，聯經出版，民國六十九年七月，p.161。

3・ 祿星

祿星與福星同樣是由星宿崇拜轉爲神格化，其由來也有多種說法，祿星的由來也有著許多說法，一爲五代四川眉山張遠霄[14]，解災求民。二是「送子張仙」，五代後蜀皇帝孟昶，祭祀可生子，民間多傳爲祁子之神。另一出自《封神榜》，周文王有九十九子，因此民間將其信奉爲子神。[15]

祿，即祿位，功名利祿之象徵，在民間信仰觀念中，祿星包含「祿」、「子」兩種吉祥的觀念，祿星形象近似於福星，惟「祿」象徵加官進祿因此在糕餅模中手持書畫卷造型，象徵加官進祿之意；又因後世相傳祿星抱子下凡故事，故糕餅模中祿星手抱一子，象徵多子多福氣；同於福星，有著吉祥之意，多爲結婚糕餅之用。



4・ 壽星

壽星爲天上二十八宿之中的角、亢二星，也有認爲是南極老人之說，經過神格化之後，南極仙翁[16]的故事在民間廣爲流傳，信仰之中主要爲添壽的寓意，故糕餅模之中的形象多似老翁，但卻有著童顏和高額頭，是具有長壽吉祥之徵，也象徵著吉祥；因此在作用上壽星除用於婚禮上，也多用於祝壽。

---

[14] 張遠霄，唐代道士，嵋山人。

[15] 華家緯，《台灣傳統文化圖像研究—以木製糕餅印模為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民國九十七年六月，p. 94。

[16] 南極仙翁是古代神話傳說中的老壽星，又稱南極真君、長生大帝，玉清真王，為元始天王九子。因為他主壽，所以又叫“壽星”或“老人星”。傳說經常供奉這位仙神，可以使人健康長壽。



5． 福祿壽三星

在民間多把福、祿、壽三星合而爲一圖形，稱「福祿壽三星」，意爲將民間信仰之中代表著福氣、官祿(子孫)、長壽的神祇結合。在結婚禮餅之中也多用福祿壽三星，爲祝賀新婚夫妻福、祿、壽皆全。

6． 仙佛

在中華文化中仙佛，民間有云，消遙無礙謂之仙，覺行圓滿爲之佛，凡破迷頓悟者，修行得道者，人人皆可成仙成佛，所以仙佛有著可以超脫生死之寄託、希望；在糕餅模中使用仙佛形象多用在神佛誕辰，也有用於喪禮祭典。



二、神靈瑞獸

1． 龍

龍在中華傳統有著特殊地位，自古即代表著祥瑞之兆，中華數千年文化之中，和龍有關的記載豐富且富有神話性質，且龍與天子、皇權息息相關，更使龍在人民心中的有著吉祥納福之意。

《說文解字》中記載：「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17]又《畫圖見聞誌》：「畫龍者，析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窮游泳蜿蜒之玅，得回蟠升降之宜。」[18]以此可以看出龍在古籍上的形象，而民間龍的形象也多以此爲範本。

傳統婚禮禮餅中，必定用到龍型圖案，「雙龍戲珠」、「雙龍拜塔」；龍形象圖形也多和鳳凰形象圖形合用「龍鳳呈祥」；用以祝賀新人吉祥如意。

2．鳳凰

鳳凰之中，雄爲鳳雌爲凰，爲百鳥之首，同龍爲中華傳統上重要的崇拜對象，據《埤雅》記載：「鳳，神鳥也，俗呼鳥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19]，又《尚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20]，鳳凰象徵著天下太平；而鳳凰的題材常用於結婚上，如祝福新婚吉祥，以龍鳳共托喜字的「龍鳳呈祥」；另有「鸞鳳和鳴」用來比喻夫妻和諧，因此鳳凰多用在新婚禮餅之上，以祝賀新婚。



3．龜

[17]〈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第二十二卷，第十一篇注下，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八年。

[18]〈宋〉郭若虛，《圖書見聞誌》，卷一　敘論，台北，藝文印書館，p.7。

[19]〈宋〉陸佃，《埤雅》，卷八，〈釋鳥〉，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五年六月，p.12。

[20]〈清〉劉逢錄撰，王雲五主編，《尚書今古文即解》卷二，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初版，p.100。

龜在民間被視爲長壽的象徵，所以在各種風俗節慶、祭祖、祝壽又或者是神明誕辰等，龜粿是無可取代的物品，其在台灣糕粿模中，也最常被使用到；龜粿模的圖案多種而不一，也因龜與長壽相關聯，故龜粿模常有加上壽字，又或是加上福祿壽三字，造型相當多樣。





4・獅

對中國來說，獅子是外來動物，見《本草綱目》中：「獅子出西域諸國」[21]，獅子的威猛形象被認爲有避邪的作用，而獅與師同音，古有太師、少師等官名，

[21]〈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五十一，獸之二　獸類三十八種，p. 1451。

固在糕餅模上刻有獅子形象者，多爲祈求官運、富貴、權勢亨通[22]，但亦有鎮邪之用。



5・ 麒麟送貴子

麒麟自古象徵吉祥和瑞，雄者爲麒，雌者爲麟，此外也代表仁德，具有君子風度；但麒麟送子模的典故主要出於民間傳說，具前秦王嘉《拾遺記》，相傳孔子誕生時，天降玉書在孔子故里：「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23]，至此有了「麒麟送子」的傳說；而在糕餅模中使用麒麟送子形象多用在祝福新婚夫妻能早生子嗣之意，所以多見於結婚糕餅禮品中。



三、動物諧音

1・ 鯉魚

[22]華家緯，《台灣傳統文化圖像研究—糕餅印模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民國九十七年六月，p. 99。

[23]〈東晉〉王嘉，《王子年拾遺記》，周靈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八年五月，p. 14。

魚的形象也常爲吉祥圖案中使用，原因在於「餘」與「魚」同音，比喻爲有餘，在加上「鯉」與「利」的發音相似，固鯉魚更受人歡迎了，也因「鯉躍龍門」的典故，所以鯉魚形象的模子多有「有餘」、「鯉躍龍門」之意。



2． 金魚

因「金魚」發音與「金玉」相似，故金魚表示金玉滿堂之意。

3． 公雞

寓吃雞會「起家」，雞和家的台語發音相似。

4． 鹿

因鹿的發音與祿同，其形象常被使用在吉祥圖案中。

5． 蟬

寓夫妻琴瑟和鳴，故常用於結婚糕餅中，以示恩愛。

6． 蝴蝶

取蝴與福的諧音，用於吉祥糕餅中。

四、植物諧音

1． 蓮花

「蓮」與「連」同音，有「連生貴子」之寓意，而蓮花自古就有純潔無塵之意，尤以佛教將蓮花視爲純潔而無染、極樂而自在的象徵，因民間盛行佛教，故民間視蓮花爲吉祥如意，，又蓮花爲高潔不與世俗同流合汙，是爲君子象徵，廣爲士大夫、文人所喜愛。台灣爲佛教盛行地區，固蓮花模有用在喪禮上使用。



2・ 葫蘆

葫蘆因多籽、其藤蔓綿延繁多，自古即被認爲吉祥物品，且多被借喻爲多子多孫之意；「葫蘆」音與「福祿」相似，有吉祥納福之意，故葫蘆常見於糕的模型中，也常爲其他糕餅模的裝飾。



3・ 柿子

柿子自中國古代即有，「柿」與「事」同音，所以常有「事事如意」的吉祥意思搭配柿子。



4． 佛手柑

佛手柑的造型特殊，其果實頭端裂開如佛手，固佛手柑造型的模子多用在佛教，另外，也因「佛手」與「福壽」音似，也被視爲吉祥納福的象徵，作爲吉祥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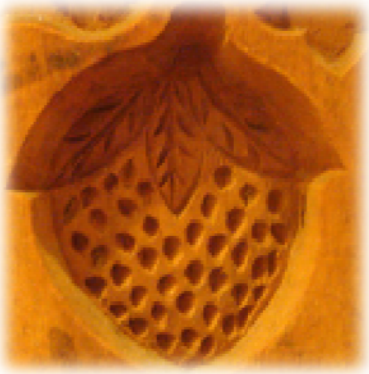
5． 鳳梨

鳳梨爲台灣常見之水果，而鳳梨被作爲吉祥象徵是因「鳳梨」的閩南語與「旺來」音似，有招來好運氣的意思，每當節慶祭神祭祖時皆會供奉鳳梨，以祈求招來好運氣；固糕模子上運用鳳梨圖案也是相同意思，另外也有運用在鳳梨酥上。



6・ 荔枝

「荔枝」音似「立子」，固有早立子的寓意，又與橘子相配有大「吉」大「利」之意，因此常見於糕餅模之中。



7・ 蕉葉

香蕉葉自古就被視爲吉祥物，芭蕉在佛教中爲十四漿之一，爲佛教修練中不可缺少之物，在道教中爲八寶之一，具避邪功用；在閩南語中「蕉」與「招」同音，因此有「招來」的意思。蕉葉多用在糕模上。



五、器物諧音

器物做爲民間平日常用器具，吉祥圖案將其直接轉化，取其寓意轉變爲祥瑞吉兆使用，使器物具有豐富的文化意涵。

1・ 扇子

吉祥圖案中，「扇」與「善」音同，被比喻爲善化之意，爲吉祥徵兆。傳統糕餅常以芭蕉扇爲圖案印模使用，周旁飾以雲紋緞帶，表現出法器祥瑞之氣。

題材內容爲蕉葉扇造型，取其諧音「善」，有驅邪、鎮守、善行、善化、文人之徵，多用以糕餅裝飾紋較多。



2・ 如意

如意早期形爲抓背爪杖，有實用功能，後漸漸轉爲觀賞用，造型爲現今常見雲葉、靈芝之形，寓意亦演化爲吉祥「如意」之意。糕餅印模中，此類圖案糕點造型爲雲葉形如意杖表現，視其爲祥瑞祈福之器，祈求萬事皆如意。

題材內容多爲雲葉如意杖表現，其寓意爲吉祥如意，同時爲佛教法器之一，

多用於餅模裝飾。



3・瓶

瓶原爲盛裝的器物，被引申爲吉祥象徵，因「寶瓶」的「瓶」字與「太平」的「平」字同音，表平安之意。佛教中，傳瓶爲觀音普渡眾生的淨水瓶，滴灑能德祥瑞，又瓶表能盛滿一切物之意，被比喻爲吉祥寓意。在糕餅印模中，使用瓶造型，往往爲「八吉祥」糕餅中寶瓶之用，另有用於糕餅印模之用。

瓶與平同音，常做裝飾之用，亦有單獨的糕仔造型，其寓意爲平安、太平之意及盛裝吉祥美滿之意，多用於糕仔模、餅印模。



4・銀錠

銀錠爲古代交易之媒介，是買賣的重要物品，其價值自然重要，故爲吉祥圖案之一。

銀錠的「錠」字與「定」同音，多與如意合稱「必定如意」。糕餅印模中，銀錠的造型多用於年末時，作爲「送神糕」圖案之用，取其碎金碎銀的銀兩造型，爲財富的象徵。

題材多表現出碎金碎銀的銀兩造型，取其意爲財富的象徵，必定如意，多用於送神用的糕仔粒。



六、象徵圖像

象徵圖像，泛指各種具體物品、事物、形體等，利用移情作用，使它們具某種抽象的概念，將其轉化爲吉祥的徵兆，賦與圖案特殊的象徵意義，以用以表達人們趨吉避凶、追求美好的心理。

(一) 動物象徵

以動物本身直接的本性或習性，經象徵詮釋之後，將原有的特性加以轉化，賦予事務某種吉祥祈福的意義，形成獨特的象徵符號，用以滿足人類祈福、期待的心理。

１． 人形

台灣地區有以人行補運的傳統習俗，祭拜時乃備替(紙人形)，俗稱爲「補運錢」，將其至於神佛前供奉，以祈求運途變順、息災求福，其中，人形是善男信女造型，用以代表祭拜者本身，來達到祈福的作用。

民間七夕習俗中，有以印人形的糕餅來祭拜七娘媽，以祈求子女能聰明靈巧。傳統糕餅以人行爲印模圖案者，多用於單一餅印模使用，除作爲祭祀供品使用，亦具有以形補形的意義，食用後可保佑平安健康。

題材爲人形，其寓意爲保佑平安、消除災厄，多爲糕餅印模。



2・ 蝦

蝦由於身形彎曲，且具有活躍的跳動能力，故吉祥圖案取其特性，借譽爲「彎彎順」的吉祥意涵，因其能彎能直，極爲滑順，用來比喻順心、順利。

又蝦本身雙眼圓潤睜開，傳能監視，具鎮宅辟鬼之用。在印模中，常以蝦爲粿模的周圍圖案使用。



3・ 貝類

貝殼不止爲貨幣使用，在傳統文化中又爲貴重裝飾品，具富貴之意，禮糕印模中常見此圖樣做爲周邊裝飾，祝賀夫妻能富貴吉祥。

：題材爲貝殼造型，表是富貴、吉祥、財富，多印於禮糕、禮餅之印模。



4・ 喜鵲

民間傳說鵲有預示的能力，聽見鵲鳴叫表示將有喜是降臨，故稱爲「喜鵲」。

另外牛郎織女的故事賦予喜鵲男女姻緣的色彩，成爲婚姻的代表，故在結婚糕品中應用極多，祝福新婚夫妻喜慶吉祥，另有希望男女雙方與牛郎織女般相愛之意。

題材多以喜鵲飛行或站在枝頭姿態爲主，常與梅同時出現，其寓意爲喜上眉梢、靈鵲報喜，多用於新婚糕仔模。



5． 鴛鴦

鴛鴦圖像常用於結(訂)禮餅禮糕之中，置於斗大的「囍」字旁，必定成雙相對出現，表雙棲雙飛、雙雙對對、永結同心等吉祥意涵。

形態以鴛鴦相對姿態爲主，常與囍字做搭配使用，其寓意爲永結同心、成雙成對，多用於結(訂)婚禮餅。



6． 鶴

常與松、桃、竹、龜、鹿等搭配，以祝賀「松鶴同齡」、「鹿鶴同春」、「龜鶴延年」、「六和同春」等吉祥寓意。又有所謂「駕鶴歸西」，故鶴亦見於喪禮的蓮花糕之中。



7・兔

兔爲十二生肖之一，自古與民間文化蘊含著相當緊密的關係。《抱朴子》稱：「鹿兔皆壽千歲，壽五百歲者，其毛色白。」從文中可了解，兔與鹿皆被賦予長壽之意，爲吉祥瑞獸之徵。另外在中國古代神話中，玉兔爲月亮的象徵，據說玉兔所搗之藥爲長生不老之藥，因此玉兔亦有長壽的象徵。

台灣糕餅印模中，玉兔圖案的使用除十二生肖之外，多爲月餅模中所使用，圖案爲玉兔搗藥之姿，配合以嫦娥爲主題的月餅使用。

構圖多爲玉兔搗藥之姿，其寓意爲長生不老及長壽，多用於中秋月餅模、糕模。



(二) 植物象徵

中國詩詞、歌賦、繪畫、器物中，使用植物爲題材的作品多不勝數，同時出現於民間的吉祥裝飾之中，根據其不同植物品性，被賦予著不同的意義與內涵。

1・菊花

菊花自古爲重陽節應景之花，又因菊經深秋而耐寒霜，開花期長，聞人常用以象徵品德。宋代李昉撰《太平廣記》記載：「荊州菊潭，其源傍芳菊被涯澳，其滋液極甘。深谷中有二十餘家，不得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餘，其七十八十猶以為夭。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有壽有徵。」[24]故菊又被稱爲「長壽花」。在民間吉祥花卉中，菊花被比喻爲吉祥、長壽的含義。

糕餅印模圖案中，糕模多雕菊花成盛開狀，造型多樣，花瓣相連繁複，爲益壽延年之徵。

構圖多爲盛開貌，且花瓣相連繁複，菊爲花中四君子之一，亦爲長壽花。其寓意爲高潔之德、長壽之意。在印模中多應用於糕仔模。

---

[24]〈宋〉李昉，《太平廣記》，卷四百一十四　草木九　飲菊潭水，北京，中華書局，民國５０年九月新一版 p. 3377。



2・ 梅花

梅，爲中國傳統名花，其冰肌玉骨、淩寒獨開的品格歷來爲人們所推崇，故世人無不推崇、喜愛梅。梅花一樹獨先天下，有「報春花」之稱，被喻爲高潔堅忍之士的象徵。

因其生長特性，與松、竹合稱歲寒三友。糕餅印模中，長可見到以梅花造型爲圖樣的糕模，另有祝賀新婚夫妻的喜餅糕模，圖案常與松、竹等合併，謂之「竹梅雙喜」。

其構圖常呈盛開狀，與菊同爲花中四君子之一，多與喜鵲組合，意指「喜上眉梢」。其吉祥寓意爲堅貞高潔、喜上眉梢之意。經常使用於糕仔模、結婚禮糕的印模上。



3・ 牡丹花

牡丹，花大艷美，豐腴富態，被視爲吉祥富貴、豐碩繁榮之象徵。唐代劉禹錫《賞牡丹》詩：「唯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25]自唐之始，牡丹雍容華貴，被喻爲「國色天香」，爲中國傳統吉祥圖案常見題材。

糕餅印模中，牡丹多呈盛開狀，用於結婚禮餅、糕仔模圖案上，比喻富貴、榮華之意。在禮餅上常與龍鳳出現，合稱「龍鳳戲牡丹」。

[25]〈唐〉劉禹錫，《劉禹錫全集》，卷二十五〈賞牡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一版，p. 185。

構圖上呈盛開狀，禮餅上常與龍鳳同時出現，表現出「龍鳳戲牡丹」的姿態。其寓意爲富貴、榮華。多用於結婚禮餅、糕仔模上。



4・ 桃花/桃樹

桃花爲中國古典詩詞文學常被使用的花卉，自古爲吉祥福兆的代表。據《本草綱目》云：「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從木兆。十億日兆，言其多也。」[26] 桃樹結子爲多產、多子的象徵，而桃花枝則具避凶鎮煞制鬼之功用。

傳統糕餅圖案常以桃束繁盛狀圍圖像應用，圖中結實累累，百花盛開，爲仲春之氣象，極具喜色。

構圖多呈現桃花繁茂，子繁，多產之徵。用以寓意多壽、長壽、多子多孫之意，另外也有辟邪之用。常用於粿印模、餅印模。



5・ 蘭花

蘭花有君子之徵，又爲百花香之王，故民間皆喜愛以蘭爲題材構圖。此外，蘭花亦具有生子得男之兆，因此「蘭兆」已成爲生兒的文化寓意，也成爲破除不祥的吉物。

糕餅印模的蘭花呈盛開之姿，多用於餅模、糕仔模圖案上，比喻清廉美德，

[26]〈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果部五果類，p. 99。

又具生子的吉祥寓意，與梅、竹、菊合稱爲爲「四君子」。

構圖上具盛放動勢，其寓意爲君子、清廉之意，另外也有生子之兆，常雕於餅模、糕仔模上。



6． 仙桃

民間傳說桃爲西王母於瑤池所種植，爲天上神仙食用之物，食之可長生不老，故又名爲「仙桃」，具延年益壽的功效，因此後人常以桃來祝人壽誕。

台灣地區對桃之喜愛尤甚，凡器具、建築、圖案及食物等，皆有製成仙桃狀。祝賀長者長壽的龜粿印模中，必定有仙桃印模作搭配，可見漢民族對生命延長的重視。

構圖上分爲尖桃及圓桃兩種，以單棵爲主。寓意爲長壽、富貴，常用以誕辰祝壽糕模及龜粿模背邊圖案。



7． 石榴

石榴因果實內籽眾多，古人稱石榴爲「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後世視石榴爲多子、豐饒的象徵。

石榴作爲吉祥物使用，主要因石榴果肉多子，取其多子多孫之意。民間婚嫁

之時，禮餅糕模圖案，多用石榴切開露出籽狀作爲糕模使用，由此可看出台灣傳統社會裡，民間對玉香火延續的祈願。

構圖上採石榴果實紅熟飽滿爆開之狀，寓意爲多子多孫、豐饒。多用於粿印模、糕仔模。



8・ 三多

「三多」爲佛手柑、桃、石榴的組合，謂之多福、多壽、多子嗣之意，其觀念與「福、祿、壽」、「財、子、壽」的概念本質上大致相同，同樣源自對生命、財富、子孫的祈願需求。

「三多」借助具體化的吉祥事物，來表達民間的祈願概念。佛手柑因形似佛手，被認爲是富貴的象徵；桃自古與壽有不可分的寓意；而石榴則因其籽眾多，多被認爲多子之意。在糕餅印模圖案使用上，「三多」以個別呈現居多，多個一組的單一圖案組成較爲常見。

構圖上，佛手柑、桃、石榴個別呈現，單一圖案組合。表達著多福、多壽、多子嗣之意，常用於糕餅印模。



9・ 瓜

瓜爲蔓生植物，其綿延生長，又瓜中多籽，被視爲子孫繁衍興盛之意。後人以此爲祝頌子孫繁衍興盛的吉祥用語。

糕餅印模中使用到瓜圖案，多作文字周邊框飾之用，具美觀又具吉祥寓意，爲民間求子的習俗中極具重要之角色。另外也有以瓜爲主題的印模圖像使用，配合瓜瓞及蓮荷圖案，謂之「瓜跌連緜」。

構圖上呈現瓜結實、藤蔓棉長的特點。意喻連綿不絕、子孫繁衍興茂。多刻於糕餅印模之上。



１０． 松

松被視爲長青之樹，一般民間賦予其延年益壽的吉祥寓意。

以松爲主題的印模中，松常與竹、梅爲「歲寒三友」，與鶴、鹿組成「松齡鶴壽」，皆具有長壽不老的寓意，爲祝壽糕餅常用的圖案，而禮餅糕模中亦會使用松、梅、鶴等圖像使用，成雙的鶴及象徵長壽的松組合，雖有錯誤使用圖像之虞，但卻不減其吉祥祝賀之意。

題材以松樹爲主，有長青不老、長壽、延年益壽、白頭偕老的意思，多用於祝壽糕仔模及禮餅模。



１１． 竹

竹子因其竹心空虛，亮節清高，幹挺有節，歷四時而常茂，有君子之道，常被比喻爲君子，象徵著謙虛。另外，中國新年時，以爆竹來驅邪避凶，故也被民

間視爲辟邪之物。

糕餅圖案中，竹常與其他圖案相配，運用於各種糕類印模之中。

有著祝賀、清節、高潔、平安之意，也作辟邪納福之用。常用於祝壽糕仔模及禮餅印模上。



１２・ 蓮蓬

一個蓮蓬內通常含有十數顆蓮子，因此被借爲「多子」的象徵。此外，蓮蓬爲蓮花的果實，因花和果實同時生長，一般民間拿來比喻「早生貴子」之意。

此種圖案多用於結婚禮糕中，祝賀夫妻能早生貴子、多子多孫。

構圖上常與蓮花同時出現，象徵著生貴子、多子嗣。



１３・ 稻穗

稻米爲漢民族的重要主食之一，爲人們生存的基礎，故被視爲神物，而一株萬粒的特性，使他被賦予除凶鎮邪的意義，具有護童功用。而稻「穗」與「歲」同音，也使的其被引申爲吉祥圖案之用。糕餅印模圖案則常借稻穗圖案來喻爲「豐饒」之意，多用於禮餅禮糕的周邊裝飾。

稻穗常用於裝飾紋飾，寓意著豐饒、豐收、辟邪、護童之意，常出現在禮餅、禮糕印模上。



(三) 器物象徵

器物寓意多從其功能及構造附會出觀念意義，使器物本身跳脫實用功能，轉爲內化的精神層面意涵。

1． 書畫卷

古時文人，書畫雙全、才學淵博，吉祥圖案則以「書」代表文人之徵。

糕餅印模中，用書畫卷圖案象徵文運之意，常爲文字周邊框飾，除達到美觀效果，又寓意富貴人家。

書畫卷常爲裝飾紋飾，有著文人、文運象徵，通常用於狀元糕、禮餅模裝飾。



2． 琴棋書畫(四藝)

琴棋書畫，合稱爲「四藝」，又被稱爲「文人四藝」、「秀才四藝」，爲中國歷代文人雅士所使用之物，用以象徵文人修養之意。

吉祥圖案便以「四藝」寓意民間所推崇的高雅修養，此類紋樣用於糕餅印模的邊飾圖案，有象徵官祿之意。

常用於裝飾紋飾，象徵文人、官祿，多使用在禮餅、糕餅印模裝飾上。

3． 寶塔

中國式寶塔爲宗教性建築，因此寶塔被視爲世界的軸心，所有的事物都圍繞它運轉，爲神與人的接觸地。《封神演義》[27]中，李靖所持器物即是寶塔，可鎮邪守護，故民間即將寶塔是爲護身辟邪的寶物。禮餅印模中，寶塔紋飾常配與龍鳳圖案爲「龍鳳拜塔」，取其守護納吉之意。

有辟邪除煞、祈福納吉之意，常用於結婚禮餅印模(龍鳳拜塔)。



4． 八卦/太極

八卦圖爲生命萬物之根源，寓意極爲深遠，爲寓意範圍極廣的吉祥納福、辟邪驅鬼圖案。

八卦由陰、陽兩種基本元素演繹而成，視爲生命的象徵，依循陰陽交替產生了太陰、太陽、少陰、少陽等四象，推演至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等八卦、兩卦相疊，後至六十四卦，表現陰陽及八種自然現象，爲生命及天地萬物萬象的根源，古即被視爲天賜之物，具有驅邪納福之意。又道家以五行之術配合八卦爲法器使用，因此常被視爲吉祥圖案使用。除辟邪擋煞外，亦有趨吉保平安的吉祥寓意，爲民間普遍的辟邪物之一。

八卦爲伏羲所作，亦爲道家器物，有著鎮邪、擋煞、趨吉之用，多用於糕仔模上。

---

[27]《封神演義》，俗稱《封神榜》，又名《商周列國全傳》、《武王伐紂外史》、《封神傳》，是一部中國神魔小說，作者是明朝的陳仲琳，也有一說為明代道教學者陸西星。約成書於隆慶、萬曆年間。全書共一百回，以姜子牙輔佐周室討伐商紂的歷史為背景，描寫了闡教、截教諸仙鬥智鬥勇、破陣斬將封神的故事。包含了大量民間傳說和神話，有姜子牙、哪吒、李靖等生動既鮮明的人物形象，最後以姜子牙封諸神和周武王封諸侯結尾。



5． 銅錢/連錢

錢的古字爲「泉」，發音「全」相同，具完滿之意；穿又與泉的意類似，即穿古錢兩個，寓意「雙全」，故錢爲吉祥圖案之用。

道家八寶中，銅錢亦爲其中之一，象徵富貴，具有辟邪驅鬼的作用。在糕餅印模中常見單一或多個一組的「連錢」糕仔模，取「十全富貴」、「福壽雙全」之意。另外，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時，需將糕仔做成碎金碎銀的銀兩、銅錢造型，取其意爲財富的象徵。

構圖上常呈現出銅錢連貫的造型，多附在粿模側邊，表示祝壽、送神、雙全、富貴之意，經常使用於天公及神明誕辰的糕仔之糕模上。



6． 元寶

中國民間奉祀的財神，雖說形象並不一致，但都有一特點，便是手持金元寶，這種現象反映民間家中求財納福的心理與追求。元寶的「元」字與狀元的「元」字相同，在舊時考試前，會製作「錠勝糕」，以祈求「定勝」，此種糕品即爲元寶造型。因此以元寶爲造型的糕仔有著招財進寶及定勝的寓意。

造型上爲元寶形狀，象徵著定勝、富貴、吉祥、招財進寶，多使用於糕仔印模上。



7． 扇窗

扇窗的「扇」字與「善」同音，具有福善的寓意，常爲吉祥圖案框飾所用。舊時富貴大戶人家的庭院多有裝飾繁複的花窗、扇窗作爲空間造型，除增加空氣流通之外，亦具有吉祥寓意。

在糕餅印模中，扇窗圖案多用於糕仔模中，因具有框飾效果，中間多雕有不同吉祥圖案，如桃花、牡丹等。

常作爲框飾之用，中間多雕有花草凳吉祥圖案，其象徵的寓意爲福善、富貴，多刻於糕仔模上。



8． 犀角

爲道家八寶之一，有辟邪除煞的功能，在傳統裝飾圖案常可見犀牛角圖案應用。糕餅印模中，犀角常與其他八寶法器及吉祥動物、植物等，一同組成多個的糕仔印模。



9． 壓勝（魘勝）

「勝」原爲首飾名，「壓勝」常被視爲吉祥的飾物，因爲其紋路交錯連長，有無窮盡之意，所以常用在婚糕粿及祝壽粿模中。方樣式樣糖模爲最常見的，祝賀夫妻長長久久，子嗣延綿不斷，長者長命百歲。



七、文字紋飾

(一) 吉祥文字

１． 囍字紋

喜，吉祥喜樂之意，民間視其爲吉祥的文字。吉祥文字經變體的使用，稱之爲「花字」。「囍」字本身並非文字，其被視爲吉祥的圖案使用。「囍」字紋圖案爲各家餅舖中必備的糕餅模具之一，各餅舖圖案皆以斗大的「囍」爲主要圖案周邊飾以花草幾何圖案或以龍鳳同拱「囍」字，象徵「龍鳳呈祥」。



２． 壽字紋

「壽」爲中國傳統極爲重要的觀念，故人民非常重視「壽」的主體觀念。所以「壽」字字體圖案的變化多端，被民間案化、藝術化後，成爲吉祥符號，用於龜粿模中的比例最多，長型謂之「長壽」，字圓者謂之「圓壽」。



(二) 裝飾紋飾

１． 雲紋

以雲頭造型爲糕餅圖案爲主，線條雜而多變，富流暢動感之姿，還有流動帶狀的仙雲爲糕餅背景裝飾之用。

2． 卷草紋

卷草紋爲中國傳統裝飾圖案之一，沒有特定的花卉，多取蓮花、牡　丹、忍冬、蘭花、梅花等花草，通稱卷草紋飾。由於造型依照蔓生植物的成長狀態所構成的花紋，已波狀、曲折、蔓延纏繞爲特色，表現出花草捲曲流動的動感及紋理繁複華美，其優美富動感的線條，有生命繁衍、綿延不絕的象徵寓意。



3． 團壽紋

「壽」字經變體，與回紋、圓字形作搭配形成團壽紋，表長壽、圓滿、連綿等吉祥涵義，極具吉祥寓意，爲祝壽糕仔模、餅印模常見之圖案，變化十分豐富。



八、特殊印模

(一) 西洋器物

自 1642 年荷蘭人登陸台灣開始，台灣先後被荷蘭人及西班牙人所佔領統治三十八年之久，傳播宗教思想和從事壓榨貿易活動。基督教到台灣後開始致力於推廣傳教活動，屬於被西班牙統治地區的淡水也深受影響，歐洲人藉由印製西洋文字、器物等糕餅，來慶祝宗教重要節日，贈送當地居民，來達到宣揚宗教的目的。

外來宗教以融入當地習俗的手法，深入民間傳達宗教意義，故產生中西特色融合的西式糕模出現。



九、吉祥語句圖像寓意

從古時候民間就流行使用吉祥語來表達人間祈求的願望，流傳自今形成龐大的體系，廣泛應用於民間各事物之中。吉祥語句的使用依其組成方式，分爲單字造型和複合字造型兩大類，單一文字如：福、祿、壽、喜等；複合字則爲多種吉祥文字的組合，大部分是四字一組的方式使用，如：吉祥如意、竹梅報喜等，後轉化成爲多複合性吉祥圖像，不乏使用於糕餅模中。

糕餅印模使用複合吉祥用語的圖像較爲少數，結婚禮餅使用較多，可能是結婚大餅餅面較大的關係。

１・ 龍、鳳

龍、鳳各爲單一獨立的吉祥圖案表現形式，圖像經組合具更明顯的象徵意義，通常指向男女雙方及婚姻的代表，比單一圖像更有明確的規則，因龍、鳳本身具有眾多的意像。

２・ 龍鳳呈祥

「龍鳳呈祥」是民間廣爲使用的吉祥用語，尤其在婚禮中更是必備，在傳統圖案中，龍鳳各居一方，龍爲東鳳爲西，自古即以互補的方式呈現，一爲萬獸之王，一爲百禽之首，相互對應。

戰國時期出土的文物，就有以龍鳳作爲裝飾之用。龍鳳爲男女婚姻象徵的代表，最有名的即三國典故中，劉備東吳招親的故事。

「龍鳳呈祥」的糕餅印模常運用於結婚禮餅中，圖案上的位置有一定的規範，龍置於右方表男方，鳳置於左方表女方，龍鳳各居一半，二者相互交融，表現婚姻美滿、富貴吉祥的祈望。



3・ 拜（護）塔／龍鳳拜（護）塔

糕餅印模運用雙龍拜塔圖像爲印模使用，多用於新婚喜慶，使用上也有出現「龍鳳拜塔」等題材取代雙龍的形式，祝賀新人如龍子鳳女一般，和諧美滿。



4・ 雙龍戲（搶）珠／龍鳳戲（搶）珠

雙龍戲珠圖像，主要爲兩條龍爭取火龍珠爲主要表現形式，龍珠源自天體運行的演化而來，爲世界的象徵，從漢朝始出現，用於裝飾，最原本的意義式祈福祈雨，後期演變爲敬神。而在糕餅模中，將其意義轉化爲興旺子嗣、辟邪祈福等概念，龍本身爲祥瑞之物，具有男性、威權的象徵；龍珠又爲龍燈，「燈」與「丁」在閩南語中爲諧音關係，故具添丁之意，在早期的農業社會中，大家都希望家中能出「龍丁」、「龍子」，所以此類餅模廣爲民間結婚禮餅之用，希望家族能人丁旺盛、辟邪納福。

少數以龍鳳戲珠的模印，會將原先雙龍造型改爲一龍一鳳，更符合男婚女嫁的結婚意象，位置也遵守龍在右鳳在左的原則。



5． 鶴、鹿、龜

鶴、鹿、龜這三種動物分別代表三種不同象徵的吉祥圖案，有其代表的意義。三者皆取長壽的寓意來做搭配組合，在結（訂）婚禮餅及祝壽糕模上。

6． 雙喜臨門

相傳「喜」字經北宋王安石變體使用後，成爲「囍」字圖案。因王安石完婚之日，又爲金榜之時，喜上加喜，他隨手於門上提雙喜字，象徵雙喜臨門，沿用幾千年，已成爲喜慶的象徵。

喜字代表一切美好的象徵，通常於婚姻大事中占極爲重要的角色，希望喜上加喜，而鴛鴦又爲匹鳥，故亦爲婚禮時裝飾之用。此類印模用於結婚禮餅中，斗大的囍字加上盛對鴛鴦，除了有喜慶的氣氛，更有成雙成對、夫妻情深之意。

肆、糕餅在年的旋律與生命的旋律中的意義

一、歲時節慶

先民爲了因應氣候的變化，農、工、商的作息，以及對神明、祖先庇佑之感恩和居家生活之調適，在一年的 365 天中，安排了若干的節令，年復一年，周而復始，有如優美的音律，吾人稱之爲年的旋律。這些歲時節令都有祭儀，因此，都備有糕餅供之。分略述下：

(一) 春節

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五爲春節期間；台灣諺語：「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飽，初四接神，初五隔開。」初一到處拜年，需早起。初二回娘家，出嫁的女兒

回娘家與親人團聚。初三較無事，因此可以睡到飽。初四爲灶神及諸神回凡間任職，需準備牲禮供品恭迎諸神下凡，以祈求平安。初五爲隔開，意味著春節的結束，另外民間認爲初五爲「五路財神[28]」的誕辰，傳統上多在這天開市，也俗稱「開市日」、「開工日」。

年節期間傳統上重視神明及祖先祭拜，會用到的糕餅有發糕、甜粿(年糕)、糖塔、菜頭粿、芋粿、糕仔粒等，茲介紹如下：

發糕：

有粉紅色和土黃色之分，而拜佛公比較喜歡用粉紅色的，製作上用的米是再來米，然後放酵母粉經過發酵後再拿去蒸即可。

「發糕」的「發」在台語中寓意「發達」的意思，因此常運用在春節的祭拜上，有著過年討個吉利之意。



甜粿(年糕)：

台灣北部的年糕，做法較費時費工的先將糯米先磨成米漿放入米袋壓乾，再切片放入大鼎和糖漿中一起熬煮，待熟後再以長竹片拉起放入容器。台灣北部爲天然琥珀色，通常切片煎熟食用，亦可裹蛋汁、或太白粉(玉米粉)或番薯粉煎食。

「年糕」的「糕」字與「高」音相同，因此被引申寓有「步步高升」之意。故在春節的祭拜上，使用甜粿的目的就是討個吉利，希望日後能步步高升。

[28]五路財神是從，的五路神發展而來的。古代的五路神又叫路頭、行神，指五祀中所祭的行神；所謂五路，則指東南西北中。後來，五路神被人格化，附會為元代末年禦寇而死的何五路。到清代，五路神就被當成了財神。來源：鄭州日報



菜頭粿：

是以白蘿蔔切絲，混入以在來米粉和玉米粉製成的粉漿，再加入已切碎的冬菇、蝦米、臘腸和臘肉後蒸煮而成。

菜頭粿是由白蘿蔔製成，白蘿蔔在台語中發音爲「菜頭」與「彩頭」發音類似，因此被賦予「好彩頭」的寓意。在祭拜時，使用菜頭粿目的在於討個好彩頭。



芋粿：

是以糯米研磨之米漿壓乾後，再和芋頭去皮切成絲及油蔥香料攪拌，再細分約巴掌大小一塊一塊壓平後放置於弓蕉葉上，再放入籠床後置於灶上大鼎以熱水炊熟而成。

「芋粿」的「芋」字，在台語上與「護」的台語相同，因此被引申爲保護之意。在春節的祭拜上使用芋粿，便是取保護之意，希望能保護家中幼童平安。



糕仔粒：

是用糯米粉和綠豆粉一起攪拌，然後再放入砂糖，最後再拿去蒸即可製成。

糕仔粒除了甜甜得好吃之外，在春節的祭祀上，往往會將其疊成塔狀，寓意著「年年高」的意思。



糖塔：

是將糖煮成水分快沒如漿般的濃稠狀、拉起來有絲的樣子，然後打到快發酵狀在放入模子製成，模子是兩個合在一起，但因天氣熱和不便食用，現在訂做糖塔的人極少，使用的時候通常是在過爐。

「塔」，有辟邪壓盛及步步高升之象徵。因此在春節中，採用糖製成塔的形狀便是要取「塔」的象徵意涵，希望能辟邪壓勝、步步高升。





在淡水，一般家庭祭拜的方法大多爲在供桌的碟盤、供盤上擺放甜料，將甜粿、菜頭粿、發糕，另外再加上疊成塔狀的橘子或碰柑，還有在發粿或包仔粿插上一枝「飯春花」，而富貴人家則會有糖塔一座，以此祭拜神明祖先。

(二) 天公生

農曆正月初九爲天公生，天公就是玉皇大帝[29]，因正月初九爲玉皇大帝誕辰，故這天稱「天公生」，《臺灣省通志》中記載：「正月初九日，為玉皇大帝聖誕，俗稱天公生日，全家齋戒沐浴，備上下桌，上五果六齋，紮紅麵線清茶，下桌供五牲、紅龜粿等；至午夜以後，全家整齊衣冠，依序行三跪九叩頭禮拜祀；全日祭神演戲，大家小戶，爭相慶祝。」[30]可見對於天公誕辰的重視。

天公生祭祀用的糕餅有與春節時使用的發糕、甜粿、糕仔粒、糖塔等相同，除此之外還另有紅龜粿。

紅龜粿：

做法是先將糯米泡水，泡了三四個鐘頭後拿去磨成漿，再把漿脫水瀝乾，瀝乾後進行攪拌使之呈如粘土狀並有彈性，然後就可以將糯米團放入模子裡面，將成龜形的糯米團拿起來放入蒸。用麵粉來做的話，將經過發酵後的麵糰放入模子裡，同樣再拿去蒸。紅龜粿放入的餡料都是甜的，並以紅豆沙和綠豆沙爲主。

「龜」自古常爲長壽的象徵，故「紅龜粿」有著祝賀、祈求長壽之意。在神明生日及一般人做壽上，經常可見紅龜粿的身影。



(三) 上元節

農曆正月十五爲「上元節」又稱爲「元宵」、「燈節」、「元夕」；淡水地方習俗中，這天有許多慶典活動，提花燈、賞花燈、猜燈謎等；家家戶戶以湯圓祭拜祖先及神明；在廟宇的慶典活動中有項特別活動「乞龜」，所謂「乞龜」便是在上元節一大早，將大大小小紅龜粿或其他類的龜，祭於供桌上，等待信眾經由祈

[29] 玉皇大帝是道教世界中級別最高的神明之一。然在民間的神仙世界中，玉皇大帝確實是眾神之王，是與人世相對的天國的主宰。

[30] 主修李汝和，《臺灣省通志》，卷二　第三張　歲時記，台中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p. 12。

求神明同意，以卜筊[31]方式，若得「聖杯[32]」(台語)同意則可以將供龜請回食用或供奉，以保佑一家平安以及事業順遂等。其後一年的同樣時間，信徒要將去年所乞之「龜」加倍償還，視信徒的個人能力、經濟情況歸還，但絕不能少於之前所乞的斤數，至少要和之前所乞的等量，這被稱作「還龜」，倘若沒有還龜則是失信於神明，在以往的農村社會中，這種意義往往代表著一個人失去個人信用，是一種違反道德的行爲。連橫《雅堂文集》中即記載：「慶弔之事，以麵製粿，或磨米為之，形如龜，為之紅龜。喪則用白。龜長壽也，讀如居，謂可居財。坊里廟會，陳龜數十，或重至十餘斤。人向神前乞之，謂可介福。明年此日，乃倍償焉。」[33]淡水的清水巖，從正月初一至十五的年節期間，便有「乞龜」、「還龜」的特別活動，這種活動中所使用到的「龜」，通常是用糯米或米所製成的「麵龜」。

「乞龜」、「還龜」的龜品除了使用糯米及米製成的之外，其他種類也相當多樣，糕、餅、粿皆可製成龜型以供乞龜，有紅龜粿、糕仔龜、芳片糕龜、米粉龜、金錢龜、黃金龜等，斤兩大小相差懸殊，從半斤、一斤的龜至五斤以上的大龜都有，大龜通常由麵包糕餅店包辦定製。

(四) 土地公生

台灣的鄉間小路、農田旁還是城市中處處皆有大大小小的土地公廟，土地公信仰在台灣民間相當普遍；土地公又稱「福德正神」、「福德爺」、「后土」[34]；農曆二月初二爲土地公誕辰，周璽《彰化縣志》記載：「二月初二日，農家皆祀福神，蓋倣古春祁之意，商賈亦然。」[35]可見不論農工商，各種職業、人家皆會祭拜土地公。在淡水土地公誕辰的祭祀中多以鮮花水果祭拜，也有較傳統者會以紅龜粿向土地公祝壽祈福，紅龜粿祭拜完後歸食，有著「食福長壽」的象徵意義[36]。

(五) 清明節〈掃墓〉

春分之後的十五日爲清明節，爲到祖先墓前打掃祭拜的日子，淡水地方習俗中則先將祖先墓打掃乾淨，清除雜草後，在祖先墓上放置「墓紙」或稱「古仔錢」以小石子壓住，此動作稱爲「掛紙」，而另外一種掃墓儀式稱爲「培墓」，分兩種情況，一是新墓，在連續的三年之中，需選定吉日，準備祭品前往祭拜，如家中有喜慶，嫁娶、添丁等，也須前往祭拜，而祭品中的糕粿以「鼠麴糕」爲主，或稱「草仔粿」，但是舊墳則以紅桃粿、紅龜粿祭拜，這些糕粿都有其意義，紅桃粿以及紅龜粿是祝祖先陰壽長壽。

---

[31] 為一種與神明溝通最直接的方式，透過卜筊傳達出神明對信徒的旨意。

[32] 指的是杯(台語)呈現出一正一反的情形。代表著「是」、「同意」之意。

[33] 連橫，《雅堂文集》，卷三・筆記〈台灣漫錄〉，南投市，台灣省政府印刷廠，民國八十一年三月，p. 183。

[34] 土地公為民間信仰中最基層的神明，好似於人間的村里長。土地公是鄉土的守護神，俗話說「田頭田尾土地公」，意味著土地公遍布各地無所不在，因此也是民間信仰中最普遍的神明明。

[35] 周璽，《彰化縣志》，卷九　風俗志，台北市，遠流出版社，p. 436。

[36] 簡榮聰，《台灣粿印藝術—台灣民間粿糕餅糖塔印模文化藝術之研究》，台北市，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司，民國八十八年六月，p. 44。

在早期尚有「揖墓粿」、「乞墓粿」、「印墓粿」，就是在祭拜祖先後，將龜粿分發給前來乞食龜粿的大人小孩，早期民間貧苦，前來乞食的人將會排成一排，講一句好話，「培墓」的人會將龜粿一個一個分與乞食的人，若龜粿不足則須發金錢，以此求祖德流芳，也可保祖先墳墓不會被小孩子惡作劇等；現已無此習俗，且也盡量講求簡單化。

草仔粿(鼠麴糕、艾草粿)：

鼠麴糕與艾草糕都稱爲草仔粿，只是所使用的草類不同，一是使用鼠麴草，一是使用艾草，而艾草粿通常爲客家人所用。

它們的做法是將糯米粉加水，和成粉糰，取一小塊先入開水煮熟，再將熟麵糰與生麵糰和勻。最後再加入混有鼠麴草末或艾草末的糖，與油再次揉勻。

鼠麴草除簡單易得之外，在醫藥上還有去瘀、鎮咳、止喘、降壓的功效。另外艾草也有驅毒的功效。故這草仔粿會使用這兩種草，其目的是祈望食用此粿品後，能夠對身體的強壯有所幫助。



(六) 七夕

農曆七月初七爲「七夕」，此日也是「七娘媽生」、「床母生」、「拜魁星」及牛郎織女的神話故事之日，所以台灣民間很重視此日，淡水也不例外。以下就祭品與糕餅印模分述之：

1．拜七娘媽（織女）[37]

「拜七娘媽」之俗自先民從唐山過台灣即有。清乾隆年間，孫霖所作〈赤

[37] 七娘媽(織女)，為玉皇大帝的第七個女兒，是兒童的保護神。

崁竹枝詞〉中有紀載：「台俗：七夕，家供織女，稱七星娘。」[38]祭祀「七娘媽」。

主要供品有紅龜粿和人形餅。紅龜粿是向「七娘媽」祝壽並答謝，人形餅則是感念七娘媽普渡眾生[39]。

傳統習俗中，至寺廟祭拜如有向七娘媽「掯絮[40]」(台語)者，需換新絮。所謂「掯絮」就是在子女滿月或周歲之後，向神明請示同意其子女爲義子義女，保佑其平安成長到成年。家中有兒女已屆十六歲者，向七娘媽祭謝後「脫絮」(台語)表示成人，將紅龜粿分送鄰里友人。

2．拜床母[41]

床母亦稱「床公婆」，拜過七娘媽後，需另備芋油飯、雞酒、芋搓仔粿拜謝床母，保佑孩童的成長。至於芋搓仔粿的使用乃是因其代表著「宜子」的意義。

(七) 中元普渡

農曆七月俗稱鬼月，民間整個月舉行「普渡」祀無祀之魂等等祭祀孤魂的活動祭典。七月初一爲「開鬼門[42]」，民眾會掛上「普渡公燈」爲好兄弟照明指引。七月十五中元節，俗稱「七月半」，也是中元地官大帝[43]的誕辰、佛教的「盂蘭盆會[44]」。普渡前，以燈籠或「放水燈」提醒好兄弟聚集，享用祭祀供品。七月三十「關鬼門」，地藏王菩薩的誕辰日，也是中元普渡最後一天的日子。

七月祭好兄弟的祭品，不論是「公普」[45]、「私普」[46]，各街各廟各家各戶，供俸的祭品甚多，如陳培桂的《淡水廳志》記載：「牲禮饌具，積如山陵。」[47] 。

---

[38] 〈清〉孫霖，《續修臺灣府志》，卷二十六　藝文（七）　詩（四），臺灣大通書局，p. 980。

[39] 傳說人間糟蹋五穀，王母娘娘下旨懲罰，要讓人間災禍四起、人吃人，七娘媽為救人間眾生，於是向王母建議，世人善多於惡，用米粉做餅，上面印上人形，普賜蒼生，使人間有「吃人之名」無「吃人之實」，又可度過飢荒。當世人明瞭人形餅的源由後，感念七娘媽的恩德，故於每年七月初七，特意摩米粉印製人形餅，感謝七娘媽。

[40] 「絮」，以紅絨線穿有古錢、銀牌或鎖牌的飾物，用來掛在小孩頸上，以祈求七娘媽的保佑。

[41] 民間信仰的床神是女性，因此叫做「床母」，她是兒童的保護神，通常有小孩的家庭，在孩子十六歲以前都要拜床母。

[42] 也就是打開地藏王所管轄的地獄門的日子，直到農曆七月三時才關閉。

[43] 地官大帝為三官大帝之一，傳說三官大帝奉玉皇大帝委任，分別管轄天、地、水三界。天官司管人間之福，即所謂「天官賜福」，地官管人閣罪惡，即所謂「地官赦罪」，水官司掌人間災惡的解除，即所謂的「水官解厄」。三官分別司祭人世間的善惡，保護眾生為民間善信所崇拜。

[44] 其是依據《盂蘭盆經》中佛陀大弟子目連救母的典故而來，據說最早是南朝梁武帝開始舉辦，於每年的七月十五舉行超渡，其後歷代君臣百姓皆效法，遂成為佛教寺院年度的重要活動之一。

[45] 又稱中元祭或盂蘭盆會，為農曆七月地方最大盛典，當地民眾參加由信仰中心寺廟所主辦的普渡活動。

[46] 為規模較小僅止於家庭或私人的普渡活動。

[47]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一風俗考，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二年三月，p. 742。

中元普渡期間需使用到的糕餅品類繁多，包含雪片糕、糖塔、糕仔粿、粿粽、中元糕等。雪片糕是祭拜糕類；糕仔粿爲鳳片粉製成，有長壽之意；因不宜以紅龜拜鬼，故改以糕仔祭祀，即爲中元糕。中元節要用到印模的普渡祭祀糕餅，以糕類的數量用的最多。

(八) 中秋

農曆八月十五日爲「中秋節」，俗稱「八月半」、「月節」。此日，在淡水地方習俗中以月餅、紅龜粿祭土地公、拜祖先。

早從明代開始，即有在中秋節前幾日互贈月餅的習俗。

台灣的中秋節傳習古風，淡水無異，其祭品也以粿、餅爲主，各地方志均有記載，如《臺灣縣志》、《諸羅縣志》、《淡水縣志》、《澎湖廳志》等，內容大致相同。

如中秋月餅，台灣民間俗稱「中秋餅」，因其餅形如滿月，象徵團圓，有吉祥之意，也代表思鄉之情。

月餅形狀花紋和大小隨著時代變化繁多，十分好看，如牡丹、梅花、寶相花、菊花等圖案；大小從一、二吋到七、八吋都有。口味有甜有鹹，餡料更是豐富，五仁、豆沙、油蔥肉、核桃、鳳梨、冬瓜糖肉、蛋黃、紅豆沙、綠豆沙、棗泥‧‧‧‧‧‧五花八門，不勝枚舉，可看出現代人越加講究月餅的美觀與其口感。

(九) 重陽〈作祭[48]〉

農曆九月九日，俗稱「重陽」，由於九月九日皆屬陽數，故又稱「重九」。此日，淡水地區如同台灣其他地區的習俗，會舉行「祭祖先」的活動，故又稱「公媽節」。連雅堂《臺灣通史》記載：「九月初九，謂之重陽，以麻粢祀祖。兒童於紙鳶，繫以風箏。自朔日起，人家多持齋，日九黃齋，泉籍為尚。」[49]，而現今多只剩下祭祖的習俗。

關於祭品則有紅桃粿和紅龜粿等：

紅桃粿：表虔誠祝壽心意。祝福祖先陰壽長壽。

紅龜粿：神明祖先的祭禮，以表虔誠祝賀之意。

二、生命禮俗

生命禮俗意謂人的一生，自生命的開始到終老爲止，先民或爲保護嬰兒之成長，或爲祝賀平安長大，亦或結婚大典，甚至祝人告終等等，在這些重要的時間，都有各式禮儀，學者稱之爲生命的旋律。在這一旋律運行之際，糕餅

[48] 「作祭」為台語，意思是指祭拜祖先。

[49] 連橫，《臺灣通史》，卷二十三　風俗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p.322。

經常是不可或缺的一項，因此，本文略作探討：

(一) 出生禮

１． 出生

古禮中，嬰兒出生時不能以水洗澡，直至嬰兒產後三天，才能替嬰兒沐浴。然後抱到正廳拜佛神、祖先和註生娘娘[50]、床母等神明，以稟告神明，祈求祖先保佑，並爲嬰兒命名。產家則做油飯、雞酒、米糕分贈親友，富有家庭甚至還設宴請客，訂製餅分贈前來祝賀的親友。而現今淡水人多只是分送油飯、雞酒、米糕之類，已較少製餅分送親友，而至於米糕則是指甜米糕。

２． 滿月

台灣習俗中產後滿一個月稱「滿月」，亦或稱爲「彌月」，淡水地區亦是如此。在這天會爲嬰兒剃頭，也就是替胎毛，並且利用這些胎毛製成「胎毛筆」。

另外，此日皆會祭拜祖先神明，以請求庇祐嬰孩能健康、平安。祭祀時，會準備油飯、雞酒、紅龜粿、酒和水果等，若曾向註生娘娘祈子者，滿月時亦要以油飯、雞酒和紅龜粿等答謝神明，祭祀完後，將油飯、紅蛋分贈給鄰居及親朋好友以此來分享喜悅。

此時產婦的娘家會贈送童裝、童帽、童鞋，俗稱「頭尾」或「送頭尾」，與根蕉〈香蕉〉、紅龜粿、紅桃、紅蠟燭等，稱「彌月之敬」。而娘家所送之禮品，產家收紅龜粿、香蕉八成，留下二成與油飯、米糕一並做答禮。

以上這些贈禮皆有用意，「送頭尾」的童裝表示「有頭有尾」、「有始有終」、「長命百歲」。送香蕉，因河洛語「根蕉」與「緊招」同音，意「緊招小弟」。又香蕉外型肖男性生殖器，故暗喻「再生男」的意思。「紅龜」表示「長壽」。

３． 做四月日—收涎餅

在台灣習俗，嬰兒屆四個月時，要爲其「做四月日」。所謂「做四越日」就是爲嬰兒於屆四個月時「祈禳」並「收涎〈口水〉」，淡水地區也不例外。

四月日要祈禳，是因「四」字被視爲不祥，而此時小兒極易「流涎」，傷其皮膚、濕其衣褲亦影響健康。故藉此生命禮俗讓小兒平安、收涎。

滿四月日這天，一般民間會準備相關供品來祭拜神明祖先，以感謝庇祐。此日祭祀以牲禮、紅壽桃、紅龜粿、酥餅等敬神祭祖，祈求小孩平安、長壽。之後長輩以酥餅在小兒嘴下拭涎，嘴唸：「收涎收離離，囝仔食百二。」

[50] 註生娘娘本名陳靖姑，是五代福建古田縣臨水鄉人，因此又稱「臨水夫人」。傳說她曾斬蛇除妖，被封為「順懿夫人」。由於其早期催生助產的傳說，演變為專負責子嗣繁衍、保佑嬰兒平安之神。

在淡水地方習俗中，收涎此種活動多爲自家內部的活動，因此較無涉及到如同滿月般之類的送禮習俗，故不會出現親友間互相贈禮的情況。

４． 做大睟—周歲「抓周」、「試兒」

嬰兒出生滿一歲，要「做大晬」又稱爲「做度晬」，傳統舉行「抓周」、「試兒」之禮。

此日會準備牲禮、紅龜粿、酥餅等供品祭拜神明祖先，以表示感謝庇祐。娘家在此日需送頭尾和紅龜粿爲禮品，只是這時的禮品以紅龜粿爲主，又稱爲「度晬紅龜」或「外媽龜」。

所謂「抓周」，就是在周歲之日，讓囝仔在大米篩內抓取物件，以測試其將來的出路或前途性向，故又稱「試兒」。

出生禮於此時即算結束，嬰兒隨即踏入幼兒階段，每年生日即不再祭拜祖先神明。

(二) 成年禮

１． 做十六歲—成年禮

台俗，小孩成長至少年，到滿十六歲，傳統要「做十六歲」——「成年禮」，經此禮始算成年、成人。

然在淡水地區則較無這種大型的成年禮儀式，只是在小孩長至十六歲時，於七娘媽生日這天，爲小孩舉行「脫絫[51]」(台語)，表示小孩已經成年，不再受到七娘媽的保護。

２． 謝天公

有些家裡的孩子出生時較難養育，身體疾病較多，家中則會向天公和三界公[52]等神明祈願，保佑孩子能順利長大成人，至十六歲成年時，即以豐盛的供品來答謝神明，此即俗稱爲「謝天公」。

祭拜天公時以齋品爲主要供品，另外需準備供水果、麵線、紅龜粿和一些甜品等，感謝天公等眾神保佑小孩至成人。

此種儀式在淡水地區並不普遍，除非是家中小孩天生較爲體弱多病，有祈求過天公和三界公保佑，才需在這天還願、答謝天公。

---

[51] 在傳統民俗中，約在兒童周歲前後，會在七娘媽生這日前往寺廟裡請求七娘媽保佑小孩，並在小孩頸上掛以紅絨線穿有古錢、銀牌或鎖牌的「絫」。往後每年七娘媽生時皆會更換新的紅絨線，稱為「換絫」。直至小孩長至十六歲已成年時，就會為其「脫絫」，也就是脫去絫。

[52] 也就是所謂的三官大帝，傳說三官大帝奉玉皇大帝委任，分別管轄天、地、水三界。天官司管人間之福，即所謂「天官賜福」，地官管人閣罪惡，即所謂「地官赦罪」，水官司掌人間災惡的解除，即所謂的「水官解厄」。三官分別司祭人世間的善惡，保護眾生為民間善信所崇拜。

台俗成年禮中，使用印模製成的糕餅供品，皆用以祭祀和小孩有關的神祇之用，以粿類最爲常見，例如紅龜粿，用以感謝眾神明的庇護，也期盼能保佑平安之意。

(三) 婚禮

１． 文定—小聘

禮俗中，訂婚「文定」俗稱「小聘」。男方準備貼「生庚」二字的紅綢、金花、綢緞盒、金手環〈一對〉、金簪、金手指〈金戒指〉、耳環及豬肉、羊肉、喜酒、糕仔、糖仔餅、紅綢、黑綢、烏紗綢、連招花、蠟燭四對、禮炮、禮香四束、糍花、麻糍、禮餅、毛巾、定頭錢等聘禮，由媒人陪同男方父母長輩送到女家，爲女方「掛手指」〈戴戒指〉訂婚，小聘即爲完成。[53]

文定小聘的糕仔、餅仔，就須以印模印花，有雙囍龍鳳、方勝、元寶等吉祥圖案。[54]

２． 納采—完聘

「納采」俗稱「大聘」、「完聘」，亦即股禮中的「納徵」。大部分人家裡都將大聘和迎娶一同舉行，稱爲「完聘娶」。大聘在舊俗中極爲重要，聘禮亦較爲隆重，男方準備納采書、婚禮書、聘金、聘禮目錄奩單：衣褲、紅綢、豬、羊、糖、大餅〈漢餅〉、盒餅、米香餅、桔餅、福糖、萬糖、蔬盒、喜酒、禮燭、禮炮、檳榔、連招〈蕉〉花等，這些禮品都裝滿木盛內，上面蓋紅布，由男方及親友媒人贈至女家，而當日男方扛的大餅，數量越多就越體面，已表示對女方的重視。女方在收下聘禮之後，將大餅分贈給親友及鄰居，以表示女兒已經有婚約，此即稱爲「貺大餅」。而收餅的親戚朋友，則回贈紅包來祝賀，稱爲「添粧」。在男方下聘後，女方則回禮「狀元糕」，以示嫁個狀元郎，象徵好采頭。

從前述的納采完聘禮品，可知喜餅、大餅在此生命禮俗是占大部分的。而糖塔印模所印的糖鴛鴦、糖鼓、糖龜、八角糖、萬字糖……等，也是糖塔類的主要。

３． 結婚第三天「舅仔探」

結婚第三天，新娘外家的兄弟會攜帶紅花、糖品、餅品、果品到新郎家訪問，俗稱「舅仔探」、「探頭花」；目的即是探問新婚夜女方是否爲完璧之意，並且順便帶新娘歸寧，男家則回贈紅包、紅龜粿、糖品、餅品等，作爲「伴手禮」。

婚嫁禮俗繁複隆重，儀式繁雜，大抵可區分爲「婚前禮」、「婚禮」和「婚

---

[53] 王灝，《台灣人的生命之禮：婚嫁的故事》，台北，臺原，民國 81 年，p. 46。

[54] 簡榮聰，〈台灣傳統粿印與民俗節慶〉《穿透古今—平面雕專題展》，苗栗，苗栗文化局，民國九十四年，p. 67。

後禮」，其中使用印模製成的糕餅供品，餅類占婚禮的最大部份，用以分贈親友，而粿類則適用以敬拜神明之用。

(四) 壽禮

１． 做生日—祝壽

一般習俗中，人在五十歲以前的生日只做「內祝」。人到五十歲以上所祝的生日，才可稱「壽」，是爲第一次的壽禮，一稱爲「暖壽」或「半百添壽」，因此，到五十歲需做壽，並於誕生日設宴招待送禮的親朋好友。以後每十年的生日稱「大生日」，六十歲稱「下壽」、「小壽」，七十歲稱「中壽」，八十歲稱「上壽」、「大壽」，九十歲稱「耆壽」，百歲稱「期頤」分別舉行祝壽。[55]

五十歲以上的生日，則要以紅龜粿敬神祭祖以稟告祝壽。紅龜有龜鶴同齡之意，另外粿數有一定原則，通常按壽齡再加上一個好數字，如六、十二、二十四等，祝福對方添壽之意，亦即俗稱的「求壽」。

「坐大生日」，通常選定生日前後的吉日舉行，傳統先做大紅龜贈親戚朋友及鄰居，同時邀請參加壽宴。出嫁女要準備父母長輩大壽歲數加十二之「紅桃粿」回來拜壽，兒子則要準備相同數目之「紅龜粿」又稱「後生龜」。壽宴之後，所有前來賀壽的親友皆會被回贈紅龜粿、壽桃、豬肉等作爲贈禮。

壽禮中，粿類用品多用以祝賀長壽之用，使用印模製成的糕餅供品，街與祝壽等吉祥含意有關，依贈送者身分不同，而意義也有所不同。

(五) 喪禮

１． 喪儀中之粿糕

喪後第二日，親戚朋友送輓聯、銀紙、燭香、糕仔、金錢等，稱「作軸」或「作敬」，其中傳統較講究禮數的家族，期弔奠禮品與答謝禮品，有粿糕之屬。

這時期喪禮中的粿糕，顏色粿類爲青黛，多以草仔葉摻於模漿作成，與掃墓、普渡相同。白粿造型與紅龜粿相同，但不染色，亦稱之爲「饅頭」。連雅堂《臺灣通史》中有記載「歲時慶賀必用紅龜，象其形也。白者為之饅頭，則喪祭為之爾。糕餅餡，多用豆，或以麻，或搗落花生為未而和之。」[56]

前來參加喪葬禮儀的親友，祭悼後以蓮花糕與以回贈，其呈長方形，上印有蓮花及鶴等圖案，旁印有「哀感謝」字，又稱爲「答謝糕」。蓮花糕在淡水現代喪禮中已不多見。

---

[55] 李秀娥，《臺灣傳統生命禮儀》，台中，晨星，民國九十二年，p.122。

[56] 連雅堂，《臺灣通史》，卷二十三 風俗志 飲食篇，台北市，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再版，p.684。

此後遇祖先忌日時，所需備妥的供品則大抵與清明掃墓時相同，新墓需以鼠麴粿〈草仔粿〉祭拜，而舊墓則以紅龜粿祭拜。

2． 祖先忌日

凡遇祖先忌日，已經出嫁的女兒，就要備妥龜粿等牲禮和紙箔回來祭拜。這些粿類也與清明祭祖一樣分爲兩種，一爲紅色一爲青色，青色屬新亡之尊親屬。這種龜粿形狀如一般的紅龜粿，只是顏色不同而已。

3． 還老願

凡老輩過是一周年後，其子孫爲代替老輩在世時所許之願未還而還願，特別請道士或僧尼，在家備辦牲禮紅龜糕餅，祭謝所有眾神明，稱之「還老願」，俗信愈早還對子孫愈好。[57]

傳統喪禮，使用印模製成的糕餅供品，以掉念亡者，表達子嗣的思念爲主，亦有替父母作功德所準備的粿品。

(六) 其他

1． 遷居、入新厝、生意開張

遷居或新居落成，親朋好友送禮品來賀，主人依禮各贈紅龜粿二個示謝。紅龜粿事先需在家中神明廳祭神之後，才能食用或贈人。

又生意開張，有製作大糕仔龜，赴廟中祭拜，拜畢殺龜，闔家分食，並致贈往賀親友，以祈平安、大賺錢。

伍、結論

台灣糕餅的歷史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當時糕餅的製作相當精良，品質佳又有豐富多樣的應景糕品推陳出新。加上清代之後，隨著大量閩粵人士的移居台灣，意將原鄉傳統的糕餅引入台灣，豐富了台灣民間社會的餅食文化，在歲時節令或生命禮俗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淡水的開發很早，雖說只是一個小鎮，但卻維持保有這份傳統的文化。

從節慶、宗教和禮俗觀之，可看出糖糕餅粿深深的深入人的生活之中，從大型節慶宗教祭典至小型自家的生活禮俗，處處可見糖糕餅粿的蹤跡，表明著其在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因此使得糖糕粿餅並不僅僅只是一種食物，而是一種表達人們內心情義的物品，成爲人與人或者人與神之間溝通的媒介之一，另外我們也從三協成餅模的圖像意涵中看出爲生命所流露出的寓意，並透過這些代表著

[57] 簡榮聰，〈台灣傳統粿印與民俗節慶〉《穿透古今—平面雕專題展》，苗栗，苗栗縣文化局，民國九十四年，p. 70。

特殊意義的糖糕粿餅，讓人與人，人與社群，人與神靈間達到溝通的目的，使得雙方的關係更加緊密連結並獲得祝福。

淡水常用的糕餅印模，可分爲以下幾大類：神話故事、神靈瑞獸、動物諧音、植物諧音、器物諧音、象徵圖像、文字紋飾、吉祥語句圖像寓意。由此可知，糕餅印模種類繁多且寓意深遠，不同的圖像或字句代表著吉祥、如意、福氣等等義涵，有些圖像的意義相輔相成或是重疊，藉此次的研究，希望個人能夠認識淡水深具優美的糕餅文化，也期待這份研究報告可以對淡水鎮有一點點的貢獻。雖然有老師的指導，可是，我們是一群才疏學淺的大學生，掛一漏萬必然不少，尚祈諸先進多多包涵不吝指教爲禱。

陸、參考資料

文獻：

〈西漢〉史游，王雲五主編，《急就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台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八十八年。
〈東晉〉王嘉，《王子年拾遺記》，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八年五月。
（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北京，團結出版社，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
（隋）謝諷，《說郛》〈食經〉。
〈唐〉劉禹錫，《劉禹錫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一版。
（唐）馮贄，《雲仙雜記》，藝文印書館。
〈宋〉李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民國五十年九月新一版。
（宋）郭若虛，《圖書見聞誌》，台北，藝文印書館。
（宋）陸佃，《埤雅》，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五年六月。
（宋）周密，《武林舊事》，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台北，文光圖書公司，民國五十七年十月。
（明）沈榜，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一冊〈宛署雜記〉，北京，中國書房出版。
（訂正者）渡部溫，《校正康熙字典》，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
〈清〉孫星衍，《燕丹子・墨子》，台北，中華書局，民國五十四年。
（清）童岳荐編撰，張延年校注，《調鼎集》，河南省，新華書店。
（清）孫霖，《續修臺灣府志》，臺灣大通書局。
（清）劉逢錄撰，王雲五主編，《尚書今古文即解》，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清〉周璽，《彰化縣志》，台北市，遠流出版社。
〈清〉陳培桂，《淡水廳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二年三月。
連雅堂，《臺灣通史》，台北市，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再版。
連橫，《雅堂文集》，南投市，台灣省政府印刷廠，民國八十一年三月。
《台北縣志》，二十三卷商業志，(日據台北州時期各街庄物品販賣者公佈表)。

主修李汝和，《臺灣省通志》，台中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著者不詳，《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台北市，聯經出版，民國六十九年七月。

專書：

簡榮聰，《台灣粿印藝術ー台灣民間粿糕餅糖塔印模文化藝術之研究》，台北市，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司，民國八十八年六月。

簡榮聰，〈台灣傳統粿印與民俗節慶〉《穿透古今—平面雕專題展》，苗栗，苗栗文化局，民國九十四年。

王灝，《台灣人的生命之禮：婚嫁的故事》，台北，臺原，民國八十一年。

李秀娥，《臺灣傳統生命禮儀》，台中，晨星，民國九十二年。

期刊論文：

華家緯，《台灣傳統文化圖像研究—以木製糕餅印模爲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網站：

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index

從海港到「空港」：淡水港埠變遷與淡水水上機場之發展 *

曾令毅**

（會議論文初稿，請勿引用）

摘要

本文欲探討之主旨，主要爲討論淡水港埠地區「轉型」成爲水上國際機場之過程及發展。首先，除了概述清代自日治初期以來淡水港埠及自然環境變遷外，本部份主要想探究淡水港口區域爲何會成爲 1910 至 20 年代殖民政府考慮建設機場之地，以及爲何能成爲 20 年代歐美各國進行亞太地區「洲際飛行」的重要停泊航點之原因及條件，同時也試圖從現有的資料中探究 20 至 30 年代海軍航空隊及民航公司相繼於淡水進行飛行試驗的意義。其次，主要是探討 1930 年代淡水水上機場之設立過程及發展。隨著 1930 年代末期南進政策的加速催化，特別是台灣爲日本聯結南洋地區之重要轉場，同時因南洋地區本身半島或島嶼之地理因素，使得當地主要機場多爲水上機場，爲考慮南洋地區的空運發展，總督府遂於 1939 年重新提出原本被擱置的水上機場設立案，並陸續展開所謂「海洋循環航線」之測試，以興建淡水水上機場之機庫及相關之氣象與通信設施。最後，擬將討論 1945 年 8 月終戰後迄至 1948 年 8 月淡水水上機場撤廢後之情形。此部份最重要的目的在於討論爲何淡水水上機場消失的原因，並試圖由相關的接收檔案探究是否因戰後相關的政策、技術及國際背景造成淡水水上機場的消失，而其消失是否意味著淡水港埠區域的國際交通位置及相關條件已經不在？從而宣告淡水的沒落？而淡水水上機場撤廢後的歸屬及土地處理的情況爲何？這些則是此部份所欲探究的重點。

關鍵詞

淡水港、洲際飛行、水上機場、綠十字飛行、機場接收

---

* 拙文撰寫過程中承蒙淡水耆宿周明德先生提供許多關鍵資料、觀點及鼓勵，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陳國棟老師對於初稿之指導及給予諸多寶貴意見，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客員研究員洪紹洋博士於筆者赴日搜集資料時所給予之協助，以及撰寫過程中之多次討論。另外，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王麒銘學長、台史所陳世芳小姐也在資料搜集時給予許多指引及協助，謹此深致謝忱。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研究生（tseng.linyi68@msa.hinet.net）

一、前言

台灣北部的淡水地區早自荷西時代以來一直是海上航行的重要補給點，清代隨著漢人移民陸續來台墾拓，淡水所具備的天然條件及寬廣河面逐漸使其成爲重要的停泊港口，並同時扮演海運及內河航運間樞紐的重要角色。十九世紀後半台灣開港後，北台灣之茶、樟腦等特產大量出口至世界各地，商業的繁榮則促進淡水河運更加興盛，因此淡水港乃逐漸成爲二十世紀以前台灣的第一大港，並同時成爲護衛台北府城之軍事要地。進入日治時期後，隨著基隆港興起，加上淡水河因天然及人爲因素導致河床日益淤淺，特別是隨著航海科技的進步，使得淡水港逐漸無法承載大型輪船停泊，於是淡水港之國際港埠功能逐漸被基隆、高雄港等新興港口所取代。雖然如此，就地理及交通要衝來說，淡水港埠區仍保有一定的價值與位置，特別是在飛機這類新式的交通運輸工具出現以後，仍可見其所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因此本文欲探討之主旨，主要爲討論淡水港埠地區「轉型」成爲水上國際機場之過程及發展。[1]

首先，除了概述清末自日治初期以來淡水港埠及自然環境變遷外，此部份主要欲探究淡水港口區域爲何會成爲 1920 年代左右殖民政府進行飛行試驗之地，以及爲何能成爲 20 年代歐美各國進行亞太地區「洲際飛行」的重要停泊航點之原因及條件，同時也試圖從現有的資料中探究 20 至 30 年代海軍航空隊及民間航空公司相繼於淡水進行飛行試驗的意義。

其次，主要是探討 1930 年代淡水水上機場之設立過程及發展，特別是 1930 年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設置臨時航空掛後，隔年曾對台灣設置民用國際機場展開調查，而當時的首選即計畫於淡水設立水陸兩用機場，雖然其後因爲陸上機場腹地之限制等因素，連帶使得水上機場設立案被否決。然而，隨著 1930 年代末期南進政策的加速催化，特別是台灣爲日本聯結南洋地區之重要轉場，同時因南洋地區本身半島或島嶼之地理因素，使得當地主要機場不少爲水上或水陸兩用機場，故爲考慮南洋地區的空運發展，總督府遂於 1940 年重新提出原本被擱置的水上機場設立案，並陸續展開所謂「海洋循環航線」之測試，且開始徵收鼻仔頭之土地，以興建淡水水上機場之機庫及相關之氣象與通信設施。不過 1941 年淡水水上機場竣工營運後，不到一年隨即由民用轉爲軍用，而雖爲軍用但其仍然扮演台灣往來南方地區之主要客運機場之一，因此本部份擬透過相關

[1] 目前關於淡水水上機場之前人研究成果，主要為周明德，〈被遺忘的台灣第二座國際機場：淡水水上機場〉，《海天雜文》(1994)，該文可說最早關於淡水水上機場之專文，並且也是由在地耆老所觀察而留下的珍貴記錄。另外，台北縣政府文化局所出版的《台北縣定古蹟淡水水上機場調查研究暨修復計劃》(2005)，以及以此古蹟調查報告書為基礎，並由該計畫團隊成員張志源、邱上嘉所另文撰寫之〈西元 1937-1945 年台灣淡水水上機場角色功能與空間配置〉，《科技學刊》第 16 卷，人文社會類第 2 期，2007 年 10 月，頁 151-161；後兩文皆以古蹟調查及建築專業為主，歷史敘述為輔，可說為瞭解該機場的入門資料。不過，或許限於當時史料公開程度不如現今，或者迫於結案時間之因素，但就水上機場歷史發展之敘述方面，尚留給後人許多努力的空間。

資料試圖勾勒出淡水水上機場實際營運的情形，並探究 1943 年後海軍高雄警備府在淡水水上機場及周邊航空兵力之駐防。另外，尚討論 1945 年 8 月戰後淡水水上機場之使用概況。根據目前所掌握資料顯示，戰後淡水水上機場第一次有飛機停留爲 1945 年 9 月「綠十字飛行」，主要目的爲運送大藏省之鈔票來台，以安定戰後通貨不足，及供日本人遣返之用，因此該部份擬使用相關檔案，輔以當時參與此任務人員之日記及回憶，試圖重現當時的情況，並說明此次飛行之意義。

二、淡水港埠變遷及航空活動

（一）淡水港埠與環境變遷

近代淡水港區域有較大的變遷應始於 1858 至 1860 年天津條約開埠後，當時北台灣之特產茶、樟腦透過該港大量出口至世界各地，使得淡水港埠及沿岸的河運更爲興盛，商業更趨繁榮，並逐漸躍居爲二十世紀以前台灣最大的港口，吞吐量約占全台一半左右。[2]而當時淡水港埠停泊的船隻種類主要爲傳統木製帆船，它們除往來於台灣及中國沿岸外，也來往於淡水河至台北府城沿岸，因此若欲探究淡水港埠變遷，首先或許應從船舶的變遷概況談起。根據相關的研究，1862 年清廷開放淡水、安平爲通商口岸後，原本的傳統帆船業尚維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繁榮，不過隨著十九世紀後半「銅底夾板船」及輪船開始出現於台灣航路後，具有更高安全性、更大承載量及機械動力的新式海上交通工具即迅速取代傳統帆船。若以淡水港爲例，1876 年外國船舶前來港者總計有 111 艘，其中僅有 44 艘爲輪船，迄至 1890 年時，帆船數量大爲減少，而輪船則增加至 126 艘，計達 177,500 噸，由此可知台灣的海運業自十九世紀末則成爲了輪船的擅場，帆船退至微不足道的地位。[3]

至於淡水河河運方面，也因傳統海運帆船業之勢微而影響甚深。清末淡水港區域的範圍主要包括海關所在地的滬尾，向上游延伸至大稻埕、艋舺等沿岸貨物交易之地，形成淡水河的河運系統。這條河運系統除了傳統帆船（商船）往來其中外，也包含往來於台北及滬尾的聯絡汽船；帆船可以隨潮水直抵艋舺以上，三、四百石（約 20 至 27 噸）商船儘可滿載而乘出入，即使大號商船，亦可半載而隨潮進出，[4]十九世紀末營運的聯絡汽船，迄至日治初期仍見穿梭於台北及滬尾間的河道，而淡水港埠外在 1895 年 6 月 9 日日本初次佔領滬尾時，也尚能容納吃水 4 公尺，排水量約 1,609 噸之日本海軍通報艦「八重山號」停泊，

---

[2] 黃富三，〈河流與聚落：淡水河運與關渡之興衰〉，收錄於黃富三主編，《海、河與台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9 年），頁 107；陳國棟，《台灣的山海經驗》（台北：遠流出版，2006 年），頁 94-95。

[3] 參見陳國棟，《台灣的山海經驗》，頁 112-115。

[4] 黃富三，〈河流與聚落：淡水河運與關渡之興衰〉，頁 108；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域史》（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6 年），頁 87、98。

[5]港埠周邊的水運可說仍爲興盛。不過隨著 1901 年台北淡水間之淡水線鐵路通車，以及 1908 年後北淡公路的陸續興築，原先以水運往來於港、市的運送方式，已部份由鐵公路所逐漸取代，特別是 1908 年基隆築港漸次完成，使其一躍成爲台灣北部最大之貿易港後，因而使得淡水之貿易也逐漸移轉至基隆，同時基隆港自 1899 年經過數次的整建計畫後，迄至 1919 年時已可容納萬噸級船舶進出，[6]於是造成僅能通行吃水四尺以下五、六十噸之小輪船，或載重千石左右（約 68 噸）帆船的淡水港沿岸區域之河運，以及僅能於滿潮時最多承載三千噸左右之港埠，[7]被新興的基隆港取代而迅速沒落。

然而影響淡水港埠及沿岸河運產生變化的原因除了運輸科技的進步及多樣化外，尚包括人爲的影響及自然環境的變遷，特別是因此而造成的河川水位降低與河床淤積。[8]1919 年時總督府方面爲圖南方及海外發展，曾計畫將淡水規劃爲軍、商兩用之港口，並委託台北廳技師梅田清次對淡水築港計畫進行調查，此計畫最後雖未獲實現，但卻提供了當時淡水港埠及沿岸河流性質變遷的詳細資料。根據梅田技師的調查，造成淡水港埠及沿岸產生變遷主要原因，如下所述：[9]

1.淡水河流域廣大，平時每秒流量爲 4,500m³，颱風及雨季來臨時僅數小時之內每秒流量即可達 66 萬 m³，造成河水迅速上升並使沿岸氾濫成災，而豪雨及颱風造成山洪易夾帶大量土石泥沙沖積至中下游的河床及低窪地區，迄至 1919 年度爲止，平均每年受災損失估計高達約 80 餘萬圓。

2.淡水河上游的大嵙崁溪、新店溪、基隆河因山高水急，土石沖刷嚴重，所沖刷下的土石流至中下游後即變成黏度高的細小土砂（黏土），使得下游河水流速緩慢，特別是台北至淡水河口一帶，情況尤爲顯著。此種情況則造成 1919 年時大稻埕需滿潮時才能勉強航行吃水四、五公尺以下五、六十噸之帆船，對照日本領台時大稻埕可停泊二、三百噸小汽船的情況來看，可見河床淤積日益嚴重。

---

[5] 參見福島安正編，〈六月九日〉，《淡水新政記》（出版資料不詳，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1895 年）；或可另見拙作，〈1895 年《淡水新政記原稿庶》之史料介紹及其價值〉，《第四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歷史系，2007 年），頁 14-15。

[6] 參見黃富三，〈河流與聚落：淡水河運與關渡之興衰〉，頁 119-122；陳國棟，《台灣的山海經驗》，頁 112。

[7] 交通局港灣課，《淡水港調查書》（台北：同編者，1934 年）頁 85。前書所謂滿潮時可容納三千噸左右之輪船主要指載運木材及石油的輪船，其中載運木材之三千噸輪船應指「施合發材木行」所屬，往來於日本及台灣間專門載運杉木及松木的「杭州丸」。參見周明德，〈台湾に於ける民間の木材王国・施合発商行盛衰記〉，《續・夕陽無限好》（台北：自印出版，2001 年），頁 121-122。

[8] 溫振華、戴寶村，《淡水河流域變遷史》（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頁 135；黃富三，〈河流與聚落：淡水河運與關渡之興衰〉，頁 108-109。

[9] 參見〈淡水港計画の件（1）〉，《海軍省公文備考》，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8021685200，頁 0879-0888。

3.上游山區過度開墾的結果造成土石隨雨水大量沖刷至河底，造成下游河川水位的逐漸降低。

4.清法戰役（1884）時為防止法艦入侵，時任前敵營務所浙江補用府正堂李彤恩為施行淡水港口閉鎖之策，而將六艘裝載共約 120 至 150 噸之石材排列於港口最窄之地並將其鑿沉，以封鎖法艦入港，[10]而此戰略雖成功阻止法艦沿河駛入淡水河內陸，但卻造成往後港口一帶泥沙淤積成灘的根本原因，雖然 1912 年以後總督府當局開始進行連續五年的港口區域浚渫工事，但因河道土石沖刷情況未有明顯改善，港口仍易聚沙成灘。[11]另根據 1934 年總督府交通局的調查觀之，自 1916 年以來香港淡水定期航線開設後，千噸級的空船於港口退潮航行時仍時感船底與河床擦過，滿潮時最多也僅能勉強容納三千噸之汽船，[12]可知浚渫緩不濟急，成效似乎有限。

綜上所述，或許即說明造成二十世紀初期以來淡水港埠及沿岸因河床淤積而導致河運功能衰退的大致原因，而此種情況一直到太平洋戰爭前夕，似乎並無多大改變；1941 年春夏之交，當時還是淡水中學校五年級學生的周明德即曾於某一天佇立於淡水河畔鼻仔頭，凝視著一艘自印尼駛來的 1,500 噸荷蘭籍油輪入港，將滿船油料灌注於嘉士洋行的大油槽，然後鼓輪遠去，船尾螺絲槳捲起一波波混濁的水浪，河港為之變色，自此之後果真不見大船再入港，[13]由此則見證了淡水港埠因河床淤積而沒落的一幕。

雖然如此，淡水這一國際重要的航點卻不會因為港埠及河道的淤積而損其價值，而是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及各列強國開始致力發展新式航空科技時，因砂土沖積使得流速緩慢、平穩且寬廣的河口區域，以及因港埠沒落造成停泊船隻驟減，加上聯結台北市內的鐵公路交通之發達，都促成新式交通工具在淡水停泊或進行試驗的良好條件。簡言之，促成淡水港埠沒落的原因，某種程度上或許就是造就新式航空科技發展的良好條件之一。

（二）早期淡水的航空活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因為戰時軍事所需，相關的航空技術可以說是有著長足明顯的進步，並且為往後的民航建立了良好的發展基礎。然而由於歐洲各國對於航空重要性之體認乃由戰爭而來，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間航空發展，也多帶有軍事及國力展示的味道，故戰後的十年間（1919—

[10] 關於此事尚可參見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文叢本 27（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頁 75、173；山本正一，〈防滬尾留牘〉，《淡水港の整備に就て》（台北：淡水郡役所，1927 年），頁 3-5。

[11] 〈淡水可為良港 開鑿水路之計畫〉，《台灣日日新報》，5577 號，1916 年 1 月 6 日，三版；〈淡水港計画の件（1）〉，《海軍省公文備考》，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8021685200，頁 0888。

[12] 交通局港灣課，《淡水港調查書》，頁 84-85。

[13] 黃繁光主編，《風起雲湧時：首位台籍氣象官周明德生平所見所聞》（台北：淡水古蹟園區，2009 年），頁 7。

1929），各國的航空發展皆以飛機的航續距離、滯空時間及長距離飛行記錄爲主要目的。[14]這些除了軍事與國力的展示之外，也意味著這些歐洲列強將來對於亞洲所屬殖民地之連絡與運輸，有了更新更快捷的選擇。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航空發展，除了持續積極發展軍方航空外，對於民間航空的推動也是不遺餘力，例如在戰爭結束前夕於東京帝國大學成立的航空研究所（1918 年 4 月 1 日），則代表著日本民間航空發展正式走入學術研究，同年 10 月 22 日由帝國飛行協會所舉行的「第一回東京大阪間懸賞郵便飛行競技會」，以及 1920 年 8 月 2 日由同單位於東京洲崎主辦的「第一回懸賞飛行競技大會」，則代表以往較具表演性質的飛行表演，轉變成追求飛機性能與速度爲主競技大會。另外，1920 年 6 月加入「國際航空條約」[15]、1921 年 4 月 9 日公佈「航空法」，以及隔年 11 月 15 日由遞信省所開闢的日本第一條定期航線（大阪至德島），[16]都顯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於航空發展上與世界脈動的同步性。

作爲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同樣因爲日本本土的航空發展而深受影響。1919 年 1 月由總督府警務局所成立的警察航空班（以下簡稱「航空班」），除了是因「理蕃及治安」需要而成立的台灣第一個正式航空機關外，就殖民地的航空發展來說，則有另一層更深的意義。遞信省出身，時任總督府總務長官的下村宏就曾於 1920 年 3 月 17 日親臨航空班第一回的卒業式時，向記者說明該班設立的真正目的：

> 台灣此回航空班的成立或者可以說是基於同化策上之效果，又可說是理蕃上之利用……，但這些都是次要的問題。真正的目的乃是：一、防備外國之威脅；二、培養本島人對飛機的智識及涵養；三、將來航空技術發達時，可供台灣設立更大規模機場之經驗。此外這也是為了達成內地郵便飛行而做的準備。[17]

---

[14]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十年間（1919—1929）的「航空記錄」來看，即可說明當時航空發展之「躍進」及各國所關注之項目：1.速度由時速 307 公里增加至 448 公里（陸上機）及 575 公里（水上機）；2.高度由 8,880 公尺增加至 12,739 公尺；3.航續距離由 3,040 公里增加至 7,905 公里；4.飛行距離記錄由 8,692 公里（紐約至舊金山來回）增加至 56,000 公里（義大利、日本霞ヶ浦、澳洲墨爾本、羅馬）。仁村俊，《航空五十年史》（東京：鱒書房，1943 年），頁 335-339；早川政之輔，〈附錄〉，《飛行隊見學》（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0 年），頁 6-9。

[15]「國際航空條約」為 1919 年 10 月 13 日於巴黎締結，1922 年 7 月 11 日開始生效，又稱《巴黎航空公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間所締結的航空條約，也是國際上第一個關於空中立法的條約。該約承認「每一國家對其領土上的空氣空間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權」（第一條）。同時，締約國承允對民用航空器在和平時期相互給予無害通過的自由（第二條），而此乃為兩次大戰期間國際航空路線開設的基本依據。〈國際航空條約加入 六月頃批准か〉，《大阪每日新聞》，1920 年 3 月 31 日；日本航空協會，《日本航空史》明治・大正編（東京：同編者，1956 年），頁 444-450。

[16] 每日新聞社編，《別冊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航空史」》（東京：同編者，1979 年），頁 303。

[17]〈飛行機に乗つた下村長官の氣焰 警察航空班の眞目的〉，《台灣日日新報》，7108 號，1920 年 3 月 24 日，七版。

由上述下村長官所言，即可瞭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台灣的航空發展，主要是以航空班之設立爲開端，並且除了解決當前台灣的治安問題外，最重要的則是藉此開端來建立台灣的空防、灌輸台灣人的航空知識，以及將來航空技術成熟時，能夠提供設立更大規模機場時之經驗，進而達到殖民地內部交通機關之改良，並在將來航空技術及相關條件成熟時，透過飛機來爲聯結母國與殖民地間之交通預做準備。[18]因此，包含航空班在內，早期的航空及表演活動多帶有實驗與測試的意味。[19]

1920 年 6 月 5 日航空班首次於淡水港埠區域進行飛行試驗，當時甫成立一年多的航空班因位於屏東崇蘭的飛行場尚未竣工，故在該年 8 月飛行場完工以前，航空班多數飛行任務主要以北部爲活動區域，並借用台灣步兵第一聯隊於台北古亭庄的練兵場（今青年公園）爲起降場所，[20]進行相關的飛行試驗。不過，較爲特別的是，當時航空班評估淡水火車站前的河口沙洲（中洲，俗稱「浮線」）「意外地緊實」，[21]爲進一步證實沙洲能否作爲飛機起降之用，因此該次在淡水的飛行試驗並不同於往常打算在空曠的平地進行，而是計畫利用河口沙洲作爲飛機起降場地。6 月 5 日試驗當天清晨 5 點相關的人員就已經從台北出發進行準備，航空班所屬的「モ式六型」飛行機（Maurice Farman）則於 7 點前由練兵場起飛，途經艋舺、江頭一帶沿河口飛行（高 600 米），8 點 10 分成功降落於河口沙洲，其間尚進行淡水及觀音山一帶的飛行高度及氣流試驗，並於下午 2 點完成所有的試驗工作返北。[22]目前雖未能掌握更多關於此次飛行試驗的進一步資料，不過該試驗或許透露出航空班可能有意將淡水河口沙洲作爲臨時的起降場地，而其原因推測可能與考量該機型的性能及穩定性，以及淡水的聯外鐵公路交通有關。[23]有趣的是，促成此次飛行試驗「意外緊實的河口沙洲」，卻是前述造成淡水港埠沒落所遺留而成的結果之一。

---

[18] 參見拙作，〈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頁 78-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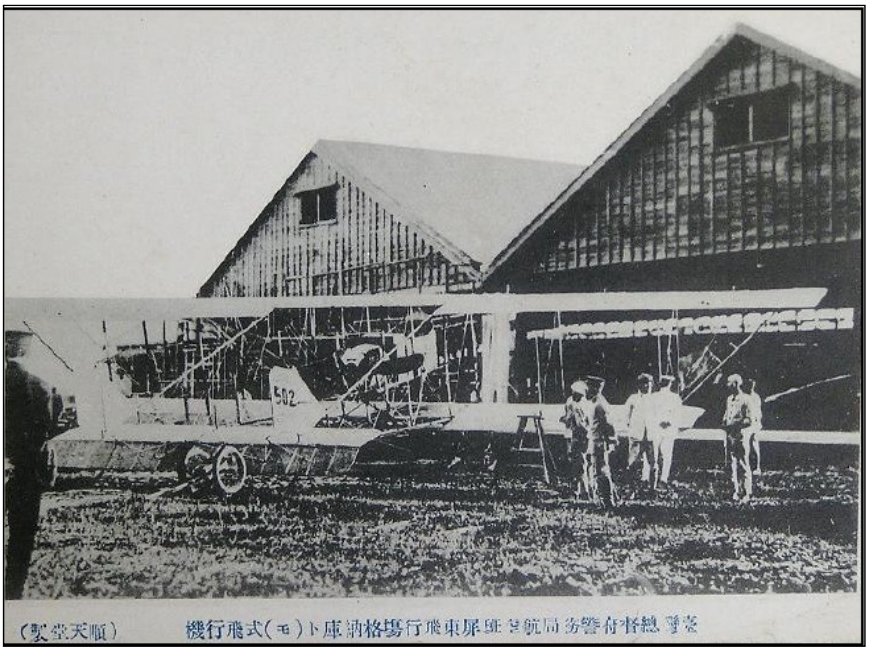
[19] 值得一提的是，1912 年當美國海上飛行家アトウォーター（Atwater）在日本橫濱進行表演獲得好評後，橫濱的美國駐日領事曾邀請其訪台進行飛行表演，雖然事後並未成行，但已事先選定淡水作為表演場地。〈飛行家の來台〉，《台灣日日新報》，4299 號，1912 年 5 月 19 日，七版。

[20] 警務局航空班，《班務概況》（屏東：同編者，1927 年），頁 2。

[21] 關於淡水河口「中洲」之敘述，可參見周明德，〈淡水港口的沙洲：浮線〉，《海天雜文》（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 年），頁 17-20。

[22]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台北：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1939 年），頁 92-94。

[23] 根津熊次郎，〈台灣の航空事業〉，《台灣時報》，1931 年 4 月，頁 53-54。



圖一、1919 年警察航空班所配置之「モ式六型」飛機

資料來源：屏東順天堂出版明信片（曾令毅收藏）。

除了航空班的飛行試驗外，此時期日本海軍航空隊在台進行的飛行試驗也值得注意。1921 年 4 月駐紮於長崎的佐世保海軍航空隊爲進行九州與台灣間之飛行試驗（航線、性能、氣象），就曾經計畫出動四架「横廠式ロ號甲型」水上飛機，進行史上首次的「內台飛行試驗」，當時隨行的還包括巡洋艦須磨號及驅逐艦四艘。該計畫於同年 5 月 7 日開始實施，三架飛機由佐世保海軍基地出發，經鹿兒島（7-8 日）、與那國島（8-10 日）、石垣島（10-13 日）後，於 14 日抵達基隆孤拔濱。[24]雖然該次的飛行試驗最後可能因基隆爲海軍要塞司令部所在地，同時考量補給等技術性問題，因而沒有選擇淡水爲停泊的地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飛行計畫開始前（2 月），佐世保海軍航空隊即已先行派遣兩名軍官來台進行水上飛機停泊地點之調查，當時兩人均認爲「淡水可爲海軍水上飛行機之抵水場，而其中洲，則可爲陸軍飛行機抵陸地」，[25]並於「內台飛行試驗」計畫書內的航空路線圖中將淡水註記爲水上飛機可停泊之港口，[26]而當時的報紙也認爲淡水應是最佳地點，其理由爲「基隆以船舶航通諸關係，恐非港外，不能著水，反是淡水可著水於市街前之河中，多分必以淡水爲目的」。[27]由此除了反映淡水港埠水域已被普遍認爲適合水上飛機停泊外，也點出了當時基隆淡水兩港的興衰。

---

[24] 關於此次飛行試驗的詳細計畫及實施內容，可詳見〈佐世保、台湾連絡飛行（1）至（5）〉，《海軍省公文備考》，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8050216500 至 C08050216900；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280-290。

[25] 〈查內台航空抵陸地〉，《台灣日日新報》，7439 號，1921 年 2 月 20 日，五版。

[26] 〈佐世保、台湾連絡飛行（3）〉，《海軍省公文備考》，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8050216700，頁 0327-0328。

[27] 〈飛行機自佐港來〉，《台灣日日新報》，7502 號，1921 年 4 月 24 日，五版。

另外，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航空業的蓬勃發展，各列強國爲展示國力及軍事力量，在航空發展方面莫不以飛機的續航距離、滯空時間、長距離飛行記錄，以及航空路線調查爲研發與試驗之主要目的。因此，當外國水上飛機進行「洲際飛行」而造訪台灣時，也將淡水視爲重要的補給及停泊地點之一。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顯示，1920 年代至 30 年初期台灣的外國飛機及行程，如下表所列：

表一、外國飛機停泊淡水之行程簡表

國別	義大利	紐西蘭
出發時間及地點	1925-4-21（羅馬）	1931-7-3（雪梨）
抵台時間及地點	1925-9-18（淡水）	1931-8-5（淡水）
駕駛及乘員	Francesco de Pindo（正駕駛，空軍中校） Ernesto Companelli（機關士，空軍上士）	Francis Chichester（1901—1972）
使用機型	Savoia S-16 飛行艇（軍用機）	Gipsy Moth 複葉水上機
主要行經地點	羅馬、巴格達、孟買、加爾格達、仰光、新加坡、婆羅洲、墨爾本、雪梨、布里斯本、馬尼拉、阿帕莉、淡水、鹿兒島、和歌山、霞ヶ浦	雪梨、木曜島、新幾內亞、納卯、雷伊泰、馬尼拉、阿帕莉、淡水、上海、鹿兒島、和歌山勝浦港
目的	爲開拓歐亞航空路線進行全程 5,300 公里之「洲際飛行」試驗	受澳洲政府委託爲開拓澳洲及日本航空路線而前往日本進行訪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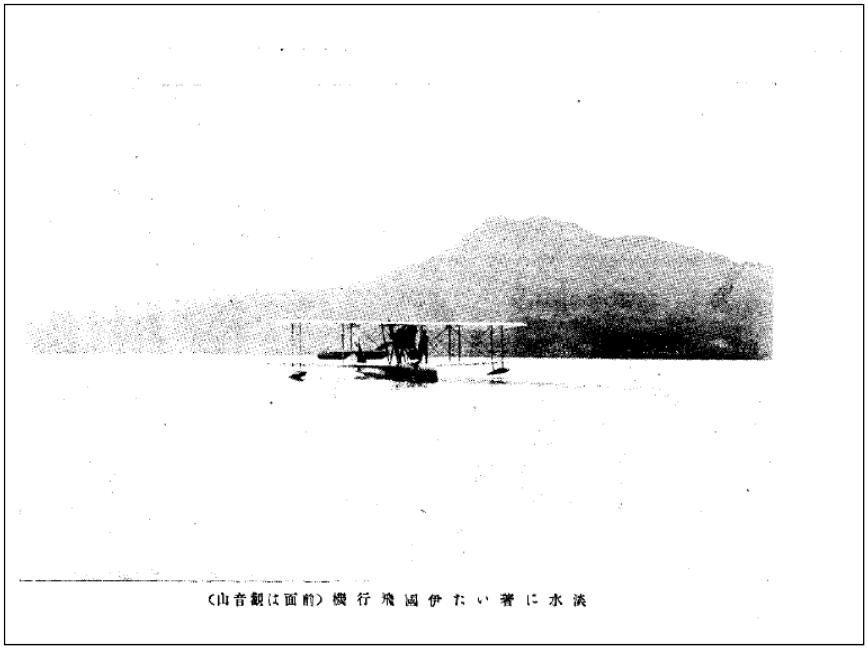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491-494；〈伊太利飛行機淡水著〉，《台灣時報》，1925 年 10 月，頁 2；根津熊次郎，〈チチェスター氏と語る〉，《台灣時報》，1931 年 9 月，頁 73-78；佐倉光一，〈航空界の回顧〉，《台灣時報》，1931 年 9 月，頁 56-58。

由上表可知，1920 至 1931 年期間經過台灣進行「洲際飛行」試驗的外國飛機僅有兩次，且都以選擇淡水做爲停泊及油料補給之地點，其主要原因除了淡水的條件適合水上飛機停泊，以及容易取得後續航路的飛航與氣象資訊外，[28]尚有國家安全方面的考量。

例如，1925 年 5 月當日本政府及海軍省得知義大利軍用機預定進入日本（含台灣）領空時，因爲該次飛行是 1922 年 7 月「國際航空條約」生效後日本首次有外國飛機經過領空來訪，加上該機又是軍用機，故對於指定區域之外的飛行活動，即軍事要地上空飛行區域之規劃及設定的問題，故而引起了外務省、陸軍省、海軍省、台灣軍司令部的多方關注與討論。因此，爲了避免由菲律賓北上經東海岸抵達台灣北部的義大利軍用機擅闖台灣軍管轄及「海軍基隆要塞地」

[28]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伊國軍用飛行機本邦飛來一件（第一卷）：官房第二〇六號，大正十四年六月九日〉，《外務省記錄》，第 3 門通商，第 6 類交通通信，第 9 項航空機，第 12 號，未編碼。〈伊國飛行機は八月二日頃淡水著 ガソリンや飛行材料を用意し 到著を待つ淡水〉，《台灣日日新報》，9061 號，1925 年 7 月 31 日，三版。

區域（東起三貂角經角板山及中壢至觀音庄），除了規定不准停泊於基隆港外，乃指定義大利軍用機行至宜蘭上空時得朝桃園方向飛行（北緯 23 度以北），至桃園外海後才能降落於指定的中途站——淡水港，[29]而此次的經驗，也爲往後的制定相關法令及規範開啓了契機。[30]簡言之，外國飛機進行「洲際飛行」時，總督府方面允許其停泊於淡水的原因，除了該地本身所具備的條件外，主要是顧及國家安全之因素，而由此也可看出淡水港作爲一個國際重要的交通航點，相對於商港兼軍事要塞地的基隆來說，似乎多了較大的彈性。



圖二、1925 年 9 月義大利軍用「Savoia S-16」飛行艇停泊於淡水

資料來源：〈淡水に著いた伊國飛行機〉，《台灣時報》，1925 年 10 月，未編碼。

（三）淡水與「內台航線」之開設

隨著第一次大戰後日本民用航空事業的發展，以及遞信省的航線開設計畫，同時開啓了連結台灣與日本的曙光。[31]不過台灣相關的航線開設計畫卻因爲相關的預算、航空技術，以及「北先南後」航線的開設順序等問題，使得遲至 1930 年中期才逐漸實現。雖然「內台航線」的開設頻頻受阻，但是總督府當局並沒有爲此而放棄，反而自 1930 年開始展開一連串的航空調查事業與飛行試驗，並

[29] 參見〈伊太利軍用飛行機本邦飛来に関する件〉，《陸軍省大日記乙輯》，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3012147800，頁 0578-0696。

[30] 〈外国航空機本邦飛来の場合取扱方に関する件〉，《海軍省公文備考》，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015183100，頁 0522-0525；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491；大阪朝日新聞社，《空中撮影禁止區域》（大阪：同編者，1936 年），頁 13。

[31] 值得一提的是，1924 年遞信省及軍方在規劃「第一期日本航空輸送事業計畫草案」時，即將淡水列為聯結「內台航線」及對岸循環航線的中繼點（鹿兒島→沖繩→淡水→福州→上海）。參見〈民間航空（8）、（9）〉，《海軍省公文備考》，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8051435900-C08051436000，頁 1614-1639。

且透過「臨時產業調查會」的召開，對往後台灣民航發展進行初步的規劃，[32]而1930年代以來總督府當局推動「內台航線」（福岡到台北）的過程中，淡水港埠區域仍因處於重要交通樞紐之位置，以及具備停泊水上飛機等各種條件，故在此時期的台灣航空發展過程中仍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

首先，就航空調查方面觀之，1930年爲總督府爲推動「內台航線」之開設，乃於同年5月6日成立交通局遞信部「臨時航空調查掛」，進行包含航空事業之「法規、事業、航線、飛機、設備、經費、郵便飛行」等相關調查，[33]而時任台灣司令官的陸軍中將渡邊錠太郎也對此表贊同之意，並允諾可提供軍用機來支持相關計畫之進行，[34]並認爲「內台航線」的設立，台灣本身必須先達到一些基本條件，例如氣象研究機關之完備、使用飛機及航空路線之調查，[35]且若政府因經費或其他問題在航線開設上有所困難的話，或許可由「內地」的航空公司自福岡經由上海、福州，以漸進的方式完成與台灣的聯結。[36]

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代總督府推行「內台航線」之期間，淡水還曾經是最早被評估爲最適合設立「台北飛行場」之預定地點。1930年5月總督府交通局「臨時航空調查掛」成立後，爲早日選定國際機場之合適地點，曾經任職於交通局遞信部海事課，並於1930年擔任交通局書記兼「臨時航空調查掛」調查工作的根津熊次郎[37]就曾在1931年4月率先向總督府提出「淡水水陸兩用國際空港」之建議，其論點主要爲：[38]

1.淡水離台北不遠，在此建立機場對旅客較爲便利，而基隆雖離台北也不遠，交通也便利，一般認爲是適合設立機場之地點，但是該地因無良好的飛行跑道，一年四季降雨又多，若爲興建飛行跑道而整地，則需耗去龐大的經費。

2.近時控制飛機降落時的煞車裝置技術大爲進步，雖然因此而減少降落時之距離，但飛機起飛時仍需要足夠的距離。

3.飛行場的各個方向，皆需存在起降跑道，也就是說，在飛機降落時如果遇到側風會有翻覆或著陸距離縮短的危險，因此爲了處理風的阻礙，起降跑道是

---

[32]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遞信省的航線開設計畫與台灣之關係，詳見拙作，〈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頁80-81。

[33] 〈交通局遞信部に臨時航空調查掛設置〉，《台灣時報》，1930年6月，頁33。

[34]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331。

[35] 另外，渡邊司令官又認為1929年10月由陸軍航空隊所進行的「所澤屏東間大飛行」，則可對於將來「內台航線」的推動及調查提供良好的經驗。除此之外，自1921年至1930年由佐世保鎮守府的海軍航空隊所陸續進行的六回「內台飛行」，也提供總督府不少相關的經驗及情報資料。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280-305；佐倉光一，〈航空界の回顧〉，《台灣時報》，1931年12月，頁55-56。

[36] 根津熊次郎，〈台灣の航空行政法規に就て〉，《台灣時報》，1930年8月，頁31-32。

[37] 〈根津熊次郎任府交通局副參事、官等、俸給、依願免本官〉，《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8年（1933）甲種永久保存，文號112，冊號10075，頁1071-1073。

[38] 根津熊次郎，〈台灣の航空事業〉，《台灣時報》，1931年4月，頁53-54；根津熊次郎，〈台の航空界展望〉，《台灣遞信協會雜誌》，1931年5月，頁10-11。

一定要完備的。

4.機場的起降跑道要平均使用，其中若有兩、三處頻頻起降飛機，那麼該處就會因使用而頻繁受到損傷，之後要修理、維持絕非容易解決的問題。因此，機場內起降的飛機應平均使用跑道才是上策。

5.機場與都市間要能迅速聯絡，也就是說應延伸前往機場的聯絡道路，原因在於聯絡道路的興建會受到機場形狀的限制，如果要使到達機場的距離變短，聯絡道路的延伸工事是十分必要的。此外還必須注意的是，飛機著陸後，旅客到達乘降所的距離應縮短，如果能夠如此的話，可以減少時間的浪費，換句話說，機場內的營業大廳應設在離跑道較近的位置。

6.以上幾點說法是依據幾何學的理論立說，但實際的情況卻不一定能夠配合。例如，實際選定機場位置時，首先要考慮的是土地能否取得的問題，再者，也須考慮土地與河川的狀態，以得知與市中心架設聯絡道路的關係，另外，興建建物的位置、附近山地的形狀，以及主要的風向等，皆是必須考慮的重點。

由上或可略知，根津氏的幾點建議，主要是對於興建機場須注意之要項及條件提出看法，特別是關於跑道的距離、飛機起降、土地徵收問題方面的意見，應較爲針對淡水「陸上機場」所考慮，而「水上機場」的部份就上述內容所及，似乎已經「渾然天成」，因而並未討論太多。然而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中，此建議雖然應爲最早提出於淡水設置機場之官方調查報告，但其主要應是希望利用淡水港埠區域已經具備的「水上機場」條件，再於附近另覓地點增設「陸上機場」，以收所謂的「兩用」之效，同時將來也能因此而容納更多不同類型飛機起降，達到國際機場的實際功能。不過，此建議最後卻因相關預算及腹地面積等因素，而於 1933 年被時任交通局遞信部航空係囑託佐倉光一[39]所提出的「松山國際機場案」所取代。[40]由此可知，淡水港埠區域雖具備設立水上機場之條件，但卻因爲腹地所具備的面積不足，而被松山所取代，加上陸上起降之飛機所搭載之運送量較水上飛機爲多，爲當時日本空運之主流，或許因爲如此才使得「淡水水陸兩用國際空港」之建議被取代而暫遭擱置。

其次，就航空試驗觀之，1930 年 11 月由總督府所召開的「臨時產業調查會」，除了是第一次正式對台灣產業現狀展開檢討、制定整體性的發展計畫外，也是首次將航空議題正式納入討論的會議（第十四號海運及航空ニ関スル件）。該會所討論的結果，即「先進行本島相關航線實況之精查，並速規劃內台間、島內諸地方間及台支間之飛行聯絡」，且「計劃於台北附近設置國際機場，以及全島

[39] 〈佐倉光一依願免本官、五級俸下賜、事務格別勉勵ニ付金九百二十圓ヲ賞與ス〉，《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 15 年（1940）甲種永久保存，文號 65，冊號 10103，頁 803。

[40] 佐倉光一，〈航空直言〉，《台灣時報》，1934 年 7 月，頁 38-42；拙作，〈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頁 84-85。

各地設置航空無線電信與航空標識」，[41]而對於航線的預算方面，則認爲不論將來是由總督府全額、各半或是若干負擔，都應一併計算評估，以期萬全之準備。[42]雖然此會議對於航空事業的討論並未出現更具體的計畫書，但仍可由此觀察到總督府對於「內台航線」開設的態度，以及往後的相關行動及方向。因此，此會討論的結果基本上可視爲 1930 至 1935 年總督府推動「內台航線」的主要立場及方針。

依循這項方針，總督府即在 1931 年與遞信省航空局進行具體的協定，並計畫於 10 月 4 至 10 日展開首次的「內台間郵便試驗飛行」。[43]該試驗主要目的爲期望達到「水上機及陸上機之使用價值比較、內台間『一日連絡』航線之開拓、晝夜飛行測試、航線附近氣象狀態調查」等，並委託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出動「雲雀號」（福克 F7b 型旅客機）及「白鳩號」（川崎 Dornier Wal 飛行艇）兩機，[44]分別由福岡太刀洗陸軍飛行場（4 日），以及福岡名島水上飛行場起飛出發（5 日），進行福岡至台北（練兵場）、福岡至淡水之區間郵便飛行試驗。[45]

兩架飛機於 10 月 4 日及 5 日相繼抵台後，除攜帶共 4,621 封航空郵件及當日報紙外，還曾於 6 日至 7 日間分別在台北及淡水兩地舉行台灣首次的「遊覽飛行」，以當時每架次最多僅能搭載 6 至 8 名乘客的程度來看，兩日間台北及淡水兩地搭乘的官民人數就高達五百人以上，其中於淡水搭乘「白鳩號」的「體驗者」就超過三百人，而從飛行駕駛必須輪流交替以應付眾多參加搭乘活動的民眾，甚至忙得連抽根煙的時間都沒有的情況來看，[46]當時盛況可見一斑。因此，1931 年 10 月 4 至 10 日所展開「內台間郵便試驗飛行」，除了因進行航線相關試驗而獲得寶貴經驗，並再次說明淡水具有停泊水上飛機的良好條件之外，藉

---

41 台灣總督府，《臨時產業調查會答申書：台灣產業計畫說明書》（台北：同編者，1930 年），頁 113。

42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臨時產業調查會會議錄》（台北：同編者，1931 年），頁 389-392。

43 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日本航空輸送十年史》（東京：同編者，1938 年），頁 13；〈內台航空輸送計畫に就て〉，《台灣時報》，1931 年 4 月，頁 17-19。

44 另外，根據戰後出版的相關資料記載，派遣水上飛機的主要理由為當時台北尚未有完備的陸上機場之故，但後來又增派一架福克「雲雀號」來台的原因為考量到此行因宣傳上之必要，定會招來許多民眾試乘，為避免水上機「白鳩號」負擔重而造成損傷，才會增派陸上機「雲雀號」來台。安辺浩，〈日本航空輸送会社設立の經緯〉，收錄於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東京：日本航空協会，1975 年），頁 295。

45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332-339；佐倉光一，〈內台郵便試驗飛行私記〉，《台灣遞信協會雜誌》，1931 年 12 月，頁 7-16。另外，根據當時搭乘此機來台進行試驗飛行的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運航部主任安部藤平的回憶，相關的準備工作其實早在 1931 年初即已開始進行，經過長達半年後才正式派機試驗，而試驗當天飛機降落的地點則是淡水河口沙洲西側的靠近左岸的河面，並由小艇接駁上岸（榕堤一帶）。關於此次試驗飛行的詳細記載，可參見安部藤平，〈台湾島の思い出〉，收錄於小森郁雄編，《航空開拓秘話》（東京：「航空開拓秘話」刊行会，1974 年），頁 163-186。

46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340-341；另外，兩日間台北及淡水兩地參加「遊覽飛行」活動的還包含許丙的夫人（於台北搭乘雲雀號）及女兒（於淡水搭乘白鳩號），詳見許伯埏，〈台湾初の遊覧飛行〉，《許丙・許伯埏回想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頁 189-191。

由淡水及鄰近區域民眾的實際參與，以及具有淡水意象的航空明信片及戳記之發行（觀音山及淡水河；參見圖四），也或許更加深了淡水港埠區域成爲台灣北部當時較適合停泊水上飛機之印象。

綜上所述，1930 年總督府開始推動「內台航線」開設計畫後，淡水即因其所具備停泊水上飛機之條件，而於相關的航空調查與試驗中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甚至曾經一度考慮將淡水納入機場設立之地點。不過，隨著 1933 年 2 月總督府確定「台北飛行場」將座落於松山，並開始陸續進行相關的土地徵收、整地、航線調查、設施建造、飛行試驗後，[47]淡水雖然在「內台航線」開設計畫過程中出局，但是就水上飛機來說，其仍爲當時台灣北部較爲適合停泊的地點之一。例如，前述已提及日本海軍航空隊來台進行飛行試驗及演練時，爲考量補給與隨行軍艦停泊等技術性之問題，大多選擇海軍駐紮地及要塞地停泊，因此，1931 至 1937 年間六次的水上飛機飛行試驗及演練（大村、佐世保、館山海軍航空隊），共有四次選擇停泊基隆、馬公、高雄等地，其中，1936 年 5 月 30 日由佐世保海軍航空隊所屬的兩架飛行艇所進行的「內台長距離飛行試驗」，[48]以及 1937 年 5 月 11 日館山海軍航空隊及其艦隊所屬的兩架飛行艇仍選擇淡水爲停泊地點，[49]可見 1930 年代中期以後淡水港埠區域雖然因「內台航線」的開始（1936 年 1 月）而一度被遺忘，但就水上飛機來說，其仍被視爲重要的停泊地點之一。

[47] 關於 1930 至 1936 年「內台航空」開設的詳細過程，可參見拙作，〈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頁 82-89。

[48] 另外，根據 1936 年佐世保海軍航空隊的調查，均認為若僅考慮地理環境及氣候條件，淡水在停泊水上飛機上仍優於多雨的基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台灣に対する方面航空兵力急速移動集中〉，《海軍一般史料》，⑤航空部隊-全般-082，未編碼。

[49] 關於 1931 至 1936 年海軍航空隊這五次來台進行水上飛機之試驗及演練，詳見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306-330；〈艦上機と飛行艇 館山から飛來 海軍武官室發表〉，《台灣日日新報》，13337 號，1937 年 5 月 12 日，夕刊二版。



圖三、1931 年 10 月 5 日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白鳩號」停泊於淡水之情景

資料來源：〈淡水に著いた水上機白鳩號〉，《台灣日日新報》，11309 號，1931 年 10 月 6 日，七版。



圖四、1931 年「內地台灣間航空郵便試行記念」明信片兩種（銷淡水戳）

資料來源：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航空資料調查會發行（曾令毅收藏）。

三、淡水水上機場之設立及發展

（一）機場設立之背景及過程

1935 年 7 月當遞信省提出「福岡台灣間定期航空補助計畫」獲得大藏省的全額承認後，聯結日本本土與台灣的「內台航線」即預定於 1936 年 1 月正式開始。[50]而 1935 年 10 月由總督府所召開的「熱帶產業調查會」，對於台灣的航空事業，則較 1930 年「臨時產業調查會」有著更具體的規劃，而該會可以說是以「達成本島對『南支南洋』所抱持之使命，所進行的各種方策之樹立」爲主要目的。[51]因此就台灣的航空事業發展而言，即是以「島內各種航空設施之整頓、島內及內台定期航空輸送事業之充實，並且朝國際航線開設而努力」等爲往後發展之主要方針。[52]

特別是關於國際航線開設，則是因爲 1931 年以後歐美各國航空公司相繼在南洋及中國設置航線，甚至獲得主導權，所以使得一向對於「南支南洋」區域甚感興趣的總督府乃倍感壓力。[53]因此該會對於國際航線開設的部份，則計畫在

[50] 佐倉生，〈內台定期航空の開始〉，《台灣遞信協會雜誌》，1935 年 11 月，頁 21-24；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369-370。

[51] 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台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六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頁 387。

[52] 台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答申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35 年），頁 14-15、60-61。

[53] 關於 1931 年以後歐美各國航空公司在東亞的航空事業發展情況，以及總督府對於此事所遭受

1936 年編列預算，以進行台北至泰國曼谷之航線開設，甚至計畫將航線延伸至更南方的新加坡。[54]而若由此會所樹立的結果及方針，對照 1930 年以來總督府在「內台航線」的爭取過程來看，總督府對於「內台航線」的設立或許只是一種階段性的策略，真正的目的是著眼於建立台灣在「南支南洋航線」中之主導地位，[55]以及將來帝國南方航空圈一旦建立時台灣的中心位置。

因此，1936 年 3 月由總督府及海軍武官室所規畫的「台灣を中心とする國際航空路計畫」(台灣爲中心之國際航線計畫)，即將航線分爲「台北馬尼拉線、台北福州廈門線、台北曼谷線」三條，並對各航線制定十個年度之預算、航線與班次。依照這個計畫，即可初步瞭解 1936 年總督府以台灣爲中心的「航空南進」計畫，主要所開拓與連結的區域爲三大區塊，分別是：[56]

1.「南支」，以對岸福建省的航線開設爲主，並以連結中國內地的航空線爲往後發展的目標。

2.「外南洋」，即是以中南半島區域的航線開設爲主，將航線由台北經香港、廣東省北海、法屬印度支那（佛印；French Indochina）河內、永珍，延伸至泰國曼谷，並計畫與新加坡聯結。

3.「內南洋」，主要是由台北經花蓮港，並往南至菲律賓馬尼拉，目的除了與美國計畫開設的「太平洋航線」連結外，最主要的目的則是爲了與委任統治地「南洋廳」區域的連結預作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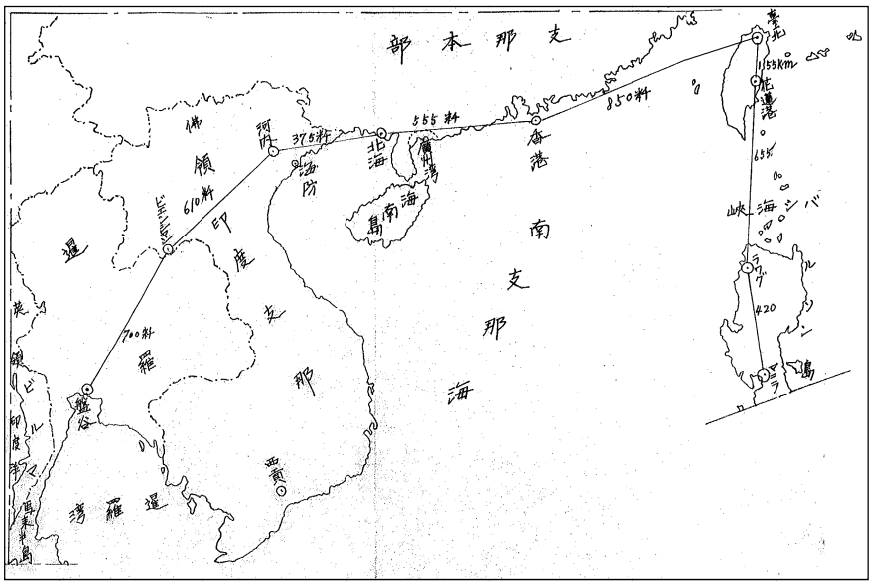
上述由總督府及海軍武官室於 1936 年 3 月所規畫的國際航線開設計畫的三大區塊中，與淡水相關的航線主要則爲南洋相關之航線，特別是「內南洋」航線相關的開設計畫則促成 1940 年淡水水上機場興建的主要原因。

的壓力與呈現出來的焦慮，可參見熱帶產業調查會，《台灣及南支南洋の航空》(台北：同編者，1935 年)，頁 15-32。

[54] 井出季和太，《南進台灣史攷》(東京：誠美書閣，1943 年)，頁 153；〈台北シンガボール 定期航空路開設費豫算 閣議で承認さる〉，《台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1 月 28 日，夕刊。

[55] 齋藤外男，〈台灣と定期航空に就て〉，《台灣遞信協會雜誌》，1935 年 9 月，頁 9。

[56] 〈台海秘第 188 号 11・3・30 台湾を中心とする国際航空路計画の件〉，《海軍省公文備考》，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5034838700，頁 0036-0047。



圖五、1936 年「台灣爲中心之國際航線計畫」：台北曼谷、台北馬尼拉航線

資料來源:〈台海秘第 188 号 11・3・30 台湾を中心とする国際航空路計画の件〉，《海軍省公文備考》，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5034838700，頁 0043、0047。

而關於「內南洋」區域的航線開設方面，前述由總督府的「台灣を中心とする國際航空路計畫」中，已開始計畫台北至菲律賓馬尼拉的航線開設。主要目的除了拉近台灣至菲律賓的距離，達到產業交流及商業競爭外，同時該航線開設後，也能與舊金山至馬尼拉之「太平洋航線」（汎美航空公司）連接，並進一步南下與所屬委任統治地南洋廳（南洋群島）連結，與歐美各國展開所謂的「太平洋航空爭霸戰」。[57]

依據遞信省「民間航空國策十年計畫」中對於菲律賓航線的決議，1936 年 3 月總督府即以此爲基調，[58]開始規劃台北至菲律賓馬尼拉的航線開設，且以台北爲起點，經花蓮港、佬沃抵馬尼拉，實施一週一回往復之航次，並試圖與「太平洋航線」接軌。另外，爲縮短與國際航線接軌的航程與時間，遞信省還曾考慮由日本本土直接開設縱向航線直至南洋廳區域，再與「太平洋航線」所經島嶼接軌之航線設計，並於 1936 年 10 月向美國提出由南洋廳塞班島連結至關島，以及由東京直接連接威克島（Wake Island）之請求。不過日本所提出的這些要求都因美方的顧忌，因此皆以軍事考量爲理由而拒絕。[59]

[57] 大久保武雄，〈太平洋航空路と亞細亞〉，《新亞細亞》第 2 卷，1940 年 9 月，頁 51-52。

[58] 為了更加瞭解菲律賓航線之狀況，1935 年 11 月 10 日大阪每日新聞社與東京日日新聞社就曾派遣飛機，以祝賀菲律賓獨立之名義，由東京經太刀洗、台北後，直抵馬尼拉（12 日），進行航線的實際調查及試驗。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頁 514-516；仁村俊，《航空五十年史》，頁 382。

[59] 〈米政府の疑心暗鬼『日本南洋空路開拓』と〉，《讀賣新聞》，1936 年 10 月 22 日；〈我南洋委

雖然與「太平洋航線」接軌的計畫因美國的拒絕而遭到挫敗，但因「南洋廳」所具備的特殊國防地位，[60]以及考量與委任統治地交通聯絡之必要，因此使得日本對於「內南洋」區域的航線開設計畫更爲堅定。當 1937 年南洋廳內主要支廳島嶼間之航線相繼建立後，該年 11 月海軍省與南洋廳即計畫進行「內地南洋間」與「廳內島嶼間」之試驗飛行。[61]不過因爲「內地南洋間」航線單程就長達 4,180 公里，使得原本預定於 1937 年 12 月開始的運作的計畫，因相關器材及機場設施尚欠完備，故遲至 1939 年 4 月 4 日才正式開通。[62]

該航線正式開始後，相關業務即由新成立的「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負責，並使用「川西式四發動機大飛行艇」（俗稱川西大艇或九七式大艇，最多可搭載 17 名旅客），由橫濱經小笠原群島後，直抵南洋廳塞班及帛琉（一週一回往復）。因此 1939 年 4 月「內地南洋間定期航線」，以及隔年 5 月以帛琉爲中心的「南洋群島內間定期航線」相繼開設後，除改善南洋廳的內外交通外，也能進而將日本的生命線及戰略線延伸至更南方的區域，對於日本在「內南洋」區域的發展來說，則具有相當特別的意義。

1939 年 4 月「內地南洋間定期航線」開設後，遞信省航空局爲因應美國「太平洋航線」在南太平洋及「蘭印」區域（蘇門答臘、爪哇、婆羅洲）的持續發展，以及考量國際情勢推移與「東亞共榮圈」之發展動向，1940 年 9 月遞信省即開始推動朝鮮京城與台灣淡水爲主的「南北兩大空港」建造計畫，而擔負聯結日本南方生命線之使命的淡水水上機場則由總督府於該年 10 月開始進行相關工程規畫，並預計於 1941 年中竣工，[63]而在水上機場興建的同時遞信省也命令「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展開新航線之規畫，[64]並將原來以帛琉爲終點的航線，向西北掠過菲律賓外海直抵台灣（淡水），並朝東北延伸至橫濱，形成「內南洋」區域內的「海洋循環航線」。[65]

任統治領と米航空聯絡を要請〉，《大阪朝日新聞》，1936 年 10 月 27 日。另外，關於 1936 至 1937 年日美兩國在太平洋及菲律賓的航空線交涉過程，可另參見〈本邦、各国間航空運輸関係雑件／日、米間連絡航空運輸関係〉，《外務省記錄》，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10074870100-B10074870300。

[60] 南洋廳的軍事價值，對於當時被「華盛頓海軍軍縮」比例（5：5：3）所限制的日本來說，無疑是等於在南太平洋上增加戰艦兩艘、航空母艦三艘的軍事戰力，並且可省下不少造艦的經費。稻田昌植，〈南遊記：重要な軍事的足場『航空母艦三隻』の價に値匹敵〉，《國民新聞》，1933 年 6 月 27 日。

[61]「廳內島嶼間」航空聯絡主要有塞班、帛琉、ヤップ（Yap）、トラック（Truk）、ポナペ（Ponape）、ヤルート（Jaluit）等支廳島嶼。〈調査委員会南洋群島開発調査会関係（9）〉，《海軍省公文備考》，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5034604900，頁 0447-0448；〈內地、南洋群島間の定期航空路愈よ實現 十一月に正式試驗飛行〉，《台灣日日新報》，13320 號，1937 年 4 月 25 日，十一版。

[62]〈空の旅・南洋へ一日半〉，《報知新聞》，1937 年 11 月 18 日；〈翼・南洋へ伸ぶ　東京・パラオ間九時間の新空路〉，《大阪朝日新聞》，1938 年 7 月 23 日。浅香良一，〈大日本航空の南洋定期〉，收錄於日本航空協会編，《日本民間航空史話》（東京：同編者，1966 年），頁 265。

[63]〈南北”空の基地”　淡水、京城に大飛行場〉，《讀賣新聞》，1940 年 9 月 4 日，七版。

[64]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第四期營業報告書》，1940 年 10 月 1 日至 1941 年 3 月 31 日，頁 3。

[65]〈橫濱→淡水→パラオ間 五千餘粁の航空路 本月下旬試驗飛行を實施〉，《台灣日日新報》，

該計畫於 1940 年 11 月 22 日由「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所屬機「綾波號」（川西大艇）搭載機組員一行 14 人自橫濱啓航，並於同日抵達塞班後，23 日朝西南方飛行至帛琉，經過一日的檢修後，即於 25 日展開新航線的第一回試驗飛行。在歷經約 10 小時 35 分共 2,800 公里的長距離無降落飛行後，「綾波號」於 25 日下午 3 時 8 分抵達計畫興建中的「淡水水上機場預定地」，並且受到總督府官員、淡水附近的民眾及學生的歡迎。[66]當時曾經親眼目睹「綾波號」抵達淡水的當地耆宿周明德就回憶：

> 那時候我就讀淡水中學校四年級，某天聽到老師說將有一架從「パラオ」飛來的飛行艇將會抵達淡水的消息，於是學校的學生下課後就被動員到淡水郡役所後方的榕堤河岸迎接他們。當飛行艇降落後，因為噸位太重，又適逢退潮，因此無法駛近岸邊，得用小船將人員接駁上岸。當時河岸邊擠滿了約一千名看熱鬧的官員、記者、民眾與學生，歡迎隊伍一直排到郡役所廣場，而我們的心情就跟看熱鬧一樣，高興地揮著學校發給我們的小型紙製「日章旗」迎接他們，有位小女生則代表我們向這些飛行士獻花致敬，……這一幕到現在我都還記得。[67]

由上述的回憶大致可瞭解，當時「綾波號」抵達淡水時的盛況。另外，光就 1940 年 11 月 17 日至 28 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就高達約 10 筆相關的新聞記事，幾乎可說是每日皆有記載，因此官方對於該航線重視的程度，可見一斑。「綾波號」於 25 日抵達淡水後，經過一天的休息，於 27 日上午 7 時 2 分由淡水河面起飛，且於下午 3 時 20 分抵達橫濱，成功地完成了總長約 9,230 公里，總飛行時間約 36 小時 32 分的長距離飛行試驗，[68]並爲將來「內南洋」區域航線的開拓，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經過此回試驗飛行後，該航線乃預定於 1941 年 7 月開始營運（每月一回往復），不過該年 12 月 8 日卻因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得民用航線全數終止而轉爲「軍用定期航線」之用（12 月 12 日）。因此「內南洋」區域內的「海洋循環航線」，基本上僅有東線成功開設，而以淡水爲中繼點的西線，在尚未正式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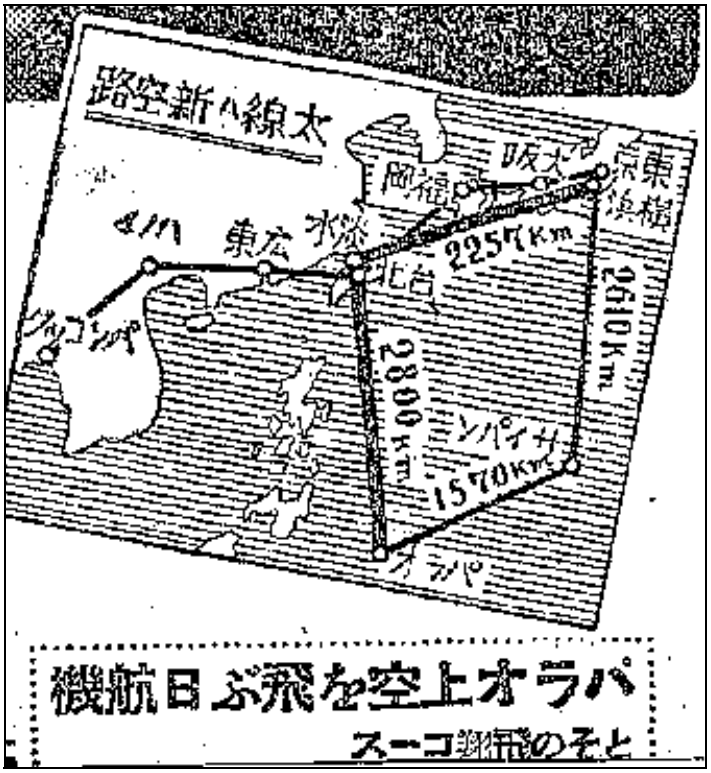
1940 年 11 月 17 日；〈横濱、台灣、パラオ結ひ 南方へ新空路〉，《大阪每日新聞》，1940 年 11 月 18 日；關於南洋航線開設與「海洋循環航線」開設的詳細過程，可參見浅香良一，〈大日本航空と南洋定期（抜粋）〉，收錄於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165-168。另外，大谷光瑞早在 1935 年就已提出只要熟練的經驗、足夠的飛行教育與經費，將來帛琉到台灣的航線也能實現之看法。大谷光瑞，《台灣島之現在》（大阪：大乘社，1935 年），頁 610-611。

[66]〈難コース堂々突破 航空日本の威力 綾波號岡野機長の談〉，《台灣日日新報》，14623 號，1940 年 11 月 26 日，七版；〈見事拓けり南方動脈〉，《大阪朝日新聞》，1940 年 11 月 26 日；斧和夫，〈一万キロ飛行の追憶〉，收錄於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597-599。

[67]〈周明德先生訪談記錄〉，2007 年 1 月 28 日於台北縣淡水鎮周宅，筆者訪談，未刊稿；周明德，〈奇縁：淡水・パラオ間の処女航空路開拓と堀清一恩師〉，2007 年 11 月 24 日，未刊稿。

[68]〈處女空路を遂に開拓 綾波號使命果して横濱著〉，《台灣日日新報》，14625 號・1940 年 11 月 28 日，七版。

始即宣告終止。[69]



圖六、1940 年「內南洋」區域之「海洋循環航線」計畫航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南太平洋を四角に結ぶ新航空路〉，《讀賣新聞》，1940 年 11 月 15 日。

「海洋循環航線」雖然因戰爭因素而未能實現，不過卻使得當時台灣的航空設施更加完備，並直接促進首座民用水上機場之興建。因爲當 1940 年 4 月「內地南洋間定期航線」成功開設後，遞信省即已計畫將航線往西北延伸至台灣，不過當時台灣並沒有正式的水上機場，爲配合「南進航空基地」的建立，以及爲因應將來南方相關海洋航線設立時所使用的飛機種類，因此乃重提 1931 年原本由根津熊次郎所建議的「淡水水上飛行場」部份的興建方案，並於 1940 年 8 月 6 日由交通局遞信部開始展開實際的測量調查，[70]12 月 15 由遞信部委託台北州總務課及淡水郡役所完成淡水街竿蓁林一帶（鼻仔頭）約 8.954 甲之機場用地（含一棟木造房屋）收購後，[71]隨即展開機場相關設施之營造工作，並於隔年 3

[69] 交通局遞信部，《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台北：同編者，1941 年），頁 13—14；遞信部，《交通局遞信部概要書》第十一冊（台北：同編者，1943 年？），未編碼。

[70] 〈淡水飛行場の敷地實地測量に著手する〉，《台灣日日新報》，14520 號，1940 年 8 月 14 日，七版、〈內台定期航空路を水陸の二本建に 淡水に水上空港を開設〉，《台灣日日新報》，14542 號，1940 年 9 月 5 日，七版。

[71]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庋藏，〈淡水及松山機場情形電報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1947 年，典藏號 00326720007010，頁 536100350027-536100350030。另外，據稱機場用地原有二、三十戶村民居住，以及俗稱「五舍公子」之淡水富商黃東茂之宅邸，參見周明德，《海天雜文》（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 年），頁 335-338。

月 29 日舉行機場興建動土之「地鎮祭」儀式。[72]

淡水水上機場由交通局基隆築港出張所長吉村善臣負責設計規劃，第一期工程預計於 1941 年初完成，並供該年 7 月 19 日新開設的「淡水曼谷線」（二週一往復）之用，[73]不過使用時間不滿一年，即於同年 12 月 12 日因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因素，由民航轉爲「軍用定期航線」所用。因此，淡水水上機場的民用時期僅爲 1941 年 7 月 19 日至 12 月 12 日的短暫時間，主要經營以橫濱爲起點，淡水爲中繼站，經海口、西貢、曼谷的民用水上飛機航線。[74]

雖然淡水水上機場啓用後不久即轉爲軍用，但就南進政策及台灣航空的發展來說，其仍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例如 1941 年 7 月爲調停日本於「北部佛印進駐」後，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之間的國境問題，以及洽談後續定期航線交涉的相關問題，日本政府乃分別於該月 19 日及 8 月 3 日分別委派「白雲號」及「卷雲號」（川西大艇）進行「特別任務飛行」，而透過這兩次的調停與交涉，也直接促使「淡水曼谷線」的啓用，[75]而此航線則是當時除了「台北（松山）曼谷線」外，日本來往中南半島的另一條重要航線，也是淡水水上機場短暫的民用時期中，唯一的一條定期航線，同時這兩條航線也將「外南洋」區域航線，連結成一個以台北與曼谷爲雙軸心的「國際循環航線」，[76]透過這兩條航線也讓更多官僚、商人，甚至是軍人能夠透過台灣快速地前往此區域，進行商業競爭、談判，以及現地指導的工作，[77]並有助於日本在此區域的經貿發展、資源取得，以及軍事勢力的迅速地擴張。

綜而言之，淡水水上機場之設立雖然在 1931 年已有初步調查及規畫，不過卻要等到 1936 年台灣「南進航空」地位的逐漸確立後，隨著 1939 年「內地南洋間定期航線」的成功開設，以及 1940 年「海洋循環航線」開設計畫的推波助瀾，相關的預算才得以編列承認，加上 1941 年 7 月 19 日以後「淡水曼谷線」的開啓，才促成了淡水水上機場的正式營運。[78]因此，1940 年「內南洋」區域的「海洋循環航線」開設計畫雖然因太平洋戰爭之因素而未能成功實行，但其

---

[72] 〈淡水空港に翼憩へ 來春竣工けふ嚴かに地鎮祭〉，《台灣日日新報》，14764 號，1941 年 3 月 30 日，夕刊二版。

[73] 佐藤一一，《日本民間航空通史》（東京：國書刊行會，2003 年），頁 272。

[74] 拙作，〈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頁 107。

[75] 〈矢野全權一行淡水に安着〉，《讀賣新聞》，1941 年 7 月 20 日，三版；〈橫濱→淡水→サイゴン 定期航空路に〉，《讀賣新聞》，1941 年 7 月 22 日，夕刊一版；〈卷雲號淡水へ安着〉，《讀賣新聞》，1941 年 8 月 4 日，三版；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170。另外，關於此次「特別任務飛行」尚有前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海洋部飛行駕駛越田利成回憶當時「白雲號」機長大堀修一對於相關經歷之講述，詳見越田利成，〈飛行艇パイロットの回想：橫浜から南太平洋へ（6）97 式大艇サイゴンへ飛ぶ〉，《航空と文化》，2010 年 10 月。

[76] 拙作，〈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頁 106-107。

[77] 〈南へ、增える空の客 內台、日泰は三倍・雁ノ巢に新記録〉，《大阪每日新聞》，1941 年 8 月 5 日；孫萬枝，〈大東亞の交通と台灣の交通〉，《台灣時報》，1943 年 3 月，頁 66。

[78] 台灣總督府，《台灣統治概要》（台北：同編者，1945 年），頁 196。

仍可說是當時台灣唯一「民用水上機場」興建的主要原因及重要推力。

表二、台灣航空事業相關預算簡表（1937—1944）

航空輸送補助預算表（單位：千圓）					
年度	東京—台北	台北—曼谷	島內航空	帛琉—淡水	台北—廣東
1937	460	400	80	—	—
1938	680	384	360	—	—
1939	525	380	360	—	375
1940	325	368	380	—	635
1941	435	324	190	265	540
1942	270	300	—	—	510
1943	120	208	190	—	510
1944	—	248	—	—	265

飛行場及航線相關預算表（單位：千圓）				
年度	台北第二飛行場設置費（淡水水上飛行場）	航線整備費	台北飛行場整備費	島內其他飛行場整備費
1937	—	—	—	460
1938	—	—	—	360
1939	—	—	—	—
1940	350	—	206	—
1941	337	634	—	100
1942	100	—	—	—
1943	—	—	1,263	—
1944	350	—	334	1,987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台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六年版，頁 731-750；交通局遞信部，《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頁 5-14；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編印，《台灣交通匯報》（台北：同編者，1946 年），頁 164-165；〈大東亜省所管南洋庁経費補充金（以下前同文）外四件〉，《公文類聚》，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10181000，未編碼。

註：航空輸送補助預算表之「台北—廣東」航線，包含 1940 年台北廣東線（1941 年延伸至海口），1941 年淡水曼谷線（經西貢）、台北曼谷臨時線（經河內）、以及東京西貢曼谷線；1944 年「島內其他飛行場整備費」共 1,987,000 圓，主要爲台南飛行場之整建。

（二）太平洋戰爭後機場之角色及發展

隨著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同年 12 月 12 日以後民間商業航

線乃因戰時軍事聯絡與輸送所需，紛紛轉爲軍用定期航線之用。因此，包含「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在內，日本帝國勢力圈內所有的民用航空公司業務乃全數轉爲軍用，且基本上不對一般民眾開放。[79]

不過，民用航線作爲一旦開戰時軍用航線的方針，其實早在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日本陸海軍即已針對自身戰略及運輸所需而與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相互制定「非常時期運航」與「戰時徵用」等相關計畫。特別是在海軍方面，因其主戰場爲廣大的太平洋海域，且以美國爲第一假想敵，加上海軍航空部隊須在萬里無涯的海上及島嶼進行作戰任務，故其相當重視海上航空輸送之能力。同時爲考量到將來戰事一旦爆發時航線的轉換及徵用，早在 1937 年以前南洋群島地區相關的民用航線開設過程中，都有賴在此區域擁有豐富飛行經驗的海軍航空部隊提供技術支援與人員訓練，甚至直接參與實際的現地飛航指導。因此，1941 年 11 月下旬當日美開戰呈現一觸即發之勢時，海軍軍令部乃命航空本部總務部策畫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於戰時的徵用計畫，並於 12 月 8 日開戰當天將計畫書交予該公司執行，[80]同時宣布 12 月 12 日以後所有民用航線正式全數劃歸爲軍事之用。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本陸海軍部隊持續在南方各地域快速地推進，爲確保日本南方戰略資源地帶，以及南方各佔領區域之警戒，1942 年 1 月 3 日以後，海軍乃相繼編成南遣第一至三艦隊，以及西南方面艦隊用以駐守南方各佔領區域，同時爲加強這些區域與日本本土之聯絡，航空輸送能力可說在戰略上極爲重要，尤其是在海上的航空輸送，則可能左右著將來戰事的發展。[81]

爲此，軍方乃首先對「軍用定期航空」進行整備統合。1942 年 9 月，陸軍率先將原本負責軍用輸用任務的「特設第十三、十五輸送飛行隊」廢止，並於「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內新設「南方航空輸送部」，而海軍也於同年底新設「海軍徵用輸送機隊」（第一至第六徵用輸送機隊），並將該航空公司內所屬機隊進行分配整編，以供陸海軍海外戰地連絡飛行與物資運輸之用。而在台灣方面，同年 10 月陸軍則在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台北支所內設立「南方航空輸送部台北出張所」，[82]海軍則於橫濱支所設立「海軍第五徵用輸送機隊」，[83]以進行包含淡水水上機場在內的南方中繼航線之相關業務。因此，1942 年以後「陸軍南方航

---

[79] 廣岡治哉編，《近代日本交通史》（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7 年），頁 216。

[80] 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199-200；財団法人日本航空協会編，《日本航空史》昭和前期編（東京：同編者，1975 年），頁 785-786。

[81] 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271-272。

[82] 該部台北出張所負責人由陸軍屏東航空支廠廠長兼任，而由此可略知戰時軍方航空運輸與維修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台灣在當時所扮演的轉場角色。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福武義雄メモ（屏東航空廠、南方航空部台湾支部関係）〉，《陸軍一般史料》，陸空-日誌回想 374，未編碼。

[83] 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274；財団法人日本航空協会編，《日本航空史》昭和前期編，頁 794-795；日本海軍航空史編輯委員會，《日本海軍航空史 3 制度篇》（東京：時事通信社，1969 年），頁 214-221。

空輸送部」與「海軍徵用輸送機隊」進駐「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後，可說是完全掌控了公司的營運及航線的規劃與發展，並進行以軍事人員與物資輸送爲主的相關業務。[84]

而爲了因應戰時軍用航線之營運，總督府乃於 1942 年 5 月任命現役海軍航空兵少佐出身，同時也是由海軍方面推薦擔任交通局遞信部航空官，專職水上飛機相關航線開設的少路虎三郎出任淡水水上機場首任場長，[85]以因應該年 6 月新開設「横濱—印尼泗水（Surabaya）」軍用定期航線時的機場管理，而該航線運輸方面的業務則受横須賀海軍鎮守府所指揮，並由「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横濱支所的「海軍第五徵用輸送機隊」實際負責。[86]該航線的班次爲每月的第一、三個星期四各開一班，並以「川西大艇」爲主要用機，由横濱爲起點，經淡水、菲律賓馬尼拉（Manila）、納卯（Davao）、印尼錫江（Pante），並以印尼石油產地之一的泗水爲終點，整個航程含待機時間共約四天。[87]而爲了配合戰時機場的營運及強化航空相關設施，1942 年 7 月後總督府乃與軍方則陸續增設相關航空設施，包括機場內的測候所（10 月 1 日），[88]以及於原淡水稅關監視部前空地興建約兩百坪，包含交通局遞信部、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測候所、稅關、警察相關部門及出張所在內的「航空事務聯絡合同廳舍」（11 月 13 日），[89]以供機場所屬人員辦公及乘客出入境使用。

另外，爲加強淡水水上機場的航空保安設施，[90]1943 年後總督府及台灣軍司令部則相繼於機場周邊設立了無線羅針所、[91]國際無線電台，[92]以及台灣最早的電波警戒機。[93]特別是 1944 年 6 月塞班島「玉碎」之後，海軍方面聯絡日本

---

[84] 拙作，〈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頁 118；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第九期營業報告書》，1943 年 4 月 1 日至 1943 年 9 月 30 日，頁 3。

[85]〈少路虎三郎任府交通局航空官〉，《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 16 年（1941）甲種永久保存，文號 4，冊號 10113，頁 36。

[86] 松長修一，〈台北支所の素描〉，收錄於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462。

[87] 浅香良一，〈大日本航空の南洋定期〉，頁 265；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274-275。

[88] 氣象局淡水飛行場出張所，〈沿革〉，《概況書》，1945 年 12 月，頁 1；周明德，〈台灣總督府氣象台淡水機場派出所記事〉，《中央氣象局通訊》，2010 年 2 月，頁 12-14。

[89]〈航空事務連絡に淡水に合同廳舍 きのふ地鎮祭を擧行す〉，《台灣日日新報》，15537 號，1942 年 11 月 15 日，夕刊二版。

[90] 另外，二次大戰期間總督府尚在「浮線」中央上豎立一支風旛（或稱「燕尾旗」），供飛行員觀察氣流。周明德，〈被遺忘的台灣第二座國際機場：淡水水上機場〉，《海天雜文》（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 年），頁 75。

[91] 台灣總督府，《台灣統治概要》，頁 196—197。

[9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央設計局台調會檢送日本在台的航空情況調查表致航空委員會函稿〉，《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匯編》第 33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年），頁 292。

[93] 該電波警戒機設置於淡水郡廳舍的西半邊，設置的原因主要為監視對岸上海方向的飛機動態（防空用），並藉由起降於淡水水上機場的各式飛機為對象，進行相關監視任務的教育實習，1944 年後為避免受空襲損害而轉入地下，故並未因戰爭因素而有太嚴重的損壞。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藏，〈台湾航空情報隊長広川中佐回想〉，《陸軍一般史料》，陸空-日誌回想 850，頁 1-4；周明德，〈台灣總督府氣象台淡水機場派出所記事〉，頁 12。

本土與南方各地域的航線僅剩的「西部」聯絡航線，即經「橫濱、淡水、西貢、新加坡、泗水」之航線，爲了唯持日本海軍中央部門與南方海軍各部隊資訊情報之暢通，加上還必須將部份駐留在南方的海軍人員運送回日本，以備本土決戰之急需。因此「海軍第五徵用輸送機隊」除了增派更多航班外，尚投入了載運量更高的新式「二式飛行艇」，以解決運輸量大增的「西部」單線飛行，[94]故爲因應此種情況，總督府相繼於 1944 年 6 月緊急撥出特別會計第二預備金共 35 萬圓，以充當「淡水飛行場緊急整備」之費用，[95]並於該年 10 月設置航空燈台（關渡），1945 年 3 月增設「淡水無線標記所」（沙崙），透過設置「短波遠距離用方向探知機」之訊號發送，[96]以及航空燈台之導引，提供更多經由淡水水上機場往來於南方各地域之飛機，能夠更正確的測定其與機場所屬之方位，確保飛航及起降安全。



圖七、1942 年後大日本航空海洋部橫濱支所經營航線

資料來源：越田利成，〈飛行艇パイロットの回想：横浜から南太平洋へ（9）ウェーキ島一番乗り〉，《航空と文化》，2010 年 4 月，未編碼。

註：粗體紅線部份表示「橫濱—印尼泗水」軍用定期航線。

1942 年以後，淡水水上機場除了提供「海軍第五徵用輸送機隊」與相關軍

[94] 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274-275。另外，根據周明德的回憶，1945 年 5 月 13 日八里米倉村淡水河面有一架大型「二式飛行艇」被美機攻擊攻擊而受創擱淺於此。滿潮時，只露出其垂直尾翼，退潮時則顯露上半身。約四個月之後（戰後），此架受創飛艇則由日軍拆除。參見周明德，〈被遺忘的台灣第二座國際機場：淡水水上機場〉，頁 77。

[95] 〈大東亜省所管南洋庁経費補充金（以下前同文）外四件〉，《公文類聚》，資料來自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3010181000，未編碼。

[96] 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編印，《台灣交通匯報》，頁 163；周明德，〈台灣總督府氣象台淡水機場派出所記事〉，頁 12。

用機進行軍事輸送及轉場起降外，爲因應戰爭的持續發展，以及考量台灣北部防衛與海運航線之運輸安全，1943 年 11 月 15 日海軍高雄警備府乃於淡水水上機場內設立淡水航空基地。

該基地主要駐紮部隊爲水上飛機偵察隊，轄下曾配置零式水上觀測機（8 架）、零式水偵機（1 架）、九四式水偵機（2 架），[97]主要負責「台灣北部海面警戒、偵察及攻擊、對潛哨戒、海上交通保護」等相關任務之執行，[98]而淡水航空基地之設立及偵察機隊的編成，則是爲因應 1943 年以後頻頻出沒在台灣至日本本土的海上航道，以及潛伏台灣北部與沖繩海域一帶的美軍潛艦之攻擊，且爲護衛往來航道的徵用船隊及搭載軍需物資的輸送船團不受侵擾，「淡水水偵隊」除了接受高雄海軍警備府司令部指揮及調配，於輸送船團接近負責海域時出動護衛之外，平時也主動進行海上對潛偵搜任務，[99]提供鄰近其他對潛攻擊部隊正確的搜索範圍，並定期協同基隆方面防備部隊（艦艇）、第十四聯合航空隊及東港航空隊所屬派遣隊及飛行艇，合作執行台灣北部海域的「對潛掃蕩」任務。[100]

另外，爲擴大淡水航空基地區域之設施，1944 年 1 月高雄海軍警備府所轄之高雄海軍施設部即曾對基地進行港口相關整建工程，並於 2 月向基隆港務局徵借淡水支局倉庫，[101]3 月以後則進行航空基地設施之整建，特別是淡水支局及倉庫前方即爲支部專用碼頭，[102]因此推測整建及徵借碼頭的原因，可能爲提供 3 月新設於航空基地的小型掃雷艇停靠之用，[103]加上 4 月以後「淡水水偵隊」與陸軍第一〇六獨立飛行部隊（分駐於台北及花蓮）共同分擔富貴角以東海域之偵搜任務，[104]由此可知當台灣周邊海域及航道受到美軍潛艦的威脅極大，[105]其除透過魚雷攻擊過往船舶之外，甚至曾經攻擊過由淡水航空基地所派遣出去的

---

[97] 檔案管理局庋藏，《台灣海軍情報資料》，檔號 0035511.14010，頁 054；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1944 年 4 月，頁 1920。

[98] 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1943 年 11 月，頁 1332。

[99] 水上飛機的「對潛偵搜任務」主要搜尋海面可疑的大面積油漬、魚群陰影、不明漂流物等潛艇可能的行蹤。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1944 年 1 月，頁 1469；1944 年 4 月，頁 1910、1916。

[100] 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1943 年 12 月，頁 1383-1386、1410；1944 年 1 月，頁 1457；1944 年 2 月，頁 1564。

[101] 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1944 年 1 月，頁 1506；1944 年 2 月，頁 1634；海軍施設系技術官の記錄刊行委員會，《海軍施設系技術官の記錄》（東京：同編者，1972 年），頁 762-7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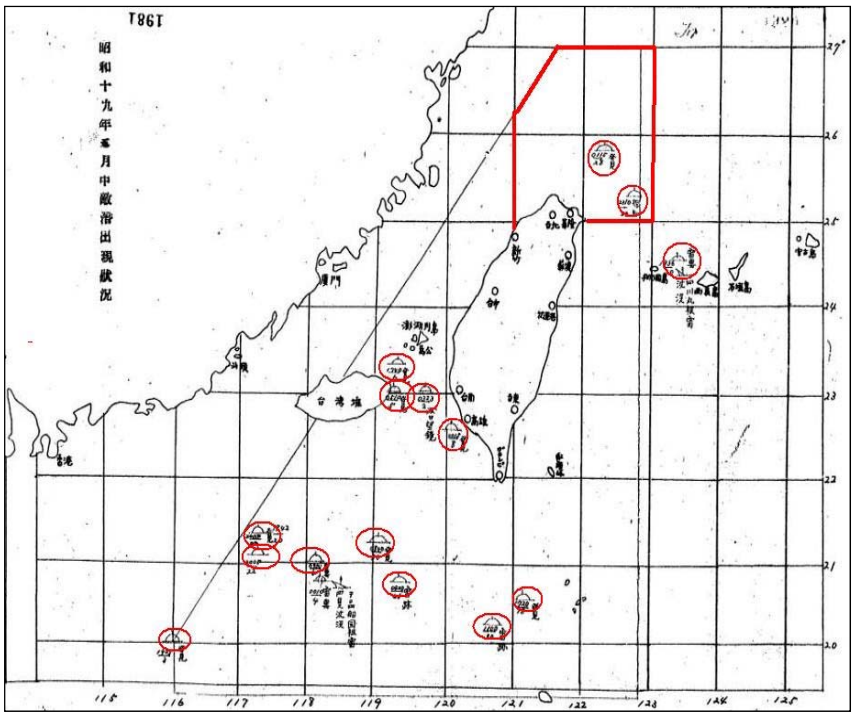
[102] 莊家維，〈近代淡水聚落的空間構成與變遷：從五口通商到日治時期〉，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頁（5-24）、（5-34）。

[103] 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1944 年 3 月，頁 1688、1697。

[104] 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1944 年 3 月，頁 1817、1824。另外，1944 年駐防於花蓮的陸軍第一〇六獨立飛行部隊主要是由陸軍第八飛行師團轄下的飛行第十四戰隊（1938 年 11 月於嘉義編成）內的一個中隊（6 至 7 架）所派遣組成，主要負責台灣東方海面的哨戒任務。參見鈴木正一，《蒼穹萬里：陸軍飛行戰隊史》（東京：陸軍飛行戰隊史刊行委員会，1976 年），頁 44。

[105] 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所屬船舶損害的眾多原因中，遭潛艇攻擊的比率為 59.7%，為船舶損害原因中的第一位。日本海軍航空史編輯委員會，《日本海軍航空史 1 用兵篇》（東京：時事通信社，1969 年），頁 387。

水上偵察機（4 月 25 日），造成基地損失九四式水偵機一架，機組員三名。[106] 茲將 1944 年 5 月中旬台灣周邊海域美軍潛艇出沒狀況圖簡列於下：



圖八、1944 年 5 月中旬台灣周邊海域美軍潛艇出沒狀況圖

資料來源：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1944 年 4 月，頁 1824；1944 年 5 月，頁 1981。

註：台灣北部及東北部海域（東至蘇澳、龜山島）以粗體框出之區域爲淡水航空基地負責偵察之區域，圈出標記表示發現美軍潛艦出末之地點。

（三）「台灣沖航空戰」前後的淡水航空基地

1944 年 6 月日本經歷馬里亞納海戰的慘痛損失之後（「あ」號作戰），海軍方面爲因應美軍自南太平的洋持續反攻，且爲能有效運用航空部隊進行反擊，於是開始採取能夠臨時機動調度指揮航空部隊的「空地分離制度」。該制度於 7 月 10 日正式實施，其主要將航空隊分爲「特設飛行隊」（甲航空隊）與「常設飛行隊」（乙航空隊），前者並未提供所屬基地及管理，因此在航空隊司令部不介入的情況下，該飛行隊具有臨時調度並指揮航空戰力的特性，且與後者呈現分別管理的制度，而「乙航空隊」即爲防衛航空基地，並保有支援系統的地面部隊，轄下並無配屬飛機（故稱「無翼有腳」的航空隊）。這種制度的實施使得海軍作戰時能夠快速集結各種不同機種的航空戰隊，並將指揮權集中於艦隊司令，使之能夠快速反映與靈活調度，並發揮最大的戰力。[107]

若以淡水航空基地爲例，該制度實施後乃將原屬於淡水航空基地的「水偵

[106] 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1944 年 4 月，頁 1932；1944 年 5 月，頁 2025。

[107] 雨倉孝之，《海軍航空隊の基礎知識》（東京：光人社，2009 年），頁 356-358；零戰搭乘委員会編，《海軍戰鬪機隊史》（東京：原書房，1987 年），頁 320-323。

隊」之調配權劃歸於高雄警備府直屬，並將其更名爲「海軍高雄警備府附屬飛行隊」（甲航空隊），並由高雄警備府視作戰需要調度轄下各航空隊派遣支隊駐紮淡水基地，故又稱某某航空隊「淡水派遣隊」。例如，1944 年 6 月 1 日高雄警備府即已抽調駐紮於海軍東港航空基地的九五三海軍航空隊之一部組成「九五三空淡水基地派遣隊」（轄下編制爲兩個分隊，共 20 名飛行科軍士官），而淡水航空基地的地面部隊則分屬於新竹的「台灣海軍航空隊」（乙航空隊），以及 1945 年 6 月由前者所改編的「北台海軍航空隊」之下，而這種指揮系統迄至該年 8 月戰爭結束爲止，基本上並未有太大變動。[108]

簡言之，爲因應 1944 年至 1945 年初美軍一路由南太平洋、菲律賓等地朝台灣周邊海域之仰攻，淡水航空基地對於原本轄下常駐的「航空兵力」已不具有管轄權，這種指揮系統的轉變，使得淡水航空基地僅能指揮所屬的地面部隊，包含設營隊、防空隊、震洋隊、監視所等，而「水偵隊」及前述的「海軍第五徵用輸送機隊」所屬機組員，都不屬基地管轄，從而使淡水航空基地在某種程度上變成僅能提供飛機停靠或轉場的「水上機場」。

而駐紮於淡水航空基地的各派遣隊（水偵隊）主要執行台灣北部海域船團護衛及對潛掃蕩之任務，其中 1944 年 7 月至 9 月間「九五三空淡水基地派遣隊」在執行「日夜對潛掃蕩」的任務時，就曾擊沉美軍潛艦兩艘、擊傷一艘，就一個編制不算大的航空派遣隊來說，戰果可謂相當豐碩。[109]

不過，1944 年 9 月美軍開始由菲律賓南部的岷答那峨（Mimdanao）朝中部的雷伊泰（Leyte）海域逐步挺進後，美軍爲切斷日本經台灣往菲律賓的後方補給路線，並以攻擊台灣各航空基地爲主要目的，而開始增派航空機動部隊朝台灣東部、沖繩及南西諸島海域集結（10 月 10 日），當日本陸海軍航空部隊在獲得相關情資後則陸續動員及移防相關航空部隊前往迎擊，自 10 月 12 至 16 日期間，兩方共派出約千架左右的各式飛機在台灣東方海域上空展開激烈的「台灣沖航空戰」，同時美軍也在該月 12 日以後開始針對台灣全島各主要航空基地及軍事設施展開連續的空襲行動。[110]

然而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顯示，在這場著名戰役中「九五三空淡水基地派遣隊」方面僅於 10 日接獲第二航空艦隊之指示前往台灣東部海域進行飛行索敵任務，[111]並透過雷達偵知美軍正朝台灣東部海域移動之情報。[112]12 日當天清晨

---

[108] 檔案管理局庋藏，《台灣海軍情報資料》，檔號 0035511.14010，頁 054。

[109] 1944 年 9 月以後淡水基地則由日本德島縣「小松島空派遣隊」移防淡水基地負責日間組的「對潛掃蕩」任務，而原駐於淡水的「九五三空淡水基地派遣隊」則負責夜間組。參見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第九五三海軍航空隊戰時日誌：昭和十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海軍一般史料》，⑤航空部隊，戰鬪詳報・戰時日誌 303，未編碼。

[110] 神野正美，《台湾沖航空戦》（東京：光人社，2004 年），頁 17-18；零戦搭乗委員会編，《海軍戦闘機隊史》，頁 148-149。

[111]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第九五三海軍航空隊戰時日誌：昭和十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海軍一般史料》，⑤航空部隊，戰鬪詳報・戰時日誌 303，未編碼。

美軍開始針對包含淡水基地在內的台灣各地軍事重地進行猛烈的空襲轟炸，[113]造成淡水基地周邊及駐紮航空戰隊遭受到嚴重損害，[114]同時隨著「台灣沖航空戰」之後日軍在台灣及南西諸島的制空權漸失，迫使包含淡水航空基地在內的台灣各軍事基地興築更多的防空設施，例如 1944 年 12 月以後淡水航空基地開始以挖坑地道的方式（橫穴式）興建彈藥庫，並預計興建飛機掩體壕十五處（12 月底前已完成六處），及高射機槍陣地數座，以防衛美軍之空襲。[115]因此，「九五三空淡水基地派遣隊」雖然未直接參與「台灣沖航空戰」，且於該戰役後受到美軍嚴重的轟炸，以致於其後並未能發揮原本的偵搜戰力，但其在戰役先前的海上偵搜及情報搜集上，甚至是反潛攻擊戰力上，應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

1944 年 12 月 20 日本部設於東港航空基地的「九五三航空隊」因戰略考量及戰隊本身損失嚴重而遭到裁撤整編，並以海上護衛總司令部轄下「九〇一航空隊」之派遣隊進駐淡水航空基地，接續台灣北部海域哨戒及海上輸送船團的護衛工作，[116]而當時「九〇一空淡水基地派遣隊」隸屬於海軍第五航空艦隊（司令官爲大西瀧治郎中將）之下，並配備六架零式水偵機，編制共 182 人。[117]不過隨著 1945 年 3 月 23 日美軍開始對沖繩及周邊諸島展開空襲及登陸作戰，揭開爲期近三個月的「沖繩戰」（3 月 23 日至 6 月 25 日）後，台灣第十方面軍司令部則下令發動「天一號作戰」，調動轄下的飛行第八師團，以及海軍各航空艦隊之航空兵力試圖抵擋美軍登陸沖繩。[118]當時海軍爲因應「沖繩戰」時的空中偵查及夜間戰力，乃自鹿兒島古仁屋基地調派「偵三〇一飛行隊」進駐淡水航空基地，並與「九〇一空淡水基地派遣隊」共同配合「天一號作戰」方針組成「水爆隊」（由海軍第五航空艦隊駐東港的六三四空司令指揮），執行沖繩諸島附近夜間攻擊及索敵任務，若發現美軍部隊後隨即通報司令部派遣台灣各基地特攻隊前往該地進行自殺攻擊，同時負責特攻攻擊後的戰果確認。[119]不過，因爲 4

---

[112] 劉鳳翰，《日軍在台灣（下）》（台北：國史館，1997 年），頁 540-541。

[113] "FORMOSA REPORTED BOMBED, "*The Times*, Friday, Oct. 13, 1944；"HEAVY ATTACKS ON FORMOSA, "*The Times*, Saturday, Oct. 14, 1944；黃繁光主編，《風起雲湧時：首位台籍氣象官周明德生平所見所聞》，頁 126-127。

[114] 另據周明德之說法，1944 年 10 月 12 日水上機場的海軍基地忽然受到美國第三艦隊航空母艦上的 Grumann F6F Hellcat 機群的空襲，基地設施大多損壞，飛機因為疏散在防空洞中，所以沒有大礙。但西北方約 200 公尺遠的原英商 Lexington 石油公司的大型油槽中彈，大火燃燒了半天之久，參見氏著，〈台灣總督府氣象台淡水機場派出所記事〉，頁 12。

[115]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第九五三海軍航空隊戰時日誌：昭和十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海軍一般史料》，⑤航空部隊，戰鬪詳報・戰時日誌 303，未編碼；周明德，〈被遺忘的台灣第二座國際機場：淡水水上機場〉，頁 76-77。

[116]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第九五三海軍航空隊戰時日誌：昭和十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海軍一般史料》，⑤航空部隊，戰鬪詳報・戰時日誌 303，未編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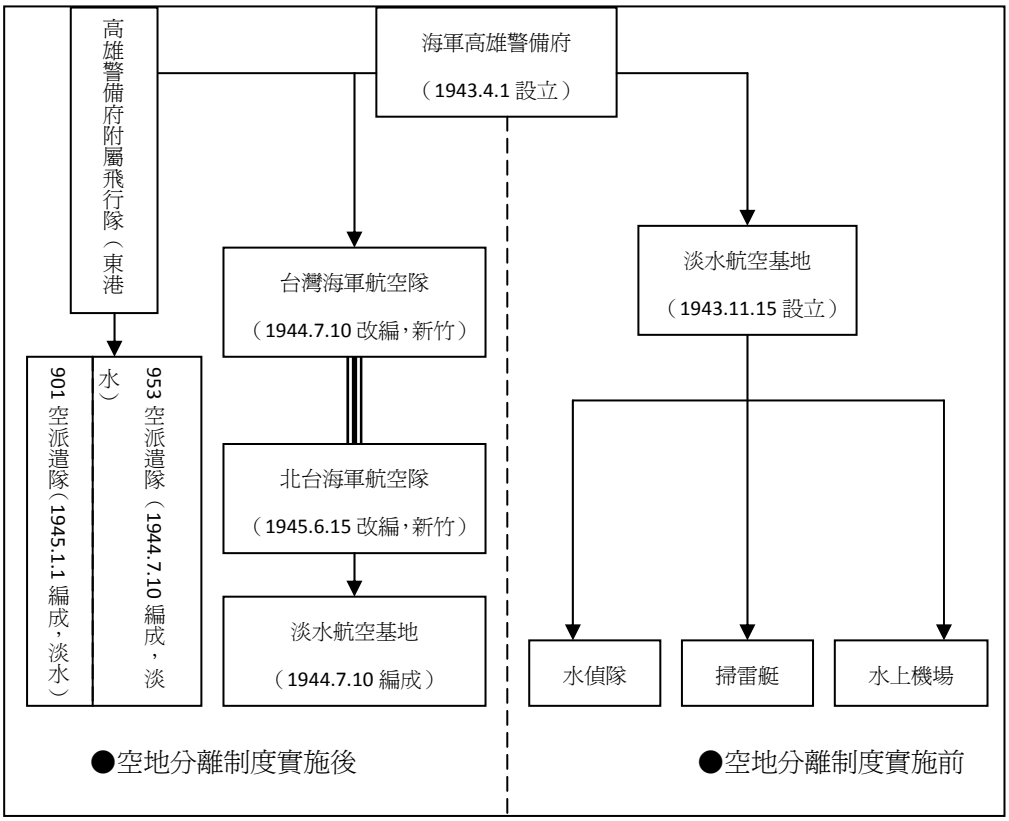
[117] 日本海軍航空史編輯委員會，《日本海軍航空史 1 用兵篇》，頁 385-387；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第九〇一海軍航空隊戰時日誌：昭和十九年八月至昭和二十年三月〉，《海軍一般史料》，⑤航空部隊，戰鬪詳報・戰時日誌 271，未編碼。

[118] 劉鳳翰，《日軍在台灣（下）》（台北：國史館，1997 年），頁 553。

[119]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東亞戰爭戰鬪詳報·台灣海軍航空隊：昭和二十年四月至五月〉，《海軍一般史料》，⑤航空部隊，戰鬪詳報・戰時日誌 337，未編碼。

月以後包含淡水在內的台灣各地航空基地持續遭到被美軍 B24 等大型轟炸機猛烈空襲，[120]因此駐紮於淡水航空基地的航空戰隊在「沖繩戰」期間能夠執行的作戰方針及戰力，似乎相當有限。

綜上或可略知，1944 年 6 月以後淡水航空基地的航空部隊主要由駐紮或撤退至東港航空基地的航空戰隊所派遣而來，並持續負責台灣北部海域航道護衛及反潛相關之任務，其後雖因日軍在「台灣沖航空戰」及「沖繩戰」的戰略而有所改編，負責任務及基地防備也有所調整，但仍可以看到淡水航空基地及駐紮航空部隊對於戰爭末期台灣北部周邊海域的防衛，以及往來南方戰線物資輸送船團的護衛上，扮演甚爲重要的戰略角色，同時在另一方面也能從其航空部隊的遞嬗及執行任務之變更，嗅出日軍及所屬航空部隊在戰爭末期失去制空權，以及退守台灣之後的窘態。



圖九、淡水航空基地指揮系統簡圖（1943—1945）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庋藏，《台灣海軍情報資料》，檔號 0035511.14010；高雄警備府司令部，《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1943 年 4 月至 1944 年 5 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第九五三海軍航空隊戰時日誌：昭和十九年六月至十二月〉，《海軍一般史料》，⑤航空部隊，戰鬪詳報・戰時日誌 303，未編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第九〇一海軍航空隊戰時日誌：昭和十九年八月至昭和二十年三月〉，《海軍一般史料》，⑤航空部隊，戰鬪詳報・戰時日誌 271，未編碼；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大東亞戰爭戰鬪詳報：台灣海軍航空隊：昭和二十年四月至五月〉，《海軍一般史料》，⑤航空部隊，戰鬪詳報・戰時日誌 337，未編碼。

[120]〈台灣南部に六十數機〉，《讀賣新聞》，1945 年 4 月 28 日，一版；〈台灣に四十數機〉，《讀賣新聞》，1945 年 4 月 30 日，一版；〈台灣に戰爆聯合來襲〉，《讀賣新聞》，1945 年 5 月 15 日，一版；〈台灣に百六十餘機〉，《讀賣新聞》，1945 年 5 月 16 日，一版。

四、戰後初期機場的利用：「綠十字飛行」

1945 年 8 月 15 日，爲時近四年的太平洋戰爭因美國相繼在長崎及廣島投下原子彈而宣告落幕。不過因爲 1941 年底日美開戰後，日本的佔領地及勢力圈遍及整個亞太地區，同時戰爭帶來的破壞使得日本本土與海外各地的通訊系統嚴重損壞，因此爲僅快進行各地區戰後事務之處理，以及考慮復員關係事務之緊密聯絡，戰後的日本政府乃向「盟軍最高司令官」提出進行戰後連絡定期航空之請求，而「盟軍最高司令官」乃於 1945 年 9 月核准該項請求，並規定該項航空業務必須隨各地區戰後事務處理告結束後終止（1945 年 10 月 10 日），而執行業務之飛機則限制不能同時超過四架進行飛行任務，飛行高度也限在 1,200 公尺以下，且必須將機身全部塗白，並塗裝綠色十字形標誌以供辨識，故該項飛行任務一般也通稱爲「綠十字飛行」。[121]

擔任戰後台灣與日本之間「綠十字飛行」任務的對口機場分別是淡水水上機場及橫濱水上機場，使用機型爲「川西大艇」，其中與戰後台灣關係事務處理直接相關的飛行任務則是該年 9 月 14 日由橫濱出發至淡水，並搭載總重量約兩公噸台灣銀行券的「綠十字飛行」。[122]根據當時受託於「終戰連絡中央事務局」（Central Liaison Office, C.L.O.）來台進行戰後事務處理的前台灣總督府主計課長塩見俊二的日記，以及擔任此次飛行任務駕駛越田利成的回憶顯示，該次任務主要的理由在於爲舒緩戰後因台灣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種種社會問題，因此乃於 8 月 30 日決定由塩見俊二負責載運總重量約兩公噸台灣銀行券，[123]以補充台灣銀行庫存的不足，[124]而選址於淡水水上機場的原因則在於當時日本與台灣間通訊系統嚴重損壞，且無法掌握當時台灣的治安狀況，加上戰後日本軍方將一部份台灣相關飛航資料燒毀，因此考慮機場降落及飛航安全，於是乃決定淡水水上機場爲降落之地點。[125]

該次飛行由川西大艇「神津號」擔任此次飛行任務，原本預定 9 月 5 日由橫濱出發，其後因天候不良及飛機故障等因素曾一度延期，[126]迄至 9 月 10 日清

---

[121] 蘆原友信，〈終戰連絡飛行〉，《日本民間航空史話》，頁 77-378；遠山泰山，〈終戰連絡定期航空：緑十字飛行〉，《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623-624；航空五十年周年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航空局五十年の歩み》（東京：同編者，1970 年），頁 322-323。

[122] 另外，根據相關資料顯示，除了 9 月 14 日的飛行任務之外，迄至 10 月 10 日「綠十字飛行」終止前，尚曾搭載「水野組」來台，不過此次的任務性質及時間，目前尚缺乏更進一步的詳細資料。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453。

[123] 除了台灣以外，「終戰連絡中央事務局」同時也決定 9 月 4 日以相同理由派遣 MG20-2 型三架運輸朝鮮銀行券前往朝鮮。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典藏，「C.L.O. No.1, 30 August 1945」，〈善後措置および各地状況関係〉，《外務省記録公開文書》，檔號 A'-0115/279，頁 0372-0373。

[124] 塩見俊二，《外から日本を見る》（東京：鹽見財政經濟研究所，1964 年），頁 16-18；塩見俊二，《秘録・終戦直後の台湾：私の終戦日記》（高知：財團法人小津圖書館，1980 年），頁 35-37。鈴木源吾，〈台湾における終戦処理〉，《ファイナンス》8：3，1972 年 6 月，頁 65。

[125] 越田利成，〈戦後台湾復興を支えた緑十字飛行艇〉，《榕樹文化》29 号，2010 年 6 月，頁 1-2。

[126]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典藏，「C.L.O. No.7, 2 August 1945」、「C.L.O. No.26, 7 September 1945」，

晨 6 點才順利成行，經約 11 個小時美軍軍機的隨同飛行後，於同日下午 4 點成功抵達淡水水上機場。[127]茲將此次飛行任務相關內容簡列於下：

表三、1945 年 9 月 10 日「神津號」飛行任務內容簡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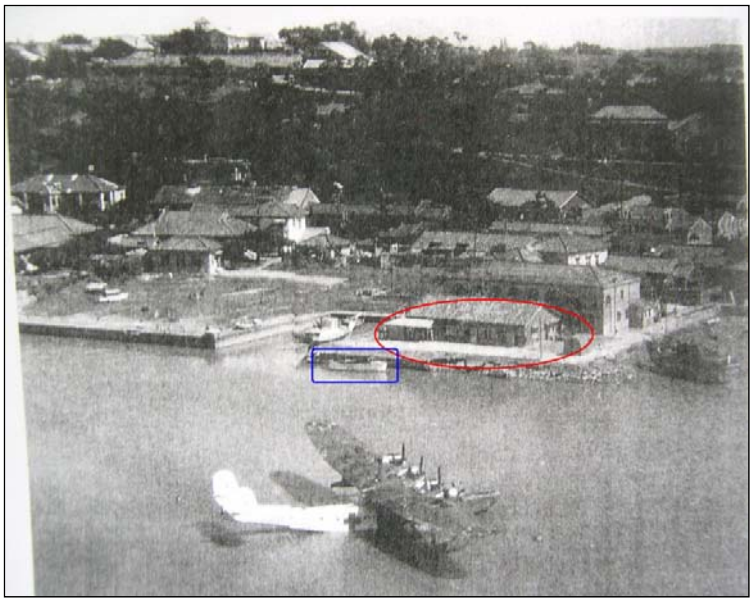
去、回程時間	1945 年 9 月 10 日、9 月 13 日
起迄地點	橫濱水上機場（a.m.6：00）— 淡水水上機場（p.m.4：00） 淡水水上機場（a.m.6：00）— 橫濱水上機場（p.m.4：00）
使用機型及名稱	九七式飛行艇（川西大艇）神津號
飛行時間 / 距離 / 時速	約 11 小時 / 2,400 公里 / 300 公里
機組員及乘員	大堀修一（機長）、越田利成（駕駛）、佐佐木吉郎（航空士）、武宮（機關士）、加藤（機關士）、鈴木及另一名（通信士）、塩見俊二（乘員）
載運物品及重量	台灣銀行券約 2 公噸
塗裝	機身爲白底，機身側邊及機翼上方兩邊標有綠十字記號，並附上長形紅色三角旗（pennant）以供辯識

資料來源：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典藏，〈善後措置および各地状況関係〉，《外務省記録公開文書》，檔號 A'-0115/279，頁 0383-0384、0401-0402；越田利成，〈戦後台湾復興を支えた緑十字飛行艇〉，《榕樹文化》29 号，2010 年 6 月，頁 1-2；塩見俊二，《外から日本を見る》，頁 16-18；塩見俊二，《秘録・終戦直後の台湾：私の終戦日記》，頁 42-43。

由前述可知，此次停泊於淡水水上機場的「綠十字飛行」任務主要是搭載戰後影響台灣金融及經濟甚爲重要的台灣銀行券來台，以解決當時通貨不足的問題。除此之外，就目前所獲得的資料顯示，擔任此次飛行任務隨行監視任務的美軍軍機所拍攝 1945 年 10 月 10 日「神津號」停泊於淡水水上機場的照片，則提供了我們對於機場的進一步瞭解。

〈善後措置および各地状況関係〉《外務省記録公開文書》，檔號 A'-0115/279，頁 0383-0386、0445-04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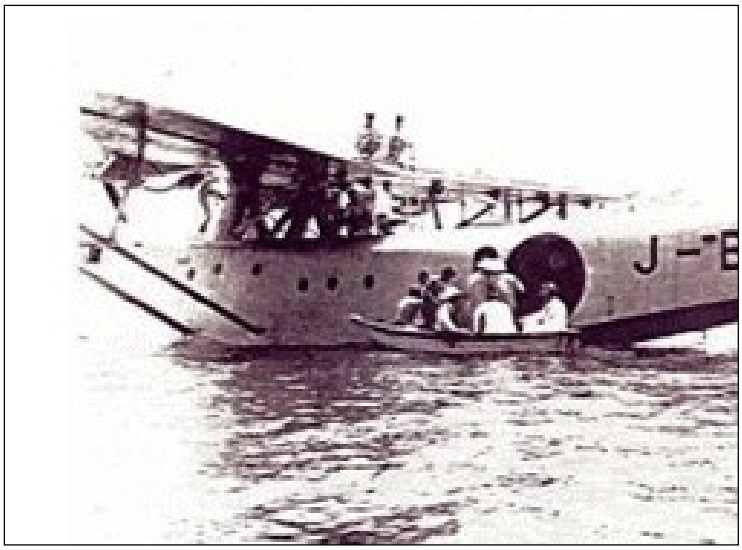
[127] 塩見俊二則將其出發之日記載為 9 月 9 日。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典藏，「C.L.O. No.12」，〈善後措置および各地状況関係〉，《外務省記録公開文書》，檔號 A'-0115/279，頁 0401-0402；塩見俊二，《秘録・終戦直後の台湾：私の終戦日記》，頁 42-43。



圖十、1945 年 9 月 10 日停泊於淡水的「綠十字飛行」任務用機「神津號」

資料來源：榕樹会事務局，《榕樹文化》29 号（京都：同編者，2010 年 6 月），封面。

由上圖觀之，「神津號」抵達淡水時，所停泊的地點並非一般所認爲的「鼻仔頭」區域(縣定古蹟區域)，而是現今淡水郵局後方的星巴克咖啡廳(Starbucks）現址前方水域，即前述淡水稅關監視部旁「航空事務聯絡合同廳舍」(橢圓標記）前方，由此即說明「鼻仔頭」區域應爲淡水水上機場的機庫及維修場，因此具有滑溜台之設置，而「航空事務聯絡合同廳舍」才應是旅客出入的地方，特別是該廳舍爲左下的小船即爲接駁小艇（方型標記），其主要功能則爲接送旅客上下飛機之用，使用情形即如下圖所示：



圖十一、「川西大艇」旁小艇接駁乘員一景

資料來源：越田利成，〈飛行艇パイロットの回想：横浜から南太平洋へ（7）女護ヶ島探問記〉，《航空と文化》，2010 年 2 月，未編碼。

由此或許可以推知，當飛機即將降落於淡水水上機場時，機場方面則派遣水上警察的汽艇於河面巡邏並鳴放警報汽笛，用擴音機告知河面上的船隻走避，待河面淨空後飛機才降落於油車口前的水域下降著水，且為閃避原已停放「浮線」東側船隻，避免相互碰撞，飛機降落後乃滑行至「浮線」西側尾端靠近淡水河左岸的河道後轉至「航空事務聯絡合同廳舍」前方，旅客即由小艇接駁上岸，而飛機起飛時則同樣利用「浮線」西側尾端靠近淡水河左岸的河道起飛，起飛滑行的方向則隨當時天候及風向而定，遇飛機故障需要維修檢查或因天候因素無法起飛時，才會將飛機拖至「鼻仔頭」區域停放。[128]

綜上所述，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之後，淡水水上機場並沒有隨著戰爭而馬上結束，而是因其原本所具備的條件提供了日本戰後處理台灣事務的需求，特別是在不清楚飛航資訊及戰後台灣治安狀況的情況下，淡水水上機場的存在則提供日本方面能夠有較多的選擇，避免如飛往朝鮮京城飛行場的「綠十字飛行」機組員，一降落就遭到軟禁的命運，[129]同時透過此行確定台灣治安平穩及松山機場尚能堪用後，美軍乃陸續增派東京至台北的相關航班，[130]以利戰後事務之處理及運作。因此 1945 年 9 月停泊於淡水水上機場的「綠十字飛行」可說是為處理戰後事務的台日兩地之官民及美軍人員，在後續的定期連絡飛行上開啓了重要的契機。

五、結論

淡水自荷西時期以來，一直被視為海上的重要航點與補給站，迄至清代台灣開港以後隨著當時台灣的特產茶及樟腦的大量出口，促使淡水港埠及沿岸的河運與商業興起，使其逐漸躍居為二十世紀以前台灣最大的港口。不過隨著時代與科技的進步，交通工具的變化也日新月異，原本僅供木製帆船停泊的淡水港埠，漸漸無法成容納新式的大噸位輪船，加上自然環境變遷造成的河川水位降低及泥沙淤積，加速促成淡水港埠功能的沒落，因而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淡水港迅速被新興的基隆港所取代。

儘管如此，作為國際重要航點的淡水並不會因為港埠功能的沒落而消失，而是憑藉著本身所具備的自然條件，為新式交通科技提供了實驗及發展的場域。關於這一點，若從 1920 年代台灣的飛行試驗與淡水的關係來看，或許正可說明淡水作為重要航點的價值，特別是 1930 年代「內台航線」的開設過程中，都可以看到淡水仍是總督府及軍方進行相關水上飛機航空實驗的選擇地點之一，甚

[128] 關於飛機起降於淡水水上機場的情況，可參見周明德，〈被遺忘的台灣第二座國際機場：淡水水上機場〉，頁 73-77。

[129] 越田利成，〈戦後台湾復興を支えた緑十字飛行艇〉，頁 2。

[130] T. katasube, Central Liaison Office,〈C.L.O. M-No.72, 25 September 1945（東京台湾間連絡飛行ニ関スル件）〉，收錄於竹前榮治監修，《「連合軍司令部往信綴」『GHQ への日本政府対応文書総集成』》第一冊（東京：新岡和幸発行，1994 年），頁 287-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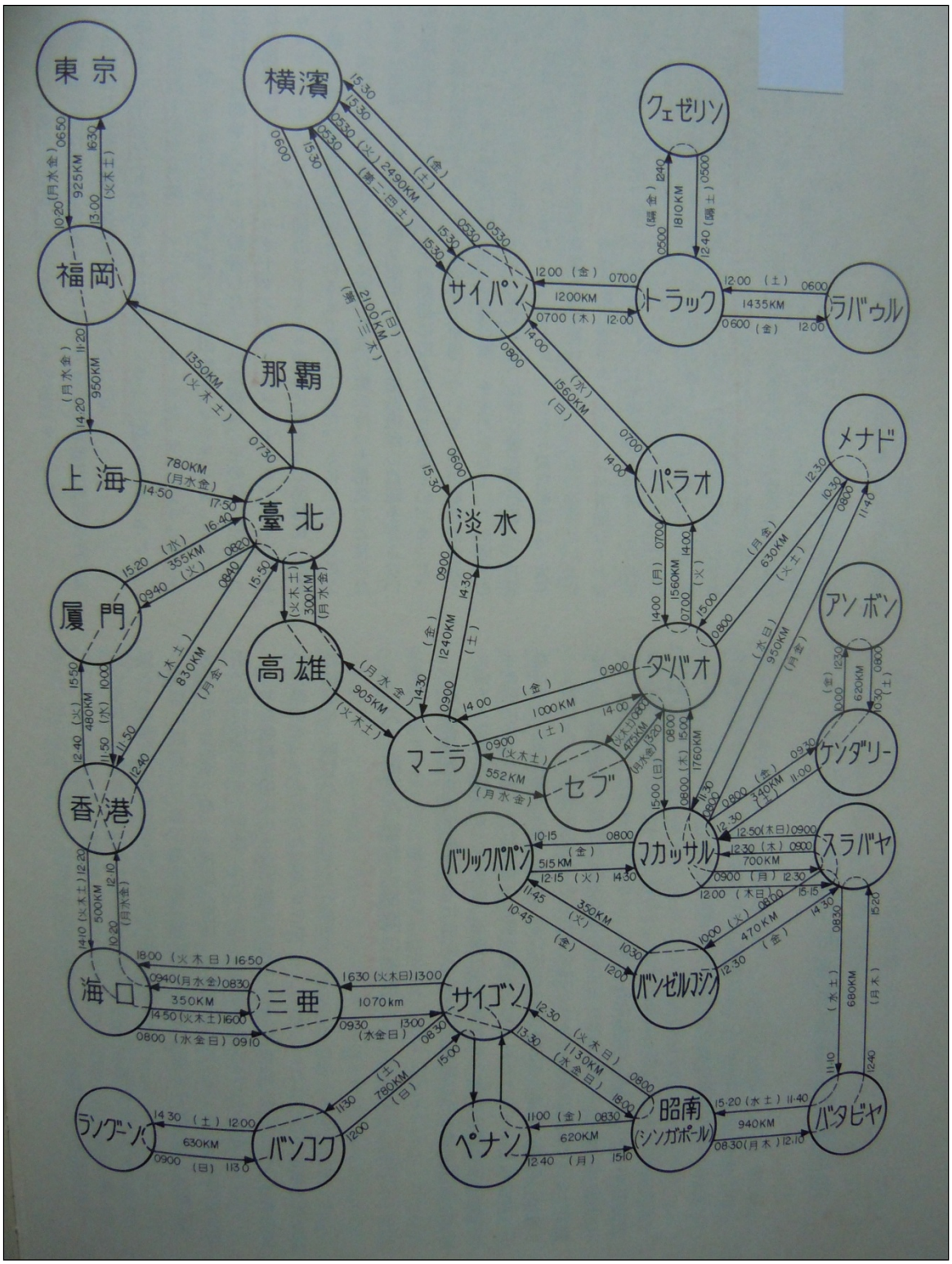
至還曾經被建議爲台灣設立國際機場預定地的首選。

隨著 1935 年以後台灣總督府對於南進政策的積極規劃與推動，以及日美兩國在亞太地區航線的競爭，特別是台灣爲日本聯結南洋地區之重要轉場，同因南洋地區本身也因半島或島嶼之地理因素，使得當地主要機場不少爲水上或水陸兩用機場，故爲考慮南洋地區的空運發展，總督府及相關單位遂於 1940 年陸續展開以淡水爲中繼站的「海洋循環航線」之飛行測試，而由此則促使了總督府於淡水設立水上機場的主因及推力。

1941 年 7 月 19 日淡水水上機場正式營運後，因受到該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影響，使得民用航線開設不到一年即轉爲軍用，不過卻隨著 1942 年日本軍事的南侵，更加強了其於軍事運輸方面的重要性，使其成爲聯結日本與中南半島、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地的重要水上飛機之中繼轉場。另外，1943 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逐漸由勝轉敗後，爲防堵美軍潛艦在台灣北部附近海域的攻擊，該年 11 月淡水水上機場則改編爲海軍轄下的淡水航空基地，並配置水上偵察機及小型掃雷艇等部隊，以執行台灣北部海域「對潛掃蕩」之任務。因此，太平洋戰爭之後，淡水除了因其重要位置及條件成爲聯結南方的運輸中繼站外，也因著戰事的發展，成爲擔負起防衛北部海域及航道安全的航空基地。此外，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以後，淡水水上機場並未因爲戰爭的結束而馬上終止，而仍因其本身所具備的條件，於該年 9 月 10 日的「綠十字飛行」任務及台灣的戰後事務處理方面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本文以淡水上機場之發展爲個案，並就現有資料，試圖從港埠變遷及台灣航空發展的觀點討論其性質及發展，雖然目前限於時間、篇幅及能力而未能關照到 1945 年 10 月至 1948 年水上機場接收及撤廢的過程與原因，但是透過對 1945 年以前水上機場於的發展及演變之探討，應可從另一個角度瞭解淡水作爲交通樞紐的重要性，同時或許也能爲往後討論機場接收及撤廢過程的後續研究，奠定些許的基礎。

六、附錄：海軍軍用定期航線圖



資料來源：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頁 276。

七、徵引資料

中文

（一）檔案、史料

劉銘傳，《劉壯肅公奏議》文叢本 27（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匯編》第 33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年）。

（二）專書

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編印，《台灣交通匯報》（台北：同編者，1946 年）。

周明德，《海天雜文》（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4 年）。

王世慶，《淡水河流域河港水域史》（台北：中研院社科所，1996 年）。

許伯埏，《許丙・許伯埏回想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

劉鳳翰，《日軍在台灣（下）》（台北：國史館，1997 年）。

溫振華、戴寶村，《淡水河流域變遷史》（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

陳國棟，《台灣的山海經驗》（台北：遠流出版，2006 年）。

黃富三主編，《海、河與台灣聚落變遷：比較觀點》（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9 年）。

黃繁光主編，《風起雲湧時：首位台籍氣象官周明德生平所見所聞》（台北：淡水古蹟園區，2009 年）。

（三）論文

莊家維，〈近代淡水聚落的空間構成與變遷：從五口通商到日治時期〉，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曾令毅，〈1895 年《淡水新政記原稿庶》之史料介紹及其價值〉，《第四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歷史系，2007 年）。

曾令毅，〈日治時期台灣航空發展之研究（1906-1945）〉，淡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6 月。

周明德，〈台灣總督府氣象台淡水機場派出所記事〉，《中央氣象局通訊》，2010 年 2 月。

日文

（一）檔案、未刊行資料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公文類聚》

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海軍省公文備考》、《海軍一般史料》、《陸軍省大日記乙輯》、《陸軍一般史料》、《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

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錄》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藏，《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行政長官公署檔案》

檔案管理局藏，《台灣海軍情報資料》

大日本航空株式會社，《第四期營業報告書》、《第九期營業報告書》

氣象局淡水飛行場出張所，《概況書》，1945 年 12 月。

（二）專書

福島安正編，《淡水新政記》（出版資料不詳，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典藏，1895 年）。

山本正一，《淡水港の整備に就て》（台北：淡水郡役所，1927 年）。
警務局航空班，《班務概況》（屏東：同編者，1927 年）。
早川政之輔，《飛行隊見學》（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30 年）。
台灣總督府，《臨時產業調查會答申書：台灣產業計畫說明書》（台北：同編者，1930 年）。
台灣總督府，《台灣總督府臨時產業調查會會議錄》（台北：同編者，1931 年）。
交通局港灣課，《淡水港調查書》（台北：同編者，1934 年）。
台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答申書》（台北：台灣總督府，1935 年）。
熱帶產業調查會，《台灣及南支南洋の航空》（台北：同編者，1935 年）。
大谷光瑞，《台灣島之現在》（大阪：大乘社，1935 年）。
大阪朝日新聞社，《空中撮影禁止區域》（大阪：同編者，1936 年）。
日本航空輸送株式會社，《日本航空輸送十年史》（東京：同編者，1938 年）。
大竹文輔，《台灣航空發達史》（台北：台灣國防義會航空部，1939 年）。
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台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六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發行，1941 年）。
交通局遞信部，《台灣航空事業ノ概況》（台北：同編者，1941 年）。
仁村俊，《航空五十年史》（東京：鱒書房，1943 年）。
井出季和太，《南進台灣史攷》（東京：誠美書閣，1943 年）。
遞信部，《交通局遞信部概要書》第十一冊（台北：同編者，1943 年？）。
台灣總督府，《台灣統治概要》（台北：同編者，1945 年）。
日本航空協會，《日本航空史》明治・大正編（東京：同編者，1956 年）。
塩見俊二，《外から日本を見る》（東京：鹽見財政經濟研究所，1964 年）。
日本航空協会編，《日本民間航空史話》（東京：同編者，1966 年）。
日本海軍航空史編輯委員會，《日本海軍航空史 1 用兵篇》（東京：時事通信社，1969 年）。
日本海軍航空史編輯委員會，《日本海軍航空史 3 制度篇》（東京：時事通信社，1969 年）。
航空五十年周年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航空局五十年の歩み》（東京：同編者，1970 年）。
海軍施設系技術官の記錄刊行委員會，《海軍施設系技術官の記錄》（東京：同編者，1972 年）。
小森郁雄編，《航空開拓秘話》（東京：「航空開拓秘話」刊行会，1974 年）。
財団法人日本航空協会編，《日本航空史》昭和前期編（東京：同編者，1975 年）。
大日本航空社史刊行会編，《航空輸送の歩み：昭和二十年迄》（東京：日本航空協会，1975 年）。
鈴木正一，《蒼穹萬里：陸軍飛行戰隊史》（東京：陸軍飛行戰隊史刊行委員会，1976 年）。
每日新聞社編，《別冊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航空史」》（東京：同編者，1979 年）。

塩見俊二，《秘録・終戦直後の台湾：私の終戦日記》（高知：財團法人小津圖書館，1980年）。

廣岡治哉編，《近代日本交通史》（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7 年）。

零戦搭乘委員会編，《海軍戦闘機隊史》（東京：原書房，1987 年）。

周明德，《續・夕陽無限好》（台北：自印出版，2001 年）。

佐藤一一，《日本民間航空通史》（東京：國書刊行會，2003 年）。

神野正美，《台湾沖航空戦》（東京：光人社，2004 年）。

雨倉孝之，《海軍航空隊の基礎知識》（東京：光人社，2009 年）。

（三）報刊

《大阪每日新聞》

《大阪朝日新聞》

《台灣日日新報》

《台灣時報》

《台灣遞信協會雜誌》

《新亞細亞》

《讀賣新聞》

《國民新聞》

《報知新聞》

《航空と文化》

《ファイナンス》

《榕樹文化》

英文

（一）檔案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典藏，《外務省記録公開文書》

（二）專書

竹前榮治監修，《「連合軍司令部往信綴」『GHQ への日本政府対応文書総集成』》第一冊（東京：新岡和幸発行，1994 年）。

（三）報刊

The Times

從在地生活的觀點探討淡水海關碼頭的再利用

張寶釧*

摘要

經歷了四十年文化資產的保存運動，期間的過程，雖然是長時間的等待及無數次的抗爭，但是，在民間的努力之下，還是建構了與政府對話的機制。2005年新文資法的頒布與施行，政府與社會大眾更清楚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性，同時，這一段日子台灣也因此保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化資產。而淡水就在這樣的環境與民間努力的爭取下，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文化資產，奠定了淡水在文化資產保存運動時期的地位及不同時期所遺留下的歷史空間。其中，淡水海關碼頭就是在當時經過眾人的努力而被留下來的一處古蹟。

淡水因其地形與地勢的重要性，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處，近四百年的歷史，經歷了西班牙、荷蘭、清朝、英國及日本的剝奪與侵略，讓一個小小的小鎮，因爲歷史的演變而擁有許多不同國家的建築與空間。而這些不同國家的建築，不只見證小鎮在歷史上的滄桑，同時也給此時的淡水流下豐沛的文化資產。民國92年，淡水小鎮已擁有了18處的古蹟與歷史建築，這些古蹟包括了洋樓、軍事要塞、漢人信仰中心及日式宿舍等多樣式的建築。民國93年爲了管理維護與活化這些歷史空間，臺北縣政府在淡水成立了台灣第一個以歷史文化與古蹟建築及文物爲展示的「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這個以保存、活化與經營管理淡水古蹟的博物館成立，正說明了臺北縣政府回應當下及未來對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的政策與宣誓，同時，這一項創舉也推動了臺灣在文化資產保存過程中，一項重要的突破，那就是歷史空間的再利用與經營管理的課題。

本文主旨與論述，主要在於歷史空間「淡水海關碼頭」再利用的議題，並從歷史背景、資產保存過程及碼頭與在地居民的關聯切入，冀望能以在地生活的觀點，參與「淡水海關碼頭」在修復後空間上的運用，讓已經擁有27處古蹟與歷史建築的淡水，因「淡水海關碼頭」再利用的模式，能有別於過去以政府政策決行或專家導向的思維邏輯，再一次開啓活化歷史空間的另一章。

* 淡水古蹟博物館第一任館長

關鍵字

淡水古蹟博物館、淡水海關碼頭、文化資產、在地化。

壹、前言

在臺灣，古蹟保存運動大約是一九七〇年中期浮現出來。由於經濟發展與工業化所產生現代化的過程，對傳統環境造成了重大的改變，原有既存的都市紋理迅速地爲公私部門之建設與投資所破壞，人們開始發現，城市的面貌與自然生態的改變已使得城市的歷史脈絡中斷甚至消逝。因此，搶救城市中具有歷史意義的空間或生態環境，成爲了許多文化人新的使命，也因爲要保存珍貴的文化資產，就在政府尚未有意識與作爲時，民間只能以抗爭來做爲搶救古蹟的行動，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 1976 年林安泰古厝拆遷的抗爭運動，這次事件聚集了過去搶救古蹟零星行動的經驗，讓保存的作爲開始有了共識與力量的集結，在這種氣氛之下，知識份子與文化精英提出了最早的批判與抵制，而這股力量，也是建構了台灣在古蹟保存運動之主要力量。

淡水因其地形與地勢的重要性，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處，近四百年的歷史，經歷了西班牙、荷蘭、清朝、英國及日本的剝奪與侵略，讓一個小小的小鎮，因爲歷史的演變而擁有許多不同國家的建築與空間。而這些不同國家的建築，不只見證小鎮在歷史上的滄桑，同時也給此時的淡水流下了豐沛的文化資產。民國 92 年，淡水小鎮已擁有了 18 處的古蹟與歷史建築，這些古蹟包括了洋樓、軍事要塞、漢人信仰中心、民居及日式宿舍等多樣式的建築。民國 93 年爲了管理維護與活化這些歷史空間，臺北縣政府在淡水成立了台灣第一個以歷史文化與古蹟建築及文物爲展示的「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這個以保存、活化與經營管理淡水古蹟博物館的誕生，正說明了臺北縣政府回應當下及未來對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的政策與宣誓，同時，這一項創舉也推動了臺灣在文化資產保存過程中，面臨重要的突破，那就是歷史空間的再利用與經營管理的課題。

時序至今，民國 99 年的淡水，已保存下來的文化資產數量，明顯已增加到 27 處的古蹟與歷史建築[1]，這些資產保存能快速成長的主因有，來自在地居民殷切的保存意願及公部門投入管理維護與經營的工作，這二大主因。就是因民間有意願、政府有管理的加持，淡水的文化資產保存才得以快速成長。只是快速成長的古蹟數量，除了需面臨修復及管理維護的責任之外，空間的再利用更是古蹟管理者所需面臨的挑戰。目前淡水 27 處的古蹟與歷史建築在空間開放的現況是，已修復開放參觀的計公部門管理的 5 處（淡水紅毛城、滬尾砲台、前清淡水稅務司官邸、淡水公司田溪橋遺跡、湖南勇古墓），公私部門共管的英商嘉士洋行倉庫 1 處，私有管理已開放的文化資產有 10 處（鄞山寺、福佑宮、龍山寺、滬尾偕醫館、淡水禮拜堂、馬偕墓園、理學堂大書院、淡水氣候觀測所、淡水外僑墓園、淡水重建街 14 號街屋），正在修復有 3 處（淡水海關碼頭、多田榮及故居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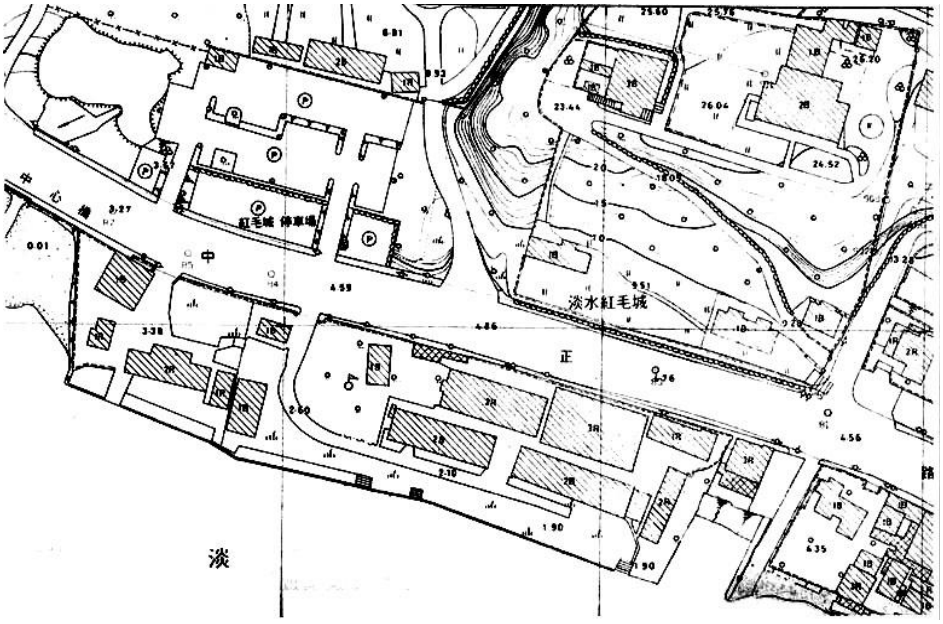
[1] 資料來源：臺北縣政府文化局網站
http://www.culture.tpc.gov.tw/_file/2963/SG/35381/D.html[1]

歷史建築公司田溪程氏古厝），未修復或未開放的有 8 處（水上機場、關渡媽祖石、淡水日商中野宅、淡水重建街 16 號街屋、淡水崎仔頂施家古厝、滬尾小學校禮堂、滬尾水道、淡水日本警官宿舍）等合計 27 處。這些已開放的古蹟空間除了大部分維持原有用途之外，另有小部分開放爲展示空間及社區大學等用途。

對於淡水已開放 16 處的公私部門古蹟空間再利用的方向，公部門大部分是專家學者的建議後由政府決行而定位，而私部門空間的再利用也由古蹟所有人來自行定位。因此，這些古蹟空間從在地生活的觀點中，常常是置之於生活之外，較難引起在地居民的共鳴與參與。另外，值得政府思考的事是，淡水許多古蹟能被保存下來，是民間戮力搶救才得以保存。但是，這些搶救者卻往往被屏除於該空間未來再利用定位或可提供在地使用的氛圍之外，這種「過河拆橋」似的作爲，難免會引起民間的埋怨或給予人封閉的官僚意識。因此，如何開啓與在地居民對話的機制？如何結合民間的力量來共同管理維護或經營古蹟空間？我想只要政府有心、民間有意，再造文化資產保存與活化後的價值是指日可待。就在「淡水海關碼頭」、「多田榮吉故居」、「程氏古厝」修復的當下，政府何妨敞開心胸建立更多與在地居民對話的機制，讓古蹟空間的再利用能深得人心，並能符應在地生活的需求。

貳、「淡水海關碼頭」的價值

淡水海關碼頭位於臺北縣淡水鎮中正路259 號，與淡水紅毛城只相隔一條馬路（如圖一）[2]。民國89 年6月27日因「淡水海關碼頭」代表的是淡水開港徵稅這個重要



圖一　淡水海關碼頭與淡水紅毛城關係圖

[2] 資料出處：台北縣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調查研究報告，第一章第 2 頁。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作者：徐福全、王惠君。

的歷史意義，在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提報下，臺北縣政府將其指定爲縣定古蹟。本處與淡水紅毛城所在的砲台埔所有古蹟連成一氣，提列爲臺灣爭取世界遺產的潛力點之一。

一、歷史地位

淡水原爲凱達格蘭族居住之地。明萬曆年間，陸續有漢人至雞籠(今基隆)、滬尾(今淡水)與當地人進行交易，1628（崇禎元）年西班牙人佔領淡水，並在此建聖多明哥城。

清領時期，淡水河口因地理位置重要，被清廷視爲據點。乾隆年間，淡水河口之貿易船隻多停泊於八里坌，雖然淡水河口的貿易日漸繁盛，但八里坌碼頭因水流的變化，在清嘉慶年間卻日漸淤淺，碼頭的位置因而轉移到對岸的滬尾。而在滬尾開埠通商之前，滬尾街區的主要街道、廟宇、米市、布補頭〈布疋零售門市〉、大街的船頭行等，已將街區與聚落串連成一體，加上淡水河已深入開發的臺北盆地，讓淡水深具商業貿易的潛力，是故，外國人將淡水視爲臺灣最重要的港口。

十九世紀初，中國東南沿海一帶，海盜猖獗，不僅嚴重打擊到日益興盛的海上貿易，對於臺灣北部地區，如：滬尾（今淡水）、雞籠（今基隆）、噶瑪蘭（今宜蘭）等地居民的身家安全更是構成極大的威脅；有鑑於此，當時的清朝政府在陸續平定這些海上梟雄之後，便決定在臺灣北部建立海防設施，將當時駐紮在福建的守備營移駐臺灣，而首選之地就是在當時具有重要軍事及經濟地位的滬尾，該點就在當時的紅毛城下，鄰近淡水河河岸的平緩台地上，成立了滬尾水師守備營。1858 （咸豐八）年，清廷因英法聯軍之役戰敗，與俄、美、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增設通商口岸，其中與法國簽訂的條約中，除臺灣外，另增設滬尾爲通商口岸。（條約中所指的滬尾，是指整個臺灣北部或是淡水河沿岸，非單指滬尾（今淡水）一地。）

1861(咸豐十一)年，英國首任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依約來臺勘查各港口情形，由於臺灣（今臺南）附近海口淤滯，船隻難以停泊，不利通商，於是最後議定在滬尾設立海關。爲了統理繁雜之海關業務，乃選擇擁有地利之便的滬尾守備營駐紮地作爲海關辦公之地，於是將滬尾水師守備舊署改爲滬尾海關公署。幾經波折，新海關終於在 1862（同治元）年 7 月 18 日正式開市，首任海關監督爲區天民。爾後又以多收洋藥稅款爲由，增設口岸，雞籠（基隆）、打狗（高雄）、安平先後設關，名義上均以滬尾（現稱淡水）爲本關，總理全臺灣海關業務。之後，滬尾海關又於鄰近之處（約在現淡水紅毛城停車場處）覓得土地興建辦公處所。隨後在北臺灣茶葉貿易興盛時期，淡水逐漸成爲臺灣最大的國際港口。

1884（光緒十）年中法戰爭，劉銘傳爲防止法軍入侵，在河口擊沈十艘滿

載石材的帆船，封閉淡水港口，也使得河口淤塞情形加速，而中流也出現大沙洲影響航運，中法戰爭之後，劉銘傳轉而經營基隆港爲主要商埠。

中日甲午戰爭後，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淡水和基隆兩海關正式移交日本管轄，在日治初期，淡水稅關管轄區域，北起富貴角，南至濁水溪沿岸。但淡水港航運地位，也在日治時期開始產生變化，淡水線鐵路通車，部分貨運由火車取代。1901（光緒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日本廢止臺南稅關，由淡水稅關長兼管安平稅關，1909（宣統元/明治四十二）年廢安平海關爲分關，以淡水爲總關，統轄關稅事宜。1916（民國五/大正五）年淡水海關總關辦公室由淡水移設臺北，之後又移往基隆。基隆港完成後，一躍成北臺灣最大的貿易港，淡水港與大稻程河港逐日趨沒落，另一個加速淡水港沒落的因素，則是淡水河運受到上游桃園大圳建設影響，泥沙淤積行船不易。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臺灣對外貿易額銳減，稅關被併入港務局。1945（民國三十四）年，日軍向同盟國投降，同年 10 月 8 日，國軍臺灣指揮所憲兵第四團，即是乘著戎克船由淡水海關碼頭登陸。戰後，海關始由海關總稅務司署派員接收，爾後再交由國軍駐防。

二、建築特色

淡水海關碼頭全段約長150公尺，依構造形式分為三段，依序為：東段碼頭、中段碼頭、西段碼頭。現存東段碼頭造根據文獻資料比對得知約於1901（日明治34）年完成。西段碼頭約於1901（日明治34）年動工，中段完成時間晚於前二者，確實時間未知。三段碼頭全屬重力式岸壁構造，碼頭重直構造體稱為「岸壁」，碼頭表面稱為「堤面」，碼頭後方稱為「堤後」。其他碼頭附屬設施尚有「繫船柱」、「登船口」，繫船柱為提供船舶停靠、繫纜繩之用，登船口為提供船舶小艇或是人員、貨物上岸之處[3]。

爲阻擋潮水的侵蝕，碼頭在結構上採用石材建造，依其材料可分爲安山岩〈或稱觀音山石〉與砂岩〈或稱淇哩岸石〉，主要是爲當時可就近取材，在工法上，採用當時十九世紀末建造碼頭的基本工法，不管石材堆砌的高度、斜度或是典型的交丁砌法，都足以作爲當代土木工程歷史發展的研究價值。東段碼頭和西段碼頭，皆採用觀音山石，較爲特別的是，淡水海關碼頭的條石打製方式，石塊各個面向的表面均爲平整，不同於一般砌石時，只修整石塊表面，其餘各面仍爲粗糙的作法。中段的碼頭乃是由淇哩岸石堆砌築成，表面再以水泥沙漿填縫，修整石塊表面。

淡水海關碼頭全區除了碼頭古蹟本體之外，區域內仍保存具有歷史文化價值之建築物，包括：磚造洋樓、磚造倉庫兩棟、舊有建築遺跡。洋樓興建年代約在

[3] 資料引用自台北縣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調查研究報告，第三章淡水海關碼頭之構造物第1頁。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作者：徐福全、王惠君。

清光緒年間，日治時期可能經過改修，兩棟倉庫推測應爲日治昭和時期修築。

三、研究報告所規劃的再利用方向

本再利用規劃原爲徐福全、王惠君所做的台北縣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調查研究報告內的再利用的規劃[4]：

> 相較於周邊淡水老街的漢人聚落特色與洋人建立的埔頂地區，在發展與保存文化景點的意義上，淡水海關碼頭所在地理位置、碼頭構造物、洋樓、倉庫建築，是見證清朝時期至日治時期淡水近代海關發展的重要證物，也是瞭解填埋中正路西段地理變遷的地點。
>
> 再利用規劃可將埔頂的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公署、紅毛城西側停車場（已無舊建築）、淡水海關碼頭作整體導覽，以為明瞭海關運作與關員生活的教材。而基地外東側木造日式宿舍，可保存成為日治時期中正路西段開發變遷的場景。此外，淡水海關碼頭位於中正路與真理街的交會處，也是老街至漁人碼頭的中繼站，可配合營區遷移與再利用規劃，將淡水海關碼頭視為連接中正路東西兩段遊憩點的中繼站，以及河岸往埔頂地區的導覽門戶。基地也可提供作為社區之文史活動或是其他機能使用，使此地成為淡水鎮的觀光休憩點與社區資源的一部分。而基地內的遊憩動線規劃，應將已完工的河岸景觀步道與油車口段自行車道一同納入，完成淡水河右岸景觀步道的完整性。

叁、「淡水海關碼頭」與在地生活的關聯

一、空間與在地的關聯

「淡水海關碼頭」從日本政府到海關的接收，進而移交予國軍來駐防，這個空間就一直屬於管制區域。高高的圍牆隔絕了空間與淡水的關聯，加以軍事重地不可對外開放的管制，「淡水海關碼頭」對淡水人來說只是一個門禁森嚴充滿神祕的軍事區塊，就在地生活而言，是看不到、聽不到「淡水海關碼頭」運用的情形或訊息，唯一偶有的消息則是同屬這個空間內，海光劇校的練習與演出的訊息。近年來，隨著世界趨勢的轉變與社會轉型，直接戰爭的機會越來越低，也因此導致「淡水海關碼頭」在軍事的價值就越來越薄弱，漸漸淡化軍事角色的「淡水海關碼頭」，由於淡水河淤塞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原駐防海關碼頭的海軍海蛟中隊小艇已無法靠岸，這個空間對軍方而言，就成爲提供小艇隊弟兄居住的功能而已。另外，年久失修又欠缺保養的「淡水海關碼頭」也因歲月及河水的衝擊，碼頭的東岸開始傾圮甚至倒塌。從碼頭坍塌開始，淡水人因看到了空間的損壞，開始關

[4]資料引用自台北縣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調查研究報告，第五章淡水海關碼頭史蹟區規劃第 6 頁。臺 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作者：徐福全、王惠君。

注起「淡水海關碼頭」，這個在地形與歷史均占有重要意義的地方。



圖二　已掏空及流失的基礎



圖三　坍塌的碼頭東岸

二、空間與淡水人的關聯

深鎖的門禁，隔絕了淡水人與「淡水海關碼頭」的關聯。這樣的關係一直到八〇年代中期，一群愛好文化的年輕人組成了「滬尾文教促進會」，他們爲了對生活空間的關心及阻止當時欲延淡水河岸新建所謂淡水環河快速道路一案，毅然從書房走入社區，並於民國86年在淡水公明街設立「淡水茶友會」。民國87年，爲了反對興建沿河快速道路，淡水文史團體擴大結盟組成「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當時透過抗爭、連署和與政府及立委對話，並以指定英商嘉士洋行倉庫、海關碼頭、水上機場及氣象觀測所，這幾個沿淡水河畔而建築的歷史空間爲古蹟，做爲搶救的策略。就在文史工作者多方奔波與努力下，民國89 年6月27日「淡水海關碼頭」因代表淡水開港徵稅的重要性，經臺北縣政府將其指定爲縣定古蹟。

民國93年「淡水古蹟博物館」成立，抱持協助淡水各古蹟管理維護的工作目標下，「淡水海關碼頭」成爲博物館管理維護及古蹟建築展示的一個點。只是，依舊門禁森嚴的「淡水海關碼頭」卻因碼頭東岸的坍塌，開始與「淡水古蹟博物館」及在地關心古蹟的人們，展開管理權與要求修復古蹟的對話。

另外，由於開放觀光及促進地方經濟繁榮的國家政策主導下，淡水漸漸成爲全台人民最常也最想觀光的地方，而這高居第一的觀光人潮，也促使了臺北縣政府對淡水整體觀光資源及規劃有了較大的動作。而「淡水海關碼頭」由於軍方在管理維護上的無力，加以日漸萎縮的軍事地位和日趨重要的觀光能源，民國99年，「淡水海關碼頭」交予臺北縣政府，並由文化局進行古蹟本體的修復工作。

肆、「淡水海關碼頭」再利用方向的思考

從軍事管制一直到此刻仍處修復工程的「淡水海關碼頭」，這個占地約一公頃的空間，由於位處交通便利點，周圍又有淡水紅毛城及埔頂古蹟群，加上碼頭擁有遼闊的視野及美麗的自然景觀，因此「淡水海關碼頭」在空間上的利用，成

爲了眾人目光的焦點。如何再利用這個空間？事實上政府似乎已有想像，那就是將空間以 BOT 模式委外經營，這是一個最佳模式嗎？我想管理資產的政府官員，應該要努力從世界的案例與趨勢去發現更適合的做法，更應在尚未做決策前，就收集不同的意見、聽不同的聲音，用謹慎的做法去做決策，切勿以專斷的思維及省麻煩的做法來決定一處歷史空間的未來。

如果我們能從在地生活的觀點，去架構「淡水海關碼頭」再利用是必需在某些條件之下進行。那麼「淡水海關碼頭」再利用的想像，在思考方向是應朝向：

一、將封閉的空間轉換成對人友善的空間

文化資產「爲民共有」，長期以來已經管制的空間，此刻，應該要開放讓所有民眾都能親近他，尤其是人與自然間的關係，不應再由高牆來封鎖住，打開國軍時期所建置的高牆，讓歷史的串連、人與自然和古蹟的關係重新建立，當然讓這個空間能成爲對人友善的空間。

二、所有的再利用應建構在原空間的歷史意義及價值上

歷史空間能引人緬懷在於它的空間樣貌，因此不應將歷史空間定位爲閒置空間，對於再利用的方向也不應只考慮空間，而是空間的歷史的意義，如何從歷史的角度和演變定位不同空間的不同用途，只有讓空間的運用能貼近史實，空間才不至於有突兀之感。

三、考量老空間的承載，應有總量管制的做法

歷史空間經歷了歲月及大自然的衝擊，古蹟本體本來就較脆弱，加以過去空間的規劃並不是以開放的公共空間爲主，因此在結構體承載量上有一定的承載，未來再利用時應避免過度使用，而加速歷史空間的老化，最佳的模式是應依空間面積及結構承載量，做出人員的總量管制，以延續古蹟本體的壽命。

四、從在地情感的觀點出發，非以觀光導向來經營歷史空間

歷史空間與在地歷史是一脈相傳的，其間經歷的情感是共通且相似，所謂空間的所在更是共同生活的生命共同體。因此，對於歷史空間的再利用不應只考慮觀光導向的發展，而應納入在地居民情感的歸依，從在地生活爲考量出發的基礎，在傾聽民意後，讓歷史空間的再利用能更具歷史意義。

伍、結論與建議

任何一處古蹟從指定、調查研究到修復工程的過程，大部分都受到民眾的關切與期待，而這些古蹟在活化必需經歷的過程中，也都是民眾納稅所產生的經費來支援完成保存的目的。「淡水海關碼頭」同樣經歷了搶救、指定、調查研究、

修復工程到空間的再利用及管理維護。此刻，做爲一個管理文化資產的政府，應該以更前瞻的視野來思量這些歷史空間未來經營管理的可能方向，加上淡水已成立了在地管理的單位「淡水古蹟博物館」，站在從在地出發，放眼世界的信念，政府應該廣泛收集及廣納不同的意見，從不同的資訊與聲音中歸納出最適切的活化方案，爲真正落實文化資產「爲民共有」的目標而努力。以下建議，就個人觀察台灣在活化資產時面臨的矛盾與衝擊，期待「淡水海關碼頭」空間再利用時，能以一個更貼切的方案模式來操作。

一、反省當前台灣觀光行爲對城市發展與文化資產保存上所帶來的衝擊

隨著觀光形式的演變，文化觀光已成爲現階段觀光的趨勢與經濟發展的希望，此刻每一個歷史空間的修復與再利用所思考的方向，大部分都考慮是否對觀光發展與地方經濟的效益有所幫助。這一種爲發展而修古蹟的作爲，忽略了修復是延續古蹟本體的壽命與保存價值的真正使命，尤其，當大眾對文化資產保存與觀光後衝擊的體認尚未瞭解時，文化資產保存教育的推動與反省，甚至學習改正因負面觀光行爲所帶給城市發展與文化資產破壞的衝擊，似乎比開放古蹟空間更爲重要。

二、民眾的期待

「淡水海關碼頭」屹立淡水一百多年，它和淡水的生活是息息相關，而曾經歷經門禁森嚴的過去，好不容易開放的空間，相信在地居民期待能有感受與緬懷歷史、分享空間的氛圍、甚至於能結合在地生活的需求去使用空間的機會，而非見到又將此空間再度委由另一個單位，還有可能因管理模式再度去封鎖它。因此，民眾期待政府能開啓與居民對話的機制，能從在地生活的觀點去考量空間未來的用途，能以全淡水整體的規劃與需求去評估再利用的可行方向。透過許多開放的訊息與討論的機制，讓好不容易打開的「淡水海關碼頭」真正的融入在地生活，而非將空間以招商的模式再度變成一個有高高圍牆阻絕於在地生活之外的空間。

三、歷史空間不應等於閒置空間

充滿歷史性的空間被保留下來，它就一定要稱爲閒置空間嗎？許多人還這麼想，閒置空間應該要充分再利用，否則就是浪費，就叫蚊子館，管理單位就應該要被檢討是否不盡責。事實上，古蹟建築被保留下來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與價值，它也許代表著某一時期的建築工藝；也許這個空間曾經居住過那一位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也許這是某一年代的歷史精隨或重要歷史事件的代表；也許這個空間記錄著一個民族的發展史；也許…。所有的古蹟或歷史建築空間，都有一定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意義，因此，任何一處的歷史空間不應等同閒置空間而隨意的去再利用與經營管理。「淡水海關碼頭」在修復工程完竣後，也不應將此列爲閒置空間而隨意招商去使用這個空間，應在古蹟本體的歷史精神下架構再利用的方向，縱

使這個空間無法自負盈虧，管理單位仍應以保存古蹟本體爲前提下去思維未來，如果開放無法保護好古蹟本體，那麼要全面開放嗎？或者應該採以低密度開放的模式，來還原空間的歷史價值與保存真正的目的。

四、博物館應建構與在地居民夥伴關係的經營模式，落實在地方管理的機制

政府長期以金字塔管理的模式來經營地方發展，這種由上而下的管理思維，在民意、落實政策、發現問題、調整策略等即時性的反應，常因窠臼制度，空間的距離而失去應變先機。而此刻的社會正準備以文化來發展觀光，企盼開創另一波經濟的高峰，做爲一個經營在地文化事業的政府代表，博物館就地方發展可以擔任的角色益顯重要。因此，博物館在地方發展的角色該如何定位？策略的執行與運作的目標又該是那些方向？最後的定位與成效都是社會對政府的期待。因此，建議政府在協助地方發展時，除了硬體建設的作爲之外，以在地管理爲主的軟實力，更是地方發展應該優先操作的方向。

陸、參考資料

徐全福、王惠君（2006）。《台北縣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調查研究報告》。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出版。

張寶釧（2008）。《以淡水古蹟博物館經營做爲地方發展觸媒之研究》。中原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

淡水古蹟博物館網站，http://www.tshs.tpc.gov.tw/tei/6_1.asp?c1_idp=88&title=古蹟調查

臺北縣政府文化局網站， http://www.culture.tpc.gov.tw/_file/2963/SG/35381/D.html

閒置空間再利用與地方政府的可作爲性

張震鐘*

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議題，早期建構在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觀念啓蒙與行動措施上，大約自一九五〇年代開始陸續在一些被視爲老閒置空間的更新再利用下，獲得了具體的成效，例如著名的紐約老舊中央車站的建築更新、原爲舊車站而修復再利用的巴黎奧塞美術館、德國的魯爾工業區荒廢老舊工業建築的再利用與地方活化等。這些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實例，清楚地說明了面對都市的新建設需求時，老閒置空間的存在並不是阻礙發展的絆腳石，反而是成爲一個保存城市生活記憶與形塑歷史人文價值的關鍵。臺灣早期論及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課題僅侷限在法令規範下的古蹟與歷史建築的保存及再利用，而具體的做法也由先前的依原貌修復的凍結保存方式，走向活化再利用的積極面向，而現今逐漸擴及到已失去原使用功能的閒置空間再利用上，期使其與都市更新發展之間，建立相融並存的可行性，賦予閒置空間新的生命與價值。臺北縣淡水鎮爲北臺開發歷史的重要門戶，留下眾多的歷史文化資產，截至目前(2010 年 10 月)已經法定的國定古蹟 4 處、縣定古蹟 21 處、歷史建築 2 處，勘稱爲臺北縣文化資產保存之首要重鎮，本文即依主辦大會討論主要標的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爲對象，討論此古蹟未來再利用的經營與地方政府的可作爲性課題。

對於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實施策略上，近幾年來陸續有許多的論述已經有多面向的提出(註 1)，一般在建築專業上多傾向於再利用的執行技術層面的探討，但是除了從閒置空間本身出發的內外在環境進行外，營運的可行性評估也是最不可或缺的課題。硬體的先天條件，也要有軟體的附加才能形成整體的面貌，再利用工作的順利才能夠動起來。所以在整體閒置空間再利用後的使用之可行性評估工作，應該結合建築物本身與未來的經營可行性評估。綜合目前一般有關閒置空間再利用論述概可將可行性評估項目分爲七點：

1.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前置性工作(再利用定位)

2.閒置空間的基礎調查工作

3.再利用課題之研擬與發展策略

4.再利用的內容與方法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

5.再利用的財務計畫

6.再利用計畫的設計與執行

7.營運管理與維護

並同時提醒應將閒置空間再利用再利用計畫可行性七項評估視爲原則指標下，因應閒置空間個案的存在條件特殊性，進行彈性的適應評估事項、或權重的調整，使閒置空間的再生活化利用達到其最佳的效益，延續閒置空間的構造生命。

閒置空間的再利用的經營課題，主要面對兩個重點，即是「保存」與「再利用」兩者，在整個計畫的定位、操作的過程與經營管理，兩者間皆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保存」是具有著發掘、研究與維護等內涵，忠實的呈現其於時間歷程中所累積的痕跡，是作爲歷史空間發展的重要基礎。「再利用」則是透過展示、傳承、教育推廣、互動交流、管理與經營等內容，將現存之歷史空間做不同機制的轉換，置入適當的軟硬體設施與展示內容，使其「再生」成爲具備教育功能的文化據點〈林會承，2000：61〉。所以，閒置空間的首要特性即是本身具有一段遺棄荒廢的歷史，其蘊含了過去歷史的文化教育功能，除了技術性適度地保存發揮再利用最佳效益的狀態，適切有效的經營方式，才是影響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核心命題。

一般所談論閒置空間的經營管理課題，比較少論及永續性的概念，即使有談論到也以短中長期的方式進行經營管理對策的研擬。事實上，永續經營的概念應建構在永久與延續的兩個思維上，才能清楚地思考經營的主軸。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在現階段臺灣的發展較具雛型的是做爲藝文使用功能的再利用，尤其在近幾年來公私部門的合作已逐漸執行數個案例，目前仍持續有民間的機構團體進駐這些原來閒置的舊建築經營各種文化事業，當然在執行的過程裡，也陸續出現經營上的諸多問題。尤其是經營者的態度，直接影響到經營的觀念與操作的執行。

閒置空間的再利用經營必須先清楚其工作上的意義，經營必須從永續的角度去設想與策劃才會步上正軌，現今的閒置空間再利用執行的結果又導入閒置狀態的盲點者，大多是被以短期的進駐來完成所謂的再利用。其實這種短線操作是十分令人擔心的，因爲其缺乏長遠之思考。閒置空間再利用應該擁有永續經營的觀念與理想，絕不是只被動的等待公部門的補助。任何再利用計畫都應有包含財務機制的計畫，以確保再利用不會是曇花一現的現象〈傅朝卿,2001：10〉。所以，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必須放在時間長軸上去思考、計畫，使建築物與營運的工作能密切結合，則經營的事業對閒置空間本身而言是有利的，更能直接解決建築老舊的負面問題，也使建築發揮支持經營新事業的功能。

對於再利用經營與在地的地方互動關係，往往是閒置空間再生具體成效的關鍵因素，此課題在此提出幾點看法：

一、首先要進行經營方式的定位確認

淡水海關碼頭爲縣定古蹟，行政主管機關爲臺北縣政府文化局，目前所有的古蹟管理與維護使用均由縣府統籌處理。臺北縣在淡水地區文化資產數量爲全縣之冠，在文化局轄下設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直接在地管理所有的文化資產工作，有關基礎的硬體維修與本體的再利用措施管制，則由文化局文化資產科權責擔綱。平日的管理營運由淡水古蹟博物館擔任，除了縣府編制行政事務人員外，也積極推廣淡水在地的地方文化志工組織，協助在各處文化資產辦理的文化教育活動工作，並近幾年來申請由相關政府部門補助的臨時就業人力投入清潔與開放園區門禁安全工作，使分散在淡水各處的文化資產點，比較有計畫地推廣文化資產的守護與文化教育、觀光等工作。本文所聚焦對象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目前正進行本體的構造修復工作，基地延著淡水河岸約長 150 米，佔地面積廣闊，與海關碼頭發展相關的構造物有洋樓一棟、磚造營舍建築兩棟，以及石砌碼頭現址。接下來如何進行古蹟再利用課題，是馬上要進行處理的工作。

	
延淡水河岸石砌海關碼頭(張震鐘攝)	閒置磚造營舍建築(張震鐘攝)

目前臺灣公部門對於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經營方式，多以現存的歷史空間或古蹟的活化利用爲主要發展對象，能夠順利進行的案例也多以建築本體爲公有權屬者較多。也因此公部門的經營決策運作方式，主要有公辦公營、公辦民營、公產民資民營等方式，結合私產私營方式形成現今各種閒置空間再利用的運作機制。其不同的財源籌措與本位出發，直接影響再利用的定位與內容，更影響到空間的經營的推動策略。所以，在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永續經營必須清楚經營方式的定位，才能發展經營的策略與執行運作。海關碼頭古蹟爲公有產權，可行作爲方式如下：

1.公辦公營：目前公有權屬的閒置空間再利用以公辦公營方式最多，主要因爲可依政府本身政策發展，較容易直接推動政府的空間政策，思考閒置空間的有效再利用經營模式，營運經費來源由政府提撥專款，並直接由公部門進駐經營。此種方式，對於地方政府的財政與人力的負擔，將會對現今政府面臨財政資源有限下的困境更加嚴重。但是，以區位點而言，海關碼頭直接臨河岸的美景優勢，與紅毛城古蹟、滬尾炮台緊鄰，正好整合成爲大範圍的古蹟文化發展區塊，就管理資源運用與整合而言，發展公辦公營方式統籌管理經營古蹟風貌區域是具備相

當有利的優勢條件。另外，由目前淡水古蹟博物館行政工作所在位址的紅毛城，有限的辦公空間移至海關碼頭基地內保存構造完整的原軍事營舍，不但解決辦公空間不足問題，海關碼頭基地內閒置建築荒廢也獲得再生活化機會，紅毛城完整地朝向遊客休閒與文化教育空間發展使用。

2.公辦民營與公有民資民營：此種經營形式爲公有產權的委外經營方式，也是近來政府在財政緊縮狀況下，將一部分的經營成本委由民間負擔。公開徵選或邀請有能力及興趣經營的企業、基金會、民間團體等，進駐閒置空間的再生改造，提供經營權，除了是回饋社會的公益經營事業外，亦由公部門提供部分資源及經費補助，但必須自籌部分再利用經營的運作經費。而公有民資民營的經營方式，民間經營者還必須負責內部硬體空間維護的經費，此經營方式下，經營者必須擁有足夠開闢財力資源的能力及熱忱兩項兼備，才有長久永續經營的契機。淡水海關碼頭的歷史價值定位在於其代表近代海關發展史的重要腳色，以歷史文化教育的角度來思考，做爲歷史保存的史實價值呈現，將其優先作爲海關發展歷史展示空間再利用，最爲名正言順。但是兼顧連結整體的周邊古蹟園區發展上而言，應在兼顧歷史展示外，同時有具教育文化知識型的休閒再利用功能的導入，將會豐富整個古蹟園區的活力展現。此可以突顯淡水的海洋歷史重鎮的豐富多元文化，以結合與海有關的歷史文物與知識，作爲此古蹟未來再發展的可行方向，鼓勵由與海運有關的民間企業或機構來認養，委由其做爲海事文化的知識型活動休閒場所，見證北台灣的海洋發展史，例如現今的長榮海事博物館、淡江大學海事博物館均是以海洋事業文化爲主的展示機構，在淡水海關碼頭成立有關的海事博物館，對於古蹟的歷史價值呈現更加契合。

二、可行的資金與資源取得途徑

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經營過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資金來源，此涉及到經營事業本身是否具備營利的條件與籌募資金能力、經營者本身財力、公益事業的社會資源注入狀況等。當然，經營時的基本開銷是必須解決的最現實問題，建築物的各項維護、營運損耗、人事費支出等均必須有相當的財力與資源來支持，此也與初始的經營方式定位直接關聯。一般而言，再利用後是否導入營利行爲將直接影響經營的型態，也關係到經營的組織形式。

1.完全導入營利事業：此閒置空間再利用的開銷即有較多經營資金營收的機會，此爲民間私有經營的閒置空間最直接的資金取得來源，當然因應社會大眾的消費需求，採用市場經營與商業行銷手法是無可避免的狀況，此即必須注意商業行爲對閒置空間是否出現負面影響與減損原有閒置空間再利用的中心價值。此種方式對於目前淡水博物館的營運發展現況而言，暫時不可行。主要是所有古蹟點已經以文化教育與大眾休閒爲發展重心，已完全不收費用方式，自由開放大眾參觀，所以完全以營利事業經營方式，配合整體淡水古蹟的營運經營現況是不可行

的。

2.部分導入營利事業：此經營的目的是以非營利爲主的導向爲原則，但爲能支應平時的維護與事務性的開銷，採取局部的對外營運項目收費，或成立公益性的義工團體協助，節省人事支出。此常見有政府經費補助、自行財力出資(集資或成立公益團體經營，並申請部分的經營賦稅減免)、尋求贊助或成立認養團體、餐飲消費、紀念品販售、出租空間、門票及停車收費等。此在其他的古蹟再利用營運方式已經有經驗可循，例如淡水殼牌倉庫的民間團體經營營運、紅毛城附設的紀念品販售，以及其他地區古蹟作爲委外的商品賣場、部分新設餐飲販售等。

3.完全非營利事業：此經營的目的完全以非營利的導向爲原則，但須有資金或資源來支撐所有的維護與開銷，此在公有產權的建築經營時大多由政府經費支持，或政府與民間團體、企業單位共同支應，此經營方式的事業發展多爲文化性功能的閒置空間再利用模式。但此種經營模式，往往能夠與在地社區的志工團體相結合，擔綱部分的人力支援，將省去龐大的專職管理人員的編制負擔。

三、建構有效能的經營組織

任何事業的發展皆與經營的團隊有關，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經營推動更比一般新建的建築方式，有更多的複雜課題與限制條件，經營上的困難度也高出許多。所以，閒置空間的再利用經營必須由有能力的經營組織推動才可見到成效。目前臺北縣文化局已經特別成立淡水古蹟博物館這個專職組織，對於淡水的文化資產守護與營運發展而言，就地的直接管理具有時時照顧與問題的解決最佳時效特性。且同時與淡水時節性的地方活動搭配，主動結合在古蹟的場所空間辦理，能夠貼近淡水地方上的社區需求，也提供豐富多元的遊客觀光休閒的場所。淡水古蹟博物館站在管理維護第一線，必須做好縣政府與淡水地方行政單位與社區的良好互動橋樑，隨時與淡水地方各部門、社區單位聯繫，了解地方社區的民間作息與需求，整合成爲有能力與效率的經營團隊。開發各方的資源運用，由閒置空間空間特性的可適性善用、活動推廣與行銷，有效地發揮閒置空間再利用的再生價值。

四、健全的財務發展機制

永續經營的首要支撐條件在於經濟因素，此要看經營者資金與資源的獲取狀況而言。所以，有多少資源作多少的支出損耗，發揮資源的最大效益，是一般經營者遵奉的最高指標。而整套的經營要有健全的財務管理機制，其涵蓋財務分析運算、執行、控制管理等，閒置空間的再利用其實決定能否經營成功的經濟因素的關鍵，即是在於財務的問題。目前淡水古蹟的再生營運採用公有公營方式楚理，成立博物館專責機構運作，所有開銷資金均以縣府編列預算支付，在無自籌財源的壓力下，獲得相當好的營運支撐。但是仍要未雨綢繆考量到未來面臨政府

財政困難時的課題，主動的謀求民間企業與社區團體、熱心志工的協力，仍是有其必要性。

五、兼具地方特色的永續發展經營事業

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經營事業注入，在思考定位上相當重要外，應有多元性的開放式經營觀念，尤其是地方文化與社區認同的促進與維護，提升人文關懷與歷史空間文化價值的保存，結合地方特質的產業行銷，與地方的產業文化某種程度的納入融合，發揮閒置空間本身的再利用價值外，也與周邊環境、社區塑造良好的共生關係。在經營事業型態上，必須具有創意性、時代性及未來性，才能維持長久永續的經營狀態。淡水海關碼頭長久時間的軍管限制，大眾無緣接觸與感受其環境的優美，濱河沿岸的遠眺觀音山景與淡水夕照，隨時盡收眼底。開放後預計必將吸引眾多遊客到訪駐留。此古蹟空間再利用的可行性發展相當廣闊，可以經營淡水地方小吃或名產的販賣，也可以經營近幾年流行的美景咖啡等最直接的一般休閒營運模式。但考量閒置空間轉化爲創意性的新使用，且兼具淡水河流域的整體發展型態，將其河岸連接整個大臺北淡水河流域濱河親水腳踏車休閒帶，將會是現今時尚而健康活動與歷史文化園區的連結，相當具有時代的空間再生創意與可適性的永續發展經營形式。

六、有助於永續經營的地方社區參與

閒置空間的存在必然與地方的社區環境有深厚的關聯，也經常是社區居民共同記憶的一部分。所以，經營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成效，應將社區的參與視爲重要的助力，甚至在經營的組織裡，直接納入社區居民的參與，將可非常容易理解閒置空間的歷史文化、空間特性等，將閒置空間具有的特色與社區居民的人文特質連結，更加提升閒置空間的附加價值。此社區參與形式可經由教育活動的推廣、再利用空間的參與使用、社區協助擔任營運管理工作，以及成立社區義工組織協助閒置空間再發展工作等，皆是溢助閒置空間再利用有利經營發展的契機。淡水古蹟博物館在此文化志工組織的成立與運作，已經有相當的成果，相信未來在淡水海關碼頭營運的社區參與上，有相當豐富的資源與助力。

從以上幾點看法歸納，淡水海關碼頭未來的再利用永續經營的契機，取決於各個部門的力量結合，中央文化資產主管機關首先擔任守護與再利用的行政管理業務與常態、臨時的預算編列提撥工作；縣政府(未來的新北市)作爲地方政府的角色，直接站在第一線的古蹟維護管理與營運的各項業務，成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專責管理淡水所有的文化資產，是目前臺灣較具積極性的行政作爲，對於地方文化的保護與文化教育、休閒觀光等的活動連結，有比較充份的執行能力與成效。對於在地的行政機關淡水鎮公所能夠溢助在地文化資產保存再利用工作貢獻上，應盡到地方社區鄰里的守護自己鄉土文化資產亦是的喧導建構，同時以在地歷史

文化的繼承者，注意新發現的歷史文物，隨時提供主管機關縣政府文化局各種訊息與文化資產保存提報工作。除了淡水古蹟博物館所舉辦文化資產相關活動外，在地的淡水鎮公所亦可以主動提出結合文化資產點，進行各項地方文化活動的舉辦，讓淡水在地居民更加貼近身邊的文化資產，良好的社區居民互動是文化資產保存的最佳優勢，並可以組織在地守護社區志工，擔綱隨時關切照顧的腳色。

文建會推廣文化資產守護網的政策，將文化資產保存共識深入到地方社區居民，使文化資產保存的傳承能夠落實到在地常民生活內，淡水擁有眾多的文化資產點，海關碼頭的再利用實施，將使淡水海洋歷史文明發展的歷程更加完整呈現。

註 1：關於閒置空間再利用實施策略的探討論述，已經有相當多的成果，僅列出近年來相關的發表論文供參考：廖慧萍 2002〈公有閒置空間再利用評估模式之研究〉、徐國訓 2003〈閒置空間文化再造策略比較之研究-以台中酒廠舊址爲例〉、方迺中 2005〈都市再生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之研究〉、楊信洲 2005〈公私協力應用於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研究－以花蓮縣七星柴魚博物館爲例〉、蕭佳虹 2005〈宜蘭縣再利用公有閒置空間營運實施之研究〉、黃金鳳 2005〈閒置空間再利用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機制之研究－以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爲例〉、傅彗倫 2008〈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屬藝文館所委外經營模式之研究-以市長官邸藝文沙龍爲例〉、戴月秋 2008〈公有閒置空間 ROT 政策之評估─以國立大湖農工學生實習農場爲例〉。

參考文獻：

方迺中 2005〈都市再生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策略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工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營建技術與管理組碩論

林會承，2000，〈歷史建築保存與再生倫理〉《留下我們的記憶空間：歷史建築保存與再生研討會》論文集，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徐孝貴，2002，〈閒置空間個案操作模式探討—台中二十號倉庫〉，賴維鈞總編輯《華山 2002 文化論壇系列：「文化空間.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會議實錄》，中華民國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臺北。

徐國訓 2003〈閒置空間文化再造策略比較之研究-以台中酒廠舊址爲例〉逢甲大學都市計畫所碩論

黃金鳳 2005〈閒置空間再利用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機制之研究－以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爲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碩論

廖慧萍，2002，〈公有閒置空間再利用評估模式之研究〉，朝陽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論。

傅朝卿，2001，〈臺灣閒置空間再利用理論建構〉《2001 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國際研討會》，行政院文建會，臺北。

傅彗倫 2008〈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所屬藝文館所委外經營模式之研究-以市長官邸藝文沙龍爲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論

楊信洲 2005〈公私協力應用於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研究－以花蓮縣七星柴魚博物館爲例〉國立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所

蕭佳虹 2005〈宜蘭縣再利用公有閒置空間營運實施之研究〉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研究所碩論

戴月秋 2008〈公有閒置空間 ROT 政策之評估─以國立大湖農工學生實習農場爲例〉逢甲大學公共政策所碩論

Fazette Bordage，2001，座談實錄《2001 文化空間再造國際研討會紀實》，行政院文建會，臺北。

Philippe Grombeer，2001，座談實錄《2001 文化空間再造國際研討會紀實》，行政院文建會，臺北。

論文化硬體管理之地方賦權
－以海關碼頭之發展爲例

蔡葉偉*

第一節　前言

海關碼頭爲淡水鎮內的縣定古蹟，自台灣光復以來即收編爲海軍所使用，之後海軍在此成立劇校「小海光」，曾繁盛過一時，也培育出不少優秀的戲劇人才、知名演員，如淡水紙繡藝術家沈海蓉等人，是不少老淡水人重要的兒時記憶，抑是老淡水人小時候視之爲神秘的禁地。隨著海軍部隊的轉移，海關碼頭漸趨沒落，在無人管問又封閉的狀態下逐漸荒廢頹圮。自民國 89 年 6 月經台北縣政府指定爲縣定古蹟之後，台北縣政府積極與海軍協議海關碼頭的管理主權，終獲海軍首肯，將海關碼頭移交給台北縣政府文化局管理。

文化局乃是縣市政府文化事務的專責組織，演化自各縣市之文化中心。民國 66 年政府推動「12 項建設」，其中第十二項爲：「建立每一縣市文化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音樂廳」，再於民國 67 年起至 72 年陸續修訂或頒布要點，使全台各地文化中心得以產生與營運。自民國 88 年 1 月 25 日施行地方制度法後，各縣市政府即著手修訂組織自治條例，紛紛將文化中心改制或是成立文化局[1]，以作爲藝術、文化發展、保存及硬體設施建置、規劃的主要機關。淡水鎮公所爲發展淡水在地的藝術、文化，亦於 98 年 8 月成立文建課，除了作爲淡水在地文化的發展與保存外，其重要的功能則是管理淡水鎮既有的文化硬體設施。

94 年起縣府文化局就委託學者進行海關碼頭的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2]，並在取得海關碼頭後，開始著手海關碼頭空間再利用、古蹟活化的規劃，於 98 年計畫以 BOT 的營運方式讓朱宗慶樂團進駐。台北縣政府此舉引發淡水在地藝術家的不滿，認爲「淡水的事、物與文化，只有淡水人自己最清楚」，因而有「在地人自己管理文化硬體設施」之聲音發起，身爲淡水鎮地方政府的首長，亦爲淡水

*淡水鎮鎮長．美國明尼蘇達州聖瑪利大學教育領導博士

[1] 地方制度法公布施行後，北高二市先後成立文化局，其餘各縣至 93 年底已全部改制為文化局。

[2] 海關碼頭的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由台北縣政府文化局委託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徐福全教授、王惠君副教授所進行之調查研究，期間就海關碼頭的歷史沿革、構造物、損壞情形、史蹟區規畫以及修復計畫等作一通盤研究，並集結成冊，以供查詢。

土生土長的在地人，自不能忽略此在地聲音。且就地方自治來說，文化硬體的管轄權本就該歸屬於地方政府[3]，故本文以海關碼頭的隸屬與再利用爲例，爲探討文化硬體管理之地方賦權問題。

第二節　閒置空間再利用之探討[4]

一般提到文化硬體，多以公立文化中心、藝文中心以及博物館爲主，實際上閒置空間也是文化硬體的一部份，如本文所探討的海關碼頭即是屬於閒置空間的一部份，其再利用並引發本文所欲探究之地方賦權議題。在進入海關碼頭再利用過程的問題討論前，先就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論述略做回顧與探究。

所謂「閒置空間」，意指原有活絡功能，但因不符管理者或使用者的當下或未來期待而暫時被「閒置」的空間場域。空間成爲「閒置」的狀態，可能是「被廢棄的」、「多餘的」、「壞掉的」、「被遺忘的」、「過渡的」或「懸盪的」空間[5]。若自建築的「生命史」來思考，空間的「閒置」只是建築生命歷程的一部份而非生命終點，而且寓有「再發展」的契機。

一、相關利害關係人對閒置空間再利用的不同想像

「閒置空間再利用」近年來在台灣產官學界的論述與實踐頗多。但綜觀各家之言：與閒置空間相關的不同「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大概可分爲「政府部門」、「藝術工作者」、「空間專業者與文化資產保存者」與「社區民眾」等四類，其中對於閒置空間「再利用」也會有不同的論述觀點。茲分述如下：

1. 政府部門

文建會自 2000 年起即大力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視之爲政府推動「地方文化館」、「鐵道藝術網絡」等各項文化環境整備之中心指導政策[6]。文建會爲彌合文化設施城鄉分佈不均的狀態，提出以「閒置空間再利用」爲解決方案。此政策方向一方面清楚述明政府擬「將閒置空間再利用爲文化空間」，「以推廣文化藝術價值」[7]；另方面則揚棄 1978 年起政府在各地「新建」以「文化中心」爲據點之大型文化設施的政策方向，將文化設施據點自都會城市延伸到地方社區，以再利用之閒置空間「籌設具永續經營能力之各類文化館」。總此，文建會所推動之「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既提供國內藝術家有創作與展演的場域，亦與社區

[3]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條第四項第五款：鄉（鎮、市）社會教育、體育與文化機構之設置、營運及管理。

[4] 本節主要內容乃引用蔡明志（2010）〈閒置空間再利用理論探討〉，經作者同意引用。

[5] 劉舜仁〈另類空間的「另類」思考—閒置空間再生的矛盾本質與蹺蹺板原理〉，《文化視窗》，第 28 期，2001 年 4 月，頁 24-25。

[6] 文建會《文化白皮書》 擷取日期：2010 年 9 月 8 日 http://web.cca.gov.tw/intro/2004white_book/files/2-2.pdf。

[7] 詳文建會「90 年度試辦閒置空間再利用實施要點」第二條。

總體營造政策結合，藉此提升民眾之生活美學。

2. 藝術工作者

藝術工作者是台灣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之先行者，自 1997 年爭取台北第一酒廠成爲「華山藝文特區」開始，藝術工作者與藝文空間則幾乎與閒置空間再利用劃上等號。藝術工作者視閒置空間之「廢棄」或「廢墟」狀態呈現出激發藝術創作的「靈光」(aura)，藉閒置空間來進行藝術的實驗與展演。藝術工作者尤關心閒置空間之「主體性」問題，批評文建會「由上而下」決定空間的新功能與目的，並過度介入與強勢運作，忽略了自詡爲閒置空間再利用「主體」的藝術家的觀點[8]。尤有甚者，亦有藝術工作者認爲閒置空間再利用，主要目的即在提供藝術家創作與交流的場域，而對文建會將閒置空間再利用與社區總體營造的連結有所不滿[9]。此外，對藝術工作者而言，閒置空間的魅力即在其破舊廢棄的狀態，但文建會與空間專業者的「修飾美好、過度設計的空間」，亦延伸出閒置空間再生的矛盾：閒置空間「是永久的基地還是臨時的處所」？閒置空間「動人的空間在改造之前還是之後」[10]？此二矛盾尤顯現在閒置空間再利用之主體爲藝術工作者或地方社區的不同作爲。

3. 空間專業者與文化資產保存者

空間專業者之專業在形塑空間，亦自認爲是閒置空間再利用之主角，與藝術工作者都是最早涉入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角色。空間專業者從老舊建築之「可適性再利用」角度切入閒置空間，視老舊空間的改造異於新建築的建造，因此其再利用之潛力需考慮既存環境、歷史與空間資源的挖掘[11]。從老舊建築體本身來看，包含閒置空間在內的老舊建築之「再利用」，牽涉到「建築物生命週期再循環、機能的持續使用」、「『結構安全性』與『經濟上存活』兼顧的保存方式」及「『史實性』與『現代性』兼顧的保存方式」之再利用理論[12]。再者，閒置空間在台灣資本主義爲主的房地產市場中亦成爲兵家必爭之地，尤其是位處市區精華地段的老舊建築或大型工業廠區。但在政府與民間戮力推動閒置空間再利用政策下，逐漸由以拆除重建爲主的「土地市場價值」思維，轉向保存都市空間歷史脈絡的「空間文化價值」取向[13]；在此趨勢下，不只老舊建築可以再生，都市同樣可以獲得再發展的契機。

---

[8]黃金鳳〈花非花，霧非霧—談閒置空間的定位問題〉，《文化視窗》，第 28 期，2001 年 4 月，頁 20-21。

[9]吳瑪俐〈文化新戰場—談閒置空間規劃與使用的主體性〉，《文化視窗》，第 28 期，2001 年 4 月，頁 22-23。

[10]劉舜仁〈另類空間的「另類」思考—閒置空間再生的矛盾本質與蹺蹺板原理〉，《文化視窗》，第 28 期， 2001 年 4 月，頁 24-25。

[11]劉舜仁〈空間的滅絕與再生〉，《閒置空間・新造化》，頁 14-19。臺北：文建會。

[12]傅朝卿〈台灣閒置空間再利用理論建構〉，《台灣地貌改造運動特展—論述專輯》，頁 358-366。臺北：文建會。

[13]陳華志〈藝文空間發展與都市再生：從臺北市空間再利用觀察〉，《博物館學季刊》，19 (4)，頁 85-99。

此外，閒置空間再利用之趨勢，原即是全球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的支脈，藉由保存與再利用老舊建築或閒置空間，以建立城市空間歷史脈絡之延續性。都市紋理與老舊建築是城市集體記憶的實體遺存，積累了豐富的文化厚度與感性深度，而「現代城市中最需要的則是歷史的連續性」。透過能夠滿足當代需求的新元素的置入，產生了新舊空間的對比、並置與辯證，既延續了過去亦衍生出新的生命力。

4. 社區民眾

文建會 2004 年的《文化白皮書》中，將「閒置空間再利用」主要歸於「新故鄉社區總體營造」項下，試圖藉由社區居民自主發掘社區內之閒置空間，並從社區的歷史人文與民眾參與的角度，進行再利用爲「地方文化館」，使之成爲營造社區文化與產業之基地。因此，閒置空間一方面被政府視爲是解決城鄉文化設施差距的策略，另方面則藉以凝聚社區的意識與能量並與民眾生活結合，使得閒置空間不只是從藝術工作者的角度增加其創作與展演的場域，更藉由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結合，提升社區民眾的生活美學，強化台灣之文化軟實力。此外，閒置空間再利用在施行初期，多藉由政府「由上而下」的執行方式，並由政府編列預算予以推動，施行的對象則以「公有建築」或「公共空間」爲主。但近年來此政策已和在地文化產業發酵，逐漸轉爲「由下而上」的運作模式，帶動了國內非政府組織與私人參與閒置空間再利用，並將閒置空間再利用擴展成「文化創意產業」中的一環。其中較具能量者，如台南市古都文教基金會所舉辦之「老屋欣力賞」。

二、閒置空間再利用之經營管理

但若將閒置空間再利用僅視爲是一種文化硬體設施予以發掘並修繕使之堪用，而未考慮及其永續經營管理，極易造成「二度閒置」的現象。近期相關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論述中，幾乎都論及再利用之「開發方式」、「經營管理權」、「財務計劃」、「經營團隊」等，對於閒置空間再利用是否能夠活絡運作的重要性。

由於目前被再利用之閒置空間多屬「公有空間」，因此其經營管理多委外辦理，依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但契約期限大多是一年至三年不等。合理的契約期限對經營管理的運作計劃與成效影響甚大，研擬合理適用之管理期程與評鑑制度方能使再利用之空間發揮效能。而閒置空間再利用是否能夠成功之最關鍵者，應是「經營團隊」的組成。「經營團隊」是被再利用後之閒置空間的主要養育者。閒置空間再利用不只是老舊建築的改造，更牽涉到後續經營的種種面向，因此必須是一個跨領域組合的專業團隊。如傅朝卿所言，應「包括了各種建築及都市人員，史學專家以及其它與保存、或開發工作有關的專家，再加上決定再利用機能後，該機能的相關專業」。因此，閒置空間再利用不只是關注空間硬體的創意改造，更要關注專業空間企畫經營與管理人的培養。

誠如上述，閒置空間的再利用成功與否，與「經營團隊」的組成是成敗最爲

關鍵的因素，而這也正是爲海關碼頭再利用所引發爭議之所在。

第三節　從海關碼頭再利用過程引發問題之探討

淡水海關碼頭是台灣第一個海關所在地[14]，也是淡水重要的歷史古蹟[15]。清・嘉慶年間，八里坌碼頭因水流變化之因素而逐漸淤淺，使船隻不易停靠，港務逐漸移轉至滬尾。而滬尾於嘉慶時期停泊船隻的功能已相當發達，開埠前滬尾主要街區重建街、清水街的米市、布市及大街船頭行將整個聚落連接成一體，加上淡水河可航行深入至台北盆地，貿易機能相當良好，當時被外國人士視爲台灣最重要的港口，因此成爲外人要求開港的首選。海關碼頭至日治時期，仍是日人所重視的關稅碼頭，更是文人詩會的集會場所，對經濟、文化、歷史都具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戰後初期海關碼頭由國民政府軍方接收，由於軍隊輪調難以知悉其詳細的變遷過程。有明確紀錄者始自民國 70 年 6 月海蛟四中隊接收海光藝工隊，進駐海關碼頭；之後由河搜（現在的海巡隊）進駐；再後則是由「海軍海蛟四中隊」與「陸戰隊警三營警七連」駐守。在軍方管轄期間，成爲軍事管制要地，一般人難以窺見海關碼頭全貌，只是偶爾透過大門口看見海光藝工隊成員的排練身影。自海光藝工隊撤出後，軍方對於此地的管理態度漸趨消極，致使裏頭的建築物損壞嚴重，以致被視之爲危樓，現已荒廢不再使用。

由於海關碼頭在經濟、交通史上都具有其重要之意義，且碼頭構造物使用的是珍貴的觀音山石，並以傳統的交丁砌法所建成，是土木工程發展史上極爲重要的證物，因此台北縣政府文化局於民國 89 年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所定程序[16]，將海關碼頭公告爲縣定古蹟，從此展開與軍方管轄權之協調，終于民國 98 年協調成功，由台北縣政府取得管轄權，之後移撥給淡水古蹟園區管理。

這幾年來台北縣政府積極發展文化藝術，在淡水地區也提出多項計畫，包含舊日本警察宿舍中正路 298 號拆除重建爲「藝術工坊」、中正路後段「藝術大街」的設置規劃、殼牌倉庫修復再利用等；另外，97 年雲門舞集大火，台北縣政府提供廢棄的中央廣播電台給雲門作爲重建舞集運作之地，種種行政措施顯示台北縣政府對於淡水藝術、文化的重視，因此，台北縣政府自將海關碼頭訂定爲縣定

---

[14] 1862 年 7 月 18 日（清同治元年 6 月 22 日），區天民以滬尾守備舊屬開設海關，正式收稅。之後在基隆、安平所設者為分關，均以滬尾為本關，成為總理全台關稅機構，是台灣地區所設立的第一處管理外國貿易的稅收機關。

[15] 海關碼頭建於 1808 年，因當時海盜猖獗，影響航運交通及貿易，在陸續平定海上梟雄之後，選擇了具有軍事及經濟雙重優點的滬尾港作為台灣北部的海防設施港口，並在此成立滬尾水師　守備營，將原本駐紮在福建的守備營移駐至此，從此成為台灣重要的軍事港口。

[16] 古蹟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古蹟之指定，應邀集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實地勘察，經審查指定後公告之。前項勘察及審查，得邀請古蹟所有人、管理人、占有人或其他相關人士到場說明。

古蹟之後，隨即展開修復計畫，並以近幾年來的文化政策走向「古蹟活化再利用」，作爲海關碼頭修復後的發展方向。自縣府爲雲門提供用地之後，不少藝文團體紛紛表達進駐淡水之意願，其中朱宗慶樂團也向文化局表示進駐之意願，並屬意英商嘉士洋行倉庫（殼牌倉庫）及海關碼頭，不過殼牌倉庫於 98 年 11 月修復完畢後將交還淡水文化基金會營運管理，而海關碼頭則屬國防部軍備局管理，文化局表示將會盡力協調，後以 BOT[17]方式讓朱宗慶樂團進駐海關碼頭。

台北縣政府爲發展藝術文化所做之種種政策規劃與措施，其出發點當然值得稱許，不過縣府的規畫卻未顧及淡水特殊的人文、歷史，幾乎割裂了淡水的文化命脈。閒置空間再利用主要是作爲活化之運用，並透過既有功能、公辦公營、公辦民營、委外經營等方式來經營。因此，當一個閒置空間在作經營規劃時，其實是有多種方式可以進行的；閒置空間實際上屬於公有空間，是公有財產，亦即爲全民的財產，既然是全民財產，就應該做最有效以及最符合人民期望的規劃利用，而 BOT 方式是否該是海關碼頭最終的經營規劃？且在海關碼頭的營運規畫中並未思考是否適合淡水的藝術發展、人文歷史背景？淡水需要甚麼樣的文化規劃，應該由淡水人積極的參與，因爲唯有當地人才更知道淡水的人文、藝術與發展方向，縣府一意孤行的執行下，往往破壞了淡水的文化發展，對此，我們也不禁要發問的是，縣府在規劃閒置空間再利用時，是否以淡水在地生活文化、歷史背景爲出發點？還是只交由少數所謂的專家做紙上作業與想象？更重要的是，是否聽到了淡水人的聲音？

第四節　淡水人的聲音

誠如上言，縣府在規劃淡水的藝文發展與空間時，在地的淡水人也已表達了他們在地的想法，而這些想法的發出，縣府是否曾仔細的傾聽過？作爲在地行政決策的淡水鎮公所，應當有權利也有義務必須將淡水居民的聲音表達出來，因爲公所所代表的正是淡水民意的行政決策機關，公所行政的功能正是爲民眾謀求最大的生活利益，而海關碼頭的再利用發展，攸關淡水民眾的願望，因而進行一項針對海關碼頭再利用願景調查訪談研究，從其中窺探出淡水在地人期望之所在。

在此項訪談研究中，得到了以下之結論：

一、文化資產活化的目的：維護與保存

不論是古蹟或是任何的閒置空間在活化利用之初，首先該確立的是其活化的目的何在？而這目的並非從觀光出發，而是要從當地歷史文化、民眾意願與此空間的發展背景來訂定活化的目的與做法。

---

[17] 台北縣文化局公告「淡水打擊樂文化教育園區文教設施公共建設」，以促參法 BOT＋ROT＋OT 方式，由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淡水打擊樂文化教育園區文教設施公共建設」案。並使用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及鄰近用地、空間為規劃，故本文以 BOT 代稱此案。資料來源自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98 年 12 月 25 日公告訊息。

> 文化資產交到我們一般政府的手裡，第一個就想到建設。因為他要活化它…，現在所有的目標就是，所有的文化資產拿到手就是要活化，那活化的目的就是為了觀光，而忽略了活化最大的目的是為了要維護、保存它。[18]

> 海關碼頭這個原本的歷史緣故一定要讓它存在…他原本蠻原始的風貌存在，那盡量也不要去破壞它，讓人去到那邊可以感受到這個地方是有歷史的地方。在那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到天津條約那時候的淡水，清朝時候的淡水，歷史區塊有個好處不用太多的說明去的人就可以感受得到。[19]

> 在海關碼頭的搶救過程中，本來是一個策略上的應用，後來發現我們搶救不只是把它當作工具性而已，它真的是很寶貴的文化資產。淡水古蹟景點怎麼形成的，它有它的歷史脈絡，如海關碼頭應該跟河運、跟河、跟以前的海關，淡水開港有關的…。它可能應該跟小白宮（海關稅務司的宿舍）有一個連結，各有各扮演不同的角色，可是是互相串連的…。因此它的意義，就在於歷史的縱深，應該把它建構出來。[20]

海關碼頭對於臺灣來說是個重要的歷史文化的遺跡，它可以說是見證了淡水自清代以來的發展，以歷史文化的遺產爲海關碼頭未來規劃的發展方向，而這樣的方向則可引發淡水古蹟間的區域連結。

二、古蹟間的區域連結

淡水地區擁有 25 處古蹟，而這些古蹟不該是單一的存在，海關碼頭應該是要跟紅毛城當成一體，從歷史文化背景來看，海關碼頭與整個埔頂山區有著密切的關係，將淡水古蹟連結起來，可以明顯知道淡水歷史文化的發展脈絡與人文的獨特性。

> 海關碼頭、紅毛城跟後面的這些傳教士的住宅還有像小白宮、稅務處官邸的宿舍這些等等，所以這些房子應該把它看成一起，那如果這樣我會比較主張用一個講故事的方式來講，用這些講故事的來把這些空間的場景給修復起來，那如果這樣的話我覺得海關碼頭這個地方應該留給淡水人，它有點像淡水人的後花園一樣…我們可以提供一個所謂給淡水人的一個後花園不只是淡水人用，而是說它會讓我們重新才可以體會到淡水人的那種靠著河岸經過時間所形成的那種河岸文化的軌跡，那是一個空間的氣氛也可以說是淡水人的氣質。[21]

> 淡水，有那麼多古蹟點，每一個古蹟點它有它的角色，然後彼此之間有連

[18] 此段語出自張寶釧，前古蹟園區館長，99 年 6 月訪談紀錄。
[19] 此段語出自許程忠，淡水漁業影像館負責人，99 年 5 月訪談紀錄。
[20] 語出張建隆，淡水社區大學校長，99 年 5 月訪談紀錄。
[21] 語出黃瑞茂，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99 年 5 月訪談紀錄。

結，它是形成一個網狀的，發揮不同的功能，但是整體的，這些古蹟整體發揮的效用將會非常大。[22]

當然，海關碼頭是一個具有故事性的歷史陳跡，也是一個具有藝術史意義的存在，在使用規劃上也與藝術具有連結性。

三、成爲淡水藝術的特區

海關碼頭自軍隊接收以後，在此成立海光劇校，就老淡水人的記憶中，海關碼頭是一個處處充滿著吊嗓子、翻跟斗等練功的聲音的地方，可說是一個表演藝術的蘊育場域。

淡水的藝術家吳榮裕對於海關碼頭的環境讚賞不已：「這個腹地這麼大，建築物這麼多，裡面的建築物很多部分都可當成辦公室，這裡還擁有許多空地可以當作排練的地方，這個地方假如好好利用，真的很棒！」[23]因此若能像台北菸廠的經營模式，成立淡水藝術特區，將此處空間釋放給淡水各種藝術團體，如金枝演社、聲身演繹、青藝盟甚至於精靈幻舞等，讓這些團體共同經營，一方面作爲淡水藝術團體的培育與支持，另一方面則是能發展出具有淡水獨特的演藝空間，如此一來便能讓海關碼頭的活化與再利用得到最大的效用。亦如余浩瑋所說：「如果說有這麼好的一個空間，是不是可以給在地的藝術家多一些機會，讓大家來發揮一些創意，看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東西，因為這是淡水這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空間。那要怎麼樣的利用，我想大家都很有興趣，或是很有意願了解他將來可以做什麼樣的發展。」[24]正由於是屬於淡水自己人的地方，由淡水自己規劃設計，較能符合淡水人的期待與經營之意願。

四、整體性、多樣的規劃設計

在整個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均不反對將海關碼頭重新規劃與利用，也不反對由藝術團體進駐，不過必須要有整體性的規劃，且必須是開放性質的空間，大部分的受訪者不同意由 BOT 來做爲海關碼頭活化利用的模式。因爲海關碼頭應該屬於鎮民所共有的空間，之前已經被封閉久了，現在有了開放的契機，不該再成爲某一特定團體的場域，所以在規劃時應該以開放使用爲規畫方向。

就海關碼頭來說，可分成數個區塊：碼頭古蹟區、歷史建物區、表演區等：

碼頭古蹟區可成爲古蹟公園，作爲緬懷歷史與觀賞景色之區域；歷史建物則可成爲海關碼頭文物展示區，亦可成爲藝文中心；海關碼頭在軍方接管後新建了不少建物，雖然有些建物已是危樓，但若能經過整建，這些建物都可提供給各個藝術團體進駐，成爲一個藝術村，或是如海光劇校般作爲藝術培育的場域，在開

[22] 語出張建隆，淡水社區大學校長，99 年 5 月訪談紀錄。
[23] 王榮裕，金枝演社導演，99 年 5 月訪談紀錄。
[24] 余浩瑋，青少年藝術表演聯盟執行長，99 年 5 月訪談紀錄。

放時期提供各種不同的表演或課程，不僅可豐富海關碼頭的功能，更能成爲淡水地區的藝文特區。

海關碼頭未來的發展與作爲，透過訪談研究，可知人民所期待的是一個多元、完整的規劃，不過，這樣的規畫需要合理的經費，以及具有公平、公開又完善的管理機制，而這管理機制最佳的人選非地方政府亦即淡水鎮公所莫屬了。在公民社會的形塑過程中，地方政府角色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爲政治制度以及環境因素的影響，從制度面來說，地方政府上承接著中央政府的政策內涵，下則是直接面對民眾的政策執行者，所以在角色定位上便是十分重要，因此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比中央政府更爲吃重，尤其是最爲貼近民眾的鄉鎮市公所。

第五節　文化硬體管理之地方賦權

一、現行地方制度下鎮有閒置空間之規劃

近年來爲了發展淡水在地特色，在現有的權限下，公所陸續收回鎮有財產及閒置空間，並以活化再利用之目的，進行重整與規劃：

表一、藝術街坊再利用規劃[25]推動期程

內容 計畫	計畫內容及用途	目前進度
第一期	主要包含台北縣政府文化局辦理之「藝術大街整體規劃及立面整修」，配合縣府城鄉局辦理之「淡水老街環境改造工程」、「淡水藝術工坊新建工程」、淡水鎮公所區域內環境綠美化改善工程。	已完工。
第二期 紅磚藝術村	延續第一期計畫，由古博館協助針對本所已收回之五連棟商行及舊國語禮拜堂二棟建物，規劃爲紅磚藝術村，計畫修建爲藝術市集中心及劇場展演空間，提供周邊進駐藝術家之推廣展示及大型展演空間，以及供居民、遊客體驗交流與休憩空間。	本建築物原爲英商道格拉斯洋行，已完成修復前期調查研究（比照古蹟調查研究程序）目前委託設計中，計畫於 100 年 8 月修復完成。

[25] 本計畫源於 95 年起規劃收回老街周邊包括中正路老街後段三民街、建設街及真理街等區域閒置及被占用公產。

第三期 將計畫收回區域分爲四區，並依產權及建物狀況，規劃爲藝術家工作坊、戶外展演廣場及綠地。	配合前二期計畫，由鎮公所陸續收回區域內公有閒置空間，分紅磚區（主要設置供藝術家進駐之個人工作坊空間）、馬偕區（主要設置藝術廣場、藝術穿廊及漫畫資料中心）、三民區（主要以修復畫家木下靜涯古宅、配合周邊藝術公園、展演廣場及入口藝廊設施）、真理區（主要結合古蹟、學校、藝術家個人工作坊空間）。	目前已完成二個個人工作坊，其他設施空間陸續收回、施工中。

表二、藝術街坊周邊區域待修復之文化資產

內容 計畫	計畫內容及用途	目前進度
建設街首任鎮長日式官邸重建淡水公民會館計畫	本建築已報准以紀念性建築重建，並編列 2 千萬重建預算，將再利用規劃爲供居民聯誼、教育講座及小型開放展覽及集會活動之公民會館使用。	辦理徵選委外設計中。
施家古厝古蹟	將規劃爲本鎮古蹟入口意象及導覽中心，結合本古蹟前方龍山寺、後方祖師廟、福佑宮資源，並成爲通往清水街、公館巷步道及重建街之動線入口。	由古博館規劃收回，進行委外修復設計中。
滬尾小學校	整合週邊公有用地，規劃爲淡水文物館及古蹟教育園區。	由古博館規劃收回，進行委外修復設計中。
日商中野宅	配合紅磚藝術村-英商道格拉斯洋行修復設置藝術展演及市集空間場域，本古蹟修復後規劃爲淡水故事館及周邊休憩綠地園區。	目前由文化局辦理委外設計規劃中，後續由古博館營運管理。

二、文化硬體管理歸屬地方賦權之重要性

地方政府存在的重要功用就在於「治理」，台灣地方自治雖然從 1950 年行政院訂頒「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開始迄今 60 年，卻得到 1999 年 1 月地方制度法公布施行後，才有真正落實地方自治感覺。1999 年之前，地方政府往往受限於省的法規組織[26]，地方可說毫無特色性亦無自主性可言。自 1999 年通過「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27]，秉持政府再造的理念，及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

[26]當時省政府透過「臺灣省各縣市政府組織規程準則」與「臺灣省鄉鎮縣市公所組織規程準則」，直接規範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的組織，不僅包括其組織規程的體例、設置的單位、名稱、業務執掌，甚至編制員額多少人等事項。

[27]地方制度法第 62 條參照。

準法與總員額法草案的精神，打破自 1950 年以來台灣省政府以高密度方式管控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組織的框架，對於要設哪些機關或單位，只要不超過準則所規範的上限，都可以本於組織自主權限，依據準則，視自己的業務需要、因地制宜設置，如本鎮即在此準則的依據下將農業課改制爲產業觀光課及設置文建課，開創地方政府可以視需要進行組織功能重組的機會。

不過隨著公民意識的提升，民眾不再以「接受」政策爲滿足，在「地方參與」與「行政效能」的要求上，亦趨嚴格。但是身爲地方自治制度下最底層的鄉市鎮公所，往往因爲行政組織層級的限制而無法達到人民的要求。如金色水岸的管理權即是一個重要的例子。金色水岸隸屬於台北縣水利局高灘地管理處，雖是老街重要的部分，卻因管轄權的問題，對於該處的整修與問題的解決，公所往往無法立即處理，必須行文給高灘處，在公文往返的過程中，不僅讓居民氣惱引起不必要的民怨，也降低了公所的行政效率。

淡水雖然以觀光聞名，但其深厚的人文、歷史與文化更是淡水的內涵所在。淡水亦擁有無數的藝術家與文史專家，也有許多文化空間，淡水人更有自己深厚的文化背景與意識，該如何維護、規劃淡水的歷史文化古蹟與文化硬體設施，就地方自治與地方參與的精神，應該讓淡水所轄的地方政府管理與發展這些處在淡水的文化硬體空間，且鄉鎮市公所正是縣級單位與民眾之間重要的溝通橋樑，也是一個區域重要的治理與決策組織，對全地區有通盤了解，亦有能力爲之集結群眾的想法並加以統籌規劃，況且文化藝術的發展向來是淡水的施政重點所在，所以文化硬體設施的管轄權對淡水來說就顯得相當重要，爲了更能有效的利用與活化這些文化硬體設施，唯有將文化硬體設施的管轄賦權給地方政府，一方面可將文化硬體設施導向淡水在地人的期望，一方面公所本身即爲文化硬體設施的管轄者，當可免去公文往返的時間，進而提升行政效能。

第六節　結論

從探討地方賦權之要點所做的訪談研究中可知，普遍的受訪者皆不贊成以 BOT 的方式來營運，其因在於文化硬體設施顧名思義是爲文化進行的場域，而 BOT 則是屬於一種商業性質的營運，且到目前爲止，尚未有以 BOT 方式而成功的區域，所以就海關碼頭未來的規劃來說，贊成台北縣政府以 BOT 爲營運方式的，可說是屈指可數。當然，文化局之所以考慮以 BOT 方式規劃海關碼頭的活化，其用意是在於以促參之手法，扶植藝術團體投入參與，但就淡水人的期盼來說，是希望政府能有效的運用這些空間，非以私人、封閉式的 BOT，而是從開放空間的規劃使用爲基本原則。

淡水目前的文化硬體設施不算少，多爲台北縣文化局管轄，由於文化局位處板橋，雖然與公所之間的互動關係良好，然因管轄權之所在，公所要使用時往往得透過繁複的公文往來，不僅延誤時效，也造成公所在整體規劃與使用上的困難。

以今年的地方文化節爲例，空間的不足使活動策畫出現困難之處。去年，在地方文化節中，動員了淡水的藝術團體、學校、民間團體以及社區，從踩街到環境劇場的道具與服裝，全由參與地方文化節之民眾共同動手製作，公所爲了讓地方文化節運作順利，特別釋出中正市場二樓的閒置空間作爲道具製作與演練場所。今年，地方文化節更爲盛大的舉辦，但是，中正市場正在拆除重建中，而公所能提供的空間卻是顯得狹小不敷使用，此也是公所力有不逮的遺憾，亦是本文有感而發之處。

淡水的地方文化節在這幾年的發展下，已有相當的成效，不僅成功的凝結了淡水藝術家、鎮民的向心力，也成爲淡水對外宣傳當地文化的活動，更是可以成爲永續經營的文化盛舉；而且，淡水也具有不少優秀、熱愛淡水文化的藝術家，他們願意奉獻自己對於藝術、文化的精髓在這塊土地上，但是他們雖然有熱情，卻少了可以讓他們安心發展他們創作的區域，正如公所有心將淡水的文化推向高峰，卻苦無場地可以發揮，所謂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實是殊爲可惜之處。

今年正值台北縣升格爲直轄市的過渡時期，實是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因爲台北縣的升格帶動了台北縣的地方層級，各項措施、經費與資源都可隨之而提升，憂的是自升格爲直轄市之後，作爲最貼近地方自治「鄉、鎮、市」層級也隨之消失，沒有了鄉鎮市層級在地方上的經營，「一鄉一特色」[28]的地方發展是否也將會隨之消失，而本文在此專文提出地方賦權的相關問題，即是因此而起。

台北縣的升格對地方發展來說既是危機，抑是轉機，如何藉著升格而提升地方層級，又能保有地方特色，其關鍵就在於地方賦權，特別是在文化硬體設施的管轄權上。其在做法上可透過組織改造方式賦予地方或「區」文化硬體設施管轄權，讓區公所成爲市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行政橋樑，提升行政效率，且以實質的文化硬體管轄權帶動民眾參與並創造出「區」的文化特質，對直轄市、區公所與市民來說可謂互蒙其利，營造雙贏之局勢。

附錄：

受訪名錄：

張寶釧：前淡水古蹟園區館長。

蘇文魁：淡江中學校史館館長、淡水地區文史專家。

張建隆：淡水社區大學校長、淡水地區文史專家。

黃瑞茂：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

沈海蓉：中華紙繡協會創辦人

[28] 一鄉一特色構想引自日本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一村一品運動，此概念是 1979 年由日本大分縣前知事(同等於縣長)平松守彥博士提出，就是每個鄉鎮結合當地特色，發展具有區隔性手工藝或食品特產的產業。

莊武男：淡水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淡水雕刻家。

許程忠：淡水漁業影像負責人、淡水歷史、文化紀錄者。

王榮裕：金枝演社導演。

余浩瑋：青少年藝術表演聯盟執行長。

※受訪對象以長期研究淡水文史之工作者、空間規劃學者以及在地藝術家爲主，對於淡水之文化發展具有專業看法以及在地期盼。

參考資料

專書：

江繼五編著，《地方自治概要》，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85 年 1 月。

張潤書，《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

黃武忠等編輯，《文化創意產業及地方文化館》，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 年。

夏學理等編著，《文化行政》，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 年 4 月。

蔡東源，《文化行政通論》，台北：古印文化出版社，2007 年 8 月。

李台京，《台灣地方政府》，台北：三民書局，2008 年 9 月。

論文

劉正輝，〈戰後台灣歷史保存之研究—以社群參與爲中心的探討〉。台北，淡水：臺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期刊論文：

劉舜仁，〈空間的滅絕與再生〉，《閒置空間・新造化》，臺北：文建會，2000 年，頁 14-19。

劉舜仁，〈另類空間的「另類」思考—閒置空間再生的矛盾本質與蹺蹺板原理〉，《文化視窗》，第 28 期，2001 年 4 月，頁 24-25。

黃金鳳，〈花非花，霧非霧—談閒置空間的定位問題〉，《文化視窗》，第 28 期，2001 年 4 月，頁 20-21。

石隆盛，〈浴火鳳凰後的新契機—談閒置空間再生的經營管理〉，《文化視窗》，第 28 期，2001 年 4 月，頁 32-33。

吳瑪俐，〈文化新戰場—談閒置空間規劃與使用的主體性〉，《文化視窗》，第 28 期，2001 年 4 月，頁 22-23。

王麗卿、何明泉，〈公有閒置空間的文化再生—藝文展演空間企劃與經營管理之研究〉，「第五屆建築生產及管理技術研討會」，2001 年 11 月 1 日，逢甲大學。

陳華志，〈藝文空間發展與都市再生：從臺北市空間再利用觀察〉，《博物館學季刊》，19（4），2005 年，頁 85-99。

傅朝卿，〈台灣閒置空間再利用理論建構〉，《台灣地貌改造運動特展—論述專輯》，臺北：文建會，2005 年，頁 358-366。

蔡明志，〈閒置空間再利用理論探討〉，2010 年，未刊稿。

洪以南的淡水歲月（1913-1927）

洪致文*

摘要

北臺漢詩人洪以南(1871-1927) 是瀛社的首任社長，曾在日本統治時期，擔任淡水街長之職。洪以南於 1913 搬至淡水，並居住至過世的 1927 年。本研究從洪以南搬遷至淡水的 1913 年談起，描述其搬至淡水的始末，以及其在淡水達觀樓（今又名淡水紅樓）居住時的點點滴滴。本研究除描述洪以南在淡水居住期間之情形外，並透過口述訪談，由洪以南唯一在世之女兒回顧其居住於達觀樓時的樓層房間分佈，以及洪以南與詩友在淡水達觀樓內交往與詩文創作之情況。

關鍵詞

洪以南、淡水、達觀樓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

洪以南（1871-1927）爲臺灣傳統詩社瀛社之首任社長，雖在日本統治初期避走福建並考取晉江縣秀才，但因家業在台而旋即搬回。洪以南在旅遊各地後，創作出瑰麗的詩作，在近代臺灣古典文學史上具有驚艷的文學價值外，更展現日本統治初期，臺灣在近代文明洗禮下的時代氛圍。在洪致文（2010）所著的「臺灣漢詩人洪以南的現代文明旅遊足跡」一書中，整理了洪以南的報上發表詩作，並以 1907 年的赴日旅遊，重新紀錄其旅行的地理時空。由於洪以南曾任瀛社社長，在日本時代初期的台灣漢詩社團間亦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其與詩社間的活動狀況，在 2009 年瀛社慶祝創立百年，臺北文獻季刊第 166 期中，有多篇論文發表均有提及（例如：卞鳳奎 2009，黃美娥與陳盈達 2009，高傳棋 2009，洪啓宗 2009）。不過，對於洪以南在淡水的歲月，與其在達觀樓內的生活情形，則較少被提出來單一研究。本論文乃從洪以南搬遷至淡水的 1913 年談起，描述其在淡水居住於達觀樓內的點點滴滴，以迄過世的 1927 年。

洪以南生平

關於洪以南的生平介紹，從 1911 年 1 月 30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所刊登的〈洪以南君略傳〉一文，可以一窺其概略：「君姓洪名以南。字逸雅。一字墨樵。號無量痴者。今年四十歲。改隸之初。避兵亂。內渡支那。僑寓鯉城。與小試。補弟子員。旋為護產計。挈眷歸梓。當道器其才。於明治三十年九月間。任臺北辨務署參事。至三十四年三月。因官制改革。罷參事。卅五年五月。任臺北檢疫委員。卅六年四月。為臺灣協會臺灣支部評議員。 三十七年四月。為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囑託。三十九年。為艋舺公學校學務委員。四十年四月間。任臺北廳參事。補益於政治者不尠。君為人豪爽。無紈袴氣。文士樂與之游。工詩。善書畫。詩廣涉諸名家。書精顏體。畫以蘭石及竹名。得之者以為重寶。當四十年間。東京開博覽會。君赴內地觀光。並攜其哲嗣長庚留學內地。即斷髮改裝。其子女亦均命循帝國之俗。原寓艋舺土地後街。今住城內新北門街。家屋半從內地式。入其門。幾與內地人之家不殊。屋之周圍。遍植花木。因號逸園。君有短額。書維新空氣滿庭軒。信然。」

此外，在《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一書中則對於洪以南之生平，以如下之文字描述：「洪以南名文成，字逸雅，號墨樵，別署無量癡者。清淡水廳艋舺（今臺北市萬華）人。同治十年（1871）四月生於艋舺土地後街，後徙居淡水。道光中其曾祖自泉州移住臺北。祖騰雲，經營米郊致富。以南幼穎異，祖喜之，延泉州名孝廉龔顯鶴課讀，授諸經子史詩賦。乙未（1895）割臺，內渡晉江，得遊泮水。後一年返臺。 日據期間，嘗任臺北縣辨務署參事、艋舺保甲局副局長，臺北廳檢驗疫員、臺北協會臺北支部評議員、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囑託，臺北廳參事、淡水區長、街長等 職。善詩文，詩書俱佳，能畫蘭竹，且家饒於貲，乃蒐集各地散佚圖籍、碑帖、文物、建達觀樓以貯之，為北臺著名藏書之所。1909 年與謝汝銓等共創瀛社，被推為第一任社長，時與當道相唱和。

著有《妙香閣集》。子長庚，是臺灣第一位眼科醫學博士，自有傳。」

上述關於洪以南的生平記載，大致上是目前坊間所流傳的一般說法。然若實際審視，則可知其實洪以南被推爲瀛社社長並非在瀛社創立之初的 1909 年，至於所謂之「著有《妙香閣集》」，洪家後人均表示未曾知悉與理解此事，另「建達觀樓」之說亦爲訛傳，因該樓造於 1899 年，爲富商李怡和所起造。由於洪以南的生平較少爲外人所知悉，本文先以年表方式整理列於表 1，以提供背景研究之參考。

表 1: 洪以南相關之年表

1871 年 4 月 7 日	洪以南出生於臺北艋舺（日期推測為舊曆）
1897 年 9 月	任臺北辦務署參事至 1901 年 3 月
1897 年 12 月 25 日	洪以南授佩紳章
1902 年 5 月	任臺北檢疫委員
1903 年 4 月	任臺灣協會臺灣支部評議員
1903 年 6 月	任天然足會副會長
1904 年 4 月	任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囑託
1905 年 11 月	臺北士林地區浴德公會入會
1906 年	任艋舺公學校學務委員
1906 年 9 月	任後藤男爵送別會委員
1906 年 10 月 1 日	任兒玉總督石像除幕式接待係係長
1907 年 4 月	任臺北廳參事
1907 年 4 月 13 日	「洪以南氏之送別會」於艋舺龍山寺舉行
1907 年 4 月 20 日	攜子長庚赴日留學並東遊
1907 年 8 月 30 日	洪以南由日返台
1908 年 1 月 4 日	艋津諸紳商等招待臺北廳長加藤氏，總代洪以南朗讀祝詞
1908 年 1 月 26 日	臺灣日日新報社第一期新築工事落成，洪以南贈自筆匾額壹面
1908 年 2 月	縱貫鐵道通車後將辦「汽車博覽會」，洪以南任發起人之一
1908 年 4 月 25 日	赴總督官邸參加祝賀縱貫鐵道完成之晚宴
1908 年 10 月 24 日	應邀前往台中參加縱貫鐵道全通式
1909 年 3 月 7 日	瀛社成立
1909 年 4 月 4 日	瀛社第一期例會於洪以南逸園舉行
1909 年 5 月 3 日	瀛社第二回例會於洪以南逸園舉行
1909 年 5 月 30 日	瀛社第三回例會於洪以南逸園舉行
1909 年 10 月下旬	洪以南逸園宅邸內櫻花盛開，觀者絡繹不絕
1910 年 1 月	任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臺北出張所委員
1910 年 3 月 6 日	瀛社例會於洪以南逸園舉行
1910 年 4 月 24 日	赴台中參與櫟社大會
1911 年 5 月	洪以南與夫人陳宇卿倡設「解纏會」

1911 年 7 月　　洪以南夫人陳宇卿任「解纏會」會長
1911 年 10 月 17 日 代表瀛社參與桃園吟社大會
1912 年 4 月 12 日 祖師廟前街派出所落成式中發表祝辭
1913 年 4～5 月　洪以南搬遷至淡水，新居為二層洋樓
1913 年 7 月 15 日 於艋舺林子楨怡樓舉行洪以南赴日送別會
1913 年 7 月下旬　攜子長庚入醫學校就讀，我鈞亦同行
1913 年 8 月 2 日　達觀樓之名首度出現於報端
1913 年 8 月 23 日 洪以南從日本歸台
1913 年 11 月　　參與大稻埕公學校新校舍落成，木村匡亦參與
1914 年 9 月 25 日 任淡水區長
1915 年 9 月 10 日 魏清德君送別會於淡水達觀樓舉行
1916 年 4 月 19 日 次子洪我鈞赴日留學
1916 年 4 月 20 日 參加下村長官招宴
1917 年 5 月 20 日 淡水郵便局落成，洪以南發表祝辭
1917 年 10 月　　淡水區長役場落成
1917 年 12 月　　淡水信用組合設立
1918 年 7 月　　在眾人共推下，任瀛社第一任社長
1918 年 8 月 14 日 明石總督巡視淡水，至區役場接見洪以南
1919 年 5 月 15 日 瀛桃竹三社聯合春季吟會於艋舺舉行,洪以南輪值作東歡迎來賓與會
1921 年 2 月 14 日 淡水同風會附屬青年會於淡水公學校召開，洪以南為會長
1921 年 4 月　　遊日月潭
1922 年 3 月 7 日　平和博覽會書法與篆刻鑑賞審查終了，臺灣僅洪以南一人入選
1923 年 9 月　　洪以南捐書畫賑災（關東地震）
1924 年 4 月 25 日 臺灣全島聯合吟會於江山樓旗亭舉行，洪以南代表朗述式詞
1925 年 5 月　　洪以南卸任淡水街長
1926 年 3 月 25 日 洪以南辭淡水信用組合長一職
1926 年 11 月 28 日 前往總督官邸參加上山總督召開之詩會
1927 年 3 月 20 日 參加於蓬萊閣舉行之全臺詩社聯吟大會
1927 年 3 月 21 日 前往總督官邸參加上山總督之詩人招待會
1927 年 4 月 3 日　洪以南女寬寬與黃炎生於臺灣神社舉行婚禮
1927 年 5 月 2 日　洪以南因生腦後疽入臺北醫院治療，施手術，住於外科病房二室
1927 年 5 月 14 日 洪以南於午前十二時五十七分仙逝
1927 年 7 月 8 日　午後二時於淡水龍山寺舉行洪以南告別式

洪以南從臺北城內「逸園」搬至淡水「達觀樓」始末

依照洪家的家傳書信等記錄，日本時代洪以南曾住過的地點大致有三個，分別是艋舺土治後街（土地后街）二十九（或二十八）番戶，臺北城內新北門街一

丁目二番戶，以及淡水三層厝街二八。這三個地點，除了艋舺一處爲早年與父兄所同住者外，另外二個地點都是洪以南獨當一面後的住所，也都因曾作爲瀛社的聚會場所，故與詩社的歷史有所關連。

洪以南位於臺北城內的新北門街宅邸，又名「逸園」，在日本時代初期（明治三十年，1897 年）的「臺北大稻埕艋舺平面圖」上，清楚地寫著爲洪騰雲（乃洪以南之祖父）宅，位置在考棚的後面（南方），也就是臺北城的東北角（見圖 1）。在洪騰雲過世前後，此宅邸由洪以南繼承。不過依照二十世紀初期的地圖判別，此宅邸的方位與日本領台初期的位置已有不同。洪以南的「逸園」宅邸方位，面對新開設的新北門街，因此推測洪以南居住此宅時，宅邸建物已是新建之房舍，而與早年洪騰雲居住時並不相同。由於洪以南宅邸與臺北醫院（今台大醫院）正好彼此相連，因此當洪以南在 1909 年因病住在臺北醫院內時，會有詩作云：「家居呎尺隔雲天。蘭桂關心夜不眼。若待茂陵秋雨盡。好將詩酒樂年年。」來感嘆自家與醫院如此相近，卻宛如隔著雲天般地遙遠。



圖 1：以 1897 年所出版之「臺北大稻埕艋舺平面圖」爲底圖，重新以灰色陰影描繪出考棚、洪騰雲宅（逸園位置）與土治後街地點。

洪以南居住在臺北城東北角之時，其地址爲「新北門街 1-2」。依照臺灣日日新報在 1913 年 3 月 18 日的報導，此宅係「古式建築，宏敞壯麗」。依照 1911 年左右的「臺北鳥目圖」（見圖 2）。來看，洪騰雲捐地興建的考棚雖已經變爲兵營，但考棚南邊的洪以南宅（逸園）卻畫得相當清楚。口字形的宅邸，位置大概就是今天青島西路一帶。這個地點在瀛社的社史上相當重要，因爲瀛社成立之後的第一次例會，舉行地點正是這處新北門街宅。由於這次例會有寫真紀錄，因此此宅邸也就有照片存世（見圖 3）。依照鳥目圖的推算，此照是在宅邸的東南角落。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口字形宅邸中間一連二棟的東側棟，以及整個口字形屋舍的最東邊那一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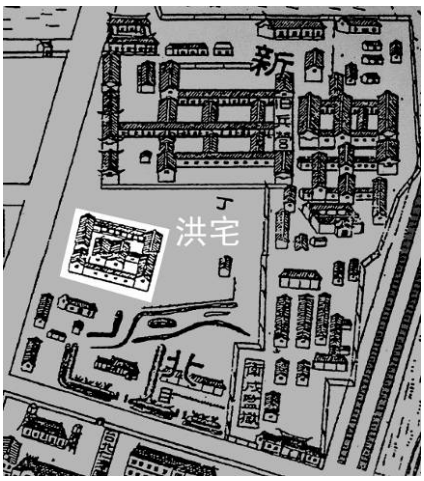


圖 2：1911 年左右的「臺北鳥目圖」所見之洪宅「逸園」。



圖 3：瀛社第一期例會之合影。攝於 1909 年 4 月 4 日。

擔任臺北廳參事時的洪以南，原本居住的新北門街逸園宅邸，因將被政府徵收開闢新道路，且在每年七、八月間，往往因爲颱風侵襲洪水氾濫，而造成居所如在澤國之中，極受其害。因此臺灣日日新報在 1913 年 3 月 18 日的報導中才說，洪以南「近其令正得心疾。深惡喧囂。非幽靜及有新空氣之地。無以療之。」所以，洪以南爲了夫人陳宇卿之心疾，乃一直在找新的住所。此際剛好傳來淡水有棟洋樓出售，其位置面海景觀極佳，洪以南乃購買後裝修，是爲「達觀樓」(見圖 4, 5 與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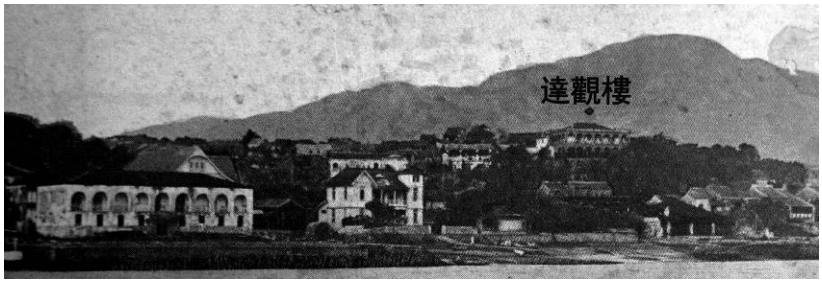


圖 4：昭和時代的淡水河岸景觀繪葉書中可見達觀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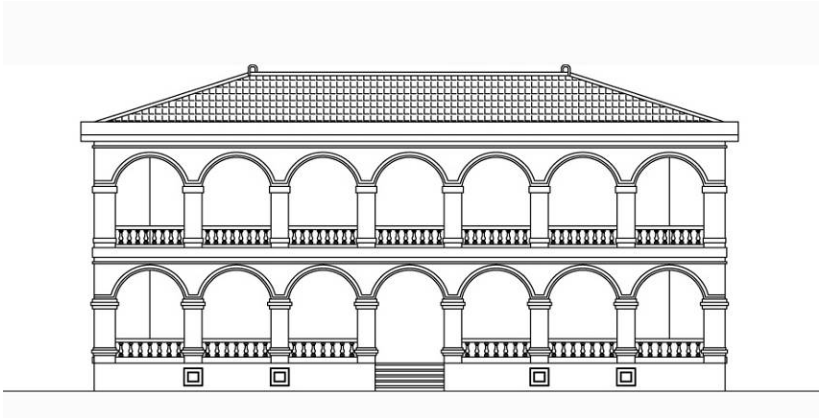


圖 5：經由實測重繪之達觀樓立面。



圖 6：目前成爲淡水重要景點「紅樓餐廳」的「達觀樓」。

原本，洪以南打算 1913 年的農曆三月朔日（新曆 4 月 7 日）舉行淡水新居所的喬遷。不過，到該年的 4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了「喬遷改期」的報導。究竟洪以南搬遷至淡水的時間爲何，雖然從報上的資料無法確認，但肯定是在該年的 4 月至 5 月之間最有可能。因爲在 1913 年 6 月 5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上，有篇在「詞林」專欄中署名爲「病癡　洪以南」的「別逸園寄懷諸友」詩作，描寫洪以南告別新北門街舊宅「逸園」，並對於淡水新邸，有「宜於此地老吾身」，以及「觀音吐霧峰積翠」這樣的描寫，因此似乎已經搬至淡水。

除了洪以南自己對於搬遷的感懷外，臺灣日日新報上也有詩友對於他遷居淡水之事的詩作，例如在 1913 年 7 月 4 日由潤菴生所做的「寄懷逸雅社兄卽次其徒居原韻」，其詩內寫道：「懷君■迹淡江濱。畫蘭日日發幽趣。種竹時時長清新。觀峰可望海可釣。況有佳鱗白如銀。」都已經清楚說明，洪以南已經搬遷至淡水之事。

洪以南在該年七月下旬有一趟日本行，因爲依照 1913 年 7 月 17 日台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瀛社諸友在 7 月 15 日聚會於艋舺林子楨的怡樓樓上，爲洪以南與黃君菊開送別會，共有十多人參加。此番洪以南之前往日本，主要是攜帶長男洪長庚入醫學校就讀，次男洪我鈞亦同行。當時，從小留學於日本的洪以南長子洪長庚，正好趁中學畢業的短暫假期歸台，因此台灣日日新報在 1913 年 4 月 11 日有篇「畢業榮歸」的報導，記載洪長庚於 1913 年 3 月從京都府立第五中學校畢業，於 4 月 9 日搭乘備後丸歸臺，預計停留至七月中再負笈回日繼續入醫學校就讀。因此，在洪以南舉家搬遷至淡水後，又立刻要攜子東上前往日本。這次前往東瀛，1913 年 7 月 17 日台灣日日新報刊載有洪以南發表之離愁詩作「余將東上瀛社諸友爲余祖餞於怡樓」。該詩云曰：「攜家重入海之東。留學歸甯趣不同。多謝鷗盟難忍別。一筵詩酒月明中。」

對於洪以南搬到淡水一事，除了瀛社諸友的離別感懷之外，在臺灣日日新報上，於 1913 年 10 月 28 日也有一篇「双祝喬遷」的報導，記載淡水地區在地民眾仕紳歡迎洪氏遷此之文。該報導寫明「洪以南黃東茂二氏，前後遷於滬尾，該地人士，莫不額手歡迎」。當時，爲了歡迎二位搬遷至淡水，地方人士設宴於天后宮慶祝二氏喬遷，與會者百餘人，乃一時之盛，描述了洪以南搬到淡水的地方歡慶宴會情形。

上述這些報紙報導或詩作，都說明洪以南趁著長子洪長庚短暫回臺的期間，將家從臺北城的新北門街搬到淡水之洋樓。因此，從時間判斷，搬家的時間以該年的 4 月至 5 月間最有可能。

「達觀樓」之名的出現

洪以南搬入的這棟二層紅磚洋樓，依照目前「淡水紅樓餐廳」網頁內的簡介

（http://www.redcastle-taiwan.com/21_story.html）云：「淡水紅樓建於 1899 年，是本地經營船頭行的富商李怡和建於清末的宅第。其建材多從中國引進，有別於其他外國人建的磚造洋樓，在建築上運用北投出產的哄哩岸石做為一樓內牆，二樓內牆及外觀牆面則運用不同形狀的清水紅磚做變化，是同時期洋樓建築所少見，然而李怡和並未在此久住，1913 年兩艘滿載貨物的自家船隻在淡水河口對撞沉沒，家道驟然中落，李家遂將紅樓售予秀才詩人洪以南。」此介紹中部分說明互相矛盾，因其建材若「多從中國引進」，則不可能在運用上又多以「北投出產的哄哩岸石做爲一樓內牆」。另二樓與外牆的紅磚，亦以臺灣產較可能，因在日本領有臺灣之後，「建材從中國引進」可能性很低。

洪以南搬遷至這棟淡水洋樓後，此樓名「達觀樓」旋即在該年出現於報端。雖有云此樓名可能爲李怡和所取，但洪家後人並未有此說法流傳。此外，在 1913 年 8 月 2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還有篇林子楨題名「達觀樓訪以南社兄賦呈卽次其別」之詩作，用以作爲「逸園懷諸友人瑤韻」。這篇詩文最重要的關鍵是，除了題目有寫到「達觀樓」，連詩內也寫及「達觀樓成招隱去」。很明顯地，該詩創作前此樓名已經取爲「達觀樓」。

洪以南在淡水的宅邸會稱作「達觀樓」，洪家家傳有個故事（洪以南女兒洪寬寬與洪彬彬在不同時間均口述此說法），是說有天臺灣總督來淡水視察，洪以南引領總督到樓中作客，並領至三樓樓頂眺望淡水景色。當時臺灣總督發現此樓位置絕佳，前可看淡水河景與觀音山，後可見大屯山，甚至整個淡水市街也都在目下，因此取名爲「達觀樓」，意指遠觀極佳之樓（見圖 7）。



圖 7：如今從達觀樓下望淡水河岸與觀音山景。

由於臺灣日日新報上出現「達觀樓」之名是 1913 年，據查當時擔任臺灣總督者爲佐久間左馬太（任職時間爲 1906.4.11.~1915.4.30.）。因其擔任總督時間相當久，達觀樓之名在 1913 年中便已經確定，因此傳說中替「達觀樓」取名的臺灣總督，從時間判斷只有佐久間一人是可能。但此說法比較有疑問者是，洪以南雖爲臺北廳參事，但搬到淡水初期並未擔任淡水區長（後之淡水街長）。如果總督來訪，是否真的會代表出迎，甚至引領至新宅頂樓攬勝都難以確認。不過，家

中有類似的傳言留下，卻也讓「達觀樓」之名多了一些傳奇軼事。

由於洪以南在 1913 年一搬到淡水洋樓內沒多久，此樓名「達觀樓」便已經出現於報上，取名之人似乎以洪以南自己本人的機會較大。但家傳的故事也相當可信，僅情節或許有些訛傳。亦即臺灣總督登樓遠望爲真，但取名者實爲洪以南本人。至於洪以南取此樓名爲「達觀」，想必內心該有雙關意義，除勉勵心境上的「達觀」之外，也取其便於觀望淡水河海風景之意。之前提到的林子楨題名「達觀樓訪以南社兄賦呈卽次其別」詩作，文末便以其自宅怡樓與達觀樓相比，曰：「怡樓堪怡。達觀信達。」達觀樓之名，似乎並未只是侷限於表象上的風景遠觀而已。

洪以南的「達觀樓」，與先前的新北門街住所「逸園」一樣，都曾作爲瀛社例會的舉辦地點，因此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往往可以看到詩文發表時以「達觀樓」入題名的例子。

例如 1913 年 9 月 23 日，臺灣日日新報上就有一連串以「達觀樓玩月」（庚韵）爲題之瀛社諸友詩作發表（該年中秋節爲新曆 9 月 15 日）。詩中提及「達觀秋色好，玩賞慰平生」、「樓外山海合，憑欄看月明」、「高樓望不極，看月若爲情，淡水連天碧，觀峰入檻明。徘徊終此夕，起舞對三更，吾亦達觀者，吟詩寄太情」、「倚檻八千里，橫空雁數聲，達觀樓上望，秋色若爲情」、「登樓爲玩月，寄興是怡情」、「達觀憑眺望，對月訂詩盟」……。因此，達觀樓在當時，可說是這些文人登樓觀月感懷寫詩之地。

此外，在 1916 年 3 月 3 日，洪以南與鄭永南詩友，還曾以「達觀樓即事聯句有序」爲題，一來一往共同創作並發表一篇漢詩（「以」表洪以南，「永」表鄭永南）：

達觀樓即事聯句有序 ⊙洪以南、鄭永南 (1916-03-03)

滿帆春雨淡江濃（永）。流水綠溪映遠峰（以）。
飲罷晚來晴更好（以）。澄光廟裡一聲鐘（永）。
白雲歸岫夕陽紅（以）。水色山光一望中（永）。
款乃歌聲歸棹念（永）。綠楊惆悵負東風（以）。
一江春水暮烟橫（永）。酒興濃時詩思清（以）。
合作平原遊十日（以）。陽關三疊不勝情（永）。
百載荷城跡未觀（以）。暮春重約共追歡（永）。
雲巖尚有無窮趣（永）。別緒難於舟上凝（以）。
欲聚雖難別更難（永）。因緣文字臭如蘭（以）。
巴山一夜三生幸（以）。剪燭西窓約後歡（永）。

春遊芳草地。夏賞綠荷池。正所謂及時行樂。人生幸事也。況節屆梅香雪白。豈可寂然閉戶自守乎。然不遊於晴。而遊於雨。高人舉止。亦俗眾所難知。永南詞兄等之來也。別有深意焉。茶前酒後。興嗟起興。因聯數截。以索春風之一笑。

洪以南在達觀樓內的居住情形

洪以南家族居住於淡水時，依照其女洪彬彬的口述回憶（二次口述訪談分別爲 2009 年 11 月 4 日與 2010 年 9 月 5 日），在元配陳宇卿過世後的達觀樓樓面分配狀況，從一樓正門進入爲大廳（有祭拜之神明、祖先牌位），左側爲三房林梅及其女兒居住的空間，右側後面則爲傭人居住之空間。至於廚房與飯廳，是在大廳的後面。二樓正中央前面是洪以南寫詩作畫的地方，也是他平常吃飯之處（因洪以南有糖尿病，所吃之飯食與其他家人分開特別煮）。二樓左側（靠近海口方向）最前面是洪以南的房間，第二間則是二房林愛君與其女兒們居住。二樓右邊最前面則是洪以南長子洪長庚的房間，右邊第二間則是洪長庚之妻洪盧乖與其兒女居住。至於二樓後面，一樣也是起居生活空間。

從這樣的房間配置可以看出，當時達觀樓雖然空間不大，但還是擠進不少妻子兒女。而此達觀樓最大之房間，也就是二樓面像淡水河的二間，分別是洪以南與洪長庚所使用，可見當時男女有別的男尊女卑狀況。

達觀樓當時的外觀是紅磚樣貌，因此才會一直有紅樓之稱。一樓內部的隔間爲石材，但二樓則是使用紅磚。一樓與二樓間的樓面係以木料製作，因此樓上樓下在有人行走時都會嘎嘎作響。至於三樓，只有沿著樓房外緣的一圈可以行走，屋頂爲斜屋頂並且覆瓦。

根據洪以南最後在世的女兒洪彬彬回憶，洪以南平時主要是講台語，也通北京話，至於日語雖不算流利但也可以通。當時家裡的人都很怕他，走在淡水街上更像是大人出巡，民眾都很敬畏。洪以南住在達觀樓二樓最靠近海口那一側的角落，二樓中間的大廳，是他寫詩作畫寫字的地方。洪彬彬記得，因爲洪以南的書法非常棒，全臺灣各地送來要求他題字的邀約不斷，很多中南部的朋友在收到他所贈的書法後，還會寄來一大堆的蔬果致謝，堆得家裡常常有吃不完的新鮮水果。她還記得，以前家裡就曾堆滿許多南部寄上來感謝致贈書法的西瓜，甚至到洪以南過世時，家裡都還堆著許多等他書寫的邀約。洪彬彬記得，洪以南常會宴請詩友到淡水達觀樓相聚（瀛社也有例會是在此舉辦），此時家裡就會開宴席，她們小孩子都躲在廚房裡面偷看，感覺很好玩，但都不敢跑出來吵鬧。由於達觀樓的前庭很大，不少詩友都聚集在那兒寫詩，直到天黑後才離開。依照 1918 年 6 月 21 日「台灣日日新報」上一系列以「逸雅詞兄達觀樓席上作」爲題的眾詩友創作發表可知，這便是一次洪以南邀約，在達觀樓席上的詩友集會。此次報上的詩作發表如下：

逸雅詞兄達觀樓席上作　　⊙雪漁
詞源倒峽門吟才。簫管聲停綺席開。
樓外青山山外水。雨餘清氣撲簾來。

同上次韵　　⊙湘　沅
戛玉敲金各逞才。主人愛客宴宏開。
老天亦似催詩興。為遣雷聲送雨來。

同上次韵　　⊙逸　雅
羨君倚馬盡高才。有句驚人茅塞開。
雨歇雲行山樹杪。迷茫又露數峰來。

同上次韵　　⊙純　甫
白也仙才賀鬼才。吟壇筆陣競先開。
雷聲驅使千峰雨。奔赴詩情腕下來。

同上次韵　　⊙子　禎
賢主風流太白才。情深潭水綺筵開。
群仙抗手詩無敵。愧我濫竽今又來。

淡水區長（街長）洪以南在淡水的足跡

洪以南在 1913 年中搬到淡水後，初期並未擔任公職，是到隔年秋才被任命爲淡水區長（後之淡水街長）。依照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記載，因原本的淡水區長趙秀山病故，當局在物色接任人選時，便考慮剛搬到淡水的洪以南，因此他是在 1914 年 9 月 25 日被任命兼任淡水區長一職（當時洪以南已任臺北廳參事），並於該日午後就任。而報上後續的報導也指出，洪以南擔任淡水區長的披露宴，是在 1914 年 10 月 10 日下午一時舉行。

洪以南擔任淡水區長後，開始積極地參與淡水的各項公共事物。記錄中，淡水郵便局落成（1917 年 5 月）、淡水區役場落成（1917 年 10 月）、淡水信用組合設立（1917 年 12 月）、淡水同風會附屬青年會成立（1921 年 2 月）……均與洪以南有關。

由於擔任淡水區長（街長）之故，當有總督府高官來淡水視察時，洪以南便需要陪同視察。當時常去的一個地點，是淡水的水源地。這地點之所以有參觀的價值，乃因淡水的自來水設施，於 1896 年 8 月開始施工建設，是臺灣設立自來水之濫觴。臺灣自來水的建置，替臺灣的公共衛生奠下重要基礎，而淡水水源地正是這個劃時代進步的象徵。例如洪以南於 1922 年 6 月 4 日陪同臺灣總督田健治郎視察淡水水源地時，便有留影留存（圖 8）。此外，洪以南於 1923 年 8 月 13 日視察淡水水源地時，亦有留影存世（圖 9）。在洪以南的詩作中，亦有與友同遊水源地後所作：

夏初同游淡水水源地即景
1918 年 7 月 16 日，台灣日日新報（以洪逸雅筆名發表）

一林疎雨鳥聲幽。聯袂登臨鎮日游。流水層岡雲霧外。風光四月淡於秋。
極目婆娑萬里流。海天風景望中收。漫山綠樹一泉水。滌盡胸懷無限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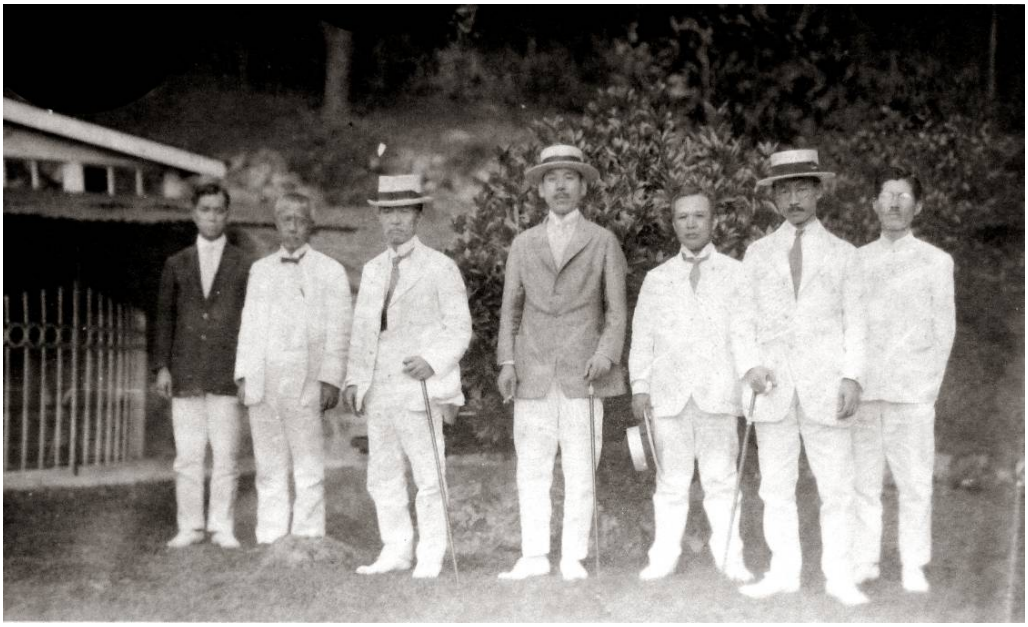


圖 8: 洪以南於 1922 年 6 月 4 日陪同臺灣總督田健治郎視察淡水水源地時之留影。本照片左起淡水街助役盧阿山、淡水街長洪以南、臺灣總督田健治郎、秘書官松田三德、淡水郡守藤代三九三、殖產局長喜多孝治 (另一名姓名未記載)。



圖 9: 洪以南 1923 年 8 月 13 日視察淡水水源地時所攝之留影。

洪以南在擔任區長（街長）時，區役場（街役場）的辦公廳舍前均掛著洪以南所題字的木牌，例如拍攝於 1923 年的合照，爲「淡水郡街庄事務講習會」的紀念攝影，高掛的「淡水街役場」字跡便相當明顯（圖 10）。



圖 10：洪以南於 1914 年 9 月接任淡水區長(後改爲淡水街長)。這張拍攝於 1923 年淡水街役場前的合照，爲「淡水郡街庄事務講習會」的紀念攝影。洪以南爲前排左起第四位，站於其後方的是淡水耆老周明德之父親周炳銘。

在 1918 年 6 月 21 日台灣日日新報上，也有一連串洪以南與眾友人在淡水區役場樓上所作的詩發表：

淡水區役場樓上作　　雪　漁
雷聲隱隱雨霏霏。此日江山景物非。
卻笑驚人雙燕子。樓中相對撲窗飛。

同上次韵　　湘　沅
雨師稅駕驕陽匿。世態炎涼瞥眼非。
漫道捲簾人去遠。開窗放出燕雙飛。
片晌清談玉屑霏。無端風雨景全非。
旌旗歷亂笙歌歇。露立雛鶯沒翅飛。

同上次韵　　純　甫
珠箔銀花似雪霏。新粧遇雨態全非。
遊廊無處堪迴避。貼地金蓮狼藉飛。

無端驟雨傾盆下。過眼繁華一霎非。
天地風雲常不測。幾疑海水又群飛。

同上次韵　　子　禎
黑雲密布雨絲霏。熱鬧場中景盡非。
蕭鼓旌旗都散亂。遙看天際片帆飛。

同上次韵　　逸　雅
暮雨無情斷續霏。雲山變幻霎時非。
知心卻有雙雛燕。也效鶺鴒比翼飛。

洪以南在 1925 年 5 月卸任淡水街長，隔年三月更辭淡水信用組合長一職後，可說無事一身輕。不過，在洪以南的晚年，擔任淡水福佑宮管理時，於 1927 年春倡議並帶頭捐資重修福佑宮，讓幾乎已經傾圮的福佑宮煥然一新，至今仍爲老淡水人津津樂道。

洪以南的過世相當突然，依照其女洪彬彬的描述，當年她只有十一歲，仍記得那年（1927 年）洪以南女寬寬與黃炎生於臺灣神社舉行婚禮時（日期爲 4 月 3 日），身體尚佳。不過婚禮後沒多久就開始生病，依照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記載，5 月 2 日時洪以南因生腦後疽入臺北醫院治療，施手術，住於外科病房二室，但旋即於 5 月 14 日午前十二時五十七分仙逝。這時，剛結婚隨夫婿前往日本的女兒寬寬，立刻急急忙忙地又趕回臺灣。洪以南的告別式在該年 7 月 8 日午後二時於淡水龍山寺舉行。二十世紀初的臺灣一代漢詩人，就此殞落。

洪以南過世後的達觀樓變遷

在洪以南於 1927 年 5 月 14 日過世時，從小留學日本的長子洪長庚已經完成博士論文且審查中，因此當時洪長庚是居住於淡水，但其眼科醫院並未開業。洪長庚在 1928 年 1 月 28 日經東京大學醫學部通過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報上並且報導近期將於大稻埕一帶開業。

由於洪長庚打算購買位於大稻埕一帶之土地興建眼科醫院，因此在獲得博士學位到該醫院建築完工之間，全家族仍住於淡水。達觀眼科醫院的開業披露式是在蓬萊閣舉行，時間是 1929 年 3 月 16 日，但其實洪長庚舉家在此之前，已經搬離淡水達觀樓。因爲依照洪以南女兒洪彬彬的回憶，她小時候是在淡水念國小，大概小學五年級才搬至大稻埕圓環旁居住，因此改念蓬萊。查閱蓬萊國小現存的畢業記錄，洪彬彬是第十八屆於 1929 年 3 月畢業，因此推測在這之前的 1928 年，也就是洪以南過世、洪長庚獲得博士學位歸國後，舉家便已經從淡水搬至臺北大

稻埕。

洪長庚搬離淡水到大稻埕時，達觀樓的宅邸與產權並未脫手，而是借給長老教會之郭青年一家人居住，並且代爲管理。依照一張拍攝於 1949 年的歷史照片（圖 11），可以看出當時的達觀樓在三樓頂靠近海口的前方，有一煙囪的增建，但此時尚未有防空警報塔的興建。不過，洪長庚之子洪達雄在 1956-57 年間的畫作中（圖 12），已經清楚且寫實地描繪出警報塔的樣貌，其造型類似鐵塔上面搭建一個鳥窩小木屋的形狀。

在洪長庚舉家搬到臺北大稻埕之後，達觀樓就一直託給郭青年一家人照顧，直到民國五十多年，此樓賣給現紅樓經營者之祖母洪許俸一家，並經整修拆卸原有斜屋頂改爲平頂，外觀抹以混凝土改成黃顏色（圖 13），繼續居住至大約民國七十年代有意改建爲止。當時洪許俸一家居於二樓，一樓則分隔成數個房間出租給附近淡江大學等學校之學生居住，因此不少當時的淡江學子都有在這棟老洋樓內住過的求學經驗。



圖 11：戰後初期所見的淡水，可見左方的白樓與最高點的達觀樓。本圖取自 LIFE 圖庫。



圖 12：洪以南之孫洪達雄在 1956-57 年間的畫作中，清楚且寫實地描繪出警報塔的樣貌，其造型類似鐵塔上面搭建一個鳥窩小木屋的形狀。



圖 13：在 1990 年代時，達觀樓無人居住時之狀況。

結語

洪以南從 1913 年搬至淡水，至 1927 年過世，雖然只在淡水居住了約十四年，但因其交友廣闊，爲人又熱心公益，擔任淡水街長時更一手參與淡水信用組合的成立，在淡水的近代歷史上留下了名聲。而他在淡水的宅邸達觀樓，也因爲洪以南的居住而成爲文人聚集的場所。如今，除了當年詩友所留下的詩作讓達觀樓的文風得以爲後人一窺樣貌外，透過洪以南女兒洪彬彬的口述，本文也間接重建當年洪以南居住時達觀樓的樣貌，讓今人在造訪淡水紅樓時，亦能遙想將近百年前文人雅士聚集飲酒作詩的風雅情調。

謝誌

本文作者爲洪以南之曾孫，此研究得以完成，作者感謝曾祖父洪以南留下如此多的漢詩創作與生平素材，也特別感謝他與先祖洪騰雲在研究上的協助。此外，本文完成亦感謝洪以南女兒洪彬彬接受數次口述訪談，讓後人得以一窺當年達觀樓之樣貌。本研究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台灣研究」計劃資助下所完成，特此感謝。

參考文獻

卞鳳奎（2009）洪以南對新思潮受容之探討，臺北文獻，167: 239-258

洪致文（2010）臺灣漢詩人洪以南的現代文明旅遊足跡，師大地理系，172 頁

洪啓宗（2009）從家傳文獻看洪以南的交友關係，臺北文獻，166: 183-204

高傳棋（2009）1949 年薇閣詩社所舉辦之「秋夜宴劍潭山」與百年來瀛社聚會場所的

時空之旅，臺北文獻，166: 161-180

黃美娥與陳盈達（2009）百年吟聲，風雅柢柱：瀛社百年活動簡史，臺北文獻，166: 25-92

初探淡水古蹟博物館之組織與功能

周宗賢[*]　王韻涵[**]

摘要

淡水的古蹟、歷史建築及其他街區、聚落，豐富了淡水的文化資產，而淡水的觀光人潮也帶動了淡水在地觀光資源的發展。大部分民眾知道淡水歷史悠久、文化資產豐富，但對於淡水有座博物館或許不甚了解，甚至該博物館位於淡水何處？隸屬於公部門哪個單位？辦理哪些業務？等，更是不解。

近6年來(民國94年至今)，由於臺北縣政府對淡水施政發展的積極與重視，「淡水古蹟博物館」配合「淡水河口藝遊網」北區旗艦計畫，規劃與執行相關子計畫，並與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淡水鎮公所等共同協辦執行，淡水的城鎮發展、地貌景象於近幾年有著快速的變化。淡水的改變與發展，對淡水而言是喜是憂？「淡水古蹟博物館」所扮演角色及單位功能爲何？其影響性又爲何？

本文乃針對「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組織」與「功能」進行研究，探討其成立過程、組織編制與營運發展的功能面向。另外，接續百年北縣升格直轄市，淡水鎮升格爲新北市淡水區，公部門（政府機關）將如何因應與準備？亦是本文所探討的內容。

關鍵詞：

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淡水河口藝遊網北區旗艦計畫、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淡水鎮公所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專任教授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淡水因擁有特殊的人文歷史背景和幽美的地理景觀，向來是週末假日充滿人潮的觀光勝地。大部分民眾知道淡水歷史悠久、文化資產豐富，但對於淡水有座博物館或許不甚了解，甚至該博物館位於淡水何處？隸屬於公部門哪個單位？辦理哪些業務？等，更是不解。

淡水古蹟博物館、鶯歌陶瓷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黃金博物館、國定古蹟林本源園邸等，皆屬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四館一園」[684]的博物館家族，前四館屬臺北縣政府文化局轄下二級獨立單位，後一園則由臺北縣政府文化局一文化資產科直接管理，該「四館一園」的博物館家族（詳【表 1】），其相關政令宣導活動、旅展、節慶與優惠活動等，皆經由臺北縣政府文化局統整與監督，並同步配合規劃、設計與辦理。

「淡水古蹟博物館」，於民國 94 年 11 月 10 日開館營運，為臺灣首座以古蹟為特色的博物館，以大淡水為一園區的概念，就近看管維護 25 處古蹟和 2 處歷史建築，辦理相關古蹟研究、修復、再利用，以及推廣古蹟教育、文化資源整合等業務，目前行政中心位於淡水紅毛城，其餘開放營運中的古蹟點（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滬尾砲台）亦設有行政辦公室，另配合淡水城鎮發展與臺北縣政府重要施政計劃，亦設有藝術村籌備處之行政辦公室，辦理專案之評估、規劃與執行等業務。

【表 1】文化局「四館一園」比較表

館名	位置	開館時間	館區型態	特色	任務
鶯歌陶瓷博物館	鶯歌	89/11/26	一名一館	以陶瓷為主題	推廣鶯歌陶瓷工藝發展，成為臺灣和國際陶瓷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十三行博物館	八里	92/04/24	一名一館	以考古為主題	以國際交流推動專業考古議題研究，並發展博物館周邊文化觀光發展計畫。
黃金博物館	瑞芳	93/11/04	一名多館	以環境保存為主題	完整保存金瓜石地區珍貴的自然、礦業、建築遺跡及人文資產，並賦予新生命。
淡水古蹟博物館	淡水	94/11/10	一名多館	以古蹟為主題	管理維護淡水相關古蹟，推廣古蹟教育，配合執行重要施政計劃。
林本源園邸	板橋	90/08	一名一館	以園林建築為主題	保存園邸建築，提供園邸歷史、景點導賞及人文情報。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2010 年 5 月 4 日。

[684] 周錫瑋發行，《臺北縣文化白皮書》（板橋市：臺北縣政府，2009），頁 35。

臺北縣擁有廣大幅員的自然生態及人文歷史資源，許多博物館、美術館、紀念館、文物館、生態園區與博物園區等地方文化館相繼成立，各地方文化館表達著該地區濃厚的歷史人文特色與獨特的城市魅力，也展現了文化的內涵與風貌，以及不朽的生命力。淡水的「古蹟博物館」亦是如此，打破博物館實體建築的概念，並非真有一座博物館名爲古蹟博物館，而是以整個大淡水視爲一座博物館，相關古蹟群、歷史建築、街區、聚落等文化資產是其珍貴的典藏，博物館的研究、蒐藏、展示、教育等功能業務，皆以「古蹟」爲前提與基準，多處的古蹟空間，影響了各面向的操作，使得古蹟博物館的經營，相較於一般博物館更具難度，且有較多的限制與考量，也因此成爲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特色，並具有其研究價值！

近6年來(民國94年至今)，由於臺北縣政府對淡水施政發展的積極與重視，包含淡水的交通、觀光、文化資產等，皆有重要計畫之規劃與執行。淡水的「古蹟」從民國92年至民國98年間，由18處[685]新增爲25處[686]；「歷史建築」從民國92年至民國96年間，由1處[687]新增爲2處[688]；「紀念性建築」亦於民國98年新增2處[689]。淡水古蹟博物館屬臺北縣政府文化局轄下二級單位，配合「淡水河口藝遊網」北區旗艦計畫，規劃與執行該計畫之相關子計畫，並與臺北縣政府城鄉局、淡水鎮公所等單位共同協辦執行。

欣逢學校舉辦第五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迺與周宗賢老師擬就「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組織」與「功能」進行研究，探討其成立過程、組織編制與營運發展的功能面向。另外，接續百年北縣升格直轄市，淡水鎮升格爲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古蹟博物館如何因應與準備？亦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淡水古蹟博物館」雖然祇是一個地區性的博物館，成立以來的時間也不長，但是，作爲一處位在歷史悠久、人文斐粹的淡水，且仍在成長中的博物館而言，本文疏漏不足之處必多，尚請諸先進多多指正爲禱。

---

685 18處古蹟為：民國72年公告之淡水紅毛城；民國74年公告之鄧山寺（汀州會館）、理學堂大書院、滬尾砲臺、淡水龍山寺、淡水福佑宮、馬偕墓；民國86年公告之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小白宮）；民國87年公告之淡水外僑墓園、淡水禮拜堂、滬尾偕醫館、滬尾湖南勇古墓；民國89年公告之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淡水海關碼頭、淡水氣候觀測所、淡水水上機場；民國91年公告之關渡媽祖石、淡水公司田溪橋遺蹟等。

686 25處古蹟為：除註1所述18處古蹟外，另新增7處古蹟，包含民國93年公告之滬尾水道、民國94年公告之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淡水崎仔頂施家古厝；民國95年公告之滬尾小學校禮堂；民國97年公告之淡水日商中野宅；民國98年公告之淡水重建街14號街屋、淡水重建街16號街屋等。

687 1處歷史建築為：民國92年公告之公司田溪程氏古厝。

688 2處歷史建築為：除註3所述1處歷史建築外，另新增1處歷史建築，為民國96年公告之日本警官宿舍。

689 2處紀念性建築為：民國98年配合淡水河口藝遊網北區旗鑑計畫之子計畫－「打造淡水藝術大街」工程，為保留具有歷史價值之「五連棟」（尚未正名）及「國語禮拜堂（尚未正名）」，暫依建築法第99條1項1款規定列為紀念性建築物，以進行調查研究、規劃設計、修復及再利用，日後提報審查通過後將可能列為古蹟。

二、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組織

(一)淡水設置古蹟博物館的意義

1、淡水古蹟園區的設置背景

淡水因歷史文化之緣由，擁有多元而豐富的文化資產，臺北縣目前已指定與登錄之有形文化資產共計 87 處，其中淡水即包含了 4 處國定古蹟、21 處縣定古蹟及 2 處歷史建築，約占全臺北縣有形文化資產的 31%，爲全臺北縣之冠，淡水文化資料保存業務執行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並於 2000 年經文建會於匯聚多方意見，將淡水紅毛城列爲國內 11 處世界人文遺產潛力點之一，此項殊榮亦讓淡水成爲保存文化資產的重鎮。

文化資產保存爲臺北縣政府文化局主管業務，惟臺北縣於 29 個鄉鎮下擁有多處古蹟，不僅行政管理幅員遼闊，於眾多文化資產資源下，其管理維護及業務推廣之人力更顯不足。

淡水眾多的古蹟與豐沛的地方資源，除了印證淡水的歷史文化悠久，更顯露出在地人士對地方環境的關心與文史研究的活躍。「滬尾文教促進會」是近代淡水在地文史工作的開端，因關心生活空間及爲阻止淡水環河快速道路一案而成立，並走入社區、廣結地方資源、舉辦各項文化活動，雖於 1988 年因故解散，但日後淡水的在地文史運動卻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展開。1990 年，「淡水文史田野工作室」、「滬尾文史工作室」、「淡水社區工作室」成立，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推廣古蹟解說導覽，推動社區營造、空間規劃及相關調查研究等。1995 年，「淡水文化基金會」、「淡水老街發展協進會」成立，結合地方政商推動社區文化活動，並積極參與中正路造街活動。1996 年，「山河工作室」、「淡水老街商圈聯誼會」成立，協助老街規劃諮詢，並致力於商圈服務品質的提昇。1998 年，「搶救淡水河行動聯盟」組成，反對沿河快速道路的興建。1999 年，「臺北縣河川生態保育協會」組成，推動生態保育與社區教育。2000 年，「桂竹文史研究室」成立，進行社區營造、地方人文自然生態資源之訪查紀錄與整理，以凝聚在地公民意識。2001 年，「淡水社區大學」成立，以踏入社區、參與社區營造及居民終身學習爲理念而經營。[690]這群長期關心淡水文化資產的夥伴，除了於文史田野調查、古蹟管理維護具有專業素養外，更成功搶救了幾處有形文化資料並指定爲古蹟，而其因研究領域不同所產生的意見表達與對文化政策積極催促的反應，亦是影響淡水古蹟園區設置並促成的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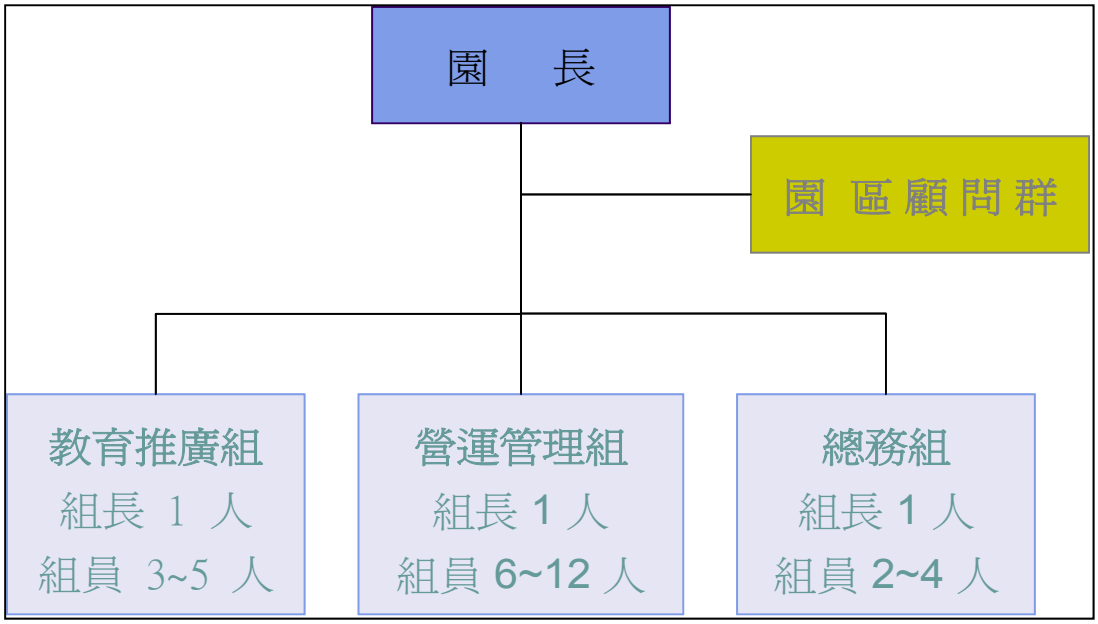
2003 年 7 月，淡水紅毛城由「內政部」移交「臺北縣政府」管理，於

[690] 張寶釧，《以淡水古蹟博物館經營做為地方發展觸媒之研究》，中原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碩論，2008 年 7 月，頁 34-35。

前置籌備階段，如何將淡水的自然景觀、歷史文化、地方力量、便捷交通、學術專業等資源整合，並兼顧地方文化發展策略，同時讓淡水在觀光發展上有新作爲，且解決當時政府組織結構上的人事凍結等問題，也是淡水古蹟園區設置促成的重要因素。[691]

2、淡水古蹟園區的設置

2003 年 2 月 1 日，臺北縣政府文化局正式以「任務編組」方式成立「淡水古蹟園區」，設置於「文化資產課」之下，並借調淡水鄧公國小總務主任張寶釧擔任園長，以及教師林延霞單任營運管理組組長，初期工作人員僅 2 名，並以該校教室爲辦公室。2003 年 7 月 26 日，淡水紅毛城正式移交，同時交接內政部移撥約聘僱人員 9 名及工作人員 10 名，辦公室亦從學校移至淡水紅毛城，當時園區組織架構如【圖 1】[692]。



【圖 1】淡水古蹟園區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淡水古蹟園區營運簡報，創園館長張寶釧提供。

至是，淡水古蹟園區以紅毛城爲行政、資訊中心，主要經營紅毛城、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官邸（簡稱小白宮）、滬尾砲台 3 處古蹟點之對外開放與營運，並整合當時淡水的 18 處古蹟資源[693]，透過在地文化基礎，建構完善的服務網絡，務期提供民眾優質的文化觀光環境，園區發展方向見【圖 2】。營運管理的重點，爲古蹟開放的配套設施規劃，如指標系統、路線規劃、公共設施、與民間管理古蹟點的串連規劃等，並發售門票，增加府庫歲入；另發

691 筆者採訪紀錄，＜現任館長唐連成口述紀錄＞，2010 年 4 月 30 日，地點：淡水紅毛城簡報室。

692 筆者採訪紀錄，＜首任館長張寶釧口述紀錄＞，2010 年 6 月 14 日，地點：住宅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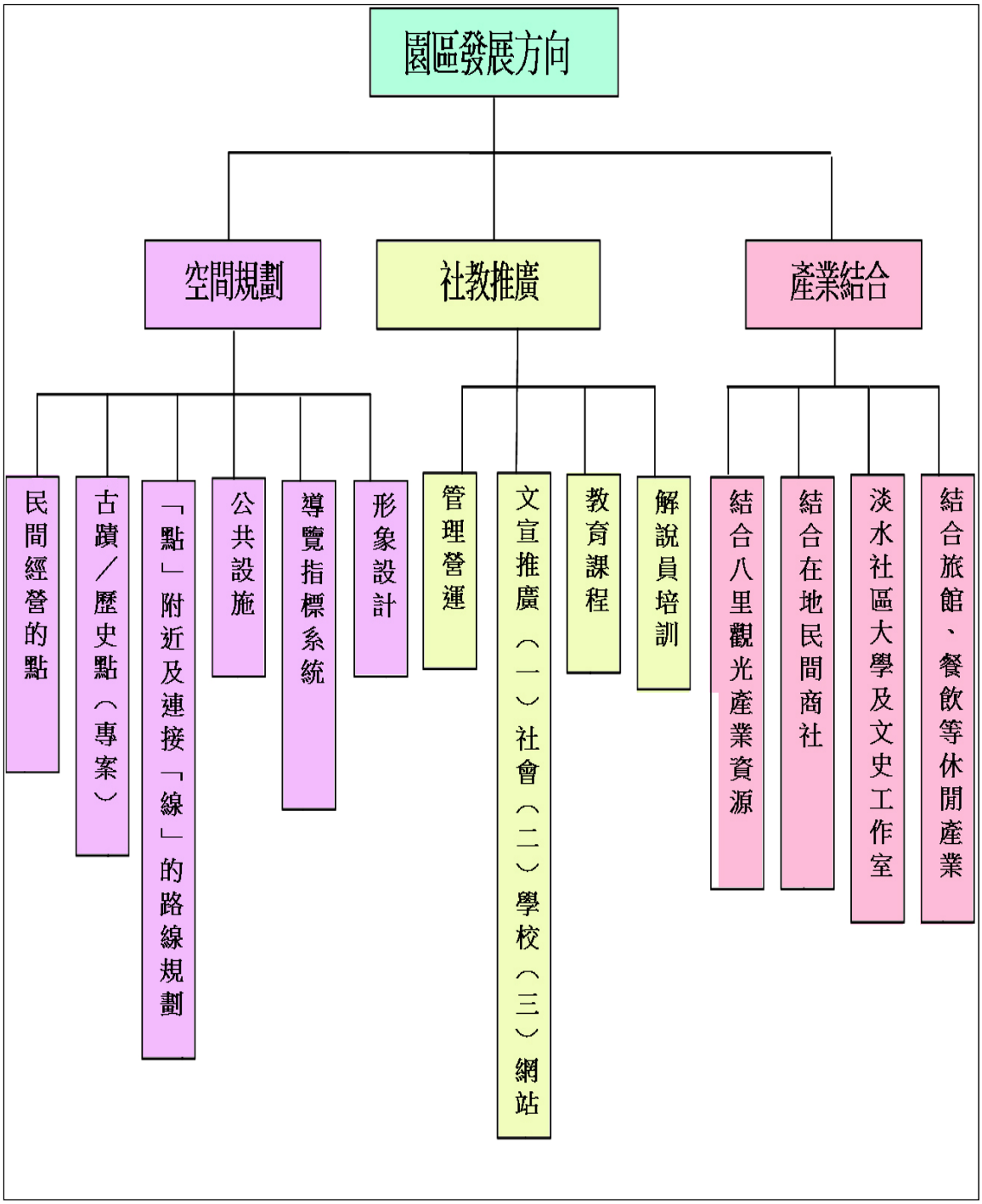
693 18 處古蹟為：紅毛城、滬尾砲台、鄧山寺、理學堂大書院、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官邸、福佑宮、龍山寺、馬偕墓園、偕醫館、禮拜堂、外僑墓園、滬尾湖南勇古墓、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水上機場、氣象觀測所、海關碼頭、關渡媽祖石、公司田橋遺址。

展園區特色周邊商品、園區書籍等，做爲販售之紀念品。教育推廣的重點，爲培訓單點、套裝導覽人員，以解說現有之古蹟；透過文宣、資訊宣導及藝文活動等，帶動民眾參與觀光；將現有古蹟分所在區塊、呈現性質，搭配淡水產業、自然景觀做遊行程規劃建議；並結合淡水多元產業，舉辦戶外展演活動，串連周邊觀光資源。

3、淡水設置古蹟博物館的意義

淡水古蹟園區的成立，不僅象徵著政府落實古蹟管理的作爲，更從過去公務系統單向指示的思維，轉換成對等的、在地的、服務的、文化接待的新意圖，爲一「在地管理」的維護機制。

由【圖 2】園區發展方向架構可發現，淡水古蹟園區成立最重要的使命，在於將已指定的古蹟妥善管理與維護，並進行其他有形、無形文化資產的資源調查與串聯。其次，爲以近代博物館的營運管理方法，從事營運管理、教育推廣、行銷企劃以等相關事務，以淡水古蹟園區而言，透過古蹟空間的開放與閒置空間的再利用，營造出古蹟空間的新生命；經由社區營造，建立與地方互動、社區參與，以及古蹟與生活關係的連結；藉由都市發展及企業行銷的概念規劃經營，融入更多創意與新觀念的，展現出老空間的新氣象；藉著古蹟教育的推動，發掘歷史的脈絡並傳承淡水的文化生命與歷程。即以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爲終極任務，其後始進行古蹟文化推廣的推行策略。



【圖 2】園區發展方向架構圖

資料來源：淡水古蹟園區營運副縣長蒞園簡報，創園館長張寶釧提供，筆者以色彩區隔。

(二)單位名稱的轉變與升格

1、單位名稱的轉變

淡水古蹟園區經過 3 年的經營，臺北縣政府將原先的「任務編組」提昇至正式編制，屬縣政府文化局之下二級獨立機關，「淡水古蹟園區」更名爲

「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將單位立案於教育部之下。[694]

博物館運用「生態博物館」的概念進行整體規劃與運作，但因名稱定位爲博物館，使洽公或遊憩之民眾造成混淆與誤解，爲讓參訪淡水的國際人士能夠容易辨識與定位，英文名稱經過許多專家學者的討論，最後慎重定名爲「Tamsui Historic Sites, Taipei County」，「Tamsui」取其爲淡水的古字發音，「Historic Sites」則取其以歷史及古蹟建築爲主的園區經營概念。[695]

生態博物館的理念，於 1970 年代法國學運之後，由法國希微賀[696](Georges Henri Riviere)和瓦西納(Hugues de Varine)兩位博物館學家先後提出了「博物館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 of museums)的觀念，認爲博物館應該走向民間，而不應是中央集權下的產物。即言，博物館不應該只侷限在一個有形的建築物內，而應是以科技整合和社區參與的方式呈現該地理區域的「集體記憶」，博物館不應爲純粹提供學術研究與成果，該無明顯展示界限的大地區範圍，也可以執行傳統博物館之收藏、研究、展示和教育功能。[697]

因此，「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經營管理，秉持大淡水整體規劃的概念：其典藏除了古蹟建築主體外，尚包含淡水的地理區域景觀、聚落、自然生態、歷史遺址等；其營運基礎，建立在整個淡水的自然或人文資產；其發展策略及目標，是以淡水多面向整合與社區參與方式，呈現在地的集體記憶；其服務對象，則不限於來館觀眾，尚包含社區族群、遊客及其未來世代的子孫。

2、淡水古蹟博物館的成立與運作

2005 年 7 月 1 日，園區正式獨立爲二級機關，同年 11 月 10 日重新對外開放【圖 3~5】。相較於淡水古蹟園區時期，擁有了獨立收發公文、獨立派用人員、獨立編列年度預算，以及獨立裁決的職權與職責。[698]

---

694 筆者採訪紀錄，＜首任館長張寶釧口述紀錄＞，2010 年 6 月 14 日，地點：住宅處。

695 筆者採訪紀錄，＜首任館長張寶釧口述紀錄＞，2010 年 6 月 14 日，地點：住宅處。

696 依據希微賀的說法：「生態博物館(Eco-museums)是由公共部門(地方政府)與地方居民共同孕育、形塑及運作的工具，地方博物館提供館員、設備及資源，地方人民則展現其抱負、知識及個人力量，所以生態博物館是地方人民關照自己的一面鏡子，用來發現自我的形象，尋求對生活所在的領域中，不論自然或人文的遺產，以及住在此領域的先民生活的解釋；同時也是一面能讓參觀者拿著以深入瞭解當地產業、習俗、特性的鏡子。」(Riviere, G. H.,1985)，摘錄至張譽騰，＜「生態博物館式」的社區觀光規劃＞，《博物館學季刊》第 10 卷第 1 期，(台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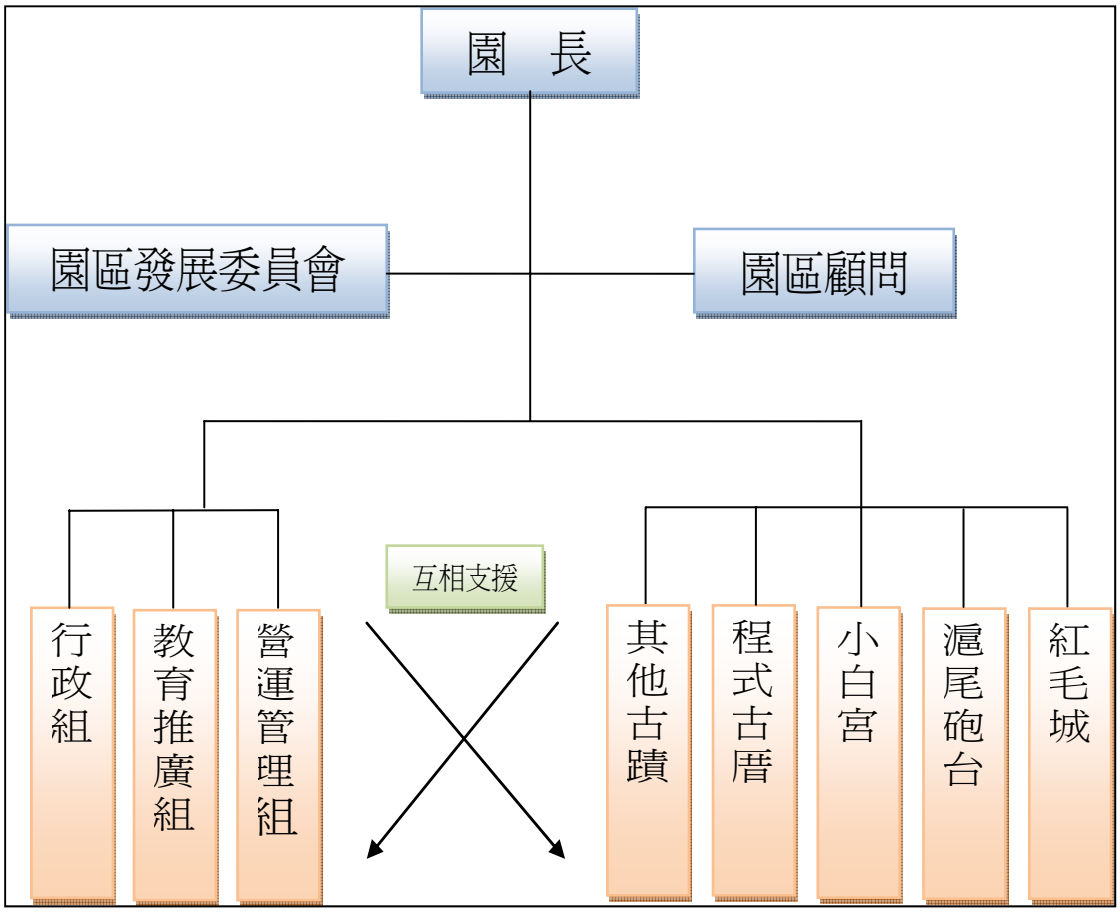
697 張譽騰，＜「生態博物館式」的社區觀光規劃＞，《博物館學季刊》第 10 卷第 1 期，(台中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1996)

698 筆者採訪紀錄，＜首任館長張寶釧口述紀錄＞，2010 年 6 月 14 日，地點：住宅處。



資料來源：首任館長張寶釧提供。

成立初期，組織架構簡單【圖 6】，正式編制人員僅 10 名，其餘加上內政部移撥的約聘僱人員 11 名，以及臺北縣政府文化局設置臨時人員 2 名，合計 23 位博物館同仁。當時的組織規程中，行政業務職掌【表 2】及公務人員進用類型有明確的規範，而行政業務外之導覽、諮詢、駐點、售票及巡視等工作，屬第一線之服務工作，其真正面對遊客，服務態度、儀態為首要課題，應變能力與基本應對教育也是重要培訓重點，概由營運管理組依工作性質與資源條件調派與教育。



【圖 6】淡水古蹟博物館原規劃組織架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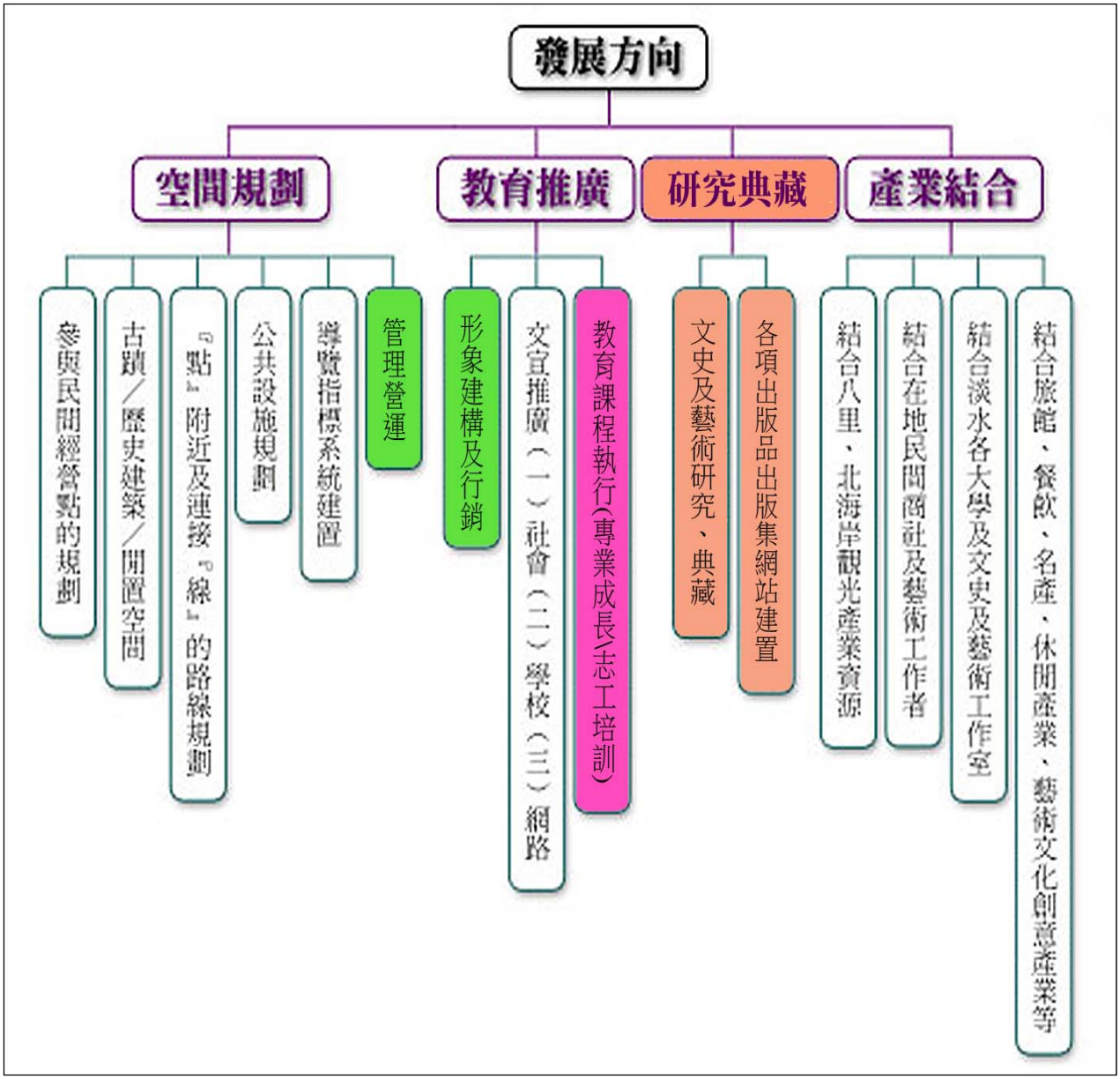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首任館長張寶釧提供。

【表 2】淡水古蹟博物館成立初期工作職掌

職稱	工作職掌	編列人員
館長	1、綜理統籌古蹟博物館所有事物，並爲機關代表人。 2、淡水古蹟博物館發展計畫擬定、執行、檢討。	1 名
園區顧問 (二年一聘)	1、不支薪的聘任制，擔任諮詢、顧問角色協助博物館館務發展事宜。 2、顧問群內含：古蹟專業、文史專業、教育專業、企管專業、法律專業、藝術專業各一人。	6 名
營運管理組	1、規劃博物館經營事宜及各點經營運作。 2、策劃及檢視園區安全維護、環境整潔、綠美化事宜。 3、負責接待園區貴賓及解說工作。 4、各古蹟點參訪秩序控管。 5、處理民眾陳情及偶發事件。 6、入園人數統計、分析及登錄。 7、票務及周邊商家管理。 8、成立危機處理小組，處理園區偶發重大事件。 9、博物館人事差勤管理、加班、補休、輪值等工作。 10、志工管理編組及其他相關事宜。 11、古蹟點解說及培訓解說員。 12、其他上級交辦事務。	組長 1 名 組員 13 名
教育推廣組	1、古蹟博物館文化行銷、活動策劃及執行。 2、教育推廣活動內含網站建置維護、員工及志工教育訓練、各古蹟點學習步道規劃、各景點行程規劃等。 3、簡介、學習單、遊園護照規劃、紀念品規劃、執行等事宜。 4、結合教育、文史單位辦理古蹟研究及文史資料收集。 5、博物館內文物清理、典藏及研究。 6、博物館圖書、資料登錄、編目管理。 7、博物館相關出版、企劃執行、出刊等事宜。 8、其他上級交辦事務。	組長 1 名 組員 3 名
行政組	1、博物館建築物管理及維修工作。 2、博物館財產相關業務(含登錄、增設、報廢)。 3、博物館各點機電管理與維護。 4、博物館出納、會計業務。 5、門票庫存及繳庫，登帳及統計事務。 6、博物館公文檔案管理、收發及傳遞。 7、博物館小額採購事宜。 8、博物館預算執行及管控。 9、委外廠商管理。 10、各項招標作業及招標事宜。 11、其他上級交辦事務。	組長 1 名 組員 3 名
備註	正式編制 10 名、約聘僱 11 名，臨時人員 2 名。	

資料來源：首任館長張寶釧提供。

淡水古蹟博物館以紅毛城行政中心辦公室爲園區的行政、資訊中心，經營紅毛城、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官邸（簡稱小白宮）、滬尾砲台 3 處古蹟點之對外開放與營運，整合當時淡水的 21 處古蹟及 1 處歷史建築等資源[699]，透過在地文化基礎與文化資源，建構更完善的服務網絡，務期提供民眾優質的文化觀光環境，當時古蹟博物館經營執行方向見【圖 7】。



【圖 7】古蹟博物館成立初期經營執行方向

資料來源：張寶釧，《以淡水古蹟博物館經營做爲地方發展觸媒之研究》，中原大學文化資產研究所碩論，2008 年 7 月，頁 52。

[699] 21 處古蹟及 1 處歷史建築為：紅毛城、滬尾砲台、鄞山寺、理學堂大書院、前清淡水總稅務司官邸、福佑宮、龍山寺、馬偕墓園、偕醫館、禮拜堂、外僑墓園、滬尾湖南勇古墓、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水上機場、氣象觀測所、海關碼頭、關渡媽祖石、公司田橋遺址、滬尾水道、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淡水崎仔頂施家古厝及歷史建築公司田溪程氏古厝。

相較於古蹟園區時期的發展方向【圖 2】，有三項調整：其一、執行方向除了原有空間規劃、教育(社教)推廣、產業結合外，新增了「研究典藏」的執行，代表博物館對典藏研究業務的開始重視。除了進行相關文史資料研究彙整以及典藏相關業務，並規劃出版品類型、項目、數量與發行時間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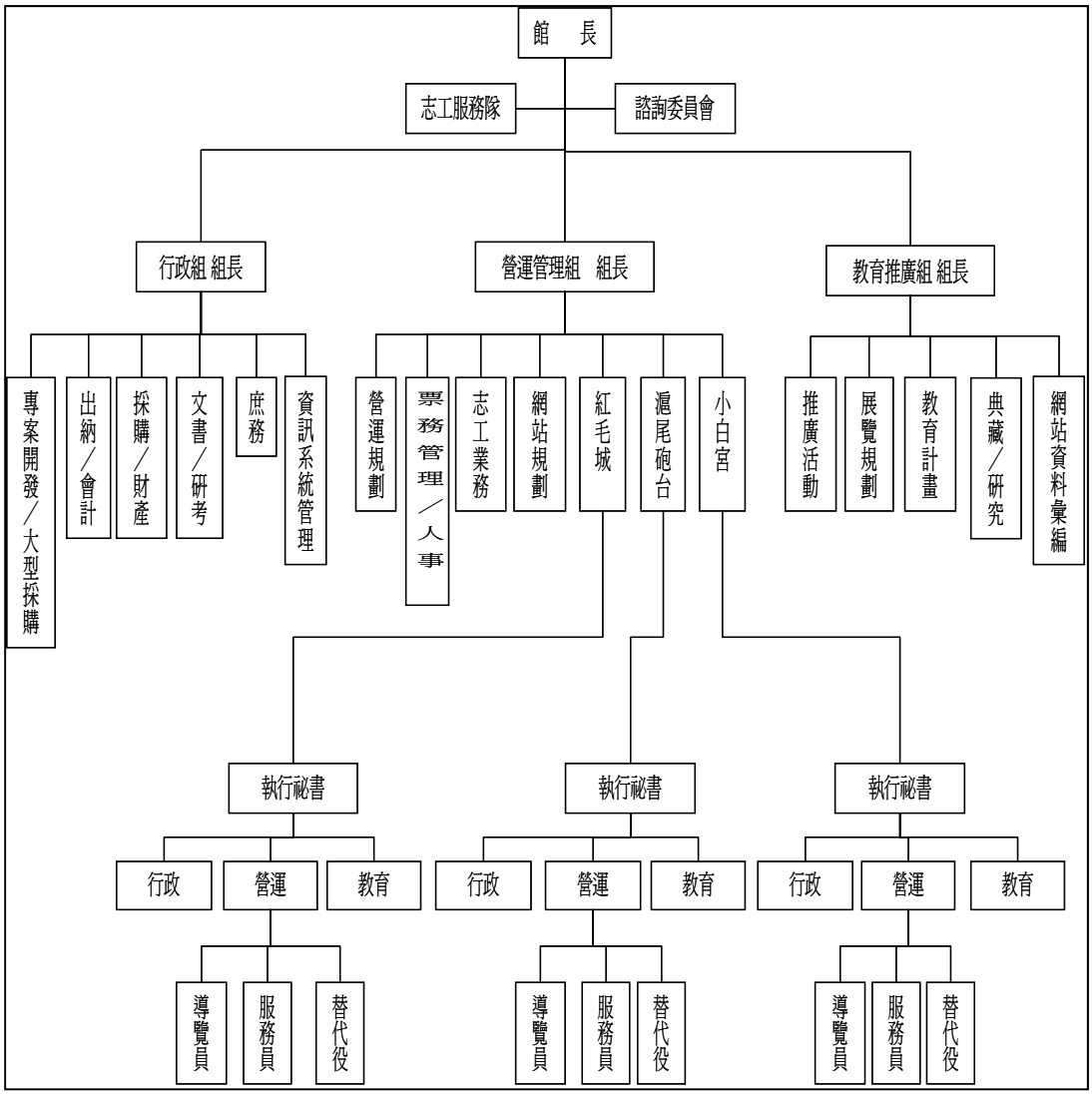
其二、爲「管理營運」由教育(社教)推廣變更爲空間規劃之執行項目、「形象設計」由空間規劃變更爲教育(社教)推廣之執行項目，並更改爲「形象建構及行銷」，此代表的意涵爲古蹟博物館的分組業務漸趨穩定與定型。「營運管理」之相關業務，屬第一線的門面印象、服務品質與溝通管道，規劃改善與更精進的方向，應由下而上以參訪者角度爲之，此與空間規劃所產生的效果息息相關。而「形象建構及行銷」屬博物館形象的行銷與推廣，相關 LOGO、名片、商品、文宣品、發行物、推廣品等之設計與行銷，非屬第一線與參訪者之接觸，於現階段爲教育(社教)推廣之業務範圍。

其三、教育(社教)推廣的執行項目，已刪除「解說員培訓」之項目，並於中「教育課程執行」中納入「專業成長與志工培訓」之元素，此亦反應出古蹟博物館的組織架構漸趨完整。蓋博物館中，無論是行政人員或是解說員，皆應隨著服務時間的增加而有專業的成長，充實博物館、古蹟教育、淡水文史等相關之內涵，服務人員若觀念不一或概念落差過大，將影響博物館未來的發展與精進；而導覽員若內容說法不一，將影響博物館的專業形象。另志工的加入是博物館往前邁進的一大步，亦是社區投入與參與的象徵，博物館志工背景的不同，爲博物館帶來各領域的社會資源與協力，於人力支援上頗有助益，並與導覽員有相互交流之效益。

(三)組織編制的擴編與轉型

1、組織編制的擴編

淡水古蹟博物館自 2005 至 2010 年營運期間，組織架構與營運模式大致定型【圖 8】，並因業務量漸增，組織編制有擴編的傾向。起初，館長之下設置行政組、營運管理組、教育推廣組等 3 組，綜理相關行政業務。其中，營運管理組下因分管對外開放之古蹟點（紅毛城、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滬尾砲台），人員分配上則各再設置「執行秘書」1 人，管理各該古蹟點之行政、營運與教育相關業務，各營運館區皆安排有行政人員及教育推廣人員各 1 人。行政人員除協助執行秘書處理現場服務人員調度與管理、偶發事件處理、貴賓接待等事宜，尚需負責該古蹟點之委外廠商進行清潔、植栽、保全、消毒等的執行監督，以及該古蹟點之館舍維護修繕等工作。教育推廣人員則負責各該古蹟點之展覽規劃、古蹟推廣、藝文展演、假日活動之策劃與執行。



【圖 8】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組織架構(2005)

資料來源：＜淡水古蹟博物館員工葵花寶典＞。

2006 年起，博物館開始思索各古蹟點之教育推廣活動應統整辦理，各古蹟點之教育推廣人員必須定期開會或密切會合，討論各古蹟點之活動辦理類型、屬性、時間，使各古蹟點活動能夠成爲一系列相關的推廣活動，並統一行銷與宣傳。再加上，臺北縣政府「淡水河口藝遊網」北區旗艦計劃的積極展開，淡水古蹟博物館迫切需要進行藝術家相關資源的調查與統整，並安排相關會議與參訪行程，教育推廣組人員間必須相互支援，並相互討論業務狀況與執行。因此，借用農業局辦公室做爲「藝術村籌備處」於該處辦公（於淡水舊中央廣播電臺斜對面），以改善人員移動會合之不便以及辦公空間不足之窘境。漸漸地，各古蹟點之教育推廣人員回歸至原教育推廣組下，統籌規劃博物館內各古蹟點及相關館區大大小小的展覽與推廣活動。

2008 年 9 月，淡水古蹟博物館配合臺北縣政府擴大就業方案，全數服務人員(工讀生)重新由博物館協辦於縣政府統一面試後錄取雇用，並於錄取後

辦理教育訓練。導覽員部份，則另由博物館公告並徵選。從此，「導覽員」負責解說、預約導覽等相關事宜，並定期輪換於三處古蹟開放點（紅毛城、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滬尾砲台）定時導覽解說；而「服務人員」則負責古蹟點之駐點、駐點解說、票務、諮詢、巡視等事宜。相較於創園、創館時期「導覽員」與「服務人員」爲相互支援之情形已大不相同。2009 年 12 月，博物館以委外方式辦理服務人員之雇用，自 2010 年 1 月起，博物館之第一線服務人員統由委外廠商進行徵才與雇用，並配合館方需求辦理教育訓練。

2009 年 1 月 18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古蹟博物館爲響應政府振興經濟、刺激消費，特配合消費券發放推出「藝遊博物館・發票做慈善」活動[700]，凡持當月發票或收據，即可免費入館參觀。2010 年起，古蹟博物館更公告，博物館提供之展覽參觀服務，一律免收入場費用[701]。從此，博物館開始思索未來之營運策略與教育推廣活動之規劃方向。

2009 年 3 月，行銷企劃組成立，辦理整個淡水文化園區業務的研究企劃與執行、行銷策略之擬定、館際交流、合作之統籌推動事項[702]，原先營運管理組與教育推廣組的所兼辦的部份業務得以釋出，並更專職的處理各組業務。同時，考量研究、典藏爲博物館之基本功能，惟因人員不足，僅能以教育推廣組兼辦之方式處理基礎業務，無再有餘力進行該項最基礎亦最重要之專職業務，對博物館而言，似有本末倒置之疑慮，並恐影響博物館之發展與精進。鑒於此，2010 年 5 月，再新增「研究典藏」一組，以辦理古蹟與文物之調查、蒐集、研究與典藏計劃之研擬及典藏作業之執行[703]，爲人員尚待補齊。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經營發展方向再次微調【圖 9】，並加入「公關行銷」的發展項目，以藝術環境打造、國際交流、設置淡水文化園區等爲重要發展方向，並以因應建國百年的營運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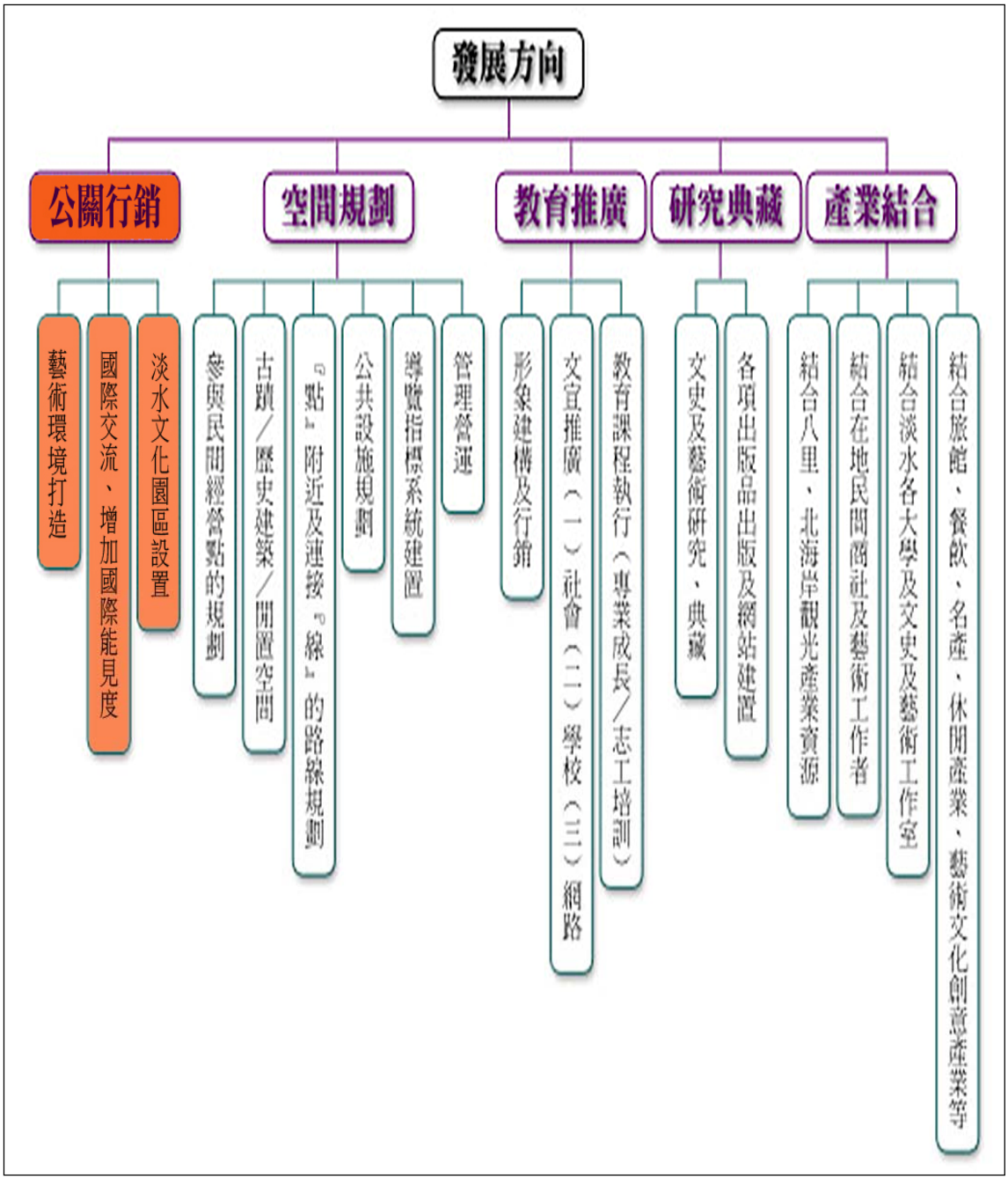
---

[700] 臺北縣所屬公有館（園）為響應政府振興經濟、刺激消費，特配合消費券發放推出「藝遊博物館　發票做慈善」活動。實施日期原自 98 年 1 月 18 日起至 98 年 5 月 31 日止，休館日除外，惟活動實施以來，廣獲好評，為繼續讓社會大眾親近博物館，使民眾享有均等之「文化公民權」，嘉惠未及利用本方案入館參觀之民眾，特將活動實施期限延長至 98 年 12 月底。實施方式為持有當月份之任何金額發票或收據（需蓋有免用統一發票章）即可免費參觀本縣所屬博物館（鶯歌陶瓷博物館、淡水古蹟博物館、十三行博物館、黃金博物館、板橋林家花園）（1 張限用一人一次）。該實施方案所有發票將由臺北縣收集後，全部捐予慈善團體。

[701] 依＜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場地使用收費標準＞第二條及第四條規定辦理，本收費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702] ＜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組織規程＞，98 年 9 月 3 日考授銓法字第 0983097898 號函第一次修訂。

[703] ＜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組織規程＞，98 年 9 月 3 日考授銓法字第 0983097898 號函第一次修訂。



【圖 9】古蹟博物館經營發展方向現況

資料來源：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網站－人文•水岸•博物館－關於博物館－發展藍圖，http://www.tshs.tpc.gov.tw/tai2_4.asp，99 年 6 月 17 日。

2、營運發展的轉型

淡水古蹟博物館 2010 年正式人員之法定編制員額共計 25 名，尚未滿編；其他現有人員有約僱人員 8 名、約聘人員 3 名、臨時人員 2 名、工友 1 名，各組工作職掌如【表 3】。

【表 3】古蹟博物館各組工作職掌現況

職稱	工作職掌	作業項目	編列人員
營運管理組	票務管理、館務活動、出版宣導、公共服務、導覽服務及其他有關營運管理之研究規劃與執行等項目。	1、票務管理 2、遊客人數統計 3、館長與民有約 4、學生公共服務 5、遊客中心夜間值班	組長 1 名 組員 9 名
行銷企劃組	淡水文化園區業務之研究企劃與執行、行銷策略之擬定、館際交流、合作之統籌推動等事項。	1、貴賓接待 2、新聞發佈 3、媒體申請來館採訪、拍攝 4、新聞危機處理	組長 1 名 組員 4 名
教育推廣組	展示推廣及其他有關教育推廣之研究規劃與執行等事項。	1、古蹟體驗營活動 2、館慶系列活動 3、邀請卡(函)製發 4、國際工作營暨學術研討會 5、特展教育活動及專案活動 6、年度特展展示規劃設計及製作 7、國外展品報關 8、文宣出版品 9、定時回傳本館活動報表 10、活動辦理 11、出版品寄存分發及銷售 12、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國際標準書號與出版品預行編目申請 13、政府出版品網出版作業系統維護管理 14、圖書資料購置 15、圖書資料交換索贈 16、圖書資料維護與管理 17、委外或自行研究計劃	代理組長 1 名 組員 6 名
行政組	文書、庶務、出納、修繕、警衛、房舍管理、研考、資訊管理及不屬其他各組之事項。	1、業務執行進度管考 2、館務會議列管事項追蹤 3、人民陳情案件處理 4、工作手冊編印 5、國家賠償事件處理 6、小額採購 7、一般採購 8、財產（物品）管理 9、文書處理 10、檔案管理 11、場地使用管理 12、公務車派用管理 13、資訊設備管理 14、零用金管理 15、採購底價定訂 16、電話禮貌測試	組長 1 名 組員 9 名

資料來源：筆者依據＜淡水古蹟博物館作業手冊＞彙整製表。

接續建國百年北縣升格直轄市，淡水鎮升格爲新北市淡水區，鎮公所未來的功能將降低，相對地，淡水古蹟博物館屬臺北縣政府文化局之二級機關，其功能則將大爲提昇，館區的範圍、面積與幅員將更擴大，因此必須確立未來的「經營軸線」與「長遠發展目標」。

面對建國百年，古蹟博物館確立了兩大經營軸線：其一、爲古蹟的維護管理、古蹟的推廣與教育。其二、爲人文與藝術的連結。淡水文化資產的維護、管理是古蹟博物館最重要的使命，而古蹟教育的推廣更是博物館一直以來的努力。古蹟博物館配合臺北縣政府「淡水河口藝遊網」北區旗艦計畫，使整個淡水文化園區於 2010 年起有著更進一步的發展：淡水原英商洋行倉庫（簡稱「殼牌倉庫」）的修復再利用[704]、藝術大街整體空間美化再利用[705]、淡水藝術工坊的新建與啓用[706]、國際藝術村的整修再利用[707]、中央廣播電臺雲門舞集的進駐[708]、淡水漁人碼頭休閒暨藝文空間的興建與啓用[709]等，該帶狀區域的空間，從鼻仔頭生態區、金色水岸區、馬偕之路的埔頂地區、滬尾之役的老戰場區至漁人碼頭等，將以新的概念串連老的空間，以藝術的方式進行空間的再利用，發展古蹟歷史人文與藝術文化的連結。[710]

淡水的藝術能量持續增長，淡水古蹟博物館配合縣府施政計劃執行相關業務，淡水的發展緊扣著「藝術」的元素，未來公所的紀念性建築與公

---

[704]「殼牌倉庫」位於捷運淡水站出口右側，臨近淡水捷運公園，佔地面積約近 3000 坪，內有四座大跨距的磚造倉庫及三座小型庫房。1997 年，由於交通部規劃淡水河北側快速道路的興建，引起淡水在地文史團隊及生態環保團體的搶救，殼牌倉庫重現生機，於 2000 年由縣府指定為縣立古蹟，並由殼牌石油公司捐贈給淡水文化基金會，作為發展淡水文化的基地。期望藉由該空間的營運活化再利用，創造古蹟與藝術文化的結合再生，並將園區定位為古蹟、藝術、低碳、環保生態園區，後續經營模式尚待各相關主管單位再行評估與裁定。

[705] 淡水老街觀潮廣場至淡水第一漁港一帶之中正路末段，縣府欲打造成為「藝術大街」，藉以提供臺北縣藝文活動新區塊，結合淡水既有觀光資源，整合淡水歷史古蹟與文化街道，以提升淡水國際視野，並於未來成為老街前段、埔頂地區以及淡水古蹟博物館等區塊連結之重要節點。

[706]「淡水藝術工坊」座落於淡水中正路 296-302 號，新建工程城鄉發展局預定於 99 年 11 月完工，後續移交古蹟博物館經營管理，預定於同年 11 月上旬開幕。縣府文化局期望藉由該空間的開啟，提供國內、國外藝術工作者藝術創作與藝術交流的平台，記錄藝術創作的過程，提供創作發表的空間與藝術市集的管理中心。

[707] 財團法人臺灣高爾夫球俱樂部同意將「舊會館培訓中心」無償提供縣府規劃使用，該建物為大成建築師事務所設計於民國 69 年。縣府文化局欲將其打造為「臺北縣國際藝術村」，做為淡水地區藝術文化交流之場域，藉此提升淡水國際視野，延續淡水當地休閒藝文發展空間。

[708] 中央廣播電臺原於民國 96 年預規劃為「淡水藝術教育中心」，做為淡水發展藝術村之傳統藝術中心、藝術家進駐創作與發表之空間。民國 97 年 2 月 11 日凌晨，雲門舞集八里排練場發生火災損失慘重，經過多方勘查，雲門最後決定與縣府合作在此落腳，除了將該棟建築第三層樓做為排練室外，未來更規劃將此區域做為雲門舞集文化園區。

[709] 為永續經營並加強淡水漁人碼頭的多元化功能，縣府特於「淡水河口藝遊網」旗艦計劃中，推動「淡水漁人碼頭休閒專用區觀光旅館暨藝術大街」軟硬體興建計畫，期將淡水漁人碼頭再造成為北臺灣的國際級觀光景點。並藉由「淡水漁人碼頭休閒暨藝文空間」的興建，規劃一結合觀光、休閒、藝術、商業的空間，透過設備的改善、新元素的引入，將地區的觀光功能再升級，重新賦予淡水漁人碼頭新生命與新能量，讓「文化觀光、藝術休閒、商業購物」等功能與創意匯集於此，並交織出一個更精緻、更豐富的商業、人文與藝術空間。

[710] 筆者採訪紀錄，＜現任館長唐連成口述紀錄＞，2010 年 4 月 30 日，地點：淡水紅毛城簡報室。

部門相關場域亦將移撥入博物館，則「古蹟」、「藝術」及「相關場域」之經營管理與博物館首要任務的連結與發展，成了重要的課題。

以「八大藝術」的繪畫、雕刻、建築、音樂、文學、舞蹈、戲劇、電影來詮釋藝術，則淡水這座擁有百年歷史風華的古老城鎮，處處皆是藝術[711]：古蹟建築的多樣是藝術，建築技術的工法、技藝、磚雕是藝術，廟宇工匠的彩繪、剪黏是藝術，淡水的文學創作、民歌發祥是藝術，充滿記憶的古老照片是藝術，表現著淡水在地情感與特質的戲劇表演是藝術，接連淡水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音樂創意是藝術，淡水的藝術俯拾即是，與生活相近。「古蹟」、「藝術」及「相關場域」結合是自然的，是因整個淡水文化園區有著多元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而這些都是與歷史文化、常民生活相關的藝術表現，並且相互串連著一個大家共同的、熟悉的、記憶中的歷史場域。

此外，古蹟博物館更以「統觀的經營目標」做爲未來長遠的發展目標，有兩大層面：其一、是將兩大經營軸線的影響力擴展至淡水、八里、三芝、石門一帶（簡稱「淡八三石」），並延伸至北縣其他地方，甚至擴及北臺灣。其二、是與各國家串連交流，站上國際舞台。臺灣位於東北亞、大陸沿海、菲律賓、東南亞等帶狀區域的中間位置，可串連日本、大陸、東南亞進行砲台堡壘的相關研究，更可與中國大陸廈門、旅順、大連、青島、天津、大湖口、寧波、廣東等地區有砲座的單位進行砲座調查研究與修砲資訊的交流。或以殖民爲主題，發展軍事防禦、經濟、貿易、外交等的研究，並與荷蘭、西班牙、法國、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進行文化學術交流，使博物館成爲東亞的「學術研究中心」，國際性的重要城鎮。[712]

淡水見證了臺灣早期歷史的發展，幾百年前淡水與國際間以航海、通商、貿易、殖民、傳教、拓墾等方式存在著國際交流的關係，使淡水成就今日的特殊與多元。幾百年後，淡水將以古蹟與藝術的元素與國際進行互動與交流，淡水一直以來扮演著國際的城鎮的角色，不論是現在、過去或未來，國際交流不曾間斷，只是形式與意義的不同。

三、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功能

(一)從年度預算分配看

淡水古蹟博物館年度預算從 95 年至 99 年，年度各項支出項目龐雜，筆者參酌各年度預算書，將各項費用進行歸類分爲 6 大類：

1、人事管理費　　4、營運管理費

[711] 筆者採訪紀錄，＜首任館長張寶釧口述紀錄＞，2010 年 6 月 14 日，地點：住宅處。

[712] 筆者採訪紀錄，＜現任館長唐連成口述紀錄＞，2010 年 4 月 30 日，地點：淡水紅毛城簡報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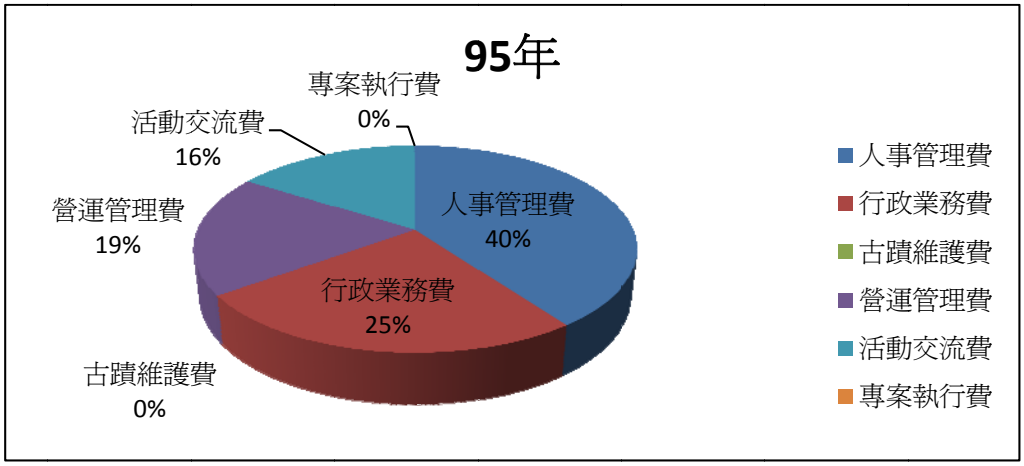
2、行政業務費　　5、活動交流費
3、古蹟維護費　　6、專案執行費等

【表 4】及【圖 10-15】爲淡水古蹟博物館每年 6 大項目費用占該年度總預算的百分比值，從中可看出各年度的業務比重。民國 95 年，人事管理費占較重比例，行政業務費、營運管理費、活動交流費等占次要比例，可知當時博物館業務以博物館古蹟本身的營運爲主，尚在發展中求穩定之階段。民國 96 年起，營運管理費、專案執行費皆占每年主要比例，可知當時博物館基本運作以漸漸定型，同時配合臺北縣政府淡水河口藝遊網北區旗艦計畫之推動、文建會對地方文化資產保存之重視，以及因應全球金融風暴以擴大內需市場等政策，各項專案之執行成爲博物館重要且賦意義性的業務。

【表 4】年度歲出預算占該年總預算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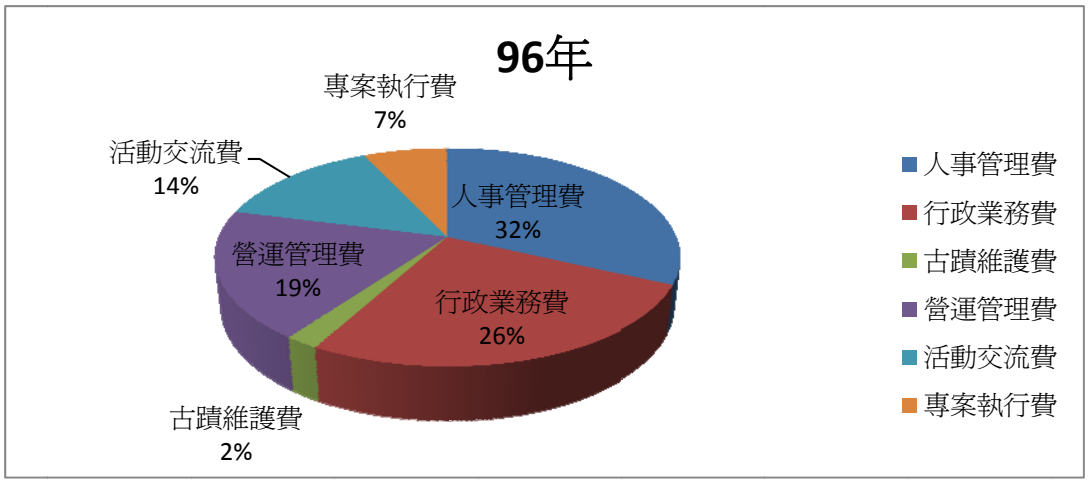
	人事管理費	行政業務費	古蹟維護費	營運管理費	活動交流費	專案執行費
95 年	40%	25%	0%	19%	16%	0%
96 年	32%	26%	2%	19%	14%	7%
97 年	13%	11%	1%	7%	5%	63%
98 年	22%	13%	1%	21%	10%	33%
99 年	28%	15%	1%	21%	10%	25%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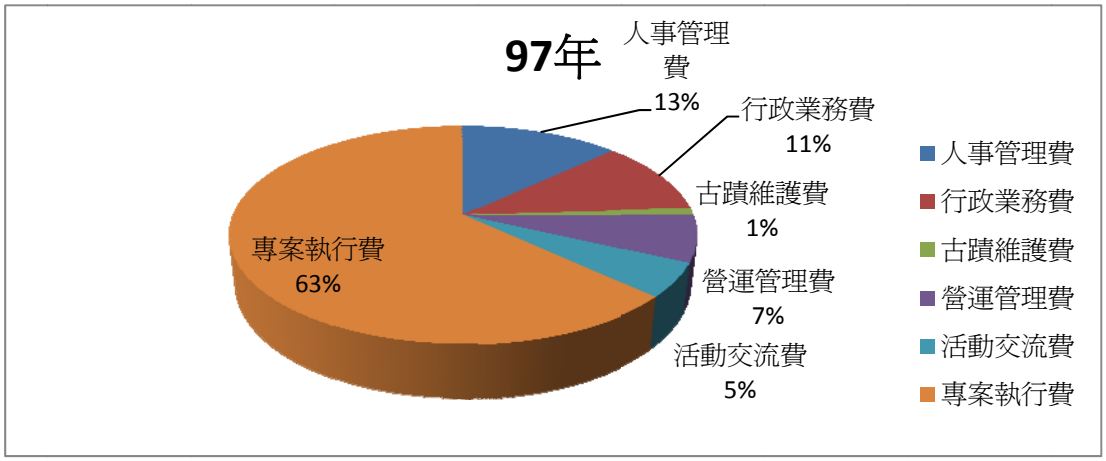
【圖 10】95 年歲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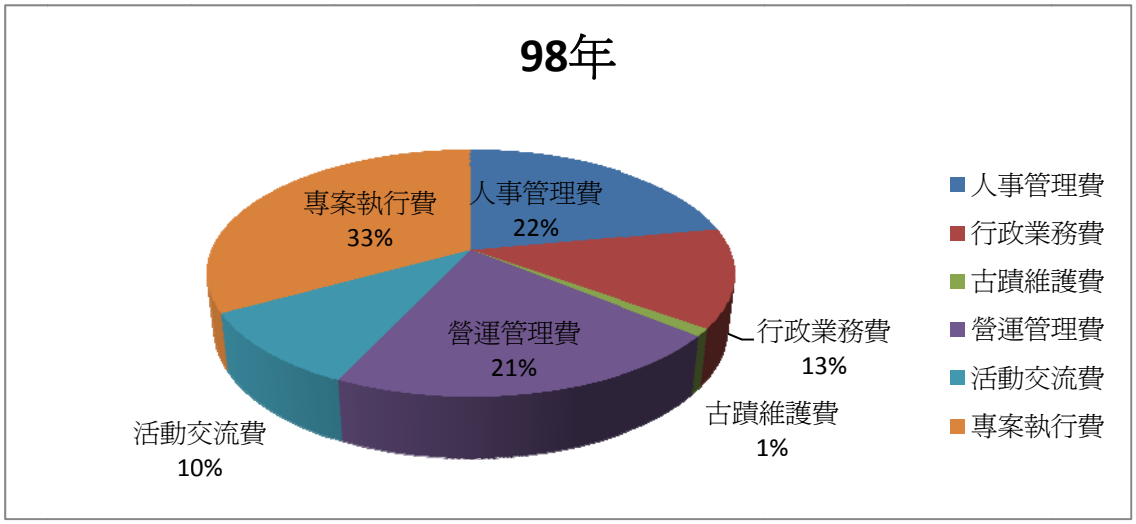
【圖 11】96 年歲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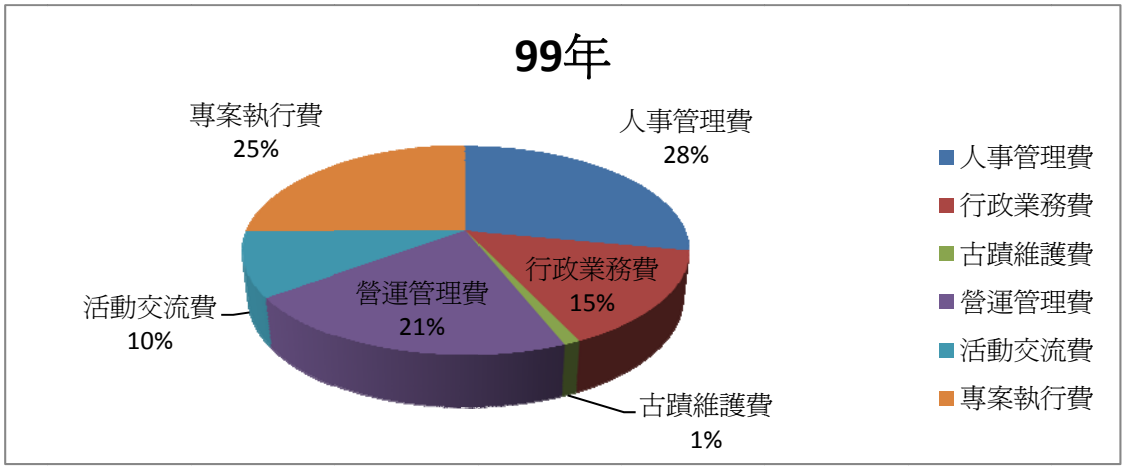
【圖 12】97 年歲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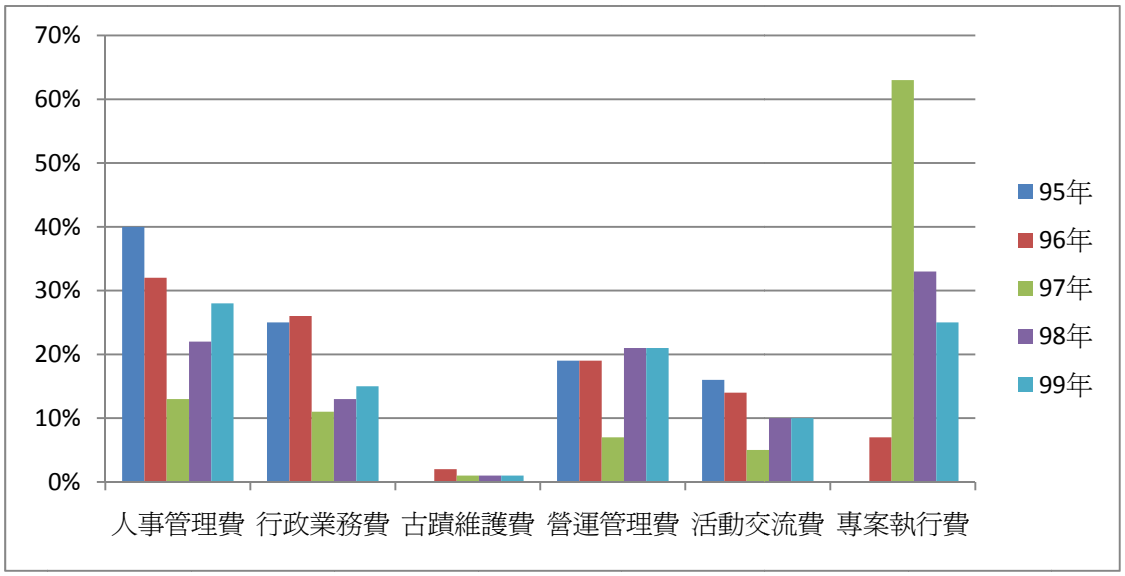
【圖 13】98 年歲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圖 14】99 年歲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圖 15】95 年-99 年歲出預算占該年總預算百分比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上【表 5】及【圖 10-15】可看出 6 大項目費用占該年度總預算的百分比，並評估該年的業務比重，以及了解各年度比重的變化。惟所占比重之減少，並不代表該項目之年度經費有所遞減，因年度總經費不同，所產生之比重亦不同。故下節將以 6 大項目費用的「年度增減百分比」及「年度增減累計百分比」來觀察該 6 大項目費用的年度變化。

(二)從年度預算增加比例看

由【表 5】觀察淡水古蹟博物館 95 年至 99 年的總預算變化，97 年大幅增加後，隔年雖有減少，但大體而言是增加的，99 年與 95 年相較，增加了 1.6 倍以上。

【表 5】歲出：年度總預算百分比統計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年度增減百分比		＋20%	＋179%	－38%	＋1%
年度增減累計百分比		＋20%	＋199%	＋161%	＋162%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淡水古蹟博物館自 97 年起，法定編制之正式職員員額陸續增加【表 6】，至 99 年增加幅度最大，因此，相關人事管理費用亦相對增加，惟技工、工友、約聘人員、約僱人員、臨時人員等員額固定，未增加預算。另工讀生部分於 98 年因應勞工局以擴大就業方式辦理，並於 99 年起以委外人力方式辦理，以節省博物館管理人力及費用。

【表 6】近五年編制員額統計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職員	10	10	12	14	25
技工	1	1	1	1	1
工友	2	2	2	2	2
約聘人員	3	3	3	3	3
約僱人員	8	8	8	8	8
臨時人員	2	2	2	2	2
合計	26	26	28	30	41
導覽人員	25	25	25	7	7
工讀生				擴大就業	人力委外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淡水古蹟博物館因應業務量增加，以及業務的專職分工，成立「行銷企劃組」及「研究典藏組」，以達博物館的行銷推廣之目的與博物館於文化資產領域專業研究之精進。由【表 7】可看出 99 年與 95 年相較，人事行政費增加了將近 0.5 倍。

【表 7】歲出：人事行政費百分比統計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所占總年度經費百分比	40%	32%	13%	22%	28%
年度增減百分比		－4%	＋16%	＋4%	＋29%
年度增減累計百分比		－4%	＋12%	＋16%	＋45%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民國 95 年起，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營運漸趨穩定，而行政業務亦漸漸配合上級相關機關漸漸增加，行政人員之員額編制逐年遞增，由於古蹟點分散，因此人員移動、公文往返較爲不便，並面臨辦公空間增加與目前不足之窘境。博物館的行政業務費由【表 8】可看出 99 年與 95 年相較，增加了 0.3 倍多。

【表 8】歲出：行政業務費百分比統計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所占總年度經費百分比	25%	26%	11%	13%	15%
年度增減百分比		＋24%	＋18%	－30%	＋20%
年度增減累計百分比		＋24%	＋42%	＋12%	＋32%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淡水古蹟博物館以「每月巡查維護」的方式維護管理，原由每位同仁分配領管 1 處古蹟點，並填報古蹟現況與日常維護檢視、處理情形之月報表，進行初步之例行維護與狀況處理。2010 年 6 月起，爲便於資料彙整及統籌管理，改由專人專職業務，按月安排巡查各古蹟點，進行例行維護與狀況處理。古蹟周遭 500 公尺內亦屬維護範圍，如有民眾肆意破壞古蹟或周遭民間活動、周遭建物老舊傾頹、周遭建案工程等恐危及古蹟時，亦須由古蹟博物館緊急應變並函報文化局備查或處理。

惟古蹟建物本身如有重大毀損狀況，必須緊急修繕處理時，由古蹟博物館函報文化局處理，或古蹟有研究調查，進行修復及再利用之必要時，由文化局編列預算進行評估、修繕與處理。因此，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古蹟維護費占總預算比例較少，所編列預算以古蹟日常養護、簡易修護爲主。由【表 9】可看出 99 年與 95 年相較，古蹟維護費增加了幅度不大，僅增加 0.2 倍多。

【表 9】歲出：古蹟維護費百分比統計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所占總年度經費百分比	0%	2%	1%	1%	1%
年度增減百分比			－29%	＋50%	＋0%
年度增減累計百分比			－29%	＋21%	＋21%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淡水古蹟博物館成立初期的經營管理以淡水紅毛城、小白宮、滬尾砲台爲主，近年來，相關古蹟點陸續移撥與再利用，陸續新增日本警官宿舍、淡

水海關碼頭、淡水街長多田榮吉故居等古蹟點，需定期進行清潔、植栽、消毒、保全、保險等維護等費用。因此，由【表 10】可看出 99 年與 95 年相較，營運管理費增加了 1 倍多。

【表 10】歲出：營運管理費百分比統計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所占總年度經費百分比	19%	19%	7%	21%	21%
年度增減百分比		＋15%	＋8%	＋89%	－1%
年度增減累計百分比		＋15%	＋23%	＋112%	＋111%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淡水古蹟博物館節慶活動費用增加不多，自民國 98 起活動交流費增加幅度較大，原因爲博物館開始重視踏入社區、與地方文化館交流、古蹟情境復舊等，因此淡水社區營造相關經費、館際交流相關經費、因應復砲計畫的兩岸文化交流計畫旅費等增加。由【表 11】可看出 99 年與 95 年相較，活動交流費增加了 0.25 倍。

【表 11】歲出：活動交流費百分比統計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所占總年度經費百分比	19%	19%	7%	21%	21%
年度增減百分比		＋5%	＋1%	＋18%	＋1%
年度增減累計百分比		＋5%	＋6%	＋24%	＋25%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淡水古蹟博物館自民國 96 年起，配合臺北縣市淡水河口藝遊網北區旗艦計畫執行相關子計畫，民國 97 年至 98 年持續增加。

民國 97 年，該年度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專案，除了「淡水河口藝遊網」相關計畫外，尚包含「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的博物館夜 Party 活動、淡水旅遊的手機導覽及簡訊定位服務、紅毛城室內展場冷氣空調設備、淡水藝術大街相關計畫、以及國際藝術村修繕工程等。

同時，淡水古蹟博物館亦配合文建區對地方文化資產的重視，於民國 96 至 97 年執行域型文化資產環境保存及活化計畫。因此，由【表 12】可看出專案執行費於民國 97 年暴增 22 倍多，雖後 2 年有遞減，但因淡水賦有歷史

人文及藝文發展的潛力，爲政府施政發展之重要區域，故大體而言，專案執行有增加的趨勢，99 年與 95 年相較，專案執行費增加了 21 倍多。

【表 12】歲出：專案執行費百分比統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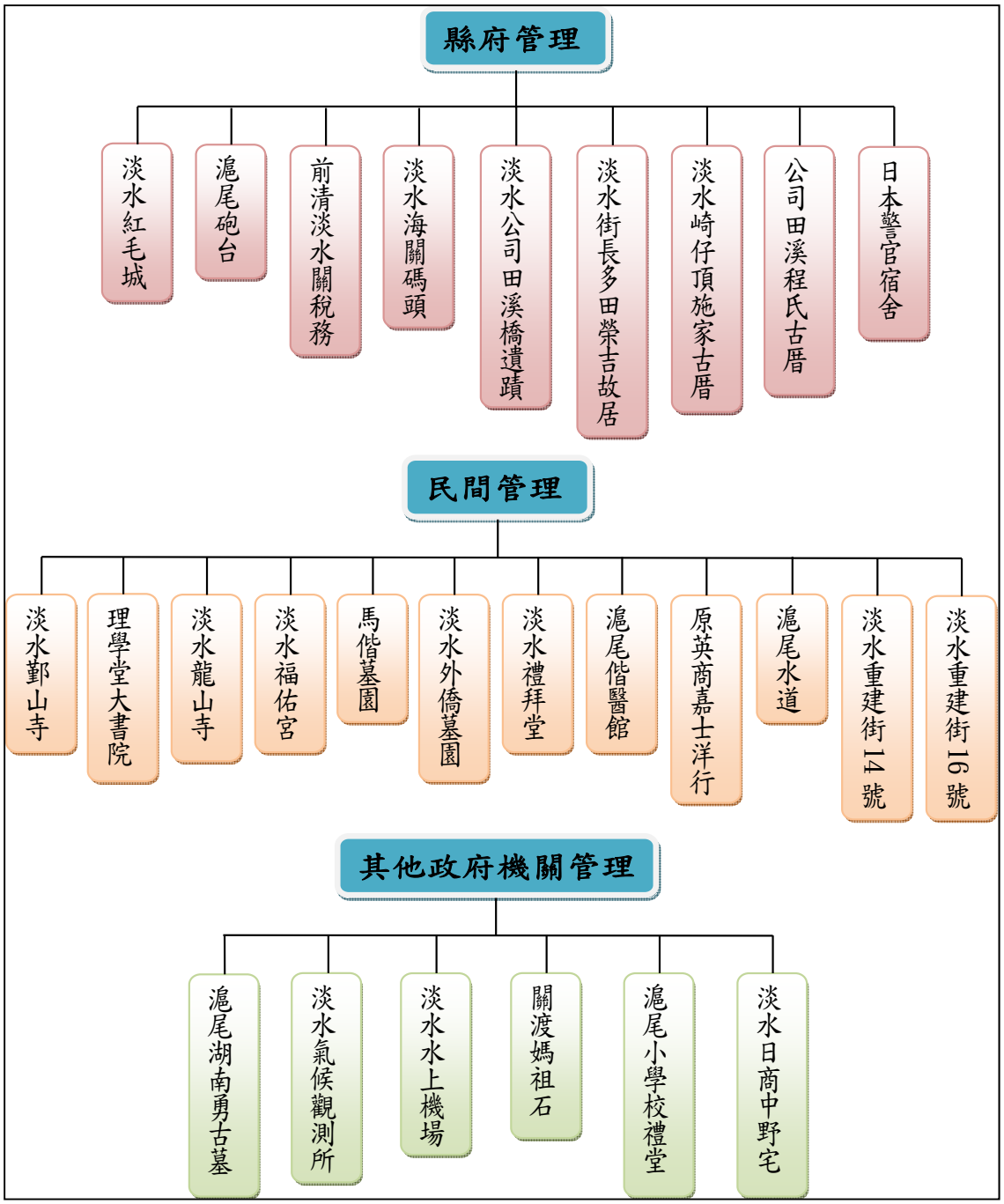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所占總年度經費百分比	0%	7%	63%	33%	25%
年度增減百分比			＋2264%	－67%	－23%
年度增減累計百分比			＋2264%	＋2197%	＋2174%

資料來源：筆者製表。

(三)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功能

1、現有古蹟的維護

淡水目前指定之古蹟及登錄之歷史建築共計 27 處，因各古蹟、歷史建築之所有或使用管理單位不同，其中 9 處由「縣府」直接管理的、12 處由「民間」管理，其餘 6 處則由「其他政府機關」管理【圖 16】，這種狀況下，使得淡水古蹟博物館在古蹟維護的運作上顯得頗爲重要。



【圖 16】淡水古蹟、歷史建築管理分佈圖。

資料來源：筆者製圖。

2、古蹟的推廣與教育

文化資產的管理與維護是古蹟博物館的重要職責，但如何將古蹟空間推廣，使民眾或遊客能夠更親近古蹟，並於參訪古蹟的同時能夠有新的體驗與收獲，漸接地啓發守護家鄉、社區、土地、古蹟的意識，並推廣至家人、朋友及社會大眾，則是淡水古蹟博物館在營運發展上的另一項功能。淡水古蹟

博物館規劃相關活化古蹟、推廣歷史建築價值的經營管理策略，以推廣古蹟並從活動中進行古蹟教育。其方式如下：

(1)藝術展演活動

古老的古蹟空間，若能夠加入新的想法、新的創意，在以不破壞古蹟的前提下，將既有的空間活化、再利用，不僅能讓民眾充滿新鮮感並有所期待，甚至可多次的參訪。古蹟不再是老舊、生硬、一陳不變的建築，而是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造訪、品味、感受歷史記憶的文化空間。

因此，淡水古蹟博物館依循紅毛城歷史文化的腳步，設定主題年，於紅毛城規劃主題年相關展覽，除了邀請眾多外國駐台代表及國際人士參與外，更邀請各領域藝術工作者、文史工作者及專家學者參與，以促進淡水國際交流，並讓民眾感受、了解各時期淡水與國際的接觸交流與發展，建立在地史觀，以及行銷、推廣古蹟與國際性特展。

此外，更邀請在地或其他「表演藝術團體」於古蹟戶外空間進行演出，表演者將古蹟空間融入爲創作題材、進行互動，展現出古蹟環境劇場的無窮魅力，效果非凡、震撼人心。讓古蹟成爲民眾休閒娛樂的好去處，可以一來再來，並非一陳不變。

(2)休閒活動的推廣

淡水古蹟博物館透過古蹟的營運與開放，將古蹟空間充分運用、活化及再利用，於各館區推出假日或特殊節慶等活動，或開放街頭藝人申請表演，目的即在規劃更兼具教育與休憩功能的古蹟環境，以及提供更適合親子互動的古蹟參觀空間。

舉凡每年 9 月第 3 週的「認識古蹟日」系列活動、11 月的館慶系列活動、其他特殊節慶相關活動、暑期體驗營活動、自行車旅遊導覽活動、DIY 體驗活動等，淡水古蹟博物館藉由休閒活動、教育推廣活動的辦理，提供學生、社區居民、一般民眾、遊客甚至國際人士參與活動、親子出遊、親近古蹟的機會，除了可串連各古蹟點形成「點線面」的完整深度旅遊網，更可透過淡水在地觀光資源之行銷與推廣，帶動地方觀光旅遊與餐飲消費商機。

(3)出版品發行計畫

古蹟推廣與教育的策略，除了藝術展演活動與休閒活動的推廣辦理外，尚需有出版品的發行，如此不僅可行銷、推廣各古蹟點，更可讓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古蹟教育成爲可以帶的走、進入校園學習、納入學術研究，以及古蹟資源的專業情報站。

淡水古蹟博物館的出版品包含摺頁手冊、兒童繪本、競賽活動作品集、館刊、研究計劃、史學研究專輯等，各種出版品所吸引之族群不同，發行之成效亦不相同，茲分述如下。

①摺頁手冊：

摺頁包含紅毛城、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滬尾砲台 3 處古蹟之「中英日文簡介」、整個淡水文化園區的「淡水旅遊地圖」、埔頂地區「馬偕之路」的文化資產介紹、「美哉淡水」淡水特色博物館、與藝文特色商家介紹等；手冊則爲紅毛城年度歷史主題展之中英日文內容介紹。此類出版品吸引親子旅遊或愛好旅遊、探訪、嘗鮮的族群，以及努力從事古蹟報告或完成學習單填寫之學生族群，同時也帶動了古蹟周邊觀光旅遊與消費商機。

②兒童繪本：

2005 年淡水古蹟博物館出版《紅毛城的故事》、《臺灣的白宮》、《砲台的故事》、《埔頂的故事》等 4 冊兒童繪本，成功地將古蹟教育推進校園，打響淡水古蹟的知名度，成爲學校單位「校外教學」安排之熱門地點，學生團體紛紛來此參訪。

③競賽活動作品集：

2008 年淡水古蹟博物館舉辦古蹟攝影比賽，並將得獎作品收錄後發行「淡水古蹟之美攝影比賽作品集」，吸引許多攝影專業人士及喜愛攝影活動的民眾注目，並透過攝影作品，民眾重新發現淡水的古蹟之美，並認識了其他平時不常去或不知道的古蹟點。

④館刊：

淡水古蹟博物館的館刊，自 2010 年 4 月起開始統籌規劃發行兩種類型的刊物：其一、是以休閒觀光、旅遊情報爲主軸的「魅力・淡水」。其二、是以人文歷史、古蹟藝術、文化資產、文化創意、國際交流等學術研究爲主軸的「博物・淡水」。前者自創館至今已發行 3 冊，因部分文章開放民眾投稿，故透過刊物的徵稿，博物館與民眾的互動性增加，亦帶動民眾對淡水的關注。後者爲因應建國百年，爲使博物館學術的功能性強化，帶動古蹟研究的風氣，提升博物館的國際視野，預計於 2011 年出刊，期望使民眾的古蹟教育更深度化。

⑤研究計劃與史學研究專輯

研究計劃爲淡水古蹟博物館配合縣府相關施政計畫所進行的先期研究或評估調查，對於欲了解淡水未來發展方向與趨勢，具有參考的價值。

淡水古蹟博物館與學術單位之專家合作研究，或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史學研究專輯，對於淡水的歷史文化研究，有著拋磚引玉的效果，帶動更多文史專家學者的投入與貢獻，並爲後學的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古蹟研究資源。

(4)教材研發計畫

淡水古蹟博物館爲進行古蹟的推廣教育，並落實博物館的館校合作，於 2010 年 3 月起，開始籌備與淡水地區各學校共同組成「課程教材研發小組」，並期望邀請學校相關領域校長、主任或教師擔任小組成員，共思古蹟教育如何與學校課程做結合。目前將先以國小爲對象，期待可整合各校現有教材資源，協助各校相關領域課程教材之深化，以達到資源共享、提昇加成的效果。

3、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

淡水地區文化資產的保存，爲淡水古蹟博物館責無旁貸的任務，爲使文化資產能夠延續其生命力並有所傳承，對於各古蹟點或其他有潛力納爲古蹟的文化資產，有謹慎評估審查，並配合文化局政策進行修復及後續再利用經營規劃的必要，此爲淡水古蹟博物館在營運發展上的重要功能。

4、文化空間的整合與串連

淡水古蹟博物館在營運發展上的重要且具願景性的功能乃是將淡水的文化資產結合觀光資源進行整合與串連，目前將淡水區分爲五大區塊進行文化空間的營造【圖 17】，包含「鼻仔頭生態區」，以殼牌倉庫爲發展核心、「淡水藝術大街」，以藝術工坊爲發展核心 、「馬偕之路」，以紅毛城爲發展核心、「老戰場之路」，以滬尾砲台、國際藝術村爲發展核心、「休閒暨藝文空間」，以漁人碼頭休閒暨藝文空間爲發展核心。淡水古蹟博物館配合「淡水河口藝遊網計畫」在空間活化與推廣上，依該五大區域之歷史背景、空間環境、保存現況及再利用目標，架構該區的整合與串連計畫，並透過空間修景、古蹟點整修、活化再利用、活動推廣之策略來形塑每一區塊的風貌與特色。



【圖 17】淡水空間整合分佈圖。　　資料來源：筆者修改 google earth 地圖編輯製圖。

【表13】92-99年紅毛城、滬尾砲台、小白宮遊客人數月別統計

年度	古蹟點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總計	合計
92年	紅毛城	21,988	30,616	36,936	20,186	15,866	13,552	22,972	30,901	19,508	38,176	31,333	23,991	306,065	306,065
93年	紅毛城	22,307	24,708	0	0	0	0	0	0	0	0	0	0	47,015	58,265
	滬尾砲台	0	0	0	0	0	0	0	0	0	0	7,543	3,707	11,250	
	小白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94年	紅毛城	0	0	0	0	0	0	0	0	0	0	36,912	31,431	68,343	168,309
	滬尾砲台	3,424	3,629	6,173	6,418	5,415	5,580	6,399	5,137	6,255	12,165	12,444	7,578	80,617	
	小白宮	0	0	0	0	0	0	0	0	0	0	11,356	7,993	19,349	
95年	紅毛城	27,010	33,695	27,260	32,944	20,836	19,501	25,625	28,266	18,873	35,230	24,583	25,869	319,692	422,276
	滬尾砲台	4,196	5,346	4,961	6,920	3,445	2,766	3,852	3,134	3,285	5,237	4,321	4,431	51,894	
	小白宮	5,037	5,515	4,317	8,201	2,943	3,432	3,246	3,668	2,471	3,901	5,214	2,745	50,690	
96年	紅毛城	22,480	40,979	24,916	28,181	27,747	20,261	30,685	26,673	29,959	26,320	23,331	38,726	340,258	436,793
	滬尾砲台	5,335	4,779	2,812	4,053	4,425	2,827	4,654	7,541	6,439	3,483	3,369	3,884	53,601	
	小白宮	4,960	4,369	2,985	3,392	2,591	2,080	3,138	3,001	5,744	2,951	2,787	4,936	42,934	
97年	紅毛城	22,080	21,468	26,621	31,631	29,822	21,063	30,963	35,297	23,681	38,499	26,835	30,314	338,274	435,565
	滬尾砲台	247	-	3,373	7,210	4,445	2,626	4,307	3,638	2,583	5,580	5,006	3,986	43,001	
	小白宮	3,013	2,481	3,786	4,397	5,220	3,636	4,539	4,416	3,940	5,873	7,320	5,669	54,290	
98年	紅毛城	35,600	35,021	29,782	35,718	43,033	19,030	31,378	29,563	20,900	23,286	21,006	28,537	352,854	494,106
	滬尾砲台	7,401	4,249	3,945	4,704	6,375	5,010	3,716	3,364	4,076	4,268	3,086	4,338	54,532	
	小白宮	5,155	6,911	7,239	9,277	12,956	5,010	7,189	6,379	6,188	6,693	5,700	8,023	86,720	
99年	紅毛城	42,488	44,693	52,633	50,607	56,112	-	-	-	-	-	-	-	246,533	349,354
	滬尾砲台	5,737	5,275	8,636	7,171	8,550	-	-	-	-	-	-	-	35,369	
	小白宮	13,221	11,213	13,641	13,549	15,828	-	-	-	-	-	-	-	67,452	

資料來源：筆者參考交通部觀光局資料製表。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year_show.asp

交通部觀光局—政府資訊公開-施政計畫/業務統計--業務調查統計--觀光統計年報--國內主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數月別統計。

5、古蹟教育的學習教室

由【表 13】可看出，自民國 94 年至 99 年期間，3 處古蹟的參觀總人次有逐年提升的趨勢。因此，淡水古蹟博物館於古蹟管理維護、古蹟推廣與教育、文化資產保存基本任務之餘，亦致力於「古蹟教育學習教室」的努力。

(1)網站建構與改版

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網站（http://www.tshs.tpc.gov.tw/）包含繁體中文版、簡體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西班牙文版，以及兒童版網頁，對於博物館的基本資訊與資源，針對不同族群需求提供不同的資訊內容，另「兒童版」的網頁，屬終身學習網路教材，特區分時光之旅、訪古趣、學習樂團等三大主題，有多媒體互動學習內容，內含各式模擬情境互動主題及各年級學習單，提供活潑有趣的動畫及多媒體影音互動資訊，是許多教育單位常使用的教學資源。

2007 年，淡水古蹟博物館再增置「淡水河口藝遊網」之網路設置與連結，提供各項淡水藝文展演訊息、藝文發展概況、藝術工作者介紹、藝文資源等資訊，建立與民眾、藝文愛好者藝文交流的平台，爲淡水的藝文發展提供前置性的藝術資源整合與共享的效益，使無法前來古蹟的民眾也能透過網路資訊進行古蹟教育的學習。

(2)無場域導覽服務

淡水古蹟博物館各開放之古蹟點(紅毛城、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滬尾砲台）設置有古蹟點中、英、日、西班牙文之語音導覽系統，提供國內及國際旅遊人士租借服務，遊客可更簡便地獲得更清楚詳細之導覽講解。

2008 年起，爲使淡水地區提升爲國際化城市，計畫提高淡水鎮全區包含古蹟點、吃喝玩樂之據點的導覽便利性，使民眾進入淡水地區能立即得知所有包含食、衣、住、行等相關資訊，塑造淡水地區藝術零距離的概念，進行「QR-code 系統規劃」，即遊客進入淡水鎮後，會主動收到歡迎簡訊，並以雙向簡訊功能的方式，選擇是否願意接收淡水地區藝文或消費的資訊，與淡水古蹟博物館合作設有『告示牌』之古蹟景點或商家，將提供 QR-code 導覽服務，利用 QR-code 技術讀取告示牌上之資料，並將相關資訊顯示於手機中。

無線通訊是未來電子設備必要的項目之一，透過手機導覽 QR-code 及手機定位簡訊傳輸的服務，將可引領民眾以另一種不同的心情旅遊淡水，除了提供民眾更便利的服務外，還可以針對客群作分析，了解消費者資料及消費習慣等，充分達到淡水古蹟博物館無場域的學習教室之目

標。

6、國際化的交流平台

博物館的經營管理應具備國際觀，適時汲取國際經驗和知識，主動向國際社會提供地方文化發展經驗，提高國際合作的深度及廣度，是未來活化營運的重要思維。因此積極整合在地資源，加強推動國際行銷，以提昇與國際文化社團的交流合作，並進行國際間文化學術交流，使古蹟博物館成爲古蹟研究的「學術研究中心」，國際性的重要城鎮是未來的重要趨勢。

(1)國際性展覽活動規劃

淡水古蹟博物館藉由每年 11 月之館慶，籌備國際性的歷史文化特展，目的即在透過展覽的規劃與辦理，與相關歷史主題國家進行交流，甚至與當時歷史背景下所謂「利害關係人」的後代建立友善關係，交流相關具關鍵性或重要性之文物，或進行展覽內容之溝通與安排，呈現出直接性的或隱藏性的歷史文化。每一檔年度主題展的推出，博物館皆邀請國際性重要人士、各國臺灣辦事處駐臺大使、各領域藝術工作者、文史工作者及專家學者參與，成功向國際人士行銷淡水，並引起相關國家的關注，紛紛來此參訪。

2007 年，淡水古蹟博物館辦理「國際藝術家駐村活動」，邀請三位來自英國、印度、印尼之藝術家，於淡水當地社區互動，透過藝術對話，以藝術語言融合在地獨特的人文歷史背景，完整呈現淡水人之藝術表達，引發當地居民對於淡水藝術造街議題的討論與共識的產生。

2010 年，「淡水藝術工坊」預定於 11 月上旬啓用與開幕。開幕展覽將以「淡水藝術工坊」的整體形象與意義之傳達，以及國內外藝術工作者「藝術對談」爲發想，設定展覽主題及呈現方式，以藝術家邀展，或收藏家、館際交流借展方式進行策展！

古蹟博物館藉由相關歷史場域或空間的經營與再利用，不僅提供國內外藝術工作者藝術交流的平台，發展北縣藝文活動新區塊，更可藉此提升淡水的文化環境及透過與國際人士的交流拓展國際視野，對於博物館的藝文交流與在地文化行銷有所助益。

(2)外籍學生實習專案

AIESEC 爲全球最大的國際性學生組織，旨在培養青年人的領導能力、國際觀、以及跨文化的團隊工作能力，使其對社會有正面的影響力。AIESEC 也爲加入的成員提供綜合性的學習平台，包括領導力培養、海外研習計畫、以及全球性的學習機會。2010 年 7 月，淡水古蹟博物館將與之合作，發展 AIESEC 實習專案計畫，由 6 名不同國籍之青年學生，

於博物館進行為期 1 個月的實習，期間將安排協助博物館英文導覽與相關活動之協辦、參訪在地藝術家工作室、串連規劃外國遊客參訪路線遊程，以及學習 10 小時之華語課程等，並於導覽檢測通過後完成實習。

淡水古蹟博物館學生公共服務或課程實習，為提供國內外相關學習領域之學習者，於館內實習進行學習研究的再精進與交流，藉由不同國籍人士的交流、激盪與溝通，將可使為博物館的視野與創意更加多元，也促使博物館行政人員的能力更精進與專業，藉此亦可將古蹟博物館做為古蹟文化交流平台。

四、結論

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組織，象徵著政府落實古蹟管理的作為，更從過去公務系統單向指示的思維，轉換成對等的、在地的、服務的、文化接待的新意圖，為一「在地管理」的維護機制。其重要性除了在於針對古蹟保存、維護、再生及世紀遺產的收集與保存外，同時要整合地方資源，協助臺北縣政府文化局在文化資料保存、文化觀光上的深度發展，並結合社區力量營造力量，經營一個具優質文化觀光的範例。

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營運功能，以現有古蹟之維護管理、完善保存、永續傳承為首要。其次則為古蹟的推廣與教育，運用經營策略將古蹟進行推廣與教育。再者，為淡水地區相關有形、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並提供民眾無場域的古蹟教育學習教室，並無遠弗屆，以國際化眼光再精進，成為國際古蹟文化的交流平台，以整合、推廣與行銷淡水文化資源。

淡水古蹟博物館的編制組織與營運發展於 2005 至 2010 年期間大致穩定與定型，為因應業務量逐漸龐大以及建國百年之精進發展，2009 年「行銷企劃組」、「研究典藏組」相繼成立，發展方向著重以藝術環境打造、國際交流、整合營造整個淡水文化園區資源環境為重要發展方向。

接續百年北縣升格直轄市，淡水鎮升格為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古蹟博物館將以藝術環境打造、國際交流、整合大淡水文化園區資源環境為重要發展方向，並確立「古蹟的維護管理、古蹟的推廣與教育」、「人文與藝術的連結」兩大經營軸線。更以「統觀的經營目標」做為未來長遠的發展目標，其一、將兩大經營軸線的影響力擴展至淡水、八里、三芝、石門一帶（簡稱「淡八三石」），並延伸至北縣其他地方，甚至擴及北臺灣。其二、與各國家串連交流，進行文化學術交流，站上國際舞台，並成為古蹟文化的「學術研究中心」，國際性的重要城鎮。

附表目錄

【表 1】文化局「四館一園」比較表----------1
【表 2】淡水古蹟博物館成立初期工作職掌----------8
【表 3】古蹟博物館各組工作職掌現況----------14
【表 4】年度歲出預算占該年總預算百分比----------17
【表 5】歲出:年度總預算百分比統計----------20
【表 6】近五年編制員額統計----------20
【表 7】歲出:人事行政費百分比統計----------21
【表 8】歲出:行政業務費百分比統計----------21
【表 9】歲出:古蹟維護費百分比統計----------22
【表 10】歲出:營運管理費百分比統計----------22
【表 11】歲出:活動交流費百分比統計----------23
【表 12】歲出:專案執行費百分比統計----------23
【表 14】92-99 年紅毛城、滬尾砲台、小白宮遊客人數月別統計----29

附圖目錄

【圖 1】淡水古蹟園區組織架構圖----------4
【圖 2】園區發展方向架構圖----------5
【圖 3】揭牌儀式----------7
【圖 4】開幕典禮----------7
【圖 5】開幕典禮----------7
【圖 6】淡水古蹟博物館原規劃組織架構----------7
【圖 7】古蹟博物館成立初期經營執行方向----------9
【圖 8】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組織架構(2005)----------11
【圖 9】古蹟博物館經營發展方向現況----------13
【圖 10】95 年歲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17
【圖 11】96 年歲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18
【圖 12】97 年歲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18
【圖 13】98 年歲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18
【圖 14】99 年歲出預算占總預算百分比----------19
【圖 15】95 年-99 年歲出預算占該年總預算百分比----------19
【圖 16】淡水古蹟、歷史建築管理分佈圖----------24
【圖 17】淡水空間整合分佈圖----------28

近代臺灣氣象制度之建立—以淡水爲例

高菱憶**

摘要

本文首先將描述開港前的臺灣氣象制度的輪廓。開港以前氣象制度尚未近代化，而是由閩浙總督定時向清廷回報臺灣的降雨情形，藉此分析影響農產量；如有船隻在海上因爲天候不穩而遭遇船難，或是有颱風、地震等天災，亦會向清廷回報。

開港通商後，往來於中國沿海的漁船、外國商船及軍艦因不熟悉臺廈間的海路及氣候，屢次遭遇颱風而造成許多商業損失，中國海關稅務總司赫德有鑑於此，遂下令中國沿江各海關蒐集氣象情報，並將之交與上海徐家匯氣象臺及香港觀象臺做情報交換。臺灣方面，天津條約打開了打狗、安平、滬尾、雞籠等四個港口，爲了航海安全，各關即遵照赫德之指令，蒐集氣象情報，由滬尾海關稅務司匯整其他三關的資料後，再送到上海及香港兩地。

1895 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將臺灣割讓給日本，交接過程中，上海-香港-臺灣三地之間的氣象情報交換一度中斷，上海徐家匯氣象臺臺長遂透過駐日外使拍電報給日本外務省，要求盡快恢復臺灣對上海及香港的氣象情報交換，臺灣總督府遂派遣氣象技師儘速修復淡水稅關的氣象觀測。

本文試圖重建清末至日治初期，淡水海關氣象觀測系統建立之過程。而淡水做爲清代到日治初期重要的大港之一，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不但從未缺席，還一直走在前方，並與臺灣氣象觀測系統的建立息息相關，具有不可抹滅的重要性。

關鍵詞

淡水、氣象、海關、燈塔

*淡江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本文為研討會初稿，請勿引用，謝謝。

一、 前言

氣象的生成改變觀乎著人民的生活，故政府自古以來便重視氣象觀測。直至清代，政府也有一套氣象的觀測、紀錄及保存的制度，但此時重視的是雨量的多寡及地震、霜雪、颱風等關乎生計的天災。

清代臺灣的氣象系統傳承自中國，官員亦將氣象的重點放在被天候影響的農業，還有中國到臺灣的航線上，船隻時常因天氣突然改變而毀壞或沈沒。本文試圖重建清末至日治初期，淡水海關氣象觀測系統建立之過程。淡水做爲清代到日治初期重要的大港之一，在近代化的過程中不但從未缺席，還一直走在前方，並與臺灣氣象觀測系統的建立息息相關，具有不可抹滅的重要性。

二、 清代臺灣之氣象觀測

清代臺灣屬於中國的領土，島上移民也大多由中國閩南遷入，筆者稍微提述中國的一些氣象制度，以凸顯日後西方勢力進入中國後，氣象制度的轉變。

（一）中國近代氣象事業的開端

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作物的收成維繫著整個國家的命脈，除了地理環境，氣象是人民得以維持生計的重要因素，從商朝開始便有專門制訂時曆及觀測天象的官員，制訂曆法系統。

曆法分爲陽曆、陰曆及陰陽合曆三大類型，中國的曆法主要是陰陽合曆爲主，經過各朝代天文學家的觀測及計算，曆法的精準度越趨精密。[1]農業以曆法爲基礎，包括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日月運作的推算等。二十四節氣是根據地球環繞太陽運行一週內的氣候變化，將一年等分爲二十四個部份，包括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等二十四個氣候間區，每一區是爲一個節氣，能夠確實的反映出一年中季節與氣候變化的規律性，在曆法及二十四節氣的相互配合之下，人們只要在農作時，以官方所頒佈的曆法爲指標，便能穩定農業的生產，若曆法推算的越精準，農業生產的穩定性就越高，反之，則越低。[2]

想要得到氣象資訊、掌握每個季節的氣候特徵，需要用儀器對氣象進行定時觀測與分析。中國從殷商時代便開始觀測天象，出現了原始的測風器、測濕器、測溫器及雨量器。

商朝的使用一種名爲「旂」的帶狀旗子來測定風向，原本用於君主出巡之時，

[1] 宋正海、孫關龍 主編，《圖說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48。
[2] 宋正海、孫關龍 主編，《圖說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49。

這種測風器構造簡單、方便攜帶，適合軍事行動和出巡活動，後來經過改良，改用五兩或八兩的羽毛製成約三、四尺的羽毛片，掛在高杆上候風，這種測風儀通稱「五兩」，唐代以降這種測風儀被普遍使用。

漢代人們發明一種天秤式的測濕器，算是一種原始的儀器。這種測濕器的原理是在天秤兩端分別放置吸濕性強的炭和其他不易吸濕的物體，並使它們保持平衡。天氣潮濕時，炭因吸收空氣中的水氣而增重，此時天平傾斜；天氣乾燥時，炭中的水氣也易於蒸發，天秤又恢復平衡，由此便可判斷濕度的變化。清初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利用鹿筋隨濕度伸縮的原理製成了「驗燥濕器」，是毛髮溫度計的前身，「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無爽，並可證明陰晴」；同時南懷仁也製作了「驗冷熱器」，可以測量氣溫。[3]

而在雨量的部分，南宋學者秦九韶在《數書九章》之中提到「天池測雨」、「圓罌測雨」、「峻積驗雪」、和「竹器驗雪」等方法，這是最早跟測雨器有關的記載，雖然並非標準的雨量器，但卻是古代定量測量雨量的主要方法。

中國朝代設有欽天監，是專門觀測天文、氣候的單位。明末清初，耶穌會教士南懷仁來到中國傳教，康熙七年（1668）受到重用，被任命爲欽天監監正，負責製造天文、氣象儀器，西方近代所發明或改良的一些科學儀器，如溫度計、濕度表傳到中國，但這些儀器卻沒有被用在觀測氣象的用途上，反而僅爲貴族官員觀賞把玩之用的收藏品。

即使政府並不支持以西方科學儀器作爲觀測天文、氣象的用具，但並不代表他們也反對西方傳教士來華設立觀象台。法人革比楞，於康熙 26 年（1687）來華，次年於紫禁城內擔任數學教師。康熙 31 年（1692）得以在北京建立教堂傳教，康熙 38 年（1699）革比楞要求擴建教堂，得到允許的同時，亦在北京建立觀象台，此後西方傳教士便在此進行天文和氣象的觀測。在革比楞之後，另一位在中國進行近代氣象觀測的人爲法國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哥比（Antonis Gaubi），他於雍正元年（1723）來華，曾在宮廷中教授拉丁文，乾隆 8 年（1743）開始在北京作氣象觀測記錄，從 1743 年開始，每日兩回，直到 1746 年 3 月爲止。繼哥比之後，氣象觀測曾中斷約 70 年左右，陸陸續續有傳教士阿彌倭、俄人富士等人在北京做過氣象觀測，同樣每日早晚兩回，但內容亦越見詳細，包括溫度、氣壓、雲量、雨量、風向等項目。[4]以上是清初使用近代化儀器觀測氣象的大致情形，此時近代化氣象觀測的範圍仍侷限在中國華北一帶，而且尚未有效地系統化，一般氣象觀測仍舊以曆法爲主。

（二）清代臺灣的傳統氣象

荷治時期以來，中國閩南一帶的漢人不斷的移入臺灣，到清康熙一朝擊敗鄭

[3]宋正海、孫關龍 主編，《圖說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37。
[4]溫克剛 主編，《中國氣象史》，北京：氣象出版社，2003 年 12 月，頁 315-316。

氏政權，將臺灣置爲中國的版圖之下，即使清廷在政策上並不鼓勵人口遷入，甚至發佈渡臺禁令以控制來臺人數，但爲維持生活，移住臺灣的漢人仍日益增加，連帶的也將其文化、信仰、及思想移植進來，並盡量維持在原住地的生活習慣，開發西部的土地，而連帶的，由於開發上的需要，觀測氣象所需的用具、知識、諺語以及官方制度，也就這樣傳進了臺灣。

氣象在各種情況下造成的影響不同，清代大致可以從航海和農業兩種面象來觀察。清代的氣象記錄分布範圍較爲廣闊，可以在奏摺、地方志和時人遊記之中見到，但記錄的重點各有不同。

康熙 4 年（1665），施琅攻克鄭政權，施琅的水師兵船在越過臺灣海峽時因氏爲不熟海路，遭受不穩的天氣及風浪的襲擊，在進攻鄭氏的緊要關頭卻「遇風漂散」，進攻行動備受阻撓。[5]

統治初期，糧食是否能順利生產是穩定政權的重要因素，但地方上並無專門觀測天候氣象官方設施，而是經由各地的保甲或各營兵勇回報當地天氣與耕種情形，官員們將各地情形統整過後，每個月由閩浙總督、監察御史、臺灣鎮總兵等官員向朝廷彙報降雨情形，內容著重於降雨量與臺灣各地農業產量的關係。「…昨據臺府各屬亦報玖月出七、初八連日大雨，田禾霑足，可望豐收，民情甚為歡悅…」[6]這一筆資料爲乾隆二年（1737）閏九月十二日，閩浙總督郝玉鄰奏報該年福建省各縣九月的天氣及米穀收割的情形，當年臺灣府的雨量充足，米稻能夠均衡發展，田產可望得到豐收，民心安定，反觀其他府縣，詔安、漳浦、海澄等縣因「未得雨澤」而有輕微旱象出現，容易導致米禾歉收，爲此郝玉麟決定採取開倉平糴的措施，以避免因米糧缺乏而造成米價上漲之危機。[7]隔年六月初九日，福建布政使王士任奏報：

> 自春徂夏，雨水調勻，二麥有收，惟至五月望後，大雨連日，溪水泛漲，低窪田地間有被水淹。然隨長隨消，禾苗尚無妨礙，臣跟同督撫二臣設壇虔禱，仰賴 聖德廣庇，即於二十一日晴霽水俱退盡，下游各郡早稻漸次刈獲。六月中旬具可登場。[8]

該年一到五月天氣穩定，雨量亦屬正常，但五月過後，連日的大雨造成溪水暴漲，低窪田地被暴漲的溪水淹過，所幸溪水很快消退，禾苗並無遭受重大損害，早收仍可正常於六月中旬進行。由以上兩例來看，清政府並非實際去測量雨量的多寡，

---

[5]陳雲林總主編，〈福建水師施琅等題本－舟師進攻臺灣途遇風飄散(滿譯漢)〉，《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 6 冊，頁 133。

[6] 陳雲林總主編，〈閩浙總督郝玉麟奏摺－閩省各屬玖月得雨並詔安等縣被旱撥穀備糴〉，《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 13 冊，頁 35。

[7]陳雲林總主編，〈閩浙總督郝玉麟奏摺－閩省各屬玖月得雨並詔安等縣被旱撥穀備糴〉，《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 13 冊，頁 36。

[8]陳雲林總主編，〈福建布政使王士任奏摺－臺灣府屬雨水田禾〉，《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 13 冊，頁 393。

而是觀察稻禾是否能承受因天氣轉變所帶來的米糧生產量的豐碩與否。而我們亦可發現，對於清政府而言，官方的氣象資料之觀測、回報、保存等制度並非未曾建立，否則地方官何以掌握這些資料，但只有當氣象情況危及政府統治之時，這些資料才會透過奏摺等檔案文件保留於史料之中；倘若氣象情況並未足以影響統治的安定性，則或許負責的吏員或更低階的行政官員便不會將資料上報。

在航海方面，雍正六年（1728），福建總督高其倬回報，調任臺灣新港巡檢羅開勳搭乘商船戶朱盛金的商船，欲到臺灣赴任，但途中卻突然遇到颶風，船隻右弦受損，因此偏離航道；二十六日，船隻已經漂流到安南一帶，羅開勳及其丁役、船家俱皆落水，幸被當地土著救起，但船隻已遭毀損，只能送回福建修理，而羅氏更因此延遲到任的時間。[9]

可見如有船隻在海上因爲天候不穩、航路不熟而遭遇船難，或是有颱風、地震等天災，亦會向清廷回報。

前面提到了清代的氣象紀錄亦可在地方志及時人遊記之中見到，這一類的紀錄對臺灣的氣候作了完整的觀察和描述，特別是在颱風、颶風、信風等部分：

> 臺灣信風，與他海殊異。風大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倏發倏止，颱風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為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致連月，為九降。過洋，以四、七、十月為穩，以四月少颶，七月寒暑初交，十月小春，天氣多晴暖故也。六月多颱，九月多九降，最忌。颱颶多夾雨，九月降多，天雨而風。凡颱將至，則天邊有斷虹，先見一片如船帆者，約破帆稍；及半天如鱉尾者，曰曲鱉。土番識風草，草生無節，則一年無颱；一節，則颱一次；多節，則多次。[10]

> 臺灣環海孤峙，極東南之澳，氣候雨漳、泉相似，熱多於寒，故花則經歲常開，葉則多年不落。春燠獨先，夏熱倍酷，秋多烈日，東鮮淒風。四、五月之交，梅雨連旬，多雷電，山溪水漲。自秋及春，則有風而無雨，多露少霧。田禾播種之後，也喜露而畏雨。至月早升，地常震，風發不時，此一郡之大概也。諸羅自半線以南，氣候同於府治。半線以北，水愈深，土愈燥，水惡土瘠，煙瘴愈厲，易生疾病，居民鮮至。雞籠社孤懸海口，地高風烈，冬春之際，時有霜雪，此又一郡中，而南北異宜者也。（諸羅雜識）[11]

除了黃淑璥《臺海使槎錄》的記述外，林謙光所著的《臺灣紀略》中也談到了「天時」的部分：

---

[9]陳雲林總主編，〈調任臺灣新港巡檢羅開勛赴省中遭颶風飄流〉，《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彙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年，第 10 冊，頁 209。

[10]《諸羅縣志．風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 編輯，台北市：文建會 出版，民國 94 年，頁 94。

[11] 黃淑璥，《臺海使槎錄．氣候》，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72 年，頁 14。

> 天氣雨中土殊，雪霜絕少，人不挾纊，三春常晴。至於淫雨，每在秋令颱颶。士人所謂正、二、三、四月起者為颶，五、六、七、八月起者為颱。颱甚於颶，而颶急於颱，將至時，先視所至之氣，如虹如霧，則預為之防。凡遇風雨將作，海必先吼如雷，暨夜不息，旬夜乃平。[12]

從黃淑璥、林謙光等人的著作中，我們可發現清人對於臺灣地區的氣象狀況頗爲瞭解，並且有系統性的留下了紀錄，可見人們已透過經驗法則或簡單的測量技術，在某種程度上掌握了氣象資料。

從這些記述中可知道，清代臺灣的官員已經對臺灣的氣候多有瞭解，及風雨災害的好發季節，而且這些觀察也具備準確性。除了對氣候的描述之外，清代對氣候災害也有詳細的紀錄，可以從通志、地方志等官方文獻中看到，以下摘錄了光緒 2 至 12 年間臺灣的氣象災害：

> （光緒 2 年）賑撫臺灣各屬被風被水災民。[13]

> （光緒 3 年）臺灣北路遭風情形慎重，分別撫恤。[14]

> （光緒 4 年）四月二十一日戌時，有蛟龍從臺南震動，狂風甚大，數刻之間，直抵臺北而沒，所過之城邑市鎮屋宇被風掃倒，大樹飄飛，難以盡舉。惟城內文武官衙受摧折尤甚，各處皆然，令人莫解，此為大異也。[15]

> （光緒 5 年，雲林・斗六堡）十二月十五日，大雨雹。[16]

> （光緒 6 年）六月十九、二十等日，臺灣、臺北兩府猝被颶風大雨，溪水陡漲，淹沒民田並傷死人口多名。十一月，岑毓英奏：澎湖前遭颶風被災嚴重，現查各島飢民共八萬餘丁口。由省城增廠倉義穀項下借提陳穀二萬石運往接濟。[17]

> （光緒 6 年，雲林）六月初三日大雨雪。八月二十二日颱風大作，三日始止，壞民廬舍甚多。[18]

> （光緒 6 年，雲林）六月三日大雨。八月二十日大風，三日始止，民舍多壞。[19]

---

[12] 林謙光，《臺灣紀略・天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編，臺灣文獻叢刊 第一輯，民國 68 年，頁 10。
[13] 光緒 2 年，《清實錄・德宗實錄》。
[14] 光緒 3 年，《清實錄・德宗實錄》。
[15] 清光緒 24 年，《嘉義管內打貓各堡采訪冊－打貓南堡・變異》，成文出版社，民國 73 年出版，頁 49。
[16]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災祥》，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72 年，頁 79。
[17] 陳衍，《臺灣通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民國 82 年，頁 207。
[18] 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災祥》，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72 年，頁 79。
[19] 同上

（光緒 7 年，雲林）是歲，布嶼飢。[20]

（光緒 7 年，嘉義）地震，是歲飢。[21]

（光緒 8 年）九月，臺北大雨颶風。[22]

（光緒 10 年）秋七月大風，禾損木折，多壞民居。[23]

（光緒 13 年）大旱，五穀騰貴。[24]

連續數年，臺灣都發生嚴重的風災，造成糧食的短缺，不但米價上漲，甚至發生飢荒，已經嚴重影響到人民的生活，經官員奏報後開倉賑災，撫恤災民。整體而言，清代官方的氣象紀錄仍只注意單次性的氣象災害、或預測該年糧食產量，進而平穩米價。氣象觀測的重要性僅在於避免其所帶來的災害問題，造成糧食短缺或建設的破壞，進而穩定地方的安定，避免造成統治問題。

除了官方的記載之外，島上的外國人也有著自己對氣象的理解，這些來到東方的外國人，或多或少都具備一些氣象相關的知識，特別是船員、傳教士、醫師等，當他們到了一個新的地方時，便會試圖去瞭解其所在之地的地理及氣候資料，從他們的傳記或遊記之中，或多或少可以瞭解他們對臺灣氣候的感受，補足了清代官方對臺灣氣候的記載。

加拿大籍的長老教會傳教士馬偕，於 1871 年年末，搭乘金麟號從廈門到達打狗，與英國長老教會傳教士李奇商量過後，馬偕決定前往臺灣北部傳教。1872 年 3 月，馬偕抵達淡水，開始傳教工作，也開始對淡水的觀察與瞭解。根據他的記載，由於臺灣島的地理位置和高山，不假是在熱帶地區，北部臺灣的氣候可說是變化多端，對外國人並不是相當容易適應的。季節的分類上，三、四、及五月可以算是春季，六至八月及九月的一部份，非常躁熱，「是最可怕的一個季節。」。淡水及基隆等地的溫度低時約爲華氏四十二度，[25]溫度高時約可到華氏一百度，[26]但是因爲大氣的濕度高，故在炎熱時容易令人感到疲乏無力。而在八月到九月時，就會有季節性的颶風及颱風來襲，可使大氣煥然一新。十月和十一月的天氣，通常令人感到安適，至十二月底，雨季便開始，延續至隔年一、二月。[27]

中國人對氣候的觀察與描述即使正確，但對行走海路到中國貿易的西方船隻

---

[20] 同上。

[21]清光緒 24 年，《嘉義管內打貓各堡采訪冊－打貓西堡．災祥》，成文出版社，民國 73 年出版，頁 9。

[22]陳衍，《臺灣通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民國 82 年，頁 207。

[23] 沈茂蔭，《苗栗縣志．祥異》，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72 年，頁 160。

[24]清光緒 24 年，《嘉義管內打貓各堡采訪冊－打貓南堡．變異》，成文出版社，民國 73 年出版，頁 49

[25] 約為攝氏 6 度。

[26] 約為攝氏 37-38 度左右。

[27] 馬偕博士 著/林耀南 譯，《臺灣遙寄》，臺灣省文獻會編行，臺灣叢書譯文本第五種，頁 26。

而言，顯然是不夠精準的，是故當英人李泰國及赫德進入中國的海關體系時，發現必須引進更先進的氣象觀測技術，才能確保航行在中國沿江沿海的船隻安全，減少商業貿易上的損失。

三、 清代臺灣近代化氣象建設

（一）赫德與滬尾關的設立

赫德（Robert Hart）是晚清海關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北愛爾蘭人，咸豐四年來華，先在香港擔任見習翻譯的工作，隨後被派往寧波擔任英國駐寧波領事館的翻譯官，同時亦充任香港督署之書記官。九年，赫德辭去翻譯官的職務，前往廣州，擔任粵海關副稅務司，開始參與中國海關的工作。十一年，李泰國授權給赫德，要求他代為購置戰船，赫德因此向總理衙門建議建立阿思本艦隊。同治二年，李泰國去職，由赫德接任總稅務司之職務，以上海為其駐地，同治八年（1869），晉升布政使。[28] 赫德接手李泰國的職務後，雇用英人金登干為其在英國辦事處的代表，負責處理赫德的財務問題、尋找各項建設所需之物資及適宜在海關之中擔任職務的人才。

道光 22 年（1842），中國因鴉片戰爭戰敗而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英國要求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為對外通商口岸，准許英人貿易、居住設領事，中國沿海口岸從此門戶大開。臺灣位於中西往來的海洋通道上，自荷治時期以來便有著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而島內豐富的物產資源，從鹿皮到茶、糖、樟腦等商品貿易，使臺灣在國際上備受重視。咸豐 8 年（1858），中國分別與俄、美、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在原本開放的五口貿易港之外另增臺灣、登洲、潮州、瓊洲、牛洲等府城口予以通商。咸豐 11 年（1861），英國副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依條約來臺勘查通商港口的情形，臺灣府海口由於淤塞，致使船隻難以停泊，不適合用作通商碼頭，最後議定以滬尾為通商碼頭。郇和與清廷議定以滬尾為通商港開始，許多外國商船也紛紛到滬尾停泊，中國方面也加速趕辦設關徵稅的工作。清廷將此事交由福建候補道區天民會同臺灣鎮、道、府之官員一同辦理。同治元年（1862）六月，區天民以滬尾守備舊署開設海關，正式收稅。以滬尾關為本關，之後在雞籠、安平、打狗等地為分關。雞籠原本並不在開港之列，只因該港天然環境良好，適合吃水較深的大船停泊，其後更將雞籠港訂為滬尾港的子口；而將打狗港訂為安平港的子口。同治 2 年（1863）左宗棠等人建議將「子口」改為「外口」，於各口設關，並設副稅務司專管四口稅務，稅銀則由臺灣、滬尾造報，按月解交閩海關庫。[29]滬尾關屬於新關，設立之初並未設置海關監督，而是交給閩海關之福州將軍兼管，同年八月，英人侯威爾（John

[28]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赫德傳〉，頁 12362-12363。

[29] 徐福全，《臺北縣縣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臺北縣文化局，民國 94 年，頁 2-3。

William Howell）擔任首任副稅務司，海關之職務在臺灣建省後，則由臺灣巡撫兼管，新關的行政權則交由總稅務司赫德控制。稅務司僅負責監督海關的行政事務，對於稅銀並無支配的能力，稅銀的管理主要是會同清廷的地方官員聯合辦理。由洋員管理的滬尾關，在編制上與一般行政機關有所不同，其職務分別有：稅務司（Commissioner）、頭等幫辦（1st Assisant）、二等幫辦（2nd Assistant）、三等幫辦（3rd Assistant）、四等幫辦（4th Assistant）、供事（Clerk）、總巡（Tide Surveyor）、二等驗貨（Examiner）、三等驗貨（Assisant Examiner）、頭等鈐字手（1st Class Tidewaiter）、二等鈐字手（2nd Class Tidewaiter）、三等鈐字手（3rd Class Tidewaiter）、醫師（Surgeon）、技師（Engineer）、燈塔執事人，這些職務幾乎都以英國人擔任，僅少數較爲低階或非技術性的職務才交由中國人負責。

海關的任務除了負責向入港的船隻徵收船鈔之外，赫德花了不少功夫整頓海務，包括港務、航政的建設和引進海務科學技術管理等方面。其具體內容主要包括：（1）指定航船停泊地段，維持泊船界內航船的秩序，制訂指示行船章程等港務工作，管理引水業務；(2)燈塔、航標的設置和保養；（3）氣象觀測；（4）疏浚航道；（5）檢疫。[30]

（二）清代臺灣氣象事業的準備

同治 7 年（1869），清朝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有鑑於外國商船常因不熟悉中國沿海海域，常遇到礁石險灘和惡劣氣候，造成商船的損失，爲保護往來船隻安全，赫德在設置燈塔的同時，亦同時決定設置氣象測候站。

同治 12 年（1874），赫德積極辦理建立燈塔的工作，另外試圖將西方觀測技術及氣象制度引進中國，並且想在中國開班授課，培訓氣象專業人員，在這樣的前提下，赫德必須先尋求一位優秀的氣象人才，這位人選必須「要具備天文學家和氣象學家的必要知識和經驗，他要既是一個好教師，又是一個優秀的觀測家。」[31]赫德的徵選條件乍看之下有些嚴苛，但也可看出赫德對這個角色相當重視，因爲赫德希望此人能夠「（在中國）開辦氣象站，由此發展成為天文學教習，並掌管一個同文館附設的天文台。」並且，此人要在三年之內「將沿海各台與北京天文台下設的總台聯結起來。」[32]，赫德所中意的這位人選便是英國的天文學教授－科普蘭(Copeland)，經過多次的協議，科普蘭也願意來華擔任氣象教習的工作。

光緒元年（1876），赫德正式向總理衙門推薦科普蘭來華擔任天文學教習的工作，卻被清廷以「不需要」的理由拒絕了，於是赫德意欲在中國開辦氣象台及培育氣象人才的事情便就此停頓了下來。[33]

---

[30]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231。

[31]陳霞飛 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匯編（1874-1907）》，中華書局，第一卷，頁 69。

[32]陳霞飛 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匯編（1874-1907）》，中華書局，第一卷，頁 222。

[33]陳霞飛 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匯編（1874-1907）》，中華書局，第一卷，頁

雖然聘請氣象學教授一事並不順利，金登干卻已將所有氣壓計及氣象儀器於該年七月由漢口號運送至上海及香港，雖然漢口號到達上海時亦遭颱風襲擊，但所幸所有氣壓計及氣象儀器未受損傷。赫德仍持續進行氣象測候站的設立，在中國沿海及內河各口海關，南起廣州，北至牛庄，分佈於緯線 20°、經線 10°的範圍內，因爲很適合作爲觀測氣候之用，但因聘請氣象教習一事受阻，僅只購置於儀器設備，並無請專人管理。[34]

光緒 4 年（1879），夏秋之際，徐家匯天文台[35]測出將有颱風襲擊上海，氣象人員趕緊向沿海各商船發出預報。這次的預報相當準確，海關巡工司華士璧對此相當敬佩，認爲準確的天氣預報能夠使損失程度降到最低，遂召集上海商會及船行代表與天文台商洽，希望該台以後常發氣象預報。海關方面亦表示中國沿江、沿海各測候所能夠提供氣象情報。此後，海關各測候所即與徐家匯氣象台合作。自光緒 9 年（1884）起，徐家匯氣象台與各口燈塔站開始互通氣象情報，臺灣諸氣象觀測站亦納入此一系統，開啓了臺灣氣象觀測的近代化歷程。

四、 臺灣氣象事業的近代化發展

臺灣最早使用近代觀測儀器紀錄氣象的紀錄出現於同治 12 年（1874）的牡丹社事件，西鄉從道率隊攻打恆春時，軍團的野戰醫院曾經利用現代儀器進行爲期七個月的氣溫觀測，但觀測地點僅在恆春一地，並未系統化地擴及全島。[36]

光緒 8 年(1883)，英國政府決定成立香港天文台，派遣杜貝克（William Doberck）爲首任台長，並計畫擴張氣象事業，杜貝克希望能夠掌握漢口、牛庄及長江內陸的氣象情報，以維護英國船隻在中國海（China Sea）航行安全，希望能夠趁機研究亞洲，尤其是中國南方沿海一帶的氣候，並釐清颱風發生的原因、時間，以便

347。

[34] 陳霞飛 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匯編（1874-1907）》，中華書局，第一卷，頁 15。

[35] 法國耶穌會為擴大傳教任務和實現在南京與上海間建立觀象台的計畫，指派南格祿、李秀芳、艾方濟等傳教師來華。他們於 1845 年從籌畫建立觀象台，但卻未能實現。1872 年，天主教江南教區的主教郎懷仁與耶穌會江南傳教會的會長谷振生在徐家匯召開了會議，決定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同時由高龍磐神父領導，在徐家匯建立一座觀象台，並將氣象紀錄和觀測結果編成年報，在上海出版並寄往歐洲。經籌畫後，徐家匯觀象台於 1872 年 12 月 1 日開始氣象觀測。1873 年 2 月，天主教江南教區，選定於徐家匯肇嘉濱西岸，興建兩層平台的五開間平房，7 月竣工，8 月徐家匯觀象台正式建立並開始觀測，同時印發氣象紀錄月報表。1874 年，徐家匯開始進行簡單的地磁觀測，同年，能恩斯神父接替高龍磐神父的觀象台工作。1879 年 7 月 31 日，強烈颱風來襲，商船損失慘重，在公董局及外商輪船公司的要求下，觀象台等設立了航海服務部，並於 1882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向上海各報發佈送中國沿海氣象預報。（溫克剛 主編，《中國氣象史》，北京：氣象出版社，頁 425。）

[36] 台湾氣象會 編著，《台湾総督府氣象台沿革史--自明治 29（1896）至昭和 23（1948）》，頁 11。

向航行於中國海的各國船隻，提供準確的氣象資訊。[37]

而此時清海關總稅務司赫德亦正試圖建立中國的氣象事業，將中國各海關新聘之燈塔執事人在執行其勤務之前，先送至香港，在領港工會先受指示信號的燈塔業務訓練，並開設氣象訓練班，增加執事人之氣象知識。[38]

香港天文臺提供了觀測儀器及技術指導，赫德開始於中國沿岸的各海關與燈塔實施儀器氣象觀測，該臺遂要求與上海徐家匯氣象台及臺灣各港、及澎湖交換氣象情報。光緒 10 年（1885），基隆、淡水、安平、打狗等四所海關，及漁翁島、南峽（今鵝鑾鼻）二燈塔開始氣象觀測。[39]

當燈臺執事人將溫度、氣壓等氣象資訊記錄下來後，必須利用通信系統將之傳送出去，但當時臺灣並無設置任何電報線，只能利用官船將氣象報表按月發送至上海徐家匯氣象台。1883 年丁日昌試圖架設由福州至臺灣之海線，以及由台北至安平之陸上電線。但由於經費困難，最後僅架設由臺灣府城至旗後（今高雄市），以及府城至安平二條電報線，合計長約九十五里，均由電報學堂學生自力完成。[40]劉銘傳入臺後，對架設水陸電報線頗爲重視。光緒 11 年（1886），劉氏於臺北設立電報總局，架設由基隆－淡水－台北，以及台北至安平之陸線，全長七百餘里，沿線並設有電報局五處，由德商泰來洋行承攬。另外，劉氏並架設淡水至福州線，以及安平至澎湖之水線，於光緒 12 年（1887）8 月開工，由英商怡和洋行承包。水陸兩線合計一千四百餘里。[41]

淡水與福州間的海底電纜於光緒 13 年建造完成，得以啓用，此時淡水與香港間才有氣象電報交換。但可惜的是，1895 年，當日軍進入淡水時，所有氣象儀器幾乎完全被毀壞，清末的氣象紀錄亦幾乎完全散佚，使後人無法還原清末淡水的氣象原貌。[42]

西元 1895 年，臺灣被割讓予日本，在日軍進入淡水之前，部分清國敗兵的武裝就已經被外國人解除，故日軍進入淡水時並沒有遭受到太多的抵抗，這些清國敗兵則被安置在電信局、舊兵營及寺院內外，共三千多名。[43]臺、閩之間的海線此時已經損壞，通信亦跟著中斷，淡水電信局內又因收容清國敗兵，導致電信

---

[37] W. Doberck，〈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Administrative Reports— Hong Kong》，1883 年。

[38]陳霞飛 主編，《中國海關密檔－赫德、金登干函電匯編（1874-1907）》，中華書局，第一卷，頁 527。

[39] 寺本真吉，〈氣象事業發達の徑路及趨勢に就て－天空に交錯する無線の氣象報告、氣象に支配されたる文明の發祥〉，《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灣警察協會 發行，第 108 期，頁 218。

[40] 《臺灣史》，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五南出版社，頁 149。

[41] 《臺灣史》，黃秀政、張勝彥、吳文星著，五南出版社，頁 163。

[42]寺本真吉，〈氣象事業發達の徑路及趨勢に就て－天空に交錯する無線の氣象報告、氣象に支配されたる文明の發祥〉，《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臺灣警察協會 發行，第 108 期，頁 218。

[43] 齋藤謙藏，《台灣戰史》，頁 109。原譯文見曾令益，〈1895 年《淡水新政記原稿庶》之史料介紹及其價值〉，頁 9。

業務無法執行。

此時淡水尚處於混亂的狀態，日本雖已取得臺灣的統治權，但日、清對於海關的部分財產轉移產生疑慮，無法釐清其所有權是屬於赫德本人抑或是清朝政府，導致延遲海關的部分交接；還有淡水至福州間的海底電纜如何修復、切割其歸屬權的爭議仍尚在與清廷協議，再加上原本駐守在海關工作的英國人開始撤離臺灣，而所有氣象儀器因戰爭而幾乎被完全毀壞，無法繼續氣象觀測的工作，以上種種狀況加起來，使得氣象情報的交換至此完全中斷，原本上海—香港—淡水的三角氣象資訊交換系統無法繼續運作，爲此上海徐家匯氣象台、香港天文台展開了回復氣象情報交換的交涉。

明治 28 年(1895)11 月 27 日，日本恢復向香港天文台發送淡水每個月兩次、漁翁島燈塔於每個月一次的氣象情報交換。

至於上海方面，徐家匯氣象台台長 Liredor 透過駐日公使向日本政府要求盡快恢復淡水、台中、臺南、恆春、及澎湖的的氣象情報交換，包括發送每日兩回，分別於上午十點及下午一點的氣象觀測記錄，[44]但由於日本政府花了一些時間平復島內的混亂局勢，日本政府遲至於明治 29 年（1896）2 月才派遣技手近藤久次郎恢復淡水的氣象觀測，利用簡陋的氣象儀器，向上海徐家匯氣象台發送淡水及澎湖的氣象情報。最後，3 月 31 日，臺灣總督府發佈敕令第九十七號「臺灣總督府測候所官制」。[45]，臺灣總督府決定在臺北、臺中、臺南、恆春、澎湖等地設立測候所，並於 10 月，開始與沖繩、九州開始氣象情報交換，從這個時候開始，臺灣總督府才開始建置臺灣的氣象觀測網。

五、 結論

從清初到清末，政府的態度由被動的紀錄轉爲主動地紀錄和預測，爲促進商業蓬勃發展，減少貨物的損失，所以需要更加精準的紀錄。無線電信的發展使得氣象情報得以快速交換，爲臺灣近代化的氣象事業又加了一把力上去。

臺灣位於東亞航運的重要位置上，淡水成爲對外的通商口岸之後，更多的商船往來於臺灣海峽與中國東南沿海之間，爲了確保船隻在海上的穩定安全，赫德決定加強相關的配套措施，並開始重視氣象資訊的擷取與交換。

清關稅總司赫德在中國南方沿江沿海一帶設置燈塔、燈船、燈杆等能夠指引船隻方向的設施，在人員的任用上，他也挑選具有基本氣象知識的人來擔任燈塔執事人的工作。同時，他也了解臺灣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氣象資訊對於交通運輸上的運用，無論其在管理、運輸及調配上均有直接的經濟價值，能使貨物不

---

[44] 〈本島氣象通報ニ關シ徐家匯氣象台長謝狀〉,《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0 年 3 月 1 日。

[45] 〈臺灣總督府氣象事務沿革〉,《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明治 37 年，第四十一卷。

致遭受運輸上的損失。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得知臺灣的氣象情報必須與上海徐家匯氣象台與香港天文台做交換，這個三角模式：中（淡水）－法（徐家匯）－香港（英）的運作，使得中國東南沿海一帶的氣象資訊得到完整，這也是爲什麼當日治初期淡水的氣象情報因戰亂而中斷時，上海和香港方面會如此苦惱，並想盡辦法要恢復交換的原因，而這種種的一切都透露出淡水在國際間所扮演的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一切盡在影像中-淡大一甲子今昔對照

馮文星*

攝影-今日的詭計，明日的真理

攝影-拓展與延伸人生視野的無限可能

民國三十九年西元 1950 年，張驚聲父子創辦淡江英語專科學校，是全台第一所私立高等學府，當時的校址只是淡水真理街中的一幢小木屋。1953 年，校址遷至五虎崗上，奠定永續發展的根基。並於 1958 年改制爲文理學院，初期只核准設立五個學系，在持續發展不同的學術領域後，成爲中西學術文化兼容並蓄的學府，終於在 1980 年升格爲今日的淡江大學。

以下各大項一一列舉其中之強烈對照感之照片，期能一窺淡大六十年來發展歷程之大要：

一、老淡水 火車站

二、地形 地物 建物篇

三、各大樓興建前後對照

四、張創辦人篇 薪火相傳篇

五、開學典禮 畢業典禮篇

六、校務運作行政辦公會議篇

七、學生活動篇

八、體育活動篇

九、歷史文物篇

十、淡江第一波到第四波

*淡江大學教學科技組編審

淡江大學發展至今，歷年來所拍攝之平面影像(照片)超過十萬件。

從影視史學的觀點，任何歷史作品不論是視覺的或書寫的，都無法將有意陳述的歷史事件或場景，完整地或大部份地傳真出來，即使連歷史上任何一件小事也無法全盤重現，但透過影像(照片)的證據，是重述(重現)某些歷史情境的基本要素，它比單獨使用書寫的或語言的證據更確實可靠，且經長期有系統的整理，至少可以透過視覺影像，提供傳達歷史以及我們對淡大校史的初步見解。

與會學者、人士名錄

*依姓氏筆劃排列

內田康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尤昭和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方子毓　臺灣觀光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王　樾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王君豪　政治大學助理
王君鑫　民權國中地理科教師
王怡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博士候選人
王俊德　淡水古蹟博物館志工
王胤傑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王健一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王嘉成　教育部技職司科員
王榮成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王韻涵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江永德　國立中正大學講師
江杰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江衍燦　中華攝影教育學會教學企劃
米復國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何永成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河原功　東京大學文學部兼任講師・日本大學文理學部兼任講師
何惠娟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研究生
余承霙　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生
吳文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吳明勇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吳明曄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吳政霖　東吳大學研究生
吳梅瑛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
吳雅雯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吳曉昇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生
吳宜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臺北市立中崙高中國文教師
呂昆彥　淡江大學盲生中心歷史助教
呂詠彥　文化大學博士生
李文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李永志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李亞祝　英國萊斯特大學學生

李其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後研究
李宜錚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李尚軒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李政儒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研究生
李庭瑜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李振銘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李健鴻　中國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助理教授
李凱騏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李慧劍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李威明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李聲慶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卓心美　退休教師
周宗賢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泓欣　石碇高中歷史科教師
周　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周國勛　檔案管理局
林子惠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林呈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志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林承緯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林玫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兼體研中心主任
林信成　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主任
林茗蓁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林詠翔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
林煜堂　砂拉越馬來西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林煌達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邱大祐　繁星多媒體公司企劃編輯
邱怡庭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
邱奕統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邱炯友　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
邱清文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聘用幫工程師
邱馨慧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阿部由理香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生
俞怡萍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研究所碩士
洪子容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洪致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
洪詩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紀榮達　滬尾田野工作室主任

范亨達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柳玉亭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研究所研究助理
唐耀棕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孫寅華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徐浤馨(年生)　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助理教授
殷豪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翁佳音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袁家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
郝崇植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馬耀輝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高上雯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高柏園　淡江大學行政副校長
高菁敏　開得數位科技顧問有限公司專案助理
高菱憶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張仁豪　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專案助理
張玉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生
張建隆　淡水社區大學主任
張炳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碩士生
張家宜　淡江大學校長
張家瑋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張常昌　士林社區大學幹事
張淳善　淡水鎮公所記者
張勝彥　國立台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張惠真　新竹市光復高中教師
張震鐘　中國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
張雙英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主任
張寶釧　淡水古蹟博物館第一任館長
張耀中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張志強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梁蘭莒　淡江大學研究生
莊蕙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許吟甄　立福貿易公司
許東來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導覽解說
許瑞敏　惇敘工商教師
郭仲軒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郭秋慶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所長
郭婷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郭福林　淡水國中教師

陳世芳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
陳俐甫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陳建仲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博士生
陳建良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陳思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研究助理
陳若明　新店國小教師
陳祝滿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導覽解說
陳新宏　國際語文教育協會研究員
傅錫壬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榮譽教授
富田哲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彭康泰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生
曾令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曾斌涵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馮文星　淡江大學教學科技組編審
黃一峯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黃民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黃宇暘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黃俊銘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黃建淳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黃彥霖　東吳大學研究生
黃淵泉　前國家圖書館編纂兼主任
黃繁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黃俊龍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楊育鎂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楊明昱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楊善惟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葉惠芬　國史館協修
虞國興　淡江大學學術副校長
趙嘉璘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劉俊裕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劉淑芬　國立空大北二中心人文學系學生
劉綺文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劉增泉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劉德敏　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劉慧娟　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歐淑莉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造形研究所碩士生
歐陽瑞蓮　開得數位科技顧問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潘依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碩士

蔡文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蔡怡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候選人
蔡葉偉　淡水鎮鎮長・美國明尼蘇達州聖馬立大學教育領導博士
蔡維民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蔡錦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鄭毓瑩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鄭慶來　導遊
鄭麗珍　導遊
盧啟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賴怡成　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戴瑞君　淡水文化基金會秘書處主任
戴萬欽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副校長
薛宗銘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三年級學生
謝美娥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謝德錫　淡水文化基金會副執行長
羅振宇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羅運治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蘇培堯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第五屆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委員名錄

會務顧問：邱炯友

主任委員：林呈蓉

總 幹 事：吳明勇

秘 書 組：楊育鎂、劉增泉、陳子璿

論 文 組：周宗賢、黃繁光、林煌達

議 事 組：王　樾、唐耀棕、高上雯

接 待 組：黃建淳、羅運治、何永成

總 務 組：尤昭和

會 計 組：尤昭和、李秀蕙

Memo